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七十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七十年

第一章 在土地革命战争中诞生和成长

一、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军事问题的探索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建立，是近代中国社会变化和革命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

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开始，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不断侵略下，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封建社会逐步演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群众的矛盾，构成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则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发展和尖锐化，造成了近代中国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从鸦片战争到 1919 年五四运动前夕，中国革命处于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期间，中国人民进行过无数次斗争，其中包括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戊戌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运动。这些斗争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清朝的封建统治，使他们灭亡中国的阴谋不能实现，表现了中国人民为追求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和祖国富强而前赴后继、英勇斗争的革命精神。但是，这些斗争都失败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并没有改变。历史表明，在中国，无论是农民战争或是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都不能彻底解决中国的社会矛盾，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历史地落到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宣告了党的成立。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为党的创立奠定了阶级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开始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奠定了思想基础。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开始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阶段。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年以后，1922 年 7 月，在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即：“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党首先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从 1922 年 1 月至 1923 年 2 月掀起了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武装镇压下，1923 年二七惨案发生后，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在斗争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得到了血的教训：如果没有强大的同盟军和革命武装力量，就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从此，党采取积极步骤，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组织革命统一战线，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战争。1923 年 6 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以党内合作形式，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推动下，孙中山加快了改组国民党的步伐。

1924 年，召开了有中国共产党人参加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对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明确提

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在实际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从而奠定了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民族民主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国共两党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国出现了大革命的新局面。这是一场旨在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压迫，推翻封建主义和军阀统治的民族民主革命。它以战争为主要形式，史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参加组织军队、进行革命战争的早期实践。

这场革命经历了创建广东根据地和进行北伐战争两个阶段。在统一战线旗帜下，国共两党合作，于1924年和1925年，创办了黄埔军校和创建新制度的军队，联合其他的军队，扫荡了广东的反革命势力，建立了广州国民政府，统编了国民革命军，击退了国民党右派的进攻，发动了广东工农运动，举行了省港大罢工配合上海工人五卅运动，使广东成为中国革命的根据地和策源地。

1926年6月，广州国民政府出兵北伐，向北洋军阀发起强大的进攻；工农民众运动也由南向北迅猛发展，冲击着买办豪绅阶级的统治基础，有力地支援北伐军作战。到1927年3月，北伐军已先后占领了湖南、湖北、江西、福建、浙江的全部和江苏、安徽的一部，打败了北洋军阀吴佩孚和孙传芳两个集团，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广大的人民解放斗争。一个光明的中国有望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

但是，就在革命胜利发展的同时，国民党内部的反革命势力也在迅速增长。

1925年3月，孙中山过早地逝世了；8月，坚持执行孙中山革命思想和政策的廖仲恺也被国民党右派刺杀，代之而起的蒋介石和汪精卫，本质上是军阀和政客，在国民党尚未成气候时，他们虚伪地赞同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保持合作关系，支持工农运动；而当着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时，他们已分别在国民党内部形成了反革命集团，各自控制和依附的一部分军队，毫不踌躇地将革命力量打入血泊之中，相继于1927年4月12日和7月15日公开叛变革命，背叛孙中山决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政策，勾结帝国主义残酷地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篡夺了革命和战争的胜利果实。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还处在幼年时期，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这三个基本问题上都还没有经验，对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懂得不多。从这一时期的中期开始，党已处在敌人和同盟者的阴谋诡计的包围之中，但没有警惕；这一时期的后期，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实行右倾机会主义，主动放弃对革命的领导权，特别是军权，当着国民党反革命派突然袭击时，采取妥协投降政策，不能组织党和人民进行有力的反抗，这就导致了革命无可挽回的失败。

经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实践，中国共产党已对军事问题作了初步的探索。这种探讨和实践，在客观上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党独立领导人民创建军队和开展革命战争作了必要的准备。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中国大革命，“准备好了红军的种子，准备好了红军的领导者即共产党，又准备好了参加过一次革命的民众。”

全称“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因设在广州黄埔港附近的长洲岛上，故简称黄埔军校。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1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与国民党合作建立新制度的军队

中国共产党早期军事实践的主要内容，是与国民党合作建立新制度的军队。黄埔军校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军事活动的“开端。1921年共产国际派代表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派出的张大雷陪同下，到桂林与孙中山进行了秘密会晤，期间提出了建立军校的建议，得到了孙中山的赞同。1923年8月，孙中山派出蒋介石、张太雷等组成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俄考察政治和军事。

11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建立“国民军军官学校”的决定。国民党“一大”以后，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国民党由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开始转变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帮助和参与下，孙中山加快了建立军校的步伐。1924年6月，黄埔军校正式创立。孙中山认为，创办军官学校，就是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革命军应以“救国救民”为宗旨，“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为保证革命军成为党军和有革命的精神，他决定汲取苏俄红军的政治工作经验，实行政治工作制度。

这时，国民党内具体负责建军工作的是廖仲恺和蒋介石。廖仲恺的主要工作在政府；蒋介石热衷于沿袭军队的私有制和雇佣军制度，以便控制军权。

这样，依照苏俄红军建设的经验，开展军队政治工作的重任，便落到了共产党人的身上。

（一）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部队中建立特别党部、党代表和政治部制度

依据中国特点，并参照苏俄红军的经验，黄埔军校和革命军建立了国民党特别党部、党代表和政治部的制度。共产党人参与设置并着重负责贯彻这些制度。

特别党部制度先在黄埔军校实行，后推广到国民革命军其他一些部队。它规定凡国民革命军官兵皆为国民党党员，皆应受国民党的组织和纪律的约束，完全接受党的训练、指示、管辖和制裁。这个制度自成垂直系统，各级党部设执行和监察两个委员会，履行职责，其总体职能在于保证军队“党化”，使军队成为有“铁的组织、钢的纪律”的党军。

党代表制度摹仿苏俄红军的政治委员制度，先在黄埔军校实行，后国民革命军的军一级也普遍实行。它代表国民党监督同级军事长官行使军权，规定凡呈请、命令、通告和指挥事宜，均须党代表副署才有效。

政治部制度先在黄埔军校实行，后在国民党革命军师以上各级实行，为司令部下属单位，与参谋部（处）并行，受同级党代表指导，对内负责官兵的政治训练，对外宣传、发动民众。团一级设政治指导员，履行政治部职能。

这三个制度，特别是党代表和政治部制度，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毛泽东曾给予很高的评价，指出：1924年到1927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组织新制度的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

孙中山：《陆军军官学校开学演说》，1924年6月16日。

孙中山：《北上宣言》，1924年11月10日。

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

（二）承担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绝大部分政治工作

黄埔军校建立半年内，国民党中央曾先后任命两任政治部主任，但均不久去职，故这期间的黄埔军校，名有政治部，实无主任，更无机关和工作。1924年11月，周恩来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不久升任主任。他上任后立即建立机关，开展工作。从此到1926年，黄埔军校政治部基本由共产党人负责。先后担任主任和副主任的还有熊雄、鲁易。期间，聂荣臻、杨其纲、洪剑雄等，先后在政治部机关工作。

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学工作和特别党部也基本由共产党人担负。恽代英、高语罕等先后担任政治主任教官，萧楚女等任政治顾问和政治教官。金佛庄、周逸群、蒋先云等10余人先后当选为校特别党部第一至第四届执行委员或监察委员。到1926年6月，在校供职的共产党员已达160多人。

1924年10月，国民党组建党军教导第1团时，共产党员胡公冕出任营党代表，许继慎、黄鳌、张际春、曹渊等9人分任连党代表。翌年8月，党军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1军，周恩来任军政治部主任兼第1师党代表，后升任该军副党代表；鲁易任第3师党代表；蒋先云（后在北伐时牺牲）、严风仪、王逸常等7人分任其中7个团的党代表。此外，还有许多共产党员在军、师政治部工作，或在团任政治指导员，在营连任党代表。到1926年3月，在第1军工作且身份公开的共产党员有250多人。

10月，中共中央统计全党人数时，在国民革命军中工作的党员已占全党党员数的8.5%，达1500多人。这些党员的绝大部分在各级做政治工作。

从1926年春到1927年初夏，在国民革命军担任军级政治工作职务的共产党员还有：任第2军副党代表的李富春；任第3军副党代表的朱克靖；任第4军副党代表的罗汉；任第6军副党代表的林祖涵（林伯渠）；任第7军政治部主任的黄日葵；任第8军政治部主任的彭泽湘等。当时，各军并不完全实行政治工作制度，故凡实行这个制度的部队，其政工干部的绝大部分都是共产党员；当时的各军党代表，皆由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兼任，副党代表是实际上的党代表。周恩来曾经说过，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几乎全由共产党人担负。

（三）培养官兵“一心一意为国家奋斗”的革命精神

孙中山在确定建军原则时，曾一再强调革命军的官兵要有“不要身家生命，一心一意为国家奋斗”的革命精神。这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基本一致的。中国共产党在开展政治工作时，努力对官兵进行思想教育，使之树立“一心一意为国家奋斗”的革命精神。

周恩来主持黄埔军校政治部工作后，制定了政治训练计划，通过举办政治讨论会、出刊物、办墙报、教唱革命歌曲等多种形式，使军校内形成浓烈的进步政治空气和民主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1925年的两次东征，他除了抓战斗各阶段的政治动员外，着重组织了政治宣传队，开展对革命军和民众以及对敌军的宣传，并且建立“血花剧社”随军开展慰问和宣传活动。政治工作的效果在东征中得到了检验。蒋先云在他的《由前敌归来》的报道中曾这样写道：“当营连党代表、当下级干部的

《毛泽东选集》，第2卷，380页。（本书以下只注卷和页）

孙中山：《陆军军官学校开学演说》，1924年6月16日。

都是我们的同学。打淡水城时，同学身先士卒，扒城先登，不知道什么生死”，“这种精神，亦就是平日主义训练的结晶”。政治部宣传队也被官兵誉为“伟大的宣传队”。

这种精神，是革命军的灵魂，是革命军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了这种精神，就产生了主动的、富于攻击精神的作战，有了东征和北伐的胜利。

（四）建立和发展叶挺独立团，培养了一批共产党的早期军事骨干

1924年10月，中共广东区委从平定广州“商团军”动乱的斗争中，认识到有必要为统帅部建立一支机动分队。在孙中山的支持下，组建了大元帅府铁甲车队。

1925年11月，周恩来和中共广东区委，在征得国民革命第4军军长李济琛的同意后，由黄埔军校抽调干部，组建了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34团（次年改称独立团），原铁甲车队编为该团1个营，叶挺任团长。该团建立了共产党支部，著名的共产党员除叶挺外还有参谋长周士第，营长曹渊（后在北伐中牺牲），许继慎，参谋董仲明（董朗），连长卢德铭等。这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自己直接掌握的武装。这支部队政治素质好，军纪严明，训练有素，战斗力很强。1926年5月，它作为北伐军先遣队、尖刀团，率先由广东出发，首战碌田，长驱泗汾、醴陵、平江，血战汀泗桥，直捣武昌城，所向披靡，令敌军闻风丧胆，令友军赞叹不已，为国民革命军第4军北伐部队获得“铁军”殊荣作出了主要的贡献。

1927年春，叶挺升任为扩编的第11军第24师师长（后晋升为第11军副军长兼第24师师长），带走独立团的一批干部充任该师3个团的骨干：独立团大部编为第4军第25师第73团，一部编入第75团，此后，第73团又调出一批骨干组建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卢德铭任团长。该团担任位于武昌的国民政府警卫任务，故又称武昌警卫团。

1926年1月，国民党中央决定把黄埔军校改成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同年冬在武汉创办分校，1927年3月，武汉分校改为主校。期间，共产党员恽代英任政治主任教官，郭沫若、周恩来、李富春、李达、蔡畅等先后兼任武汉军校政治教官，陈毅做学员队政治工作。武汉军校师生近4000人，学员队相当于1个团，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帮助国民党建立的又一支部队。

在参加创办黄埔军校和武汉军校的时候，为保证学员的政治素质，每当招生，中共中央都指示各地组织动员党、团员和优秀青年报考军校。这既为国民革命军输送了一批优秀的军官，事实上也培养了共产党早期的一批军事骨干。

（五）给稍后编入国民革命军的一些部队以民主的政治训练

1926年7月，湘西地方部队贺龙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要求总政治部派政工干部到所部开展政治训练。中共湖南区委受总政治部委托，派周逸群率政工干部30人前往贺部工作，对部队政治素质的提高起了明显的作用。

1927年2月和6月，贺部编为独立第15师后扩编为第20军。周逸群在部队建立政治部，并发展共产党组织，贺龙了解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后，强烈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坚定地站在革命力量一边。

1926年7月，共产党员段德昌到国民革命军第8军第1师任政治部秘书

《中国军人》，第2号，1925年3月20日出版。

《东征记略》，《政治周报》第2期，1925年12月20日。

长，后升任主任，与该部第1团第1营首长彭德怀来往密切，促使该团首先建立士兵委员会，维护士兵民主权利。后来，彭德怀升任第1团团团长，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该团建立共产党组织。

其间，共产党员朱德、刘伯承在四川军阀部队中开展国民革命宣传，影响川军的部分将领率部在泸州、顺庆兵变，组成国民革命军第15军，刘伯承任军长。这个军不久失败，但这次兵变给川军以一定的触动。此后，刘伯承到中共中央军事部工作；朱德到第3军任军官教导团团长，又给所部以革命影响。国民革命军高级军官叶剑英，也在这一时期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并于武汉国民党当局公开叛变革命前夕，加入中国共产党。

应当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上述努力，在总体上是按照陈独秀领导的党中央只负责做政治工作不掌握军权的指导思想进行的。孙中山逝世以后，掌握着军权的蒋介石和各军将领，逐步背离孙中山的革命主张，沿袭旧军队的私有制和雇佣制，反对在部队中开展革命的政治工作或者只在所部形式主义地开展政治工作，把共产党人的政治工作划定在为他们巩固部队和提高战斗力的范围内，完全服从他们的需要。当他们不再需要时，便毫不留情地把共产党人赶出军队，甚至惨无人道地对共产党人实行屠杀政策。所以，尽管共产党人在一部分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民革命军的雇佣军队的性质。一旦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他们所掌握的军队即沦为新军阀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镇压中国革命的工具。这个教训是深刻的，它说明无产阶级政党不掌握军权，就不可能建立和建设起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

但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这些努力，对后来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建立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是它使党得到了深刻的教训，认识到掌握军权的极端重要性，开始创建一支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二是有了军队建设的初步经验，为后来人民军队建设奠定了基础。三是在国民革命军的官兵及黄埔军校的师生中，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同时，还直接掌握了少量部队。后来，在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平江起义等重大武装起义中，党所影响和掌握的部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时期培养的党的早期军事骨干，如朱德、刘伯承、聂荣臻、陈毅、林彪、朱云卿、左权、萧劲光、粟裕、黄鳌、周逸群、徐向前、许继慎、曾中生、陈赓等，后来都成了红军的著名将领。毛泽东曾经指出：我们在直接准备和组织军队的问题上，“从一九二四年参加黄埔军事学校开始，已进到了新的阶段，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了。”朱德也说过：“大革命时代，许多进行军事运动的同志”，“对我军的创建是有功劳的，没有他们所进行的军事运动，就不能有独立团，就不能有南昌、秋收、广州、湘南等起义。党的军委当时也曾选派干部到黄埔军校学习，好些人后来成了红军的骨干。”

广泛动员民众，建立工农自卫军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把动员和组织工农民众，开展反帝反封建的人民解放运动，支持援助革命战争，作为工作重心。在此期间，

《毛泽东选集》，第2卷，547页。

朱德：《在编写红一军团史座谈会的讲话》，见《朱德选集》，1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党还十分重视建立工农民众武装，使工农运动和武装斗争密切结合起来。

这个工作首先从广东开始。通过召开农民和工人代表大会造声势，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和训练农民运动干部，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等措施，迅速打开局面，并由南向北发展。1925年5月，上海工人发动五卅运动，广东工人立即发动省港大罢工以响应和声援，使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买办阶级压迫的工人运动蓬勃发展，中国大革命开始进入高潮。

1926年2月，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民众“请求广州国民政府出兵北伐”。继而，中共中央在党内进行北伐的动员，提出“北伐的政纲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要求全党“从各个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组织发动民众，特别是组织发动北伐必经的湖南、湖北和河南等省农民，以接应北伐。3月，中国共产党发表通告，号召全国民众，“集中于广州国民政府革命旗帜之下，助成他的北伐使命”；并且指出，民众不可坐待北伐军来解放自己，“应立即起来团结，武装和革命”，求得自身的解放。北伐战争开始后，湖南和湖北农民运动兴起。为了将全国农民运动引向深入发展，中共中央于11月任命毛泽东为中央农委书记；毛泽东制定了全国农民运动发展计划。这个计划是全国农民运动发展的蓝图，它提出以集中为原则，就全国而言，要求除广东省以外，应集中在湖南、湖北、江西、河南4省发展；各省也应贯彻集中原则，湖南着重是湘南、湘中和湘东北等地区，湖北着重是京汉铁路两侧和长江两岸地区，江西着重在吉安经南昌至九江一线，河南着重在京汉路沿线等地区，福建着重在闽西，广西着重在右江地区，等等。此后，全国农民运动基本按这个蓝图发展，特别是两湖的农民运动，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组织起来的农民，向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和封建宗法思想与制度发起冲击，造成空前广大的农村大革命。农民运动的兴起又促进工人运动的发展。至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前，全国工会会员已发展到280多万人，农民协会会员则发展到近1000万人。

为了适应工农运动的开展和支援革命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组织起来的工农民众建立自卫武装。首先，在广州建立“工团军”（即工人赤卫队）和农民自卫军，到1927年3月，全省的工农自卫军已达约1万人。继而，湖南和湖北也相继建立工农自卫军，到1927年6月武汉国民党当局叛变革命前，两省农民自卫军已分别发展到拥有3000枝和2000枝枪，武汉工人纠察队已超过2000人。有些地区的工农自卫军已发展为正规军，如海陆丰地区已组成400多人枪的工农自卫军常备队；湖南平江、浏阳两县，则组织了实力相当于正规军1个团的工农义勇队。

工农运动的发展得势于革命战争的胜利，革命战争则得到了组织起来的工农群众的支持和援助而胜利发展。第一次东征时，海陆丰农民自卫军主动夺取县城，迎接和支援东征军；当着北伐军由广东进入湖南时，广东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组织了数千人的输送队，将北伐军的辎重送到湘南；当北伐军转战于湖南、湖北、江西时，又有数万工农群众支援乃至直接参加了粤汉铁路两侧和赣江两岸至南浔路的历次战斗；当北伐军挺进浙苏皖时，又有湘鄂赣3省工农给以人力物力的保障，上海工人则发动武装起义策应北伐军的胜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一九二六），40、81、88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一九二六），40、81、88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一九二六），40、81、88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利进军。

当着工农民众运动蓬勃发展，推动北伐战争胜利前进时，蒋介石、汪精卫控制的国民党集团相继背叛革命，对工农运动进行了残酷的镇压。然而，革命已深入人心，镇压只能引起反抗。后来，中国共产党被迫独立领导人民进行武装斗争，各地的工农武装起义绝大部分发生在大革命时期工农民众斗争开展得比较广泛的地区，而红军的一部分，也来自于这一时期建立的工农民众武装。

在实践中认识到军队的重要性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一段时间里，还处在幼年时期，对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懂得不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因此，不可避免地出现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错误，以至于对军队的极端重要性的认识，走过一个曲折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的学说和十月革命的经验，1921年7月，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中明确规定：“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1922年，周恩来在《评胡适的“努力”》一文中指出：“真正的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蔡和森也指出，党专做工人运动是不够的。如果能用一部分力量去做军事工作，“鼓起人民武装的自卫和抵抗，使各大城市的市民全副武装或工人全副武装，那么，民主革命没有不成功，封建的武人政治，没有不崩倒的。”1923年11月至1924年1月，邓中夏接连提出，工人、农民、兵士是“革命主力的三个群众”，“军阀所恃者唯兵，打倒军阀的最有效方法是兵士运动。”恽代英写道：“革命是不能绝对脱离武力战斗的手段的”。这些认识，虽然还是初步的、概念的，基本上还处在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上，但也表现出党已经在某种程度上看到武装群众和开展兵士运动的重要性。随着与国民党合作组织新制度的军队和进行革命战争，中国共产党人对军事重要性的认识随着实践的发展在逐步提高。1925年，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中之武装斗争问题》中指出：近年来中国社会变化，已经造成武装斗争的必要条件；在这种情况下，“革命战争是主要的方式”，其他方式都是直接或间接的做革命战争的准备；军队是革命的极端紧要问题，“政治上以革命民众的政党为主体，军事上以正式的革命军队为主体，从事于革命的作战……而后中国平民才有彻底解放的希望”。同时，周恩来也提出，“军队是压迫阶级的工具，而也可以作为被压迫阶级的工具”。毛泽东在1927年3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出，必须推翻地主武装，建

蔡和森：《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见《六大以前》，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邓中夏：《论兵士运动》，见《六大以前》，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恽代英：《何谓国民革命》，见《六大以前》，1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瞿秋白选集》，2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纪念周恩来总理》（文物选刊七），3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77。

立农民武装。

中共中央对军事工作也开始重视。1925年10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四届二中扩大会议决定建立中央军事部，指导党的军事工作。1926年7月，中共中央四届三中扩大会议又专门作出《军事运动议决案》，指出“军事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本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党，随时都须准备武装暴动的党，在民族革命的进程中，应该参加武装斗争的工作，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摧毁反动的军阀势力，并渐次发展工农群众的武装势力。”

然而，在这一时期，党的主要领导人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特别是武装斗争问题上，指导思想存在着严重错误。当时党的主要领导者认为，中国革命应当分为两次：第一次是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帮助资产阶级实现民主革命，从中得到一定的经济解放和合法斗争的政治权利；然后，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上，通过长期合法斗争，团结、争取广大群众和一部分士兵，在适当时机实行城市武装起义，一举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夺取国家政权，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即第二次革命。这就是所谓的“二次革命论”。

这种理论，使党在军事问题上产生了一系列错误的认识和观念。依据这个理论，党在第一次革命中，仅处在帮助资产阶级的消极地位，不需要也不应当直接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党不掌握革命领导权，更不需要掌握军权；依据这个理论，党在第二次革命时，也不是直接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而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后，以城市武装起义一举夺取政权，然后建立国防军保持政权。这样，得出的必然结论就是：党不论是在第一次革命还是在第二次革命，工作中心都是发动和争取群众。党虽然已从当时的革命实际需要中，提出了建立“联合战线”进行“联合战争”的正确主张，但又仅停留在帮助国民党组织军队和进行革命战争的范围内，并没有直接组织自己的军队。革命的领导权，特别是军权都被放弃了。这种错误的理论在1927年春开始得到纠正，但也仅仅是从理论上认识到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并没有解决对革命领导权的争取问题，更没有解决直接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问题。

1927年4月，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共两党合作关系开始由局部破裂向全面破裂发展。形势的急剧变化，促使中国共产党加深了对独立自主开展武装斗争和建立军队重要性的认识。5月13日，国民党军夏斗寅独立第14师叛变，企图进攻武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蔡和森和李立三向中央政治局提出，以党所掌握的叶挺部队和武汉军校的学员队占领粤汉路，镇压夏斗寅叛军；如果唐生智的部队也叛变。党所掌握的部队则由粤汉路取湖南为根据地，再进攻湖北和广东；并且提议，“积极准备武力，以暴动对付暴动”。

6月上旬，国民党所谓“二期北伐”的河南战争结束，各方代表在郑州会晤，国民党彻底反共的趋势已十分明朗。蔡和森提出的“以暴动对付暴动”的政策，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数人所赞同。周恩来主持的中央军事部积极作出安排，调集军事干部赴湖南和江西，准备组织工农暴动。但是，总书记陈独秀实行对国民党妥协投降的政策，以致党的方针没能立即改变。

6月底，武汉国民党当局派何键第35军进驻武昌，同时发布解散工农革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一九二六），229页、227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4册，508页。

命组织的训令。中共中央迫于何键的压力，下令解散武汉工人纠察队。7月4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讨论湖南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党应注意保存农民武装，指出：“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并且指出，农民武装应“上山”，“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陈独秀虽然赞成“使农民武装化”，但仍认为应当采取联合唐生智对付何键的政策，没有认清武汉国民党当局反共的一致性。

7月15日，汪精卫控制的武汉国民党当局作出“分共”决定，公然步蒋介石集团的后尘，对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实行大屠杀。至此，国共合作关系彻底破裂，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归于失败。

血的教训，终于使共产党人认识到军队的极端重要性。中共中央指出，党“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创造新的革命军队，不要有雇佣的性质，而要开始于志愿兵的征调，渐进于义务的征兵制，建立工农的革命军”。

《毛泽东年谱》，上卷，2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340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二、武装起义，人民军队的诞生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使中国国内政治局势发生重大逆转。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军阀篡夺革命胜利果实所建立的反动统治，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它对外勾结帝国主义，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残酷地压迫和剥削人民。

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力量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在大约一年间，共产党员被杀达 2.6 万多人，革命人民被杀近 30 万人，还有许多共产党员和工农运动积极分子被捕，一些同志不得已暂时避难藏匿。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消极了，甚至叛变了。共产党员的数量由近 6 万多人锐减至 1 万多人，工农会员只剩下 10 多万人，农民协会全被取缔了，工农自卫军的绝大部分被缴械、解散。几十月前还是轰轰烈烈的革命形势，一下子变得冷冷清清了。

与此同时，革命的阶级阵营也发生分化。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右翼，被继续打着孙中山国民革命旗号的国民党反动派所述惑，继续跟着国民党，实际上是倒向买办豪绅阶级的一边。

革命最直接的敌人，已不仅是旧军阀，更主要的是国民党新军阀。它拥有国家政权和庞大的军队，有着买办豪绅阶级的社会基础，得到了世界上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和援助。

显然，中国革命处在极端危险的困难时期。

但是，这并不等于革命没有重新兴起的可能。国民党政权的建立，并没有改变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它的统治，不过是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外勾结帝国主义，继续出卖国家的利益；对内代表买办豪绅阶级，残酷地压迫和剥削人民。因而，引起革命的矛盾不仅没有缓和，反而更加的尖锐。国民党与旧军阀的争夺并没有完结，它的内部陷入分赃火并与“削藩”和反“削藩”的战争，帝国主义和买办豪绅阶级支持下的军阀混战，仍然是中国的特征之一。这种社会局面，给革命复兴造成了有利条件。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虽然遭到很大的破坏，但中央和省市一级的领导机关基本保存下来了，而基层组织也在努力恢复之中，中国革命仍然有着领导的核心力量。党通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军事问题上的探索和实践，通过对工农运动的领导，已经在客观上为创建人民军队、开展革命战争，作了必要的骨干准备和群众动员。特别重要的是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已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军队和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决心领导人民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所有这一切，都为中国革命的重新兴起提供了可能。

1927 年 8 月 7 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在会上，毛泽东强调指出：党“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起义作为党当前的重要任务。

蒋介石、汪精卫自以为屠杀可以吓倒、征服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彻底镇压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屠杀的结果，是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1 卷，2 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本书以下只注卷和页）

迫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拿起枪杆子，作殊死的斗争。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是被国民党反动派“逼上梁山”的。

南昌起义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南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宣告开始领导人民创建自己的军队，进行革命战争。光辉的8月1日，成了人民军队建军的纪念日。

1927年7月中旬，汪精卫力首的武汉国民党当局作出两项重大决策：一是公开宣布“分共”，对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采取“宁可枉杀千人，也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屠杀政策；二是发兵“东征讨蒋”，与在南京另立国民党中央和中央政府的蒋介石集团，争夺国民党正统地位和长江下游地区。这时、武汉国民党当局所属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不愿为汪精卫等人的利益去与蒋介石集团拼命，企图借所部“东征”行动之机，在兵进江西时折转南下，回广东另立局面。对于“分共”，张发奎考虑到他的第二方面军的第24、第25师为共产党人叶挺所领导，第20军军长贺龙与共产党人关系密切，为稳定军心实现南下企图，他不能也不敢断然立即“分共”。

7月中旬，中共中央采取非常措施，以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张太雷5人，组成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务委员会，停止陈独秀的领导。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组成后，作出两项应变决策：一是发动农民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粤赣4省农民秋收起义，夺取政权，实行土地革命；二是将武昌警卫团、武汉军校学员队和平浏工农义勇队等武装力量集中到第二方面军，和该方面军的第24、第25师一起，随张发奎回广东，徐图发展；并决定将党中央的部分领导和机关干部，疏散到第二方面军的势力范围九江地区，以避免损失和加强对党掌握的部队的领导。不日，中央发现汪精卫在极力拉拢张发奎，遂又给九江的同志以张发奎如跟汪精卫走我部则与他脱离关系的指示。

7月20日，在九江的中共中央委员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与叶挺、聂荣臻一起分析形势时，认为张发奎已靠不住，必须实行脱离关系的原则，联合贺龙第20军在南昌起义，打出“左派国民党”旗帜，自成局面，坚持革命。中央很快批准了这个计划，并派周恩来到部队组织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书记，直接领导这次起义。

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并取得成功。接着，组织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起义军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原第4军第25师并入第11军，第20军开始组建第3师，另设第9军番号（后建立约1个营的部队）。贺龙军长代理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叶挺升任第11军军长并代理前敌总指挥，朱德任第9军副军长，刘伯承任革命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中共党员聂荣臻、廖乾吾、朱克靖分别任3个军的党代表。全军共2.3万人。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人民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起点。它似春雷，报道革命的严冬即将过去，春天就要来临；它是旗帜，在革命失败的形势下给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指明了武装斗争的方向。它标志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即土地革命战争的开始。

南昌起义后，由于缺乏经验，部队没有与江西农民运动结合开展斗争，而是按照中共中央的既定战略，离开南昌，南下广东。南昌起义前，中共中

中央在批准起义计划时，曾要求前委在起义成功后，率部南下广东东江地区，控制海口，争取得到共产国际的物质援助，会同东江地区工农民众的势力，夺取广州，重建广东根据地，再行北伐。中央的这个战略规定显然是“依张回粤，徐图发展”决策的具体化。但原定“依张回粤”的力量是整个第二方面军的近5万兵力，它足以与总兵力虽有5万多人，但嫡系部队只有3万多人的国民党李济第8路军一争广东；可是南昌起义军仅仅是从第二方面军分化出来的、还不够巩固的2万人部队，在这种情况下，再南下广东，就不可避免地使起义军陷入与优势广东国民党军决战的危险境地。

8月下旬，起义军与前出赣南拦阻的广东国民党军进行了第一次决战。经过壬田、瑞金、会昌等多次血战，共歼敌6000多人，但此时自己已损失半数。9月底至10月初，起义军主力又分别在广东揭阳北面的白石和大埔的三河坝等地，再次与敌决战。虽给敌以重大打击，但终因敌众我寡和消耗严重而无力再战。实践证明，南下广东再次北伐的道路行不通。

主力失败后，一部由董朗率领，退入农民运动发展的海陆丰地区，后编为工农革命军第2师，与当地农民相结合在海陆丰坚持斗争。另一部由朱德、陈毅率领，退出广东，进入赣西南。在崇上堡对剩下的800多人加以整训后，部队又经粤北于1928年1月进入湘南，占领宜章，发展到2000多人，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朱德任师长，陈毅任党代表，这支部队后来转战到井冈山地区，与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部队会师，成为红军的重要来源之一。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中共中央在批准南昌起义后，将南昌起义和湘鄂粤赣4省农民起义作为一个斗争整体考虑，并希望夺取广东和湖南两省政权。故在南昌起义爆发的第3天，中共中央颁布了湘鄂粤赣4省农民秋收起义大纲，将原已拟定的秋收起义计划，提交湘鄂粤赣4省各级党组织实行。大纲体现了4省农民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的相互配合和策应关系。在对湖南任务的规定中，任命毛泽东为中共湘南特别委员会书记，要求特委领导湘南农民起义，建立革命政权，受广东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与广东的革命斗争相呼应。

毛泽东受命湘南特委书记后，认为农民起义必须以正规军为骨干。他即向中央提出，请中央将平浏工农义勇队调到湘南，并请南昌起义前委派1至2个团的部队到湘南，组成为1个师，以便占据四五个县，建立革命政权，实行土地革命，形成为湖南武装斗争的起点。并且提出设想，如果湘南的斗争失败，部队不应调往广东，而应“上山”。

8月中旬，毛泽东到长沙，与中共湖南省委讨论湖南秋收起义计划。认为中央拟定的湘南起义计划，因没有落实所需的正规军，必须暂缓执行。他还进一步提出，国民党的旗帜已成为白色恐怖之象征，必须抛弃，应以党的旗帜领导人民革命；应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才能调动农民的革命热忱。他的这些战略、策略性意见，得到了与会的多数同志的赞同，也左右了湖南秋收起义计划的制定。8月下旬，中共湖南省委从安源党组织的报告中得悉，原定参加南昌起义的武昌警卫团和平浏工农义勇队没有赶上起义，退驻在赣西北修水、铜鼓地区；同时，罗荣桓从鄂南带来的一部农军在修水，王兴亚从赣西带来的一部分农军在安源。据此，省委决定，由毛泽东任省委前敌委

员会书记，到湘赣边界将上述部队编为工农革命军第 1 军第 1 师，并率其会攻长沙；由易礼容任省委行动委员会书记，发动长沙周围 7 县镇农民起义，配合工农革命军夺取长沙。

9 月初，毛泽东到达安源和铜鼓，向当地和部队的共产党组织传达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关于秋收起义的计划，将上述各部分编为 3 个团，组成工农革命军第 1 军第 1 师，原警卫团团团长卢德铭为总指挥，副团长余洒渡为师长，这支由工农兵组成的部队约 5000 人；以各部长官为委员组成前敌委员会，并与各部领导协商制定了向长沙攻击前进的作战计划。

9 月 11 日，工农革命军各团按预定的计划起义。由于部队分散行动，加上一些领导者麻痹轻敌，致使进攻失利。北路第 1 团遭敌袭击损失 200 多人，南路第 2 团改攻浏阳城后在敌反攻下溃散，毛泽东所在的中路第 3 团也在浏阳东门市地区被敌阻挡，难于前进。更加严重的是行委领导的 7 县镇农民起义，由于准备仓促没有能形成足以牵制敌军的大规模起义局面，预定的进攻长沙计划已不能实现。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当机立断，命令各部停止前进，到浏阳文家市集中。9 月 19 日夜，毛泽东在文家市主持召开前委会议。师长余洒渡等人坚持继续向长沙前进，以攻占长沙。毛泽东则力主保存实力，放弃攻占长沙计划，部队转而沿罗霄山脉南下，到远离敌人中心城市且农民运动基础好的湘南寻求发展。总指挥卢德铭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前委作出放弃攻长沙计划部队南下湘南的决定。20 日晨，部队由文家市出发，开始南下，后又几经挫折，最终确定向井冈山进军。这支部队成为红军的又一重要来源。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是继南昌起义后的又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它的特点在于不仅仅是军队的行动，而且有众多的工农武装参加；公开打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旗帜，号召人民进行土地革命；在指导上更从实际出发。这次起义，虽然只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人民武装斗争的一个局部，但这个局部在策略和战略方面所把握的基本点，却有全局的指导意义。那就是：必须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领导中国人民武装斗争；必须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以调动农民的革命热忱；必须首先建立军队，以军队为农民武装斗争的骨干；必须由敌人力量强大的城市退却，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进军；必须有“上山”的准备，“上山”可以造成革命势力的基础。也正因为是这样，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放弃进攻中心城市转向农村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人民武装革命胜利的伟大起点。

广州起义

1927 年 12 月 11 日，中国共产党又领导举行广州起义。这次起义与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一起，构成了有代表意义的三大起义。

国民党新军阀在篡夺中国大革命的胜利果实后，立即陷入了内部的分赃火并。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等联合起来，向蒋介石争权夺利。蒋介石一时失势，遂以退为进，宣布下野，将“宁汉对立”的矛盾推给李宗仁去解决；另一方面，又多方活动，寻求日本和美国的支持，以求东山再起。李宗仁决心用战争来解决“宁汉对立”的矛盾，于 1927 年 10 月打出“西征”旗号，“讨伐”唐生智，湖南、湖北战火又起。张发奎率领第二方面军余部回到广东后，又与李济琛兵戎相见、争夺广东。

国民党新军阀战争的爆发，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革命造成了有利时机。鉴于9、10月份各地举行的秋收起义均未达到预期的目的，中共中央于11月上旬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利用有利时机，全党动员，再次发动武装起义，以夺取国民党在广东和两湖的政权，并动摇其在北方的军阀统治。这次会议在继续贯彻八七会议的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方针上是正确的，但也存在着将党的武装斗争全面引向城市，以城市为中心的错误。

广州起义，是根据中共中央决定进行的又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

这次起义的主力仍是军队。7月底，武汉军校的学员队奉中共中央指示离开武汉，准备开赴南昌参加起义，但部队到达黄石港时，南昌起义已爆发，学员队被张发奎部截住，陈毅等身份公开的共产党员被迫离队。同时，任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第4军参谋长的秘密共产党员叶剑英，为保存党的这支队伍，说服急于扩军的张发奎，将其收编为第4军教导团，叶剑英亲自兼任团长。此后，该团随第二方面军余部南下广东，进驻广州市。张发奎回广东后，又组建第4军警卫团，部分共产党员打入该团，基本控制了局面。这2个团成为广州起义的主力。

中共广东省委和广州市委把工人作为这次起义的重要力量，并对起义作了比较周密的准备。张发奎回广东后，将主要精力放在与李济争夺广东上，为稳定社会秩序，他没有采取新的白色恐怖措施，广州的工会组织乘机恢复。中共广东省委和广州市委接到中央十一月扩大会议精神后，加紧起义的准备，着力于组织广州工人赤卫队。

11月中旬，张发奎与李济争夺广东的矛盾发展为军事行动。张发奎将主力部队调往西江等地，准备对李济部队作战，广州只剩下教导团、警卫团和少量留守部队。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以省委书记张太雷为委员长的起义领导机关——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以叶挺为总指挥、叶剑英为副总指挥的起义军总指挥部。

12月11日深夜，广州起义爆发。起义部队很快控制了市区，以苏兆征为主席的广州市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

当时的计划是起义军坚守住市区，待位于粤北的朱德部队和位于海陆丰的董朗部队到达广州后，对敌发起进攻，夺取广东政权。熟悉张发奎部队情况并富有作战经验的叶挺等人，认为这个计划不切实际，建议起义军撤出市区，避免与敌拼消耗。但省委坚持执行中央的夺取广州指示，拒绝采纳这个建议。

12日，国民党军以3个师的兵力，在美英日法等帝国主义军舰和海军陆战队的支援下，从南、西、北3个方向向广州发起反攻，起义军与敌展开激战，损失严重，张太雷壮烈牺牲。

13日，起义军被迫撤出市区。

200多人向北突围，撤到北江，后由朱德部收编，最终带上井冈山；主力1000余人撤到花县，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师，叶镛任师长，袁裕（袁国平）任党代表，后于1928年1月转移到海陆丰，参加当地的武装斗争。

广州起义，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为挽救革命，向反革命势力进行的一次英勇反击，是以工人和军队的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一次大胆尝试。起义后成立的广州苏维埃政府，当时被誉为东方的巴黎公社。广州起义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一起，是党创建人民军队的伟大开端。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引起中共中央的进一步思考，开始认识到首先夺取中心城市的道

路是行不通的。所以，中共六大认为广州起义是革命从城市的“退兵一仗”。

其他地区的武装起义

1927 年秋到 1928 年夏，中国共产党还在大江南北湘鄂粤赣等十几个省的 150 多个市县，发动近 100 万工农群众和数万革命部队，举行了 100 多次的武装起义。其中主要有：

鄂中和鄂西农民起义。湖北中南部沔阳、监利、石首、公安、江陵、荆门、天门、汉川广大地区，是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比较发展的地区。八七会议后，中共湖北省委将这一地区划为鄂中和鄂西区，列为武装起义的重点区域之一，并派出一批干部到该区，与当地党组织一起组建鄂中和鄂西特委，领导农民武装起义。1927 年 9 月到 1928 年 1 月，在鄂中、鄂西特委和一些县委的领导下，这一区域的各县和邻近的湖南华容等县，相继发生了一系列的农民起义，建立了沔阳、鄂西、石首、鄂中等若干支游击队。石首和鄂中游击队又与另一支游击队合编为 49 路工农革命军。到 1928 年 1 月，这些队伍已发展到共约 1000 人，形成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局面。

黄麻农民起义。湖北东北部的黄安、麻城两县地区也是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发展的地区。1927 年 9 月下旬，两县县委根据中共湖北省委的秋收起义计划，领导农民进行打倒地主豪绅、开仓分粮的斗争。此后，省委决定组织黄麻特别区委，领导农民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11 月上旬，两县农民再次起义，攻占了黄安城，建立了 300 多人的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此后，起义军在坚守黄安城的战斗中失败，余部转移到黄冈木兰山，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 7 军，吴光浩任军长，戴克敏任党代表，建立了党的委员会。这支队伍虽然已不足 100 人，但它是后来鄂豫皖苏区红军的最初队伍。

海南岛农民起义。海南岛是当时广东农民运动比较发展的一个地区。蒋介石集团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海南岛的共产党组织，领导琼东（今并入琼海）、琼山、定安、乐会（今并入琼海）、澄迈、文昌、临高、儋县等县群众建立了讨伐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的工农讨逆军。

1927 年 9 月，中共琼崖特委按省委指示，领导上述各县工农讨逆军举行秋收起义，此后，各县工农讨逆军台编为工农革命军，分东、西、中 3 路，冯平任总指挥，上文明任党代表，对敌展开攻势作战。到 1928 年 1 月，全军发展到 6 个营共 1400 多人。

赣东北农民起义。江西东北部信江流域各县，在大革命时已建立共产党组织。1927 年 8 月底以后，共产党员方志敏、邵式平、黄道先后回到家乡弋阳、横峰。他们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恢复党的组织，发动农民准备武装起义。1928 年 1 月初，他们召开弋阳、横峰、贵溪、铅山、上饶 5 县党员代表会议，建立党的 5 县工作委员会，接着领导弋阳、横峰农民起义。受此影响，贵溪、余干、万年、铅山、上饶等县，也相继举行了小规模农民起义。此后，党的委员会决定从弋阳、横峰起义队伍中抽出一部分武装骨干，组成工农革命军第 2 军第 2 师第 14 团第 1 营第 1 连。这个连虽然只有 20 多枝枪，但它是后来赣东北苏区红军的前身。

湘南起义。湖南南部当时的湘粤大道两侧 10 余县，是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发达的地区之一。因此，中共中央曾于 1927 年 8 月计划在湘南发动农民起义，建立革命政权，后因湖南省委决定举行以长沙为中心的秋收起义，

暂缓湘南起义计划的实行。11月，中共湘南特委开始起义的准备。

1928年1月，朱德、陈毅率部进入湘南宜章，引发了湘南宜章、郴县（今郴州市）、耒阳、永兴、资兴等县农民起义，并影响和推动了衡阳、桂阳、常宁、汝城、临武、嘉禾等县一些乡村的农民起义。此后，特委将宜章，耒阳、郴县农军分别编为工农革命军第3、第4、第7师，将永兴和资兴农军分别编为2个独立团。连同朱德、陈毅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1师，全区工农革命军已达1万人。不久，全区的部队转移到井冈山地区，与毛泽东部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军。

桑植起义。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失败后，贺龙和周逸群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于1928年2月回到湖南桑植，计划“依山建军，再向平原发展。”贺龙利用旧部和亲友关系，很快组织了一支3000多人的队伍，打出工农革命军旗号，于3月发动起义。起义后，队伍虽被反攻之敌打散，但经贺龙的收集，到6月恢复到1500多人。7月，该部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军，贺龙任军长，黄鳌任参谋长，主力编为第1师，贺锦斋任师长，张一鸣任党代表。

赣西和赣南农民起义。以江西吉安和赣州为中心的赣江中上游各县，是大革命时期江西农民运动的主要地区。党的八七会议后，当地共产党组织开始恢复，并相继建立中共赣西和赣南特委，领导各县农民作起义准备。1927年11月到1928年4月，万安、吉安、兴国、赣县、南康、信丰、零都（今干都）、寻邬（今寻乌）等县，相继举行了规模不同的农民起义。吉安东固等地农民起义武装，形成为工农革命军第7、第9纵队；零都桥头起义的武装组成工农革命军第15纵队。以上各部后来发展为江西红军独立第2、第4团。

平江起义。1928年春，担任湖南国民党军独立第5师第1团团长的彭德怀，参加中国共产党，并与党派到该部的同志在第1团建立了党的秘密组织。6月中旬，该师奉命由南县、华容、安乡地区进驻湘东北平江县，镇压当地农民斗争。7月初，中共湖南省委派滕代远到平江寻找党组织，并担任湘鄂赣边特委书记。当月中旬，彭德怀部共产党组织被敌发现，彭德怀、滕代远等同志当机立断，于22日率领第1团等部在平江城起义。起义后，部队编为红军第5军，彭德怀任军长，滕代远任党代表，全军2500多人。

上述这些起义建立的工农革命军和游击队，与落脚在井冈山地区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建立的工农革命军第1师，会聚在海陆丰地区的南昌起义建立的工农革命军第2师、广州起义建立的工农革命军第4师，共约2万人。这7个地区和井冈山地区、海陆丰地区一起，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人民武装斗争最初的格局。

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人民武装斗争，有着国共两党合作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客观准备；但转入武装斗争却又是仓促和缺乏经验的。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委员会乃至武装斗争的领导者，普遍还不懂得怎么根据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开展武装斗争。开始时，摹仿北伐战争或俄国十月革命的方式，以弱小的起义军去与强大的敌人作一城一地的争夺，不可避免要遭到失败，蒙受不必要的严重损失。然而，各地的武装起义，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的英勇反击，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敌人，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一些起义部队在数省边界、距离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较远的偏僻山区坚持下来，开展武装斗争，成为各地红军最初的来源，为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三、开展游击战争，创建农村根据地

人民军队在武装起义中诞生后，面临的形势是十分严重的。一方面是城市中心的道路行不通，必须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革命斗争道路，另一方面由于国民党新军阀进行极其残酷的“进剿”和“会剿”，各地红军普遍遭受到严重的挫折，革命处在“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危险境地。

红军没有被眼前的巨大困难所吓倒。他们在党的领导下，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以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坚持开展游击战争，创建农村根据地，并在斗争实践中不断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逐渐认识中国革命战争的一些规律，逐步解决适合中国特点的革命道路问题和游击战的作战原则问题。

坚持井冈山的斗争

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起点，开始于井冈山的斗争。

1927年9月下旬，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向长沙攻击前进受挫后，毛泽东毅然决定放弃攻打中心城市原定计划，率领起义部队转入农村，于10月下旬开始了在井冈山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井冈山位于湘赣两省边界、罗霄山脉中段。之所以确定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其原因是：第一，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大革命时这里曾建立过党的组织、工会、农会和农民武装，党和革命的影响仍然存在，还保存着袁文才、王佐两支农民自卫军。第二，反动派的控制力量比较薄弱。这里距国民党统治中心较远，而且地处两省交界，便于利用两省军阀的矛盾发展革命力量。第三，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便于实行游击战，建立革命根据地。第四，有自给自足的地方农业经济，便于筹粮筹款，为红军的存在和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第五，这一地区具有一定的战略地位，在这里开展游击战争，可以同时影响湘赣两省，推动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经过了一个艰苦的斗争过程。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进驻井冈山后，利用敌人兵力空虚的机会，分兵发动群众，帮助边界各县恢复或建立共产党组织和群众武装，打下了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基础；经过教育争取，收编了农民武装袁文才、王佐部，增强了革命力量；消灭了当地的反动武装和打破敌军的第一次“进剿”，建立工农兵政府。

1928年2月，井冈山根据地初步形成。

4月，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农民起义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部队会师。两支部队合编成工农革命军（6月改称红军）第4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同时选举产生了党的红4军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这次会师使井冈山的革命武装力量有了很大的增长，为发展游击战争和根据地提供了有利条件。两支队伍中，各有一部分经过北伐战争考验的骨干力量，他们继承了“铁军”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具有较强战斗力。

1928年春，国民党在南方的统治相对稳定。湘赣两省国民党军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了连续“进剿”和“会剿”，妄图消灭红军。当时红4军仅4个团（8月，只剩下3个团）的兵力，而湘赣两省前来“进剿”的国民党军随时都有八九个团，最多时达18个团。红军充分利用根据地内有利的地形条件，在人民群众支持下，以灵活的游击战打击敌人，一次又一次粉碎了敌人的进攻。

1928年5月至6月,井冈山根据地军民又粉碎了江西国民党军的三次“进剿”。6月下旬,红军取得了尤源口战斗大捷,一举歼敌1个团,击溃2个团。井冈山根据地发展到全盛时期。

接着,又于同年7月至次年1月,进行了反对湘赣两省国民党军三次“会剿”的作战。

7月,国民党军发动第一次“会剿”。湖南省委受“左”倾盲动主义影响,拒绝毛泽东等提出的巩固和发展井冈山根据地的正确主张,一再命令红4军离开井冈山前往湘南,导致了湘南和湘赣边界两方面的失败,即“八月失败”。

8月下旬,国民党军发动第二次“会剿”。坚守井冈山的红军胜利地进行了黄洋界保卫战,打退了国民党军的进攻。9月上旬,毛泽东率部将在湘南失败的红军大队迎回井冈山,接着,利用湘赣敌军利害不同、行动不一的弱点,采取对湘敌取守势,集中兵力打击赣敌的方针,实施反攻作战,至11月初,在遂川、新城、永新等地接连击败赣敌,彻底粉碎了敌人第二次“会剿”,井冈山根据地基本恢复。11月6日,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红4军前敌委员会成立,统一领导边界党政工作和红4军的行动。

12月上旬,平江起义组成的红军第5军主力在彭德怀、滕代远率领下,由湘鄂赣边区转战至井冈山,与红4军会合。

在井冈山开展红军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有独特的优越条件。但是,随着红军力量的扩大,其弱点也逐步显露出来。这里人口不多,物产有限,在国民党军的军事“进剿”和经济封锁下,红军经济上的困难日趋严重。这里处于湘江、赣江两条无法徒涉的河流之间,军事上缺乏足够的回旋余地。

1929年1月,鉴于湘赣两省国民党军已在策划对井冈山发动新的“会剿”,红4军前委召开有地方党组织参加的联席会议,决定采取“攻势的防御”战略,由毛泽东、朱德率领红4军主力出击赣南,首先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如敌发动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主力则在外线作战调动敌人;由彭德怀、滕代远率由红5军主力编成的红4军第30团(习惯仍称红5军主力)和第32团一起,在根据地内坚持斗争,红4军主力向赣南出击后,湘赣两省敌军开始了对井冈山的第三次“会剿”。留守的红军部队与敌人英勇激战。随后,红30团主力按待委预定计划突围,寻找红4军主力。少数保存下来的红军和赤卫队,继续坚持斗争。

井冈山的斗争,虽然因敌人重兵“会剿”,红军主力被迫撤离而转入低潮,但仍不失其伟大意义。它创造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新的斗争形式,从实际上开拓了中国革命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成为全国红军游击战争和革命根据地发展的一面旗帜。

各地红军游击战争的开展和根据地的创建

1927年秋至1930年初夏,是各地红军游击战争广泛开展起来,建立革命根据地阶段。这一阶段,在红4军坚持井冈山斗争的同时和稍后,各地武装起义保存的队伍,先后转为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到1930年5月,红军游击战争已在全国20多个地区展开,组成了10多个军,总兵力达6万余人,形成了赣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湘赣、湘鄂赣、赣东北、右江等若干大的和较大的战略区。其他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也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斗

争，建立起各具规模的根据地或游击区。红军完成了战略基地的初步创建，实现了初步的战略展开。

（一）赣南、闽西地区：

1929年1月，红4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出击。途中，遭到敌军重兵迫袭。2月10日，红4军在赣南瑞金的大柏地举行伏击战，一举歼灭了尾追的敌军两个团。这次战斗，扭转了被动局面，扩大了政治影响，使赣南的党和群众受到巨大鼓舞。之后，红4军进至吉安东固，与红2、红4团会合。

1929年3月，红4军主力转战闽西。

14日，攻占闽西重镇长汀城，全歼守敌2个团。接着，回师赣南，与从井冈山突围的红5军主力会合。

红4军在转战赣南、闽西的斗争中，前委开阔了战略发展的视野。赣南、闽西地区山林起伏，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物产比较丰富，便于开展游击战争；

1928年春农民起义后逐步建立的江西红军独立第2、第4团，已初具规模，闽西各县也建立了党的组织，并且有农民武装斗争基础。这里反动统治力量薄弱，敌军主要部队来自外省，战斗力不强；距离大城市较远，交通不便，敌军调动困难。这些主客观条件，有利于红军战争的继续发展，可以形成一个大的战略区。

红4军主力攻占长汀后，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又一次战争——蒋桂战争已经揭开序幕。经过对形势和周围环境的分析，红4军前委决定，在赣南、闽西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以此作为“前进的基础”。同时，还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的战略计划，建议中央将工作指导的重点放在敌人势力相对薄弱、党和群众基础较好的闽浙赣3省。红4军前委的计划和建议，其精神实质是要利用军阀混战的机会，在更大范围的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以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这是毛泽东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思想在新形势下的重大发展。

此后，红5军主力返回井冈山地区。红4军与江西红军紧密配合，经过1个多月进攻作战，在原有秘密割据区域基础上，建立了赣南苏区（即根据地）。

5月中旬，红4军主力趁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粤桂战争爆发之机，第二次入闽。通过三打龙岩。攻占永定等一系列战斗，建立了闽西苏区。

红军的胜利，震动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8月，闽粤赣国民党军向闽西苏区发起第一次“会剿”。红4军以主力出击闽中调动敌军没有奏效，返回闽西苏区，打退了敌人的“会剿”，攻占了上杭等地。在进攻广东东江受挫后，红4军转向赣南，随即第三次入闽。

1930年1月，闽粤赣三省国民党军对闽西苏区发动第二次“会剿”，红4军向赣南转移以调动敌人。闽西各县赤卫队统一编成闽西红军坚持斗争。敌人“会剿”破产后，闽西苏区组建了红军第12军，邓伟任军长，高静山任政治委员。在赣南苏区，坚持斗争的江西红军于1930年1月组建了红军第6军（后改称红3军），军长黄公略，政治委员刘士奇。

为了在更大范围内统一领导革命斗争，2月上旬，由各红军与地方党组织在吉安陂头举行的联席会议决定，红4军前委扩大为统一领导红4、红5、红6军及赣西、赣南、闽西、东江地区革命斗争的共同前委，选举毛泽东为书记。3月下旬，红4军和红6军一部取得水南战斗的胜利，歼敌1个旅大部。此后，红军转入了分兵发动群众，建设赣南、闽西苏区的斗争。

5月，赣南、闽西苏区已建设成为全国最大的苏区，并为后来形成的中央苏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湘鄂西地区：

湘鄂西苏区以湖北洪湖地区为中心，包括湘鄂边、洪湖区、襄枣宜、巴兴归4个地区。

1928年春至1930年夏，这一地区的红军第4、第6军和第26、第49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了艰苦的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游击战争，取得了很大胜利，成为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战略区之一。

湘鄂边苏区是由贺龙、周逸群领导的湘鄂边红4军创建的。这支部队在敌人的进攻下，曾两次遭到严重挫折。在以贺尤为书记的中共湘西（后改为湘鄂西）前敌委员会领导下，整顿部队，坚持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发动群众，到1929年5月，建立了以桑植、鹤峰为中心的湘鄂边苏区，以后，又连续取得南盆、赤溪大捷。

洪湖地区距敌人控制的中心城市较近，但河湖港汊密布，便于与敌人周旋。以周逸群为书记的中共鄂西特委，领导游击队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逐步建立起苏区。

1929年春，国民党军阀战争爆发，鄂西特委抓住机会，组成鄂西游击总队开展进攻作战；并与前来“进剿”的优势敌人进行了顽强斗争，粉碎了敌人的“清剿”。鄂西游击总队扩编成红军中央独立师，后又改编成红军第6军，旷继勋任军长，周逸群任政治委员。1930年4月，洪湖苏区形成。

与此同时，鄂北的襄阳、枣阳、宜城地区和鄂西的巴东、兴山、秭归地区也相继发生了红军游击战争，组成了红军第26师和第49师，1930年夏，分别建立了两块苏区。他们与红4、红6军的斗争相互呼应，巩固和扩大厂湘鄂西苏区。

（三）鄂豫皖地区：

鄂豫皖苏区位于三省交界，大别山横贯其间，地形险要，地域辽阔，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多次领导农民起义，开展游击战争，逐步在鄂东北、豫东南和皖西建立红军和苏区。

1928年4月，工农革命军第7军返回黄安、麻城地区，经过艰苦的游击战争，于7月创建了以柴山保为中心的鄂东北苏区，部队改编为红军第11军第31师。中共鄂东特委提出“学江西井冈山的办法”，依托大别山造成武装割据局面的方针后，游击战争进一步扩大。

1929年5月，党领导了河南商（城）南（部）起义，建立了红32师。在打击反动民团的斗争中，建成了以南溪、吴家店为中心的豫东南苏区。

1929年6月至10月，国民党军和地方民团联合对鄂东北和豫东南苏区发动了三次“会剿”。红军避强击弱，转战外线打击敌人，赤卫队和群众武装则在内线袭扰和牵制敌军，迫使敌军撤出苏区。反“会剿”斗争的胜利，使鄂东北和豫东南苏区连成一片，形成鄂豫边苏区，红31、红32师也发展到1200余人。

1929年11月，党领导皖西六（安）霍（山）起义，组成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

1930年初，将各游击队编成红军第33师和工农革命军独立师。红33师在红32师一部和独立师的配合下，积极进攻，曾占领英山、两克霍山，到5月间，部队发展到300余人，并初步建成以金家寨为中心的皖西苏区。

1930年4月，红31、红32、红33师台编组成红军第1军，许继慎任军长，曹大骏任政治委员兼前委书记。该军直属中共中央指挥。同时成立以郭述申为书记的中共鄂豫皖边区特委，统一领导鄂豫皖苏区的斗争。红1军的组成和鄂东北、豫东南、皖西苏区的统一领导，使鄂豫皖苏区发展成为红军游击战争的一个重要的战略区。

（四）湘赣、湘鄂赣地区：

湘赣苏区是在井冈山根据地基础上形成的。1929年初，红4军主力南下后，红4军余部和赤卫队组成红军独立团坚持斗争，收复了井冈山和九陇山。红4军30团（即红5军主力）返回湘赣地区开展活动后，两团分别改编为红4军第5、第6纵队。此后，彭德怀和陆代远率原红5军主力向湘鄂赣边区转移，留下的部队和各县赤卫队继续坚持斗争，同年10月红5军第4纵队返回湘赣边，与当地红军一起发动攻势行动，扩大苏区，湘赣边界的政治、军事中心由井冈山转移到永新。

湘鄂赣苏区，是由平江起义的红5军逐步建立起来的。

1928年冬红5军主力转赴井冈山后，由黄公略率红5军第2纵队继续坚持斗争。1929年4月，部队扩编为红军湘鄂赣边境支队，打破了湘赣国民党军和民团的“清乡”。8月，红5军主力返回后，湘鄂赣边境支队编入红5军。此后，红5军以主力恢复和扩大湘赣边区，一部北上创建鄂东南苏区，以一部留在湘鄂赣边坚持斗争。经过1930年1月下旬开始的进攻作战，湘赣边、湘鄂赣边和鄂东南苏区基本连成一片。6月上旬，红5军第5纵队扩编成红军第8军。湘鄂赣边红军和苏区形成当时红军游击战争的主要战略区之一。

（五）赣东北、闽北地区：

赣东北苏区是在弋阳，横峰起义的基础上创建的。起义部队通过坚持游击战争，开创了弋阳、横峰边界磨盘山为中心的苏区。1929年春，部队改编为江西红军独立第1团。他们以伏击、袭击方式打退了敌人的“进剿”，并进行了一系列进攻战斗，使原苏区得到很大发展，形成为赣东北苏区。

在赣东北游击战争推动下，闽北游击战争也不断发展。

1929年底，在各红军小分队基础上，成立了闽北红军第55团。1930年初，整编为闽北红军独立团，建立了闽北苏区。此后，闽北和赣东北苏区统一由中共信江特委领导。

（六）右江地区：

右江苏区是由红7军创建的。1929年12月，百色起义部队改编成红7军，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同时创建了右江苏区。1930年2月，龙州起义部队改编为红8军，俞作豫任军长，邓小平兼政治委员；李明瑞任红7、红8军总指挥。同时成立左江革命委员会。不久，红7军作战失利被迫退出右江沿岸；红8军在强敌进攻下也大部溃散，余部后编入红7军。6月，红7军主力回师右江，经战斗使苏区大部恢复。此后，红7军积极打击敌人，开展土地革命。

除上述这些地区和红军外，这期间，中国共产党还领导创建了广东东江若干块小苏区和红军第11军；在浙江南部和江苏中部的（南）通海（门）如（皋）泰（兴）地区创建了游击区，建立了红13、14军；在四川创建了川东游击军和川东游击区，在海南岛创建了红军琼崖独立师和琼崖苏区。虽然这些红军和苏区有的在后来失败了，有的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但都为土地革命

战争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1927 年秋至 1930 年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地武装起义、创建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阶段。经过艰苦斗争，红军迅速发展，根据地（苏区）不断扩大，中国革命形势出现了胜利发展的新局面。

游击战作战原则的形成

红军创建阶段的主要作战形式是游击战。这是由敌强我弱这一基本事实决定的。红军诞生时，人数少，装备差，物资补给困难，战斗力弱，一开始就处于强大敌人包围中，不断遭到敌人的“进剿”和“会剿”。革命根据地小而分散，流动性很大，带有游击区的明显特征。这种敌强我弱的基本形势，决定了红军不能与敌人打正规战争，只能采取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方式。游击战以奇袭为主要战斗方式，具有分散和流动的特点，虽然规模较小，但比正规战具有更大的主动性、灵活性、进攻性和速决性。通过游击战争，红军达到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打击敌人，保存和发展自己的目的。

红军进行的游击战争，有自己鲜明的特点。毛泽东曾经指出：“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无比一天广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

各地红军在斗争中，都有自己的做法，创造了自己的经验。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是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军所创造的经验。这些经验不仅对井冈山、赣南闽西游击战争的胜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得到当时党中央的认可和推广，对全国各地的红军游击战争也发生了重要指导和借鉴作用。

早在 1928 年初，毛泽东通过总结湘赣边界斗争经验，即提出了“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原则。在粉碎江西国民党军的各次“进剿”中，红 4 军游击战的经验进一步丰富。以后，在反对湘赣两省敌军“会剿”时，又提出对力量强大的湘敌取守势，对力量较弱的赣敌取攻势的斗争方针。

1929 年红 4 军转战赣南闽西，毛泽东在《红 4 军前委关于目前形势闽赣斗争情况和红军游击战术向中央之报告》中，对红军游击战原则进行了概要的阐述，即“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踪，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些，都是充满革命首创精神的原则，是红军游击战争经验的结晶。

其他各地红军通过总结自己的斗争实践，并借鉴党中央推荐的红 4 军行之有效的典型经验，也都提出了因地制宜的游击战的战术原则。湘鄂西红军的战术是：“你来我飞，你去我归，人多则跑，人少则搞”。还提出 4 条原则：随时是进攻的，不是保守的；不攻坚不打硬仗，但决不是逃跑主义；取得群众的拥护，以政治宣传战胜敌人；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鄂豫皖红军的经验是：集中作战，分散游击；作战时尽量号召群众参加；敌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103～104 页。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103～104 页。

情不明，不与作战；敌进我退，敌退我进；对敌采取跑圈子的形式；对远距离的敌人，先动员群众扰乱敌人，次采取突击的方式；敌人如有坚固防御工事，不与作战。湘鄂赣边红军和游击队在斗争中总结出“彼集我散，彼散我集；昼伏夜出，化整为零；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化整为零，昼伏夜出，敌来我藏，敌退我追，敌左我右，敌往我截，彼合我散，彼散我合，虚张声势，避实击虚，集中围击，疲惫敌人”等游击战术。赣东北红军提出“出敌不意，攻敌不备，声东击西，避实就虚，集中兵力，争取主动，打不打操之于我，扎口子，打埋伏，打小仗，吃补药，吃得下就吃，吃不下就跑”。赣西南地区红军的对敌斗争经验是：散整为零、集零为整、扰强扑弱、坚壁清野、避实就虚、打圈子、麻雀战、钻山主义，等等。

综合以上经验，红军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的主要内容为：

（一）创建并依托革命根据地进行战争。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是红军的战略基地，它提供了红军休养生息的环境和后勤供应的来源；在党领导下的根据地人民和群众武装，对红军的反“进剿”、反“会剿”作战起了积极的配合协同作用，并为红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兵员补充，由此形成了由赤卫队到地方红军再到主力红军逐步升级的红军发展途径和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创建根据地，依托根据地进行战争，是红军游击战争的一条重要原则，也是红军游击战争与历史上农民战争流寇主义的根本区别之一。

（二）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游击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和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游击战争。发动群众和应付敌人是红军三大任务中的两大任务。毛泽东深刻阐述道：“分兵的目的，是为了更能争取群众，更能深入土地革命和建立政权，更能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集中了才能消灭大一点的敌人，才能占领城镇，消灭了大一点的敌人，占领了城镇，才能发动大范围的群众，建立几个县联在一块的政权。这样才能耸动远近的视听（所谓扩大政治影响），才能干促进革命高潮发生实际的效力。”分兵与集中的关系，毛泽东认为好比渔人撒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湘鄂西红军提出：“分散与集中，在策略上下是对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完全要以客观形势和主观条件来决定，就是要在集中指导下分散游击发动群众，集中力量打击敌人。”

（三）避免硬战，专打弱敌。初创阶段的红军，无论在人员上还是武器装备上，与敌人相比都处于绝对的劣势。因此，在作战中要力避强敌和硬拼，而以分散孤立之敌和战斗力弱的敌地方部队为主要作战对象，这样才能一口一口地吃掉敌人，发展壮大自己。

（四）以袭击力主要战斗方法，速战速决。弱小的红军要战胜敌人，在作战行动上必须秘密和神速。秘密才能出敌不意，使敌借手不及；速战速决则使敌人增援不及，便于达成全歼。因此，袭击、伏击、奔袭等，是红军的主要战斗方法。

（五）强敌跟踪，以盘旋式打圈子方法对付。当强敌进攻时，红军为避免与之硬拼，总是采取退却和转移行动，而敌人往往穷追不舍。此时，红军必须利用有利的地形和群众条件与敌人盘旋打圈子。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被敌人吃掉，并发现和造成敌人的弱点和过失，创造战机，集中兵力消灭敌人。这种走与打相结合的盘旋打圈子战术，是红军消灭敌人脱离被动恢复主动的

有效方法。

在红军游击战争的作战实践中，毛泽东、朱德总结提出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最具代表性。它简明扼要地概括了红军游击战争原则最基本的内容。其精神为，依托革命根据地的有利条件，扬长避短，避强击弱，按照战场实际情况，主动灵活地打击敌人，逐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争取战争的胜利。它把防御与进攻，退却与反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包举了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两个阶段，在防御时又包举了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的两个阶段。”

“十六字诀”是红军在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条件下，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能动地夺取作战胜利的可靠保证。正因为如此，它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前期红军游击战争的基本指导原则，成为后来形成的红军全部作战原则的基础。

毛泽东提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在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的斗争中，红军不仅创立了一套以弱胜强的战略战术，使自己不断发展壮大；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一实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还初步找到了指引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正确道路，这就是后来概括的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

中国革命战争有着自己的特点。它发生在经过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经济不平衡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在敌人强大、红军弱小的条件下进行，担负着夺取政权实行土地革命的任务。这种特点决定，中国革命战争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战争，它必须以农民为主力军，以农村为阵地，必然经过一个长期在农村中积蓄力量，造成敌我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变化的过程，才能最后夺取城市，取得革命的全部胜利。可是，由于当时的党中央对中国革命的特点缺乏认识，在一段时间里，领导武装斗争的方针，基本是依照俄国十月革命以及北伐战争的经验，走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事实证明，这种经验是不符合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

此后，全党和各地起义武装，都对中国的革命道路进行了认真的探索。毛泽东是成功地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在农村保存、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的主要代表。八七会议后，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队伍向农村进军，创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打退敌人的不断进攻中，使根据地得到巩固扩大。其他各地区的党组织和起义武装也先后将斗争重心转入农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这就在实践中为中国革命开辟出一条全新的道路。

在实践的基础上，毛泽东逐步提出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

首先，在1928年秋冬，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为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中，对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发展的原因和条件作了分析。主要原因是：第一，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地方的农业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造成了白色政权的长期分裂和战争，为红色区域的发生和坚持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第二，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长

期存在于有革命基础的地区；第三，红色政权能否长期存在，取决于全国革命形势能否向前发展；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第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必备条件是：很好的群众；很好的党；相当力量的红军；有利于作战的地势；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所谓红色政权，就是“工农武装割据”。毛泽东强调，“‘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

随后，到1930年初，毛泽东提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论断，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形成。他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他还指出：“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他强调，党和红军都要有“用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这里，毛泽东已经把“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与夺取全国政权联系起来，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斗争中开创的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基本形成。

后来，毛泽东又进一步阐述了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必要性。指出，由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的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因此，中国革命基本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必须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之一。由于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广大农村则是他们统治的薄弱环节，无产阶级要坚持奋斗下去，准备积蓄和扩大自己的力量，避免在自己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建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

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反映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四、人民军队建军原则的确立

红军在开展游击战争创建农村根据地的同时，开始了人民军队的建设。

那时的红军成分复杂。就队伍而言，主要来自于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从经过大革命时期民主政治训练和接受过工农群众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中分化出来的；一部分是由大革命时期建立的工农群众武装保存的力量组成的。前者的基础是旧军队，即雇佣军队；后者的基础是组织松散的群众武装。就人员而言，主要的也是两部分：一部分是旧军人；一部分是农民。农民受小生产的影响，有着狭隘自私观念和散漫习气；旧军人则不免沾上旧军队的陋习，而且如果归根溯源，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出身于农民。来自于旧军队和农民的同志，虽然已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但思想上的旧军队和农民阶级的烙印，却不是一时内可以消除的，总要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来。南昌起义保存的队伍撤至赣西南大庾（今大余）时，个别的士兵到商店进行敲诈；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原湖南平江浏阳工农义勇队的同志，才随队南下到江西莲花，就已走掉一大半，他们可以在家乡闹革命、分田地，却不愿为农友的翻身得解放而远离故土。要将这样的队伍造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将这样素质的官兵造就成为为民族和人民的解放而奋斗的无产阶级革命军人，必须作出艰苦的努力。

那时，红军的处境十分艰难。因为城市的敌人力量强大，红军只能在敌人统治薄弱的穷山僻壤中寻求生存发展，靠没收地主豪绅的不义之财来筹措给养。更严重的是敌军对红军的区域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以至于根据地的日常生活用品断绝，红军的生活困难到了极度。井冈山地区的红军，最好的饭菜不过是红米饭、南瓜汤，到1928年秋冬的最困难时期，“永新、宁冈两县没有盐吃，布匹、药材完全断绝，其他更不必说”；红军“每天除粮食外的五分钱伙食费都感到缺乏，营养不足，病的甚多，医院伤兵，其苦更甚”；寒冬腊月，“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红军的官兵毫无薪饷，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那时，革命处于低潮，“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红军又时时处在敌军进攻下，稍有不慎，都可能全军覆灭。井冈山斗争时期，就有一些人发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在物质生活如此菲薄，革命胜利的前途如此艰难的情况下，要把红军造就成为一支对革命充满着信心，英勇奋战而不溃散的人民军队，更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这样艰难的条件和险恶的环境中，开始了中国历史上从没有过的建设人民军队的伟大创举。

中共中央对建军的初步设想

当时，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建军经验中，最突出的有两种：其一是大革命时期与国民党合作，在雇佣制基础上创建新制度军队的经验；其二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先以武装起义夺取国家政权，尔后以起义的武装力量为骨干建

《毛泽东选集》，第1卷，70、53、65、78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70、53、65、78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70、53、65、78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70、53、65、78页。

立国防军的经验。这两种经验都不完全适合于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的需要，但又都影响于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的实践，首先是影响到中共中央的建军设想。

1927年8月21日，中共中央指出：“革命的经验，已经证明雇佣军队决不是革命的靠得住的工具”，“因此创造新的革命军队，不要有雇佣的性质，而要开始于志愿兵的征调，渐进于义务的征兵制，建立工农的革命军”，“是现时革命运动中最重要任务之一”。同时提出，“这种军队之中要有极广泛的政治工作及党代表制度，坚固的本党兵士支部，要有靠得住的忠实于革命的军官”。8月底，中共中央指示各地，必须在武装起义之前，特别是在起义夺取政权之后，将武装力量编成为工农革命军。9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放弃“左派国民党”旗帜，但又认为在夺取全国或一省政权之前，不建立苏维埃政府，按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也暂不建立红军。10月下旬，中共中央同意临时中央政治局南方局书记兼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关于南昌起义军必须“改名易旗”的提议，部队由国民革命军改称为工农革命军，“一律废除青天白日旗，改用红旗，以斧头、镰刀为标识，与国际旗同。”这是中共中央对所建立的军队第一次规定军旗。

但是，俄国十月革命的以武装起义一举夺取国家政权的经验在中国行不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开始在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形成局部的武装割据。根据这种状况，中共中央又在1928年5月的《军事工作大纲》中，提出了一个比较全面的建军设想。

中央认为：“为保障暴动的胜利与扩大暴动，建立红军已为目前的要务，不一定要寻〔等〕到一省或一国暴动成功，只要能建立一割据区域，便应当开始建立红军的工作”；并且规定，“在割据区域所建立之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

对红军的建设问题，中央提出：（一）原则上必须在团一级建立共产党支部，连一级建立支分部。在目前红军多以连为战斗单位的情况下，如果连的党员数量较多，可暂时以连为单位建立支部，但不可像国民党一样，把士兵都规定为党员。（二）应当由苏维埃政府派出政治委员。政治委员力党的代表，任党的支部或支分部书记，“监督军官，并负责进行政治工作”，负责对士兵的政治教育和在部（分）队中开展文体活动。（三）必须特别注意政治工作。红军的士兵不仅为战斗员，而且应为“战地宣传组织人员”；应当对士兵进行政治教育，以提高他们的政治认识和宣传与组织群众的工作能力。（四）红军的编制，必须从武器数量和作战需要出发；红军的训练以战斗之必要的技能为主，“一切形式的不必要的训练应尽量减少”；“红军的生活应力求工农化，官兵之待遇应一律平等”；红军的指挥必须以割据区域为单位统一；红军应设立经理委员会，士兵选举代表参加经济管理；红军应建立“侦探调查工作”；红军应实行“定期退伍”制度，“每六个月退伍三分之一”。

6月中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又在《军事工作决议案（草案）》中，对“建立红军的原则”作了重申和规定，强调红军必须实行征兵制，但在向征兵制过渡时期可实行志愿兵制度；红军必须“实行政治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一九二七），340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一九二八），233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委员与政治部制度”。

中共中央的这些设想还仅仅是一些原则，其中如实行征兵制根本不适合当时红军的特点，但多数还是正确和基本正确的，对各地红军的创建有着一定的指导意义。

怎样建设红军是全党的工作。在中共中央提出建军的一些原则设想的同时，各地已经遇到了建军的许多具体的实际问题，迫使他们必须在实践中加以解决。其中，毛泽东领导的红军的建设经验最具代表性。

“三湾改编”和政治工作制度的建立

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进行“三湾改编”，在实践中为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型的革命军队奠定了基础。

1927年9月20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部队离开浏阳文家市，开始沿罗霄山脉南下。部队放弃进攻长沙计划，使一些急于革命胜利的官兵失望，原平江浏阳工农义勇队也有许多人不愿远离家乡。因此，一些人不辞而别。25日，部队在萍乡芦溪遭到敌军袭击，受到一些损失，总指挥卢德铭牺牲，失败主义和离队现象更加严重。行进至莲花县时，部队所剩兵员已不足千人，军心严重不稳。与此同时，其他问题也突出出来：由于严重减员，造成建制大，连队缺员，很难遂行作战任务；原来每团虽有一个共产党支部，但属机关性质，既不能领导部队，也没有能组织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原来连以上虽设有党代表，但沿袭的是国民革命军党代表制度的职能，作用没有充分发挥，且与军事长官矛盾重重；旧军队的陋习依然保持，斗争如此严酷，给养相当困难，军官们生活待遇特殊，并任意打骂士兵，官兵关系十分紧张。这些问题如不彻底解决，部队就有溃散的可能。

9月29日，部队到达远离敌人城市的偏僻山乡江西永新三湾村，作短期休整。当晚，毛泽东主持前委会议，通过对部队进行改编的方案。30日，部队开始改编，全军缩编成1个团，使连队得到充实；同时，在部队建设上采取了“支部建在连上”、实行新的党代表制度和民主制度三项重大措施。

这次改编，在团、营两级建立共产党的委员会，连建立支部，负责领导部（分）队，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党赋予的任务，并且积极发展党的组织，逐步做到班、排建立党小组，以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实行新的党代表制度，以党代表担任同级党组织书记，拥有与同级军事长官同等权力，分工负责官兵政治思想教育，领导官兵开展思想工作和群众工作，协助军事长官管理和指挥部（分）队，并负党务工作责任。

这是一个重大的改革。它使人民军队的连以上各级党组织和党代表制度，与国民革命军的相应制度不仅有本质上的不同，而且在职能上也有重大差别：一、改变了国民革命军的特别党部制度和党代表制度的自成垂直系统的关系，将两个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突出了党的领导作用。二、克服了国民革命军特别党部制度的消极的党纪制约的作用。它不是官兵人人皆为党员，而是按党章要求，吸收具有无产阶级先进思想和行为的官兵为党员，以党内民主的方式选举组成支部和党委。这就使人民军队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便于发扬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连队设党的支部和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极为重要，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三、它将

国民革命军党代表与同级军事长官的监督和被监督关系，改变成为同在党的委员会领导下的分工协作关系，把个人监督改变力由党的委员会的集体领导。改革后的新制度，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对红军的领导。

这次改编还规定：“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为了保障士兵民主权利的履行，部队连以上各级建立由士兵选举的代表组成的士兵委员会，参与部（分）队的经济管理和行政管理，并在党代表的领导下，兼做政治思想工作和群众工作。这个制度也是中国历史上所没有的新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它肃清了雇佣军队官兵之间的压迫与被压迫、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确立了官兵一致的新型人民军队的内部关系。在当时，这个制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毛泽东评价说：“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这些制度的实行，还使连队开始有了群众性的思想工作，并参加了对群众的宣传工作。

1928年4月井冈山会师后，毛泽东在“三湾改编”时提出的红军建设制度，在红4军全军实行。5月，毛泽东开始对政治部制度进行改革。改革中首先采取过渡性措施，暂不设政治部，而是在军党委和团党委（无师建制）设机关，兼负政治部职能，领导官兵开展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以避免像国民革命军那样政治工作只由政治部少数人担负，而广大官兵单纯军事观点严重的弊端。1929年春，红4军主力在长汀整编，团改为纵队，毛泽东和前委将纵队以上的党委机关改为同级政治部。红4军的政治部制度包括了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的对内担任官兵政治训练，对外做群众工作的职能，但又有根本的差别。国民革命军政治部设到师以上各级，为同级司令部下属机构，没有实质性权力；红4军的政治部设到团一级，与同级司令部并行，具有同级党委机关职能，负有对部队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的领导与指导职能，这就从根本上提高了政治部和政治工作的地位和威信。

1929年3月以后，中共中央将红4军的建设经验推荐给许多地区的红军，并规定将党代表改称为政治委员（后来，连政治委员改称为政治指导员）。

这样，红军的政治工作制度便基本建立了。这一方面保证了党对红军的领导，另一方面也从实际上确立了政治工作作为红军生命线的重要地位。

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制定

随着红军建设实践的发展，军队的任务、纪律逐步明确和制度化。

1927年10月下旬，毛泽东率部到达井冈山后，开始创建革命根据地。

11月，派第1营到湖南茶陵筹款和发动群众。那时，部队还没有在农村筹款的经验，更没有创建根据地的观念。他们打垮当地反动武装挨户团占领县城后，一面按以往在城市筹款的经验，召集商人派款，一面按旧衙门方式，升堂问案。毛泽东得悉这个情况后，立即给予指示，要部队分兵到乡村，没收地主豪绅的不义之财，一部分作为部队的粮款，一部分分给穷苦的农民；

《毛泽东选集》，第1卷，65、65、65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65、65、65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65、65、65页。

同时，广泛开展宣传工作，发动民众革命，建立群众组织、革命政府、共产党组织和赤卫队。12月，当部队回到宁冈时，毛泽东对部队的这次行动作了总结，提出了部队必须执行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三项任务。

这三项任务，就是红军的三大任务。这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打仗是为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将敌人控制的地区变成为红军控制的地区；筹款，是为解决红军的供给问题；做群众工作，则是最根本的政治任务。红军正是通过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建立共产党的组织，来实现革命，体现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的三大任务，是由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体现了红军的人民军队本质特征。

红军执行三大任务，要有纪律作保证。各地红军建立后，都根据实际需要，陆续制定了一些纪律。其中，以毛泽东给红军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最具代表性。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制定，有个逐步形成发展的过程。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在三湾时，正当红兽收获季节。在初次助民劳动中，有的官兵吃老乡的红薯。对此，毛泽东给部队规定了不拿老百姓一块红薯的纪律。不久，部队到茶陵筹款，在打土豪时又有个别官兵将没收的财物据为己有。于是，毛泽东又提出打土豪归公的纪律。1928年1月，部队到遂川发动群众和筹款。当时，部队以连、排为单位分兵发动群众，与群众广泛接触，也出现了一些损害群众利益的不良现象。毛泽东了解情况后，又给部队规定了上门板、捆禾草等六大注意事项。3月，部队南下湘南到根据地外活动，纪律显得更重要。1月初，毛泽东在桂东沙田，将过去陆续制定的纪律和注意事项合在一起，并作简单修改补充，正式定为三条纪律六项注意予以颁布，三条纪律为：一、不拿工人、农民、小商人一点东西；二、打土豪要归公；三、一切行动听指挥。六项注意为：一、上门板；二、捆禾草；三、讲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三条纪律六项注意鲜明地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质特征。对此，红4军的代表曾在1930年5月全国红军代表大会上，向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其他地区的红军代表作了报告和说明。其中说，三条纪律六项注意，是红军“四、五、六军及闽西、赣西南各地赤卫队共同用的政治纪律”。具体为：“不拿工人、农民、小商人一点东西”，“着重在一点上，如一根草也是一点”；“上门板”，是“指宿营时借老板的门板走时要上好才走”；“捆禾草”，是“指宿营时借老板的禾草，走时要捆好才走”；“讲话和气”，是“指对工农讲话，不要做出恶样子，要和和气气”；“买卖公平”，是“指买卖东西不许强买强卖”；“借东西要还”，是“指借老板的任何东西都要送还才走”；“损坏东西要赔”，是“宿营时损坏了老板的任何东西，要赔偿他才走”。

1930年5月以后，毛泽东和朱德又对六项注意作了修改，增加了“七、不得胡乱屙屎；八、不搜敌兵腰包”，从而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写进了9月25日红一方面军颁布的《红军士兵会章程》中。

1931年，中共中央代表欧阳钦在向党中央报告中央苏区情况时，具体地报告了红一方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此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条文措词略有改动，并成为全军和地方武装的纪律。

1931年秋，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对地方武装的训令中，要求地方武装绝对执行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红军政治工作制度和民主制度的建立、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制定，加上1928年2月新城战斗后毛泽东提出实行的优待俘虏的政策，使得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和优待俘虏等项原则，已在实际上形成。

“古田会议”和建军原则的确立

1929年12月召开的红军第4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是人民军队建设史上一座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里程碑。会议通过的决议,是人民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确立了红军建设的根本原则,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服从于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服务于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大问题,对人民军队建设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古田会议的召开,是红军建设实践发展的结果。当时,由于红军长期处于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红军的主要成分又是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主要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经常大量反映到红军队伍中来。红军的官兵,特别是军事长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旧军队。他们在革命斗争中,忠于党忠于人民,有的不惜为革命抛弃高官厚禄,他们作战英勇顽强,堪称模范,但他们也不自觉地带着旧军人的单纯军事观点等种种旧观念。在军队中正确地实行民主制度时,又产生了极端民主化的错误倾向。部分官兵不习惯于做创建根据地的艰苦工作,不习惯党对军事工作的领导和集权制(当时对民主集中制的称谓)原则,不习惯政治工作地位的提高。他们认为毛泽东强调党对红军的领导,实行集权制,是搞家长制;他们认为政治部妨碍了司令部工作,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他们不主张创建根据地,而主张四处游击,走州过府。这些不同认识,在红4军党内引起了争论。

1929年6月下旬,红4军召开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以求解决争论问题。但由于缺乏正确的政治观念,会议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反而造成不良后果。它否定了毛泽东的必须反对流寇主义和坚持党的集中制领导原则等正确意见,助长了忽视根据地的错误观念和极端民主化;不经中共中央许可,越权选掉中央指定的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职务,迫使毛泽东离开前委领导岗位。此后,又召开红4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但仍未解决问题。

针对红4军党的七大存在的问题,中共中央于8月21日致信红4军前委予以批评,并且指出:红军不仅是战斗队,而且更具有宣传群众的政治作用,红军游击战,更主要的是为了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和建立政权;红军中的党应当实行集权制领导原则,绝不容许极端民主化;红军的政治工作和宣传组织,“是红军中政治命脉”,决不能动摇这一“根本路线”。8月底,陈毅到达上海,就红4军党内存在的问题,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9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九月来信”,指示红4军前委:红军的基本任务,一是“发动群众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是“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是“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并且指出:“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

其八项注意的第七项,已改为“不调戏妇女”。一切行动听指挥排为三大纪律的第一条纪律。

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红军中右倾思想，如：取消观念，分家观念，离队观念，与缩小团体倾向，极端民主化，红军脱离生产即不能存在等观念，都非常错误，皆原于同志理论水平低，党的教育缺乏。这些观念不肃清于红军前途有极大危险，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之。”中共中央还让陈毅带着“九月来信”返回红4军，请毛泽东回前委复职。中共中央的这些指示，特别是“九月来信”的精神，为红4军党内统一认识，纠正各种错误思想提供了依据。

11月26日，毛泽东回到红4军前委，在朱德、陈毅的协助下，于12月下旬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红4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会议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指示精神，总结了红军诞生以来的建设经验，纠正红4军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会议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新的红4军前委，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决议总结了红军建立以来破除旧军队影响，进行新型人民军队建设的经验，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其主要的内容是：

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决议指出，必须对官兵进行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的教育，划清红军与国民党军及其他旧式武装的界限；红军必须执行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决议强调：“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离开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因此，红军必须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

红军必须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决议强调，红军必须实行党的政治领导，必须“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以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广大党员，“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使党的组织确实能担负党的政治任务”。决议指出，“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红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必须健全连队以上各级党的领导中枢；在党内，应当“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应当严肃党的纪律，反对极端民主化和非组织观念，防止“党与军事分离”、“党不能领导军事的危险”。

红军必须建立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决议规定了红军中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的地位，指出红军的政治部和司令部，是“在前委指导下，平行地执行工作”的关系。“在组织上，把红军的政治工作机关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是错误的，“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决议指出，红军的各级政治委员和政治部，应当积极开展政治思想工作，加强对官兵的政治训练，提高官兵的阶级觉悟，纠正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保证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和各项任务的完成。

红军必须建立一个很好的内部和外部关系。决议规定了红军处理内外关系的准则，指出红军官兵都是阶级兄弟，在政治上是平等的，要求官长应当爱护士兵，关心士兵的政治进步和生活状况，特别应当关心伤病兵；必须保

即“古田会议”决议所说的小团体主义。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一九二九），477、486、487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

障士兵的民主权利，尊重士兵的人格，坚决废止肉刑，纠正打骂士兵等旧军队的管教方法；要求士兵要尊重官长，自觉地服从命令，接受管理，纠正平均主义、雇佣思想等错误倾向。决议提出，要加强对官兵的纪律教育，严格执行三条纪律六项注意，爱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尊重地方党和政府。要加强瓦解敌军的工作，实行优待俘虏的政策。

“古田会议”决议，还对红军党的建设、思想政治教育和宣传工作等具体问题，作了进一步的强调和要求。

在党的建设问题上，决议从组织建设和党内教育两个方面提出要求，强调必须健全各级组织，建立正确的上下级关系，“上级机关要明了下级机关的情况和群众生活情况，成为正确指导的客观基础”；“党的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对于上级机关的指示，要经过详尽的讨论，以求彻底地了解指示和意义，并决定对它的执行办法”；“党的各级机关解决问题，不要太随便。一成决议，就须坚决执行”；“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除必要时得在下一次会议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决议强调要加强党的组织生活，纯洁党的队伍；强调必须加强党内教育，提高党员的质量，增强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在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上，决议强调要以基层为重点，以战士和基层干部为主要对象；要与文化学习相结合，着眼于提高士兵和基层干部的文化水平；要着重于革命常识教育，以提高官兵的革命觉悟和宣传群众的能力；强调思想教育工作的群众性，使人人做工作、受教育；强调因人施教、分班施教，逐步和逐级提高；提倡教授法，要求形式喜闻乐见，方法灵活多样。

在宣传工作问题上，决议指出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的工作”，它的任务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强调“红军的宣传队是红军宣传工作的重要工具”。对人民群众的宣传，形式要多样化，对敌军的宣传，侧重于宣传红军的宽待俘虏政策。

“古田会议”确立的建军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建设人民军队的根本原则。它不仅推动了当时红军建设和革命战争的发展，而且以新的经验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军学说，成为人民军队建设的伟大纲领。

五、红军三次反“围剿”和作战原则的形成

经过3年艰苦的游击战争，到1930年夏秋，红军开始了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军事战略转变。与此同时，国民党军对红军和根据地发动了规模空前、持续不断的“围剿”。红军进入反对国民党军大规模“围剿”的新的斗争阶段。各地红军从实际出发，制定了正确的对敌斗争方针，在苏区人民的大力支持下，从1930年11月到1932年6月间，连续打破了国民党军的三次“围剿”，累计歼敌约20万人，缴获各种枪约11万枝，创造了以弱胜强的奇迹。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使全国主力红军发展到15万余人，形成了主力红军、地方红军和群众武装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和一整套以积极防御力基本精神的红军作战原则。

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

1930年夏，红军开始实行由游击战争向正规战争发展的军事战略转变，这在人民军队发展史上是第一次重大变革。红军的战略转变，包括军队组织形式和作战形式的改变，它引起军队建设、作战原则和人们观念等一系列变化，而作战形式的改变是军事战略转变最基本的内容和标志。

红军由游击战争向正规战争的转变，主要是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运动战，是正规兵团在长的战线和大的战区上面、从事于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的形式。其特点是正规兵团、战役和战斗的优势兵力、进攻性和流动性。红军由游击战为主转向以运动战为主，反映了红军战争由低级向高一级的必然趋势，是革命力量发展壮大表现。同时，这种正规战又是带有游击性的，正如毛泽东指出的，这种“所谓正规战争是中国型的，只表现在集中兵力打运动战和指挥上、组织上的某种程度的集中性和计划性方面，其他则仍是游击性的，低级的，不能和外国军队一概而论，也和国民党的军队有些不同，因此，这种正规战，在某种意义上，是提高了的游击战。”

在这里，有两种错误倾向应该反对，其一，是“沉溺于游击性而不愿向正规性转变的右的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的倾向”；其二，是“过分地重视正规化的‘左’的集中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倾向”，这两种倾向都是与中国革命战争实际情况相脱节的，都会给红军的发展造成危害。

红军由游击战争向正规战争的战略转变，有它发展的必然性。

首先，红军游击战争的发展和苏区的扩大，为这一转变提供了物质基础。

实行运动战的首要条件，是要建立正规兵团。中共六届二中全会以来，中共中央加强了对红军游击战争和苏区的领导，促进了各地红军游击战争的发展。通过粉碎国民党军的“进剿”、“会剿”，红军作战能力不断提高，队伍不断壮大，到1930年夏，全国红军已达7万多人，地方武装有3万多人。红军数量的扩大和作战能力的提高，为编成正规兵团，实行运动战奠定了物质基础。

实行运动战的另一重要条件，是要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和广阔的回旋余地。苏区的发展壮大，提供了上述条件。随着红军游击战争的不断胜利，分散于大江南北12个省的20多块小块苏区，逐渐发展成为连接成片、比较巩

固的若干苏区。苏区内普遍建立了共产党组织、工农政府和群众武装，实行了土地革命。经济的发展和水平的提高，激发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广大青年积极参军参战，支援红军。这就为红军进行大规模的运动战，提供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和广阔的回旋余地。

其次，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客观上为红军实现战略转变提供了有利时机。从1929年3月蒋桂战争开始，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不断以战争形式爆发出来。1930年5月，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等派系之间爆发了规模空前的中原大战。双方投入兵力达100万之众，战争历时半年之久，死伤兵员30多万。这就使反动势力大为削弱，南方各省红军的压力得以减轻，革命战争的发展出现有利的时机。

此外，还与当时的党中央政治路线和军事战略的改变相关。以李立三力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艰巨性和不平衡性缺乏足够的认识，错误判断了形势，于1930年2月提出“变军阀战争为国内阶级战争，以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总的政治路线，为红军规定了“进攻交通要道、中心城市，消灭敌人主力”的任务。为了完成上述任务，党中央决定红军“集中组织，统一指挥”。这种在出发点和目的上，具有“左”倾冒险主义的规定和决定，在客观上又与红军由小到大、由弱而强所必然出现的由游击性而正规性的发展趋势相吻合，造成了对红军的军事战略转变，既有促进的一面，又有给以错误影响的一面。

1930年5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红军代表大会，促成了红军战略转变的开始。根据中共中央确定的“为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任务和战略”，这次会议提出了关于红军的决议案，确定集中各地红军组建正规军团，以建设正规红军。此后，又颁布了中国工农红军编制草案和中国工农红军纪律条例草案。这些，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红军编制及其组织系统的统一和加强，客观上反映了红军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必然趋势。

这次大会后，根据会议决定和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指示，各地红军先后集中整编，主力部队组建为正规兵团，开始了以转换作战形式为基本内容和主要标志的战略转变。

红军整编最重要的结果，是建立了方面军、军团一级的兵团。同时，原有的军级及其以下的单位，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在赣南闽西苏区，建立了红1军团。

1930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总前委与中共闽西特委在汀州（今长汀）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红4军与红6军（红3军）、红12军合编组成红军第1军团（开始称第1路军），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全军团约2万人。同时成立中共红1军团前敌委员会和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分别担任书记和主席，统一领导赣南闽西苏区的建设和红军行动。

在湘鄂赣苏区，建立了红3军团。这一地区的红5、红8军以及新建立的湘鄂赣边红军独立师（不久扩编为红16军）合编，组成红3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滕代远任政治委员。全军团共1.7万人。同时成立了中共红3军团前敌委员会，彭德怀任书记。

8月下旬，红1军团与红3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市会师，合编为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下辖第1、第3军团，共约4万人。

在湘鄂西苏区，建立了红2军团。这一军团由当地的红4、红6军合编

而成。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治委员，全军团约1万人。

整编后的红军较大的部队还有：鄂豫皖苏区的红1军，军长许继慎、政治委员曹大骏；赣东北苏区的红10军，军长周建屏，政治委员胡庭铨（后邵式平）；广西右江苏区的红7军，军长张云逸，政治委员邓小平；广东东江的红11军、琼崖地区的红军独立师等部。各地红军通过整编，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基本统一了指挥，提高了战术技术水平，为实行运动战创造了前提条件。

如前所述，红军的这次战略转变是中国型的，是由游击战向带有游击性的运动战的转变。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并没有根本改变，革命战争的发展在各地也不平衡。然而，当时党内的“左”倾盲动主义领导者却看到这一点。他们试图通过整编，组织红军进攻中心城市。

1930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由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即《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认为当时出现了直接革命的形势，并“有极大可能转变为全国革命的胜利”。决议要求，要把“布置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的首先胜利”，作为“目前党的策略总路线”。据此，决定组织中心城市暴动，向各地红军下达了攻取以武汉为中心的大中城市的作战任务，企图实现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冒险战略。中央还要求各地，在8月底前扩大50万红军，将根据地内的地方武装和群众武装都集中到主力红军中去。

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主要地区红军在编成正规兵团的同时，于1930年6月至9月，相继开展了进攻作战。红、军团根据中央关于夺取南昌、九江的指示，自闽西地区出发北上，逼近南昌。但军团首长并未贸然强攻南昌、九江，而是依据敌情，隔江向南昌鸣枪示威，尔后转至安义、奉新地区休整待机、做群众工作，从而避免了不必要的损失，继而以外线进攻战和速决战取得文家市战斗胜利。红3军团遵照中央关于“切断武长路”的指示，从湘鄂赣边出击，先后攻占岳阳、长沙，但在优势之敌反扑下，旋又撤出。红1、红3军团会合组成红一方面军后，再攻长沙没有奏效，在毛泽东的劝说下，放弃进攻长沙战役，取得吉安战斗胜利，接着开始进行反“围剿”斗争准备。红2军团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和中共长江局的命令，进攻沙市，进逼武汉，主力渡江南进，虽取得一些战斗的胜利，但也受到不少损失，未达到战略目的。鄂豫皖地区红1军，在执行中央关于“切断京汉路，配合以城市为中心的地方暴动”的任务中，出击豫南，使部队和苏区都受到很大损失。其他地区红军，除赣东北等少数地区红军，由于没有贸然进攻敌人守备坚固的中心城市，而未受到损失外，右江、苏中、浙南、琼崖、川东以及新黄广等地区的红军，都因强攻中心城市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甚至失败。此外，红军集中攻打中心城市，致使军事行动与苏区建设脱节，也给苏区建设造成严重危害。

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停止全国总暴动和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结束了这次“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的统治。这就为红军顺利完成战略转变，和此后夺取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粉碎国民党军的第一、二、三次“围剿”

红军和苏区的发展，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感到了威胁。1930年10月，中

原大战一结束，蒋介石便调兵遣将部署军事“围剿”，准备在3至6个月中消灭红军、摧毁苏区，“围剿”的重点是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由此开始，红军进入反对国民党军大规模军事“围剿”的斗争阶段。

红军反“围剿”斗争，与以往反“进剿”、反“会剿”斗争相比，有明显不同的特点。其一，以往“进剿”、“会剿”是由一省或数省国民党军组织的，而“围剿”则是国民党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地统一组织的；其二，“进剿”、“会剿”中，进攻红军的多是国民党地方军队，兵力较小，战斗力不强，而“围剿”中，国民党军参战部队众多，其中不少是主力，战斗力较强；其三，“进剿”、“会剿”一般持续时期较短，作战规模较小，红军往往通过一二次战斗即能打退敌人进攻。“围剿”中，往往作战规模较大，持续时间较长，敌军多路协同配合，并根据战场变化不断调整“围剿”战略。这些特点，使红军的反“围剿”斗争，无论在作战范围、战斗规模还是激烈程度、持续时间上，都大大超过以往，因而对作战指挥能力和部队素质的要求也更高。

反“围剿”斗争是对红军的巨大考验，各苏区红军在反“围剿”斗争中，贯彻积极防御的思想，以己之长，克敌之短，取得了重大胜利。

（一）中央苏区和红军的反“围剿”斗争

1930年至1931年底，红一方面军连续取得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

1930年11月，蒋介石调集11个师约10万人的兵力，以鲁涤平为总司令，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战术，对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发起第一次“围剿”。

当时，红一方面军约4万人，苏区扩大到近20多个县。面对强敌进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接受毛泽东的主张，确定了“诱敌深入”方针。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红军东渡赣江，退至苏区中心。

国民党军发起进攻后，急于与红军主力决战，但由于红军后撤而一再扑空。敌军深入苏区后，红军和游击队不断袭扰，苏区人民坚壁清野，致使其疲劳沮丧，补给困难，弱点不断暴露；而红军主力则依据苏区的各种有利条件，做好了大举歼敌的准备。12月30日，红军集中优势兵力，全歼了冒进龙冈的敌“围剿”军主力第18师，活捉敌前线总指挥兼第18师师长张辉瓒。接着，又于1931年1月3日，在东韶全歼敌第50师1个旅。其他各路敌军狼狈溃退。两次作战，共计歼敌1.3万人。这样，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即被粉碎。

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是红军在战略转变阶段以运动战方式歼敌的第一次战役行动，为以后各次反“围剿”作战积累了经验。

4月，蒋介石又纠集18个多师共20万兵力，以何应钦为总司令，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和“分进合击，互相策应”战术，对中央苏区和红军发起第二次“围剿”。

红一方面军3万余人，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仍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退至苏区前部持重待机。随后，采取集中兵力，先打弱敌，并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战法，5月16日至5月30日，由西向东横扫，在富田、白沙、中村、广昌、建宁连打5个胜仗，转战700余里，歼敌3万人，缴枪2.2万枝，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围剿”。

7月，蒋介石调集了23个师30万兵力，自任总司令，再次以“长驱直

入”的作战方针，向中央苏区发起第三次“围剿”。

这时，红一方面军主力还在远离苏区的闽西、闽赣边界地区分兵开展群众工作，尚未收缩兵力和进行必要的休整补充，这给反“围剿”斗争带来极大困难。得知敌人进攻后，临时总前委决定仍以“诱敌深入”为指导方针，主力迅速回师苏区，集中兵力，寻机歼敌。正当盛夏，暑热难当。红军一路挥汗急行，绕经瑞金北部的壬田，于28日到达赣江东岸的兴国高兴圩地区，完成千里回师任务。在此前后，红7军也奉命转战至中央苏区，参加反“围剿”斗争。

长驱直入的敌军发现红军主力后，以9个多师的兵力包围过来。红军被敌人压缩在高兴圩地区数十里狭小地区。临时总前委临危丁乱，派少量兵力西向赣江佯动诱敌，主力于8月5日夜从东面敌军阵地间20公里的缝隙中秘密穿越，将敌人抛在身后。尔后乘敌不备，从6日至11日，在莲塘、良村、黄肢连打3个胜仗，从被动中夺得主动，随后转至君埠集结。当敌人又以8个师兵力向君埠包围过来时，临时总前委以红12军伪装主力向东北方向佯动吸引敌人，主力2万人向西南方向突围。15日夜，红军摸黑从东进入敌军阵地结合部10公里间隙的崇山中，大胆穿越，再次跳出敌人的包围圈，隐蔽于兴国境内休整。

被红12军牵着鼻子转了半个月的敌军，发现上当再回头时，已精疲力竭，成了强弩之末。而休整了半个月的红军正严阵以待。就在此时，两广军阀发动了反蒋战争，蒋介石不得不下令结束“围剿”。红军抓住机会再次反攻，彻底打破敌人的“围剿”。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使赣南、闽西苏区连成一片，形成了方圆5万平方公里的中央苏区。红军的运动战作战原则也在斗争中全部形成，红一方面军在战后改称中央红军，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

在红军反“围剿”胜利的鼓舞下，国民党第26路军1.7万人，在该军中共地下特别支部和参谋长赵博生、旅长董振堂、季振同等领导下，于12月14日在宁都举行起义，加入红军，被改编为中央红军第5军团。这使中央红军的力量进一步壮大。

在中央苏区和红军反“围剿”斗争同时，其他各苏区和红军也与国民党“围剿”军展开了英勇斗争，各苏区和红军的斗争，在战略上形成了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的态势。

（二）湘鄂西苏区和红军的反“围剿”斗争

1930年11月，国民党军以4个师又7个旅兵力，采取“分区重点围攻，步步为营，逐步清剿”方针，对湘鄂西苏区发动“围剿”。“围剿”分三期进行，重点进攻洪湖苏区。

当敌人开始进攻时，湘鄂西红军的主力红2军团出击外线。中共湘鄂西特委领导地方武装组成江左军、江右军和红军独立团，在群众武装的配合下，利用河湖港汉的复杂地形，积极开展游击战争。

1931年初国民党军发动第一期“围剿”，进攻洪湖苏区的江北地区。江左军主力转移外线，开辟新苏区，敌人虽然占领了江北地区，却未能消灭红军。3月初，国民党军发起第二期“围剿”，进攻江南华容县的东山区，江

1931年1月，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撤销，方面军党组织由中共苏区中央局及其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同年5月，为加强对前线作战部队和战区地方党组织的领导，又成立了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

右军实行内外线斗争相结合，一部进山坚持斗争，一部转入洞庭湖西岸，开辟了洞庭特区。在此期间，红军独立团乘机北渡长江，与江左军共同进行恢复江北苏区的斗争。在斗争中，红军独立团扩编为红3军第9师，段德昌任师长。国民党军在红军的打击下，被迫转入守势，革命根据地逐步得到恢复。1931年9月，国民党军乘洪湖地区水灾严重之机发起第三期“围剿”，再次重点进攻江南华容县的东山苏区，中共湘鄂西分局一面组织群众抗洪救灾，一面领导红军和游击队进行游击战争。在敌人占领东山苏区后，红军主力向江北突围，地方武装又组成江南游击大队，坚持与敌斗争。

1931年3月，转战于湘鄂边的红之军团根据党中央指示改编为红军第3军，军长贺龙，政治委员邓中夏，4月，红3军北渡长江，以攻势行动支援洪湖苏区反“围剿”斗争，后又转战鄂西北。创建了鄂西北苏区。之后，红3军主力与红9师会合，后返回洪湖苏区。为调动敌人，红3军和红9师先后出击襄北，取得了尤王集、文家墩等战斗胜利，粉碎了敌人对洪湖苏区的“清剿”。这时，洪湖苏区进一步扩大，湘鄂西苏区得到巩固和发展，红3军也发展到1.5万余人。

（三）鄂豫皖苏区和红军的反“围剿”斗争

1930年11月，国民党军8个多师10万兵力，对鄂豫皖苏区发起第一次“围剿”。当时红1军正在外线作战。中共鄂豫皖临时省委和军委领导地方武装和游击队，以游击战灵活打击。袭扰和疲惫敌人，使进占苏区之敌只能困守几个县城和集镇。红1军转战皖西后，连续取得金家寨、苏家埠等战斗胜利，又在东西香火岭歼敌3个团、击溃1个团，在商城四顾墩歼敌1个团，打破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

1931年：月中旬，红1军与红15军合编为红军第4军，军长旷继勋，政治委员余笃三，参谋长徐向前。全军共1.2万人。随后，展开攻势作战，取得双桥镇大捷，巩固和扩大了鄂豫皖苏区。

4月上旬，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发起第二次“围剿”。红4军以一部兵力牵制敌人，集中主力拣弱敌打，先后在皖西独山镇和鄂豫边的价湾地区、黄安的桃花镇和十里铺等地，多次打败敌人，迫使敌人转攻为守，粉碎了国民党军第二次“围剿”。

5月中旬，以张国焘为书记的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成立；同时成立了由张国焘兼任主席的军事委员会。此后，红4军进行了整编，扩大力4个师，近之万人。10月，成立了红军第25军。11月，红4军与红25军联合组成红军第四方面军，涂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红四方面军的组成，对于鄂豫皖红军的进一步发展和进行大规模的运动战具有重要意义。

在这之前，蒋介石已在准备对鄂豫皖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但由于与地方实力派的矛盾不断加剧，第三次“围剿”迟迟没能实施，进至苏区周围的国民党军处于分散防守的状态。针对这一形势，红四方面军决心以进攻作战打破敌人的“围剿”计划。从1931年11月上旬，至1932年6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先后进行了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4次进攻战役。红军依托苏区，在广大人民支援下，以集中兵力、围点打援、诱敌深入、迂回包抄等战术，军事进攻与政治攻势相结合的方法，取得了胜利，总共歼敌6万人。这不仅使敌人的“围剿”计划成为泡影，而且使红四方面军发展到4.5万余人，鄂豫皖苏区也扩大到26个县的4万平方公里范围。

这一时期，湘赣、湘鄂赣、赣东北、闽北等苏区的红军，分别在当地党组织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开展反“围剿”、反“清剿”斗争，挫败了敌人消灭红军、摧毁苏区的企图，在战略上配合了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的反“围剿”斗争。

经过这一阶段的反“围剿”斗争，全国红军发展到约 15 万人，形成了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鄂豫西苏区、湘鄂赣苏区、赣东北苏区和湘赣苏区 6 个大的和较大的战略区，革命的星星之火，已形成燎原之势。

红军作战原则的形成

红军在反“围剿”作战中，不仅提高了作战能力，完成了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而且将战争经验系统化，在“十六字诀”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形成了一整套以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为指导的战略战术原则。毛泽东曾说：“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这时是军事原则的新发展阶段，内容大大丰富起来，形式也有了许多改变”。这些思想和原则，后来，在毛泽东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作了完整的论述。

实行积极防御，是由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决定的。当时中国革命战争基本特点是，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而又经过了 1924 年到 1927 年的革命；敌人强大；红军弱小；有共产党领导和土地革命。第一个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红军有可能发展和战胜敌人；第二个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持久性。

由上述特点决定了“围剿”与反“围剿”长期的反复，成为当时战争的一个规律。在敌强我弱，红军和战略基地苏区被分割和被包围的情况下，敌人对红军的“围剿”必然是长期地连续地进行。红军必须实行持久战略，准备长期地反复地同敌人的“围剿”作斗争。

为此，必须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又叫决战防御。”“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这种防御，就是既要避免不利的决战，在强敌进攻下，利用苏区的种种有利条件，实行必要的战略退却；又要实行有利的决战，集中兵力，抓住敌人弱点，以战役战斗的进攻战，一个局部一个局部地歼灭敌人，从而打破敌人一次次“围剿”，在长期作战中转化敌我力量对比的形势，变弱为强，以达到战略上削弱敌人之目的。

红军在实行积极防御战略方针时，还实行以下原则：

第一，诱敌深入，这是红军实行积极防御方针依托苏区进行反“围剿”作战的基本原则。实行战略退却，“诱敌深入”，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战略步骤。毛泽东指出：“对于我们，当敌举行大规模‘围剿’时，一般的原则是诱敌深入，是退却到根据地作战，因为这是使我们最有把握地打破敌人进攻的办法。”实行这一原则，从根本上说，是避免红军在不利情况下过早与敌人决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204 页。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198、211 页。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198、211 页。

战，在退到根据地内部后，选择或造成有利于我而下利于敌的若干条件，再适时反攻歼敌。这些条件主要有：积极支援红军的人民；有利作战的阵地；红军主力全部集中；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使敌人疲劳沮丧；使敌人发生过失等等。“诱敌深入”原则指导下的反“围剿”作战，一般包括这样几个步骤，当敌人开始准备“围剿”时，红军应停止进攻作战，适时转入反“围剿”的准备工作：主要是包括军事、政治两方面。当敌人开始进攻时，红军主力应有计划地向苏区退却；退却终点的确定，要选择有利于红军实施反攻作战的地区，一般说来，应具备良好的地形条件和人民条件，其中最主要的是人民条件。当红军主力集结完毕，而敌人在苏区内经人民战争打击弱点充分暴露时，红军适时转入反攻，选择敌人的要害或薄弱环节，集中兵力狠狠打击，从而粉碎敌人“围剿”。并乘胜展开攻势作战，以扩大战果，巩固和发展苏区。

第二，慎重初战。这是红军在各次反“围剿”中作战取得胜利的关键。毛泽东指出：“处在防御地位的红军，欲打破强大的‘进剿’军，反攻的第一个战斗，关系非常之大。第一个战斗的胜败给予极大的影响于全局，乃至一直影响到最后的一个战斗。”这是因为，红军的反“围剿”作战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进行的，而且比以往的反“进剿”、反“会剿”作战更激烈，更艰巨，持续性战斗更多。打好第一仗，下仅可以极大地鼓舞士气，有利于下一步作战任务的完成；同时也是实行下一步战役、战斗计划的基础。

慎重初战应坚持必须打胜，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必须照顾下一阶段的原则。为了首战获胜，需要充分准备，选择有利的地形条件，取得人民群众的密切配合，掌握适当的作战时机，确有获胜的可能尔后再战。否则，宁可持重待机，下可轻率出击。中央苏区三次反“围剿”作战都十分注意把握初战时机，为全局胜利创造了良好开端。第一次反“围剿”中原定先打敌谭道源部，因其迟迟不脱离工事，红军两度开进又忍耐退回；后敌张辉瓒部孤军冒进，红军迅即发起攻击，获得全胜。照顾全战役计划，是要在首战之初，通观全局，确定作战方向。第二次反“围剿”作战中，红军中曾有首战从东开始，由东而西歼灭敌军的意见。毛泽东认为，这样打红军将为赣江所限，无发展余地；战后回师，则劳师费时，故主张自西而东打，以便在打破“围剿”后，乘势于闽赣交界地区扩大苏区。这就是从战役全局出发所作的考虑。除此而外，在发起反攻前，还要考虑到作战的方向，是否有利于扩张战果，是否有利于为下一次反“围剿”做好准备。

第三，集中兵力。这是红军以弱胜强的基本法则。在反“围剿”作战中，红军在战略全局上基本处于劣势防御地位。然而，这种态势并非不可改变。要在被动的防御中取得主动，夺取战役、战斗的胜利，最基本的法则是集中兵力，以强击弱。只有集中兵力，红军才能以战役、战斗的优势各个消灭当面的弱敌，使敌人的战略优势逐渐分解转化为劣势，改变红军战略上的被动。所以，毛泽东说：“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从战略防御中争取胜利，基本上靠了集中兵力的一着。”

要做到集中兵力，必须注意有计划战略退却，以保存军力准备反攻；

《毛泽东选集》，第1卷，220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225、228页。

注意在同一时间内保持一个主攻方向，避免两个拳头打入；注意在必要时，敢于牺牲局部，避免全线御敌；还应注意以部分兵力来牵制和分散敌人，保证主力的集结。选择攻击目标时，要特别注意拣弱敌打。红军在总体上处于劣势，即使通过集中兵力造成优势，也只能是相对的。只有打击敌人的薄弱环节，这种相对优势才能收到明显成效。中央苏区红军三次反“围剿”作战所打的关键性战斗，无一不体现了集中兵力，以强对弱的特点。如第一次反“围剿”，尽管敌人的总兵力有10万，红一方面军仅4万人，处于劣势。但在打张辉瓒时，红军是以4万人对付敌军1万人，因而获胜。毛泽东说：“我们是以少胜多的——我们向整个中国统治者这样说。我们又是以多胜少的——我们向战场上作战的各个局部的敌人这样说。这件事情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敌人一般地都摸熟我们的脾气了。然而敌人不能取消我们的胜利，也不能避免他们的损失，因为何时何地我们这样做，他们不晓得。”

第四，运动战。由于敌人强大和红军弱小，红军没有固定的作战线，只有在运动中歼敌，因而，运动战成了红军作战的基本形式。实行运动战的基本特点是走。为了创造战机，必须主动退却、穿插转移、佯动奔袭、迂回包抄、跟踪追击等，这些都要通过有计划的走来实现；当情况不利时，也要通过走来调动敌人，改变不利；当战斗形成僵持时、被动时，还是要通过走来脱离被动，恢复主动，另寻战机。所以，也可把红军的运动战通俗地解释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强调有计划地走，适合红军发挥优长，趋利避害。在中央苏区三次反“围剿”中，红军将走与打相结合，以运动战的机动性、灵活性调动敌人，牢牢掌握了战场主动权。第一次反“围剿”中，红军由赣江西岸连续向赣江东岸、苏区中部运动，避免了与敌人过早不利的决战；第二次反“围剿”，红军15天中连走350公里，力5战5胜创造了条件。

运动战的主要攻击目标，是运动中或立足未稳之敌。这样易于乘敌不备，夺取胜利。预期和不预期的遭遇战、大兵团伏击、围城打援、分进合击等等，都是运动战的有效形式。进行运动战，还必须配合以广泛的游击战，同时也下放弃必要的阵地战。只有从战场实际出发，结合运用多种作战形式，才能更有效地发挥运动战威力，夺取战役、战斗的胜利。

第五，速决战，这是红军作战的基本要求。中国革命战争在战略上必须是持久战，而战役和战斗中又必须是速决战。这是因为：“第一，红军的武器尤其是弹药没有来源！第二，白军有很多支部队，红军只一支部队，打破一次‘围剿’要准备迅速的连续的作战；第三，白军各个虽然分进，但多是比较地密集，打它们中间的一个如果不能迅速地解决战斗，其余各个就都来了”。只有速战速决，干净利索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红军才能以战役战斗的不断胜利改变不利的战略态势。要做到速战速决，“主要的条件是准备充足，不失时机，集中优势兵力，包围迂回战术，良好阵地，打运动中之敌，或打驻上而阵地尚不巩固之敌。”

第六，歼灭战。这是红军作战的根本目标。只有实行歼灭战，才能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打破“围剿”和巩固与发展苏区；也才能使红军获得必要的武器、弹药和各种军需物资的补充，发展和壮大自己的力量，从而逐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积小胜为大胜。“歼灭战和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包围迂回

《毛泽东选集》，第1卷，225、228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234~235页。

战术，同一意义。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人民赞助、良好阵地、好打之敌、出其不意等条件，都是达到歼灭目的所不可缺少的。”

红军的作战原则，是红军广大将士反“围剿”斗争经验和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在总结这些原则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这些原则，是一个辩证的有机的整体，贯穿于战争的全过程中。红军正是在战争中灵活运用这些原则，才掌握了战场主动权，不断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

六、进行初步的正规建设

从 1930 年夏开始的红军的初步正规建设，是红军由游击战争向正规战争实行战略转变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作战形式上红军由游击战争转变为正规战之运动战的要求相适应，在组织形式上，红军由分散建立的游击部队转变成在战略区范围内集中编组的正规兵团，这就要求红军在思想上克服游击观念，增强正规意识，同时，在组织、装备、纪律和人员素质等方面，作相应的提高。在组织上，建立较为完善的军事、政治、后勤机关及其运行机制，以保证集中指挥；在装备上，增加武器的数量。种类以及通讯器材，并建立必要的特种分队；在纪律上，达到整齐划一、令行禁止，消除游击部队的自由散漫习气；在人员的素质上，提高指挥能力和技术、战术水平。1930 年底开始，红军在大规模反“围剿”作战中，取得了连续胜利，兵力得到大的发展，缴获敌人大量武器和一部分器材（特别是通讯器材），部队的装备得到了增强和改善。苏区的巩固和扩大，减少了流动性，增强了对红军战争的支持能力这就为红军的正规建设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促使红军向正规建设的方向不断发展。

红军向正规建设发展，也是当时中共中央的要求。李立三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统治的中央，特别是后者，推行“左”倾政治路线和冒险主义军事战略，企图集中红军遂行大规模进攻作战，求得革命的迅速胜利。他们认为，红军要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武装力量的地位相适应，于是，不仅要求红军正规化，甚至采取许多措施迫使红军实行不适当的正规化。

这样，红军的正规建设便成了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它既向正规的方向发展了，又仅仅是初步的；既有正确的一面，又有错误的东西。正确和发展的一面是：从 1930 年夏开始，持续到 1934 年秋长征前，通过建立集中指挥的机构和机制，颁布一系列的条例、条令，建立后勤体系，建立军政学校和训练制度，建立特种分队等若干方面的努力，达到以战略区力单位的指挥、制度、编制、纪律和训练的相对统一。另一方面，由于红军仍然处在被敌分割、经济落后、各不相连的农村根据地，兵力还十分弱小，给养非常困难，以及装备完全取之于作战缴获等种种不利因素，红军的正规建设还只能是初步的、低级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的正规兵团只是提高了的游击兵团。然而，当时的党中央却不顾红军的实际情况，机械地搬用了苏联军队正规建设的经验和标准，要求红军实行不适当的正规化，强制推行绝对集中指挥，把红军正当的游击性当作所谓的“游击主义”来反对；同时，废弃了红军的筹款任务，造成单纯军事观点回升，这一切，使红军的正规建设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实际，造成了不良的后果。

尽管这样，红军的正规建设，已使红军从幼年的游击性提高到初步的正规性。这种提高，既保障了红军运动战的进行，也为后来的人民军队正规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指挥机关的建设和指挥的逐步统一

红军的正规建设，从统一指挥开始。

1930 年 2 月，中共中央将原作为全党军事运动指导机关的中央军事部，改作为全国红军统帅部的中央军事委员会。4 月，中共中央决定全国红军实

行“集中组织，统一指挥”，拟定了“集中组织”的方案，并通令全军，“一切指挥权完全统一于中央军委”。6月，主要战略区红军开始合编为正规兵团。各战略区相继建立了党的总前委或调整前委、特委组织，作为党对该战略区红军统一领导的机关。与此同时，各军团乃至方面军，相继建立了指挥部，加强了参谋处和兼负侦察、通信职能的交通大队的建设，以适应于正规兵团作战行动指挥的需要。8月，中共中央决定“中央军委直接在政治局指导之下”工作，并决定建立参谋部作为全军指挥机关，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颁布编制草案，规定团以上各级建立参谋处，作为部队指挥机关。上述这些措施，体现了中央建立红军统一指挥体制的意图。建立党对红军统一领导的机关，体现了党领导军队的原则；建设部队的统一指挥机关，则是正规战争统一指挥的需要。从1930年6月到同年年底，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只就各战略区红军的战略方针和任务作出规定，而不强行干预具体的战役、战斗和其他军事行动。各战略区红军中党的主要领导人，基本是红军的主要指挥者，他们在接受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战略指导的同时，坚持从实际出发，决定所部的战役。战斗行动，甚至决定自己的战略发展问题。这种指挥关系，是当时红军处于以战略区为单位各自为战的特点决定的。

1931年春，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在中共中央取得统治地位后，先后向各苏区派出中央代表团或中央代表，以推行其政治路线和军事战略。在此前后，在赣南、闽西苏区建立了中共苏区中央局（赣南、闽西苏区因之统称为中央苏区），在湘鄂西和鄂豫皖苏区分别建立了分局，在其他苏区建立了新的省委。这些组织成为各苏区党政军的最高领导机关。苏区中央局和各分局、省委设军事委员会，以中央局、分局和省委书记兼任主席。

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同时建立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通令“所有中华全国红色海陆空军完全集中统一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统辖之下”。中革军委属中央政府下设机构，由苏区中央局直接领导。

从1931年开始，为了适应大规模反“围剿”作战和队伍的正规建设需要，红军加强了指挥机关的建设，扩大了参谋业务，开始建立一些相应的制度。中革军委建立后，以红一方面军参谋部为基础，建立了总参谋部，下设作战、侦察、管理、教育、动员5个科和无线电队，不久，作战科、侦察科、管理科分别改称第一、第二、第三局，动员科改为第四局，教育划归红军学校负责，另设通讯处。其他战略区军委也先后设参谋部或加强指挥部建设，增设一些必要的部门，部队不同程度地加强了司令部建设。

1933年2月，中革军委对各级司令部设置作出规定，军、师司令部由参谋处、经理处、军医处和直属队组成。5月，中革军委通令，总参谋部改称红军总司令部，方面军以下各级参谋部（处）改为同级司令部，军需和军医部门从司令部隶属中脱离，司令部成为专司指挥的机关。红军的司令部体制基本形成。从1931年到1933年夏，红军的作战文书制度进一步完善起来。作战文书更为规范和齐全。指挥文书有敌情通报、部队集结命令、准备歼敌命令、对敌发起攻击命令、部队转移命令等等；此外，还有了报告文书和备考文书等。同期，报告制度和实力统计制度也建立起来。战斗详报既有从师、军、中央局直至党中央的逐级详报，也有单独执行任务部队直接向中革军委的越级详报；此外，还有转移、部署、敌情、群众情况等详报，并且在报告中附有作战经过日和详细的战绩统计表。实力统计从1931年春开始，逐步制

度化。各次战役、战斗后均对实力逐级统计上报。到 1933 年 1 月，中央苏区红军已发展到每月统计一次；统计以列表为形式，包括人员、武器和人员变动三个基本表。红军的司令部工作已相对正规。

但是，在指挥机关建设和司令部工作逐步走向正规的同时，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推行，红军的指挥出现了绝对集中的错误。

1931 年，“左”倾错误的领导者派出的代表团和代表，还没有来得及完全控制红军的指挥权，“左”倾冒险的军事战略也还没有完全形成与贯彻，因此，红军统一指挥关系还维持在与以战略区为单位，各地红军各自为战的特点相符合的状态。这保证了红军反“围剿”的胜利。

1932 年春，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战略形成，并开始在各地强制推行。他们派到各地的代表，排挤或取代了所在区红军的主要领导人，逐步将所在区红军的指挥权绝对集中。这样，就使所在区红军的领导人，不仅失去了对战略问题的发言权和表决权，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对战役、战斗及其他军事行动的指挥权，他们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努力避免战役、战斗的夫误，争取作战的胜利。

红军进入正规兵团运动战阶段，必须实施统一指挥；红军统一领导机关和指挥机关的建立，也从统一指挥这一侧面反映了红军的正规性的加强。但问题是指挥权集中到什么程度。当时的红军还处于敌人分割包围各自独立的战略区状态，各区的兵力、地理、敌情及其他条件差别很大，这就必须发挥富有指挥经验的战略区红军领导的主观能动作用，必须给战略区红军以战役、战斗及其他行动的临机处置权，必须听取战略区红军领导对战略方针和决策的意见，因此，只能是实行相对集中指挥。但王明“左”倾错误的领导者却置实际情况于不顾，对各区红军的战略乃至战役、战斗行动实施绝对集中指挥，强制推行他们冒险主义的军事战略，这就违背了战争指导的一般规律，必然导致红军战争的挫折和失败。这是党还不成熟的表现，是党在军事问题上的教条主义所造成的惨痛教训。

开始以条例、条令治军

条例、条令是军队的法规，是军队正规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军人行为的准则。从一定意义上说，红军向正规建设发展，必须也必然要进行条例和条令建设。

1930 年 5 月，中共中央为准备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上海召开了全国苏区代表大会和红军代表大会。此后，为使红军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武装力量的地位相适应，中央军委开始参照苏联国家和军队的有关法律、条例、条令，制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军制草案》、《中国工农红军编制草案》、《中国工农红军纪律条例草案》和《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9 月下旬，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讨论并通过这批条例。

10 月下旬，中共中央颁布上述 4 个条例。这些条例中的军制草案属国家法律，其他 3 个条例，是红军建立以来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颁布的第一批条例。

《中国工农红军编制草案》，虽然强调加强红军的革命化建设和编制上适应“现代战争”，但重点是加强红军的正规建设，主要表现是：正式使用中国工农红军称谓；规定了中国工农红军的军旗、官兵服饰，从实际上确定了军徽样式；确定了全军的体制，并规定团以上各级机关设置；以“三三制”

为基本原则，统一集团军（军团）以下各级编制和定额。这个条例是遵照共产国际关于要着眼于“现代战争”的指示精神制定的，相当程度地移用了苏联军队的一套，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红军的实际情况，故没有也不可能完全得到实行。但是，它是在红军进行初步正规建设时颁布的，一方面表示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有统一编制的意识，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红军编制的相对统一。条例确定的某些编制或设置，如在连一级设政治指导员等，则一直沿袭至今。

《中国工农红军纪律条例草案》，主要是阐明纪律的重要性，明确各级奖惩的权限。这个条例后经修改，成为《红军纪律条令草案》，由中革军委于1932年5月颁布试行，后又经修改成为《工农红军纪律暂行条令》，由中革军委于1933年8月1日正式颁布。《条令》在草案的总则、奖励、惩戒3章的基础上增加了附则，共4章18条。总则指出：中国工农红军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解放工农群众和其他被压迫人民而作战的革命军队，因此，“红军的纪律是建筑于工农群众自己利益之上”的；红军的纪律是红军的命脉，是红军完成中国伟大革命赋予的任务的重要保证，全军将士应当自觉养成“遵守纪律的习惯”，各级首长“要以本身作遵守纪律的模范”。其他的3章，则规定了红军奖励和惩戒的等级与批准权限。

1933年2月26日，中革军委又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红军暂行法规》。《法规》指出：工农红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历史上有觉悟的革命战士所组成的武装集团”，是“为工农阶级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建立并巩固工农兵苏维埃政权一直到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最后胜利的主要工具”，因此，红军“必须有严密的组织和科学的分工”，“各级指挥员、工作人员、战斗员的职责、工作范围，必须在法规上有明确规定，使红军全部生活集体化、纪律化、科学化”。《法规》除规定了军、师司令部、政治部的编制外，还对各级人员的职责，一般规则、值星勤务、会议汇报和礼节等作了具体的规定。这部《法规》，实际上是编制和内务合一的条令。

除了编制、纪律和法规这三大条例、条令外，从1931年到1933年间，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各战略区，还制定和颁布了许多具体的条例或规章。例如：在编制方面，有中革军委颁布的《中国工农红军暂行编制表》、《鄂豫皖苏维埃政府革命军事法庭暂行条例》等；在作战方面，有《中革军委关于防空组织法的规定》等；在政治工作方面，有《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修改草案、《红军党务委员会工作暂行条例》、《红军中列宁小组的工作》等；在后勤工作方面，有相当干部队卫生工作条例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三次卫生会议卫生决议案》、《卫生员工作条例》，《鄂豫皖苏区苏维埃政府优待医生暂行条例》等。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也颁布了若干关于红军的条例。主要有：1931年11月颁布的《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红军抚恤条例》；1934年1月颁布的《优待红军家属条例》等。

此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还作出了关于确定建军节和军旗的重大决定。1933年7月1日，临时中央政府批准了中革军委关于以南昌起义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的决定。1934年1月第二届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工农红军的军旗样式为：“红色底子，横五尺、直为三尺六寸，中为黄色交叉镰刀锤子，右角上为黄色的五角星，旗柄为白色”。

上述的条例、条令的颁布，既是红军向正规建设方向发展所必须的，也标志着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各战略区开始以条例、条令治军，红军的条令和条例，体现了红军的宗旨，体现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原则和红军的内外关系原则；它强调红军的纪律应建筑在自觉的基础上，有严密的组织、科学的分工和井然的秩序，这不仅对当时的红军正规建设有着规范的意义，而且对后来的人民军队正规化建设也有原则的指导意义。

后勤机关和后勤体系的建立

红军转为正规兵团进行运动战后，加大了对后勤的依赖性；苏区的巩固和扩大，又增强了对红军的物质支持能力。这些，促使红军的后勤建设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是：后勤机关从司令部编制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部门；机构原来比较简单，后逐步形成基本适合当时特点的体系；指挥方式由各部各行其是逐步达到战略区的统一；给养由完全自筹逐步转为部分供给。红军努力减轻人民的负担，全军办后勤；苏区全民办后勤等传统也在新形势下得到发扬。

1930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颁布的《中国工农红军编制草案》中规定，中央军委设经理部和军医院，集团军（军团）至师设经理处和军医处，团设经理处，从条例上确定了后勤为独立部门。

1931年11月，中革军委建立总经理部和军医处。1932年2月17日，中革军委颁布《关于各项经理工作问题的训令》，强调“经理机关应建立独立统一的工作系统”，在军事上受同级军政首长指挥，在业务上构成上下对口，上级指导下级的关系。同时下达了各级经理机关设置的规定，颁布了《经济公开条例》和《总经理部工作条例》，给经理工作以初步规范。期间，红军进行大规模反“围剿”作战，战场救护和伤员治疗问题显得十分突出，红军扩大了医疗系统的建设。红一方面军在军团建立野战医院和后方医院，在师和团建立绷带所；鄂豫皖苏区红军建立了后方总医院和军、师、团所属的前方医院及营医务所。其他战略区红军，也扩大了医院。

1933年6月，中革军委颁布《中国工农红军暂行编制表》，各级经理处改为供给部，总经理部改为总供给部；团和师军医处改为卫生队，军团和方面军军医处改为卫生部，军委军医处改为总卫生部；同时规定了机关设置和人员定额。在这个编制表颁布之前1个月，中革军委通令各级参谋部（处）改为同级司令部，这实际上也明确了各级供给部和卫生部门下再隶属于司令部。这是红军后勤机关体制的一项重大改变。

中央苏区红军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赣南、闽西苏区联成一片，红军作战范围加大，战线延长到纵横300公里以上。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后勤机构的设置，并建立后方的统一领导机关。这使后勤系统又增加了两方面建设。一是扩大兵站和建立兵站线。中央苏区红军兵站设有总站、大站和中站，总站编有运输团，大站编有运输营，中站编有运输连；兵站线分主线、支线、临时线和采购线。兵站线的前运、后送均采用逐级转运，分段负责制。除此之外，还根据作战需要，通过军委总动员部与地方武装部联系，由地方武装部动员和组织民工运送队，1932年4月中央红军东路军进行漳州战役时，为了保障红军长途作战的前送和缴获的大量枪支、弹药、布匹、粮食、食盐、药品等物资的后送，动员了十几万民工，仅后送的食盐就达2万担。二是扩

建后方办事处。中革军委后方办事处辖：兵工厂，下辖第一、第二修械处和制弹厂；总医院，下辖直属第一医院、残废院、各军团后方医院，军医处材料科；粮食站，下辖第一、第二、第三分站；各军留守处，下辖第 1、第 5 军团和直属队留守处及被服仓库。此外，还有红军休养所、军医材料科和骑兵连。9 月，总兵站改为总兵站运输部。

至此，适应红军特点和反“围剿”斗争形式的后勤体系便基本形成了。虽然后勤系统中供给部、卫生部和后方办事处尚未统一，但就整个后勤系统而言，已经与司令部、政治部一起构成了部队三机关的体制。

在建立和完善后勤体系的同时，红军的供给关系也有改变。装备虽仍然主要取自作战缴获，但弹药已有少量自供。随着兵工厂的建立和发展，各战略区红军已经可以程度不同地从自己的兵工厂中取得子弹和手榴弹的补给，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后期的弹药，大部分是自己的兵工厂供给的。兵工厂还能修复损坏严重的枪、炮。仅中央苏区兴国官田兵工厂，自 1931 年 10 月成立到 1934 年 9 月就修理长短枪 4 万余枝，机枪 200 余挺，迫击炮、山炮 100 多门，翻制子弹 400 多万发，制造手榴弹 6 万余枚。给养供给关系的变化更大一些。红军反“围剿”的胜利，使苏区得到巩固和扩大，地方政府一方面组织人民发展生产，保障红军军粮的供应；一方面积极发展工商业，解决部分军费。中央苏区政府创办钨砂公司并发展到 4 个分矿；组织竹、木、纸、烟、茶油、钨砂、煤炭输出以及煤油、食盐、火柴、棉花、布匹、药材的输入，既解决了苏区人民和红军的生活必需品，也通过工商业的利润和税收，筹措红军的部分给养。此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还发行了苏区货币，分纸币、银元和铜钱，以解决红军的部分经费。这样，红军的粮食和经费，便基本由苏区后方供给。

红军还建立了预算制度，开展节约运动。在中央苏区，中革军委从 1932 年 1 月到 3 月连续下达 6 次训令，命令红军各部严格执行开支预算、紧缩经费。在《经字第一号》训令中，中革军委指出，必须改变过去在经费开支上，“不按照上级规定擅自随意决定实行”的“游击主义”；经费开支必须执行预算，未经中革军委总经理部批准，“不得丝毫更改”；通令从对每人每日伙食费到各级机关每月的办公费，都作了详细和具体的规定。在《经字第六号》训令中，中革军委还规定，中央红军各部从 7 月开始，连队的月办公费由大洋 20 元降至 8 元，团由 25 元降至 12 元，其他各级均作大幅度削减。此后，中革军委又在粮食定量和伙食费标准上作出严格规定：前方作战部队和军政学校学员，每人每天粮食定量为 1 斤 6 两（16 两制，下同），伙食费为 1 角 4 分；后方卫戍部队和机关人员的粮食定量为每人每天 1 斤 4 两，伙食费也相应减少。在最困难时期，中革军委曾规定红军各部非作战时每天两餐；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于 1931 年 5 月发出通知，要求党和政府机关人员每天吃两餐稀饭，以节省粮食；其他战略区红军，也都相继实行紧缩开支和节省用粮的规定。红军建立经费预算制度，是红军后勤建设向正规性发展的措施之一；而开展节约运动，一方面为了解决经费和粮食紧张的问题，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色。

红军的后勤建设，与红军其他方面的正规建设基本上相适应，但同时也存在着严重问题。当时苏区虽然实行了土地改革，解放了生产力，但由于战争给生产造成的严重破坏，加之敌人的经济封锁，阻碍了贸易，苏区经济仍然十分困难，对红军的供给能力十分有限。因此，红军的筹款任务还不能解

除，还必须在敌军转入守势时，前出苏区外线敌之薄弱地区进行筹款、筹粮。王明“左”倾错误的领导者过分强调苏区的供给，废弃了红军的筹款任务，不仅使红军给养处于非常困难状态，而且增加了苏区人民的负担，影响了苏区的建设和人民的生活。这是王明路线“左”倾错误对红军后勤建设和苏区建设造成的严重危害。

特种分队的建立

红军进入初步的正规建设后，红军学校和后来的特科学校设置了炮兵、工兵、重机枪专业，通信学校开设有无无线电专业，这4个专业分队，就是红军的特种分队。它们在红军中的比重不大，但具有重要意义。

红军装备完全取之于作战缴获。从这个意义上说，红军的装备和特种分队，与国民党军陆军的装备和特种部（分）队有着密切的关系。1930年后，国民党陆军的特种部（分）队有所加强，团一般有重机枪连和迫击炮连，旅有迫击炮连或营及工兵队，师有山炮营或团及工兵营，编制了无线电队，配有15瓦或100瓦电台。1930年底，国民党军开始对各战略区红军的大规模“围剿”，除骡马驮载和牵引的火炮受交通条件限制，炮兵部（分）队特别是山炮营或团没有普遍投入作战外，其他的特种分队，均用于对红军的作战，这就使红军有了在作战中缴获敌特种装备的可能。据不完全统计，从1930年12月到1932年12月的两年间，红军全军除缴获长短枪10多万枝外，还缴获重机枪约500挺，迫击炮近200门，山炮20多门，电台20多部，同时俘获了敌军中一部分受过专业技术训练的人员。这就为红军特种分队的建立在装备和人员上提供了条件。

首先建立并发挥重大作用的是无线电队。

早在1928年，由周恩来建议，党中央决定进行无线电通讯的筹建工作，开始派人到苏联学习和报考国民党军无线电学校。这也为后来向中央苏区和鄂豫皖苏区派遣无线电专业人员作了准备。

1930年底，红一方面军开始反“围剿”作战，朱德和毛泽东在12月29日下达的作战命令中专门规定，缴获“无线电台不准破坏”。战斗中，部队果然缴到敌第18师15瓦电台1部，可惜从未见过无线电台的战士把发报机砸了。朱德、毛泽东得悉这一情况后，再次严令不准破坏电台并要求注意俘获敌之电台工作人员。他们还亲自接见被俘的国民党军第18师电台台长王净，说服他加入红军，参加筹建红军的第1支无线电队。这支无线电队，由王净任队长，冯文彬任政治委员。无线电队建立后，利用缴获的收报机，监听各路敌军的呼叫，为红军提供了准确的情报。此后，红军又在东韶战斗中缴获15瓦电台1部；第二次反“围剿”又缴获15瓦电台2部、100瓦电台1部，并俘获敌第28师无线电队的全体人员。5月31日，总前委决定扩编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无线电队，下设总部电台、红3军团电台、后方电台和河西红7军电台4个分队，同时建立纠察台。9月，在第三次反“围剿”中，又缴获15瓦电台6部。红一方面军无线电队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军和主力师都建立了无线电队，形成为网络。同时，由任弼时带到中央苏区的密码“豪密”开始使用，以100瓦电台与上海党中央联络。这样，红一方面军不仅建

周恩来编，周曾化名伍豪，故称“豪密”。

立了用于作战指挥和对敌监听的无线电网络，而且能够与上海党中央和后来有了电台的鄂豫皖、湘赣、赣东北等苏区红军联系。

在红一方面军建立无线电队稍后，由中共中央派到鄂豫皖等苏区的无线电人员，也随着电台的缴获而建立无线电队。其中，鄂豫皖苏区红四方面军的无线电队自成网络，并且拥有与上海党中央、中央苏区、赣东北苏区和湘鄂西苏区红军联络的密码和设备。

在建立无线电队的同时，红军的炮兵也发展起来，逐步作为一个兵种并形成战斗力。

1931年5月，红一方面军在第二次反“围剿”的富田和白沙两次战斗中，缴获迫击炮30门和山炮4门。中央军委决定以红3军团原有的炮兵连为基础，建立军委炮兵团，下辖3个炮连，1个炮兵教导队和1个运输连，1个警卫连（7月改力红3军团炮兵教导大队）；同时，建立红1军团山炮连，接着，又在第三次反“围剿”中缴获迫击炮50多门、骡马数百匹，使红一方面军拥有的迫击炮超过了100门，各军、师分别建立迫击炮连。1932年5月，红四方面军利用苏家埠战役缴获的43门迫击炮、山炮，建立方面军山炮连，除原第10师迫击炮连外，又建立第11、第12、第73师迫击炮连，形成队属炮兵编制。在1931年到1932年间，湘鄂西等苏区红军，也缴获了一定数量的迫击炮，建立炮兵连。

红军在作战中对炮兵作了集中使用。

1932年2月红一方面军进行赣川战役，红3军团炮兵教导大队和红5军团第14、第15军迫击炮连，全部投入战斗。同年7月，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七里坪一仗，第10师迫击炮连先敌开火，一举摧毁了敌之指挥所，在其他一些战役、战斗中，炮兵也发挥了作用。

但是，红军的炮兵一方面受缴获限制，难以有更大的发展；另一方面受交通条件、弹药供给和维修保障限制，难于发挥更大的作用，以至每当部队远距离作战时，炮兵只好留在后方。

与炮兵相比，红军的重机枪分队发挥了更大的作用，重机枪算不上重武器，但在当年却堪称为红军的“重武器”，因而，被各地红军学校列入“特科”范围，与炮兵、工兵同等对待。由于重机枪的大量缴获，红军兵工厂有一定翻制子弹的能力，部队团一级普遍建立了重机枪连，重机枪一般编制为6至8挺。战时根据需要，将重机枪分队加强给营或突击分队，用于压制敌之人力，或给进攻之敌以侧射杀伤，掩护红军分队冲锋或阻击。后来，师建立以重机枪为装备的防主排，出现了高射机枪分队。

与炮兵和重机枪分队比，工兵则不受交通条件和装备的限制。因此，在1930年6月红3军团建立时，就编有工兵连；同年10月，红1军团也建立起了工兵连。

1931年春，红一方面军在第二次反“围剿”期间，根据作战的需要，将原红1军团工兵连扩编为工兵营，下辖3个连。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红一方面军转入拔除苏区内敌军据点“土围子”的战斗。10月初，针对战斗中存在的问题，方面军总部指出：“以前打土围子攻炮楼都用步兵的冲锋。用炮兵威吓，实在不够得很，死伤很多，土围子炮楼还是没有打开，总不晓得用工兵的能力去挖地洞、打对壕、埋地雷去爆炸他的围墙，再冲进去，或

是用多量火药完全给他炸个干净”。方面军总部要求各部队普遍推广坑道爆破作业，并且注意爆破的各种数据和经验，以便整理成为工兵教材。10月28日，红3军团在攻击会昌城时，方面军调集了4个工兵连进行爆破作业，仅在南门挖掘的坑道就长达150米，装药数百公斤，把城墙炸开一个长达数十米的破口，保障了攻城战斗的胜利。这是红军战争史上屈指可数的工兵大爆破之一。同年11月，红一方面军总部撤销，工兵营第1、第2连编入红1、红3军团，第3连编入红军学校，后发展为工兵营，既作为训练工兵技术人员的教学单位，又是一支作战分队。

1932年冬，湘鄂西苏区的红军建立工兵队；

1933年7月，红四方面军建立工兵营。这些工兵部队，主要用于攻城的坑道作业或部队行动时的交通保障。此后，工兵进一步发展，中央红军主力军团分别建立工兵营。

红军的特种分队虽很弱小，但对红军作战来说，却是极其宝贵的。它的建立和形成一定的战斗力，既是红军作战能力发展的需要，又是红军作战能力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红军初步正规建设的程度。

军政学校和训练制度的建立

红军转入以正规兵团运动战进行大规模反“围剿”作战阶段后，随着人员消耗、补充的增大和兵力的大发展，要求在红军的建设中进一步加强干部培养和部队训练，增强干部的数量和质量，提高士兵的技术和战术水平。游击战争时期简单的教导队或随营学校，已不能满足新形势下干部培养、训练的需要；原来在打仗中学习打仗的办法虽不失为主要的办法，但必须加上必要的系统训练。这就要求红军在可能的条件下创办多层次的、多专业的正规学校，建立部队、分队和新兵训练制度。同时，由于苏区的巩固和发展，红军战略基地的固定性加大，反“围剿”作战有明显的战役间隙，使红军军政学校的创办和训练制度的建立有了可能。因此，在红军开始由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时，中央军委及各战略区都积极抓紧解决干部的培养和部队的训练制度问题。

1930年初，红4军将随营学校改为闽西红军学校，校址设在龙岩县大池，由朱德、毛泽东亲任校长和政治委员，学员130多人，在此前后，赣西南、赣东北和洪湖苏区也建立了红军学校，4月，共同前委决定将赣西南红军学校并入闽西红军学校；经中央批准，学校改称红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9月，中央军委决定把闽西红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改为军委直属学校，洪湖苏区的红军学校为第二分校，并要求其他战略区也创办红军学校。1931年2月，鄂豫皖苏区建立红军学校第四分校。

毛泽东对创办红军学校极为重视。他认为治军必治校。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共两党曾合作创办黄埔军校，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批军事人才；红军也应当办一个“红埔”，以培养红军的干部。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苏区中央局于1931年11月决定，将红军军官学校和红1、红3军团随营学校合并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简称红校。红校设置培训具有两年以上实际经验的团以上干部的高级班；培训具有两年以上实际

1931年10月14日，《红军第一方面军训令》。

经验的连、营干部的上级班；还有培训排、班干部的“步（兵）科”；培训政工干部的政治科；培训特种兵干部和技术人员的机关枪科、炮兵科和工兵科等，这是红军第一所层次和学科相对齐全的综合学校。

1932年，湘鄂西、鄂豫皖苏区的红军学校，向步兵、特种兵和政治工作等多学科发展；湘赣苏区建立红军学校分校。

1933年10月，为了便于组织和实施不同层次、不同学科、专业的教学，也为了更多地培养人才，中革军委下达《关于改编红军学校的命令》，将原红校高级班和上级班改为红军大学，设高级指挥、上级政治、上级指挥、上级参谋4科；原红校的第6、第7两期学员团队，分别改为步兵第一、第二学校；原红校的工兵营、炮兵连、重机枪连、防空和防装甲连改编为特科学学校。同时，创办了工农红军通信学校，工农红军卫生学校，工农红军供给学校，地方武装干部学校。这样，中央苏区红军学校又由一所综合学校发展为层次、专业和学科相对齐全的若干专科学校，形成了当时条件下的军事学校体系。

备苏区，特别是中央苏区，十分重视军事学校办学的质量，注意选调具有多方面科学文化知识和办校、教学经验丰富的高级将领担任教学、管理。刘伯承、叶剑英、曾中生、萧劲光等，先后出任过学校校长；邓萍、粟裕、陈赓等，先后担任过学校的机关领导；左权、周子昆、伍修权、郭化若、苏进等先后担任过教员。毛泽东和朱德等，也亲自到中央苏区的红军学校授课。这既体现了红军对办学的重视程度，也从根本上保证了学校的教学质量。

中革军委还十分注意军校教材征集和编纂。1931年12月9日，中革军委发出训令教字第1号，向全军“征集军事教育材料和计划”，要求各部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将所有的教学计划和教材各送一份，以便审查或修正后，作为红军统一适用的教学计划与教材。

1932年1月15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编印了《红军教育与管理》的小册子，此后又编印了《苏维埃土地红军问题讲授提纲》、红军授课大纲、步兵教程、炮兵教程、新闻材料、医务科诊断手册等许多教材。红军学校坚持适合红军情况和战争环境的办校方针，以保证“急需”为原则，学制通常为4至6个月，军医班为1年。红军大学以理论和协同战术的进修及实兵演练为重点；步校以分队的进攻、防御、追击、退却等战术教学和学习为重点，注重夜间作战课目；特科学学校则注重于本专业学习，兼及提高思想和文化素质。学校既注重培养学员坚强的战斗意志和顽强的战斗作风，也通过反“游击主义”、“军阀残余习气”和“小团体观念”，以增强正规军观念和人民军队意识；学校还针对学员多数是文盲和半文盲的特点，通过学军事、学政治、学文化，在提高军政素质的同时，提高文化水平。学员以战斗部队的编制编组，学校既是一个教学单位，又是一支战斗部队。洪湖苏区和湘赣苏区的红校学员，都曾直接参加过反“围剿”作战。这样，既使学员在短期内学到必要的军事、政治、文化知识，又体现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教学和育才相结合的原则。

红军学校的创办和发展，为红军培养、训练了大批的军政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仅设在中央苏区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自1931年秋到1933年秋的两年间，就培养和训练了军政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1万余人。这不仅为红军取得战争胜利和正规建设提供了重要保证，而且也为人民军队造就了一代善于治军的将才，后来的人民解放军的老一代将军，绝大部分经过这一时期红

军学校的培训。

在创办红军学校的同时，各战略区红军也开始建立并逐渐形成部队的训练制度。一是在职干部的训练。一般采取短期集训方式。方面军总部、军团、军和师通常根据需要，利用战役间隙举办短期训练班，正副职轮流离职受训，有针对性地对在职的排以上干部实行短期培训，由军政领导亲自授课，一次训练一个课目或解决一个问题。二是部队和分队的训练。一般采取临战应急训练和战后集中训练方式。通常是在反“围剿”准备阶段，一边进行战前动员，一边开展应急训练；在打破敌人“围剿”后的战役间隙，一边开展群众工作，一边进行训练，内容以技术和战术运用并重。在技术上练射击、刺杀、投弹、目测距离；在战术上练地形地物利用，班排连进攻、防御、追击和退却，并着重于夜间战斗的训练。同时，还特别强调勤杂人员的训练，培养他们成为技术、战术合格的战斗兵。三是集中训练新兵。红军在大规模反“围剿”时期，开始在苏区内实行征兵制，所征集的新兵，一般要集中起来进行军政训练。军事训练不重队列，主要是武器的使用和保养，以及技术、战术、侦察、警戒、行军的基本常识教育。经过一定集训后，再补入战斗部队。

红军的训练制度，不仅养成了官兵的训练观念，培养了练兵热情，形成了行之有效的训练组织与实施方法，提高了部队的技术、战术家质，而且也为战争时期人民军队的训练，探索了行之有效的途径。

七、政治工作的加强与发展

红军在创建阶段建立的政治工作，必须使之日臻完善。红军实行军事战略转变和大规模反“围剿”作战的展开，也要求红军的政治工作有相应的发展，给部队建设和作战以强有力的保证。因此，红军在向初步正规建设发展的同时，在政治工作方面又有新的创设。

红军政治工作的发展，基本遵循“古田会议”确立的建军原则，提出并坚持以政治工作为红军的生命线，发挥政治工作的保证作用，将已建立的政治工作制度，加以统一规范，以法规性的条例、规章贯彻于全军；建立战时政治工作，给作战以保证；加强基层建设，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召开政治工作会议，总结交流经验。这保证了红军的正规建设，保持并增强了红军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对后来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另一方面，红军政治工作的发展，也受到了党内“左”的教条主义的不良影响，红军做群众工作的任务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正确的军民、军政和官兵关系教育被忽略，政治工作中的形式主义有了某种发展。但这不是主流，有些在实践中逐步得到纠正。

政治工作条例和规章的建设

红军政治工作的发展，从制度化、规范化开始。1930年夏秋，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各战略区红军开始制定政治工作条例和规章。

1930年9月底，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红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10月下旬，中共中央颁布这一条例草案。

《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由总则、十个具体条例和政治机关系统表组成。总则提出，红军政治工作的任务是保证中国共产党对红军的领导，“使红军成为有力的工农革命的武装力量”；“目的是巩固红军的战斗力”；内容是“实施无产阶级的阶级教育，使红军战斗员与指挥员明了红军之阶级的政治责任，与敌人战斗的阶级意义，及对于地方居民之阶级的友爱与仇恨”。总则强调，在红军中实施政治委员制度和建立政治机关，是为了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红军的政治委员和政治部机关，“是党在红军中政治路线及纪律的执行人”，“是红军中政治指导者”。十个条例，分别对连政治指导员、各级政治委员，团政治处，军师政治部，军区（实际编成为方面军）、集团军（实际编成为军团）政治部，总政治部，党支部，党委会，青年团工作及政治机关，军队党组织与地方党组织的关系等加以规范，规定其设置、性质、职能、职责及隶属关系和与之并行机关的关系。

这个条例，有它不足的一面，也有它积极的意义。它在一定程度上参照苏联军队的有关条例，有些部分并不符合中国红军的实际情况。但在起草之前，中央军委曾通过全国红军代表大会上各战略区代表的报告，了解到各区红军建设的基本情况，因此，许多部分又是适合于红军情况的。它与编制草案、纪律条例一起，作为红军正规建设的措施而制定和颁布，标志着党已开始以条例、条令治军。它给了红军政治工作以法规的地位，并使之有了统一的依据，对红军政治工作建设的深入和统一，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它改变了过去连以上各级政治主官统称政治委员，团以上各级政治机关统称为政治部的状况，将连政治主官称为政治指导员，独立营以上各级政治主官称为政

治委员，团政治机关称为政治处，全军最高政治机关称为总政治部。这些规定一直沿袭到今天。

1931年以后，红军的体制、编制逐渐完善，相继建立了省军区、军分区、学校、医院、兵站，实行政治战士制度，建立了俱乐部列宁室等等。这样，原来的政治工作条例已不能包括这些新增设单位的需要。通过实践，总政治部也发现政治工作条例的有些内容不适合红军的实际情况。1934年2月全军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上对政治工作条例进行了修改。

修改后重新颁布的政治工作条例，在总则中增加了一条，即：“红军在力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过程中，同样担负着发动帮助地方工农群众建立政权，实行土地革命，和推翻帝国主义的任务，因此红军中政治工作，除了政治上巩固红军战斗力主要任务外，必须进行上述的工作”；总则的其他条款也有一定的改动。同时，对具体条例也作了一定的修改。修改后的条例，除保留原有的十个具体条例外，还增加了：军区政治部工作，军分区政治部工作，学校政治机关工作，医院政治机关工作，赤卫军政治机关工作，兵站政治机关工作，战士通讯处工作，俱乐部列宁室工作，政治战士工作等9个条例。

修改后的政治工作条例，写进了红军担负做群众工作的任务，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党内“左”倾错误的领导者把红军的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三项任务，缩小成为单纯打仗一项任务的主张，虽然还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篇幅也比以前更长了，但内容也更加全面和具体，适合于红军体制和编制的变化。

在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制定和颁布红军政治工作条例的前后，各战略区红军也先后制定了相应的条例和规章。

1930年6月，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红4军，为贯彻“古田会议”决议，制定了《红军第四军各级政治工作纲领》，其中对军政治部、纵队（相当于团）政治部、支队（相当于营）和大队（相当于连）政治委员的工作，在职责、方法和注意事项等方面作出规定。8月，红一方面军组成后，不仅将《红军第四军各级政治工作纲领》推广到方面军各部，并且又制定两个条例性规定。一是为统一和加强连政治委员的工作，制定了《政治委员工作须知》。这个《须知》由“党的方面”、“群众方面”和“地方工作”3个部分组成。“群众方面”是主体，包括行军、宿营、作战、给养、卫生、训练、管理、士兵会的工作等8个问题，并列工作细则。二是针对士兵委员会组织不统一，职权过大而造成极端民主化等问题，制定了《红军士兵会章程》。这个章程包括宗旨、职权、组织、工作、经费和附则等6章共35条，它明确了士兵会的性质、职能和权限，改变过去逐级设士兵会为团、营、连三级设士兵会，并明确各级组织法和开展工作的方法。《须知》和《章程》不论是形式还是实质，都带有条例性质，它的颁布，统一和规定了红一方面军连政治委员和士兵会的职能与工作，推动了连队政治工作的开展和士兵民主权利的正常发挥。中共中央颁布《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之后，红一方面军根据暂行条例规定，把《政治委员工作须知》修改为《连指导员工作须知》，增写了绪论和“战时政治工作”，把原来的“群众方面”和“地方工作方面”，改为“连指导员的任务”和“连指导员的工作”，在许多方面较之以前规定得更细，更具有操作性。同期，其他战略区红军，也在贯彻政治工作条例中，根据自己的情况，制定了一些具体的工作规章。

政治机关的建设和基层政治工作建设的加强

红军的政治工作，既要靠政治机关的组织领导，又必须面向基层。这就规定了红军政治工作的发展，必然要在政治机关建设和基层建设两方面同时加强。

1930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颁布的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在关于师以上各级政治部和团政治处设置的规定中，除理顺了各级政治机关的关系外，对政治机关各部门的关系也作出重要改革，即将原来政治部下设秘书处，秘书处下设宣传、组织等部门，改为秘书处与宣传、组织等部门平行，从而理顺了政治机关各部门的关系。

1931年2月，苏区中央局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建立总政治部兼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毛泽东兼主任，领导红一方面军加强各级政治部建设，积极开展政治工作，保证红军反“围剿”的胜利。11月，原苏区中央局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改为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由王稼祥任主任。1932年2月4日，根据中华苏维埃第五次执行委员会决定，中革军委总政治部改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6月，总政治部颁布《各级政治机关系统表与组织及其工作纲要》，对师以上各级政治部和团政治处的机关设置以及各部门职能，作了明确的规定，政治部下设秘书、宣传鼓动、组织、青年工作、党务工作和教育等部门的体制大体确定。

同期和稍后，红军总政治部和各大部队政治部，还建立了其他一些重要的职能部门和直属单位。总政治部设立了红色战士通讯处，创办了《红星》报和《红星画报》。《红星》报是中革军委机关报，1931年12月11日创刊。该报先后由张如心、邓小平、陆定一等担任主编。办报宗旨为，将报纸办成红军“政治工作讨论会”，交流政治工作经验，推动红军政治工作的深入开展。各战略区相继建立了剧社等宣传单位。中央苏区建立了工农剧社，设有歌舞“蓝衫团”，演出歌舞、京剧和话剧等。中央红军第一、第三、第五军团政治部，分别建立了“战士剧社”、“火线剧社”和“猛进剧社”。此后，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也分别将化装宣传队扩编为剧社。《红星》报和剧社的建立，推动和活跃了部队的政治工作，丰富了部队的文化生活。

基层政治工作建设，首要问题要是加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

1930年10月颁布的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改变了三湾改编时确立的连党支部设置形式和政治主官与党的委员会的关系。这个条例，不适当地照搬苏联红军的规定，强调团和连的党组织都必须受团政治委员的领导，并规定团不设党委，仅设总支部，团政委也不兼支书，营既不设党组织也不设政治主官，连设支部干事会，指导员不兼书记，也不管支部工作；团总支和连支部干事会的书记皆由民主选举，分别为每6个月和3个月改选一次，受团政委领导，为“一切日常工作之直接指导者”。这种改变，不仅削弱了政治主官在党组织中的作用和政治工作责任，而且造成了与军事主官在职权上的矛盾。

1931年11月苏区第一次党代会在讨论红军建设问题时，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红军基层党组织存在的问题，提出“军队中党的生活，应该是为巩固红军战斗力和保证命令的执行而不是包办一切的”；强调要“加强党在红军中领导作用”。

1932年1月，总政治部开始在不改变条例的前提下，加强基层党组织的工作。它在《关于红军中支部工作的一封信》中强调，“支部是党的最下层组织基础”，要加强支部的工作，并且提出支部工作应当注意的20个问题；同时强调团政委要领导支部，要加强“党的政治领导”，政治工作与党的工作不能分离。这封信虽然未能在怎样加强基层党组织问题上规定更有效的措施，但它强调必须加强基层党组织的工作，和对基层党组织的工作给予明确指示，这对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有着推动的作用。同年9月21日，总政治部又发出《关于红军中党的工作的训令》，在肯定红军的政治工作和党的工作有所进步的同时，指出党的支部工作仍然是整个政治工作中最薄弱的一环，强调必须加强。《训令》重申，“支部是党在红军中的‘堡垒’，连支部是党的基本组织”；强调支部“要以战斗力为中心进行自己的工作，要根据战斗的各种情况，在政治机关的领导之下，抓住工作的中心，以巩固部队的政治情绪，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支部领导，党团员要‘以身作则，的成为群众的模范’”。《训令》突破了政治工作暂行条例的规定，强调“连指导员对支部工作，负有领导的责任”。1933年，总政治部制定并颁布了《支部工作纲要》，强调“支部是党的下层基本组织，是党与群众的连环。”必须加强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纲要》对支部的工作、支委工作、党小组长的工作、党员训练、发展党员和团的工作等，作了详细的规定。这些，有效地加强了连队党支部的建设和工作。

1934年修改后的政治工作暂行条例，在指导员的职责中，增加了“指导连支部工作和当选为连支部委员会委员”的内容，并且增加了指导员受伤或牺牲时，“由支部书记自动代理，遂行指导员的职责”的规定。这些，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原有条例的不适当之处，使指导员和党支部的关系重新联系在一起。

除了加强基层党组织工作以外，红军在加强基层建设方面还采取了以下3个措施：一是加强青年团工作。总政治部在1932年1月19日《关于红军中支部工作的一封信》中，提出“团的工作要实际的建立起来，要有团的大会”。此后，红军中青年团的工作得到了加强，“在党的支部之外，建立了列宁青年团的组织”，“团员有了相当的发展，团员的政治文化水平有了相当的提高，团对青年战士的领导也增加了一些”。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同年9月总政治部在《关于红军中党的工作的训令》中指出，“政治机关和党的支部对团的工作领导与注意异常不够，对团的取消主义的倾向还没有肃清”。为此，《训令》提出：“政治机关和党的组织，特别是连支部要加强对团的工作领导，推动团员深入到青年战士中去，进行政治的、教育的、娱乐的、文化的工作”，以充分发挥青年团的组织作用和团员的骨干作用。

二是设政治战士。1932年12月21日，总政治部发布训令，提出，“为健全政治工作”，基层设政治战士。《训令》指出：“政治战士必须是全排中最能够得群众信仰、能作群众最好模范、政治文化水平较高的共产党员”，他们“仍然与普通战斗员一样的担负各种军事和工作勤务，并且还要经常的在战士中作模范”；政治战士由指导员提名，支部大会通过，报师政治部批准；他们执行指导员给予的工作，“与党小组长关系是并行的，不相隶属”。政治战士生活在战士之中，协助指导员进行政治教育，了解战士情况，组织政治学习，开展对敌宣传工作，不仅成了党支部、小组和青年团以外连队政治工作的又一支力量，而且成为基层政治干部的预备队。在特定的历史时期，

政治战士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而，后来许多老红军战士每当回忆红军战斗岁月时，都为曾经是政治战士而自豪。

三是设红垦奖章、授团旗和颁布红军誓词。1933年7月7日，中革军委发布《关于颁布红军奖章命令》，决定设一、二、三级红星奖章，分别授予“有特殊功绩”的人员。11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由军委统一制作步兵团团旗，“团旗是标示工农群众所赋予这步兵团为苏维埃斗争使命，同时是提高该团作战声威”，要求官兵“敬重爱护团旗”，发扬红军奋斗精神。红一方面军总部和各军团，于“八一”建军节时，分别举行了授旗、授奖大会。27日，中革军委颁布了《中国工农红军誓词》，主要内容是：我们是工农的儿子，为工农解放奋斗到底；我们是红色军人，保证绝对遵守和服从苏维埃的一切法令；我们是苏维埃的柱石，誓为实行土地革命，推翻国民党统治，保卫苏维埃而战斗；我们要团结一致，用我们的头颅和热血，换取苏维埃新中国；我们遵守纪律，服从上级命令。上述措施，有力地促进了官兵的革命荣誉感和责任感。

战时政治工作的建立

红军战时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红军作战时，为巩固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而进行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它是由红军战争特点和战争发展决定的，是红军战胜敌人的法宝之一。

红军所进行的战争，不论是在兵力、火力和经济力等方面，都处于严重的敌强我弱地位，靠的是人的因素，特别是指战员的主观能动性和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要发扬这种精神，必须要有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尤其是战时政治工作。

游击战争时期，红军的游击性和根据地的流动性很大，红军还处在幼年时期，除经常性的政治工作外，战时虽也有简单的动员、鼓动乃至战评，但从总体上说，还没有形成形态完备的战时政治工作。1930年底开始，红军的战争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虽然敌强我弱的形势并没有改变，但红军的游击性和根据地的流动性减少了许多，主力部队已是以战略区为单位编组的正规兵团，采取的是反“围剿”的活动形式，在回旋余地较大的苏区内作战。国民党军的“围剿”和红军的反“围剿”，期间相隔可能是数十天甚至几个月，于是就有了战争环境下相对的平时与战时的区分。“围剿”和反“围剿”的反复，并不是简单的重复。其规模一次比一次更大，情况一次比一次更复杂，战斗一次比一次更激烈。红军的命运系于能否打破敌之“围剿”，这就要求在进行反“围剿”作战时，政治工作给予全力以赴的保证。这样，必然要求要有专门保证作战胜利的战时政治工作。

红一方面军进行第一次反“围剿”作战中，开始有了初步的战时政治工作。1930年12月下旬，主力部队北移到黄陂等地隐蔽待机时，总前委在小布召开军民誓师大会，书记毛泽东亲自作政治动员，深刻地分析了敌必败我必胜的条件，号召苏区军民英勇战斗，打破敌之“围剿”，以保卫苏区，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此后，部队又深入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有力地保证了作战的胜利。

第二次反“围剿”（当时称二次战争）时，红军的战时政治工作意识进一步增强。1931年2月21日，苏区中央局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颁

发了《争取第二次大战胜利的宣传大纲》，阐述了“第二次大战的八个大胜利的条件”。3月20日，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毛泽东下达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通令》，进一步阐述“二次战争的意义、目前敌我的形势和争取二次胜利的准备工作的”。《通令》在“逼在目前的第二次战争与我们的准备工作”问题中，将“政治方面的准备工作分为红军与地方两个方面”，并且提出了政治工作的内容和方法。在红军的政治工作问题上，强调从军、师逐级到连队，召开军人大会作政治动员；要求从各级政治工作干部到军事干部和每一个战士，人人做政治工作；要求从军队到民众，人人做鼓动工作，欢送官兵上战场。在地方政府和民众的政治工作方面，强调分别以县区为单位进行深入动员，以号召民众支援和参加战争，并给红军官兵以鼓舞，增强其士气；采取多种形式和方法开展对敌宣传，以瓦解敌军。这样，战时政治工作的战前动员部分的内容便基本形成了。

与此同时，其他各战略区红军在反“围剿”作战中，也开始有了战时政治工作。而且是部队越大，战斗规模越大，战时政治工作意识越强，工作越深入。

此后，战时政治工作继续向作战的各个阶段、向更加具体化、更加面向基层的方向发展。1932年7月，红一方面军在《连指导员工作须知》中，明确地提出了战时政治工作概念，并列出了在行军、作战等不同阶段政治工作的实施细则及方法。

1933年，红军战时政治工作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934年2月，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在全军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了战时政治工作的经验介绍。

红军战时政治工作，是红军广大指战员，特别是各级政治工作人员，在作战实践中逐步创立并形成成为比较完备的制度的。它的任务、组织和实施情况，大体如下：

红军战时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巩固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保证作战的胜利。具体是：进行深入广泛的政治动员，造成官兵旺盛的战斗热忱，树立必胜的信心；注意巩固部队，避免战时可能出现的畏敌情绪和逃跑、投敌叛变现象；加强战时纪律教育，保证命令的贯彻执行；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和工作，保证部队各阶段任务的完成；提高后方勤务部队和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保证给养、救护及运输等任务的完成；动员全体指战员，特别是党团员，积极参加做思想工作，并保证政治工作与作战协同一致。

红军战时政治工作的实施，包括一般动员和具体工作两方面。一般动员有党内动员、部队动员和群众动员。党内动员在于强调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以带领本部官兵完成作战或其他行动任务。部队动员包括战役动员、行动动员、退却动员、反攻动员和后勤保障动员等，通常由本部最高政治机关下达总动员令，本级政治机关下达所部动员令，阐明作战或行动的目的，分析敌我双方的有利和不利条件，提出要求，号召官兵严格执行作战或行动意图与计划，完成作战或行动任务。群众动员通常由地方党政机关和群众组织实施，讲明战争与群众的直接利害关系，以发动群众积极支援协助红军作战。具体工作有：对执行特殊任务部（分）队的教育工作；反攻或进攻阶段的工作；转移行动时的工作；战斗间隙时的工作；撤出战斗时的工作；夜间作战时的工作；战后总结评比时的工作。其中各项工作均作了相当细致的规定。以反攻或进攻时的工作为例，包括：在发起攻击

前作简短有力的鼓动，激发官兵勇猛精神；要求共产党员和政治战士冲锋在前，轻伤不下火线；保障火线上官兵的饮食；尽可能及时地抢救伤员；严格执行战场纪律；严格执行俘虏政策和看管好俘虏；展开对被围困之敌的政治攻势，以达到促使敌人缴械投降的目的。

红军战时政治工作是一个创设。它恰当地将政治工作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结合起来，依靠干部、党员、政治战士和青年团员形成群众性工作。以有力的政治动员和细致的说服，将工作做到每一个阶段、每一个行动、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战士的心中，从而转化力强大的战斗力。这不仅保证了红军反“围剿”作战的胜利，也为后来人民军队开展战时政治工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政治工作经验的总结与推广

在加强政治工作建设的过程中，总政治部和各战略区，还积极进行了政治工作经验的总结和推广工作。

1931年12月创刊的中革军委机关报《红星》报，其工作任务之一，就是交流红军政治工作经验，推动政治工作的深化。正如这份报纸创刊号的“见面话”中所说，《红星》报是一面“大镜子”，反映红军的生活与战斗；是一座“无线电台”，报道革命战争、苏区建设和世界革命的新闻；是一个“政治指导员”，帮助官兵提高觉悟、增强知识、改进工作。

1932年10月，红一方面军在宁都小源召开了政治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方面军建立以来开展政治工作的经验，强调红军政治工作必须着眼于战时特点，改变领导方式，实行直接的活的领导；指出政治工作不仅是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干部去做，主要是靠党团员和战士来做，党的组织要领导官兵积极开展政治工作，使政治工作群众化。会议提出，必须改进政治工作的作风和方法，少开会布置，多用口头传达；要加强预见性和工作部署上的灵活性，以适应瞬息万变的情况。会议要求注意部队政治教育的方法，改变过去背书式的教授法和传教式的灌输法，采取启发式和讨论方式。这次会议所强调的问题和提出的要求，贯彻了“古田会议”决议精神，它对于中央苏区红军，特别是对红1、红3军团政治工作的继续发展，对于战时政治工作的加强，都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1934年2月，总政治部在中央苏区瑞金召开全军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中央红军各部、中革军委直属部队、湘赣苏区、湘鄂赣苏区、闽浙赣苏区以及江西、福建、闽赣、粤赣等军区的团以上单位政治工作领导干部和部分基层政工干部，共258人参加会议。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作了《目前形势与政治工作任务》的报告，其他领导同志也发表了讲话。会议总结了过去政治工作的经验教训，对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政治教育的方针，战时政治工作的方法，修改政治工作暂行条例，对游击队、赤卫队、少先队、地方群众中的政治工作，对敌军的工作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肯定了红军建军以来政治工作的成绩，表彰了中央红军第1、第3军团的政治工作经验，号召全军“要将模范的一、三军团的经验拿回去，在其他兵团、在各个军区分区、在后方各机关的工作中广泛地运用起来”。会议强调了政治工作的地位，提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是提高红军战斗力的原动力”。会议重申了政治工作的任务，提出“政治工作就是要提高红军战士与工农群众的积极

性”、“保证军事技术与战术的提高”、“保证上级命令的执行，保证每一个战斗的胜利”。总之，“一切政治工作都是为着前线的胜利”。会议明确提出，政治工作要实行面对面的领导和“活的领导”，反对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平均主义和刻板的工作方式。会议要求“每个政治工作人员要学习新的战术，学习新的军事科学”。

这次会议是在中共临时中央已迁到中央苏区，完全排除了毛泽东的领导，全面推行王明路线，“左”倾教条主义、单纯军事观点非常严重的情况下召开的，它没有也不可能完全纠正王明“左”倾路线在红军政治工作中所造成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等错误。

但是，这次会议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把1929年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时提出的政治工作是红军命脉的论断，发展为“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对当时乃至后来的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坚持和发展，有着深远影响。会议重申了政治工作的任务、方法和政治干部必须注重学习军事等内容，推广了战时政治工作的经验，促进了红军政治工作的开展。

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后，红四方面军也于同年10月在川陕苏区毛裕镇召开政治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的特点是将红军的政治工作与党务工作结合在一起讨论。会议形成了《红四方面军政治与党务工作决议（草案）》。《决议》指出，“政治工作的坚强与否，党的领导的充实与否？是战胜敌人最主要条件”；强调政治工作“要保障战争的胜利”。《决议》总结了红四方面军以往政治工作和党务工作的成绩与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今后政治工作和党务工作的八项具体任务。此外，会议还制定了《团政治处暂行工作条例》、《军师政治部的暂行工作条例（草案）》。这次会议的基调和所提出的其他各项要求，基本上是正确的，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红四方面军政治工作和党务工作的发展。但是，在“左”倾教条主义统治和张国焘错误领导下，会议也存在着严重的偏差。特别是不顾错误的肃反已造成的极为惨痛的后果，仍然强调要加强肃反与清洗工作。

在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和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总结和推广政治工作经验的同时，其他战略区红军也以不同形式总结和推广了自己的政治工作经验，使得全军政治工作进一步深入发展。

八、在“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下的进攻作战和反“围剿”斗争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取得统治地位。他们对中国革命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特别是无视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深刻变化，推行了一整套“左”倾冒险主义的政治路线和军事战略。1931年5月9日，中共中央作出《目前的政治形势及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强调要在一切实际工作中根本肃清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开始在党的实际工作中贯彻推行。9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1932年1月9日发布《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以党的决议的形式，重新向红军提出攻打敌人设防严密的中心城市，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任务，这标志着“左”倾冒险主义军事战略的形成。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各苏区的贯彻，是一个充满斗争的复杂过程。在一段时间里，他们还未能在组织上直接控制全国红军，他们的错误指示，还受到了各根据地党和红军的不同程度的抵制。特别是在中央苏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在党和红军中有着深刻的影响。这样，红军的一些作战，包括第四次反“围剿”作战，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的统治长达4年之久，给革命造成了巨大危害。其军事战略的发展变化，在战争实践中，经历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三个阶段，使红军遭受重大挫折和损失。

1932年的进攻作战

1931年4月，中共中央派遣的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苏区，开始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中央红军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苏区中央局多次提出，要夺取赣江流域的一二十中心城市，实现革命在江西的首先胜利，或者以“先发制人”的进攻，制止敌人可能发起的“围剿”。为此，中央红军在1932年连续进行了6次进攻性战役。这时，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军事战略还没有在中央苏区占据统治地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同“左”倾冒险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在冒险进攻与积极防御两种不同军事战略的斗争中，凡是正确意见占主导时，红军就打胜仗；反之，就打败仗。1932年中央红军的6次进攻战役，就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背景下进行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民主运动高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危机加剧，蒋介石被迫于同年12月宣布“下野”。这时，国民党军一时难以组织起对各苏区红军新的大规模“围剿”，在战略上暂时处于守势。次年初蒋介石复出，重新开始组织对苏区和红军新的“围剿”，但其进攻目标改为首先从鄂豫皖、湘鄂西开始，对中央苏区红军仍暂取守势。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红军完全可以主动进攻打击敌人。问题在于，进攻的目的是为了夺取中心城市，争取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还是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扩大苏区，发展红军，筹集资财，为打破敌人新的“围剿”做准备；进攻的方向是选择敌人重兵防守的中心城市，还是敌人兵力薄弱的广大农村，以及孤立无援的中小城镇。冒险主义军事战略的错误，就在于选择了前者。

赣州战役。

1932年1月10日，根据中共临时中央“首取赣州，迫吉安”的指示，中革军委向中央红军下达了攻取赣州的作战命令。其目的在于，以赣州为中心向北发展，“使革命发展更迫近夺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毛泽东极力反对红军攻打赣州。因为赣州三面环水，易守难攻，又是敌人必守的坚城；红军技术装备差，攻坚不仅伤亡大，也没有把握；赣州周围驻有国民党军重兵，一旦驰援，必会对红军形成夹击之势。但这一意见遭到否决。2月4日，赣州战役开始。敌军依城固守，红军多次爆破强攻均未成功，伤亡严重。这时，敌人12个团援兵赶到，红军腹背受敌，被迫撤出。这次作战，红军不仅攻城不克，反而伤亡3000人，在战略和战役指导上都是错误的。

漳州战役。赣州战役后，中央红军分兵作战。东路军向福建发展。攻占龙岩后，毛泽东根据漳州城易攻难守的地形特点，并从攻克漳州可以取得大量的给养和装备补充，有利于巩固闽西苏区考虑，一再建议攻取漳州，苏区中央局接受了这一建议。由于选择了正确的作战方向，加之集中兵力展开攻势，4月20日，红军胜利攻占漳州，不日主动撤出。这次战役，歼灭守敌第49师大部，缴枪2000余枝，缴获食盐2万担和大量军用物资，筹款100万元以上。这一胜利，巩固了闽西苏区，缓解了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财经物资上的困难，有利于红军下一步的作战行动。西路军于4月初西渡赣江转战至湘赣边界地区，在3个多月中，与湘粤赣3省40多个团国民党军多次交战，牵制了敌人兵力，配合了东路军的作战行动。

南雄、水口战役。6月5日，中共临时中央下达了“先解决入赣粤军”，“再沿江北上，占领赣州、吉安、樟树，以争取南昌为目的”的作战任务。苏区中央局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朱德任总司令，叶剑英任总参谋长，王稼祥任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仍以政府主席身份在前方“主持大计”；集中红军主力于粤赣边界打击入赣粤敌。7月上旬，红一方面军发起南雄、水口战役。经激战，共击溃粤敌15个团，毙伤敌“近三千”。然而，由于未能真正集中兵力和指挥上、情报上的失误，红军没有重大缴获，且自身“损伤两千以上”。这种“没有缴获或缴获不超过消耗”的胜仗，对于枪械物资主要取之于敌的红军来说，是缺乏实际意义的；而且打击粤军，不利于缓解与广东军阀陈济棠的对抗，反而利于陈济棠与蒋介石矛盾的缓和。

乐安、宜黄战役。南雄、水口战役后，毛泽东被重新任命为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周恩来也由后方到达前线，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共同组成由周恩来任主席的最高军事会议，负责处理红一方面军的行动和作战。鉴于乐安、宜黄地区敌人兵力薄弱，红一方面军于8月中旬发起乐安、宜黄战役，全歼国民党军1个师，不仅给江西国民党军以打击，也在一定程度上策应了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红军的反“围剿”作战。

建宁、黎川、泰宁战役。国民党军对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红军的“围剿”相继得手后，将“围剿”重点转向中央苏区红军，近20个师的国民党军陆续集结于中央苏区附近。根据“积极进攻”的战略方针，红一方面军于10月中

1931年上半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和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向忠发先后被捕叛变。9月下旬，因王明即将前往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周恩来将前往中央苏区，而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不到半数，在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下，成立了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秦邦宪）总负责。临时中央成立后，继续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政策。

旬进行了建（宁）黎（川）泰（宁）战役，意在乘敌人合围尚未完成之前，以“先发制人”的进攻制止“围剿”。由于建黎泰地区是敌人兵力的薄弱环节，红军集中优势兵力，以较小的代价攻取了这一地区。

金溪、资溪战役。建黎泰战役后，中革军委不是要求红军就地发动群众，巩固胜利，为即将到来的反“围剿”战斗做好准备，而是命令红军于11月发起金资战役。这次战役，尽管广大红军战士英勇战斗，总共击溃敌人6个师，歼灭1个多旅，但也消耗和疲惫了自己。这次战役中，红5军团副总指挥赵博生英勇牺牲，给红军造成重大损失。

中央红军实施进攻战役的实践一再表明：盲目进攻敌人重兵防守的中心城市，红军就打败仗；相反，从战场实际情况出发，抓住敌人薄弱环节，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红军就打胜仗。可是，实行后者，不可避免地要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攻打中心城市的战略意图发生冲突，从而形成两种战略指导的激烈斗争。

乐宜战役后，按照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原定计划，红一方面军应西取吉安或北攻抚州；随后，中央局又提出向北出击，威胁南昌，以援助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红军。可是，这些要求都超出了红一方面军的实际能力，缺乏实现的可能性。红一方面军没有执行这些计划，而是从敌情和战场实际出发，在乐安、宜黄地区分兵发动群众，为粉碎敌人新的进攻作战前准备。1932年10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全体会议，在后方的中央局成员严厉指责在前方的红军领导是“对革命胜利和红军力量估计不足”，军事上是“纯粹防御路线”，提出要“集中火力反对这种错误”。毛泽东被迫离开了红一方面军领导岗位，总政治委员的职务由周恩来接替。

宁都会议的矛盾冲突，实质是王明冒险主义军事战略与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之间的斗争。由于错误路线占了上风，这次会议后直到遵义会议前，毛泽东一直被排斥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之外，中央苏区和红军的革命战争因而蒙受了极大损失。

1932年的红军进攻战役，除赣州战役外，大部都取得了胜利，达成了预期的战役目的。然而，“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在敌强我弱的形势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特别是在敌人即将发起新的大规模军事“围剿”之时，不是以积极防御的战略养精蓄锐，后发制人，而是集中红军主力寻战于敌人重兵集团之间，企图通过夺取中心城市来实现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或者试图以“先发制人”的进攻来打破敌人的“围剿”计划，既是不现实的，也使红军难以进行充分的反“围剿”准备，给后来的反“围剿”作战带来不利影响。这种战略指导，从全局上看，是不可取的。

第四次反“围剿”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加紧“围剿”红军和各革命根据地。1931年和1932年，国民党军两次召开“剿匪”会议，总结失败的教训，制定了新的“围剿”战略。其要点为，战略上取攻势，战术上取守势，实行经济封锁和堡垒推进的方针。1932年6月，蒋介石调集50

万大军，亲任总司令，对红军发动了第四次“围剿”。此次“围剿”，实行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总体战”方针；同时决定“围剿”分区进行，以左路军 10 万人进攻湘鄂西苏区和红军，以中、右两路 30 万人进攻鄂豫皖苏区和红军，以另 10 万人先对中央苏区和红军实行经济封锁。达到目的后，再集中力量“围剿”中央苏区和红军。为摧毁苏区消灭红军，蒋介石还制定了稳打稳扎、分进合击的战略和“纵深配备，并列推进，步步为营，边进边剿”的战术；并强调实行“连坐法”，编组保甲，组织团练，全面进行反革命动员。

1932 年 6 月，国民党军首先向鄂豫皖苏区和红军发起了第四次“围剿”。面对敌军即将到来大规模“围剿”，鄂豫皖苏区党和红军的主要负责人张国焘，被红四方面军刚刚取得的 4 次进攻战役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认为“围剿”已被根本打破，国民党军不堪红军一击，因而多次拒绝停止进攻作战转入反“围剿”准备的建议，命令部队进攻麻城，企图实现“会师武汉”的冒险战略。8 月上旬国民党军发起“围剿”，乘虚深入苏区中心区域，占领了红安、七里坪。张国焘命令红军从麻城撤围，迎击国民党军主力。已苦战月余的红军，在冯秀驿、七里坪地区堵截国民党军精锐部队，经顽强苦战，虽重创敌军，但自身伤亡严重。此后，红军与敌在新集以北肿湾地区苦战 5 昼夜，遭敌三面包围，被迫撤离豫东南，转移至黄安。

10 月上旬，敌军三面包围黄安。此时，张国焘认为红军在苏区内战斗已无胜利希望，率红四方面军主力退出鄂豫皖苏区。途中，红军在枣阳以南进行了两次战斗，试图通过外线作战摆脱被动、打回苏区，但都未达到预期目的。至此，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失败。

留在鄂豫皖苏区的部分红军和地方武装，相继组成红 25、红 28 军，顽强坚持与敌人的“围剿”、“清剿”作斗争。后两军合编为红 25 军，在徐海东、吴焕先等率领下继续战斗。

张国焘的错误引起红四方面军干部战士的不满。

1932 年 12 月上旬，红四方面军主力转战至陕西城固西北小河口。在以曾中生为代表的一些高级干部要求下，成立了红四方面军前敌委员会。这对张国焘的独断专行起了一定制约作用，也有利于从实际出发确定红四方面军的行动。1933 年 2 月，红四方面军在敌人兵力空虚的川陕边地区建成了以通江、南江、巴中 3 县为中心的川陕苏区。

1932 年 7 月，国民党军向湘鄂西苏区和红军发动了第四次“围剿”。在此之前，以夏曦为书记的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积极贯彻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指令红 3 军“转变到大规模的平地战、城市战，为夺取中心城市而斗争”。红 3 军与优势之敌激战损失严重。与此同时，中共湘鄂西分局又进行错误的“肃反”，严重削弱了红军战斗力。

7 月中旬，“进剿”的敌军占领襄北，随即“围剿”洪湖苏区中心区域。湘鄂西分局由冒险进攻转为消极防御，拒绝转移外线机动作战以打破敌军“围剿”的正确意见，命令红军主力重返襄北牵制敌人，并在苏区内构筑碉堡，分兵把口，用阵地战阻挡敌军。苏区军民虽顽强抵御，并展开局部反击，但大多失利，伤亡惨重。最后，洪湖苏区陷入敌手，湘鄂边、襄枣宜、鄂西北等苏区也相继被敌人占领。至此，整个湘鄂西苏区全部丧失，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终于失败。

10 月下旬，中共湘鄂西分局率红 3 军向湘鄂边转移。经长途转战，于 1933

年初到达湘鄂边的鹤峰、桑植地区。接着，中央分局又进行了错误的“肃反”，并命令红军向强敌进攻。结果作战受挫，在鹤峰建立苏区的计划未能实现。国民党军调集重兵，从三面向红军发起进攻。苦战半年后，红3军又于1934年2月向湘鄂川黔边转移。

“左”倾错误不仅造成了湘鄂西苏区和红军反“围剿”斗争的失败，也使红军蒙受惨重损失。红3军广大干部战士对此日益不满。1934年6月，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在贵州沿河县枫香溪召开会议，初步批判了分局主要领导人的“左”倾错误，决定加强部队建设，创建新苏区。9月，黔东北苏区基本建成。

蒋介石国民党将红四方面军主力和红3军逼出鄂豫皖与湘鄂西苏区后，于1933年初，集中40万兵力，进攻中央苏区和红军。其作战方针为“分进合击”，分三路向南丰、广昌推进，企图一举消灭红军。此时，红一方面军已发展到7万人，但连续6次进攻作战使红军缺乏休整和反“围剿”的充分准备；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的失败，使中央苏区在战略上失去了“三足鼎立”、互相支撑的有利格局；特别是1933年初，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其冒险主义军事战略得以直接在红军中推行，对敌斗争经验丰富的毛泽东又被迫离开了红军领导岗位。这一切，增加了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的困难。

2月初，国民党军第四次“围剿”即将发起，苏区中央局决定，红一方面军西渡抚河攻打敌军重要据点南丰，以先发制人，打破敌人的“围剿”。周恩来多次力陈攻打南丰的不利，建议抓紧进行反“围剿”准备，求得在抚河东岸以运动战歼敌。但遭到苏区中央局拒绝。

南丰城池坚固，红一方面军强攻不克。敌援兵向南丰迅速推进，企日围歼红军于南丰城下。周恩来、朱德于12日果断决定，对南丰改强攻为佯攻，主力迅速脱离战场准备打援。但援敌兵力集中，不易攻击。于是决定撤围南丰，以一部兵力向黎川佯动，方面军主力秘密转移至苏区内部待机歼敌。这是红军由被动转为主动的关键一着。

苏区人民严密封锁消息，敌军因情况不明，遂以3路纵队紧跟红军佯动部队之后向黎川方向迫击。开进途中，敌第1纵队态势孤立。红一方面军主力抓住战机，在黄陂、霍源地区选择有利地形秘密设伏，一举歼灭敌军近两个师。随后，迅速撤回苏区内隐蔽待机。

敌军遭受沉重打击后，将“分进合击”改为中间突破，分前、后纵队，交替掩护，向广昌攻击前进。红一方面军以一部兵力伪装主力，进至广昌西北地区，积极活动吸引敌人，主力则在山路崎岖，丛林密布的草台岗、徐庄地区隐蔽设伏。敌军果然中计，前纵队加速向广昌推进，势力单薄的后纵队逐渐与前纵队拉开了距离。当敌后纵队进至草台岗、徐庄地区时，前纵队已远在前方50公里外。隐蔽设伏的红军迅即发起攻击，将敌后纵队分割包围，于3月21日歼敌1个师。各路“围剿”军闻讯纷纷后撤，对中央苏区和红军的第四次“围剿”宣告破产。

黄陂、草台岗两仗，创造了红军大兵团伏击战的典范，共计歼敌3个师。这一胜利再次表明，在强敌进攻面前，应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主动退却，保存军力，在运动之中造成敌人过失，依托根据地寻机歼敌，是红军行之有效的作战原则。

国民党在对中央苏区和红军进行第四次“围剿”时，对周围的湘鄂赣、

湘赣、闽浙赣苏区和红军也发动了“围剿”。这些地区的党组织，领导地方武装和游击队袭击和牵制敌人，主力红军转至外线，寻机求歼小股敌军，巧妙地对付敌军的“围剿”，也配合了中央苏区和红军的反“围剿”作战。随着进攻中央苏区和红军的敌“围剿”军的撤退，进占这些地区的敌军也先后撤走。

中央苏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和其他地区红军的反“围剿”

1933年5月，蒋介石调集50万大军，准备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这次“围剿”，蒋介石确立了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相结合的战略和“以守为攻”、“合围之法”的战术，在苏区周围广筑碉堡。红军的反“围剿”斗争形势十分严峻。

就在敌人紧锣密鼓准备“围剿”时，6月，临时中央决定红一方面军实行分离作战，一部组成东方军入闽作战，另一部组成中央军在赣江、抚河间活动，创造会攻抚州、南昌的条件。这种“两个拳头打人”的战略，造成红一方面军东方军打得十分疲劳，而中央军置于无用地位，使红一方面军既不能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又失去了进行反“围剿”准备的宝贵时间。

9月25日，国民党军大举进攻黎川，中央苏区和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拉开战幕。此时，经过四次反“围剿”斗争考验和锻炼的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地方部队已发展到共约10万人，苏区得到很大发展，广大群众积极支援红军作战。如果战略战术得当，红军是有可能粉碎敌人“围剿”的。可是，此时“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战略已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红军的积极防御战略和运动战原则被排斥，战争的指挥权实际垄断在不懂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博古与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等人手里，这就埋下了反“围剿”失败的祸根。

“左”倾领导者首先实行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9月28日敌军攻占黎川之后，临时中央大为震惊，急令还在执行分离作战任务的红军东方军迅速北上，以收复黎川，并准备与红军中央军会合，与敌在抚河地区决战，御敌于苏区之外。红军仓促向硝石、资溪桥、浒湾八角亭、云盖山、大雄关等敌人重兵扼守的堡垒地带进攻，结果连遭失利，不仅没能收复黎川，反而遭受重大伤亡。

正当中央红军反“围剿”作战开局不利之时，被调到福建“剿共”前线的国民党第19路军，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于11月20日发动“福建事变”，公开宣布抗日反蒋，与红军停战，并成立了福建人民政府。蒋介石急忙调动“围剿”中央红军的北路军一部镇压，对中央苏区的“围剿”暂时停顿。这时，周恩来、张闻天等向中革军委建议，侧击入闽之敌中央军，配合第19路军的行动。毛泽东进一步提出，红军主力应趁机突进到苏浙皖赣地区去，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这样，就能迫使敌军回援其根本重地，从而粉碎其“围剿”，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可是，临时中央拒绝了这些意见。他们声称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害怕出击外线会丢失苏区。结果，不仅不敢对国民党后方出击，反而继续命令红军进攻敌人堡垒密集地区。红军因缺乏重武器难以有效攻克堡垒，反遭敌人强大火力杀伤，处境更加被动。

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错误地将中央苏区和红

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说成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强调继续反对所谓“主要危险的有倾机会主义”。这标志着“左”倾冒险主义发展到顶点。在此前后，红一方面军再次归中革军委领导，改称中央红军。

1月下旬，蒋介石镇压了“福建事变”后，重新开始“围剿”中央苏区和红军。这时，“左”倾领导者从进攻中的冒险主义转为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他们命令红军在苏区的重要城镇和交通要道构筑碉堡，以阵地防御和阵前反冲击的“短促突击”战术，抗击敌人的进攻。这就完全放弃了红军擅长的运动中歼敌的打法。从1月下旬开始，红军在阵地防御战和“短促突击”战斗中，付出了重大的牺牲，却没能阻止敌人推进。

4月上旬，红军举行了广昌保卫战。这是红军作战史上最典型的阵地战、消耗战。当时，敌人集中了11个师向广昌进攻。中革军委不顾红军十分疲惫、减员严重的现实，提出“为保卫广昌而战，就是为保卫中国革命而战”和“不让敌人侵占苏区寸土”的拼命主义口号，命令红军以所谓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的方式，与敌人进行“正规”战。血战18天，红军付出了5000余人伤亡的惨痛代价。

28日，广昌失陷。战后，彭德怀当面批评李德的指挥“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斥责李德对红军造成的损失是“崽卖爷田不心疼”。在后方的毛泽东也指出，广昌保卫战，对红军来说是个灾难，毫无战绩。一些曾支持过“左”倾政策的人，也由此认识了冒险主义的严重危害。

7月上旬，敌人向苏区中心区发起全面进攻。“左”倾领导者仍命令红军“六路分兵”、“全线抵御”。此后2个多月空前激烈的战斗中，无数红军战士为保卫苏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兵日少而地日蹙，苏区仅剩下瑞金、兴国、于都间的狭小地区。红军被迫于10月间实行战略转移。中央苏区和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终于失败。

国民党军在对中央苏区和红军进行第五次“围剿”时，对邻近苏区也发动了“清剿”或“围剿”。湘赣苏区红6军团在根据地大部被敌占领的情况下奉命转移；湘鄂赣苏区红军在敌重兵围攻下，遭受极严重的损失；闽浙赣苏区红10军团在转战浙皖边时，主力在赣东北怀玉山遭敌人重兵合围，大部牺牲，军团领导方志敏被俘就义。上述各苏区都曾有过很好的革命形势，红军都发展到万人以上，但随着“左”倾冒险主义军事战略的贯彻，加以强大敌人的反复进攻，终使苏区丧失。

在中央苏区和红军进行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前后，在川陕苏区，红四方面军先后打败了国民党军的“三路围攻”和“六路围攻”。

1933年2月，四川军阀发起对川陕边苏区的三路围攻。红四方面军总结第四次反“围剿”失败惨痛的教训，在强敌进攻面前，实行了“收紧阵地”的御敌方针。红军利用山险路隘节节抗击敌人，逐步向苏区中心收缩，不仅歼敌逾万，红军也集中了兵力。在敌人士气低落、补给困难的情况下，红军5月中旬展开反击，大量歼敌后，乘胜扩张战果，恢复了南江、通江、巴山根据地。在反“三路围攻”作战中，红四方面军共歼敌俘敌2.4万人，缴枪8000余枝，巩固了苏区，部队也发展到4万余人。

8月中旬开始，红四方面军乘四川军阀再次混战之机，发起了仪（陇）南（部）、营（山）渠（县）、宣（汉）达（县）3次进攻战役。至10月下旬，累计歼敌1.2万余人，川陕苏区与川东游击根据地连成一片，红四方面军兵力达5个军约8万余人，实力大大增强。

四川军阀的混战结束以后，蒋介石于12月中旬任命的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集中川军110个团20万兵力，发动了对红四方面军的六路围攻。红四方面军仍采取“收紧阵地”方针，至1934年4月底，在步步抗击中歼敌3.5万人，并完成了主力的集中。接着，以万源城保卫战为序幕，在东、西两线展开了反攻作战。

10月底，反“六路围攻”战役结束，红军取得了俘敌2万余人、缴枪3万余枝和击落敌机1架的重大胜利。

这一时期，地处西北偏僻地区的陕甘苏区和西北红军在艰苦的斗争中逐步发展。这一根据地是在红军陕甘游击队和陕北游击队创建的陕甘边、陕北苏区基础上形成的，两支游击队先后改编为红26军第42师和红27军第84师。1934年春至1935年夏，国民党军对陕甘边和陕北先后发动了两次“围剿”。红42、红84师在安定会师后，成立了以刘志丹力总指挥的红军西北军事委员会前敌总指挥部。红军与游击队、赤卫队密切配合，声东击西，打击敌人，粉碎了敌人的“围剿”，陕甘边苏区与陕北苏区连成一片，红军发展到5000余人。

1932年初至1934年夏秋，从总体上看，是红军战争遭受严重挫折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以王明为代表、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冒险主义，加紧推行其错误的军事战略。他们否定党和红军在实践中创造的完全符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一系列军事原则，实行一整套错误的战争指导原则。结果，在国民党军的进攻下，苏区和红军的力量遭受严重损失。这是继大革命失败以后，党和人民的力量又一次遭受的重大挫折。这一时期反“围剿”斗争失败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但主观指导上的错误是最根本的原因。主要教训是：

第一，必须实行战略的持久战，反对战略的速决战。中国革命敌强我弱的特点，规定了战争的长期性。红军只有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不断打破优势敌人的“围剿”，逐步削弱敌人的力量，壮大自己的力量，改变力量对比，才能最后战胜敌人。这就要求实行持久战略。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相信“围剿”反“围剿”长期反复的规律，极力实行进攻战略，企图取得速胜。在国民党军发动“围剿”之前，他们命令红军进攻中心城市，以实现所谓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进而夺取全国胜利，然而，这只能是不切合实际的空想。当敌军“围剿”开始以后，他们实行毫无把握的外线出击，命令还比较弱小的红军与强大敌军决战，其结果，不能不使红军遭受严重损失，丧失作战的主动权。

第二，必须实行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在优势敌军进攻和“围剿”面前，实行积极防御，事先做好反“围剿”准备、有计划地实行战略退却、适时发起战略反攻，是夺取胜利的必要步骤。其中战略反攻是在战略退却中造成的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式下，采取的一种带有决战性的行动，是战略决战中最精彩、最关键的阶段。“左”倾冒险主义者，既不事先组织做好反“围剿”作战的准备，敌军发起进攻后，又不敢诱敌深入聚而歼之，更不敢组织积极的战略反攻或向敌人薄弱的后方出击，而是处处设防，消极抵御，以阵地战代替运动战，以消耗战代替歼灭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来支持这种消极防御。其结果，不能不导致失败。

第三，必须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反对分散兵力打消耗战。在全局敌强我

弱的形势下，只有集中兵力，才能在一定时间和范围内，对特定的作战对象形成优势，迅速取得胜利。红军历次反“围剿”作战中，此法屡屡奏效。“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却实行军事平均主义，“全线出击”、“两个拳头打人”，“六路分兵”，“全线抵御”，其结果，进攻时不能大量歼敌，防御时又被敌各个击破。在敌经济、军事潜力远大于我的形势下，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只能使我力量枯竭，最后为敌所乘。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战略，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军事战略最根本的分歧点，就在于是否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事实表明：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尊重别人流血的经验，也尊重自己流血的经验，才能探索出科学的战争指导规律，引导革命战争走向胜利；一切从实际出发，从想象中的“原则”出发，必然断送有利的革命形势。

九、举行万里长征，准备对日作战

中央红军不能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为了保存力量，建立新的根据地，以开创发展的新局面，被迫于1934年10月实行战略转移。但是，由于敌人重兵的“追剿”，他们不能在南方落脚，不得已过长江折转北上。这样，原计划的短程战略转移便发展为长征。作为红军在南方战略格局主要支柱的中央红军不能尽快恢复稳定，引起了整个战局的不稳定。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即红2、红6军团）等部，也相继实行战略转移，进行长征。

红军长征是10年土地革命战争最为严酷的一个阶段。由于红军在苏区内的反“围剿”没有能从防御转到进攻，反而由防御变成了退却，敌军也就由进攻变成了追击，这样，“围剿”和反“围剿”就变成了“追剿”和反“追剿”。这种改变，虽然不是“围剿”和反“围剿”这一中国内战主要形式的改变，但作战上已由在相对固定的苏区内进行，改为在流动中进行，这使得红军失去了较为有利的地理、群众等条件，后勤工作也出现了严重困难；战争的地域由长江中、下游和江西、福建的局部地区，逐步移到西南、西部和西北的广大地区，这使得红军不仅要面对敌人重兵的围追堵截，而且还要面对着万水千山的艰难险阻；红军受到了很大的削弱，敌我强弱的悬殊更加严重；作战周期也更长了，红军长途转战持续达两年之久。显然，战争较以前更加复杂和激烈，更加难以驾驭。

红军要夺取长征的胜利，必须靠党的正确领导。而党要领导红军夺取长征的胜利，首先必须纠正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1935年6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党内又出现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惊心动魄的斗争。这些，又给红军夺取长征的胜利，增加了新的困难。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华北事变”，加紧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妄图沦中国为它的殖民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全国抗日民主运动日益高涨。形势的发展，一方面要求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担负起抗日救国的使命；一方面又有利于红军夺取长征的胜利，前进到抗日出发地域，准备直接对日作战。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红军迎着第五次反“围剿”严重失败的痛苦考验，一边为完成长征的任务，一边为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转变而斗争。

长征开始和遵义会议

红军长征，从1934年10月10日开始。在此之前，1934年7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命令红军第6军团西征，拉开了长征的序幕。

当时，由于“左”倾领导的错误指挥，中央苏区和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已处于严重不利境地。为牵制敌军，7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命令湘赣苏区红6军团突围，转移到湖南中部创造新的苏区，并与红3军取得联络；由任弼时、萧克、王震组成军团军政委员会，任弼时为主席。以后，又成立了军团正式领导机关，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治委员。

8月7日晚，红6军团主力9700余人，从江西永新地区突围西征。连闯敌人封锁线，进抵湘江。国民党军急调重兵实行追堵，企图围歼红军于湘南。红6军团以打圈子的战术与敌人周旋，并在广西界首地区顺利渡过湘

江。此后，又突破敌军 20 多个团的重围，于 10 月下旬在黔东北印江县木黄，与活动在川湘黔边的红 3 军胜利会师。红 6 军团西征，为中央红军向西突围，实行战略转移，起到了探路的作用。

红 6 军团和红 3 军会师后，红 3 军即恢复了红 2 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红 2 军团首长统一指挥红 2、红 6 两军团行动。为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并创建新苏区，10 月下旬，红 2、红 6 军团发动了湘西攻势。3 个月中，两军团在湘西地区共歼灭国民党军 4 个旅，初步建成了湘鄂川黔苏区，红军发展到 1 万余人，成为红军三大主力之一。

在中央苏区，1934 年 10 月上旬，国民党“围剿”军已逼近苏区中心地区。在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未做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博古等人仓促决定放弃中央苏区。

10 月 10 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第 1、第 3、第 5、第 8、第 9 军团以及中央党政军机关人员、直属部队组成的第 1、第 2 野战纵队共 8.6 万人，由江西瑞金等地突围，开始战略转移。在此之前，留下红 24 师及地方红军共 1.6 万人在苏区坚持斗争；成立了由项英任书记和司令员的中央分局、中央军区和陈毅任主任的中央政府办事处，继续领导中央苏区和邻近地区的斗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统治，使中央苏区这块由无数红军战士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战略基地终于丧失。

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最初目标，是到湘西与红 2、6 军团会台，创建新苏区。这时，“左”倾领导者，又由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转为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他们把红军的战略转移当成大规模搬家式的行动。出发前未做充分的准备工作，也未在部队中进行适当的政治动员。出发后，不是积极争取有利时机，主动灵活地歼灭敌军，而是消极避战，以红军主力掩护庞大的后方机关，边打边走。其行军部署为：红 1、红 9 军团在左，红 3、红 8 军团在右，军委第 1、第 2 野战纵队居中，红 5 军团殿后，形成甬道式阵势。行军队伍还携带了大批行李辎重，以至在崎岖的山路间，每天仅能前进十余公里，有时甚至几公里。这样，红军主力成了掩护队，在国民党军重兵“追剿”下，陷于极被动的地位。

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后，先后闯过敌人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此时，毛泽东建议，乘敌“追剿”军正在调动尚未靠拢之际，集中兵力，求歼一路或一部敌军，以摆脱被动。但是，“左”倾领导者不敢与敌再战，致使红军失去歼敌之机。

11 月下旬，蒋介石凭借湘江天险设置了第四道封锁线。国民党军 20 余万人，日夜兼程赶往湘江两岸围追堵截红军。是否能迅速过江，成为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

27 日，红军先头部队一部首先渡过湘江，控制了渡河点，并架设了浮桥。此时，军委纵队离湘江渡河点仅 80 余公里，但由于辎重过多，行进缓慢。敌“追剿”军陆续赶到，向红军发起攻击。红军在湘江两岸与优势之敌血战数日，终于掩护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于 12 月 1 日渡过湘江。担任后卫的红 5 军团和红 3 军团各一部，被敌人阻于湘江以车，激战至弹尽粮绝后，大部壮烈牺牲。湘江之战，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打得最艰苦，最激烈的一仗。红军与优势敌军顽强战斗，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两岸的企图。但是，自身也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 8.6 万人锐减至 3 万余人。这是“左”倾错误路线自长征以来实行消极避战、逃跑主义的严重恶果。

12月10日，中央红军到达广西通道县境。此时，国民党军已判明中央红军北上与红2、红6军团会师的意图，在前方张网以待。红军如果继续北出湘西，势必与敌20万重兵展开决战，这对疲惫已极、减员严重的红军是十分危险的。在这样生死存亡的形势下，毛泽东提出放弃北上湘西计划，全军西进敌人力量弱的贵州。博古和李德虽然坚持北上湘西，但政治局的许多同志赞同毛泽东的建议，中革军委决定西进贵州。中央红军于17日进占黎平。次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举行会议。会上，毛泽东根据敌情，力主放弃同红2、红6军团会合的计划，提出继续西进，到川黔边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建议。经激烈争论，毛泽东的建议被通过。红军虽然避免了覆灭的危险，但改变博古和李德的错误领导，从根本上纠正党的错误军事战略，已成为刻不容缓的问题。

1935年1月初，红军强渡乌江，进占遵义。尾追的敌薛岳兵团因弄不清红军的去向，转为在乌江以南地区休整。抓住这个时机，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即历史性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党和红军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结束了“左”倾错误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这次会议和会后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的经验教训，严肃批评了博古、李德等人的指挥错误，肯定了毛泽东等提出的红军作战一系列原则。

关于组织问题，会议决定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随后，张闻天接替博古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朱德、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毛泽东协助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3月，又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3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红军的行动。以毛泽东力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实际上的确立，标志着党的成熟，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开始形成。这对中国共产党和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具有极为深远的历史意义。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实事求是地解决自己重大问题的会议。经过这次会议，中国共产党，首先是中央领导集体，自觉地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把革命事业引向胜利。这是党在理论上和政治上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进行了整编。随后，在云贵川边展开了灵活机动的运动战。从1月19日至4月4日，中央红军在贵州境内和四川南部，与40万国民党“追剿”军进行了著名的四渡赤水战役。

根据遵义会议确定的方针，中央红军准备渡过长江，进军川西或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敌军加强了对长江的布防封锁。1月19日，红军兵分三路向北开进，准备从泸州至宜宾地段北渡长江。遭川军重兵堵截后，转而在川黔边境土城附近西渡赤水河。2月7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暂时放弃原定渡江意图，集中云南扎西地区。这时，敌各路“追剿”军扑向扎西，露出黔北空虚弱点，红军则突然甩开敌军，挥戈东指，从二郎滩一带东渡赤水河，向黔北桐梓地区急进。2月24日，发起遵义战役，5日内连下桐梓、娄山关、遵义城，歼灭和击溃敌人2个师另8个团。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

遵义战役后，蒋介石亲飞重庆，策划新的围攻，企图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地区。敌军逼进时，中央红军将计就计，由茅台附近向西三渡赤水，进入川南，吸引敌人。蒋介石果然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调重兵沿江防堵，并大筑碉堡。当大批国民党军进入川南时，红军以秘密神速的动作，从二郎滩等地向东四渡赤水，并以红9军团向北吸引敌人，主力分路从敌重兵集团之间穿过向南急进。随后，红军主力南渡乌江，直逼敌人防守空虚的贵阳。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惊恐万状，急令位于黔西南大定的滇军驰援“保驾”，其余各路敌军也纷纷回援。中央红军抓住滇东北敌人兵力空虚之机，绕过贵阳，急进云南，前锋直逼昆明。这时滇军主力已东调，云南各地民团集中昆明守城。红军主力在昆明虚晃一枪，即转向西北，5月上旬，由皎平渡顺利渡过金沙江。担负牵制敌军任务的红9军团，于4月4日在打鼓新场以东歼敌两个团，结束了四渡赤水战役以后，经过转战，也顺利北渡长江。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将尾迫之敌全部甩在金沙江以南，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意图。这是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继中央红军长征之后，1934年11月中旬，在鄂豫皖地区坚持斗争的红25军，在军长程子华、政治委员吴焕先和副军长徐海东率领下，奉命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

12月上旬，到达陕西洛南地区，开始创建鄂豫陕苏区，随后，粉碎了国民党军的两次“围剿”。

1935年7月，力策应红一、红四方面军行动，红25军再次西进，于9月中旬到达陕西延川永坪镇，同西北红军会师。长征途中，政委吴焕先不幸牺牲。红25军长征历时10个月，途经5个省，转战近万里，获得了最终胜利。此后，红25军与西北红军台编并组成红15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副军团长刘志丹。

10月，红15军团取得劳山、榆林桥作战的胜利。

与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斗争

1935年3月至4月，战斗在川陕苏区的红四方面军，为向甘南发展、扩大苏区，并配合中央红军在川滇黔边的作战，进行了嘉陵江战役。作战中，红军选择敌军兵力薄弱地段，以偷渡和强渡相结合，重点突破和宽大正面多路突破相结合的战术，一举突破敌军嘉陵江防线，并迅速向敌深远后方发展进攻，在运动中大量歼敌，取得了胜利。这次战役，总共歼敌1万余人，攻克城镇9座，控制了嘉陵江以西的川甘边界广大地区。嘉陵江战役的胜利，对于坚持和巩固川陕苏区，并继续向甘肃南部发展极为有利。但是，张国焘却对形势作出错误的判断，认为红军战争已转入低潮，红四方面军已难于在川陕苏区坚持斗争，产生了与其被敌人撵走，不如主动撤走的思想，既未同在前线指挥作战的红四方面军首长商量，也未向党中央报告，就擅自决定放弃川陕苏区，实行战略转移。

1935年5月初，红四方面军及党政机关等约10万人分路西进，开始长征。这样，红四方面军原定的依托川陕苏区向甘南发展的战略计划也失去了实现的可能。

红四方面军在西进途中进行了土门战役，击破敌人堵截，相继占领茂县、威州、理番及松潘、平武以南地区。为策应正在北上的中央红军，红四方面

军派红 30 军政治委员李先念率部西进，攻占懋功、达维等地。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为实行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苏区计划，继续北进。为了避开与强大的敌人决战，红军不得不走青藏高原东侧的丛山峻岭。5 月中旬进入冕宁彝族居住区时，红军模范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各项纪律，总参谋长刘伯承还与沽基家族首领歃血为盟，团结了少数民族群众。此后，在大渡河畔，红军以先头部队一部在安顺场渡口实施强渡，后分兵夹河而上，飞夺泸定铁索桥和泸定城，党中央及中央红军主力经泸定桥胜利北上。6 月上旬，中央红军又翻越了终年积雪的夹金山。

6 月 12 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在北进达维途中与红四方面军第 30 军会师。

18 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到达懋功，两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

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胜利会师，粉碎了国民党军将红军主力各个歼灭的狂妄企图，鼓舞了全党全军的胜利信心。两大主力会师后，总兵力达 10 余万人。与此同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华北事变，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全国抗日民众运动开始高涨，形势正朝着有利于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方向发展。

在此前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全面分析了形势，决定放弃原定在川西北地区建立苏区的设想，两个方面军继续北上，在川陕甘 3 省建立苏区。党中央的北上方针是正确的。这是因为：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后，虽然壮大了革命力量，但均处于无根据地依托的境地。红军所控制的大、小金川流域及其周围的川西北地区，虽然地域辽阔，但属高山穷谷，人口稀少，交通不便，且为少数民族居住区，存在着复杂的民族问题，不利于红军的生存、发展和建立根据地。向北面的川陕甘地区发展有下述有利条件：其一，地域广阔，物产较丰富，交通方便，居民以汉族为主体，便于红军的生存和发展。其二，川陕甘地区国民党军力量薄弱，派系复杂，内部矛盾很多，便于红军展开军事、政治攻势，也有利于机动作战，发展革命力量。其三，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逐步加深，华北已成为抗日斗争的前线。向川陕甘地区发展，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便于形成指导全国革命运动的领导中心，领导和推动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也便于取得抗击日军的前沿阵地，直接进入华北对日作战。

6 月 16 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致电张国焘，转达了中央的决定，明确指出“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陕甘川 3 省，建立 3 省苏维埃政权”。可是，张国焘却不同意这一方针。他认为，现在应是“总退却”阶段，提出组织远征军，西进青海、新疆等地，或者全部南下川康边界，以为这样可以避开国民党军的压力。18 日，中共中央再电张国焘指出，以一、四方面军这样大的部队，经草原游牧区入甘肃、青海，将感绝大困难。向南发展，即使一时得手，亦少继进的前途。但张国焘仍坚持己见。

为统一战略思想，6 月 26 日，中共中央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经说服，张国焘表示接受中央的战略方针。中革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准备两支主力红军协同作战打击国民党军胡宗南部，打开北上甘南的通道。

两河口会议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即率中央红军主力分路北上，连翻数座雪山，先头部队到达松潘以西的毛儿盖。然而，这时张国焘却按兵不动。他自恃枪多势众，借口“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尚未解决，唆使一些人向中央提出由他担任军委主席的要求。党中央在拒绝张国焘无理要求的同时，为顾全大局，实现党的战略方针，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这样张国焘才率红四方面军北上。由于他的拖延，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已在松潘地区集结，原定战役计划已无法实现。红军只能改由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草地北上。

8月上旬，中共中央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重申了集中红军主力向北，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要求进一步加强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维护两个方面军的团结；再次强调要与消极避战、对革命前途和创造新的苏区失去信心的右倾错误作斗争。会后，红军总部决定将红一（其间，中央红军已实际上改称为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混编成左右两路，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率左路军由卓克基经阿坝北进；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率右路军由毛儿盖经班佑北上，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

北上红军经过方圆数百里的茫茫草地。这里气候恶劣，没有道路和人烟。地表腐草之下多为沼泽，稍不留意便会深陷其中，许多红军战士因此献出了宝贵生命。红军以坚韧的毅力，历尽艰辛终于走出草地。8月下旬，左路军先头部队到达阿坝；右路军于月底全部到达班佑、巴西地区，并攻占了包座，为红军全军北上打开了通道。

9月1日，毛泽东等联名致电张国焘，要求左路军迅速东进，向右路军靠拢，共同北上。可是张国焘再次变卦，强令已进至墨洼附近的左路军先头部队返回阿坝，并下令左路军全部停止北上。9月9日，张国焘背着党中央电令陈昌浩，要他率领右路军并要挟党中央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危害党中央。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看到电报后立即报告了毛泽东。党中央政治局在阿西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为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贯彻北上战略方针，党中央率右路军中红一方面军主力7000余人迅速转移，先行北上。当红四方面军中一些不明真象的干部主张武力阻拦时，徐向前坚决制止，维护了红军的团结。

中共中央到达甘肃俄界后，又连续电令张国焘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9月12日，党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一致同意中央已实施的战略步骤和继续北上的战略方针；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号召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倾向作斗争。

张国焘同中共中央关于战略方针的争论，其实质是对当时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的估计存在着原则分歧；而发展到以枪指挥党的错误，则是因为他的军阀主义。当时，全国形势正在出现着有利于革命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和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激起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不断高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已在全国人民中产生重大影响；遵义会议后，红军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转败为胜，实现了两大主力的会师，增强了红军的战斗力；红2、红6军团在湘鄂川黔苏区，西北红军在陕甘苏区进行的反“围剿”斗争，先后取得了胜利；红25军在鄂豫陕边建立了新的苏区；留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坚持斗争的红军和游击队，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开创了新的斗争局面；围追堵截红军的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已远离中

心城市，补给困难，士气低落，矛盾重重。这一切表明，红军虽然还面临许多困难，但发展壮大的转机已经出现。北上的战略方针，正是党中央在正确分析形势基础上制定的、有利于革命和红军进一步发展的正确决策。张国焘却错误估计形势，过分夸大敌人的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对在西北创造新的苏区失去信心，企图以退却到川康边避免同敌人交战的方式来求得生存，这完全是脱离实际的一厢情愿。同时，张国焘存在着严重的军阀主义倾向。他自恃枪多势众，企图凌驾于党之上，向党争权，以枪指挥党。党中央在严肃批评他的错误同时，耐心说服教育，一再给予其改正的机会。可是他却一意孤行，这就不可避免地走上分裂党和红军的绝路。

将革命大本营奠基西北

9月中旬，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离开俄界继续北上。16日，攻克天险腊子口，打开了进入甘南的门户。18日，乘胜攻占哈达铺。在哈达铺，红一方面军主力和军委纵队根据俄界会议决定进行了改编，改编后的部队称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以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叶剑英任参谋长，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任副主任。

9月下旬，红军陕甘支队冲破敌人的渭河封锁线，于27日占领通渭榜罗镇。行军途中，党中央获悉陕北尚有相当力量的红军和苏区存在等情况。在榜罗镇，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决定，率红军陕甘支队前往陕北，会合当地红军，巩固和扩大陕甘苏区。会后，陕甘支队分3路北上，通过回族居住区，闯过敌人两道封锁线，翻越高耸的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今吴旗）镇。

红一方面军主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经过一年长驱转战，历经11个省，胜利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举行扩大会议，指出：在完成战略转移后，党和红军今后的战略任务是“建立西北根据地，领导全国大革命”。从此，工农红军在党的领导下，为完成新的战略任务而开始了新的斗争。

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抵达陕北时，陕甘苏区军民正在进行第三次反“围剿”斗争。当地“左”倾领导者进行错误的肃反，使根据地陷于极其危险的境地。中共中央到达后，迅速纠正了错误的肃反，挽救了危局。

11月初，红军陕甘支队进抵甘泉地区，同红15军团会师。继而，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实际上担负中央军委职责），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西北军委成立后，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下辖第1、第15军团，共1万多人。

为了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11月下旬，红一方面军进行了直罗镇战役。作战中，红1军团和红15军团协同作战，利用敌第109师麻痹骄纵、孤立冒进的弱点，将其引入直罗镇红军的包围圈，全歼该师及援敌第57军1个团。这一胜利，最终打破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也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中共中央及红一方面军主力完成长征，到达陕北前后，全国形势正发生急剧变化。1935年发生了华北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步步入侵，民族危亡日趋严重。国民党政府实行卖国内战政策，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和不满。

1935年8月1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

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12月9日，北平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

为了实现新形势下党在政治策略上的转变，中共中央于12月17日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解决了遵义会议没有来得及解决的党的政治路线问题。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指出，在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总任务下，红军的战略方针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和“猛烈扩大红军”。根据这一方针，决议规定：红一方面军的主要任务是向山西和绥远发展，以打通抗日路线和巩固扩大苏区；红2、红6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应在战略上继续牵制国民党军队，削弱其力量；长江南北的游击队应在民族战争的号召下努力恢复和发展游击战争。决议还充分肯定了毛泽东为红军制定的战略战术。这些，标志着红军开始由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

根据瓦窑堡会议确定战略方针，1936年2月至5月，红一方面军举行了东征战役。红军主力1.3万人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由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率领，东渡黄河，向山西、绥远进军，并准备开赴河北，直接对日作战。国民党军阎锡山部对红军实施拦堵；蒋介石调集11个师兵力进入山西，并命令黄河以西的国民党军进攻红军的战略后方并封锁黄河。为保存抗日力量，避免内战扩大，促进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中共中央决定适时结束东征，红军撤回河西地区。东征战役，是一次战略进攻性战役。在历时75天的作战中，红军共消灭敌军7个团，俘敌4000余人，并迫使“进剿”陕北的晋绥军撤回山西，使陕北苏区得以恢复和发展。作战中，陕甘红军和苏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红28军军长刘志丹英勇牺牲。东征期间，红军还扩充新兵8000余人，筹款30余万元，在山西20多个县开展了群众工作，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建立起一些抗日游击队和游击区，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华北以至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东征期间，党和红军还对国民党军驻陕西的张学良、杨虎城部展开了统战工作，达成了军事行动上一定程度的谅解。

然而，蒋介石无视中共中央联合抗日的主张和红军主动回撤的诚意，又调集重兵对陕甘苏区和红军发动“进剿”。鉴于敌“进剿”军派系不一，难于大举进犯的实际情况，为了巩固和扩大西北抗日根据地，红军于1936年5月至7月，举行了西征战役。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1.3万人，组成西方野战军，由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率领，进行西征，重点打击坚决反共而力量薄弱的宁夏军阀马鸿逵、马鸿宾部，以造成广大的陕甘宁根据地，并打通与苏联、蒙古的联系。经过两个多月的作战，俘获敌军人枪各2000余，战马500余匹，开辟出纵横200余公里的新根据地，使陕甘苏区扩大为陕甘宁苏区，为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红军在西征期间，宣传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发动群众起来抗日，争取东北军、第17路军等国民党军停止内战，联合抗日，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的重大胜利。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南方红军游击队坚持斗争

1934 年秋，红军主力长征以后，留在长江南北各苏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在各地党组织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在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广东等 8 省 15 个地区，坚持了三年艰苦的游击战争，在战略上配合了主力红军的长征，保存了革命火种。以后，又成为抗日战争在南方的重要战略支点，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红军主力突围转移后，国民党军继续向各苏区腹地进攻。他们以堡垒封锁将苏区分割成零碎小块，疯狂进行“清剿”。一些苏区，如江两区和闽西区，约 80 万群众被杀害，出现了一片片无人区。

面对敌人的屠杀政策，苏区军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在中央苏区，起初，为掩护主力突围转移，苏区军民在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委领导下，以阵地防御战顽强地抗击敌人的进攻。当敌军以重兵划区“清剿”时，陈毅等通过总结实行阵地战遭受损失的教训，提出全面转入游击战争的建议，被中央分局采纳。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于 1935 年 2 月接连指示中央分局，要采取“小游击队的形式，有计划的分散活动”，并强调：“占领山地，灵活机动，伏击袭击，出奇制胜，是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这些指示，对中央苏区乃至其他苏区坚持游击战争，起了重要指导作用。

根据中央指示，中央分局决定将红 24 师等部分散到各地开展游击战争。但由于敌情严重，红军在分途突围中受到很大损失。一些党和红军的重要领导干部，如何叔衡、贺昌、阮啸仙、刘伯坚、毛泽覃等在作战中牺牲，瞿秋白等被捕就义。少数突围部队转战至赣粤边、闽西等地，会同当地党组织与红军继续坚持斗争。至此，中央分局与中共中央及其所领导的其他地区失去了联系。

在中央苏区的红军游击队实行战略转变的同时，其他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也相继采取游击战形式与敌人进行斗争。以后，逐步形成了多块分散独立的游击区。

赣粤边游击区：1935 年 3 月，项英、陈毅等率部 300 余人，由中央苏区突围，后到达赣粤边的油山地区，与当地游击队会合。他们根据中共中央的 2 月指示，确定了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革命新高潮的斗争方针，在以油山为中心的赣粤边坚持以游击战争，先后挫败了敌人 3 次“清剿”，保存了革命力量。

闽西游击区：1935 年春，陈潭秋等率领从中央苏区突围的红 24 师余部 100 多人到达闽西，与当地红军会合，一起确立了坚持游击战争、保存力量、锻炼部队、等待时机以开展新局面的斗争方针。经半年多艰苦转战，粉碎了敌人 2 次大规模“清剿”。

1936 年初，当得知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指示后，红军游击队改称抗日讨蒋军，积极进行抗日宣传和统战工作，部队一度发展到近 2000 人。

皖浙赣边游击区：闽浙赣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余部转战赣东北和皖浙赣地区，会同其他各部红军游击队共同组成皖浙赣独立团，确定了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巩固以鄣公山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的斗争方针。后来，皖浙赣边的游击战争发展到 30 余县。到 1936 年底，游击武装已达 3000 余人。

鄂豫皖边游击区：红 25 军长征后，留在这一地区的红军组成红 28 军，依托大别山区坚持开展游击战争，打破了敌人的反复“清剿”，使游击根据

地的范围逐步扩大到近 50 个县，部队也发展到近 2000 人。

湘鄂赣边游击区：中共湘鄂赣省委书记陈寿昌率红 16 师余部，在平江、浏阳、铜鼓地区坚持斗争，多次取得对敌作战胜利，建立和巩固了以黄金洞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部队扩大到 5000 余人。后在敌人“清剿”中，部队遭受较大挫折。

闽赣边、闽粤边、浙南、闽北、闽东、闽中、湘赣边、湘南、鄂豫边和琼崖地区的红军游击队，也克服重重困难，顽强地与敌人进行斗争。

国民党军在对红军游击队和游击区反复“清剿”的同时，还从经济上进行严密封锁，企图将红军游击队饿死困死。各红军游击队在极端艰难条件下，风餐露宿，昼伏夜行，出没于崇山峻岭、密林树丛中与敌人周旋，终于粉碎了敌人的一次次“清剿”，使革命力量得以保存。

南方各地游击战的坚持与发展，对国民党军起了重要的牵制和消耗作用，支持和配合了主力红军的长征。

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全军准备对日作战

1935 年 11 月，红军第 2、第 6 军团从湖南桑植出发，开始长征。

在此之前，红 2、红 6 军团于 1935 年 1 月，初步建立了湘鄂川黔苏区，以坚决积极的战斗行动，打破敌军的“围剿”，牵制和消灭大量敌人，有力地支援了中央红军的长征。是年 2 月，国民党军以 10 万余兵力，对湘鄂川黔苏区发起“围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指示红 2、红 6 军团：“集中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的在运动中各个击破之”，特别强调：“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湘鄂川黔苏区成立了以贺龙为主席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分会，统一指挥红 2、红 6 军团作战。经过半年艰苦的斗争，先后取得陈家河、桃子溪、忠堡、板栗园等战斗胜利，粉碎了敌人的“围剿”。

同年 9 月，国民党军以 130 多个团的兵力，再次发动“围剿”。由于敌人兵力密集，堡垒封锁线层层紧逼，红 2、红 6 军团在内线寻机歼敌的计划未能实现。

11 月 19 日，红 2、红 6 军团主力 1.7 万余人，由湖南桑植突围开始长征。

1936 年 1 月中旬，红 2、红 6 军团在冲破敌人重重围堵后，进入黔东的江口、石阡地区。因当地不具备建立根据地的条件，又继续西进，于 2 月初进入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发动群众，积极开展抗日民主运动。继而，因国民党川、滇军队加紧“追剿”，红 2、红 6 军团于 2 月下旬进入乌蒙山区，与敌周旋。3 月底，红 2、红 6 军团到达盘县、亦资孔地区后，接到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治委员张国焘关于北上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指示，遂疾进滇西，抢渡金沙江，翻越大雪山，于 7 月到达甘孜。

这时，位于甘孜的红四方面军及红一方面军一部，在张国焘南下战略的危害下，屡遭挫败，损失过半。

1935 年 9 月，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后，张国焘不顾中央的一再命令和警告，不顾朱德、刘伯承等同志的反对，命令左路军和右路军第 4、第 30 军南下到天全、芦山、大小金川等地。

10 月 5 日，张国焘在理番县卓木碉（今马尔康县足木脚）宣布另立党的“中央”、“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并自封为党中央“主席”；狂妄

要求中共中央“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张国焘公开分裂党、分裂红军的行径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朱德、刘伯承等在艰难的处境下，与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为了贯彻其南下方针，从10月7日至11月25日，张国焘命令红军南下部队，先后进行了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和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由于红军广大指战员英勇奋战虽取得一些战果，但红军战斗力也遭受严重削弱。11月中旬，红军在名山县百丈地区陷入与优势之敌决战的被动局面，在伤亡严重的情况下，被迫转入名山西北地区。至此，张国焘的南下方针已完全失败。

名山西北的川康边地区为藏族居住区，民族隔阂很深，且人烟稀少，粮食缺乏，数万红军转战于此，粮食、物资补充十分困难，陷入绝境。这一切证明，党中央早先即提出的“向雅、名、邛、大南出，即一时得手，亦少继进前途”的警告是正确的。

1936年2月初，国民党军向川康边地区发起进攻。张国焘在南下失败后仍执迷不悟，决定部队西进，避开敌人的进攻。红军克服了天寒地冻，衣食不继等严重困难，翻越了海拔5000多米的折多雪山，于4月上旬到达甘孜地区。至此，南下红军的总人数已由出发时的8万余人，锐减至约4万人。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对红军南下部队始终十分关心，不断向他们通报各方面情况和敌情的变化，希望他们迅速北上，与党中央会合。

张国焘另立“中央”后，中共中央于1936年1月22日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责令张国焘立即取消其另立的“中央”，放弃一切反党倾向，并决定向全党公布俄界会议决定。24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即张浩）也致电张国焘，要其取消第二“中央”。红军南下部队的广大干部战士，从切身经历中认识了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强烈要求北上与党中央会合。

1936年7月，红2、红6军团抵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主力会师。7月5日，中革军委电令红2、红6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萧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所属第2、第6两军团建制不变，原红一方面军第32军（即红9军团）编入红二方面军。

朱德、刘伯承、贺龙、任弼时、关向应以及红四方面军一些领导同志，坚决拥护中央的正确路线和方针，对张国焘作了大量工作，维护了党和红军的统一团结。张国焘在南下失败、分裂活动不得人心的情况下，被迫取消其另立的“中央”并同意北上。

7月上旬，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开始共同北上。

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后，党中央极为关怀。7月27日，中央批准成立西北局，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统一领导两个方面军的北上行动。此后，两军过草地进入甘南。接着，根据党中央指示，红四、红二方面军先后发起了岷（州，今岷县）洮（州，今临潭）西（固，今舟曲）战役和成（县）徽（县）两（当）康（县）战役，控制了甘南广大地区，形成了与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师的有利态势。

为阻止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蒋介石命令胡宗南第1军由湖南兼程北返抢占西（安）兰（州）公路静（宁）会（宁）定（西）段，切断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通路。为打破敌人企图并为下一步夺取宁夏创造条件，9月中旬，中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以3个方面军协同组织静（宁）会（宁）战役。关键时刻，张国焘再次显露其分裂之意，声称：“我们大计，以快向西北进为宜”，督令红四方面军加紧进行西进青海和甘肃北部的准备，欲在西北另创一个局面。16日，中共西北局在岷州召开会议，否定了张国焘的西进主张，决定北上与党中央会合。可是，张国焘竟于20日推翻西北局决议，命令部队准备从兰州以西渡黄河西进；为向党中央封锁消息，还指令红军总部机关所有未经他签署的电报“一律不准发出”。朱德总司令在极困难的情况下向党中央报告了此事，明确表示坚决维护党中央制定的静会战役计划。

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得知这一情况后，接连致电张国焘指出：“我一、四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合则宁夏、甘西均可占领，分则两处均难占领，并且尔后会合将不可能，有一着不慎，全局皆非之虞”，强调“四方面军应即北上”。在朱德和红四方面军领导的坚持下，加上当时北渡黄河计划难以实现，张国焘才不得不同意红四方面军继续北上。

为了迎接红四方面军北上，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派出两个特别支队南下，先后攻占了会宁城、将台堡等地。

10月9日，红军总部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会宁、同红一方面军南下迎接的部队会师。于此同时，红二方面军经中央批准由两当、徽县北上，于22日到达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另一部会师。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宣告了长征的胜利结束。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革命与反革命两种力量，光明与黑暗两种命运的一场大搏斗，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伟大创举。长征中，红军以无与伦比的英雄气概，粉碎了国民党上百万军队的围追堵截，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跨越万水千山，取得了战略大转移的胜利。长征中，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党达到成熟。长征中，锻炼和考验了党和红军，播撒了革命的火种，使革命转危为安，由挫折走向胜利。经过长征考验的共产党和红军将士是党和军队的宝贵财富，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治党、治军、治国的骨干。长征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在全国人民中起了伟大的教育作用，使全国人民更清楚地看到，只有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长征使党的北上抗日战略方针得以实现，红军主力转移到抗日的前沿阵地，这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创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长征中，产生了伟大的长征精神：这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被国救民，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毛泽东曾经评刻地指出：“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

红军长征的经验是十分丰富的。它告诉我们：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

确领导，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长征中，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是长征取得胜利的最基本的原因。人民军队忠于党，枪杆子永远听从党指挥，这是长征中所积累起来的最重要的历史经验。必须从实际出发，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实行高度的机动作战。长征中，党和红军依据实际情况，数度调整战略方向，最终确定了将革命大本营奠基西北的战略方针。这对中国革命战争新局面的展开具有历史性的意义。长征中，各部红军实行高度灵活的机动作战，以己之长，克敌之短，扭转了长征初期的被动局面，使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终告破产，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大胜利。必须以大局为重，加强团结。长征的胜利，是全党全军共同奋斗的结果。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党全军和军民之间实现了革命大团结。主力红军各部的战略配合和坚强团结，参加长征的主力红军和未参加长征、在各地坚持斗争的红军和游击队的战略配合和坚强团结，党、红军和人民群众的坚强团结，都是长征胜利不可缺少的条件。必须坚持共产主义信念，发扬艰苦奋斗、一往无前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长征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与敌殊死搏斗的战争奇观，是人类征服自然的英雄凯歌。没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没有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长征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前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确定了宁夏战役计划，拟集中主力，向北发展，扩大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的西北革命根据地，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根据中革军委命令，10月24日，红四方面军第30军先期渡过黄河。25日，中央军委致电红军总部和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通告作战的两步重点。在关于红四方面军行动问题中，中央军委指示：以红9军以外之1个军继红30军渡河，两军迅速占领黄河弯曲处西岸大卢塘等地，并向中卫方向延伸；除两个军以外，尚余以红9军为中心的3个军与红二方面军主力一起对付南面敌人。但红四方面军总部却率第9军、5军先后渡河。

鉴于蒋介石以胡宗南部由南向北追击红军，以马步青、马鸿逵等部沿黄河防堵的情况，中央军委确定了“先打胡敌，后攻宁夏”的作战方针，以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刘伯承为参谋长，准备组织海（原）、打（拉池）战役，重点打击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

30日，彭德怀下令发起战役。可是张国焘却命令第4、第31军撤离前敌总指挥部指定的作战位置，致使海打战役未能实现。国民党军胡宗南部于10月底至11月初打通了增援宁夏的道路，将黄河东岸红军主力与河西部队的联系切断。这样，红军夺取宁夏的战役计划被迫中止执行。

11月下旬，中央军委乘胡宗南部孤军冒进，饥疲困乏之机，集中红一方面军主力和红四方面军一部，在红二方面军的配合下，举行山城堡战役，歼灭胡部1个多旅。胡宗南部遂停止了进攻。山城堡战役的胜利对于巩固陕甘宁苏区，促进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起了积极作用。

11月1日和2日，红四方面军领导致电朱德和张国焘并毛泽东、周恩来，请示河西部队行动。2日，毛泽东和周恩来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命令过河部队“暂以现地区为中心向三百扩大占领领域”。4日，红四方面军领导向朱德、张国焘提出，如情况不利时，他们将向大靖、凉州方向前进。5日，张国焘复电红四方面军总部，指示过河的部队“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7日，红四方面军总部致电党中央、军委和红军总部，建议组织党的西北前敌委员会和军委分会。8日，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复电红军总部和红四方面军总

部，同意河西部队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9日，红四方面军总部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河西部队称西路军，成立以陈昌浩为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的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指挥部队行动。此后，西路军开始西进。11月11日和12日，毛泽东，周恩来先后致电西路军和红军总部领导人，请他们考虑西路军“有单独前进接近新疆的把握否？如遇困难要重返河东时有可能否？”12日，西路军领导人复电中央军委和红军总部，表示“可以单独行动完成任务。”14日，张国焘指示西路军“须独立完成打通远方任务”。

15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西路军领导人，“同意你们向凉州进。”此后，西路军深入河西走廊地区，在与恶劣的自然环境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同时，与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敌人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浴血奋战，共计歼敌2.5万人。然而，在没有根据地依托，没有弹药、粮食及兵员补充和孤军作战的极端不利情况下，西路军最终失败。红5军军长董振堂、红9军军长孙玉清及政治委员陈海松等万余名指战员英勇牺牲。为营救处于困境中的西路军，中共中央曾多次向国民党当局交涉，并表示愿付重金争取马步芳、马步青停止对西路军的攻击；

1937年2月下旬，还组成以刘伯承为司令员的援西军前往增援。但这一切努力都没能达到预期结果。西路军失败后，中共中央利用统战关系，全力营救西路军失散人员，使数千名干部战士得以返回延安。西路军的失败，是红军史上悲壮的一页。那些为了革命事业，用生命与鲜血与敌人斗争的勇士，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以后，中国共产党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作了进一步的努力。1936年12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促进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期间，红军对爱国将领张学良部东北军、杨虎城部十七路军进行了积极而必要的支援。1937年1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由保安移驻延安，红军主力进驻三原、淳化、耀县一带。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提出五项要求四项保证。在国内外形势推动下，国民党政策开始转变，国内和平基本实现。

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下，红军力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转变，为准备对日直接作战，从政治、思想、组织、军事多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准备。全军加紧形势教育和军事训练，使军政素质不断提高；通过对王明“左”倾错误、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的批判，政治觉悟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全军的团结进一步加强。到1937年7月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前，陕甘宁边区（后改为特区）面积已达13万平方公里，人口约200万，红军总数也增加至7.4万人。

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还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加强对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的领导，使他们尽快了解瓦窑堡会议后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并通过错综复杂的谈判斗争，打破国民党当局“北和南剿”的阴谋，迫使其最终承认了南方各游击队的合法地位。到全国抗战爆发后，南方8省红军游击

中国共产党要求国民党：一、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自由，释放政治犯；三、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准备；五、改善人民生活。如果国民党确定上述五项国策，中国共产党保证，一、停止推翻国民政府的暴动；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指导；三、在特区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队集中时，总数达 1 万多人。南方各省的游击根据地也发展成为抗日战争的若干战略支点。

土地革命战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主要依托，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以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的，一次极其深刻极其残酷的阶级战争。

土地革命战争历经 10 年。在这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各地武装起义，创建了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了游击战争和以运动战为主的反对国民党军大规模“围剿”的战争；在王明“左”倾错误占据党内统治地位，反“围剿”失败后，举行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实现了三大红军主力在西北会师；以后又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实现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战略转变。这场战争中，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不但形成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而且形成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开创了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确立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形成了人民战争思想及其战略战术。在艰险曲折的斗争中，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锻炼出一支不怕任何艰苦、英勇善战的新型的人民军队，造就了一大批善于治党、治国、治军的骨干。这些历史性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以自己的英勇奋斗，以几十万党员和红军指战员的流血牺牲所获得的。它不仅使土地革命战争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而且为取得抗日民族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人民军队从无到有，逐步成长并开始走向成熟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经验是：进行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必须创建一支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新型的人民军队；必须认清中国革命的规律，从中国革命的特点出发，走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必须实行人民战争，有一整套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

第二章 抗日战争的主力军

一、全国抗战爆发，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制造九一八事变，开始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导致东北三省在四个多月里迅速沦丧。1933年初，日军开始将侵略魔爪伸入关内，侵吞了热河省。

1935年，日本又采用所谓“谋略”手段，以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运动”的方式开始对华北进行渗透，迫使国民党政府签订《秦土协定》、《何梅协定》等屈辱条约，攫取了华北大部主权，这就是日本企图变华北为第二个满洲国的华北事变。

日本侵华战争引起的中日民族矛盾，由于华北事变而严重激化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形成高潮。国内政治格局也因此而开始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这是关于建立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一个崭新纲领，又称《八一宣言》。《八一宣言》果断放弃了中共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一直执行的左倾关门主义的“反帝下层统一战线”策略，首次提出了建立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主张。同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正式将“反帝下层统一战线”策略发展为反日反蒋、上层与下层双管齐下的统一战线策略。基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1936年9月，中共中央又发布《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毅然放弃反蒋方针，确立了“逼蒋抗日”的新方针。

华北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咄咄逼人的、无止境的侵略扩张，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力倡导，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日益高涨，以及国民党内部抗日派力量的不断增长，迫使国民党政府的对日政策逐步由妥协向抗日方向转化。尤其是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结束了持续多年的内战局面，大大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进程。

1937年2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虽然重弹了反共的老调，但在实际上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这标志着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中国政局的变化，使日本侵略者感到，单凭“谋略”手段难以达到征服中国的目的，于是将对华政策由以“谋略”为主转变为以武力征服为主。日军参谋本部制定的1937年度对华作战大纲计划以14个师团的兵力，占领中国华北、华中、华南地区，一举灭亡中国。

1937年1月，参谋本部又提出建议：不再以“谋略”手段进行华北“分治”工作，“真的到了不得已时，经过最大的忍耐后，准备给予致命的痛击”。为此，日本加紧了全面侵华战争的准备。一方面大量增加军事工业投资，加速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另一方面，大幅度增加直接军费拨款，使日军总兵力和武器装备水平迅速提高。

日本侵华策略的转变和战争准备的加强，预示着一场规模空前的全面侵华战争已不可避免。

1937年7月7日夜，在北平西南卢沟桥附近演习的日军，以一名士兵失踪为由，向当地中国驻军宋哲元第29军发动进攻，29军奋起抗击。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七卢沟桥事变。

七七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29军的奋起抗击则标志着中国人民全国抗战的开始。中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在这场全面侵华战争中，日本帝国主义的如意算盘是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速战速决，一举灭亡中国。为此，日军于7月底攻占北平、天津后，又以平津为出发地，调集30万大军，沿津浦、平汉、平绥三大铁路线向华北腹地展开战略进攻。8月13日又制造八一三事变，在上海燃起战火，矛头直指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南京，企图迫使中国屈服。

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重危险。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迅速作出了反应。卢沟桥变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发表通电，向全国人民呼吁：“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紧接着，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致电蒋介石，要求全国总动员，并代表全体红军将士请缨杀敌，表示愿“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7月14日，又派在西安的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向南京政府表示：“愿在蒋指挥下努力抗敌，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动，同意担任平绥线国防。15日，中共代表周恩来在庐山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递交蒋介石。《宣言》强调，“在民族生命危急万状的现在，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宣言》还郑重声明，愿为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取消苏维埃政府，改称特区政府；取消红军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准备随时奔赴抗日前线；在特区内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和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17日，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继续同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张冲、邵力子举行谈判。中共方面提议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作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并商定宣言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

在全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内抗战派的积极推动下，蒋介石于7月17日发表“庐山谈话”，指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但此时蒋介石并未完全放弃对日媾和的幻想，表示仍“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把中共的提议搁置起来。

八一三事变的爆发给国民党当局以极大震动，这表明不仅卢沟桥事变失去了和平解决希望，就连国民党自己统治的心脏地带也变得岌岌可危了，国民党当局遂于8月14日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宣布：“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这表明，国民党政府决心实行全国抗战。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274、278页，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274、278页，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毛泽东等致叶剑英电，1937年7月14日，中央档案馆藏。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终于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又发表了《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申明国共合作、团结御侮的必要性，并指出：“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事实上承认了中共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共产党《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是关系抗日战争前途的至关重要的事件。它的形成，使得联合全国各种抗日力量进行抗日战争成为可能。尽管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缺乏具体的组织形式和共同承认的政治纲领，然而它仍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政治基础。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

取消红军番号，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难关头为促成国共合作而向国民党作出的重大让步之一。早在1935年底、1936年初国共两党的最初接触中，已涉及这个问题。后来的国共正式谈判更将红军改编问题视为焦点。国民党当局力图通过谈判来削弱红军和取得对红军的指挥控制权。为此，蒋介石只同意红军保留3000人，后又加至5000人、1万人、1.5万人，并要求师以上将领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按材录用，各师之参谋长与师内各级副职，皆由国民党派充。中共对此苛刻条件当然不能同意。由于中共方面的据理力争，国民党始同意红军编3个师，共4.5万人，但不能设独立的指挥部，且须由国民党派员担任要职。中共坚持设置独立的指挥部，并拒绝国民党当局派员来红军任职，但同意国民党派联络人员，以便协同作战。由于国民党当局坚持其无理要求，谈判未能达成协议。

八一三事变爆发后，蒋介石急欲调动红军开赴前线参战，因而被迫同意红军设置独立的指挥部和不向红军派遣国民党人员，一直悬而未决的红军改编问题终于得到解决。8月22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宣布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改编令，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及陕北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编为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下辖3个师和总部直属队：第115师，由红一方面军之第1、第15军团及陕南红军第74师编成，林彪任师长，聂荣臻任副师长，周昆任参谋长，罗荣桓任政训处主任、萧华任副主任，辖第343旅、第344旅和独立团、教导队、骑兵营、炮兵营、辎重营等部。全师共1.55万人。

第120师，由红二方面军之第2、第6军团和陕北红军第27、第28军及独立第1、第2师，赤水警卫营、总部特务团各一部编成，贺龙任师长，萧克任副师长，周士第任参谋长，关向应任政训处主任、甘泗淇任副主任，辖第358旅、第359旅及教导团、骑兵营、特务营、炮兵营、工兵营、辎重营等部。全师共1.4万人。

第129师，由红四方面军之第4、第31军，陕北红军第29、第30军和陕甘宁独立第1至第4团及第15军团之骑兵团等部编成，刘伯承任师长，徐向前任副师长，倪志亮任参谋长，张浩任政训处主任、宋任穷任副主任，辖

第 385 旅、第 386 旅及教导团、骑兵营、特务营、炮兵营、工兵营、辎重营等部。全师共 1.3 万余人。总部直属队，3000 余人。全军共 4.6 万人。

为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安全，中共中央军委于 8 月 25 日决定，从第 115、第 120、第 129 师各抽调一部共 9000 余人，组成直隶中央军委的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萧劲光任主任。

1937 年 9 月 11 日，按全国统一的战斗序列，八路军改番号为第 18 集团军，朱德、彭德怀由正副总指挥改称正副总司令，但八路军的称呼仍被广大指战员和人民群众习惯地沿用下来。同年 12 月，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改称八路军留守兵团，萧劲光任司令员（后兼政治委员），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后曹里怀任参谋长。

红军主力改编完成后，国共双方又就南方八省红军和游击队的改编达成协议。10 月 12 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将南方八省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任命北伐名将叶挺为军长。尔后，由中共中央提名经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核定，又任命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周子昆为副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为副主任。

1937 年 12 月 25 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1938 年 1 月 6 日移驻南昌。2 月上旬，军部命江南各游击队开赴皖南岩寺集结整编，江北各游击队分别在湖北黄安（今红安）七里坪和河南确山县竹沟集结整编。全军编为 4 个支队：

第 1 支队，由湘鄂赣边、湘赣边、粤赣边、赣东北等地游击队编成，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下辖第 1、第 2 团，共 2300 余人。

第 2 支队，由闽西、闽赣边、闽南及浙南等地游击队编成，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下辖第 3、第 4 团，共 1800 余人。

第 3 支队，由闽北、闽东游击队编成，张云逸兼司令员，副司令员谭震林，下辖第 5、第 6 团，共 2100 余人。

第 4 支队，由鄂豫皖边红军第 28 军、豫南桐柏山游击队等部编成，司令员高敬亭，下辖第 7、第 8、第 9 团和手枪团，共 3100 余人。军部机关、特务营 980 余人。

全军共 1.03 万余人，装备各种枪 6200 余枝（挺）。

红军改编是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的历史事件。改编的完成使国共两党具备了实现合作的一个必要条件，同时也使红军更加适合于国共合作和民族解放战争的新形势。然而，改编并不意味着红军的性质有任何变化，红军的名称虽然取消了，但八路军、新四军仍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这一点并未因改编而改变。为了祖国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广大红军指战员脱下心爱的八角帽，换上了国民革命军军服，准备奔赴抗日的战场。

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战略总方针

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华战争使中日民族矛盾空前激化，中华民族被推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除极少数民族败类之外，几乎所有炎黄子孙都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抗日救亡的道路。因此，七七事变后中国人民面临的主要问题已不是应否抗战的问题，而是如何抗战的问题。但是在这方面，国共两党存在着严重分歧。

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尤其八一三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政府改变了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对日不抵抗主义和“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开始了与共产党的团结合作和大规模对日作战。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但是，由于国民党囿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一方面不相信人民群众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力量源泉，另一方面对人民群众怀有很深的疑忌心理，生怕人民群众动员起来会危及其统治地位，这就决定了国民党在如何抗战的问题上必然推行单纯由政府 and 军队抗战的片面抗战路线，对共产党和人民抗战力量总是千方百计地予以限制甚至打击。而推行片面抗战路线的结果，不仅极大地制约了国统区抗日力量的发展，也导致了正面战场的屡屡失利，于是国民党只能将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外国援助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上。但事实上，抗战期间同盟国对中国的援助是十分有限的，蒋介石期待已久的美英对日战争直到1941年底才宣告爆发，至于苏联的对日宣战更是姗姗来迟，直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前夕才得以实现。对内不愿意也不敢于发动人民群众，对外又争取不到及时有力的援助，这就是国民党长期对日采取两面政策——一面实行抗战，一面谋求妥协的基本原因。

中国共产党的情形与国民党根本不同。她代表着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信奉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相信战争的伟力存在于民众之中，她认识到在落后的半殖民地中国同强大的帝国主义日本之间的战争中，如果不发动群众就不可能赢得抗战的胜利，因此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明确提出了与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截然不同的全面抗战路线。

毛泽东在1937年7月23日发表的《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自信地指出：“民力和军力相结合，将给日本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民族战争而不依靠人民大众，毫无疑问将不能取得胜利。”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西洛川冯家村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深刻分析了抗日战争面临的形势，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全面抗战路线。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也指出：卢沟桥抗战已经成了全国抗战的起点，从此开始了实行抗战的新阶段；这一新阶段内的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是使业已发动的抗战发展成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胜利。由此可见，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与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不是将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外国援助上，而是寄希望于中国人民自身的抗战；不是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抗战，而是要求最广泛地动员民众，唤醒千百万民众加入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使已经发动起来的抗战发展为真正的人民战争。为此，中国共产党要求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必要的政治经济改革，废除一党专政，给人民以充分的抗日民主权利，并努力改善工农大众的生活。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是中国共产党对全面抗战路线的具体阐述，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全国军事的总动员；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抗日的外交政策；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改良人民生活；抗日的教育政策；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抗日的民族团结。由十大纲领具体体现的全面抗战路线，高举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旗帜，以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为最高利益，同时又

《毛泽东选集》，第2卷，347页。

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324~326页。

与社会解放有机地结合起来，反映了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和迫切要求，因而得到全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和支持。

抗日战争不仅需要正确的政治路线，同样也需要正确的战略方针。这个战略方针就是持久战。持久战的基本内涵是，通过持久的抗战，不断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同时集聚自身的力量，并争取国际的援助，最后夺取抗战的胜利。

早在 1935 年 12 月的瓦窑堡会议上，中共中央就号召全党“为着同敌人作持久战而准备自己的艰苦工作罢”。在会后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毛泽东强调：“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在洛川会议上，张闻天指出：争取抗战胜利，这是艰苦、持久、变化很多的斗争过程，要准备持久战争。毛泽东进一步分析了中日两国各方面情况，说明这些情况规定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不是速决战，其结果是中国胜利。朱德早在会前就著文指出：抗战“将是一个持久的艰苦的抗战”。听了张闻天、毛泽东的发言，他补充说，持久战不能单凭消耗，主要是发动群众，中心摆在支持华北的持久战，重点争取大行山及其以东地区。周恩来赞同朱德的意见。

洛川会议后，张闻天在《解放》周刊上专门发表了《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持久性》一文，通过中日两国人力、物力、军力、国内矛盾、国际关系以及战争性质等因素的对比，说明日本很难实现速战速决的战略，中国也很难在短时间内战胜日本，中日两国的战争将带有持久的性质，中国必须用持久战以战胜日本。战后，彭德怀和周恩来又分别在《解放》周刊上发表《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先决问题》和《怎样进行持久抗战》等文章，对持久战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国民党的有识之士虽然也主张实行持久抗战，但国民党内部在持久战问题上并未取得共识。全国抗战开始以前，国民党营垒中就有人宣扬“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全国抗战开始后，他们又散布“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再战必亡”的论调。南京失陷后，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更加起劲地鼓噪“亡国论”和民族失败主义。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人抱有毫无根据的“速胜论”观点，盲目地认为，最多只要打三个月，国际形势一定发生变化，英美干预，苏联出兵，战争就可以解决。特别是台儿庄大捷后，一些人被局部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认为徐州会战是与日军的“准决战”，“这一战就是敌人的最后挣扎”，抗战胜利指日可待。但随着徐州的沦陷，速胜论消失了，亡国论再次抬头。

为了驳斥亡国论和速胜论的滥调，全面深入地阐明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坚定抗战军民的胜利信心，毛泽东以其科学的理论思维，结合抗战十月的经验教训，并集中全党全军的智慧，于 1938 年 5 月发表了《论持久战》。

在这篇著名的论文中，毛泽东深刻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在这场战争中，中日双方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0 册，603 页。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153 页。

张闻天在洛川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 年 8 月 22 日。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发言均据 8 月 24 日的会议记录。

张闻天、彭德怀、周恩来的文章分别载于《解放》周刊第 1 卷，第 17 期、第 25 期、第 30 期。

存在着相互矛盾着的四十基本特点：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即是说，日本是一个帝国主义强国，其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强的，但其国小、地小、物少、人少、兵少，加之战争的非正义性、野蛮性，必然夫道寡助；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但处于进步时代，有共产党及其军队作为团结抗战的核心，加之地大物博，人多兵多，以及战争的正义性，必然能唤起全民族的空前团结，并得到国际的援助。这些特点从根本上规定了中日战争必将是一场持久战，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是日本。“亡国论”者只看到敌强我弱的不利方面，而看不到其他的有利方面；“速胜论”者则只看到有利方面，不承认敌强我弱这一特点，因而都是战争问题上的唯心论和机械论者。

毛泽东的更高明之处还在于他根据中日双方的基本特点、力量对比及其发展趋势的深入分析，科学地预见到持久抗战将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战略防御阶段。日军凭借其军事优势大举进攻，占领中国的许多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但由于其兵力不足，中国的游击战争乘着敌后空虚将有一个普遍的发展，该阶段中国虽有颇大的损失，但也有颇大的进步，这种进步就成为第二阶段继续抗战的主要基础。第二阶段是战略相持阶段。由于敌之兵力不足和我之坚强抵抗，日军在第一阶段末期不得不停止其战略进攻，转入保守占领地。这个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是敌强我弱形势转变的枢纽。相持阶段是相当长的，战争将是残酷的，中国将会遭到严重破坏，但游击战争能够胜利。中国如能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持久战，将在此阶段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从而完成战略反攻的准备。第三阶段是战略反攻阶段。收复失地主要地依靠中国自己不断增长的力量，同时辽须依靠国际力量和敌国内部变化的援助。根据中国政治、经济的不平衡状态，战略反攻在其前一时期将不是全国整齐划一的姿态，而是带地域性和此起彼落的姿态。

关于如何进行持久战，并夺取最后胜利的问题，《论持久战》首先指出：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解放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全国人民的总动员，离不开广泛的人民战争。“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只要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困难的前提”。其次，《论持久战》进一步提出了坚持持久战总方针所应采取的具体作战方针与原则，即：在战略上是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在战役战斗上必须实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变战略上的劣势为战役战斗上的优势；而实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又必须发挥组织指挥上的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在作战形式上，要根据战争发展的不同阶段，正确地运用运动战，游击战和阵地战三种不同形式。就全国抗战来说，战略防御和战略反攻两个阶段是以运动战为主，以游击战与阵地战为辅，而战略相持阶段则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与阵地战辅之。

《论持久战》的分析与论断，几乎完全被后来的战争实践所证实。

《论持久战》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分析解决战争问题的典范，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它从理论上彻底批判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观点，指明了持久抗战的胜利前景，并且从战略、战役和战术各个层次上提出了一整套克敌制胜的切实可行的办法。

在全国抗战开始不久，许多人对战争前景感到茫然的情况下，《论持久战》清晰而有说服力地描绘出抗战全过程的完整蓝图，解答了人们头脑中关

于这场战争的种种疑惑，这对于统一中国共产党乃至全国人民的战略思想，坚定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真正确立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二、挺进敌后，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

从1937年7月至1940年底，是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上升阶段。这一时期，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挺进华北、华中敌后，执行中共中央制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实现了由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军事战略转变，成功地开辟了华北、华中敌后战场。进入相持阶段后，八路军、新四军分别完成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赋予的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使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和自身实力进一步发展壮大，敌后战场逐渐上升为抗日战争的主战场，人民抗日武装成为全国抗战的主力军。在此基础上，八路军发起百团大战，予敌重创。

华南和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作为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两翼，也发挥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方针与军事战略转变

全国抗战开始后，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所面临的政治军事形势已同国内战争时期迥然不同，新的敌人是日本军队，旧的敌人成了友军，作战地域是以前几乎未曾涉足的华北（后来又发展到华中、华南）。这些新的情况和新的变化迫切要求人民军队提出适应新形势的新的战略方针。

毛泽东对此极力重视。他在1937年8月1日致周恩来等人的电报中指出：我军新的战略方针应是“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在8月下旬的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强调我军的战略方针应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并解释说：所谓“独立自主”，是指在统一战线和战略方针共同商量的条件下的相对独立自主的指挥；所谓“山地”，是指首先在山区创造根据地，依托山地开展游击战争，并向平原发展；所谓“游击战争”，是指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在人民军队兵力有限，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斗争形势错综复杂的背景下，毛泽东提出的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无疑是正确的。但在日军长驱直入，华北战局危急之际，八路军如不适当集中兵力进行一定数量的运动战，就不可能较多地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和解救华北危局，也不易树立党和八路军的威信。因此，一些军委领导人和八路军将领提出了打“运动游击战”或“游击运动战”的意见。毛泽东充分考虑了这些意见之后，在同年12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表示：人民军队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一部，这是对洛川会议提法的补充和完善。

后来，毛泽东又在《论持久战》中更为明确地提出，八路军（当然也适用于新四军）的战略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是关于我军战略方针的完整、准确和简练的表述，至于“山地”二字的删除，是因为此时八路军已成功地将游击战争推向了冀鲁平原，“山地”已不足以涵盖八路军的游击战争。

“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很好

地解决了分散兵力进行游击战和集中兵力实行大兵团作战的关系，解决了保存自己和消灭敌人的关系，是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以我之长击敌之短，保存和发展自己，打击和消灭敌人的最佳战略。

要使新的战略方针真正得到确立和贯彻，不仅要求对这一战略方针进行科学的阐述和宣传，而且必须全面实行全党全军的军事战略转变，即由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转变。洛川会议及时提出了这个问题，要求红军把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集中使用的正规军，转变为抗日战争中分散使用的游击军；把国内革命战争的运动战，转变为抗日战争的游击战，只有如此，才能同新的敌情、友情、我情以及新的任务相适应。实践证明，实行由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军事战略转变，是中国共产党深刻洞察抗日战争全局面作出的英明决策，这一转变的成功与否不仅关系着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前途，而且极大地关系着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和发展，关系着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

但由于这个战略转变在现象上表现为一个倒退的转变，因此党内军内许多干部对此不甚理解，思想上仍倾向于集中兵力打运动战，轻视游击战的作用，有些人甚至将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军的正规战。为了使全党全军正确认识游击战争的极端重要性，推动军事战略转变的顺利完成，毛泽东在致八路军前方将领的电报中一再强调，只有游击战争才是八路军的“拿手好戏”，“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后来，毛泽东又于1938年5月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在这篇与《论持久战》齐名的著名论文中，毛泽东着眼于中日战争的全局，从战略高度考察了抗日游击战争在持久战中的特殊战略地位。他指出：在敌小我大，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侵略我被侵略的情况下，敌人占地甚广的现象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发生了。由于日军兵力不足，其占领区必然有许多空虚的地方，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即在敌后单独作战。并且，由于有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广泛参加，抗日游击战争就不是小规模而是大规模的。于是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一整套的东西发生了，由于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于是根据地问题和向运动战发展等问题也发生了。这样，抗日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归纳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六大战略纲领：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和正规战争相配合；建立根据地；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向运动战发展；正确的指挥关系。这六条，是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配合正规战争，争取最后胜利的必由途径。

游击战争古已有之，但它通常只是正规战的辅助形式，起战役战术的配合作用。毛泽东根据抗日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把抗日游击战争放在战略地位来考察，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全党全军对游击战争重要性的认识，有力地推动了全党全军由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转变。

在这个问题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先后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中若干基本问题》、《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的任务》、《论抗日游击战争》等文章，深入阐明党的游击战的战略方针

和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对于统一全党全军认识，促成战略转变的顺利实现，发挥了重要作用。

开辟敌后战场

七七事变后，华北日军迅速攻占了北平、天津，尔后以平津为出发地，投入 30 万兵力，沿津浦、平汉、平绥三大铁路线向华北腹地展开战略进攻。国民党军虽然进行了抵抗，但屡战屡败，节节退却，华北战局危急。

为解救华北危局，八路军三个师不待改编就绪，即誓师出征，于 1937 年 8 月 22 日至 9 月 30 日先后由陕西省三原、富平县经韩城地区东渡黄河，挺进山西抗日前线。此时，山西前线的国民党军正在纷纷退却，八路军的英勇挺进与友军的败退形成鲜明对照，因而八路军所到之处无不受到当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人民将希望寄托在八路军的身上。

八路军没有辜负民众的期望，进入山西不久便取得了震惊中外的平型关大捷。

八路军 115 师于 9 月中旬开抵晋东北地区。9 月 22 日，日军第 5 师团第 21 旅团一部从灵丘向平型关方向进犯。八路军总部即令第 115 师侧击该敌。9 月 24 日夜，林彪、聂荣臻率第 115 师主力冒雨设伏于平型关东北公路两侧高地。

25 日 7 时许，日军进入伏击地域，第 115 师发起突然攻击。经整日激战，歼灭日军 1000 余人，击毁汽车 100 余辆、马车 200 辆，缴获长短枪 1000 余枝，还有一些机密文件，其中包括一幅标有日军华北作战计划及目标的日文地图。

平型关大捷是卢沟桥事变以来中国军队对日作战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并且，这个胜利是在日军长驱直入，友军节节败退，华北战局危急的形势下取得的，因此沉重打击了日军的疯狂气焰，粉碎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捷报传出，举国欢腾！向八路军致敬和慰问的电报、函件，如雪片似地飞向延安和八路军总部。

由于日军突破国民党军晋北防线，直趋太原，国民党军在太原以北忻口一带组织防御。八路军以机动灵活的游击战配合友军进行忻口战役。

10 月间，120 师在雁门关南北频繁设伏，歼敌数百人，击毁日军汽车、坦克、装甲车 50 多辆，切断了大同至宁武、忻口的交通线。10 月 19 日夜，第 129 师第 769 团夜袭代县阳明堡日军机场，击毁敌机 20 余架，大大削弱了日军进攻忻口的空中力量。至此，八路军三十师均首战告捷。

在八路军的有力配合下，国民党军成功地将日军阻于忻口以北。日军正面进攻不逞，遂改取迂回战术，另派两个师团沿正大路攻击晋东娘子关，以配合正面部队夺取太原。八路军主力遂南下正大路娘子关附近地区，配合友军阻止日军西犯。10 月底至 11 月初，八路军各师连续取得长生口、七亘村，黄崖底和广阳伏击战的胜利，以伤亡 300 余人的代价，取得歼灭日军 1800 余人的胜利，显示了坚强的战斗力。忻口战役国民党军指挥官卫立煌将军对八路军的英勇善战十分钦佩，他说：“八路军确实是抗日的，是复兴民族的

最精锐的部队。”

忻口战役是抗战初期华北战场上规模最大、战绩最佳的战役。此役，正面友军英勇作战，坚守阵地达 21 天之久，八路军的有力配合是他们取得成功的不可或缺的因素。

晋东娘子关失守后，忻口正面友军腹背受敌，被迫南撤。

11 月 8 日，太原失陷。由于国民党军纷纷南撤，华北的主要交通线和黄河以北大部地区被日军占领。从此，在华北以国民党军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宣告结束，以八路军为主体的游击战争上升为主要地位。八路军结束了直接配合友军作战的阶段，转而根据洛川会议的决定，挥师挺进日军后方，开辟敌后战场，主要从战略上配合国民党军作战。

于是，华北战场就出现了一种奇特的景观：日军大举进攻，步步进逼；国民党军屡战屡败，节节后退；八路军则挺进日军后方，开辟抗日战场。

到敌人后方去，开辟敌后战场，这就使中国抗日战争形成了相互配合的两个战场：一个是由国民党军队担负的正面战场，另一个则是由共产党军队开辟的敌后战场。之所以会出现如此独特的战略布局，主要因素是：第一，政治上的必然性，众所周知，民族利益的一致性促使国共两党停止了内战，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阶级利益的下一致性又使统一战线内部矛盾丛生。国民党顽固派居心叵测，无时无刻不在图谋借抗日之机削弱乃至消灭共产党。这就迫使共产党不得不实行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到敌人后方去独立自主地开辟抗日战场。第二，战略上的必要性。在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下，要扭转敌我力量对比，摆脱战略上的被动地位，争取战争主动权，最好的办法就是从正面与敌后对日军实施战略夹击，变战略上的内线为战略上的外线，变战略上的被包围为战略上的反包围。第三，客观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敌之侵略的野蛮性，我之反侵略的正义性，必定唤起民众助我抗战，在敌后亦下例外；另一方面，敌以少兵临大国，必定顾此失彼，其占领区虽大，却因兵力不足只能控制点线，这就为开辟敌后战场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第四，主观的能动性。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对中日战争的特点与规律有着正确的认识和科学的把握，与人民群众有着密切的血肉联系，并且在以往的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的游击战争和建立根据地的经验，这一切都是开辟敌后战场的有利因素。

所谓开辟敌后战场，就是挺进敌后，建立根据地，并以根据地为依托，开展抗日游击战争。那么，八路军是如何开辟敌后战场的呢？

八路军向敌后挺进的目标首先指向了山区。山区具有自然屏障，有利于八路军的隐蔽与机动，却不利于日军机械化优势的发挥，因此毛泽东从全国抗战一开始就强调要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并确定八路军集中向冀察晋绥四省交界的恒山地区挺进。但鉴于日军的战略计划是以大迂回的姿态包抄太原，为避免陷于日军迂回包围之中，毛泽东早在平型关战斗之前，即果断变更部署，改集中配置为分散配置，指示八路军各师分别转至山西四角的管涔山、吕梁山、恒山南段和太行、大岳山脉。太原失守后，八路军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示，向山西四角实施战略展开，创建山区抗日根据地。

第一个山区抗日根据地是聂荣臻领导创建的以恒山山脉为依托。以五台山区为中心的晋察冀边抗日根据地。平型关战斗后，第 115 师副师长聂荣臻

奉命率该师独立团、骑兵营等部约 3000 人挺进晋察冀交界地带的五台山区。同年 11 月 7 日成立了八路军晋察冀军区，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次年 1 月中旬又在河北阜平选举产生了第一个边区抗日民主政权——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这标志着八路军第一个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抗日根据地正式形成。

晋察冀根据地的开辟，对天津、石家庄、太原等地日军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在晋察冀根据地尚未完全形成之际，日军便调集 2 万余人，于 1937 年 11 月对根据地实行八路围攻，企图将根据地扼杀在摇篮之中。晋察冀军区部队与地方武装相结合，广泛开展游击战，集中力量打击敌之一路。经一个月作战，歼灭日军 2000 余人，粉碎了敌之围攻。

在晋察冀根据地之后陆续建立的山区抗日根据地，还有贺龙、关向应领导第 120 师创建的以管涔山为依托的晋西北根据地；刘伯承、张浩领导 129 师创建的以太行、太岳山脉为依托的晋冀豫边根据地；罗荣桓领导 115 师主力创建的以吕梁山脉为依托的晋西南根据地。日军对这些根据地同样进行了大举围攻，根据地军民奋起反击。其中，第 120 师于 1938 年 2 月至 4 月粉碎日军五路围攻，歼灭日军 1500 余人，一举收复宁武、神池等七座县城。1938 年 4 月，第 129 师在国民党友军配合下粉碎日军对晋东南的九路围攻，歼灭日军 4000 余人，长乐村一战歼灭日军 2200 余人。第 115 师于 1938 年 3 月取得隰县午城、蒲县井沟战斗的胜利，歼敌 1000 余人。

从平型关首战告捷到 1938 年 4 月，八路军在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情况下，英勇作战 500 多次，歼敌 3 万余人，不仅有力地配合了友军作战，而且完成了在山西四角的战略展开，创建了四个山区抗日根据地，使八路军成功地在山区站稳了脚跟。山区抗日根据地的创建标志着华北敌后战场初步形成。

八路军进入山西之后，山西人民抗日武装得到迅速发展。中共山西省工作委员会薄一波等人以牺盟会负责人名义与阎锡山商定，帮助其建立新军。新军全称“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实际上是中共山西省工作委员会组建和领导的一支革命军队。

1937 年 8 月 1 日，决死队第 1 总队（相当于团）成立，随后又建立了第 2、第 3、第 4 总队。不久，又由 4 个总队发展为 4 个纵队（相当于旅），另外还组建了工人武装自卫总队，政治保卫队第 209、第 212、第 213 旅和暂编第 1 师等部。总兵力达 5 万余人。这支部队与八路军协同作战，对山西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和山区根据地的创建与巩固，均发挥了重要作用。1939 年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一次反共高潮后，山西新军正式加入八路军序列，完全成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

七七事变后，中共领导的冀鲁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也蓬勃发展起来。在河北，中共保属省委于 1937 年 9 月保定失陷后，发动群众，组成河北游击军。10 月，国民党军第 53 军第 691 团在团长、共产党员吕正操率领下，拒绝南撤命令，返回冀中，改称人民自卫军，与河北游击军共同开展抗日斗争。此外，平西、冀东地区也建立起人民抗日武装。

1938 年春，陈再道、宋任穷先后率 129 师一部进入冀南，建立了以南宫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成立了冀南军区。

在山东，中共山东省委发动和领导了冀鲁边、鲁西北、天福山、黑铁山、徂徕山等十大抗日武装起义，建立了十支较大的抗日武装，共 4 万多人，并

在全省十几个地区建立了抗日游击根据地。

河北、山东地区人民抗日武装的建立和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为八路军由山区向平原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两省人民抗日武装自身由于缺乏战斗骨干，也亟待八路军主力部队的支援和加强。

鉴于山区根据地已初步巩固，而冀鲁平原抗日游击战争亟待加强，以及日军华北方面军主力南下进攻徐州地区友军等情况，为进一步发展平原游击战争，以钳制和打击敌人，配合正面战场友军的作战，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于 1938 年 4 月 21 日向八路军总部发出关于开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指出：根据抗战以来的经验，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开展与坚持抗日游击战争是可能的；党和八路军应采取广泛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尽量发动广大群众走上公开的武装斗争，并划分若干军区、分区，有计划有系统地发展游击战争，广泛组织不脱产的自卫军；在收复的地区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八路军总部随即作出统一部署：令徐向前率 4 个团兵力由太行山区挺进冀南，会同先期到达的宋任穷、陈再道部巩固扩大冀南根据地；令 120 师雁北支队和晋察冀军区一个支队组成第 4 纵队，挺进冀东；令河北游击军与人民自卫军台编为第 3 纵队，发展冀中抗日斗争。

经过几十月的艰苦奋斗，挺进冀鲁平原的各部队在当地人民武装的配合下，不仅巩固扩大了冀南根据地，辽开辟了冀鲁边、冀鲁豫、冀中根据地；与此同时，山东各支人民抗日武装也整编为统一指挥的游击兵团——八路军山东纵队。

至此，华北敌后的抗日根据地已由山区扩展到平原，初步形成山区与平原相互依存、相互策应的广阔的敌后战场。

在八路军一部东下平原的同时，坚持在山区的八路军主力英勇地保卫和发展了山区根据地。

1938 年 9 月中旬至 11 月上旬，晋察冀军区与 120 师主力历经 48 天作战，成功地挫败了日军 5 万余人对晋察冀根据地中心区的大规模围攻，歼敌 5200 余人。其中第 120 师第 358 旅的滑石片一战歼敌 500 余人。同年 9 月中旬，第 115 师第 343 旅优击沿汾离公路来犯之敌，三战三捷，歼敌 1200 余人，迫敌回撤，保卫了陕甘宁边区的安全。9 月下旬，第 120 师第 358 旅政委李井泉率领大青山支队挺进绥远，将游击烽火燃到了大青山区。

在华中地区，八一三事变后日军于 11 月 12 日攻占上海，12 月 13 日占领南京，并在南京进行了长达六周的血腥屠杀，枪杀和活埋中国军民达 30 余万人！这种骇人听闻、令人发指的暴行充分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极端残酷性与野蛮性。

此后，日军连陷杭州、合肥、徐州等地，长江下游苏浙皖地区大部沦入敌手。但日军因兵力不足只能控制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广大乡村尚无敌踪。这本来是新四军挺进敌后的大好时机，但由于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干扰，致使新四军未能抓住有利时机在 1937 年冬至 1938 年春及时地开展华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和创建抗日根据地。针对这一情况，毛泽东于 1938 年 2 月、5 月连续发出指示，要求新四军抓紧时机，建立苏南茅山根据地，并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再分兵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

根据上述指示，新四军军部于 1938 年 2 月由南昌迁至皖南歙县岩寺（后

又迁至泾县云岭)，各支队分别向皖南、皖中集结，准备向日军出击。

向皖中集结的第4支队于4月进抵舒城、庐江、无为、巢县地区。5月12日，首战巢县蒋家河口，歼灭日军20余人。此为新四军出师敌后第一仗。蒋介石闻讯，致电嘉奖。6月17日，粟裕率领新四军先遣支队，在镇江韦岗伏击日军告捷，歼敌20余人，击毁汽车4辆。这是新四军出师江南第一仗，捷报传出，民心振奋。陈毅也即兴赋诗祝贺，“故国旌旗到江南，终夜惊呼敌胆寒；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

尔后，新四军第1、第2支队挺进苏南，第3支队开赴皖南，第4支队展开于皖中，先后取得新丰、句容、永安桥、清水潭、马家园、棋盘岭、三十里铺等战斗的胜利，并粉碎了日军对小丹阳地区的“扫荡”；同时大力开展群众工作，组建抗日民主政权，至1938年10月，新四军不仅顺利完成了改编、集中和整训的任务，而且挺进大江南北，开展游击战争，共作战280余次，歼敌3800余人，初步建立起苏南、皖南，皖中抗日根据地，开辟了华中敌后战场。同时新四军自身也得到壮大，由整编时的万余人发展到2.5万余人。

从1937年9月八路军首战平型关，到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八路军、新四军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与日伪军展开英勇斗争，共作战1780次，歼敌5.4万余人，缴获各种枪1.2万余枝（挺），创建了晋察冀、晋绥、晋冀豫、晋西南、冀鲁边、冀鲁豫、山东、苏南，皖南、皖中等抗日根据地，华北、华中敌后战场基本形成。八路军、新四军也由出师时的4万余人发展到18万余人。

敌后战场的形成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进展。它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创建的抗日根据地已以独当一面的战略姿态屹立于敌后，侵华日军从此陷入了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两面夹击之中。敌后游击战争对日军的牵制和消耗，是中国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的重要因素。

八路军，新四军之所以能在短短的十几个月里取得这样伟大的胜利，其根本经验就是坚决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具体他说，就是：贯彻了全面的、全民族的人民战争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适时实行了由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转变，坚决执行了“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作战指导方针；抓住有利时机，大胆深入敌后，实施战略展开，创建抗日根据地。

巩固华北，发展华中

1938年10月，日军连续攻陷了华南的广州和华中的武汉两个大城市。在侵略者看来，这是继攻占平、津、沪、京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胜利。但实际上这种胜利仅仅是表面上的。由于战线过长，兵力不足，财力不敷，加之正面受到国民党军的节节抵抗，后方又受到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的牵制和威胁，日军的战略进攻已几乎达到极限，因而不得不对侵华政策进行重大调整，这种调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保守；由战略速决转入战略持久；由主要打击国民党转而主要打击共产党，调集主力加强进攻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以确保其后方的占领区；对国民党则由军事打击为主转为以政治诱降力主。这表明，中国抗日战争开始进入毛泽东所预言

的战略相持阶段。

日本的政治诱降使国民党内部发生分化，亲日派首领汪精卫于 1938 年 12 月 18 日逃离重庆，公开叛国投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仍坚持抗战，但由于正面战场军事压力有所减轻，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限共、防共、溶共”的方针，反共倾向明显加剧。

战争形势的重大变化要求中国共产党迅速提出新的对策。中共中央为此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会议确定要不断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同时批判了王明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军事上，继续执行“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方针。关于八路军、新四军今后的任务，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指出：在游击战争充分发展了的地区，如华北，主要方针是巩固已经建立的基础，以准备新阶段中能够战胜敌之残酷进攻，坚持根据地；在游击战争尚未充分发展的或正在发展的地区，如华中，主要方针是迅速发展游击战争，以免敌人回师后游击战争发展困难。据此，会议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和华南”的战略任务。为适应这个新的任务，中共中央决定充实中共中央北方局，任命杨尚昆为北方局书记；设立北方局晋察冀分局，彭真任书记；设立北方局山东分局，郭洪涛任书记。撤销长江局，设立中原局和南方局。刘少奇任中原局书记，统一领导长江以北华中地区的党政军工作；周恩来任南方局书记；同时，东南分局改称东南局，项英仍任书记。

巩固华北的战略任务责无旁贷地由八路军承担起来。根据中共中央巩固华北的战略任务和日军先“扫荡”平原后进攻山区的企图，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作出重大决策：以八路军各师主力挺进冀鲁平原，这是八路军第二次也是更大的一次挺进平原的战略行动。

1938 年 12 月，由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第 129 师主力一抵达冀南平原，便投入了激烈的反“扫荡”作战，经 3 个月 100 多次战斗，共歼灭日伪军 3000 余人，其中第 386 旅陈赓旅长指挥的香城固战斗诱歼日军 200 余人，成为诱伏战斗的范例。

贺龙、关向应指挥的第 120 师于 1939 年 1 月下旬进抵冀中平原，同冀中军区（八路军第 3 纵队）会合，成立以贺龙为首的军政委员会，并组成以贺龙、吕正操为正、副总指挥，关向应为政委的冀中总指挥部，统一领导冀中各项工作。在连续粉碎日军三次围攻之后，4 月下旬，第 120 师又在齐会地区冒青毒气与日军激战三昼夜，歼敌 700 余人，创下平原歼灭战的范例。此战贺龙师长亲临前线，中毒负伤。

第 115 师主力在该师政委罗荣桓率领下，于 1939 年 3 月初进入鲁西平原。3 月 4 日，首战樊坝，全歼伪军 1 个团 800 余人。4 月，取得陆房突围战斗的胜利，歼灭日军 1300 余人。同年夏季又先后取得鲁西反“扫荡”和梁山战斗的胜利，于敌重创。日军第 114 师团中将师团长沼田德重在鲁西被击伤致死，日本皇族长田敏江少佐则在梁山被击毙。8 月，八路军第 1 纵队成立，徐向前任司令员，朱瑞任政委，统一指挥山东与苏北及冀鲁边区部队，同时，成立山东军政委员会，朱瑞任书记，徐向前、郭洪涛、罗荣桓等为委员，统一领导山东党政军工作。

10 月，八路军第 1 纵队机关与山东纵队机关合并，组成统一的指挥机关；第 115 师主力由鲁西进入鲁南，创建鲁南根据地。

第 115 师第 344 旅一部由代旅长杨得志指挥，于 1939 年 2 月由晋东南进

入直南（今河南濮阳、内黄、滑县一带），随后扩编为冀鲁豫支队。1940年4月与八路军第2纵队会台，组成新的第2纵队兼冀鲁豫军区，杨得志任纵队司令员，黄克诚任纵队政委兼军区司令员，崔田民任军区政委。同年5月，黄克诚率第2纵队主力南下豫皖苏，杨得志率余部坚持冀鲁豫边区的抗日斗争。

在晋察冀的平西地区，以八路军第4纵队为基础的“冀热察挺进军”于1939年2月组成，萧克任司令员，执行“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开辟平北”的任务。

八路军主力挺进平原，进一步实施战略展开，不仅发展了平原的抗日游击战争，巩固了平原抗日民主政权，也帮助当地部队提高了战斗力，从而为长期坚持平原抗战打下坚实基础。同时，八路军主力也在平原地区得到壮大，如第120师由挺进冀中时的6000余人发展到2.1万余人，第129师和第115师也都得到发展。

1939年夏，华北日军将进攻重点由平原转向山区。为此，八路军除将第115师主力继续留在山东之外，命第120师和第129师主力返回山区。第129师返回太行区后，粉碎了日军5万人的夏季大“扫荡”，歼敌2000余人。9月下旬，第120师由冀中返回山区的途中，在河北灵寿县陈庄伏击“扫荡”之敌，歼敌1280余人。

11月上旬，晋察冀军区部队在冬季反“扫荡”战斗中，连续取得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的胜利，歼敌1400余人，其中黄土岭一战歼敌900余人，击毙日军“山地战术家”、独立混成第2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不幸的是，著名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在抢救黄土岭战斗伤员时，手指划破被病毒感染，11月12日病逝于河北唐县，时年49岁。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一文，使中国人民至今仍对这位国际主义战士缅怀不已。在黄土岭战斗后不久，第129师、第115师第344旅及晋冀豫军区各一部发起邯长战斗，歼灭日伪军700余人，收复黎城、涉县，使太南、太北两区联成。1939年和1940年是华北敌后战场斗争十分激烈的两年。据统计，日军出动千人以上的“扫荡”就达109次，使用总兵力在50万人以上。然而，这些“扫荡”均一一被英雄的八路军所粉碎。经过两年的艰苦斗争，八路军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巩固华北的战略任务，使华北各根据地在巩固中得到发展，在发展中日渐巩固。八路军自身也迅猛壮大。到百团大战前夕，八路军总兵力已将近40万，装备各种枪近20万枝（挺）、炮240门，并拥有晋享冀、晋绥、晋冀豫、冀鲁豫、山东五大块根据地，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举足轻重的一支武装力量。

按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既定部署，新四军承担着“发展华中”的重任。

1939年2月下旬，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身份，专程由重庆赴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与新四军领导人研究发展华中的问题。他提出的原则是：哪个地方空虚，我们就向哪个地方发展；哪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到哪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哪个地方只有敌人伪军，友党友军较不注意，没有去活动，我们就向哪里发展。这样可以减少磨擦，利于抗战。依据这个指导思想，最后确定新四军的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实践证明，这是对新四军发展华中的一个重大而正确的决所谓“向北发展”，指的是多抽部队过江，把江北地区发展成为具有战略意义的根据地；“向东作战”，就是重点出击京沪地区，使江浙沿海敌人不得安宁，并造成国际影响；“巩固现在阵地”，就是巩固军部所在的皖南和业已开辟的

苏南茅山根据地。由于这个方针符合华中和新四军的实际情况，得到新四军很多干部的赞同。陈毅、粟裕等人领导第 1、第 2 支队积极执行了这一方针，4 月间以一部控制了丹阳以北的沿江地区和地处江中的扬中全岛，并成立苏北特委，为渡江北进创造了条件；5、6 月间，以叶飞等部东进，夜袭浒墅关车站和上海虹桥机场，扩大了新四军的影响；尔后，又以一部渡江北上，控制扬州以东、泰州以西和仪征。六合、天长地区，造成了跨越长江两岸的有利态势，为后来开辟苏北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与此同时，新四军第 3 支队和军部直属部队坚守皖南阵地，其中繁昌保卫战连续击退日军五次进犯，使日军损兵近千人也未能得手。第 4 支队和由第 4 支队一部扩编的第 5 支队分别进入津浦路东西两侧地区，挫败了日伪军和顽军的频繁进攻，建立了皖东根据地。彭雪枫领导的游击支队于 1938 年 9 月进入豫东，随后向皖苏交界地带发展，至年底建成了豫皖苏根据地。1940 年 2 月，游击支队改编为新四军第 6 支队，致力于巩固豫皖苏边区。

1939 年 1 月组成的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在李先念率领下向豫鄂边区挺进，6 月改编为豫鄂挺进支队，次年 1 月扩编为豫鄂挺进纵队，仍由李先念任司令员，豫鄂边根据地同时形成。

从 1938 年底到 1940 年初，经过一年多的英勇战斗，华中的游击战争和根据地规模以及新四军的兵力都有了显著发展。新四军已由 1938 年底的 2.5 万人发展到 5 万余人，但是华中敌后仍有广大地区尚待开辟。

1939 年 11 月底，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到达津浦路西淮南地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从 12 月至次年 2 月，刘少奇在这里连续主持召开了三次中原局会议，着重讨论了华中的发展方向等问题。根据六中全会精神和华中的实际情况，中原局认为，新四军如向西发展，将会受到国民党军第 1、第 5 战区的限制，且易引起中间势力的疑惧，政治上不利；而苏北地区全部为敌占区，只有国民党军韩德勤部，力量较弱。新四军向苏北发展，政治上有理，对抗战有利。同时苏北靠近山东，新四军发展苏北可与山东的八路军互力依托，互相策应。据此，中原局决定华中新四军执行向西防御、向东发展、开辟苏北的战略任务；刘少奇并建议中共中央令八路军一部南下，新四军主力北上，协力开辟苏北。

刘少奇的建议得到中央同意。1940 年 5 月，黄克诚奉命率八路军第 2 纵队主力 1.2 万余人由冀鲁豫边区南下，7 月与新四军第 6 支队合编为八路军第 4 纵队；尔后，第 4 纵队又抽出一部，与八路军苏鲁豫支队、陇海南进支队各一部编成八路军第 5 纵队。7 月，开辟苏北的计划付诸实施。陈毅率新四军江南部队主力北渡长江，建立了以黄桥为中心的由南向北的前进阵地。9 月，黄克诚率第 5 纵队东进开辟了淮海根据地，从而建立了由北向南的前进阵地。

10 月，陈、黄两部协同作战，一举击败顽军韩德勤部的进攻，取得黄桥反磨擦战役的重大胜利。10 月 10 日，新四军与八路军在东台以北白驹镇胜利会师，终于完成了开辟苏北的战略任务。为了统一对华中新四军和八路军的领导，1940 年 11 月在苏北海安成立了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叶挺任总指挥，刘少奇任政委，叶挺抵苏北前由陈毅代理总指挥。

由于贯彻了中共中央“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新四军成功地坚持了皖南，巩固并扩大了苏南和皖中根据地，发展了皖东、鄂豫皖边和豫皖苏边根据地，开辟了苏北根据地，形成了广大的华中敌后战场。新四军发展到 9 万

亲人，成为坚持华中抗战的重要力量。

从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到1940年8月百团大战之前，将近两年时间，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获得迅猛发展，进而导致中国抗日战争总体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敌后战场成为全国抗战的主战场。之所以会出现这个重大变化，原因有两个：其一，日军政策的转变，广州、武汉失守后，日军被迫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转而采取以保守占领区为主的方针，将军事打击的主要对象由国民党转为共产党，集中主力进攻敌后抗日根据地，这就使抗战的主要责任客观地、历史地落到了敌后抗日军民的肩上。其二，国共两党在两个战场采取了不同的战略指导。国民党从一开始就推行片面抗战路线，进入相持阶段后又增加了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这必然导致国民党抗战力量的削弱和正面战场地位的下降。与此相反，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制定和推行了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使抗战力量空前壮大。到百团大战前，八路军、新四军已发展到近50万人，根据地面积达到数十万平方公里，人口达1亿多。

开辟华南和东北敌后战场

如果说，华北、华中敌后战场是敌后抗战的主要战场，那么华南和东北敌后战场则是它的两翼，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日军为了封锁南海口、切断中国的海上国际交通线，于1938年10月12日在大亚湾登陆，21日攻占广州。随后，广州周围及东江下游大片地区全部沦入敌手。

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广东的抗日斗争，七七事变后不久即派遣廖承志、潘汉年、张三逸等人到香港、广州等地开展统战工作，动员民众抗日。

1938年4月又成立了以张文彬为书记的广东省委。中共中央还多次致电广东省委，就开展游击战争问题作出指示。根据指示精神，广东省委决定将工作重心放在东江、琼崖两地区。

战斗在东江的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是1938年12月建立的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和次年1月建立的东主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曾生、玉作尧分别是这两支游击队的领导人。1939年4月，中共中央派八路军留守兵团所属保安司令部参谋处主任梁鸿钧到东江帮助开展抗日斗争。5月，在坪山成立东江军事委员会，由梁广、梁鸿钧负责，统一领导两支游击队。9月至12月，游击队向日军发动袭击，收复大鹏半岛沙鱼涌、葵涌和宝安县南头镇，游击队发展到700余人。1940年3月，游击队遭到国民党顽军进攻，被迫向海陆丰转移，途中又遭顽军截击，损失严重。同年8月，游击队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返回宝安县，改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3、第5大队，林平兼两个大队的政委，梁鸿钧负责军事指挥。

10月，两支游击队分别进入广九铁路西侧的大岭山区和阳台山区，开展游击战。到1941年9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发展到1500余人，在大岭山区和阳台山区建立起东江根据地。

1938年10月，珠江三角洲的广州及南海、番禺、顺德等地相继被日军侵占。当地中共组织根据中共广东省委指示，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1939年2月至1940年6月，先后成立了顺德抗日游击队和中山抗日游击中队。中共广东省委还派遣共产党员到民众抗日武装广州市区游

击第 2 支队工作，于 1941 年 7 月将其改造为一支中共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

10 月中旬，该支队在顺德县取得西海战斗的胜利，歼灭伪军 600 余人。

1939 年 6 月下旬，日军侵占潮州、汕头。7 月，中共潮汕中心县委在桑浦山成立汕头青年抗日游击队，以“国民革命军独立第 9 旅游击队”名义开赴潮州西郊开展抗日游击活动。

在海南岛，1938 年 12 月 5 日，琼崖红军游击队和岛内各地抗日武装在琼山县云龙村改编为广东省第 14 统率区民众抗日自卫团独立队，约 300 人，冯白驹任队长。

1939 年 2 月 10 日，日军侵入海南岛。1939 年 3 月，中共琼崖特委将独立队改称独立总队，冯白驹任总队长，下编 3 个大队。此后，独立总队转战于琼山，文昌、澄迈、临高、儋县、昌江、感恩地区，多次袭击日军。到 1939 年 2 月，第 1、第 2 大队在琼文地区作战 70 余次，歼日军 800 余人，开辟了琼文根据地。转战于海南岛西部的第 3 大队，取得了那大围困战的胜利，促进了当地游击战争的开展。

1940 年，独立总队开辟了美合山区根据地，部队发展到 2000 余人。为支持海南岛的抗日斗争，中共中央先后派庄日、李振亚赴独立总队担任领导职务。由于遭到国民党顽军的进攻，独立总队于 1941 年 2 月主动撤出美合，返回琼、文地区，并粉碎日伪军对琼、文地区的多次“扫荡”。到 1941 年底，独立总队发展到 3500 多人。

此外，粤中和雷州半岛地区也建立了人民抗日武装，展开了抗日游击战。这些人民抗日武装合称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或华南抗日纵队。他们长期处于优势敌人的分割封锁之下，且远离八路军、新四军主力，斗争环境十分艰苦，但在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华南抗日游击队独立自主地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多次粉碎日伪军的“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围攻，大量消耗和牵制了日伪军。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作为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全国抗战爆发前已经开始了。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政府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将东北三省拱手让给了日本侵略者；中国共产党则表现了截然不同的态度，旗帜鲜明地反对日本的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抗战。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满洲省委积极组建反日游击队，杨林、杨靖宇、赵尚志、童长荣、冯仲云、夏云杰就是这些游击队的主要领导人。同时，还派遣周保中、李延禄等入到东北义勇军中进行改造工作，使部分义勇军成为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武装。

随着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扩大，1933 年 5 月，中共满洲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决定以所属游击队为基础，组建东北人民革命军。从 1933 年下半年到 1936 年春，相继成立了 6 个军。其中，第 1、第 2 军活动于南满、东满地区；第 3、第 6 军活动于北满地区；第 4、第 5 军活动于吉东地区。各军认真贯彻了政治建军原则，在连以上单位建立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健全政治工作制度，使部队成为新型人民抗日武装。各军建立后，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向日伪军出击。到 1935 年底，陆续开辟了 8 个抗日游击根据地。1935 年 11 月，第 3 军第 1 师第 2 团政委赵一曼在珠河县（今尚志）左撇子沟战斗中负伤被俘，次年 8 月英勇就义。经过两年多的艰苦斗争，东北人民革命

军共进行了数千次战斗，攻克日伪军占领的数十个城镇，打破了日伪军多次“讨伐”，部队发展到1万余人，游击区扩大到东三省50多个县。

1936年2月，东北人民革命军改称东北抗日联军，并在原来6个军的基础上又组建了第7至第11军。全军共3万余人。中共南满、吉东、北满省委成立后，抗联各军先后编成第1、第2、第3路军，分别归三省省委领导。第1路军于1938年春正式编成，辖第1、第2军，杨靖宇任总司令兼政委，副总司令王德泰，魏拯民任政治部主任；第2路军于1938年春正式编成，辖第4、第5、第7、第8、第10军等部，周保中、赵尚志任正副总指挥，崔石泉（崔庸健）任参谋长；第3路军于1939年11月正式编成，辖第3、第6、第9、第11军，张寿答（又名李兆麟）任总指挥，冯仲云任政委，许亨植任总参谋长。

由于抗联日趋广泛的游击战争对日军构成重大威胁，日本关东军从1936年4月开始推行“三年治安肃正计划”，对抗联进行大规模“讨伐”。抗联各部密切协同，奋起展开反“讨伐”作战，并分别开展了西征、北进和扩展游击区的作战。从1936年4月到1937年上半年，经数千次战斗，抗日联军共歼灭日伪军1万余人，不仅取得反“讨伐”作战的胜利，而且把游击区扩展到了70多个县，建立了东南满、吉东和北满三大片抗日游击根据地。1936年冬，第1路军副总司令兼第2军军长王德泰在抚松县小汤河战斗中英勇牺牲。

全国抗战的爆发，极大地鼓舞了东北各族人民的抗日热情。东北抗日联军力配合全国抗战，主动出击，积极牵制与打击日伪军，掀起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高潮。

活动于南满、东满地区的第1路军先后攻克抚松县庙岭和辉南县城，袭击宽甸县四平街，奇袭辑安（今集安）县老岭隧道，并在蚊子沟伏击伪军景索清旅，歼其300余人。活动于吉东、北满地区的第3至第11军，也取得依兰、土龙山、青龙山、孟家岗、聚宝山等战斗的胜利，毙俘日伪军7600余人。至1937年冬，抗联的游击战争达到鼎盛，总兵力发展到4.5万余人，活动范围遍及70多个县，牵制日伪军数十万人，不仅对东北的日伪统治构成严重威胁，而且从战略上配合了全国抗战。

1937年底，日伪军采取压缩包围的战法进行“三江省大讨伐”，企图将抗联第4、第5军等部压缩包围于松花江下游、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之间的三江平原聚而歼之。力粉碎敌之围歼计划，1938年4月，第2路军决定以第4、第5军主力跳出敌之合围圈，举行西征，力争与第1路军同华北八路军沟通联系；第2路军总部则率第4、第5军留守部队和第7军等部在宝清、饶河等地坚持斗争。7月，西征部队按计划出发，途中攻克苇河县楼山镇，并奇袭了珠河县元宝镇“集团部落”。8月，西征部队遭日伪军重兵围堵，损失惨重，第4军军长李延平、副军长王先宇壮烈殉国，仅有一部进入五常、舒兰，余部返回原地。第5军一部在东返途中遭日伪军袭击，妇女团指导员冷云及班长胡秀芝、杨贵珍，战士胡桂琴、黄桂清、王惠民、李凤善和被服厂厂长安顺福8人被敌人包围，宁死不降，毅然跳入乌斯浑河，全部牺牲。这就是著名的“八女投江”。第2路军坚持原地斗争的部队，先后进行大小战斗37次，毙伤日伪军2000余人，其中第7军在饶河县西风咀子伏击战中击毙日军少将日野武雄。同年夏，坚持在北满地区的第3、第6、第9、第11军从汤原、萝北、绥滨地区陆续远征，先后到达海伦、德都地区，攻克讷河

县城和克山县北兴镇，给日伪军以重创，并在德都县朝阳山一带建立了游击根据地。

1938年下半年，日军将关外兵力增至8个师团，加紧对抗联进行军事“讨伐”、政治诱降和经济封锁，并采取增建“集团部落”，推行“保甲连坐法”等手段，隔离抗联与群众的联系，竭力破坏抗联的生存条件，尽管少数意志薄弱者变节投敌或脱离抗联，但广大抗联将士仍纵横驰骋于白山黑水之间，同日本关东军和伪满军进行着殊死的搏斗。

1938年秋冬，日伪军出动1.5万人对抗联第1路军实行大“讨伐”。第1路军从老岭地区向桦甸、濛江山区转移，连续进行150多次战斗，歼灭日伪军1500余人，挫败了日伪军的秋冬季大“讨伐”。1939年，第2路军在吉东地区开展反“讨伐”作战200余次，歼灭日伪军2000余人，粉碎日军的“聚歼”计划。第3路军转战黑嫩平原20余县，歼灭日伪军数千人，牵制日伪军数万人。东北抗联在转战和远征中，虽遭到很大损失，但仍取得歼敌1万亲人的胜利。在此期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给杨靖宇和东北抗联发出慰问电，称赞东北抗联是在“冰天雪地里与敌周旋七年多的不怕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

百团大战

1940年上半年，德国军队横扫西、北欧，欧洲反法西斯战争处于低潮。日本决心趁西方大国无力东顾之机，南下太平洋，夺取它们在东方的殖民地。为放手南进，日本一面加紧对国民党政府的军事讹诈，扬言要“南取昆明，中攻重庆，北夺西安”；一面加紧进行政治诱降，汪精卫傀儡政府在日本的扶持下粉墨登场，日蒋双方代表也在香港进行着秘密媾和谈判。一时间，妥协与投降的乌云笼罩在中国的上空。

在华北，日军疯狂推行“肃正建设计划”和“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分割封锁各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八路军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小了。

为打破日军的“囚笼政策”，消除国民党妥协投降的危险，争取时局好转，八路军总部决定发起破袭正大路战役，规定参战兵力不少于22个团。

8月20日晚8时，八路军参战部队同时向当面日军发起猛烈攻击。战斗打响后，许多部队自发地投入战斗，以致实际参战兵力大大超出计划，达到105个团（约20万人），于是“百团大战”这个响亮的名字就叫开了。

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描述说，从晋西高山，到东海海岸，从黄河畔，到长城边，都形成了战场。“一百团人打击了敌人的整个经济、交通线和封锁网，战斗是炽烈而无情的”。

百团大战分为三十阶段：

第一阶段（8月20日~9月10日）为交通破击战，重点破击了正太路、同蒲路、白晋路、平汉路与德石路等重要交通线；第二阶段（9月20日~10月5日）主要是攻坚战，消灭交通线两侧及深入根据地内的日伪军据点；第三阶段（10月6日~12月5日）主要是反击日军报复“扫荡”。

第18集团军总部：《战役预备命令》，1940年7月22日。

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中文1版，431页，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69。

在历时三十半月的百团大战中，八路军在地方武装和当地人民群众的大力配合下，共作战 1800 余次，毙伤日军第 35 师团步兵旅旅长饭田泰次郎少将以下 2 万余人、伪军 5000 余人，俘日军 280 余人、伪军 1.8 万余人，拔除据点 290 多个，破坏铁路 470 余公里、公路 1500 余公里，缴获各种炮 50 余门、各种枪 5800 余枝（挺），八路军亦付出重大代价，计伤亡 1.7 万余人，2 万余人中毒。

百团大战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处于低潮、中国抗战面临困难、妥协投降空气甚浓的形势下取得胜利的，因而具有重大的军事和政治意义。

首先，它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囚笼政策”和“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梦想，给日本侵略者以很大震撼。战役结束后，“囚笼政策”的发明人、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被撤职。日本众议员微中利一哀叹：“要想消灭中共军，则必须依靠百年战争才能解决。”百团大战给日军以沉重的精神打击。正如一位日军俘虏所说的：八路军“猛烈而巧妙的阵地攻击作战，在我们的心目中造成了极大的不安，扰乱了我们的战斗意志”。以至素以顽强著称的日本军队，竟也出现了跪地缴枪、乞求活命的现象，280 多人做了八路军的俘虏，这在以往的作战中是罕见的。

其次，百团大战钳制了大批在华日军，进一步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遏制了国民党内部妥协投降逆流的蔓延，日蒋双方的秘密媾和谈判在百团大战的枪炮声中不了了之。百团大战还推迟了日军南进的步伐。日本早在 1940 年 7 月已确定了南进方针，并规定 8 月内完成南进准备，但百团大战迫使日军推迟南进计划，日军第 5 师团 9 月 23 日在法属印度支那强行登陆后又改以“演习”为名宣告收场。在这一戏剧性变化中，百团大战无疑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再次，百团大战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战信心，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驳斥了顽固派关于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谣言。百团大战的捷报传开之后，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在弥漫着悲观气氛的大后方，八路军的胜利犹如春雷炸响，使军心民气为之一振。就连蒋介石也不得不致电朱德、彭德怀表示：“贵部窥破好机，断然出击，与敌甚大打击，良用嘉慰。”大后方报社、电台竞相刊载战绩，发表评论，各地纷纷举行祝捷会、庆功会，沉闷、悲观的空气一扫而空。苏联《红星报》、美国合众社等新闻媒介也对百团大战进行了报道，共产党、八路军的国际威望进一步得到提高。

张惠才等译：《从帝国军人到反战勇士》，中文 1 版，14 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八路军·参考资料》（1），480 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

三、适应民族解放战争的新形势，加强军队建设

抗日战争是一场民族解放战争，这场战争使人民军队面临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也为人民军队提供了发展良机。在错综复杂的新的战争环境中，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坚持和加强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利用作战间隙整训部队，加强军队院校建设，有力地推动了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积累了军队建设的新鲜经验，为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坚持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在红军实行改编后，如何坚持党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绝对领导，这是在新的历史环境中人民军队建设面临的一个新的重大课题，也是关系到人民军队性质改变与否的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为此，中国共产党作出了不懈努力。

粉碎国民党控制和吞并人民军队的企图，确保人民军队本色。

全国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国共之间的阶级对立和政治分歧，蒋介石从未忘记削弱和消灭共产党及其红军。因此，在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的过程中，国民党借口统一，提出不设总司令部，改政治部为政治训练处，并由国民党当局派人担任政训处主任，向各师派出参谋长，师以下（至连）也要派人任职，企图借改编之机控制和吞并人民军队，从根本上改变人民军队的性质。

针对国民党的险恶用心，中国共产党作了坚决的斗争。一方面，在同国民党的谈判中据理力争，坚持原则，拒绝国民党的无理要求，使其无法在谈判桌上达到阴谋控制红军的企图。同时，在党内军内反复强调坚持党对红军绝对领导的重要性，强化各级干部对于党指挥枪这一根本原则的认识。

1937年7月22日，彭德怀在红军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关于红军改编的意义和今后工作的报告中，强调了改编后的红军必须坚持共产党绝对领导的重要性。8月1日，总政治部作出《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要求保证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依靠于党的领导的加强，保持红军的光荣传统，巩固与提高部队的战斗力。8月25日，中央军委签发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命令强调：各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扬十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坚持执行党中央与中央军委的命令，为党的路线及政策而斗争，完成中国革命之伟大使命。9月2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指出：在原有红军及一切游击队中，共产党绝对独立领导之保持，是完全必要的；共产党员不许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任何原则上的动摇。正是从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一根本原则出发，中国共产党在红军改编问题上坚决拒绝了国民党向红军派员担任要职和不允许设立独立指挥部的无理要求，从而阻止了国民党企图通过改编控制、吞并红军的图谋。

建立健全党对军队的领导机构，从组织上保证党对军队的领导地位。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通过党在军队中的各级组织机构卓有成效的工作和广大党员的努力实现的。在军队中建立健全党的领导机构，是坚持和实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组织基础，也是确保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关键。

因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极为重视军队中党的领导机构的建立、健全和完善。

1937年8月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决定成立新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新的中共中央军委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浩、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11人组成，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周恩来任副主席。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在八路军中设立中央军委前方分会（后称华北军分会），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张浩、林彪、聂荣臻、贺龙、刘伯承、关向应9人组成，朱德任书记，彭德怀任副书记，受中央军委统辖。新四军成立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于1937年12月决定设立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任命项英为书记，陈毅为副书记，也受中央军委统辖。皖南事变后，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改组为中央军委华中分会，刘少奇任书记。在领导体制上，八路军、新四军除接受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军委分会的领导之外，还就近接受所在地中央局或中央分局的领导和指导，主力军接受所在地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从组织上保证了全党全军的集中统一。

根据1937年5月中共中央苏区代表大会的决定和《中央组织部关于改编后党及政治机关的组织决定》，八路军、新四军还在师以及独立行动的部队中设立不公开的军政委员会，作为党在该部队的最高军政领导机构。八路军115师军政委员会由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周昆、萧华组成，林彪任书记；120师军政委员会由贺龙、关向应、萧克、甘泗淇、王震组成，贺龙任书记；129师军政委员会由刘伯承、张浩、徐向前、陈赓、王宏坤组成，刘伯承任书记。

1941年2月7日，中央军委颁布《军政委员会条例》，决定在八路军主力军团以上、地方军分区以上部队中一律成立公开的军政委员会，作为各部队党的领导机关，集体讨论决定重大军政问题。各级军政委员会通常由该部队军政主官及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组成，主席一般由政治委员担任。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建军部并将所属部队统一整编为7个师。同年4月，各师都成立了军政委员会。在党委制中断的情况下，军政委员会对于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尤其是加强军队内部党的集体领导，发挥了重要作用。

克服右倾错误，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

全国抗战初期，党内出现了一种盲目依赖国民党，否认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性的右倾错误情绪，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就是这种右倾错误的主要代表。1937年11月，他从莫斯科返回延安，在同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错误地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主张，抹煞国共两党的阶级区别和原则分歧，否认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原则。在1938年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还进一步提出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不仅仅是名称的改变，而是“相当地改变红军性质”，主张八路军、新四军服从国民党的“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统一受蒋指挥”。由于毛泽东等人的抵制，王明的错误主张未能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形成决议，但王明总是打着共产国际的招牌来宣传和推行错误主张，因此在党内还是造成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并给党的实际工作造成了危害。为纠正这种右倾错误，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领导人陆续发表文章或讲话，有力地批驳

了王明的错误主张。毛泽东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中指出：“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因此不应该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如果解释为‘一切服从’蒋介石和阎锡山，那也是错误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毛泽东还提出了处理国共关系的四种方式，即：先斩后奏、先奏后斩、斩而不奏、不斩不奏，这就将党的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具体化了。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毛泽东强调指出：“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现在是民族抗战，还要争民族的兵权。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由于党坚决实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和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因而把王明右倾错误的影响限制在局部范围内，并较快地加以克服。到1938年秋六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决定撤销王明主持的中共中央长江局，王明的右倾错误从组织上得到纠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和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得到肯定。这个问题的及时解决对于抗日战争的胜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从根本上保证了党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绝对领导。

加强政治工作，坚持政治工作的独立性。

革命的政治工作是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是党实现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基本途径之一。在民族统一战线条件下，为了保证人民军队的建设方向，使之成为实现党的抗战路线，争取民族自由、解放的有力工具，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极其重视八路军，新四军的政治工作。

1937年8月1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指出红军改编后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一切为着积蓄和加强抗战力量，保证抗战的胜利；保证共产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保持红军的光荣传统，巩固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决定》重申：“政治机关应始终是保持其为党的工作机关的特点”，应使之“成为部队全部生活的决定骨干，成为一切政治工作的支持与依靠”。

1938年1月10日，周恩来在《抗战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一文中首次提出政治工作是军队的生命线，深刻揭示了政治工作在军队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为坚持和加强政治工作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1937年8月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在关于红军改编后党及政治机关的组织的决定中，1940年5月6日总政治部在对新四军政治工作的指示中，都提出政治工作即是党的工作，从而阐明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性质，体现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党性原则。

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完整提出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即官兵一致的原则，军民一致的原则，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原则。

1940年8月13日，毛泽东等对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召集的政治工作会议及军区干部会议的指示中，提出了政治工作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的注意事项。这一切，都继承和发扬了人民军队历史上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并使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理论得到了丰富和发展。1944年4月11日，谭政在中共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报告》，对人民军队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工作进行了历史性的总结，提出和解决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原则问题，明确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任务和总方针。这个报告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指导下，由谭政起草，并经毛泽

东亲自修改、中共中央扩大的书记处会议批准的，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个报告是继古田会议之后军队政治工作的又一重要历史文献。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这两个报告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建设人民军队的经验，全面概括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对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对军队政治工作的加强和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为保证在政治思想上实现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排除阻力，成立和恢复了各级政治工作机关。1937年10月10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军委总政治部（对外以八路军政治部名义出现），任弼时任主任（任不在任时，由毛泽东代理），谭政为副主任。根据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建议，中央军委决定于1937年10月在八路军中恢复因国民党干扰而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任命聂荣臻、关向应。张浩分别兼任第115、第120、第129师政治委员，与此同时，各级政训处一律恢复政治部（处）名称。不久，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又任命了各旅政治委员。

为进一步加强政治工作，并使之制度化、正规化，1938年12月中共中央军委批准颁布了《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目的是加强和规范八路军的政治工作，同时也是为了向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提供一部总结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经验的文件，供全国所有抗日军队参考和借鉴。1942年10月，中共中央军委又批准颁发了《中国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第八路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这部条例旗帜鲜明地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和党在军队中的思想与组织建设问题，弥补了上一部条例的不足。同时，建立了工作报告制度。1939年3月6日，八路军政治部发出《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通知》，指出：自上而下的建立报告制度，应该成为各级政治机关和每个政治工作者本身任务之一。1941年7月15日，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建立政治工作经常的报告制度》的指示，再次强调建立这一制度的必要性，要求纠正不报告、不请示、自成系统、自成局面的坏习惯，并要求从高级机关起，以身作则，力促实现。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强调，八路军、新四军的政治工作应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能因为统一战线的环境和战区指挥关系而改变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性质。

1940年5月6日，总政治部针对《新四军政治工作组织纲要》中只字不提共产党的领导，不以共产党的理论、纲领、策略和口号为根据，反而把国民党领导人的言论编成讲话材料教育部队等错误，发出《对于新四军政治工作的指示》，着重指出：军队中政治工作，仍旧是共产党的党的工作，并不因统一战线的环境和战区的指挥关系而有所改变。因此，政治工作必须在政治上、理论上、组织上、工作内容与方法上，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必须保证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8月13日，总政治部又专门发出关于加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独立性的指示，要求根据民族战争的环境来确定政治工作在各方面的具体方针，使军队政治工作变成实现党的政策的有力武器。

实践证明，这些措施有效地解决了国共合作新形势下党与军队的关系问题，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地位。这对于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乃至全国抗日战争的胜利，都是至关重要的。

利用作战间隙整训部队

抗日战争开始后，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处在敌顽两面夹击的态势下，作战条件艰苦。并且，随着部队的发展壮大，部队中新战士、新干部、新党员的成分加大，加上某些部队教育、训练工作没有充分展开，使部队的政治素质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干部的组织指挥能力和部队的战术技术水平与残酷的战争需要不相适应；在统一战线和高度分散的战争环境下，受地主、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部队中的军阀主义、游击习气等不良倾向有所滋长；新组建的部队，特别是新收编的各种杂牌武装，成分比较复杂，还不巩固；某些部队政治工作指导思想上的右倾错误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上述种种情况要求全军从政治、组织、思想、装备、战术、纪律等方面巩固部队，提高质量；否则，便经不起战争中恶劣条件和严酷斗争的考验，而且将直接影响部队建设及抗日根据地的发展与巩固。因此，中央军委决定对全军各部队进行普遍整训。

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于1939年2月、6月和1940年2月，陆续发出训令，除要求各部队在战争中随着部队的发展及时利用战斗间隙整训外，还决定从1939年初至1940年底，全军分期分批地集中进行整训，每期3至4个月。训令要求各部队通过整训，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党在部队中的绝对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加强内部团结，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克服军阀主义和游击习气，使部队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起来。并要求在政治整训的基础上，加强军事整训，即加强游击战的战术和射击、投弹、刺杀等技术训练。同时，进行组织编制整顿，健全各种规章制度。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于1939年2月、6月分别发出第一、第二期整军训令，要求两期共整编60个团，加强主力部队。

1940年2月，八路军总部又发出整军训令，规定当年分两期（每期4个月）再整编50个团。在整军过程中，除加强了原有各旅外，第115师先后编成了7个教导旅；山东纵队所属部队先后编成5个旅；第129师和冀鲁豫地区部队先后组成了9个新编旅；第120师一部与冀中军区2个支队台编为2个独立旅；八路军留守兵团先后编成2个警备旅。根据八路军总部下达的编制表，各部队对编制进行了调整，压缩了机关，充实了战斗部队，并改变了过去编制不一、序列混乱的状况。从1940年4月至11月，各部队的整编工作先后结束。经过整编，115师编成22个团，120师编成32个团，129师编成39个团，晋察冀军区编成33个团，山东纵队编成24个团，2纵队兼冀鲁豫军区编成8个团。到1940年底，八路军发展到40万人，新四军发展到8.8万余人。

在整训中，各部队十分重视加强党的建设。

1939年6月25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加强部队党内教育致晋察冀军区转萧克电》，“决定于三个月内将党龄一年及一年半以内之新党员举行一个有计划大规模的训练”，使新党员懂得“共产主义最初步的知识”和“共产党员的责任”，“以提高军队中党的组织之质量。”7月13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又发出《关于加强党的工作的训令》，再次强调目前党的工作的基本方向，是“巩固党、强化党的工作，加紧党内教育工作”。各部队根据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指示和训令，注意加强对党员进行党的知识的系统教育和党的实际生活锻炼，开办了干部党员、新党员等各种训练班。同时，健全了党日制度，活跃党内民主生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充分发挥共产党员

在部队建设和战斗中的模范作用，并注意纯洁内部，吸收先进分子加入党的组织，从而使部队中党员的数量，质量都得到提高。据统计，八路军主力团中党员人数一般是占部队总人数的40%左右，地方团也达到了30%。到1939年2月，新四军中的党员已占全军总人数的40%。

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是整训工作的重要环节。早在1938年11月，毛泽东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就充分肯定了八路军进行反对新军阀主义斗争的正确性。1939年4月30日，华北军分会在《关于目前战争形势与我军任务的训令》中指出：必须健全党的生活，加强政治教育，注意思想整顿，克服各种不良的作风与习气。6月4日，彭德怀在某支队排以上干部会上作了《建设我们的军队》的报告，具体阐述了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作风。在整训中，各部队在进行形势任务教育与统一战线政策教育的基础上，突出了革命传统教育和思想作风的整顿。通过教育和整顿，使广大指战员分清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与一切旧式军队的根本区别，革命军队的管理教育与反动军队管理教育的区别。同时，对于存在的军阀主义残余和游击习气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并建立健全了学习、操课、会议、报告、管理等各项制度，有效地克服了军阀主义残余和游击习气，巩固了部队纪律，密切了官兵团结。

在政治整军的同时，八路军、新四军还进行了全面认真的军事训练，利用作战间隙掀起练兵热潮，使战术技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各级领导机关还着力加强司令部建设和参谋队伍建设，认真总结抗战以来的作战经验，并以此教育干部，使他们提高了战术素养和指挥水平。

加强时新组建部队的整顿与建设，也是整训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1939年6月，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发出《关于整理与巩固新部队的训令》，要求主力兵团选派一定数量具有适当能力与工作经验之干部，指定得力人负责，以考查团巡视团等名义分别派往指定地区之部队中帮助工作；协同各该地区之军事政治机关，规定整理计划，严格审查内部成分，整理组织，培养干部能力，传达经验，加强各级的领导及其政治基础。遵照这一训令，各主力兵团在新建部队中深入进行抗日教育和阶级教育、反对军阀主义教育、人民军队优良传统和作风的教育，提高了部队的民族意识、政治觉悟和组织纪律性。同时建立健全了新建部队中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和各种民主生活制度，任命政治委员，加强政治机关，并注意加强基层党支部的建设，从而确定了党的活动和政治工作的合法地位。对干部队伍进行了严格审查，清洗素质不好的个别分子。从主力部队抽调得力干部来加强领导，并开办各种短期训练班，教育、考察、培养干部，发展党员使共产党员占绝对优势，保证各级领导权掌握在政治可靠的优秀分子手中。建立健全各种管理制度，严格纪律。经过一定时期的整训之后，让新部队配合主力兵团参加作战，经受实战锻炼，提高战斗力。这些工作的深入开展，使新建部队出现了新气象。

利用作战间隙整训部队的成功实践证明，即使在战争环境中，也不能只顾作战而忽视部队的整训工作。只有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才能使两者相辅相成，互为促进。整训部队的实践还说明，既要重视部队数量的发展，也要重视部队质量的提高，两者不可偏废。

加强军队院校建设

抗日战争时期，人民军队创办了举世闻名的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日军政大学或抗大）。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在各抗日根据地又建立了抗大分校，八路军总部，新四军及其所属部队还办有随营学校、军政学校和各类专门学校。军队院校的建立，为抗日战争培养和造就了懂政治、懂军事、会做群众工作的优秀指挥员，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伟大贡献，在人民军队建设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正如毛泽东于1939年指出的：昔日之黄埔，今日之抗大，是先后辉映，彼此竞美的。

干部是军队的骨干。抗日战争的发展对干部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敌后战场的扩大和部队的发展，需要大量干部。但随着精兵工作的进行，剩余干部又需要妥善安置。另外，大批爱国知识青年奔向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也需要接纳与培养。为了培养干部，提高素质，适当储备，保留骨干，需要有一定的战略性措施来保证。基于这种需要，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加紧了军队院校的建立和建设。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十分重视抗日战争中的军队院校建设，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创办了各类军队院校，初步形成培训体系。早在全国抗战开始之前，毛泽东就指出：要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争取抗战胜利，就必须大大增加抗战力量，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增加战斗力量的工作和方法很多，然而其中最好最有效的办法是办学校，培养抗日干部。毛泽东还将全部干部分为支持斗争与保存学习两部分，要求送干部入院校培养。于是，在1936年2月，成立了西北抗日红军大学；6月，改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

1937年1月又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全国抗战开始后，随着敌后战场的扩大和部队的迅速发展，前方部队干部十分紧缺。为便于为前线部队培训干部和就近吸收爱国知识青年入学，更加理论联系实际，更便于吸收前线丰富的战斗经验，减少陕甘宁边区财政粮食困难，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于1938年12月，决定将抗大一部分与陕北公学枸邑分校等合并组成抗大第1、第2分校。

1939年1、2月，分校全体人员分别到达晋东南和晋察冀根据地。1939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以抗大一部分组成第3分校，留在延安办学。“抗大、抗大，越抗越大。”根据敌后抗日根据地形势的变化，各战略区又相继建立了抗大分校。华中抗日根据地先后建立了抗大第4、5、8、9、10（先后两个第10分校）分校和华中抗大总分校。华北抗日根据地先后建立了抗大第6、7分校和太岳、太行分校。抗大总校和部分分校还设立了附属陆军中学与附设中学，着手培养青少年以作为抗战的后继骨干和未来事业的栋梁之才。琼崖纵队成立了琼崖抗日军政干校。中央军委也先后建立了八路军军政学院、军事学院、摩托学校、航空工程学校、炮兵学校、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等。同时，八路军、新四军及有的师还成立了随营学校。

为使院校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十分重视院校教育方针和教学内容的确定。在抗大成衷之初的第一期教学中，确定了“少而精”，理论与实际并重，理论与实际联系，体力、智力统一，军事、政治适当配合等教学原则。在教学上贯彻启发式、讨论式方法。随着大批知识青年的入校，提出了强化军事教育、军事生活的要求。为使入学的新老工农干部与知识青年团结一致、共同进步，提出了“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分子知识化”的要求。1939年5月26日，毛泽东在抗大三周年纪念日时，

把抗大的教育方针概括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并指出：这三者是造成一个抗日的革命军人所不可缺少的，抗大的职员、教员、学生，都是根据这三者去进行教育与从事学习的。毛泽东还为抗大规定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7月25日，中央军委根据对抗大第3分校、第2分校工作检查的结果，发出《关于整理抗大问题指示》，提出了抗大以及一切由知识青年所组成的军政学校及教导队的办理方针：把知识青年训练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或同情者；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思想，因此教育应当是中心。10月，中共中央电示抗大，再次强调教育是学校一切工作的中心，坚持政治教育是整个教育的中心；强调马列主义教育，即着重政治教育与党支部的工作，加强思想意识的锻炼，理论与实际的联系，同时要特别加强军事生活与军事技术的提高。鉴于分校越办越多，1941年9月中央军委对于抗大总校和分校及其培训任务的分工，作了明确的指示：总校与各分校的工作，总校着重培养上级干部、参谋人员、教员，分校着重培养中下级步兵干部，延安第3分校培养特种干部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对院校的教学和发展起着宏观的指导作用，有效地保证了院校建设的正确方向，保证了院校教育目标的实现。

在办院校过程中，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舍得拿出得力干部办院校，同时也要求部队舍得送优秀干部入院校学习。1937年8月，中央军委为加强对抗大的领导，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的抗大教育委员会，并任命林彪为抗大校长，刘伯承为副校长，罗瑞卿为教育长。在职干部也由第1期的14人增加到87人。毛泽东、朱德等高级领导人常到抗大讲演。教员除从部队和投奔抗日根据地的人员中选调外，还从毕业的学生中选拔优秀分子担任。抗大总分校和分校相继成立后，中央军委又任命了总分校和各分校的负责人，如何长工、陈伯钧、许光达、陈毅、彭雪枫、张云逸、粟裕、李先念、刘忠、周士第、陈赓、童国贵等。同时，中央军委还任命王稼祥兼任八路军军政学院院长，徐向前任军事学院院长，任命刘鼎为摩托学校校长、郭化若为炮兵学校校长等。在中央军委的关怀下，各分校还较好地充实和加强教员队伍，顺利地完成了教学任务。在办学过程中，有的部队没能遵照规定选派学员，甚至派送的学员素质较差。为此，中央军委多次发出指示，要求所送学员由各政治机关考核，首长负责，要保证质量。毛泽东也多次函电有关战略区负责人，要求部队抽调好的有造就前途的领导干部送院校学习。高质量的学员入学后，经过培养和锻炼，迅速成长力德才兼备的部队骨干。

在极端困难的敌后斗争环境中，原野和土炕、牛棚就是课堂；学员用膝盖当桌，背包作凳；吃的是小米，高粱、荞麦和黑豆，甚至用野菜充饥；敌机时常“光顾”课堂，枪炮声不绝于耳。尽管这样，敌后院校建设仍取得重大成就，共培养、训练各类学员近20万人，这无疑是世界军队院校史上的奇迹。

四、粉碎敌人疯狂进攻，坚持敌后艰苦奋斗

1941 年是世界法西斯最力猖獗的一年。德国侵占西北欧后又侵入北非和巴尔干半岛，并于同年 6 月 22 日对苏联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日本在德国节节胜利的刺激下，于 12 月 8 日偷袭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基地珍珠港，继而对美、英等国在太平洋和东南亚的属地发动进攻。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第二次世界大战波及欧、亚、非三大洲及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的广阔海域，参战的国家和地区达到 61 个。1942 年 1 月 1 日，中、美、英、苏 4 国为首的 26 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共同宣言》，这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国际形势的变化，一方面有利于中国抗战，有利于中国获得反法西斯同盟国的支援和配合；另一方面，日本为扩大战争急于解决中国问题，妄想将中国变为太平洋战争的“兵站基地”，因而加紧了对中国抗日力量尤其是敌后军民的军事进攻，战局反而日趋严峻。

从中国战场看，由于 1940 年八路军的百团大战给日军以极大震撼，日本舆论惊呼：“中共势力扩大到这种程度，日本方面是没有想到的”，“对华应有再认识”。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在 1941 年 1 月 16 日批准的《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中要求侵华日军“发挥综合战力，给敌人以重大的压力，力求解决事变”。中国派遣军更是将华北视为“彻底治安肃正”的重点，把第 17、第 33 师团从华中调到华北，使华北方面军的兵力增至 30 万。经过八路军沉重打击后，华北方面军强烈意识到，“华北治安的症结就是中共”，因此“肃正的重点，仍然在于剿共”。

与此同时，国民党继续坚持积极反共方针，不断挑起磨擦事件。

1941 年 1 月悍然制造皖南事变，使新四军遭到严重损失，并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造成极大破坏。

在自然条件方面，华北、华中先后发生旱灾、虫灾和水灾，灾情十分严重，给敌后根据地造成严重的物质困难。

由于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敌后战场从 1941 年开始进入极端困难时期。但是，敌后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大无畏的精神顽强坚持敌后抗战，同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

粉碎敌人对华北的大“扫荡”

1941 年 2 月，老牌侵华分子冈村宁次接替被撤职的多田骏就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到任伊始，冈村便扬言，“要在四个月彻底消灭华北的共产党和八路军”。日伪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毁灭性大“扫荡”随之开始了。

1941 年 3 月 30 日至 1942 年 12 月 10 日，由华北伪政权出面在华北连续推行了 5 次“治安强化运动”。日伪军结合“治安强化运动”的推行，采取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纵横清剿、反转电击、辗转剔抉等手段，连续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并在“扫荡”中实行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妄图消灭抗日武装力量，摧毁抗日军民的生存条件和抗战意志。因此，反“扫荡”成为敌后战场对敌斗争的主要形式。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文 1 版，第 2 卷，第 2 分册，101 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1941年春，华北日军抽调10万兵力进攻中条山地区的国民党军的同时，在敌后战场“扫荡”了鲁西和冀鲁豫等地。夏秋季，“扫荡”北平四周的冀东、冀中、北岳等地区，以北岳区为重点，出动兵力7万人，时间长达两个多月。冬季，“扫荡”太岳、太行地区和沂蒙山区等地，以沂蒙山区为重点。在这一年里，日伪军共进行1000人以上的“扫荡”69次，其中1万人至7万人的大“扫荡”9次。1942年，日伪军共进行1000人以上的“扫荡”77次，其中1万人至5万人的大“扫荡”15次。两年内，日伪军出动“扫荡”的兵力高达83.89万人次，较前两年的50万人次增加近1倍。“扫荡”的次数也比前两年的109次增加2/3。

1943年1月9日，汪伪政府对美、英宣战。为增强汪伪政府的政治、军事地位和提高日军的机动作战能力，华北方面军将占领区的警备及经济等一切事务尽可能移交给华北伪政权，集中兵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展开更加频繁的“扫荡”。在这一年里，日伪军共进行1000人以上的“扫荡”87次，其中1万人至4万人的大“扫荡”18次。累计“扫荡”天数为984天，出动兵力达41.9万余人次。

日伪军对抗日根据地的残酷“扫荡”，是一种特殊的极其野蛮的战争。日军将“扫荡”部队区分为封锁、攻击两部分：封锁部队抢占要道、要隘、枢纽地带，构筑据点，形成封锁网；攻击部队又区分为放火队、搜索队、搜捕队或挺进杀人队，用血腥屠杀手段摧毁抗日军民的生存条件，以图困死抗日军民。尤其是冈村宁次就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后，加紧推行骇人听闻的“三光”政策。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1941年1月，“扫荡”冀东时，1500余人突然包围丰润县潘家峪村，将全村男女老幼赶到1个大院内，一面放火烧，一面用步机枪扫射，使1300多人惨遭杀害，还烧毁房屋1000多间，造成了震惊华北的潘家峪惨案。1942年5月1日，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日伪军5万余人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野蛮的“五一大大扫荡”，在藁城、无极一带杀害150余人，在定县北疃村，日军用毒气手死妇孺800多人。这次“扫荡”，杀伤和抓走群众达5万多人，深县以南各村，“无村不带孝，处处闻哭声”。类似的惨案在华北各地均有发生，不胜枚举。

日伪军在“扫荡”中，还强迫群众构筑公路、封锁沟墙和据点、碉堡，以分割或占领被“扫荡”的抗日根据地。如，1942年5月，“扫荡”冀中时，修筑据点和碉堡1700多个、公路3000余公里、封锁沟1700余公里，把冀中分割为2670个小块，每块都处在敌火力的严密控制下。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安达二十三在1942年10月间宣称：“华北碉堡已新筑成7700余个，遮断壕也修成11860公里之长，实力起自山海关经张家口至宁夏的万里长城的6倍，地球周长的1/4。”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平原地区，被纵横交错的公路、封锁沟、封锁墙和星罗棋布的据点、碉堡所分割。最困难时，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了约1/6，人口减少1/3，冀中、冀南、冀鲁豫、鲁中、清河、冀鲁边和大青山等抗日根据地，大部变成了游击区，有的变成了敌占区。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的人口由1亿下降到5000万，八路军由40万减为34万，形势极为严峻。

面对日伪军疯狂的“扫荡”进攻，抗日根据地军民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党政军民齐动员，主力军、地方军和群众武装齐参战，运用袭击战、麻雀战、破袭战、地道战、地雷战和水上游击战等战法，灵活机动地同疯狂已极、凶残万端的敌人展开全面斗争。反“扫荡”的主要做法和经验是：

第一，加强侦察，掌握敌人动态。利用便衣侦察、武工队员和伪军、伪组织的关系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情报网，力求查明“扫荡”之敌的行动方向、时间与企图。

第二，提高警惕，做好反“扫荡”准备。党政军领导机关，把反“扫荡”作为抗日根据地的一项中心任务，经常开展形势任务教育，使抗日军民保持高度的警惕性，随时做好反“扫荡”的各项准备工作：制造和储备枪、弹和手榴弹、地雷、土枪、土炮等战斗武器；拟制各种反“扫荡”方案，并进行演练，确保反“扫荡”的正确开展；派部队控制根据地四周的要点，设立观察哨、消息树等，做到早发现、早通报、早疏散，争取避免或减少损失；发动群众以搬空、藏空、躲空等空室清野手段对付敌之三光政策，使“扫荡”之敌没有饭吃和水喝，没有消息来源，没有人带路，成为饥渴、聋言之军。

第三，采取内外线相结合的有效战法。敌每次“扫荡”都是从各守备地区临时抽调兵力，企图以优势兵力同根据地的抗日武装决战而歼灭之。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抗日武装的最好战法是以我之分散对付敌之集中，尽量避免与“扫荡”之敌决战。遇敌集中优势兵力对抗日根据地“扫荡”进攻时，留下主力一部配合地方武装和群众武装坚持内线斗争，牵制、迷惑、杀伤敌人，保护群众的生命财产。主力部队适时转至外线，猛烈袭击敌守备薄弱的据点和交通线，迫使“扫荡”之敌回撤。在敌分兵清剿或撤退时，主力部队及时返回，以集中对其分散，协同内线部队用伏击、袭击、侧击、追击等手段打击敌人，并乘机拔除敌残留于根据地内的据点，恢复和扩大根据地。

第四，相邻区抗日武装积极协同作战。敌人抽调兵力“扫荡”一块或几块根据地时，其他根据地边缘区的敌人兵力明显减少，正是攻击敌人的有利时机。

1941年秋，日伪军7万人“扫荡”北岳时，与北岳区相邻的晋西北、太行、太岳、冀南、冀中等抗日根据地武装频频出击，迫使敌人从“扫荡”区抽兵回援，有效地配合了北岳军民的反“扫荡”斗争。

在反“扫荡”斗争中，抗日军民表现了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和宁死不屈、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

1941年8月1日，日伪军突然包围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的家乡献县东辛庄，杀害、拷打群众，强迫村民交出马的母亲。马母不忍群众受到伤害，挺身而出。被捕后，又坚决拒绝日军要她写信劝儿子投降的要求，绝食身亡。9月25日，晋察冀军区第1团7连6班5名战士与日伪军在易水河畔狼牙山激战一天，弹尽后毅然纵身跳下万丈悬崖，马宝玉、胡福才、胡德林壮烈牺牲，葛振林，宋学义挂在树上脱险。五壮士的壮举，使与之苦战的日军震惊得目瞪口呆，不约而同地对天礼拜中国的“五位神兵”。

11月18日，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在保卫黄烟洞兵工厂的战斗中，3名勇士在水腰山打完最后一颗子弹后，纵身跳下百丈悬崖，壮烈殉国。1942年5月25日，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在总部机关部队和驻地群众被日伪军包围时，毅然挺身而出指挥突围，不幸中弹牺牲于山西辽县（今左权县）十字岭。左权是抗日战争中八路军牺牲的最高将领。朱德总司令写诗赞他：“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这样的民族英雄，在反“扫荡”斗争中数不胜数。他们百折不挠、英勇战斗的气节和精神，永载中华民族史册。

反“蚕食”斗争

“蚕食”是日军“治安强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总力战”方针的具体化，具体分力边缘区蚕食和跃进蚕食两种方式：边缘区蚕食，就是日伪军依托其占领区和所控制的交通线，向游击区或根据地压缩推进，逐渐扩大敌占区的行动；跃进蚕食，就是日伪军在“扫荡”抗日根据地时占领的地区内，建立伪政权和伪武装，使之变成游击区或敌占区。

日伪军在蚕食时通常采用准备、实施、巩固三个步骤。先是派出便衣武装进至预先选择好的离据点 15 至 20 公里的地区，利用流氓、土匪、会道门及对抗日政权的不满分子或动摇分子，秘密开展特务工作与建立特务组织，暗中成立维持会，形成日伪秘密控制的点线。然后派日伪军主力进入已准备的地区，公开维持会。最后，建立各级伪政权和伪组织、伪武装，使游击区或根据地一块一块地变成敌占区。

“蚕食”的特点，与大规模的“扫荡”明显不同，由于它是以一种较缓和的、隐蔽的、波浪式推进的方式侵占游击区或根据地，容易使根据地军民忽视其严重性与危害性；但实际上，“蚕食”对根据地具有极大的危害性，甚至危及到根据地的巩固与坚持。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华北军分会指出：“敌占区扩大，根据地的缩小，由于敌人的‘蚕食’所造成者十之七八。敌人‘蚕食’政策给我们的危害，较之严重的‘扫荡’与‘清剿’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蚕食”与“扫荡”是日伪军进攻抗日根据地时交互使用的毒辣手段。“扫荡”掩护“蚕食”，而“蚕食”又为大规模“扫荡”作准备。1941年起，日伪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更大规模的“扫荡”，同时开始了“蚕食”进攻。针对敌人下断的“扫荡”和“蚕食”，抗日军民都在积极探索对付的办法，早在 1940 年 4 月，第 129 师师长刘伯承就提出了“敌进我进”的方针。所谓“敌进我进”，用刘伯承的话说，就是敢于脱离自己的后方，进入到敌人的后方，与广大民众结合作斗争的行动”。根据这一方针，第 129 师首先组成 10 个武装宣传队，深入敌占区。开展政治攻势，收到了明显效果。8 月，罗荣桓在山东提出：“建立起通向敌占区或越过严密封锁线之潜渡桥梁”，这种斗争方式后来发展为“翻边战术”，即敌人打到我这里来，我打到敌人那里去，以制止敌人的“蚕食”进攻。10 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扩大会议，在总结对敌斗争经验时，决定建立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并规定了武工队的 5 项任务。从此，以武工队反“蚕食”的斗争方式，推广到各抗日根据地。

1942 年 1 月，聂荣臻在晋察冀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到敌人侧后方去开展游击战争”的口号。会后，一些地区队和县游击支队，纷纷深入敌人后方活动，对制止敌“蚕食”收到了显著效果。3 月，刘伯承再次提出要执行敌进我进方针。他指出：必须派遣武装工作队、武装便衣队，不断浸透到敌占区活动，一方面配合根据地反“扫荡”、反“蚕食”；一方面鼓动敌占区群众起来开展游击战争。

北方局和华北军分会：《关于反对敌人蚕食政策的指示》，1942 年 5 月 4 日。

刘伯承在北方局召开的高级干部会上的报告《党军问题》，1940 年 4 月 21 日。

罗荣桓：《坚持我们的边沿游击区》，《斗争生活》，第 16 期。

《聂荣臻回忆录》，中册，545 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

为了加强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反“蚕食”斗争的指导，扭转根据地被敌“蚕食”的不利局面，中共中央和华北军分会在总结各根据地反“蚕食”斗争经验的基础上，于1942年5月4日联合发出《关于反对敌人“蚕食”政策的指示》，强调指出：反“蚕食”斗争是目前华北敌后的一个最紧急的任务，只有争取这一斗争的胜利，才能渡过黎明前的黑暗；反“蚕食”的基本方针应是以武装斗争为中心，发挥党政军民的整体力量，把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隐蔽斗争与公开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展开全面的对敌斗争。根据这一指示，各根据地均以1/3或1/2的部队，以营、连为单位分散到敌区，掩护武工队进入被敌“蚕食”的地区，广泛发动群众，深入开展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全面斗争，打击和瓦解伪政权与敌武装，建立或恢复党组织、抗日政权和人民武装，迫使敌人退出“蚕食”地区。5至7月，太行、太岳两区共摧垮维持会1000多个，消灭汉奸400余人。冀鲁豫边区为反对敌人的“蚕食”，将游击支队由12个增至20个，并将主力分散到各县，支援游击支队行动，给“蚕食”之敌以沉重打击。6月，晋绥军区派出15支武工队进入被“蚕食”的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斗争，恢复了部分地区，有力地打击了敌之“蚕食”。9月，晋察冀在平山县寨北村召开党政军高干会，聂荣臻提出“到敌后之敌后去”。会后，北岳区主力部队的1/3到1/2伸展到敌侧背，开展反“蚕食”斗争。在4个月中，共恢复和建立了1600多个抗日村政权，使北岳区的斗争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11月，第115师一部在滨海地区发起海陵反“蚕食”战役，歼灭伪军800余人，彻底粉碎了敌“蚕食”滨海的行动。

从1943年起，各中央局和军区都把“敌进我进”作为本地区对敌斗争的指导方针，结合反“扫荡”开展反“蚕食”斗争。晋察冀军区加强北岳区的反“蚕食”斗争，在春季的反“蚕食”作战中歼灭日伪军2500余人，使敌放弃“蚕食”计划。晋绥分局和军区决定贯彻毛泽东“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从主力军和地方武装抽调300多名有经验的干部加强武工队，同时派出39个主力连和49个游击支队配合武工队，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开展“挤敌人”的斗争。山东分局和军区继续实行“翻边战术”，以600名干部组成43个武工队，深入铁路沿线和敌“蚕食”地区活动，并在清河区持续发动反“蚕食”作战，3个月歼灭日伪军3000余人。华中局和新四军也实行“敌进我进”方针，充分发挥武工队、游击队在主力部队支援下反“蚕食”的作用，不但制止了敌在苏北、淮北、苏中、鄂豫皖等地区的“蚕食”行动，还逐步恢复了被“蚕食”的地区，有的地区甚至开辟了新区，扩大了根据地。

至1943年上半年，敌人对抗日根据地的“蚕食”基本上被粉碎了。

反对敌人对华中的“清乡”和“扫荡”

“清乡”是日伪军打击抗日根据地的又一种方式，主要施行于华中尤其是江浙地区。1941年春，汪伪政府的日军顾问晴气庆胤和警政部长李上群提出所谓“清乡”，得到了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的赞同与支持，并决定由日军和汪伪政府联合推行。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制定的《昭和16年以后现地长期政略指导》，确定以长江下游地区为起点，分批进行“清乡”的方案，

并向汪伪政府提出“清乡”建议。“清乡”分为军事、政治、经济、思想四种：“军事情乡”，是以强大兵力寻找新四军作战，并血腥镇压根据地人民；“政治清乡”，重点是摧毁抗日政权和各种抗战组织、团体，推行保甲制度，建立伪政权；“经济清乡”，是清查田亩，整理赋税，控制货物进出；“思想清乡”，是鼓吹“大东亚新秩序”和“中日亲善”，宣传“清乡”的目的、意义。日伪军特别重视“政治清乡”，声称要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手段相辅而行。1941年至1943年，华中日伪军除对苏北、淮北和鄂北的大小悟山等地区进行较大规模“扫荡”外，主要是“清乡”。时间长达3年，范围波及到新四军的许多重要根据地，首先是苏南地区的苏常太、澄锡虞、澄西地区，尔后是苏中和鄂豫皖、浙东等地区，重点是苏南和苏中地区。

1941年2月，日军第13军成立“清乡指挥所”，研究“清乡”计划。由于苏南抗日根据地的京沪线以北地区东临上海，西连南京，北滨长江，“是中国屈指可数的粮仓，又是新政府（指汪伪政府）威令深入贯彻不下去的敌性地区”，所以日军在与汪伪政府几经协商后确定在苏南进行3期“清乡”。第1期定为苏（州）常（熟）太（仓）地区。3月，日军将“清乡”指挥所移到苏州。5月，汪精卫去日本东京访问，乞得5亿日元“清乡”费，随即在南京成立“清乡委员会”，汪精卫任委员长，周佛海、陈公博任副委员长，李士群任秘书长兼苏州办事处主任。

7月1日，日伪对面积约1800平方公里的苏常太地区实施第1期“清乡”。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加之该地区党政军领导有轻敌麻痹思想，对敌“清乡”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决策失误，指挥不当，苏常太反清乡斗争遭到失败，当地新四军被迫向澄锡虞和上海等地转移。

1941年9月，日伪军4000余人从苏常太地区转至澄锡虞地区进行第2期“清乡”。次年春，日军第15师团一部在伪军协同下，对京沪线以北的澄西地区实施第3期“清乡”。这两期反“清乡”都因正确接受了苏常太反“清乡”斗争的经验教训，除留少数人员配合地方武装坚持游击战和开展隐蔽斗争外，主力适时转到了外线。日伪军虽占领了这两块地区，但第16旅主力和党的组织基本保存，未受更大损失。

华中敌后根据地1943年仍处于严重困难时期。日军为防止美军在华中沿海登陆，加紧了对苏北、苏中的“扫荡”和“清乡”。1943年2月中旬，日伪军2万余人对新四军第3师主力所在地盐阜区实行“扫荡”，3月18日，新四军第3师第7旅19团第4连，在淮阴以北刘老庄遭敌千余人合围，该连82名指战员顽强抗击，反复肉搏，歼敌170余人，最终全部战死，无一生还。这就是名垂战史的“刘老庄八十二壮士”。3月下旬，新四军以“围点打援”和伏击、袭击战术展开全面反击。至4月中旬，粉碎了敌之“扫荡”。3月至9月，日军还对新四军第5师所在地鄂豫皖边区和第7师所在地皖中等地进行“扫荡”，均被击退。

从1943年4月11日起，日军第60师团长小林信男指挥日伪军1.5万余人，对临江濒海、易于分割封锁又盛产棉、粮、渔、盐的如皋、南通、海门、启东地区，即苏中军区第4军分区进行长达9个多月的规模空前的“清乡”。

苏中军区极其重视反“清乡”斗争，在1942年冬进行思想、组织准备的基础上，1943年初把反“清乡”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并在军事上和组织上重新做了周密部署。苏中区党委书记兼苏中军区司令员粟裕到敌可能重点“清乡”的第4军分区具体指导完善各项准备工作，这就保证了反“清乡”

斗争的正确开展和取得胜利。

在敌人进行“军事清乡”时，第4军分区主力适时转到“清乡”区外，袭击据点和交通线，策应内线斗争。留内线坚持的部队和地方武装及民兵在群众掩护下，不断攻击敌新设的据点和小股敌人，尤其是短枪队、锄奸组、狙击队等积极袭击“清乡”机关，捕杀特工、汉奸。在敌人实行“政治清乡”时，短枪队和游击队加强活动，打击编查保甲的伪军政人员，同时揭露敌人的阴谋，动员群众纷纷起来反对建立伪政权，并对地主、绅士等晓以民族大义，争取其大多数，使敌之伪化阴谋难以得逞。在敌增调兵力进行“延期清乡”时，新四军在“清乡”区内的部队减少公开活动，组织群众开展秘密斗争与合法斗争：敌编保甲，新四军就发动群众假报户口进行敷衍；日伪抓丁编自卫队，新四军就派人参加进行控制；敌设瞭望台，新四军就派人打入使之成为抗日军民的警戒哨。“清乡”区外的主力部队则加强袭扰活动，至12月底，苏中军区第4分区终于取得反“清乡”斗争的胜利。在这次反“清乡”斗争中苏中4分区军民共作战2100余次，毙伤日伪军及“清乡”人员2400余人，争取伪军政人员反正、投诚1700余人。这次反“清乡”斗争的基本经验是：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使军民树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和敢打必胜的勇气与决心；接受苏南反“清乡”斗争的经验教训，在组织和军事上进行周密部署，做好对付敌人各种手段的充分准备；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团结中小地主、开明士绅，共同对敌；采取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狠狠打击死心塌地的汉奸、特务，教育和争取动摇分子，分化与孤立敌人；以武装斗争为主，把武装斗争与非武装斗争、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开展军事、政策、经济、文化的全面斗争；实行内外线相结合的方针，一部主力在内线结合地方武装和民兵坚持斗争，大部主力在外线袭击敌据点和交通线，使其陷入顾此失彼、被动挨打的境地。

华中军民的反“清乡”斗争，打破了日伪军歼灭新四军的图谋，粉碎了日伪军伪化抗日根据地的计划，积累了对敌斗争经验，锻炼了部队，为后来举行反攻作战创造了条件。

坚持华南、东北敌后抗战

在八路军、新四军开展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斗争的同时，华南抗日游击队和东北抗日联军也在顽强坚持敌后抗战。

1941年12月，日军侵占香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派一部兵力进入港九地区，开展城市游击战。

1942年1月，根据中共南方工委的指示，成立广东军政委员会，并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扩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梁鸿钧任总队长，林平任政委。随后，游击总队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示，与中共香港地下组织密切协同，从香港营救出何香凝、柳业子、茅盾、夏衍、邹韬奋、胡绳、廖沫沙、戈宝权等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知名人士、国民党官员和眷属，以及美、英、荷、比、印等国友人800余人，这项营救工作，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对于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乃至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都起到了积极作用。1942年，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军乘东江地区发生严重灾荒之机，对大岭山、阳台山根据地轮番发动进攻，实施经济封锁，根据地军民坚决抗击日伪军和顽军进攻，并通过生产自救，征收抗日捐税和到香港筹款等措施，

克服了严重困难。

1943年春，游击总队向日伪军广泛出击，恢复并发展了惠东宝根据地。年底，又挫败了日伪军对大岭山、阳台山根据地的万人“扫荡”。1943年12月2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扩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曾生任司令员、林平任政治委员，王作尧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杨康华任政治部主任，总兵力3000余人。东江纵队成立后，积极开展杀敌立功竞赛和拥政爱民及扩军运动。到1944年6月，共作战148次，歼灭日伪军1000余人，纵队发展到近5000人。

在珠江地区，1943年2月，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成立，统一领导该地区的抗日武装，并以中山县五桂山为根据地，向平原发展。次年10月，游击区指挥部撤销，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中区纵队，林锵云任司令员，罗范群任政治委员，总兵力2700余人。1945年1月，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林锵云任司令员、梁嘉任政委。

在潮汕地区，1945年3月，潮汕人民抗日游击队成立，以大南山为根据地，开展游击活动，先后三次袭击伪警察署，并在普宁县伏击日军成功。同年5月，潮汕人民抗日游击队扩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韩江纵队，林美南任司令员兼政委，兵力700人，同年8月发展到1200余人。

1945年1月，粤中地区和广州湾、雷州半岛地区的人民抗日武装，分别整编为粤中人民抗日解放军和广东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前者由梁鸿钧任司令员，罗范群任政委，兵力1000人；后者由周楠任司令员兼政委，兵力2000余人。

在海南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以琼崖地区为重点，加紧进行“扫荡”和“蚕食”。琼崖独立总队采取内外线结合的作战原则，打击敌人。敌人遭到打击后，集中兵力实行报复“扫荡”，独立总队主力被迫于1942年底转至琼山西部和澄迈、临高、定安地区。

1943年夏秋之交，琼崖独立总队以主力转至外线，经一个多月转战，逐步恢复了琼文根据地，开辟了万宁、陵水和保亭游击区，创建和巩固了绿现山、儒万山根据地，部队发展到4个支队。到1944年春，琼崖独立总队已将游击战争扩大到海南岛全岛。

据统计，抗战期间华南抗日游击队共作战3900余次，歼灭日伪军1.9万余人，部队发展到2.7万人，创建了拥有600万人口、面积达4万平方公里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有力地支援了全国其他战场及盟军在南太平洋的对日作战。

在东北地区，日军为彻底消灭东北抗联，巩固其殖民统治，以及准备对苏作战，于1939年底将关东军兵力增至9个师团。同年秋冬，日伪军集中7.5万人，对抗联第1路军进行规模空前的重点“讨伐”。第1路军与超过自己几十倍的敌人展开殊死战斗。部队缺衣少食，饥寒交迫。

10月初，抗联第1路军总司令兼政委杨靖宇在桦甸县头道溜河召开中共南满省委和第1路军主要领导人会议，决定实行化整为零、分散游击的方针。会后，杨靖宇率警卫旅及第1方面军共800余人，转战于桦甸、濛江一带，牵制日伪军，配合其他部队转移。第2方面军在抚松、安图、敦化一带分散开展游击活动，不断突击日伪军据点。第3方面军以团为单位分散转战于敦化、汪清、延吉、东宁等地。

1940年初，杨靖宇率部攻克濛江西北龙泉镇，虽取得毙敌近百人的胜

利，但暴露了总部行踪，加之叛徒告密，敌人遂组织多支“讨伐”队跟踪追击。杨靖宇将部队进一步化整为零，自己率领一支60余人小分队，在濛江、辉南之间的山区与敌周旋，转战50多天，战斗30余次，仍未能摆脱追击。2月18日，杨靖宇只身陷敌重围，与敌人周旋五昼夜，23日在濛江县保安村三道崴子壮烈殉国。第1路军在政治部主任魏拯民的领导下继续坚持斗争。经过318次战斗，共歼敌3100余人，终于挫败日伪军的大“讨伐”计划。

鉴于抗联各路军减员十分严重，中共吉东、北满省委部分代表于1940年1月20日在中苏边境地区集会，决定采取保存实力，逐步收缩的方针，将第1路军缩编为第1、第4、第7支队，第2路军缩编为第2、第5、第8支队，第3路军缩编为第3、第6、第9、第12支队。第3路军率先完成了第3、第6、第9、第12支队的缩编，转战于黑嫩平原；第2路军随后完成了第2、第5支队的缩编，活动于同江、富锦、宝清、虎林地区；第1路军因远在南满地区，联系中断，仍以几个方面军番号开展活动，至1941年3月始将第2方面军缩编为第1支队，转战干东宁、绥芬河地区。

缩编后的抗日联军，仍积极开展对敌斗争，连续进行了红旗河、克山城、霍龙门、肇源城等著名战斗，给日伪军以重创，但自身伤亡也十分严重。1941年，日军在东北的兵力猛增到16个师团，总兵力高达90万人。东北抗联后方密营遭到破坏，大批游击根据地丢失，游击区缩小到不足10个县，抗联总兵力只有约2000人，魏拯民、李延平、夏云阶、汪雅臣等一批重要干部相继去世或牺牲。在斗争环境日趋恶化的形势下，为保存骨干力量，中共吉东、北满、南满省委决定留抗联一部在国内坚持斗争，将大部转移到中苏边境苏联一侧进行整训，以备再战。1941年冬，转至苏联境内的抗联部队组成南、北野营。1942年2月，原抗联第2路军副总指挥赵尚志率小部队回国开展游击战，不幸在攻打萝北梧桐河伪警察分驻所时，重伤被俘，慷慨就义。同年8月1日，抗联南北野营合编为教导旅，周保中任旅长，张寿篈任政委，崔石泉任参谋长，下辖4个教导营和1个通信营。教导旅一面进行军政训练，一面派遣小分队返回东北进行游击活动，侦察敌情，开展群众工作，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在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中，抗日联军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坚持抗战，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14年间，抗联共歼灭日伪军17万余人，3万名抗联将士为国捐躯，其中师以上干部百余人。他们的长期抗战，有力地配合了全国抗战，也支持了苏联的卫国战争。

一些朝鲜的共产主义者和爱国志士，也加入了东北抗联，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许多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是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的。

五、坚持自卫立场，打退反共高潮

抗日战争中，中日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然而国内阶级矛盾依然存在。国民党顽固派站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为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和在中国的独裁统治，一向图谋利用抗战之机，消灭或削弱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力量。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对国民党由军事打击为主变为政治诱降为主，日军停止了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转为巩固占领区，并将主力集中于敌后战场，打击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摧毁抗日民主根据地。国民党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早就嫉恨不已，而日本的政策转变又为它的反共提供了良机，于是开始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溶共、限共、防共、反共”方针。紧接着，国民党又秘密颁布了《共党问题处置办法》、《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置办法》等旨在限制和迫害共产党的政策措施，使全国许多地方反共乌云翻滚，军事进攻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军队的磨擦事件屡屡发生。同年4月，国民政府山东省主席沈鸿烈指使秦启荣部在博山太和镇伏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3游击支队，杀害该支队团级以下干部200余人。以后，又陆续发生了深县、平江、竹沟等惨案。上述磨擦事件，致使国共两党的矛盾和对抗日趋激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出现严重危机。

面对日军的侵略和国民党军的磨擦，八路军、新四军坚持以主要力量抗击日本侵略军，但为了自卫求存，对于国民党顽固派蓄意挑起的反共磨擦事件又不能不进行斗争。困难主要不在于要不要进行这种斗争，而在于如何将抗日与反顽结合好，使抵御内患之争不致于损害抗战大局。为此，毛泽东在留守兵团军事会议上强调，巩固陕甘宁边区必须坚持一个方针，两条原则：一个方针是“一步不让”。两条原则的第一条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第二条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否则，人家磨擦来，你不磨擦去，他便得寸进尺。这便是我们的立场。在6月召开的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再次阐明了反顽斗争的坚定态度和根本目的。他指出：对国民党的磨擦与武装进攻，是必须坚决抵抗的。但必须严格站在自卫立场上，决不能过此限度，给挑衅者以破裂统一战线的口实。这种自卫防御、反磨擦斗争之目的，在于巩固国共合作。为此，“一定条件下的缓和退让也是必要的”。“统一不忘斗争，斗争不忘统一，二者不可偏废，但以统一为主，‘磨而下裂’”。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9月16日，毛泽东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记者谈话时郑重宣布共产党人对反共磨擦的态度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就完整地为中国共产党确定了反磨擦的基本方针。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八路军、新四军成功地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一次又一次的反共高潮。

粉碎第一次反共高潮

转引自《毛泽东军事年谱》，277～278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

《毛泽东选集》，第2卷，590页。

1939年12月至次年3月，国民党顽固派置抗战大局于不顾，悍然向陕甘宁边区及山西、河北的八路军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陕甘宁边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建并保存下来的惟一革命根据地。边区首府延安，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所在地。抗日战争时期成为人民抗战的政治、军事中心，也是敌后人民抗日武装的战略总后方。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政府迟迟不予承认，反而宣布为“非法组织”，“绝对不能令其存在”，并向边区委派专员、县长，造成边区内国共政权并存、磨擦事件不断的混乱局面。

蒋介石为封锁和取消边区，将嫡系胡宗南部调至陕中地区，使从西、北、南三面包围边区的兵力达30万人以上。1939年冬，国民党军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纠集在边区的反共势力，相继袭击边区西部陇东地区的镇原、宁县、正宁和边区南部关中地区的枸邑（今旬邑）、淳化等县的八路军留守兵团，摧毁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地方政权和群众抗日团体，制造流血惨案，强占了边区5座县城和6个区共43个乡镇。同时，在边区东面的绥德地区，绥德行政督察专员、“磨擦专家”何绍南，指使反动分子叛乱为匪，袭杀边区军政干部和人民群众，破坏边区治安。当第359旅由雁北返回进驻绥德时，他集中13个保安队准备偷袭，阴谋败露后，又煽惑3个县保安队哗变为匪，疯狂进行暗杀和袭击活动。

面对国民党军接连不断的袭击和掠地事件，第359旅在边区东面展开反击，清除了绥德、米脂、葭县（今佳县）、吴堡、清涧5县的反共势力。与此同时，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给朱绍良，以及蒋介石、孔祥熙、陈诚等国民党军政要员发出通电，要求停止军事行动，呼吁秉公处理。次年2月，萧劲光致电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天水行营主任程潜，要求通知陕西省政府撤走边区境内的国民党县长，否则护送出境。程潜不得不回电同意边区各县长由边区政府委任。

经过一番艰苦的交涉、斗争，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的代表与朱绍良的代表在陇东西峰镇达成了“维持现状，听候双方中央解决”的协议。国民党军进攻边区的军事行动告一段落。

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将这次反共高潮推到了高峰。阎锡山妄图依仗其军事优势，在日军协助和国民党中央军的配合下，一举歼灭被其视为异己的山西新军。

阎军进攻的第一个目标，是新军决死第2纵队。1939年12月1日，阎锡山令第2纵队于5日准备向同蒲铁路灵石至霍县段的日军铁路封锁线“大举破击”，实行所谓“冬季攻势”，又令所谓“讨叛军总司令”陈长捷指挥阎军4个军47个团作为总预备队堵在其后，使第2纵队陷入前后夹击之中。第2纵队洞烛其奸，遂停止行动。阎锡山以此为借口，下令进攻。第2纵队被迫自卫还击，在八路军115师晋西支队配合下，苦战10余日，击溃阎军两个旅，但仍被包围在孝义、汾阳地区，力小势单，处境危殆。中共晋西南区委果断决定晋西南地区的新军和晋西支队突围转移，于次年1月成功地转至大岳抗日根据地。

阎锡山消灭晋西南新军之计划破产后，又令第7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经部在陈长捷部配合下南北夹击晋西北地区的八路军和新军各部队，为反击阎军的大举进攻，中共中央军委派军委参谋长滕代远赴晋西北统一指挥，令第120

师主力从晋察冀边区返回，并组成以续范亭为总指挥的“晋西北拥阎讨逆抗日总指挥部”，指挥自卫还击。次年1月，对发动进攻的骑兵第1军和暂编第1旅以歼灭性打击，迫使赵承绶率部退到临县城内。滕代远决定集中兵力再击赵部。阎锡山为保存实力，令其南窜晋西南。

阎锡山仍不甘心失败，遂令第8集团军总司令孙楚率部配合国民党中央军5个军进攻晋东南的大岳和大行山南部地区。

为粉碎其进攻，八路军总部令第129师第386旅主力及总部特务团进入大岳地区，在第386旅旅长陈赓指挥下阻击顽军的进攻，给第27军以沉重打击，制止了其向临屯公路以北的推进，巩固了太岳根据地。在太行山南部地区的第344旅、晋曹边支队、独立游击支队、决死第3纵队等部在第344旅旅长杨得志、政治委员黄克诚指挥下展开反击，一举歼灭孙楚的独立第8旅一部，恢复了大南部分地区。其间，第129师主力一部在榆次、榆社地区歼灭由北向南进犯的阎军第19军暂编第2旅全部及新编第2师大部，打退了阎军的猖狂进攻。

1940年2月，八路军为贯彻中央书记处关于对顽军的进攻“应在自卫和有理有利的原则下，坚决打击彻底消灭”的指示，派总部副参谋长左权到大南地区组建八路军第2纵队，统一指挥这一地区的反顽作战。

面对八路军的严阵以待和坚决抗击，蒋阎军被迫收敛其进犯晋东南的军事行动。

国民党军在山西的进犯受挫后，乃将进攻矛头指向冀西和冀南地区。蒋介石令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省长鹿钟麟率部在第39集团军石友三和冀察游击总指挥孙良诚等部配合下发起进攻。为维护团结抗战的大局，彭德怀赴冀南与鹿钟麟会谈；朱德、左权劝国民党第97军军长朱怀冰停止磨擦；刘伯承也向其发出警告。然而，他们置若罔闻，继续进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八路军奋起抗击。邓小平亲临大南前线指挥13个团反击朱怀冰等部，歼灭两个师及其他武装万余人。程子华、宋任穷指挥冀南反顽作战，歼灭石友三等部6000余人，迫使余部逃到卫河以东的清丰地区。八路军奉令停止追击，结束了冀南反顽战役。

在西北、华北的反顽斗争取得胜利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适时实行休战方针，派遣朱德和萧劲光、中共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秘书长王若飞等分别到河南洛阳和陕西宜川县秋林镇同卫立煌、阎锡山进行谈判，达成协议：在晋西以汾离公路力界，互不侵犯；在晋东南及河北地区，以临屯公路和长治、平顺、磁县一线力界，该线以南为国民党军防区，以北为八路军防区。至此，第一次反共高潮彼粉碎。

八路军在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过程中，坚决执行了中共中央“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和“有理、有利、有节”，“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斗争原则。在国民党军发起进攻前，严守自卫立场，避免衅从我起，始终争取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保持主动；在国民党军发动进攻时，尽一切可能争取中间派保持中立，以集中力量狠狠打击最反动或对我威胁最大的反共力量，并力求每战必胜；在打退国民党军进攻后，及时收兵歇战，使斗争适可而上，并主动与对方谈判，达成休战协议。

由于我军坚持团结抗战的大局，灵活运用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反顽斗争的方针原则，从而粉碎了顽固派的军事进攻，保卫和巩固了抗战阵地，

在华北造成了对八路军十分有利的战略形势。

对这次反顽斗争的经验，毛泽东于1940年3月11日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做了总结。他强调指出，“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同顽固派斗争，必须注意下列几项原则。第一是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就是说，决不可无故进攻人家，也决不可在被人家攻击时不予还击。这就是斗争的防御性。对于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之。第二是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应懂得利用顽固派的矛盾，决不可同时打击许多顽固派，应择其最反动者首先打击之。这就是斗争的局部性。第三是休战原则。在一个时期内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之后，在他们没有举行新的进攻之前，我们应该适可而止，使这一斗争告一段落。在接着的一个时期中，双方实行休战。这时，我们应该主动地又同顽固派讲团结，在对方同意之下，和他们订立和平协定。决不可无止境地每日每时地斗下去，决不可被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这就是每一斗争的暂时性。”这三项原则，不仅是反顽斗争的军事原则而且也是政治原则。对指导人民军队正确开展反顽斗争，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这些原则的贯彻执行，保证了全党全军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处于主动地位，立于不败之地。

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

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失败使蒋介石意识到，华北的力量优势不在自己一边，在那里制造反共磨擦捞不到任何好处，于是将反共的重心由华北移到了华中。

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发动，与国际形势的变动密切相关。1940年6月，德军进占巴黎，法国投降。日本与德、意缔结军事同盟条约，以便从中国战场抽兵南进，为此德国再次出面调停，日本对蒋加紧诱降。英、美一改以牺牲中国利益换取日本妥协的绥靖政策，加紧拉蒋以遏制日本。苏联根据《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继续给蒋以援助。国际上对蒋的三种态度，使其处于身价猛增，“待价而沽”的有利地位。加之，国民党军进攻苏北新四军时于黄桥一役吃了亏，亦急于报一箭之仇。

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指使其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发出“皓电”，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电到一个月内撤到黄河以北指定地域，以此揭开了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序幕。11月9日，中国共产党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发出“佳电”，拒理驳斥“皓电”的污蔑和无理要求，但为顾全抗战大局，仍答应在江南的新四军正规部队北移，不过须宽以期限。14日，国民党军拟定了集中第3、第5战区主力在“黄河以南剿灭共军作战计划”，第一步第3战区部队于1941年1月底前歼灭江南新四军，尔后转兵歼灭苏北新四军；第二步第5战区部队于1941年2月28日前歼灭黄河以南的八路军和新四军。12月7日，蒋介石批准执行这个计划。8日，国民党又以何、白名义发出“齐电”，令黄河以南之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开至河北，以此制造进攻借口。蒋介石亦从后台跳到前台。他于9日令黄河以南之八路军、新四军北开，次日即令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按照前定计划，妥为

部署并准备”，江南新四军年底前若不北移，“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这时，国共两党关系急剧恶化，皖南的军事冲突已箭在弦上。

面对国民党的军事企图，毛泽东多次电示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兼新四军副军长（实力政委）项英，要皖南部队渡江北移，并做好应付突然事变的一切准备。12月26日，毛泽东又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电告新四军：自己想办法，下决心克服移动中的困难。“你们不要对国民党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国民党帮助你们任何东西，把可能帮助的东西只当作意外之事。你们要有决心有办法冲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达到北移之目的。如有这种决心办法，则虽受损失，基本骨干仍可保存，发展前途仍是光明的；如果动摇犹豫，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12月下旬，顾祝同决定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指挥7个师8万余人从东、南、西三面围堵皖南新四军。

1941年1月4日晚，在皖南的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9000余人从云岭出发，拟经苏南向江北转移。1月6日，当部队行至泾县茂林地区时，突遭国民党军包围和拦击。新四军指战员被迫还击，经七昼夜血战，终因弹尽粮绝，处置夫当，除2000余人分批突出重围外，其余近7000人或受伤被俘或壮烈牺牲。叶挺奉令与国民党军谈判时被扣，项英、周子昆突围后被叛徒暗害，袁国平在分散突围中牺牲。此即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由此达到顶点。

1月17日，国民党通过其军事委员会发布通令，诬称新四军“叛变”，宣布撤销其番号，将叶挺军长革职，“交军法审判”，并通缉副军长项英，妄图先声夺人。

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使中共领导人一度认为国共的全面破裂已经开始，国共第二次合作已经完结，应当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同时展开全面反攻，但经过反复权衡，中共中央又改变了想法，认为时机不成熟，力量不允许，因而决定采取政治攻势、军事守势的方针。1941年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总结新四军失败的原因后指出：对于皖南事变，我们要实行全国的政治反攻，像前年反对第一次反共高潮那样非常强硬的态度。只有不怕破裂，才能打退国民党军的进攻。20日，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全军整编为7个师另1个独立旅，共9万余人。同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发言人名义发表《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严词揭露了国民党的反共阴谋，提出包括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惩办制造皖南事变的祸首、释放叶挺、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撤退华中剿共军等善后办法十二条。新四军将领17人发表声讨亲日派通电，谴责亲日派行秦桧之志。周恩来指示《新华日报》拒登军委会通令，还亲笔书写“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挽联在报上发表，揭露皖南事变真相。

在如何解决皖南事变的问题上，苏联和共产国际要求中共采取息事宁人

蒋介石致顾祝同电，1940年12月10日。

蒋介石致顾祝同电，1940年12月10日。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600页。

《周恩来年谱》，48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89。

的政策，对蒋介石作某些必要的让步，以避免因国共破裂而影响蒋介石抗日。毛泽东对此不以为然，他让周恩来转告苏联驻华总顾问崔可夫：“要我们对蒋让步，是危险的。目前是迫蒋对我们让步时期，不是我们对蒋介石让步时期”，我们的目的“在于以攻势打退攻势”，这“只会迫蒋抗日，不会妨蒋抗日”，“只会好转国共关系，不会破坏国共关系”。

事实证明，中共采取尖锐对立的政治进攻策略是成功的。蒋介石在中共猛烈的政治攻势下陷入前所未有的孤立地位。国民党左派中的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在香港发起抗议运动，并3次致电蒋介石，要求他“悬崖勒马”，“撤销剿共部署”，连阎锡山、胡宗南等在此次反共高潮中亦表示中立。海外侨胞陈嘉庚等痛斥国民党倒行逆施，呼吁“弭止内战，加强团结”。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和武官崔可夫相继向何、白提出质问；美国总统代表居里当着蒋介石的面批评其对内政策；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劝蒋介石终止国内冲突。日本人的行动亦超出了蒋介石的预料，并未坐山观虎斗，而是趁蒋大举反共时出兵豫南，将国民党准备进攻豫皖苏抗日根据地的反共大军搞得东逃西窜，使蒋在政治上、军事上遭到很大打击。

在此情况下，蒋介石被迫收敛其反共活动，3月6日他在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上发表谈话，一方面仍强调其军令，政令必须统一；另一方面又被迫表示“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尽管中共参政员无一人与会，但会议仍下得不选董必武力常驻委员。对此，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一种阿Q主义，骂我一顿，他有面子，却借此收兵”。3月14日，蒋介石约周恩来面谈，表示了和解之意。至此，第二次反共高潮被粉碎。

蒋介石和国民党顽固派是血腥屠杀皖南新四军的罪魁祸首。但是，皖南事变新四军损失如此之重，作为新四军的最高领导人和决策者的项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毛泽东于1941年1月中旬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皖南事变发言时指出：“皖南新四军的失败，从我们自己方面来说，首先是由于新四军的领导项英、袁国平没有反磨擦的思想准备，其次便是指挥上的错误。新四军本来可以北上，但项英动摇。”就项英一生来说，他对人民革命事业，无疑是有贡献的，而在皖南事变中却犯了原则错误：一是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认识不足，对国民党顽固派存有幻想，丧失了必要的警惕性；二是对中共中央“向南巩固，向北发展，向东作战”的战略方针理解不够，军部长期株守皖南面敌背顽的狭长地带，处于危险境地；三是对皖南部队北移迟疑不决，未抓住国民党军围攻部署就绪前移动的时机，陷入了被动；四是对国民党军的进攻未作充分准备，惊慌失措，指挥失当，导致皖南新四军遭受严重损失。

第二次反共高潮，是国民党在抗战中发动的规模空前，最为严重的一次反共行动。国民党军虽击败了皖南新四军，但其歼灭黄河以南八路军、新四军的计谋却破产了。蒋介石在这次斗争中直接出面反共，狰狞面目已暴露无遗，广大人民群众对他的幻想开始消失。经过此次较量，国共两党的地位发生了有利于共产党的变化。皖南事变震惊中外，引起了全国及世界人士的关

毛泽东致周恩来电，1941年2月14日。

《国民党大事记》，323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

毛泽东致周恩来电，1941年3月12日。

《毛泽东军事年谱》，343页。

注，中国共产党的声望显著提高，更加成力坚持团结抗战的重要因素。

在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反顽斗争的经验。毛泽东在5月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的党内指示，对这次斗争的经验进行了总结：第一，国民党的反共历史特别是抗日战争中两次反共高潮证明，和其反共政策作战，需要一整套的战术，万万不可粗心大意。“任何的人民革命力量如果要避免为蒋介石所消灭，并迫使他承认这种力量的存在，除了对于他的反革命政策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便无他路可循。”对项英的失败，全党应引为深戒。第二，“在中国两大矛盾中间，中日民族间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间的矛盾依然处在从属的地位。”因此，同国民党作斗争“必须是有理、有利、有节的，三者缺一，就要吃亏”。第三，在同顽固派的斗争中，不争取中间派的同情和支持，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中间派即中间势力，不仅包括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国民党中央和机关中有爱国心的官员也属于这个范畴。为争取中间势力，在不损害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原则下，作适当让步是必要的。由于皖南事变时，在《佳电》中同意皖南部队北移，并在事变后适时转入政治反攻，使中间派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从而取得了他们的同情与支持。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对中间派及其重要性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挫败第三次反共高潮

在国共合作抗日的过程中，两党关系常以国际关系的变化为转移。第三次反共高潮就发生在德意日法西斯处于不利、盟军已在欧亚两洲转入反攻及共产国际解前之际。

1943年春，苏联红军取得斯大林格勒战役的重大胜利，美军则攻占了日军在太平洋的重要据点瓜达尔卡纳尔岛。在此形势下，蒋介石一方面希望盟军战胜德国后集中力量打败日本，使他不费力气就可赢得抗战胜利；另一方面，他又担心和害怕共产党力量的壮大，使其反动统治难以为继。为维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准备大举反共，蒋介石在美、英等国废除在华不平等条约后，叫嚷中国从前的命运在外交，今后的命运在内政。于是，他在3月10日公开抛出《中国之命运》一书，竭力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并疯狂攻击共产主义和共产党，诬蔑八路军、新四军为“新式军阀”、“变相割据”，扬言要在两年内解决中国内政问题，即消灭共产党和一切抗日民主力量。为此，蒋介石令各战区指定精锐部队，专负“清剿”之责，不仅要消灭华中的新四军、华南的抗日游击队，对黄河以北的八路军亦企图分割包围歼灭。

在蒋介石的统一部署下，国民党中央通知各省党部和政府，称中共为“奸党”，同时命韩德勤、王仲廉、李仙洲等部向八路军、新四军挑衅。但由于八路军、新四军的坚决反击，各路顽军未能得手。

5月中旬，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国民党认为，共产

《毛泽东选集》，第2卷，782、781、783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782、781、783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782、781、783页。

党失去了国际支持，正是迫其就范的天赐良机。复兴社特务头子张涤非在西安召集座谈会并发出通电，叫嚷“马列主义已经破产”，“要求解散共产党”，交出边区”。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对此事发表新闻报导，通告中外，煽动反共舆论。届时，要求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的喧嚣声不绝于耳。蒋介石趁此密令第8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调集兵力进犯延安，妄图夺取陕甘宁边区。6月9日，何应钦、白崇禧、胡宗南等到耀县召开作战会议，部署进攻。6月底至7月初，胡宗南撤河防之军，调集60万兵力，准备分9路闪击延安，其先头3个师已向陕甘宁边区推进，并炮击关中军分区警戒阵地。7月2日，胡宗南令各部于10日完成一切作战准备，听候蒋之手令即行进攻。至此，内战危机，千钧一为挫败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进犯，中共中央决定在政治上开展有力反击，在军事上准备自卫作战。7月4日，朱德致电胡宗南，劝其勿破坏团结抗战之大业。6日和9日，又致电蒋介石、何应钦及军令部长徐永昌，抗议胡宗南挑衅，呼吁团结。8日，中共中央决定发动宣传反击，通过在重庆的董必武把国民党军阴谋进攻边区的消息向大后方各界和各国驻重庆使馆通报，力求运用国际国内统一战线发动制止内战运动。9日，延安民众3万人集会，给蒋、胡及各方要人发出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通电。

12日，《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撰写的《质问国民党》的社论，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制止内战。紧接着，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和大后方人民及爱国人士也纷纷集会，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与此同时，中央军委从第120师和晋察冀、冀鲁豫抽调部队加强陕甘宁边区，并从冀中地区调部队增强晋西北防务。联防军在此期间重新调整了陕甘宁边区的防御部署，做好了反击国民党军进犯的各种准备。美、英、苏等国共同警告中国政府不要内战，否则将终止援助。国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和陕甘宁边区在军事上的充分准备，加之陇南民变蜂起，迫使蒋介石下令胡宗南改变决心。大规模进犯陕甘宁边区的行动被制止。

国民党于3月发动的波及西北、华北、华中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至10月被彻底挫败。这次反共高潮之所以被打退，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继续坚持了反顽斗争的方针原则，在政治上展开强大攻势，动员国内外舆论揭露国民党的内战阴谋行动，使其陷于孤立；在军事上坚持自卫立场，不打第一枪，并对敢于来犯之顽军予以坚决打击。国民党在军事和政治方面均遭到惨败，共产党则占据了主动地位，赢得了国内外人民的广泛同情与支持。

六、实行精兵政策和开展整风、生产、拥政爱民运动

从 1941 年开始，由于日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进攻，并且在根据地内进行“扫荡”、“蚕食”过程中，将数以百万计的壮丁抓往东北和日本国内，加之国民政府在皖南事变前断绝了对八路军的粮饷和其他供应，并继续以几十万军队对根据地实行包围和封锁，以及各地不断发生自然灾害，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根据地的生产力遭到很大破坏，敌后军民在衣、食、住、行等方面遇到极大困难。毛泽东在谈到当时的困难情景时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为战胜严重困难，坚持抗战，争取胜利，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陆续提出各种政策措施，即：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审查干部，时事教育，三三制，减租减息。后来毛泽东将这些政策概括为十大政策。

实行精兵政策

从 1941 年 12 月尤其是 1942 年初起，八路军，新四军普遍实行了精兵政策。

八路军、新四军之所以要实行精兵政策，是由抗日根据地面临的极其严峻的形势决定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抗日军民力及时而正确地摆脱困境，取得对敌斗争更大胜利的现实需要。

抗战以来，八路军、新四军虽然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和发展自己等方面取得重大胜利，但也逐渐出现了机关臃肿，部队庞大，行动困难，指挥不便的现象。这样便产生了两个亟待解决的矛盾：一是由于物质条件恶劣，根据地的生产力状况与所能养活的军队之间，产生了水小鱼大、兵多难养的矛盾；二是庞大的军事机构行动困难，指挥不便，为战争环境所不容。此种矛盾不解决，便有坐毙危险。

其实，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早就预见到了敌后抗战严重困难时期的到来和新阶段的出现，对困难的严重性，长期性及根据地内我军的现状有清醒的认识，并依据敌我力量的诸般变化与敌后斗争客观形势的发展，开始寻求解决的办法。

1940 年 8 月 20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各抗日根据地内节省人力物力，坚持长期抗战的指示》，明确要求全区域党政军民学脱离生产者之人数与全人口之比例不能超过 3%。

1941 年 11 月 7 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指出：主力军应采取适当的精兵主义，其工作重心是提高其政治军事技术的质量，缩编与充实编制。中央军委还认为，无论将来有无大的变动，在山地根据地内主力军与地方军数量上的比较，一般应以二与一之比为原则，在平原根据地内则以一与一之比为原则；在某些最困难的区域，应当打消主力军与地方军的区别，全部武装地方化。

1941 年 11 月 6 日，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等在陕甘宁边区第 2 届参议会上提出“精兵简政”的提案：对于军事应实行精兵主义；对于政府应实行倚

政主义。在毛泽东支持下，提案被大会通过并形成边区政府的决议。

12月6日，《解放日报》发表《精兵简政》的社论，指出，“精兵简政”不仅在陕甘宁边区，即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也是非常恰合时宜的主张。即是说，在敌后，敌我斗争已进入新的阶段的情况下，我们的兵，不能不精，我们的政，不能不简。17日，中共中央《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中要求：为进行长期斗争，准备将来反攻，必须普遍地实行“精兵简政”；“精兵简政”，节省民力，是目前迫切的重要的任务。

28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给八路军、新四军及党的主要负责同志的指示中，要求各根据地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实行精兵简政。很明显的，军事系统的精兵和政权系统的简政是同时进行、互为促进的。就我军而言，则是实行精兵政策。

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八路军、新四军根据各自情况进行了精兵政策的落实。

1942年上半年，全军进行了第一次精兵，取得初步成效，但还有较大差距。8月3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彻底实行精兵政策》，指出：各抗日根据地应用一切力量来彻底实行精兵政策。4日，毛泽东针对新四军部分同志认为华中特殊不能精兵简政的错误观点，致电陈毅指出：华中情形虽略有不同，但总方向是相同的。要求须下绝大决心实行彻底的精兵简政。5日，毛泽东电示晋察冀分局，强调在这个政策上迟疑不决，就将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9月7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要求各根据地都要把精兵简政“当作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来看待”。从9月开始，我军又进行了更加彻底的第二次精兵，同时发展地方军及民兵。

1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统一领导与精兵简政工作的指示》，要求在今冬明春，没有实行精兵简政的地方立即着手研究实行精简，已经实行了地方再审查，凡不彻底的地方，须彻底来一次大大的痛快的精简（不是小小的不痛不痒的）。据此，我军于1942年底到1943年春又进行了最为彻底的第三次精兵。整个精兵工作到1943年下半年基本结束，由此可见，精兵政策的实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痒的、局部的，而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

全军经过大刀阔斧的精兵工作，收到了较为满意的效果：

按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各部队先后多次缩编机关，整编部队，减少指挥层次，充实和加强战斗部队。如晋西北军区，精兵前，机关与部队人数的比例，师旅级为1:1.7，团级为1:3.7；精兵后，师旅级为1:5.6，团级为1:10.8。据晋察冀边区1942年8月统计，战斗队队员额已占边区部队总人数的84.36%。新四军军直精兵前战斗员占总数的31%，精兵后占总数的65%。第120师第一次精兵后，连队最少为60人，一般连队在80人左右。第二次精兵后，每连平均达130人左右。机关变得更加精干，部队战斗力也相对地提高了。

各作战部队从本地区、本部队的具体情况出发，实行了多种灵活的编制方式。八路军第120师于1941年底实行甲、乙、丙三种编制（旅团）。第129师的团实行甲种团辖3个营9个连（每个连以9个班为基础），乙种团辖2个营6个连，丙种团辖4个连的编制。晋察冀军区取消了挺进军番号，主力部队按大团3个营、小团5个连编制。新四军则采取甲、乙、丙三种师的编制，甲种师采取3旅3团3营4连制，乙种师采取废旅制，丙种师采取

废旅、团亦废营制。这种编制的调整，表现出高度的灵活性，更适合敌后游击战争复杂、艰苦环境的要求。作战部队编制合理，量小而质精，更有战斗力。

主力军固有全国性，同时又具有地方性。为更好地适合最困难时期坚持抗战的需要，我军将更多的主力军直接变为地方军，不仅实现职能上的地方化，有的将组织形式也地方化，加强了地方部队和人民武装的力量。1942年8月，山东纵队改为山东军区，其所属主力第2、3、4旅和第115师教导第2、5、6旅分别与二级军区。军分区合并。次年3月，第115师与山东军区合半成立新的山东军区，罗荣桓任司令员兼政委。冀南军区以3个主力旅与3个军分区合并。在一些最困难的地方，如冀东、大青山、苏南等地全部实行“主力地方化”，把主力军划归为地方军，就地坚持抗日。

对精兵后的编余人员尤其是干部如何处理，直接关系到精兵工作的施行和效果。各部队按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基本政策，进行了统筹、妥善的安置。编余干部除充实地方武装外，或送学校培训，或转到生产岗位。老弱干部及战士也作了合理安置。同时，加强了对各级干部的在职培训。

精兵政策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鱼大水小”的矛盾，缓解了敌后根据地在物质供应方面的困难，同时也达到了精简、效能、统一、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的目的，实现了精干的主力军与强大的后备军的有机结合，使之更加适应游击战争的需要，这对于战胜极端困难，奠定反攻基础都是十分重要的。精兵政策的实行也使人们认识到：军队的发展与精简，是军队建设不可或缺两种形式。何时采用何者形式，则需要依据战争情况的变化而定。作为指导者，应审时度势地把握这一时期军队建设的大局和重心，及时制定政策，转变军队建设的工作重心。全军则应将战争指导者制定的政策化为自觉的行动。二者缺一不可。同时，军队的规模要适度，结构要合理，要与一定的经济力和战争的要求相适合。所谓“精兵”，并不是说取消主力，消极地裁减主力部队的员额，简单地缩小后方勤务机关；也不是裁兵减员，拆台散伙；而是要充实、加强主力部队的作战力量，并按照不同的情况，规定何者应裁减，何者应紧缩，何者应充实；按照斗争形势发展的规律，主动地改变我们战斗组织。精兵政策的实行，为我军的精兵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正如毛泽东1945年12月15日指出的：“兵贵精不贵多，仍是今后建军原则之一。”

全军整风运动

从1942年春天起，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全党全军范围内展开了一次普遍的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是有领导、有准备、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起来的。它的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方针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达到新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次整风运动是抗日战争的整个革命链条中的根本环节，在精神生活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之所以要在全党全军进行这样一场整风运动，是党领导革命军队、革命军队完成斗争任务的需要，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从 1931 年开始，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给中国革命造成巨大损失。在 1935 年 1 月的遵义会议上，由于条件尚不成熟，毛泽东明智地将解决问题的范围严格限制在军事路线上，而将认识尚不一致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问题留待以后解决，这样做既适合了多数同志的认识水平，又维护了党内团结。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的正确与否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兴衰成败。因此，错误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迟早要加以纠正。

全国抗战爆发后，王明等人深受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影响，由原来的“左”倾教条主义，一变而力右倾投降主义，主张放弃党在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六届六中全会虽然制止了王明的右倾错误，但是党的历史经验没有来得及在全党范围内进行系统的总结，也没有从思想根源上对党内历次“左”倾和右倾错误进行深刻的揭露。

到了 1941 年前后，纠正错误的政治路线、确立正确的政治路线的时机终于成熟。这时，中国革命已走出低潮，抗日根据地和八路军、新四军已取得很大发展；党内已形成了以毛泽东力首的领导核心；党和军队高层领导人中已有一大批了解党的历史上多次“左”、右倾错误的经验教训的骨干；从客观环境看，敌后抗战虽处于困难阶段，但总的斗争形势变化较小，尤其是党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比较稳定和平静。

全党全军性的整风运动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开始的。

八路军、新四军是中国共产党完成中国革命事业最重要的一支力量。过去一个时期的主观主义曾给予部队一些影响，三风不正现象特别是宗派主义思想在部队还是存在的。抗战开始后随着部队的扩大，新的成分加入部队，加之处在统一战线的环境中，部队又出现了一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更重要的是，某些军队干部在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是很贫乏的，不能自觉地反对军事领域的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肃清地主资产阶级军事理论的影响；也不能综合实践的经验，吸收一切有利的东西，来丰富与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不是生吞活剥接受人家的东西，就是固步自封，满足于狭隘的经验。

为了实现党内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的统一与一致，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巩固军队的团结，同心同德地战胜困难与迎接将来的光明，都需要进行整顿三风的工作。基于这种需要，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认为有必要在全党全军开展一次整风运动。

早在 1938 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就向全党全军提出了“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任务，这对于后来整风运动的开展起了积极推动作用。1941 年 5 月 19 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指出过去错误路线的思想根源，主要是广泛存在于党内的理论和实践相分离的主观主义倾向，因此，毛泽东在文章中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理，提出了改造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的问题。9 月 10 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批判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使党的高级干部对于中国革命许多关键性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上取得一致的认识。

26 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

11 月 29 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高级军事干部学习的决定》。八路军新四军各主要负责人，军队的师、军区或纵队的干部都参加了高级学习组的学习。

1942年2月，毛泽东先后发表《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演说，整风运动随之进入普遍整风时期。

反对主观主义，是这次整风的最主要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曾在很长时间内为主观主义所统治。党内的“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思想基础都是主观主义。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中指出，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其中，教条主义更危险，因为教条主义容易装出马克思主义的面孔，吓唬工农干部，把他们俘虏起来，充作自己的佣人，而工农干部不易识破他们：也可以吓唬天真烂漫的青年，把他们充当俘虏。经验主义往往将经验绝对化，以自己的经验为满足。军事领域也存在着一定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必须立即纠正。

整风运动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反对宗派主义。

党的统一是由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统一来实现的，二者缺一不可。同时，思想上的统一又是由组织上的统一来保证的。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在党的历史上，当主观主义思想占统治地位时，在党内军内的组织上必然要实行宗派主义。遵义会议之后，党内军内并没有占统治地位的宗派主义了，但宗派主义的残余还是存在的。反对和消除主观主义，发展实事求是的精神，就必须铲除这个祸根。这样，才能使党和军队胜利前进。

军队在历史上曾受过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干扰和破坏，对此未曾进行彻底清理。抗战以来，军队的一些人在个人和党的关系、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的关系、军队和军队的关系等方面，还存在着宗派主义的残余。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严厉批评了党内军内一些干部“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要求全党全军树立共产主义精神，防止宗派主义倾向，达到队伍整齐，步调一致的目的，以利战斗。

随着全党整风运动的普遍展开，全军的整风运动也从1942年夏季全面展开。同年6月16日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军队中整风学习与检查工作的指示》，7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关于军队中的整顿三风》，强调军队开展整风，是为了反对军事领域中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提高党性，增强团结，提高战斗力。为搞好整风，八路军、新四军都成立了学习委员会与检查委员会等机构。

全军的整风一直持续到1945年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步，学习文件，结合抗战的形势、任务和我党我军的地位，明确整风的宗旨、内容、意义，以提高整风的自觉性和针对性；第二步，进一步领会整风文献的精神，联系实际，开展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划清马列主义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是非界限，对政治立场、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进行全面检查；第三步，在前面学习。检查的基础上，个人和单位写出总结，并进行审查干部的工作。

此外，在整风运动中，军队还批判了军阀主义倾向。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军队领导干部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的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严肃地批判了军阀主义倾向：某些干部把党的军队看成为自己的势力；某些官兵关系不正常，官兵之间脱节；某些干部之间的关系不正当；一些地区军民关系、军地关系不正常；政治工作的职权与地位被忽视、被抹煞等。任弼时在《肃清部队中军阀主义倾向》的演说中，严肃指出了军阀主义存在的危害性和根源：某些干部和某些部队中产生着一些严重的现象，它对于过去的优良传统起着一种腐蚀的和摧毁的作用。这种现象就是军阀主义

的倾向。这种倾向的存在，就成为军队干部向党闹独立性的一种根源，必须认识必须警惕这是一种很危险的倾向。我们必须努力克服它，防止它发展，然后才能巩固我们的部队中的一些优良传统。如果任其发展，那是非常危险的。会议期间，军队的一些领导人对军阀主义等问题还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

在整风运动中，军队的高级领导干部还参加了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学习。在这期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作了一系列关于党史的报告，指导干部正确地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军队干部和其他干部一道，对于党的全部历史人特别是1931年初到1934年底这一时期中央的政治路线，进行了多次讨论。同时，还组织了曾在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中工作过的同志，召开各地区、各部队的党史座谈会，如红七军、红五军团历史座谈会，湘鄂赣边区、湘赣边区、鄂豫皖边区、福建地区、闽西地区、闽粤边区党史座谈会等，认真分析全党的路线问题，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提高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

1944年5月21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召开。会议中间多次召开大会讨论党的历史问题和路线问题。在1945年4月20日，即最后一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作了说明，对党内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出详细的结论，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中，将“前车之覆”成为“后车之鉴”，达到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上的一致。《决议》的通过表明，中国共产党真正走上一条独立自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化的正确道路；军队同全国人民一道去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至此，整风运动胜利结束。

军队的整风运动和全党的整风一样，取得了重大成果。通过整风，全军指战员尤其是高级指挥员提高了马克思主义水平，增强了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军队坚持党的路线的自觉性，密切了军政、军民、军队内部等各方面的关系。军队整风运动，为军队与全国人民一道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今后的更大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大生产运动

军队开展大生产运动，是克服经济困难，减轻人民负担，坚持持久抗战并夺取抗战胜利，而采取的一项重大措施。抗战以来，由于日军不断发动进攻和残酷“扫荡”，国民党政府实行经济封锁，各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陷入严重困难的境地，军民生活极为困苦。因此，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发展经济，增加财富，便成为坚持敌后抗战的一项基本政策。

军队的大生产运动首先是从陕甘宁边区的部队系统开始的。1938年，留守兵团的部分部队在战斗和训练之余，出于改善生活的目的，从事一定的农副业生产。毛泽东对这一做法予以肯定，要求推广到留守兵团的所有部队。

1939年春，毛泽东向陕甘宁边区军民提出了“自力更生”，“自己动手，生产自给”的方针，6月10日，又明确提出了“自力更生，克服困难”的方针。1940年2月，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指出：抗日战争已进入更艰苦的阶段，财政经济问题的解决必须提到政治的高度。要求军政首长、各级政治机关努力领导部队的生产运动，各部队依不同环境和条

件，开展生产运动，做到一面战斗（非战斗机关是一面工作），一面生产，一面学习。从此，凡条件许可的边区部队都先后开展了大生产运动。于是，边区部队以改善生活为目的的局部性的农副业生产，发展为整个边区的以逐步实现经济自给为目的的生产运动。进入 1941 年以后，抗日根据地进入极端困难的时期。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号召边区军民更加努力地开展生产运动，以使边区的财政经济由半自给转到完全自给。陕甘宁边区的生产运动由此进一步发展起来。这种大规模的军队生产运动真可称之为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

在大生产运动中，八路军第 359 旅开发南泥湾并创造的“南泥湾精神”，树立了一面光辉的旗帜。

1941 年初，中共中央命令八路军第 359 旅开赴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在朱德进行实地考察后，从 3 月起，王震率 359 旅陆续开进南泥湾等地。南泥湾一带多年荒芜，人烟稀少。他们在生产资金缺乏和生产工具缺少的极端困难情况下，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经过丙年的辛勤劳动，把荒凉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江南”。到 1943 年，359 旅生产的粮食全部自给。

1944 年，不仅实现了粮食和日用品全部自给，而且达到了“耕一余一”，开始向边区政府上交粮食。同时，359 旅指战员用自己的汗水生产了比粮食更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在生产过程中，上自旅长兼政委王震和其他旅首长，下至勤务员和炊事员，都编入生产小组，参加劳动，同甘共苦。718 团团团长陈宗尧和政委左齐身先士卒，带领和鼓舞大家开展劳动竞赛，受到毛泽东的表扬。他号召大家“学习这两位同志的精神”。因此，在开发南泥湾中创造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官兵一致、同甘共苦等内容的革命精神，就是后来人们称赞的“南泥湾精神”，对全党全军起了极其深刻的教育作用，对战胜困难，完成抗日大业乃至夺取民主革命的胜利。都产生了重大作用。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各抗日根据地大生产运动初步展开之后，及时总结经验，给予督促和指导，使大生产运动发展为普遍运动。1942 年 9 月 9 日，《解放日报》发表《积极推行“南泥湾政策”》的社论，向各个抗日根据地推广了 359 旅的经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中央、军委领导都亲自动手，开荒种地，学习纺线，并亲赴南泥湾进行考察，进行指导，给各抗日根据地军民以极大的鼓舞。

1942 年，毛泽东在《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报告中，总结了各根据地军队开展大生产运动取得巨大成绩的原因与经验。他指出：这种成绩是依靠了什么才达到的呢？是依靠了干部们的积极领导与战士们的劳动热忱才达到的。没有这两种人的自觉性，没有他们感觉到他们的工作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什么无聊的事业，而是为了神圣的革命需要，假如他们没有这种感觉，那末，是无法完成这种艰苦的生产任务的。此外，毛泽东还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毛泽东的这篇报告及 1943 年写成的《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组织起来》等文，构成了党领导根据地大生产运动的基本纲领。1943 年初，中共中央提出了“丰衣足食”的口号，既是号召，又是具体要求。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以此为指导，使其他抗日根据地的生产运动于 1943 年、1944 年发展为普遍运动。经过努力，敌后各根据地也大多做到粮食自给 1 个半月到 3 个月，蔬菜基本自给，并发展了其他各项生产事业。素以贫脊著称的晋绥边区，到 1943 年已基本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晋察冀边区军民的吃饭问题，也基本上得到解决；晋

冀鲁豫边区到 1944 年，部队一般能实现每人自给 3 个月的粮食和当年的蔬菜；山东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不仅保障了部队供给，而且还储备了大批粮、油、棉、盐等重要物资；华中根据地军民也通过自己动手，逐步做到丰衣足食。一些游击区也创造了“劳力与武力相结合”的斗争形式，一手拿锄头，一手拿枪杆，一面打仗，一面生产，在残酷斗争中获得了优异的生产成绩。

军队的大生产运动从改善官兵生活，克服困难起步，逐渐发展为生产自给，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对此，毛泽东指出，军队的生产自给虽然在形式上是落后的、倒退的，但实质上是进步的，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在形式上，我们违背了分工的原则。但是，在我们的条件下，国家贫困、国家分裂（这些都是国民党统治集团所造成的罪恶结果）以及分散的长期的人民游击战争，我们这样做，这是进步的了。我们自己，在没有生产自给的时候，何等困难，一经生产自给，何等舒服。我们采用了这种表面上“落后的”、“倒退的”办法，而使我们的军队改善了生活，减轻了人民负担，并足以支持长期战争和扩大军队，因而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时至今日，军队大生产运动创造的“南泥湾精神”，仍然是鼓舞军队胜利前进的精神力量。

拥政爱民运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奉行军政一致、军民一致的原则，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建立了严格的群众纪律，因此，在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政、军民关系是亲密的、团结的。但是，由于军阀主义、宗派主义等旧思想旧作风残余的影响，加之游击战争的高度分散的环境、纪律教育的放松等原因，也有个别军队干部不适当地强调军队特殊性，骄傲蛮横，不执行根据地政府的法令，不尊重根据地政府，超越军队权限擅自代行政府职能，甚至侵犯群众利益，违犯群众纪律。同时，由于根据地遭到严重经济封锁和出现自然灾害，部队供给时常遇到困难，一些人对政呀和根据地人民体谅不够，存有埋怨情绪。

密切军政、军民关系，实行军政一致、军民一致，是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也是克敌制胜的法宝。未彻底解决的一些不良现象，是与军队的光荣传统格格不入的，也是影响抗日的不利因素。1940 年 1 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农业展览会上讲话时，就通俗而深刻他说明了军民合作的道理：八路军也就是老百姓，故军队不要忘本，本就是工农。老百姓是主人，我们要军民合作。大家亲亲密密团结起来，日本一定打倒的。8 月 5 日，八路军总政治部专门发出《关于严整纪律改善军政民关系的训令》。13 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对野战政治部召集的政治工作会议及军区干部会议的指示中，指出：应当与军队中破坏对居民纪律的行为，不爱护根据地，浪费人力物力，不尊重政府及地方党以及一切脱离党的政策的行为，作严肃的斗争。

为彻底克服军队中存在的尊重政府、违犯群众纪律的现象，进一步密切军政、军民关系，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领导与推动下，从 1942 年底开始，陕甘宁边区的部队首先开展了拥政爱民运动。

1942 年 10 月 19 日至 1943 年 1 月 14 日，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和陕甘宁边区部队军政干部会议上，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都各自检查了军政军民关系上存在的问题。为了克服各自的缺点，加强军政、军民团结，建设和巩固

抗日根据地，经军队和地方政府商定，分别在部队和地方开展一次“拥护政府，爱护人民”和“拥护军队”的运动。据此，1943年1月1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了《拥护军队的决定》、《拥军公约》和《“开展拥军运动月”的工作指示》。1月25日，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和政治部发布《关于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决定》，要求边区部队必须提高全军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认识，使党政军民更加团结一致。同日，留守兵团政治部发出《关于拥政爱民运动月的工作指令》，决定从2月5日至3月4日为边区部队拥政爱民运动月的决定。2月1日，贺龙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开展拥政爱民运动》，向部队发出了号召。同日，留守兵团公布了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个拥政爱民公约。内容是：服从政府法令；保护政府，帮助政府，尊重政府；爱惜公共财物；不得侵犯群众利益；借物要送还，损失了要赔偿；积极参加生产，减轻政府和人民的负担；帮助人民春耕秋收和冬藏；帮助人民进行清洁卫生运动；了解民情风俗，尊重民情风俗；向人民宣传，倾听人民意见。从此，陕甘宁边区便出现了军队拥政爱民的热潮。与此同时，边区人民拥护军队，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的运动也蓬勃开展起来。拥政爱民与拥军优抗互为呼应，互为推动，消除了军政、军民之间的某些隔阂和误会，进一步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增进了军政、军民团结。

八路军留守兵团拥政爱民和陕甘宁边区拥军优抗的成功经验很快被推广到敌后各抗日根据地。1943年5月8日，《解放日报》发表《拥军运动和拥政爱民运动的经验》的社论，号召各抗日根据地部队学习和借鉴陕甘宁边区部队开展拥政爱民运动的做法。10月1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指示中，明确地指出：应准备于明年阴历正月普遍地、无例外地举行一次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的广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要求军队方面，重新宣布拥政爱民公约，自己开检讨会，召集居民开联欢会（当地党政参加），有损害群众利益者，实行赔偿、道歉。以后应于每年正月普遍举行一次。

10月14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又强调：一切问题的中心是老百姓的问题，武装的人民（军队）与非武装的人民要打成一片，必须要有政策来实现，只要军队能拥政爱民，政与民是会爱军队的。12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拥政爱民拥军运动的指示》，规定明年旧历正月全月力拥政爱民月及拥军月。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下，各根据地的军队领导机关，都先后发出指示，重新公布拥政爱民公约，使拥政爱民运动蓬勃地开展起来。在此期间，涌现出许多拥政爱民的先进人物，如“马定夫爱民模范连”等。经及时宣扬后，对推动拥政爱民运动起了很大的作用。各根据地的拥军优抗运动也搞得有声有色。拥政爱民运动与拥军优抗运动的广泛开展，使根据地军民达到了空前的大团结，有效地保障了对敌斗争的开展与胜利。从此，拥军爱民运动便成为军队的新的光荣传统，始终坚持、继承和发扬下来。

军队开展拥政爱民运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进一步加强军政。军民团结，进一步发展壮大对敌斗争力量的重要政策。拥政爱民运动之所以能够深入开展，是由人民军队的宗旨决定的。随着时代的发展，拥政爱民运动被不断赋予新的内容，从而保持着永久的活力。

七、开展反攻作战，夺取抗战胜利

中国人民长期的艰苦抗战和国际形势的有利变化，逐渐改变了中日战争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期待已久的对日反攻。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曾预言，由于中国政治和经济的不平衡的状态，对日战略反攻，在其前一时将不是全国整齐划一的姿态，而是带地域性的和此起彼落的姿态。战略反攻的实践完全证实了毛泽东的预见。

发动局部反攻

1943年2月，苏联红军胜利结束斯大林格勒战役，此役共歼灭德军150万人，这个重大胜利成为苏德战争的转折点。美军于同期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的争夺战中歼灭日军2.4万人，迫使日本在太平洋战场转入战略防御，7月，英、美联军在意大利南部登陆，意大利法西斯被迫于9月投降。德、意、日法西斯联盟从此瓦解。9月，中、美、英军在缅甸也开始反攻。

11月，美、英、中三国首脑举行开罗会议，商讨联合对日作战和日本战败后的处理问题。会议发表的《开罗宣言》，强调战争的目的在于制止和惩罚日本的侵略，声明三国“将坚持进行为获得日本无条件投降所必要之重大的长期作战。”这说明，盟国虽仍坚持先欧后亚，但对日作战更加重视起来。在中国战场，由于中国军民的长期艰苦抗战，侵华日军受到巨大消耗，也开始陷于被动地位。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转折的时期，抗日根据地军民战胜了严重困难，走过了中国抗日战争漫长的相持阶段，发展壮大抗日力量。敌后战场聚积了46.9万多军队和100多万民兵、几千万自卫军，仅主力军就达147个团。这些部队虽长期执行游击战争任务，但它们是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红军正规部队或部分红军骨干发展起来的，经由长期战争锻炼，数量增加，质量提高，已逐步上升为正规军，具备了从游击战转变为正规战的基本条件。

1943年秋，敌后战场的斗争焦点转到日伪军控制区。同年8月，八路军冀鲁豫军区和第129师先后发动卫南战役和林南战役。同年冬，山东军区部队一打伪军刘桂棠，二打伪军李亚藩，三打伪军吴化文。卫南、林南战役和山东军区的几次进攻战役，揭开了敌后战场反攻的序幕，成为局部反攻的前奏曲。但由于敌强我弱的形势尚未根本改变，我军还不能在敌后全面制止敌人的进攻，仍须分遣一部兵力，在地方武装配合下，粉碎日伪军那些“抓一把就走”的“扫荡”；同时敌人也无力阻止我军的进攻，抗日武装可以在局部地区集中主力，进攻城镇据点，大量歼灭日伪军，使敌占区变成解放区。因此进攻作战与反“扫荡”作战交替进行，集中兵力作战与分散的游击战相结合、军事攻势与政治攻势相结合、外线出击与内线反攻相结合，成为敌后战场局部反攻的一个鲜明特点。

第一，出击外线，开辟全面反攻的前进基地。

1944年，美军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同时，在亚洲太平洋战场发起越岛进攻，切断了日本的海上运输线，并向日本本土推进，从中国大陆起飞的美国飞机也不断轰炸日本本土及其在中国台湾的军事设施。

日本为救援在太平洋和东南亚地区的孤军，摧毁位于中国境内的美空军基地，从国内及中国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地区抽调 51 万兵力向河南，湖南、广西等省发动“打通大陆交通作战”，以及浙东作战。

这次作战波及 10 多个省，除安徽、江西、贵州 3 省失地因日军退出被国民党军收复外，其余 7 省中包括郑州、洛阳、许昌、长沙、衡阳、桂林、柳州、南宁、温州、福州等大中城市在内的 149 个县市沦入敌手，沦陷国土 25 万余平方公里、人口 4450 万。正面战场的又一次大溃败，全国人民及美、英等国无不感到震惊和失望。

国民党军的大溃败使得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历史重任更大程度地落到了敌后抗日军民的肩上。

1944 年 4 月 12 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上指出：“现在的任务是要准备担负比较过去更为重大的责任。我们要准备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在中共中央发展河南、缩毂中原的战略部署下，八路军、新四军相继派部队向河南敌后进军。7 月，冀鲁豫军区增派部队南下豫东，会同当地武装在新黄河东西地区建立了 8 个抗日县政权，扩大了豫东抗日根据地。新四军第 5 师从 7 月底开始先唐派出 5 批部队开辟豫南，挺进豫中，在汝南、竹沟、信阳、舞阳间建立了 7 个抗日县政权，开辟东西宽 70 余公里、南北长达近百公里的抗日根据地。8 月中旬，新四军第 4 师主力从淮北西进，经过四个多月的艰苦奋斗，打退日伪军及国民党军的进攻，建立了第 2 专署和 8 个抗日县政权，基本恢复了豫皖苏抗日根据地。新四军第 4 师师长彭雪枫在恢复豫皖苏的战斗中英勇牺牲。自 9 月初起，八路军太行、太岳军区及陕甘宁边区相继派部队进入豫西，在嵩山、箕山地区和新安、湍池地区建立了 20 个县、300 万人口的豫西抗日根据地，完成了发展河南，打通中原的战略任务。

中共中央为增强华南抗日力量，扩大对日全面反攻的前进基地，决定八路军第 359 旅分批南下湘粤边，配合东江纵队创建五岭抗日根据地。

11 月 9 日，第 359 旅 4000 余人组成南下支队，从延安出发，两渡黄河，三越铁路封锁线，1945 年 1 月在大悟山与新四军第 5 师会合，随后南渡长江，转战湘鄂赣边，并一直打到广东南雄县百顺地区。

1944 年 9 月 27 日，中共中央指示华中局派新四军主力一部南下，发展苏浙皖边与浙江沿海，为收复南京、上海、杭州等各大城市创造条件。根据中共中央和华中局指示，新四军第 1 师先后派两批部队共 6 个团从苏中渡长江南下，与在苏南和浙东的新四军会台，开辟了拥有 10 个县、100 多万人口的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

第二，展开内线反攻，猛烈扩大解放区。

日军抽调兵力打通大陆交通作战，其后方守备兵力相对减少，为在内线反攻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1944 年，各解放区连续在内线发动攻势作战，取得了重大胜利。山东军区发动春夏秋冬 4 季攻势，共作战 3500 多次，毙伤日伪军 2.27 万余人，俘日伪军 3.6 万余人，争取伪军反正 1.1 万余人，攻克利津、沂水、乐陵、临邑、南皮、文登、荣城、莒县、栖霞等 9 座县城，拔除和逼退据点、碉堡 1200 多个，解放国土 4.4 万余平方公里、人口 930 万，并粉碎日伪军对滨海、渤海区的“扫荡”，使渤海、胶东、鲁中、滨海、鲁

南5块抗日根据地在巩固中得到发展。晋察冀军区发动春夏秋季攻势，共作战4100余次，毙伤日伪军2.3万余人，俘日伪军及争取伪军投诚、反正共2万余人，攻克肃宁、武强两座县城，攻入安新、赵县、深泽、安平、献县、饶阳等县城，一度攻占任丘，袭入保定西关和天津市区，共拔除据点、碉堡1700多个，解放人口750余万，扩大了北岳区，巩固了平北、平西区，坚持了冀东、冀中区。晋绥军区发动春夏秋季攻势，共作战1300多次，毙伤日伪军3500余人，俘日伪军1400余人，攻克据点100多个，解放村庄3100多个、人口40余万，扩大解放区2.4万余平方公里，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得到巩固和扩大，绥西、绥南地区恢复到1942年前的局面。晋冀鲁豫边各军区发动春夏秋季攻势，共作战1万多多次，毙伤日伪军3.1万余人，俘日伪军3.7万余人，争取伪军投诚、反正7500余人，攻克朝城、榆社、沁水、林县、内黄、丘县、清丰、濮阳、莘县、寿张、清河等11座县城，解放国土6万多平方公里、人口500多万，不仅改变了根据地被分割的局面，而且扩大到豫北的济源、垣曲地区，为进军豫西创造了条件。

新四军各军区主动地、有计划地对日伪军发动春夏秋季攻势，并粉碎日伪军千人以上的“扫荡”40余次，共进行大小战斗1700余次，歼灭日伪军4.8万余人，争取伪军1800余人反正，攻入盱眙、定远、长兴、溧水、溧阳等县城，攻克据点1300多个，解放国土7400平方公里、人口160多万，大大改善了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形势。

华南抗日游击队乘华南日军主力参加打通大陆交通作战之机，在东江两岸和海南岛发动攻势，攻入顺德，一度攻克台山、清远县城，逼近广州市郊，出没于香港九龙地区。

1944年的对敌斗争，由于在内线和外线同时反攻，集中主要兵力于主要进攻方向，实行先打根据地所包围之敌据点，再向根据地边缘推进和先打弱敌后打强敌的作战指导原则，解放区军民不仅攻克了许多残留于根据地内和根据地边缘的敌军据点，而且将进攻目标扩及到敌纵深守备薄弱的城镇与交通线。全年共作战两万多次，歼灭日伪军近20万人，攻克县城22座，使解放区面积扩大到61.9万余平方公里，人口增加到9200万，主力部队发展到65万，连同地方武装共77.9万余人，民兵达到168.5万余人，大大增强了反攻力量。

1944年12月15日，毛泽东在《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演讲中指出，全国“唯一的任务是配合同盟国打败日本侵略者”，要求开展更大规模的反攻作战，“把一切守备薄弱、在我现有条件下能够攻克的沦陷区，全部化为解放区”。从1945年春开始的反攻作战，由于指导思想更加明确，指挥日趋统一，打击重点进一步集中，作战规模逐渐扩大，因而战果辉煌。八路军山东军区以胶济路东段为重点，对荣子恒、赵保原、张景月、厉文礼、张步云等大股伪军发动讨伐战役，共攻克县城11座；晋察冀军区先后发动任河、文新、安饶、雁北、察南、热辽、子牙河、大清河等战役，攻克县城15座；晋冀鲁豫边各军区分别发动道清、豫北、南乐、安阳、东平、阳谷等战役，攻克县城28座；晋绥军区对离（石）岚（县）、五（寨）三（岔堡）、忻（县）静（乐）、神（池）义（井）等公路及沿线发动攻势，攻克县城3座。新四军苏北军区发动3个月战役攻势和阜宁战役，攻克阜宁县城，收复灌河以北广大地区；苏中军区攻克高邮、兴化地区和淮安西南许多据点；淮北军区发动宿南、睢宁战役，攻克泗阳、睢宁县城；淮南军区攻克旧县、金沟、黎城

等一批据点；鄂豫皖湘赣军区发动白兆山、四望山战役，恢复了这两块根据地；皖江军区沿长江北向西发动攻势，打通了与鄂东根据地的联系。华南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向粤北发动攻势，开辟了以罗浮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珠江纵队在珠江三角洲攻克村庄 400 多个，扩大了五岭山根据地；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进军廉江以西地区，开辟了拥有 10 万人的游击区；琼崖纵队主力挺进白沙，攻克白沙县城，创建了以白沙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驻扎在苏联境内的东北抗联教导旅为协同苏联红军向中国东北进军，加强临战训练并制定了配合苏军作战的行动计划。7 月底，教导旅派出数百名指战员空降到牡丹江、盘石、海拉尔、赤峰、长春、满洲里等 18 个地区，执行侦察日军火力点，袭击日伪后方机关等任务。

1945 年的春夏季攻势，共歼灭日伪军 16 万余人，攻克县城 60 多座，收复国土 24 万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 900 多万，进一步把日伪军压缩到大中城市周围，主要交通线和沿海地区，至 8 月初，解放区面积达 86.4 万余平方公里，占关内沦陷区的 80%，人口 1 亿多，占关内沦陷区的 57%，军队发展到 93 万余人，民兵扩大到 220 多万人，拥有长短枪 42 万多枝、轻重机枪 1 万余挺、各种炮 700 多门、掷弹筒 3000 多具。这就为展开全面反攻，打下了胜利基础。

在反攻中整训军队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八路军、新四军根据不同时期的形势任务多次进行过军事政治整训。在进入局部反攻并取得巨大胜利之际，为适应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准备全面反攻和对付国民党可能发动的突然事变，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利用战斗间隙进行一次全军性大规模整训。

1944 年 7 月 1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训部队的指示》，要求“一定要在一年内，加紧整训现有军队，在现在物质基础上与战斗生产间隙中，把我军的军事训练与政治工作极大地提高一步”。指示对整训的时间、内容和练兵方法，以及要达到的目的等都提出了具体要求，尤其强调训练干部和班以下骨干。7 月 20 日，新华社全文广播了第 358 旅旅长张宗逊的《冬季练兵工作总结报告》，以供各部队参考。8 月 22 日，毛泽东、刘少奇、陈毅致电饶漱石、张云逸、赖传珠，“华中部队整训应着重练兵、带兵、养兵、用兵 4 大项，而以练兵力中心”，可参考张宗逊总结报告中“打破陈规，采用兵教兵、官教兵、兵教官群众运动的练兵方法”。练兵内容，着重提高战斗技能，把投弹、射击、刺杀、土工作业 4 大基本技术练好。团级干部及部分优秀营级干部可由军部办训练队，学习战术学、兵器学、筑城学、地形学、管理教育（带兵、练兵、养兵等军事行政事项）5 大项，以提高干部的管理教育能力和指挥艺术。

10 月 12 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全党练兵与军队大整训之决定》，号召全党研究战争，学习军事，进行大练兵，要求在冬季 4 个月内至少整训主力军 60%。游击队 30%和轮训全部民兵。同月 14 日，毛泽东、朱德致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4 册，262 页。

毛泽东、刘少奇、陈毅致饶漱石、张云逸、赖传珠电，1944 年 8 月 22 日。

毛泽东、刘少奇、陈毅致饶漱石、张云逸、赖传珠电，1944 年 8 月 22 日。

邓小平、滕代远等，要求在作全面反攻准备中，充实现有小团，健全游击队，加强民兵组织，认真练兵。

八路军、新四军的团以上机关都在深入学习中共中央的指示与决定，统一思想认识的基础上，结合各自部队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军政整训计划，对整训内容、重点、方法、步骤都作了安排。在整训全面展开前，各军区一般是先训练一批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及武工队，以便坚持对敌斗争，掩护其他部队分批整训。整训中，多数部队首先进行政治整训，在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开展军事整训。为训练干部和骨干，各军区充分发挥抗大分校、随营学校和各级训练队的作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在1943年冬季先行开展练兵运动，接到中央指示后又重新部署了1944年冬季的练兵工作。晋绥分局作了《关于加强全党练兵与军队大整训的决定》，军区成立练兵团，分区成立练兵营，整训主力军。山东军区1944年秋季召开的军事工作会议讨论部署了整军工作，要求在1年内按先主力后地方的顺序进行3至4个月的整训。华中局和新四军对整军作出具体部署，规定从1944年冬至1945年3月开展整训。全军的大规模整训工作，从10月开始陆续展开。

政治整训是以古田会议决议和谭政报告为指针来改造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谭政1944年4月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的报告》，由谭政起草，经毛泽东修改和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它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政治工作进行了全面总结，是继古田会议决议后又一个政治工作的重要历史文献。中央宣传部，总政治部通知全党全军将此报告作为整风文件和固定教材，加以研究讨论，并联系实际改造自己的思想与工作。党中央所以在整训指示中强调，军队政治工作除必须保证整训任务的完成外，根据古田会议和谭政报告作一普遍的彻底的有计划的改造。整训开始后，许多部队组织各类各级干部，联系部队实际，再次学习古田会议决议和谭政报告，对部队政治工作现状进行检查，既肯定成绩，又严肃批评了某些轻视或忽视政治工作和下愿做政治工作的错误倾向，进一步明确了政治工作的地位与作用，政治工作状况得到改善。在此基础上，动员管理教育方面存在缺点错误，存在军阀主义作风的干部在连队民主大会上做检查，接受干部战士的批评，同时也启发有缺点错误的战士做自我检查，以克服部队中的不良倾向。有的部队还以团为单位召开干部反省会，研究战士提出的意见，制定改进措施。民主大会后，在部队中普遍进行拥政爱民教育和开展尊干爱兵活动，号召干部爱护士兵，士兵拥护干部，使官兵之间、军民之间的团结进一步增强，部队更加巩固。

军事整训主要是练兵，并总结带兵、用兵与养兵的经验。政治整训结束后，迅速进行军事整训，掀起以投弹、射击、刺杀和土工作业等技术练兵为主的群众性练兵热潮。在练兵中，改变由机关、教员包办及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做法，实行能者为师，采取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等群众性练兵方法和开展竞赛活动，介绍典型经验，表彰练兵模范等方式，把群众性的练兵推向高潮。1944年9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为表彰大练兵中的积极分子，推广他们的经验，在延安召开模范者学习代表大会。贺龙司令员在开幕式上，称赞这样的会是个创举。9月1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招待会，招待在延安的全体模范者学习代表。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等中央和军委的负责同志，以及在延安的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等到会欢迎代表，并相继发表讲话。毛泽东说：“我

们开这个会，是代表我们根据地的八千六百万人民和全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民来开的。”朱德在讲话中号召全军加紧练兵，“使部队造成最模范的队伍，使八路军、新四军更坚强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开饭时，毛、朱、刘、周、彭等分散到代表席上陪餐，还亲切地询问练兵和前方作战情况，使大家深受教育和鼓舞。在延安召开的模范者学习代表大会，介绍和赞誉了警备第3旅7团1连连长苗保山和其他英模人物的事迹和经验，表彰奖励了298名练兵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模范射击手、投弹手、刺杀手和体育模范等。《解放日报》还发表《祝边区部队模范学习者代表会议》的社论。从此，召开英模大会，表彰先进典型的方法被推广到全军部队，从而推动了练兵运动的深入开展。

许多部队在练兵时，还十分注意劳逸结合，并尽可能改善物质文化生活，保护指战员的练兵热情。为加强干部和骨干培养，八路军、新四军都十分重视发挥各抗大分校、随营学校、教导团、教导营，以及教导队的作用。新四军送各抗大分校学习的干部达5000余人。八路军大行军区对参加高级干部会议的干部进行为期1周的军事训练，尔后又组织轮训队，分期分批地轮训了全部营以上干部。八路军一些部队在整训中还组织干部战士学习文化。驻陕甘宁边区的部队，有1/4的战士达到能读能写，3/5的干部能读报纸。

八路军、新四军的军区、军分区，在整训主力军和地方军的同时，对民兵和自卫军也分期分批地进行了整训。仅淮北军区1944年冬就组训民兵10万人，还建立健全了乡以上武装委员会，调整了干部，明确了指挥系统，并开展争创民兵英雄活动。经过整训，人民自卫武装的军政素质明显提高，成为主力军的强大后备军和配合主力军举行反攻作战的重要力量。

这次整军，是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最大的一次整军，成果之大，前所未有。经过整训，部队的政治思想觉悟提高了，军民关系和官兵关系融洽了，内外部团结增强了，政治工作的作风和方法也有了很大改进。在军事上既提高了战术技术水平，又培养了干部练兵、带兵、养兵、用兵的能力，力建设和发展正规兵团培养了骨干。通过整训，有效地提高了训练质量。山东军区特务团干部射击命中率达96%以上，战士3发3中者占78%。晋绥军区4大技术的平均成绩都在良好以上。据第358旅统计，步枪射击命中率由练兵开始的48.5%提高到90.5%。特等射手由174名增加到433名。轻重机枪射击原来成绩很差，到冬训结束时，全旅除4名普通射手外，均达到了特等、优等射手的标准。山炮射击从卸炮到发射由15分钟减到2分40秒，实弹命中率达到100%。投手榴弹，全旅平均由25米增到40~69米，其中投弹标兵26名，还创造了投弹72米的最高纪录。

举行全面反攻

1945年初，欧洲反法西斯战争接近最后胜利。2月，美、苏、英三国首脑秘密签订《雅尔塔协定》，以中国承认外蒙独立和恢复沙皇在中国东北的权益为条件，确定在德国投降后2~3个月参加对日作战。5月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在太平洋战场，美军于2月底控制吕宋岛，6月底占领冲绳岛，从东、南两个方向进逼日本本土。

在日本法西斯行将灭亡，中国抗日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之际，中国共产党于4月至6月在延安隆重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放手发动

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领导下，打败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政治路线，并规定了解放区的军事任务，即：“动员军队与人民，从各方面来准备大反攻，及准备战略上由以游击战为主到以运动战为主的转变。”

至大反攻前，中共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已发展到近 90 万人，拥有各种枪 43 万余枝（挺）、各种炮 475 门、掷弹筒 2600 余具，控制着陕甘宁、晋察冀、晋冀豫、冀鲁豫、山东、晋绥、冀热辽、苏北、苏中、苏南、浙东、淮北、淮南、皖江、豫西、鄂豫皖、湘鄂赣 17 块抗日根据地，总面积 90 余万平方公里，人口近 1 亿，民兵达 218.7 万余人，控制县以上城市 100 余座。

八路军、新四军的壮大和敌后解放区的发展，为战略反攻奠定了基础。

7 月 26 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但遭到日本政府拒绝，美国随即出动数百架 B—29 轰炸机，轮番轰炸日本本土，并于 8 月 6 日在日本广岛投下一颗原子弹。8 月 8 日，苏联对日宣战。9 日，美军又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同日，百万苏军进军中国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发起进攻。

8 月 9 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指出：“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8 月 10 日至 11 日，朱德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的名义，连续发布七道进军命令，主要内容为：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依据《波茨坦公告》规定，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日伪军发出通牒，限期投降，如遇日伪军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晋绥、晋察冀军区和山东军区各以一部兵力向东北进军，配合苏军作战；对收复之各城镇实行军事管制，维持秩序，保护人民。

正当解放区军民向日伪军展开大反攻之际，蒋介石却于 8 月 11 日连续发布三道命令，命八路军、新四军“原地驻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动”；令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等待国民党军收编；令国民党军各部“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上述命令的用意显然是妄图独吞抗战胜利果实。13 日，朱德、彭德怀致电蒋介石，严正指出：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得很厉害”。

8 月 15 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的形式宣布投降。同日，朱德命令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及其所属部队，除被国民党军包围者外，应立即向解放区军民投降。解放区军民随即向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发起全面反攻。

全面反攻分为三十阶段：

第一，向敌占大中城市和交通线进军。

8 月 10 日，中共中央致电各中央局、分局和各区党委：立即布置动员一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1945 年 6 月。

1945 年春季统计数，参见《抗日战争时期档案·实力统计》第 1 册。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1119 页。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三），88～92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蒋介石致第 18 集团军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的电报，1945 年 8 月 11 日。

《解放日报》，1945 年 8 月 17 日。

《解放日报》，1945 年 8 月 16 日。

切力量向日伪军发动广泛的进攻，以正规部队占领大城市和要道，以游击队民兵占领小城市。次日，再次电示各区党委，要求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日伪军缴械投降，并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同时，延安总部连续发布7道进军命令。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延安总部的命令，敌后抗日根据地的93万多军队和220多万民兵在根据地亿万人民的支援下，立即进攻华北、华中和华南的敌占城镇与交通线，并向大中城市推进。山东军区部队攻占县以上城市22座，包围了山东省会济南和青岛、涂州等城市，切断胶济、津浦等铁路线。晋察冀军区部队攻占察哈尔省会张家口及县以上城市13座，包围北平，攻入天津及河北省会保定和石家庄等重要都市，切断边区境内的所有铁路线。晋冀鲁豫边区部队攻克县以上城市25座，逼近河南省会开封和新乡、归德（今商丘）等城，切断同蒲、平汉、陇海、德石等铁路线。晋绥军区部队攻克县以上城市7座，逼近山西省会太原，攻入绥远省会归绥（今呼和浩特），切断同蒲路北段和平绥路西段。河南军区部队攻克县城两座，向郑县（今郑州）西面和南面的铁路线推进。新四军攻克县以上城市17座，攻入芜湖，逼近上海和湖北省会武汉、江苏省会南京、浙江省会杭州等大中城市，切断津浦路南段和沪宁、沪杭等铁路线。华南抗日游击队攻克县城1座和许多据点，切断广九铁路。东北抗日联军配合苏联红军进攻日本关东军，收复了佳木斯、牡丹江、齐齐哈尔、哈尔滨、长春、沈阳等57座城市，解放了东北全境。

第二，夺取中小城市，控制广大乡村。

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逼近大中城市时，日本于8月14日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15日宣布投降，这正是人民抗日武装夺取大中城市的有利时机。然而，国民政府与美日伪勾结起来，使人民抗日武装夺取大城市之计划不能实现。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命令蒋军加速向沦陷区推进，抢夺抗战果实，同时又令日伪军拒绝向抗日的人民军队缴械投降，并要他们守住占据地区，等待蒋军受降。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通令所属各部，只向蒋军投降，不向其他抗日武装缴械。对蒋军以外其他军队的要求，“不仅应坚决拒绝，而且应根据情况毫不踌躇地行使自卫的武力”。在美蒋日伪勾结的复杂形势下，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于8月22日决定改变方针，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一般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要道，而以必要兵力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中共中央认为，原定力争大城市的方针是对的，但形势变了，只能得些小城市与乡村。“得不到大城市，不是我们不愿意去，叫做无可奈何。力争的东西似乎争不了，我们要承认这个现实”。

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新方针指导下，各军区立即调整部署，除以一部兵力继续威胁大城市外，主力转取中小城镇和控制广大乡村。至日本签字投降，又取得了重大胜利。八路军在华北地区攻克县以上城市57座及港口城市秦皇岛、烟台等地。新四军在华中地区攻克县以上城市15座和一些重要集镇。华南抗日游击队攻克许多小城镇。

从全面反攻开始至日本签字投降，在不足1个月的全面反攻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坚决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紧紧抓住战机，积极向日伪军占据的城镇和交通要道进攻，收复县以上城市150多座，一度切断了日军占领区的所有铁路交通线，迫使其向

大中城市退却。据不完全统计，共歼灭日伪军 7.6 万多人，缴获长短枪 7.3 万余枝，轻重机枪 900 多挺，各种炮 160 多门，取得了重大胜利。

第三，歼灭拒绝投降的日伪军。

9 月 2 日，日本签署投降书，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但是，在中国战场上被人民抗日武装包围的日伪军拒不缴械投降，还配合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进攻。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在抗击国民党军队进攻的同时，继续打击日伪军，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发展并争取控制东北。

敌后战场的抗日武装继续英勇作战，一面抗击向解放区进犯的国民党军队，一面继续打击不向我军投降缴械的日伪军。至年底，八路军在华北地区抗击国民党军进攻的同时，又从日伪军手中攻克县以上城市 90 多座，以及东北地区的一些城镇，完全收复了热、察两省和晋、冀、鲁、豫 4 省广大地区，使华北各解放区连成一片，并打通了与东北解放区的联系。新四军在华中地区一面抗击国民党军的进攻，一面又积极进攻日伪军，又攻克县以上城市 8 座和许多集镇。华南抗日游击队也向拒绝投降的日伪军展开反攻，至 9 月底，收复城镇 60 余座，歼灭日的军 1000 余人。在这一阶段作战中，人民抗日武装共歼灭日伪军 322 万余人，缴获长短枪 17 万多枝，轻重机枪 4100 多挺，各种炮 1100 多门，攻克县以上城市 100 余座。

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在八年全面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英勇作战 12.5 万余次，以伤亡 60 余万人的重大代价，歼灭日伪军 171.4 万余人，其中日军 52.7 万余人，缴获长短枪 68 万多枝、轻重机枪 11 万余挺、各种炮 1800 多门，收复国土 104.8 万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 1.255 亿，抗击了 58% ~ 69% 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成为中国抗战的主力军。

中国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由中国各族人民和海外侨胞广泛参加的一场全民族抗战。经过长达 14 年的浴血鏖战，中国人民终于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取得历史性的辉煌胜利。

这个胜利，是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革命史的重要转折点，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伟大里程碑。

这个胜利，一举洗雪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创造了半殖民地弱国战胜帝国主义强国的奇迹。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正是这个历史奇迹得以实现的决定性因素。

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清楚地表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由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华南抗日游击队开辟和坚持的敌后战场，在全国抗战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且，随着战争的进程，愈到后期愈显出其重要性。

在战略防御阶段，正面战场友军英勇抗击着侵华日军的大部，在抗战的全局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八路军、新四军虽然只发挥了战役和战略上的配合作用，但它极大地牵制和消耗了日伪军，与正面战场一道形成了对敌人两面夹击的战略态势，加速了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

在战略相持阶段，由于日军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以主力回师

确保占领区，加强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进攻，人民抗日武装以独当一面的战略姿态屹立于敌后，与敌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英勇抗击着半数以上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成为全国抗战的中流砥柱，敌后战场上升为抗日战争的主战场。

在局部反攻和战略反攻阶段，我军的攻势作战和战略反攻，极大地消耗和削弱了日伪军的力量，有力地支援了正面战场的豫湘桂战役，进而促成了抗战的最后胜利，并捍卫了自己应得的胜利果实。

敌后战场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抗日战争又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敌后抗战无时无刻不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产生着重大影响。举凡中国抗日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如遏制日军北进，策应苏联卫国战争，延缓日军南进，支援美英军太平洋对日作战等等，敌后战场均在其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对此，国际人士不乏公正的评论，一些直接进入敌后战场采访或亲历敌后抗战的国际友人，更不乏客观真实的记录。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之所以能够对抗战的胜利作出巨大贡献，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始终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忠实地贯彻了中共中央制定的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在敌后大力宣传、动员、组织与武装人民群众，展开了以军事斗争为中心，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及外交斗争在内的全面对敌斗争，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在全面抗战路线的指导下，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建成了一支来自群众、依靠群众的人民军队，它实行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自卫队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贯彻军政、军民、官兵一致的原则，从而使敌后战场形成团结抗战的整体。这对于坚持持久抗战，夺取抗战胜利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开展广泛而持久的抗日游击战争，是人民军队贯彻执行全面抗战路线的主要作战形式。持久而广泛的游击战争，不仅保存与发展了自己，而且牵制和消耗了敌人，成为人类战争史上的一大壮举。敌后游击战争具有人类以往游击战争所不具备的鲜明特色，这表现在：它主要不是在内线，在战役战斗中配合正规战，而是在外线、在敌之深远后方独立作战，在战略上承担着独当一面的任务；它不是小规模，而是大规模的，遍及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它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贯穿于战争的全过程；它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斗争相配合的；它不仅由正规军承担的，而是有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参加的，正是这种广泛的群众性酿造了丰富多彩的游击战术；它不是永远停留在游击战状态，而是随着战争的进程，逐步向正规战发展，使之成为战胜敌人的重要因素。因此，这种游击战争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将在人类战争史上演出空前伟大的一幕”。“这样又广大又持久的游击战争，在整个人类的战争史中，都是颇为新鲜的事情”。“这就是中华民族自求解放的战争形态，是半殖民地大国在二十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举行的解放战争的特殊形态”

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是人民抗日武装贯彻全面抗战路线，开展敌后

游击战争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在长期的、残酷的并且脱离大后方的游击战争中，如果没有根据地作依托，人民抗日武装就无法生存发展和坚持长期抗战；而有了根据地，就进可攻，退可守，立于不败之地，就能保存与发展自己，消灭驱逐敌人，争取抗战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由人民军队执行的游击战争同历史上农民起义军流寇主义的游击战争的根本区别之一。

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人民抗日武装在取得辉煌战绩的同时，自身也取得巨大发展，正规军由出师时的 5 万余人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 127 万余人，民兵达 268 万余人，并拥有根据地 100 余万平方公里，人口达 1.2 亿多。这支雄厚的力量为中国共产党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三章 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

一、争取和平民主，准备应付全面内战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两个命运、两种前途的决战。人民解放军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积极争取和平民主，挫败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同时，加强部队建设，从各方面做好应付全面内战的准备。

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

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国内形势发生重大而急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要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独立的新中国，把中国引向光明，而国民党统治集团则坚持内战、独裁、卖国，要把中国引向黑暗。这是关系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斗争。

经过抗日战争，中国国内两种力量的状况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建立了鱼水般的亲密关系，军队已达到 127 万余人，民兵 268 万人；解放区发展到 19 个，人口 1 亿多。国民党统治集团总兵力为 500 余万人，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事力量相比占有绝对优势。

面对抗战胜利后的新形势，国共两党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方针。国民党统治集团企图垄断抗战胜利果实，消灭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在日伪军的接应下，国民党以“受降”名义，迅速将大量兵力从西南、西北调往华北、华东等地区，抢占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对解放区实行分割包围，伺机发动内战。蒋介石的所作所为，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和援助。

中国共产党从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出发，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作为争取和平建国的总方针。中国共产党认为，避免内战，力争以和平方式逐步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建设新中国，是符合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的，也是与世界潮流相一致的。这样做，尽管前进的道路上会出现种种阻碍和复杂局面，但对人民是有利的，这是中国共产党竭力争取的目标。同时，中国共产党还认为，争取和平，要靠力量，要靠斗争。

1945 年 8 月 13 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所做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著名讲演中，提出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要实行“针锋相对，寸上必争”的方针。一方面争取民主，努力制止或推迟内战的爆发，另一方面要做好对付国民党突然袭击的准备，用革命战争消灭反革命战争。根据中共中央确定的方针，人民军队对蒋介石抢夺胜利果实、积极准备内战的行径进行了坚决的斗争。8 月中旬，第 18 集团军总司令朱德两次致电蒋介石，揭露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并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制止内战的主张。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坚决执行延安总部的命令，向一切被解放区军民所包围的日伪军据点展开进攻，保卫和发展人民胜利果实。

解放区军民力量的强大和中国共产党的严正警告，全国人民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强大呼声，使国民党统治集团不得不有所畏惧；国际上美、英、苏等国从各自利益和战略目标出发，也声言不赞成中国发生内战；特别是国民党数百万军队，一半以上还位于远离内战前线的西南、西北地区，调动兵力尚需时间。蒋介石感到发动全面内战时机还不成熟，于是，在 8 月中旬，以国民政府主席的名义，三次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邀请他到重庆进行和

平谈判。蒋介石的企图是，如果毛泽东不到重庆，就借此蒙骗舆论，将内战责任推向中国共产党；如果毛泽东到了重庆，就在谈判桌上施加压力，诱逼中国共产党交出解放区和军队，并以谈判为烟幕，加紧运兵部署内战，稍后，蒋介石在致各战区的密电中称：目前与共产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将寇军完全受降后，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共产党作具体谈判。共产党如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清剿之。这是蒋介石的如意算盘。

对于时局的艰危和蒋介石的险恶用心，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明察秋毫。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团结和教育全国人民，中共中央经过审慎研究，决定派遣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等，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并对谈判的前景进行了分析，认为，国民党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在中国共产党作出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必要让步后，“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国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同时我党力量强大，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心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不要轻易打，打则必胜），绝对不要被反动派的其势汹汹所吓倒。”

重庆谈判，从1945年8月29日开始，至10月10日结束。经过激烈复杂的斗争，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国民党被迫承认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承认了各党派的平等地位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并同意召开由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但解放区军队和政权这两个关键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国民党试图在“军令”、“政令”统一的借口下，根本取消人民军队和解放区。中共代表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表示愿作出让步，即在未实现政治民主化之前，可先行整编军队，人民军队缩编为24个师，至少20个师，与国民党军队之比为七比一。同时主动提出，人民军队退出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除外）等8个解放区。尽管如此，国民党政府仍顽固拒绝，以致无法达成协议。在重庆谈判期间，中国共产党表现出来的和平诚意，赢得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和赞扬，受到了国内外舆论的高度评价。

国民党当局同共产党谈判的出发点，是以军事、政治两种手段扑灭人民革命力量。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命令其军队加紧向解放区进攻，企图在战场上向中国共产党施加压力，迫其接受在谈判桌上提出的条件。国民党军第2战区长官阎锡山充当“先锋”，他先以3个师2个挺进纵队进占晋冀鲁豫解放区的长治（古称上党郡）地区，后又增调2个军6个师南援，企图以此为基地占领整个晋东南，在晋冀鲁豫解放区腹地安插钉子。力保卫解放区并配合重庆的谈判斗争，晋冀鲁豫军区遵照中共中央军委指示，集中主力部队3万余人，在5万民兵的配合下，采取围城打援、攻城打援、迫敌突围等作战方法，于9月10日发起反击。

10月12日，战役胜利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3.5万人。上党战役，是解放战争过渡阶段人民军队进行的第一个较大规模的歼灭战，它打击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内战凶焰，大大加强中国共产党在重庆谈判中的地位，促进了

《双十协定》的签订。

《双十协定》达成后，国民党统治集团背信弃义，又秘密颁发“剿匪”命令，要求各部“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达成任务。”但国民党的军事进攻，遭到解放区军民的有力回击，损兵折将。这时，国际形势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美国政府助蒋内战的政策，激起了世界舆论的强烈谴责，迫使美国局部地调整了对华政策。美国总统杜鲁门于12月15日发表声明，表示赞成中国召开主要政党代表会议，以早日解决内争。为此，派马歇尔作为特使，到中国调处内战，但在许多实质问题上，明显地偏袒国民党统治集团。同月，苏、美、英三国外长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并发表公报，声称希望中国实现统一和民主，表示不干涉中国内部事务。在国内外压力下，国民党统治集团被迫同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关于停止内战的建议，并同意按照《双十协定》的规定，召开各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

政治协商会议于1946年1月10日至31日在重庆举行。会议斗争的焦点仍是解放区的军队问题和政权问题。国民党方面的主张是，先实行军队国家化，而后再实行国家民主化；中国共产党则提出，先实行军队民主化和国家民主化，然后才能实行军队国家化。两种主张表面看起来是“国家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的顺序之争，其实有着十分深刻的政治内涵。国民党主张的实质，是要把人民军队“化”到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国家”中去，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听凭国民党当局的宰割。而中国共产党主张的实质，则是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废除国民党的一党独裁统治，根本改造国民党的反动军队，使中国走上独立、统一、民主、繁荣之途。会上，中国共产党团结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同国民党作了坚决斗争，并作出适当让步，提出了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两者“平行前进，归于一途”的主张，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在会议通过的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中规定，建军原则为：“军队制度应依我国民主政制与国情实行改革”；整军原则为“军党分立”、“军民分治”，并实行“以政治军”的办法。会议决定由国民党政府代表、中国共产党代表和美国代表组成军事三人小组，商定办法对中共军队进行整编，国民党军则按照国民党政府军令部的计划实行整编。

政协会议的召开和政协决议的通过，是抗战胜利后中国政治生活中万众瞩目的又一重大事件。会上通过的整军原则和整军办法，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民主所做出的积极努力。这表明经过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考验，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党，人民军队已经是一支成熟的军队。按政协决议进行整编，人民军队在数量上和组织形态上将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将会通过其他方式体现出来，人民军队的无产阶级的本色仍将得到保持。

政协会议闭幕后，中共中央即向全党发出《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指出：政协的成功，使中国“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指示要求全党全军做好同国民党合作建国的思想准备，同时也指出，民主化的道路上将会有曲折，须采取相应的对策。然而，国民党对实行政协决议毫无诚意。在3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和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四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上，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头面人物公然否定政协确定的各项原则，会议通过了反对政协决议的议案。与此同时，国民党军加紧向解放区推进，东北呈现出乌云压城之势，关内各解放区受到国民党军的渗透和蚕食，中国大地弥漫着内战的火药味。

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挫败国民党军的局部进攻

争取和平民主，制止和推延全面内战的爆发，不仅要依靠政治斗争，更要依靠军事斗争。因此，在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保持高度警惕并采取一系列重大步骤，建立起军事上的有利布局，挫败了国民党军发动的军事进攻，促进了民主与和平。

争取东北，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战略任务之一。毛泽东在会上强调指出：“东北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新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末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1945年9月19日，中共中央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全国战略方针。“向北发展”，就是全部控制热河、察哈尔两省，力争控制东北；“向南防御”，就是收缩南郡防线，巩固华北以及华东、华中解放区，以对付国民党军的进攻，保证向北发展任务的完成。中共中央强调指出，“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

当时，国民党政府一方面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另一方面又加紧调兵遣将，准备内战。其战略意图是：完全控制长江以南地区，重点夺取华北战略要地和交通线，分割、压缩解放区，打开进入东北的陆上通道，进而独占全东北。这样，南方各解放区首先面临着国民党军的军事威胁。国民党军先后进占了徐州、开封、郑州、洛阳、太原、归绥等临近解放区的城市，华中、苏南、浙东、皖南、皖中和豫西、中原、湘粤边等解放区，均被国民党军重兵包围，有被各个击破的危险；晋冀鲁豫、晋察冀、晋绥、山东、华中各解放区，也面临着国民党军重兵进攻的严峻局势。要保持主动，必须收缩南方战线，做好防御准备。与此不同，东北则是国民党军势力薄弱的地区。

1931年“九一八”事变，由于国民党统治集团实行不抵抗政策，东北很快就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丧失东北有罪，收复东北无功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为在抗战胜利后独占东北，通过外交途径与苏联订立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规定将苏军进驻地区交给国民党政府。但当时苏军在东北仅占有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要道，许多地区仍为土匪、伪满军警所控制，国民党军队在短时期内还无法大量抵达。相反，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抗日战争的大反攻中，迅速出关的八路军又与东北抗日联军一道，配合苏军歼灭日伪军，控制了东北大片地区并迅速扩展了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争取和控制东北就占有了先机之利。东北有着优越的地理条件和重要的战略价值。它背靠苏联，与蒙古和朝鲜接壤，并与冀热辽解放区相连，与山东解放区隔海相望。它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工业发达，交通便利。争取了东北，就有可能打破国民党军在战略上对人民革命力量长期包围的局面，就将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便于革命力量的生长，使人民解放战争获得强大的战略基地；因此，“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是在中国革命的重大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做出的趋利避害的重要战略决策。

《毛泽东文集》，第3卷，4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刘少奇选集》，上卷，3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根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中央军委对全军的部署进行了大范围的调整，调整的中心内容是把完全控制热河、察哈尔两省，发展东北并争取控制东北，作为全军的主要任务。为了实现这一任务，一是抽调大批八路军、新四军的部队迅速进入东北，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从1945年9月开始，山东军区机关率主力6个师，新四军第3师，以及陕甘宁、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等解放区部队共11万人，加上2万干部，海陆并进，开入东北。9月，中共中央东北局成立，统一领导东北地区的工作。10月，成立东北人民自治军，林彪任总司令，彭真任第一政治委员，罗荣桓任第二政治委员。毛泽东指出，十几万军队去东北，“这是有共产党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调动”，是“又一个几千里的长征”。1946年1月，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总兵力达27万人。二是收缩南方战线。从1945年9月下旬开始，长江以南各解放区的人民军队开始撤离根据地。新四军主力8万余人北上山东，新四军军部兼山东军区，陈毅任司令员，饶漱石任政治委员。新四军苏浙军区主力北移苏皖边区，与当地人民武装组成华中军区，张鼎丞任司令员，邓子恢任政治委员。同时成立中共中央华东局，统一领导山东和华中两个战略区。八路军359旅南下支队、河南军区部队和新四军第5师在以桐柏山为中心的鄂豫解放区会合，组成中原军区，李先念任司令员，郑位三任政治委员。鄂豫皖中央局改为中原局，统一领导这一地区斗争。三是保卫以张家口为中心的战略基地。晋绥、晋察冀两解放区坚决打击向张家口进攻的国民党军，使以张家口为中心的战略区域成为联结东北与华北的枢纽。

“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的实施，使人民解放军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获得了主动。从政治上看，挺进东北，歼灭日伪武装，符合民族大义；同时，也在一段时间里，在一个大的方向上，避开了与国民党军直接冲突，有利于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人民解放军主动让出南方8个解放区，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和平诚意，推动了和平谈判。从军事上看，争取东北，打破了国民党独占东北、南北夹击关内解放区的企图，使中国革命将有一个强大的战略基地。撤出南方部分根据地，避免了被国民党军各个击破的危险，加强了华北、华东与中原各解放区的基本阵地，使各解放区紧密相联、互为依托，形成了进行自卫战争的严整而有利的战略态势。

调整战略部署，是在紧张激烈的军事斗争中进行的。

1945年9月，国民党统治集团调集36个军73个师，兵分四路，沿平绥、同蒲、平汉、津浦等铁路向华北各解放区进攻。美国也派出飞机、军舰将大批国民党军队从华南等地运到天津、北平和秦皇岛，配合沿铁路推进的国民党军。为阻止国民党军的推进，掩护人民军队战略部署的调整与进军东北；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组织有力战役，打击、迟滞沿各铁路线向解放区进犯的国民党军，自1945年10月至次年1月，晋冀鲁豫军区、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津浦前线野战军（后改称山东野战军）分别在平汉铁路、平绥铁路、津浦铁路，进行了邯郸战役、绥远战役和津浦路徐（州）济（南）段战役。

晋冀鲁豫军区进行的邯郸战役，是继上党战役之后进行的又一次大规模歼灭国民党军的战役。

10月，国民党军4万余人从新乡地区出发，沿平汉铁路及其东侧北犯，

另有一部跟进，企图进占晋冀鲁豫解放区首府邯郸，控制平汉路。晋冀鲁豫军区部队采取诱敌至预设战场，集中兵力实行围攻，并适时网开一面，在敌退路上夹击、各个击灭的战法，将国民党军3个军诱至漳河以北、邯郸以南的滏阳河河套多沙地带，逐次歼灭。同时，还把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结合起来，促使国民党军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8军军长高树勋率部举行战场起义。这次战役，晋冀鲁豫解放军伤亡4700余人，共歼国民党军2万余人，缴获大批武器资材，挫败了国民党军沿平汉路北进计划，对人民军队调整战略部署、争取国内和平的斗争起了重大作用。高树勋率部起义，开创了解放战争中国国民党军1个军起义的先例，在国民党内部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它一方面说明人民解放军对敌工作的强大威力，同时也表明，国民党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又发动内战极为不得人心，甚至在其高级军官中也发生了严重的分化。晋察冀、晋绥军区进行的绥远战役，历时近两个月，歼灭沿平绥铁路东进的国民党军第12战区傅作义所部1.2万人，收复绥东、绥南广大地区。傅作义一部被歼后，其主力即全线西撤，退守归绥、包头。津浦前线野战军进行的津浦路徐（州）济（南）段战役，实行了争取先机、开辟战场、待机歼敌的方针，并利用国民党军与其所收编的伪军之间的矛盾，实行分化瓦解，争取郝鹏举率1万余人举行起义。是役持续近3个月，津浦前线野战军伤亡6000余人，歼灭国民党军2.8万人，挫败了国民党军打通津浦路的企图。由于解放区军民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制定的战略方针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对进犯国民党军实行坚决反击，使国民党军控制华北、华东大城市及交通要道的战略目标未能完全得逞。

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之前，中共代表团首先提出无条件停止内战的建议。经过激烈的谈判斗争，1月10日国共谈判代表签订停战协定，毛泽东、蒋介石同时下达从1月13日午夜生效的停战令。根据协议，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代表三方组成军事调处执行部，以监督停战，调处冲突，停战协定达成后，中共中央发布《停止内战冲突的通告》，规定，对于停战协议，“凡共产党领导下之一切部队，包括正规军、民兵、非正规军游击队，以及解放区各级政府，共产党各级委员会，均须切实严格遵行，不得有误。”人民解放军各部严格遵守了这一规定。然而，国民党对执行停战协定却毫无诚意。停战令生效后，国民党就频繁调动军队，加紧进行全面内战的准备。自1月13日至5月底，国民党先后违约向解放区周围运送和调动42个军、118个师共130余万人。虽然政协开幕、停战令生效后一个短时间内，国内出现了暂时的和平，但这只是暴风雨到来前短暂的平静。从2月开始，国民党军进攻的重炮在东北再度轰响起来，关内各解放区也被国民党军蚕食、骚扰的硝烟所笼罩。

东北是国共两党争夺的重点地区。国民党拒不承认人民军队在东北的合法地位，妄图独占东北。1945年9月，国民党当局成立了东北行营和东北保安司令部，积极收编伪满军警和土匪武装，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相对抗。此后，在美国军舰运送下，调动军队向东北进攻，11月间，攻占东北民主联军驻守的山海关、锦州等地，挑起了东北的内战。1946年1月停战协定签订时，国民党政府以“接收主权”为名，坚持把东北排除在外。

3月，国民党军乘苏军开始从东北撤兵之机，立即进驻沈阳。它违背已达成的调处东北冲突的协议，集中5个军11个师的兵力向东北民主联军大举进攻，试图抢占四平等地，进而占领全东北。为配合和平谈判，促进东北及

全国和平的实现，东北民主联军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从4月8日至5月18日，进行了四平保卫战。作战中，东北民主联军以劣势装备，英勇地抗击了国民党军在飞机、坦克、大炮掩护下的疯狂进攻，歼敌万余人。在给进犯的国民党军以沉重打击后主动撤出四平、长春，向松花江以北和东满、西满转移。四平保卫战，是中共中央从东北和全国的战略利益出发，为配合谈判斗争，阻止国民党军扩大军事进攻而组织的一次特殊条件下的较大规模的城市防御战。进行这一战役是必要的。如果不给进犯东北的国民党军以阻击，而使其长驱直入，和平谈判即无法进行，东北根据地也不能建立和巩固。所以，战役进行中，中共中央一再电示东北民主联军，必须坚守四平。指出：东北战争，中外瞩目；必须坚持奋战，将敌军打得精疲力竭，挫其锐气，方“可能求得有利于我之和平”，这次作战，挫败了国民党军独占东北的狂妄计划，对保卫北满根据地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有力地配合了谈判斗争。虽然国民党军占领四平，并继而占领长春、吉林等地，控制松花江以南地区，但已无力再进。6月，国民党被迫同意实行东北休战。

国民党军在大举进攻东北的同时，不断向关内各解放区进犯。从停战令生效到1946年6月，国民党军先后出动兵力270万人次，进犯解放区达4300多次，给解放区人民造成了严重损失。关内各解放区军民开展了英勇的反蚕食斗争，歼灭大批国民党军，巩固了解放区，使人民解放军在军事布局上处于较为有利的战略态势。

实行战略转变，编组野战兵团

依据不同的作战对象和敌我力量对比状况，采取不同的组织形式与作战形式，是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抗日战争末期，为适应对日本侵略军实施全面反攻的需要，根据中共“七大”的精神，八路军、新四军开始逐步实行由抗日游击战到抗日正规战的战略转变。1945年8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提出由抗日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的战略措施。要求迅速组建超地方的正规兵团，集中行动，“以便在解决敌伪时，保证我军取得胜利。解决敌伪后，主力应迅速集结整训，提高战斗力，准备用于制止内战方面。”由于日本宣布投降，抗日战争最后反攻阶段的时间短促，八路军、新四军未能全面地实现由抗日游击战为主向运动战为主的军事战略转变。日本投降以后，在国民党统治集团篡夺抗日战争胜利果实、蓄谋发动全面内战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军委及时作出了继续进行军事战略转变的决策，9月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中央关于扩兵与编组野战军的指示》，对野战兵团的编组与指挥关系等问题作了明确的规定。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各战略区迅速集中部队，使之脱离分散游击状态，分甲、乙、丙三等，组成团、旅、师，形成超地方性的正规兵团，集中行动，执行作战任务。此后，又按照中央军委的要求，在编组野战兵团的基础上，全面加强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建设。各战略区野战兵团数量，占全部兵力的 $\frac{3}{5} \sim \frac{2}{3}$ ；野战兵团，从连、营、团、旅（师）至纵队，基本上按“三三制”编成；同时，建立实施机动作战的指挥机构，并依情况辖若干纵队，直接受中央军委和各中央局的指挥，人员给养的补充供应则仍由所在区域负责；正规兵团的首长、机关不再兼军区、军分区的首长、机关。此外，还加强了炮兵等特种兵建设。

在编组野战兵团的过程中，各战略区采取了逐步升级、新老合编和重点保证主力相结合的原则，以保持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具体办法是由区小队升编为县大队，县大队升编为独立团或旅，分区独立团升编为野战纵队。每个纵队至少保留一个战斗力强的旅，每个旅至少保持一个战斗力强的团，其余旅团也有一定数量的老部队作骨干。因此，既保证了主力部队在合编后不丧失其突击力量，又保证了多数部队的迅速巩固与提高。各部队还用打运动战为主的指导思想统一指战员的思想与行动，并由此带动作战指挥、教育训练、后勤保障及战斗作风的相应变化。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各战略区基本完成了野战兵团的编组，逐步健全了野战兵团与地方部队、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在华东，新四军和山东军区部队主力编成山东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黎玉任政治委员，下辖2个纵队2个师；山东军区下辖5个军区和独立旅共20余万人。在新四军编成内，组建华中野战军，下辖4个纵队共4万人；华中军区下辖1个军区和8个军分区，约11万人。中原军区编组2个野战纵队共3万人，并辖3个军区共3万人。晋绥军区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序列中分出，直接受中共中央军委指挥，组建晋绥野战军，贺龙兼任司令员，下辖4个旅；晋绥军区由贺龙任司令员，李井泉任政治委员，下辖3个军区，全区部队共3万人。晋冀鲁豫军区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下辖4个军区和5个野战纵队，全区共有野战部队8万余人，地方部队23万人。晋察冀军区由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5个军区和9个野战纵队；同时，为适应在晋察冀和冀察热辽两个方向作战，先后组成第1、第2野战军，各辖4个纵队，全区野战部队18万人，地方部队12万人。

编组野战兵团，实行由抗日游击战到国内正规战的军事战略转变，意义极为深远。面对严重的内战危机，人民解放军组建正规兵团，可以形成强大的对敌斗争的骨干力量。当国民党不顾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将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时候，就可以实行以运动战为主的大规模的正规战，用革命战争消灭反革命战争。人民解放军在实行战略转变，组建野战兵团的同时，强调要加强地方部队和民兵的建设，使传统的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更加完善，更利于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

加紧战备

随着国民党统治集团对停战协定、政协决议的破坏，内战危险越来越严重。面对这种严峻的局势，解放区军民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加紧了应付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

为适应作战需要，人民解放军各部队进行了精简整编。实行战略转变，组建野战兵团后，一些部队出现机关庞大重叠，编制不合理，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的比例失调等问题，影响部队战斗力，增加了解放区的财政负担。中共中央在《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等指示中一再指出，“兵贵精不贵多”，要精兵简政，减轻民众负担，以有利于解放区的巩固和坚持。各战略区相继召开复员整编会议，制定精简整编计划。经过深入细致的工作，精简整编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至1946年6月，全军共复员、转业23.3万余人；同时，还动员吸收部分青年农民参军入伍。经过整编，全军共有野战军27个纵队（师）及6个旅，61万余人。地方军划分33个军区、102个军

分区、45个隶属于军区的独立师（旅），66万人。精简整编，提高部队战斗力，既是争取和平民主的需要，也是全面加强人民军队建设，准备应付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的一项重要措施。

加强军政训练，提高思想觉悟和战术、技术水平，以适应作战需要。实现由抗日游击战到国内正规战的转变，以及大量翻身农民参军补入部队，迫切要求部队加强军政训练。1945年底，中共中央把军队练兵规定为翌年解放区三件中心工作之一。全军各部队普遍开展“春季练兵”，“百日练兵”等活动。随着时局的发展，中共中央专门发出《关于练兵的指示》，要求“立即下令全军练兵，上级督促检查，将此看成决定胜负的关键之一。”在另一则指示中又强调：现全国性的内战危机，极端严重，我应积极加以准备（特别抓紧练兵），遵照这些指示，各部队利用作战间隙，广泛开展了军政练兵运动。政治训练方面，各部队进行了形势任务教育、阶级教育和加强组织纪律性的教育，使广大指战员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假和平、真内战的面目，克服了和平麻痹思想、家乡地域观念以及怕苦畏难情绪，树立了为人民解放而奋斗的决心。军事训练方面，以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等形式，着重进行投弹、射击、刺杀、埋雷及近战、夜战等技术战术训练。各战略区还努力办好军政干部学校和各类专业技术学校，培养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经过练兵运动，人民解放军不仅在政治素质、技术水平上有了很大提高，而且进一步改善了官兵关系，增强了部队的团结，提高了部队的作战能力。

参加解放区建设。解放区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生存、发展、作战的依托。有巩固的解放区，就有了支持战争的保障。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人民解放军各部队积极参加了解放区建设，特别是参加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和大生产运动。军队参加地方土改使官兵受到一次生动的阶级教育，密切了军民关系。部队参加生产运动，改善了军队的物质生活，又使解放区的经济逐步恢复和发展，经济实力有较大增强，这就为迎击国民党的进攻和支持长期战争，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解放区建设中，东北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1945年底，中共中央即多次指示东北的人民军队退出中长铁路沿线大城市，在东满、北满、西满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建立根据地。据此，东北民主联军在集中兵力同国民党军作战的同时，抽出部分部队参加建设东北解放区的工作，特别是1946年6月东北实现休战后，东北民主联军将主力部队以师（旅）为单位，分区对创建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危害极大的散布在北满等地的土匪，展开了全面清剿，发动群众，建立民主政权，实行土地改革，使东北（特别是北满）根据地的面貌发生很大的变化，成为东北民主联军巩固的战略后方。在休战期间，东北民主联军还全面加强了自身建设，进行统一整编，调整军区、军分区，改善部队武器装备。至1946年10月东北内战重新爆发时，东北民主联军总兵力已发展到36万人。

总之，从抗日战争胜利到全面内战爆发这10个月时间里，中国处于重要的历史转变关头。这一时期，各种矛盾纵横交错，和平与内战两种可能同时并存，谈判与作战交替进行。人民解放军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争取和平民主，立足长期战争，挫败了国民党军向解放区的一次又一次进攻，推迟了全面内战爆发的时间。同时，加强了部队建设，从各方面做好了应付全面内战的准备。事实表明，在两次战争之间的和平或休战期间，正确估量形势，做好和与战的两手准备，在力争和平的同时，把一切工作的基点放在应付打上面，才能在纷坛复杂的形势下，保持斗争的主动权，立于不败之地。

二、以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

1946年6月底，国民党统治集团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人民解放军被迫实行自卫作战，全国解放战争由此开始。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运筹帷幄，确定了正确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指挥人民解放军打破了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同时，在部分战场转入战略反攻。经过一年英勇奋战，为转入战略进攻奠定了基础。

打败国民党军进攻的战略思想与战略方针

1946年6月，国民党军在完成发动全面内战的各项准备之后，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对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解放区军民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奋起自卫。

战争开始时的形势，对人民解放军来说是极其严峻的。国民党在军事上和经济上占据明显优势，它拥有兵力430万人，其中正规军陆军200万人，特种兵36万人，海空军19万人，后方军事机关等101万人，非正规军74万人；接收了侵华日军100万军队的装备，有22个美械师、半美械师；统治着全国3/4以上的地区和3亿以上的人口；得到美国政府在军事上和财政上的巨大援助。与此相比，人民解放军则处于劣势，总兵力127万人，其中正规军61万人，又被分割在各个根据地里；装备是小米加步枪；解放区只有1亿多人口，其中大部分地区的反动封建势力尚未肃清，土地改革刚刚展开，人民解放军的后方还不很巩固；没有外援，一切依靠自力更生。

全面内战开始时，国民党政府使用全部正规军的80%，即193个旅（师），约160万人，向解放区实行全面进攻。其中，进攻中原解放区的为25个旅，约21万余人；进攻华东解放区的为58个旅，约46万余人；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的为28个旅，约24万余人；进攻晋察冀解放区的为18个旅，约16万余人；进攻东北解放区的为16个旅，约16万余人；进攻陕甘宁解放区的为19个旅，约15万余人；进攻广东各游击区及海南岛解放区的共9个旅，约7万余人。蒋介石依仗其一时的军事优势，狂妄宣称，要在48小时内歼灭中原解放军；2个星期占领苏北，3个星期打通津浦路和胶济路，3个月至6个月，打败人民解放军。

在国民党军的疯狂进攻面前，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敢不敢以革命战争来反对反革命战争？怎样才能战争中打败国民党反动派？这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必须回答的两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当天空中乌云翻滚的时候，毛泽东坚定地指出：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我们必须打败蒋介石，我们能够打败蒋介石。之所以必须打败蒋介石，是因为蒋介石发动的战争，是一个美国支持的。反对中国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的反革命战争。在这一战争面前，如果软弱和退让，不敢以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中国就将变成黑暗世界，中华民族的前途就会被断送。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是因为蒋介石虽然有美国援助，但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国民党军面前有五大难以克服的弱点，一是战略意图与兵力不足的矛盾。蒋介石的野心很大，但他的兵力短缺，后备枯竭，在他全面进攻的情形下，已经顾此失彼，捉襟见肘，一碰到人民解放军自卫反击，便更加手足无措。二是战术要求与战略意图的矛盾。蒋介石想要的地方很多，

或能暂时对某一地区集中相当优势的兵力，但同时在其他地区就破绽百出。国民党军进入解放区作战，不仅地理不熟，还会遭到解放区军民的袭击困扰，只能穷于应付，兵力更加分散，作战的机动性亦愈减少。

三是中央军和“杂牌军”的矛盾。蒋介石从来都把“杂牌军”视为非嫡系部队，放在第一线当炮灰，以达到其消灭异己的目的。“杂牌军”不肯真心为蒋介石卖命。四是首领意图与下级情绪的矛盾。蒋介石下了一连串主观主义的命令，其部下明知无法达到命令所指定的任务，只好消极怠工。凡遇失利，蒋介石从不“责己”，反诿诸部属。五是战术上的弱点很多等。国民党军事力量的优势，美国的援助，只是起临时作用的因素。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也有办法。并且，最重要的是解放战争所具有的爱国的正义的革命性质，必然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拥护，这才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毛泽东在1946年8月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进行的一次重要谈话中，提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从理论上武装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极大地增强了打败国民党军的信心和决心。

针对蒋介石的全面进攻战略，中共中央制定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7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指示；9月16日，中央军委发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对这个方针的主要内容作了明确规定：依靠解放区的有利条件，实行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辅；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力求全歼；战略上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斗上的速决战。经过战略防御阶段作战，大量消耗和消灭敌人，保存和发展自己，逐渐改变军事力量上敌强我弱的状态，改变战略行动上敌进攻我防御的形式，为转入战略进攻创造条件，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

蒋介石对其将校军官们说，“古今中外的战事，凡战略上取守势者未有不败之理”，他断言，人民解放军实行“战略取守势，战术取攻势……他们这种守势战略自然非失败不可的。”然而，战争进程表明，正是人民解放军的“守势战略”，打败了国民党军的“攻势战略”。

打破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

蒋介石为了尽快赢得这场战争，依靠暂时的军事力量的优势和美国政府的援助，决定采取全面进攻、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首先消灭关内各战场的解放军，占领解放区；然后再集中力量解决东北问题，据此，蒋介石确定了国民党军的“作战纲要”：第一步，将解放军所占据的重要都市和交通据点收复，使解放军不能保有任何根据地；第二步，从各据点纵横延展，控制全部交通线，使解放区被分割，解放军的兵力无法集中，陷于被各个歼灭的境地。国民党军实施全面进攻的战略部署和重大战役行动，都是依据这一指导思想作出的。

面对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各战略区人民解放军遵照中共中央军委积极

蒋介石：《国军剿匪必胜的原因与剿匪战术的改进》，（1947年4月15日）。

防御的战略方针，结合本战略区的实际，创造性地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打击进犯之敌。其作战特点，主要不是实行正面的阵地防御，而是主动放弃一些城市和地方，避开敌军进攻的锋芒，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从 1946 年 6 月至 1947 年 2 月，打破了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

战争首先在南部战线的中间——中原解放区爆发。6 月 26 日，国民党军调集 30 万人的部队对中原解放区发起大规模的进攻，企图消灭中原解放区的部队，拔掉中原腹地的这颗钉子，打通向华东、华北、东北的进军道路。中原解放区与南京、武汉隔江相望，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但由于孤立突出于南线，在国民党军重兵包围之中，兵力单薄，粮弹奇缺难于长期坚持。遵照中共中央“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的指示，中原军区以少量兵力就地坚持游击战争，以一部分兵力佯装成主力向东转移迷惑国民党军；主力 2.5 万余人，分两路向西突围，突破国民党军的包围和堵截，于 7 月、8 月在陕南、鄂西北创建了两块游击根据地。中原突围的胜利，保存了中原解放军主力，牵制了国民党军大量兵力，有力地支援了其他战场人民解放军的作战。正如中共中央在致中原军区的慰问电中指出的：中原军区部队“在极端困难条件之下，执行中央战略意图，坚持游击战争，曾经钳制了蒋介石正规军三十个旅以上，使我华北、华中主力渡过蒋介石进攻的最困难时期，起了极大的战略作用。”

华东解放区是国民党军进攻的主要方向之一。因为该区对国民党统治中心宁沪杭地区构成直接威胁，不将其摧垮，蒋介石日夜不宁。他的作战方针是由南向北、由西向东逐步压缩，先占苏皖解放区，消灭华中野战军或迫其北撤，随后在山东寻求与解放军决战，占领山东、占领整个华东。针对国民党军进攻的特点，华东解放军采取打一仗，歼敌一部，后退一步，“边打边走”的战法，有步骤、有计划地由解放区前沿退至解放区纵深，以暂时放弃苏北、鲁南解放区大部城镇为代价，换取了大量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的胜利。这一时期，华东战场进行的主要作战有苏中、鲁南和莱芜等战役。

1946 年 7 月至 8 月进行的苏中战役，是全面内战爆发后，人民解放军在主要战场上进行的一次较大规模的作战。国民党军 12 万人集结于长江北岸南通、靖江、泰兴、泰州一线，企图先占如皋、海安，尔后再沿南通赣榆公路和运河一线向北进攻，与向淮南、淮北进攻的部队相配合，夹击苏皖边解放区首府淮阴。华中野战军 3 万余人，采取内线作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先后取得宣（家堡）泰（兴）攻坚战、如（皋）南战斗、海安防御战、李堡战斗、丁（堰）林（梓）战斗、如（皋）黄（桥）路遭遇战、邵伯保卫战等 7 次作战的胜利，歼灭国民党军 5.3 万余人，被誉为苏中“七战七捷”。这次胜利，打击了国民党进犯军的气焰，在战略上配合了山东和晋冀鲁豫解放军的作战。这次战役表明，依托解放区进行内线作战，便于以己之长克敌之短；在数量上和装备上处于劣势的人民解放军，只要实行正确的战略战术，集中优势兵力，就能够歼灭全副美械武装的国民党军。中央军委对这一战役作了高度评价，指出，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敌一部，故战无下胜，士气甚高；缴获甚多，故装备优良；凭借解放区作战，故补充便利；加上指挥正确，既灵活，又勇敢，故能取得伟大胜利。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4 卷，87 页。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3 卷，438 页。

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主力在 12 月取得宿北战役胜利后，又回师鲁南，于 1947 年 1 月进行了鲁南战役。这时，国民党军整编第 26 师及第 1 快速纵队（装备有中型坦克、榴弹炮、汽车），在临沂西南 30 余公里处的向城、卞庄（今苍山）、长城一线转入防御；其左翼整编第 51 师位枣庄、齐村地区；右翼整编第 59、第 77 师位台儿庄以北地区。针对这种部署，山东、华东两野战军集中 27 个团的兵力，一反先打弱敌的常规，首先歼击整编第 26 师这个强敌。1 月 2 日至 20 日，解放军发起突然攻击，首歼整编第 26 师及第 1 快速纵队，尔后集中兵力攻歼驻守峰县、枣庄的国民党军，共歼敌 5.3 万余人，缴获坦克 24 辆、各种火炮 217 门和汽车 474 辆。这次作战，创造了以劣势装备歼灭国民党机械化部队的经验，同时，还为华东人民解放军组建特种兵部队提供了装备。

鲁南战役后，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合并编成华东野战军，全军 11 个步兵纵队，（其中 9 个纵队均在山东解放区执行内线作战任务，2 个纵队留置苏中、苏北敌后）和 1 个特种兵纵队。华东野战军成立后的第一个胜仗即是莱芜战役。1947 年 1 月，国民党军统帅部制定“鲁南会战”计划，以 31 万余人的兵力，分南北两线向山东解放区进攻，企图迫使华东野战军主力在临沂地区与其决战。针对国民党军南强北弱的特点，华东野战军以一部兵力在南线阻击，并适时放弃临沂，主力大踏步北上，于 2 月 20 日至 23 日在莱芜地区取得一次歼敌 2 个军部、7 个师共 5.6 万余人的胜利，华东野战军伤亡 8000 人，这次战役之所以取得胜利，主要是一切作战行动均从有利于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着眼，哪里有利于歼灭敌人就到哪里去打，必要时不惜放弃重要城市临沂；集结主力于便于机动的位置，持重待机；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求歼孤立突出之敌；利用敌人的弱点和矛盾，造成敌人错觉；敌变我变，实施灵活机动的指挥。

晋冀鲁豫解放区与陕甘宁、晋察冀、华东、中原解放区相邻，是联结上述各解放区的枢纽。当然成为国民党军进攻的主要方向之一。国民党军集中 28 个旅 25 万人进攻这一地区。其中，一部进攻冀鲁豫和豫北解放区，一部进攻晋南解放区。针对国民党军兵力比较分散，后方空虚的特点，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采取避实击虚，在大步进退中调动敌人，各个击破的战法，迎击国民党军的进攻，先后进行了陇海路、定陶、巨野、鄆城、滑县、巨金鱼和豫皖边等战役。

8 月，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大步前进，向陇海路中段开封至徐州段突然发起攻击，歼灭国民党军 1.6 万人，截断陇海铁路，打乱了国民党军的南线作战计划，迫使其抽兵回援，从而支援了中原突围和华中战场作战。陇海路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军统帅部匆忙从陕南、豫西追堵中原军区突围部队的兵力中抽调 3 个整编师，从淮南、徐州等地抽调 1 个军和 2 个整编师，加入冀鲁豫战场，连同原在郑州、新乡、商丘等地的 8 个整编师，共 14 个整编师 32 个旅约 30 万人，企图以优势兵力从徐州、郑州两方面钳击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于陇海路以北定陶、曹县地区，占领鲁西南，然后打通平汉铁路（今北京—汉口），晋冀鲁豫野战军，决心首先诱歼整编第 3 师于定陶以西韩集地区，尔后视情况再歼整编第 47 师一部或大部。遂以一部兵力箝制徐州方向之敌，集中四个纵队的主力，对由郑州方向进攻的国民党军整编第 3 师实行攻击。这样，就在局部上造成四倍于敌的优势。9 月 3 日午夜发起攻击，激战至 6 日下午，全歼整编第 3 师。随后，又迅速转移兵力，扩张战果，歼整

编第 47 师两个旅。此役，晋冀鲁豫野战军伤亡 3500 余人，歼灭国民党军 1.7 万余人。延安《解放日报》9 月 12 日社论指出：定陶战役，“是继中原我军突围胜利与苏中大捷之后又一次大胜利。这三个胜利，对于整个解放区的南方战线，起了扭转局面的重要作用。”定陶战役的胜利再次证明，人民解放军依托解放区实行内线作战是可以取得重大战果的。

10 月，晋冀鲁豫野战军又进行了巨野战役和鄆城战役。其中巨野战役虽歼敌一部，但未能在大步进退中调动敌人，打成“牛抵角”式的僵持局面。为避免被动，人民解放军撇开强敌，在纵深实行宽大机动。终于在野城战役中，以四倍于敌的优势，歼灭国民党军一个旅 9000 余人。11 月、12 月，晋冀鲁豫解放军主力，又实行敌进我进的方针，先后进行了滑县战役、巨（野）金（乡）鱼（台）战役、豫皖边战役，捕歼分散、孤立之敌，获得歼灭国民党军 4 万余人的重要战果。

晋南的太岳解放区控制着同蒲路，是国民党军全面进攻中的战略方向之一。国民党军第 1 战区企图在 1 个月内，打通同蒲路南段，席卷晋南，然后再与第 2 战区会攻上党，策应其主力向平汉线进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 4 纵队和太岳军区、晋绥军区等部队，决心乘第 1 战区胡宗南部和第 2 战区阎锡山部尚未靠拢时，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粉碎其进攻，随之先后进行了闻夏、同蒲等战役，给国民党军以沉重打击。在同蒲战役进行时，胡宗南于 1946 年 8 月中旬将其整编第 30 师和其精锐的所谓“天下第一旅”（整编第 1 师第 1 旅）共 4 个旅调到晋南，企图与阎锡山部南北夹击，消灭第 4 纵队。第 4 纵队等部决定在胡部北进时，在临汾、浮山地区寻歼其一二个旅。9 月 22 日，临浮战役打响。经过激战，使胡宗南全副美械装备、抗战八年期间留置西北舍不得动用的所谓“天下第一旅”被全歼。接着，又取得了吕梁、汾孝战役的胜利。晋南解放军共歼敌 2.5 万余人，解放了晋西南广大地区，并将敌压缩到同蒲线和晋中盆地，扩大了陕甘宁边区与晋绥解放区的联系。

晋察冀、晋绥两解放区包围和威胁着国民党军占领的北平等重要城市与一些交通干线，也是国民党军进攻的重要方向。国民党军企图首先占领热河省会承德和冀东地区，尔后夺取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确实控制各条铁路线，分割晋察冀、晋绥、东北解放区的联系，然后集中兵力消灭晋察冀和晋绥解放军。晋察冀和晋绥军区按照中央军委的既定计划，于 7 月进行了晋北战役，收复城镇 10 座。随后，又于 7 月至 9 月进行了大同、集宁战役，歼灭国民党军 1.2 万人。但由于对敌情估计不足，缺乏攻坚经验，兵力使用不当等原因，大同久攻不下，未达到攻城打援的预定目的。国民党军占领集宁、承德后，从东西两面夹击张家口。晋察冀军区部队进行了张家口保卫战。这次战役，在平绥路东段和平汉路北段给国民党军以有力打击，但由于对傅作义的迂回进攻未作出准确估计，西线兵力未能部署在有利地区机动，张家口终于在 10 月 11 日失守。张家口失守后，晋察冀军区总结前段作战的经验教训，充实野战纵队，于 1946 年 11 月至 1947 年 2 月，先后发起易满、保南等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 2 万余人，粉碎了国民党军分割、占领晋察冀解放区腹地的企图。

在东北战场，1946 年 10 月，国民党军采取“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方针，以部分兵力监视北满解放军，集中主力进攻南满解放区，企图稳固控制南满，切断东北解放区与华北解放区的陆上联系，和东北解放区与山东解放区的海上联系，等待关内援兵到后集中兵力攻占北满，进而控制整个东北。

在这种情况下，东北民主联军采取坚持南满，巩固北满，南北满密切配合的作战方针，以及南拉北打、南打北拉的作战方法，先后进行了新开岭战役和南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给国民党军以迎头痛击。

1946年10月上旬开始，国民党军向南满解放区大举进攻。东北民主联军南满部队采取以内线歼敌力主，外线密切配合，集中优势兵力，于10月底11月初，在新开岭地区一举歼灭国民党军第25师8000余人，开创了民主联军在一次作战中歼敌一个整师的先例。延安《解放日报》社论指出：10天前，“杜聿明侵占安东时是如何得意忘形，他公开表示要在东北大打，然而曾几何时，这个号称蒋军嫡系精锐、全部美械装备的第25师，一旦毁灭于人民军队之手，这对好战分子，是如何的痛心损失啊！”中共中央军委在嘉奖令中强调指出，尔后每次作战都必须像新开岭战役那样，在战役上和战术上集中优势兵力，方可必胜。

在东北国民党军继续贯彻“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集中兵力进攻南满解放区的时候，东北民主联军为粉碎其进攻，于1946年12月至1947年3月举行了南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共歼国民党军4万余人。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南攻北守，先南后北”，各个击破东北民主联军的战略计划。南下江南、四保临江作战，是东北战局发展过程中一个战略上的转折点。此后，国民党军由于机动兵力更加减少，不得不放弃攻势，转取守势，这就为东北民主联军转入战略反攻创造了条件。南满解放区的保存，北满、东满、西满解放区的巩固和发展，使东北解放区日益成为巩固的战略根据地。南下江南、四保临江作战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就在于南、北满在战略上主动而密切的配合，使国民党军疲于奔命，兵力更加分散；始终贯彻了积极主动、先机歼敌的战术思想，每战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歼敌一部。

解放战争的头8个月，人民解放军实行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而不以夺取或保守城市与地方为主的战略方针，经过160余次作战，歼灭国民党军71万余人，渡过了战争最困难的阶段。国民党军虽然占领解放区105座城市，但平均每占一城市，要付出7000人的代价，而且由于占领区扩大，战线延长，又不得不以重兵来守护交通线和城市，加之有生力量大量被歼，这样，它的机动兵力就大为减少，蒋介石的全面进攻战略无力维持下去了。

打破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与展开局部战略反攻

1947年3月开始，国民党军放弃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集中兵力对山东解放区和陕甘宁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企图压迫华东解放军至胶东狭窄地区消灭之，摧毁共产党的“军事根据地”；攻占延安，打击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首脑机关，摧毁共产党的“政治根据地”。随后，从东西两翼北上，在华北与人民解放军决战，进而出关占领东北。为保证重点进攻方针的实施，在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战场上，国民党军暂取守势。

针对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战略，人民解放军继续执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陕北、山东战场解放军实行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捕捉战机，各个歼灭进犯之敌，并为尔后转入战略反攻创造条件；在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等战场举行战略性反攻，歼灭当面之敌，收复失地，以配合陕北、山东战场作战。中共中央指出，蒋介石的攻势虽然还在继续，但是比较1946年秋季已经衰弱得多了。为着彻底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必须在今后几个月内再歼

国民党军 40~50 个旅，这是决定一切的关键。中共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准备用百折不回的毅力，有计划地克服所有的困难，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

1947 年 3 月，国民党军集中 34 个旅 25 万人的兵力，由南、西、北三面进攻陕甘宁解放区。其中胡宗南集中 15 个旅 14 万人由洛川、宜川之线直取延安。当时在陕北战场，人民解放军仅有两万多人，兵力处于绝对劣势。西北解放军在延安以南实行阻击，掩护中共中央机关和群众安全转移后，于 3 月 19 日主动撤出延安。国民党军的将领们为占领延安而欣喜若狂。但正如毛泽东指出的，蒋介石占领延安，将标志着蒋介石的灭亡；人民解放军的放弃延安，将标志着中国人民的胜利。

毛泽东离开延安后，中共中央从革命全局利益出发，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指挥西北和全国解放战争；以刘少奇、朱德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以叶剑英、杨尚昆等组成中央后方委员会，在晋绥解放区的临县，统筹后方工作。在国民党集结重兵侵占延安，深入陕甘宁边区腹地的严峻时刻，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转战陕北，不但鼓舞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斗争意志，而且将蒋介石的一个王牌集团——胡宗南集团钳制在西北，正便于其他战场打击、消灭国民党军，收复失地。

根据陕北群众基础好、地形险要、回旋余地大等有利条件，西北野战兵团（7 月底改称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指导下，针对胡宗南急于寻找兵团决战的心理，采取“蘑菇”战术与其周旋，创造战机，运用“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和运动战、阵地攻坚战等战法，在撤离延安后的 45 天内，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歼敌 2 万余人，稳定了陕北战局，为彻底粉碎蒋介石对陕甘宁解放区的进攻奠定了基础。此后，西北野战兵团进行了陇东、三边战役，又歼灭国民党军 4700 多人，收复了大片失地。但由于对青海、宁夏的马步芳、马鸿逵集团骑兵机动力强、骠悍顽强等特点认识不足，兵力部署不够集中，未能更多地消灭“二马”部队。

国民党军对陕北重点进攻的同时，集中 24 个整编师约 45 万人，在陆军总司令顾祝同指挥下，采取密集靠拢，加强联系，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战法，向鲁中山区发动进攻，企图消灭华东野战军主力或迫其北渡黄河，达到占领整个山东解放区的目的。

为调动敌人创造战机，华东野战军在鲁南、鲁中地区实行“耍龙灯，’式的高度机动回旋，一个多月内，未能把国民党军调动、分散，予以大量歼灭，而国民党军继续向新泰、蒙阴进攻，针对这种情况，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多次发出指示：敌军密集不好打，只要有耐心，总有歼敌机会。不要性急，不要分兵，不要过早惊动敌人后路，不要天天同敌接触，让敌大胆前进，必能找到歼敌机会。根据这些指示，陈毅、粟裕以最大的耐心持重待机，决定主力再后退一步，转至蒙阴、新泰、莱芜以东地区，隐蔽集结，待机破敌。顾祝同随即令各部“跟踪进剿”，迫使华东野战军与其“决战”。这时，向坦埠前进的国民党军整编第 74 师孤立突出，便于分割围歼。华东野战军立即抓住战机，集中 5 倍于该师的兵力，于 5 月 13 日至 16 日，发起了孟良岗战役。经过 3 天激战，将这支号称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整编第 74 师歼灭，击毙中将师长张灵甫。这次战役，华东野战军歼灭国民党军 3.2 万余人，自己伤亡 1.2 万余人。毛泽东指出：歼灭七十四师，付出代价较多，但意义极

大。孟良崮战役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鲁中会战”计划，给其重点进攻以沉重打击，迫使国民党军暂时停止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孟良崮战役的胜利，说明人民解放军能够用各个击破的战法，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当时新华社评述说，这是在蒋介石最强的进攻方向打击了蒋介石最精锐的部队，这一打击出现于解放区举行全面反攻的前夕，因而有特殊重大的影响。华东野战军能取得如此大胜，是因为对于密集靠拢、稳步推进的国民党军重兵集团，不急于求战，而以最大的耐心持重待机。在大踏步前进与后退中，始终做到不分兵，最大限度地掌握机动兵力。根据战场实际，不拘泥于攻歼侧翼之敌的习惯战法，大胆实施“中间突破”，攻歼强敌，并且使主攻兵团与阻援兵团密切协同，从而达成了速决的全歼的战役目的。

在西北、华东人民解放军迎击国民党军重点进攻的时候，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战场的人民解放军，遵照中央军委的部署，不失时机地相继转入战略性反攻。

晋冀鲁豫野战军于3月至5月，先后发动了豫北攻势和晋南攻势，共歼灭国民党军5万余人，收复和解放城市30余座。晋察冀野战军乘国民党军在正太路守备薄弱之机，采取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战法，于4月至5月，向石家庄外围及正太线东段出击，共歼灭国民党军3.5万余人。随后进行了青仓战役、保北战役，歼灭国民党军2万人。东北民主联军于1947年5月至6月，发动大规模夏季攻势，经过50天作战，歼灭国民党军8万余人，收复城市42座。这些作战的胜利，有力地配合了陕北、山东人民解放军的作战。

全国解放战争第一年，人民解放军经过内线作战，共歼灭国民党军112万人，毙俘国民党军少将以上军官202名，自己损失35.8万人，国民党军占领解放区的城市335座，而人民解放军解放和收复城市288座，两者比较，国民党军净得城市47座，但是，国民党军每占一城平均要付出2.4万人的代价。人民解放军第一年作战的胜利说明，中共中央制定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是十分正确的。国民党军依靠其兵力上和装备上的优势，实施战略进攻，力求速胜，人民解放军则不计一城一地之得失，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不但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并且基本上粉碎了它对陕北、山东的重点进攻，使整个战局发生了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重大变化。

三、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性转折

1947年7月至1948年6月，全国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人民解放军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的战略进攻方针及其十大军事原则，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在外线大量歼灭国民党军，创造新的解放区；同时继续在内线作战，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从而奠定了革命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基础。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是中国革命战争的伟大历史性转折。

战略进攻方针的确定和十大军事原则的提出

全国解放战争进入第二年时，中共中央军委通观全局，认为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时机已经到来，便毅然决定人民解放军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中明确指出：“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我军第二年作战的部分任务是：以一部分主力和广大地方部队继续在内线作战，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

战略防御与战略进攻的转换，通常是在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实现的，即原来进攻的一方由优势转为劣势，原来防御的一方由劣势转为优势。然而，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却不是这样的。当时，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及武器装备并没有超过国民党军，国民党军对陕北、山东的重点进攻虽然遭到严重挫折，但并没有完全被粉碎。中央军委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决策，是建筑在对战争形势科学分析的基础上的。

经过一年的作战，交战双方力量对比的形势发生了明显变化。国民党军的总兵力，已由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人，下降到370万人，其中正规军由200万人减少到150万人，战略机动能力大为减弱；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则由战争开始时的127万人增加到195万人，其中正规军近百万人，机动作战兵力已超过国民党军。国民党军在对陕北、山东进行重点进攻时，连接这两个战场的晋冀鲁豫战场及整个战略后方兵力十分薄弱，战略态势十分不利；人民解放军在陕北和山东战场上虽然还处于防御地位，但在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等战场上已举行了战略性的反攻，特别是晋冀鲁豫野战军已经解放了豫北和晋南广大地区，夺得了向黄河以南进攻的基地。由于战争连连受挫，节节失败，国民党军队的士气低落，浑心动摇，蒋介石在政治上更加孤立，国民党统治集团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之中。人民解放军的装备改善，士气高昂，充满着必胜的信念；解放区人民由于土地改革更加支援人民解放军。因此，人民解放军已具有转入战略进攻的条件。

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不但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由于战争深入到解放区的腹地，生产遭到破坏，人民生活困苦，人力、物力资源日益紧张，人民解放军在内线作战的机动区域缩小。而蒋介石实行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企图彻底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解放战争难以持久。在这种情况下，人民解放军如果仍然在内线作战，就中了蒋介石的毒计。打倒蒋介石，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是人民解放军肩负的神圣使

命。光在解放区内作战是打不倒他的，因为他还占有全国四分之三的土地和三分之二的人口。因此，人民解放军必须转入战略进攻，打到国民党统治区去。这样，才能根本改变战局，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

为此，中央军委决定将战略进攻的主要方向指向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长）江、淮（河）、（黄）河、汉（水）广大地区，因为这里是国民党军的薄弱而要害的区域，既有获胜把握，又最能对战争全局产生决定性影响。同时还作出了“三军配合，两翼牵制”战略进攻部署，即以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称刘邓大军），实行中央突破，先战鲁西南，然后跃进大别山；以陈毅、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主力（称陈粟大军），挺进豫皖苏地区；以陈赓、谢富治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称陈谢兵团），挺进豫西。三路大军在黄河、长江、汉水、淮河之间，布成品字形阵势，以保障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立足生根为中心，三军互相配合，协同作战，歼灭国民党军，重新建立中原根据地。以西北野战军出击榆林，将进攻陕北之胡宗南集团北调；以华东野战军内线兵团在胶东展开攻势，将进攻山东之国民党军牵向海边，掩护三路大军挺进中原。与此同时，中央军委要求东北、华北战场上的人民解放军，积极开展攻势，歼灭当面之敌，收复失地，从战略上策应转入外线作战的刘邓、陈粟、陈谢三军。

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在那里歼灭敌人，创建新根据地，是人民解放军面临的新任务，中共中央指出，要争取胜利，必须正确解决两个关键问题，“第一是在善于捕捉战机，勇敢坚决，多打胜仗；第二是在坚决执行争取群众的政策，使广大群众获得利益，站在我军方面。”

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部署，各战场的人民解放军从1947年7月至9月，逐渐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人民解放军主力打到国民党统治区去不久，毛泽东就为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政治宣言，即10月10日公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并宣布了八项基本政策。

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重要会议，毛泽东作《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阐明了在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时期，党的政治、军事、经济纲领。关于军事纲领，即是十大军事原则：（1）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

（2）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

（3）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4）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5）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

（6）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

（7）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8）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坚固的据点和城市，等候条件成熟时夺取之。（9）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分人员补充自己。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

（10）善于利用两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毛泽东指出，这“就是人民解放军打败蒋介石的主要方法。”十大军事原则是人民解放军在和国内外强大敌人长期作战的锻炼中产生出来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

理同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内容十分丰富，对作战方针、歼击目标、作战形式、作战方法、作战准备、战斗作风以及休整补充等问题都作了明确规定，而其精神实质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十大军事原则的提出，不仅对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发展，而且对夺取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三路大军挺进中原

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4个纵队12万余人，在山东省阳谷以东张秋镇至菏泽以北临濮集地段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由此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刘邓大军利用国民党军在鲁西南地区兵力薄弱和逐批增援的弱点，采取攻敌一点，吸敌来援，打其一边，各个击破战法，实行连续作战。首先迅速夺取郟城、定陶等地，收复曹县，开辟与敌作战的广阔战场，摆脱背水作战的不利局面；接着，抓住援敌王敬久兵团主力正在运动中和兵力分散的弱点，集中兵力，取得六营集、羊山集两仗的胜利。至7月28日止，共歼灭国民党军4个整编师师部、9个半旅6万余人。迫使蒋介石从陕北、山东等地抽调7个整编师17个旅向鲁西南驰援，从而打乱了国民党军的战略部署，有力地配合了西北和山东人民解放军粉碎敌人重点进攻的作战，并力尔后挺进大别山开辟了道路。

正当蒋介石纠集30个旅的兵力对刘邓大军实行分进合击，并企图掘开黄河大堤，水淹刘邓大军和黄河南岸数百万人民的危急时刻，刘伯承、邓小平决心提前结束休整，令全军立即南进，同时报告中央军委。8月7日，刘邓大军突然甩开敌军，兵分三路，向南疾驰，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壮举。毛泽东收到刘、邓电报后连续发电，指出刘、邓“决心完全正确”，“在情况紧急不及请示时”，一切由刘、邓“机断处理”。刘邓大军以勇挑革命重担，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粉碎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前堵后追，先后越过陇海路，涉过黄泛区，跨过沙河、涡河、汝河、淮河等重重障碍，于8月末胜利地到达大别山。随后，一面作战，一面开展地方工作。到11月下旬，共歼敌3万多人，发动群众建立了33个县的民主政权，初步完成在大别山区的战略展开。刘伯承指出：“这一战略行动，恰似一把利剑插进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心脏”。

在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时，陈赓、谢富治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8万人，于8月22日、23日在晋东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转战豫陕鄂边区，往返机动作战。到11月底，歼灭国民党军5万余人，建立39个县的民主政权，在豫陕边地区实现了战略展开。

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8个纵队18万人，于9月初在鲁西南地区沙土集歼灭国民党军一个整编师9000多人，取得转入外线作战后的第一个胜仗，不但鼓舞了全军士气，为恢复和重建鲁西南解放区创造了条件，而且迫使国民党军从山东和大别山战场抽兵增援，从而配合了华东野战军内线兵团和大别山区刘邓大军的作战。9月下旬，陈粟大军以6个纵队越过陇海路南下，挺进豫皖苏边区。到11月下旬，解放和收复县城24座，完成了在豫皖苏边地区的战略展开。

三路大军挺进中原，采取了独特的进攻样式。无论是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还是陈谢、陈粟大军挺进豫陕鄂边、豫皖苏边，均未采取通常战争中常见的正面进攻、一线平推的样式，而是采取避开国民党军的战略要点，以主力脱离后方，跳跃式地直插敌人的战略纵深的样式。之所以这样做，是由于解放军在数量上、装备上仍处劣势，还没有能力逐一夺取国民党军坚固设防的大中城市，而广大乡村则便于解放军进攻和机动；同时解放军与人民群众有着紧密的联系，必然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这样，就能在国民党军的战略纵深立足生根，变无后方为有后方。这种独特的进攻样式，是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中的一大创造，是毛泽东战略进攻理论的一个发展。

人民解放军三路大军挺进中原的胜利，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极力惊恐。蒋介石既怕人民解放军在中原立足生根，又怕人民解放军南渡长江或西进四川，于是调集 33 个旅的兵力，在海空军支援下，由国防部长白崇禧统一指挥对转战大别山的刘邓大军实行围攻，企图首先消灭或驱逐刘邓大军，而后转向豫皖苏边及豫陕鄂边进攻，压迫解放军退出中原。刘邓大军能否在大别山立足，关系到战略全局。为粉碎国民党军对大别山的围攻，中央军委指示刘邓大军以主力坚持大别山内线斗争，陈粟、陈谢两路大军在外线的平汉、陇海铁路展开大破击，调动围攻大别山的国民党军。三军密切协同，“直至粉碎敌人对大别山之进攻为止”。三路大军内外线积极作战，密切配合，经过一个多月的苦战，歼灭国民党军 6.9 万人，粉碎了国民党军对大别山的围攻。

三路大军挺进中原，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广大地区，歼灭大量敌人，调动和吸引了国民党军南线全部兵力 160 多个旅中约 90 个旅左右于自己的周围，把战线由黄河南北推进到长江北岸，使中原地区由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成了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

部分主力继续内线歼敌

三路大军外线出击挺进中原后，内线的西北、山东、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等人民解放军，展开攻势，歼灭与吸引当面之敌，掩护三路大军实行战略展开，并为最后收复全部失地、全歼内线之敌创造条件。

在二路大军挺进中原时，担负从两翼牵制国民党军重任的西北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内线兵团，依据中共中央指示，从全局需要着眼，从利于外线三路大军立足生根着眼，不仅完成了钳制敌人的任务，而且使自己转入了反攻。

西北野战军在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指挥下，于 1947 年 8 月围攻榆林，迫使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北上救援。随后，主动撤围榆林，在沙家店地区，一举歼灭由榆林南下的国民党军整编第 36 师 6000 余人。这次战役，结束了国民党军对陕北的重点进攻，是西北野战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的标志。这次战役在指挥上的特点，是利用国民党军骄横失慎、孤军冒进的弱点，严密隐蔽己方企图，积极造成敌方错觉，诱敌进入预设战场，然后集中兵力，予以全歼。9 月至 10 月，西北野战军又发动延清、黄龙战役，扫清延安东北敌军的孤立据点，力转入外线进攻创造了条件。

华东野战军主力转向中原后，以留置在内线的 4 个纵队组成的内线兵团（后改称山东兵团），从 9 月 1 日开始进行胶东保卫战，采取内线与外线、主力军与地方军相结合的战法，巧妙地钳制与打击敌人。至 12 月 30 日，共歼灭国民党军 6 万余人，并收复胶东腹地。至此，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的

“重点进攻”被彻底粉碎。胶东保卫战，不但根本改变了山东战场的形势，而且有力地配合了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的战略进攻。

晋察冀野战军为打破敌我双方在北平、天津、保定三角地带对峙状态，积极创造战机，于10月围攻保定以北徐水，迫使石家庄之敌第3军北援。然后，当机立断，迅速改变决心，以主力隐蔽快速南下，在保定以南清风店地区，将该军全歼，取得了晋察冀野战军转入战略进攻后的第一次大胜利，对扭转晋察冀战局起了关键作用。11月，又举行石家庄战役，经过充分而周详的准备，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多路而有重点的突击、连续爆破手段，实施攻城，一举攻克国民党军坚固设防的重镇石家庄，全歼守敌。由此开创人民解放军夺取国民党军坚固设防城市的先例，使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联成一片，为发展生产，支援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东北民主联军于9月至11月，坚持以运动战为主，围城打援，先打弱敌，各个击破，远距离奔袭等战法，发起强大的秋季攻势作战，使国民党军时时被动挨打，处处防不胜防。南满部队首先攻歼北宁路及其两侧地区守备薄弱之敌，并诱使沈阳国民党军主力南调；随后北满部队在中长路发动攻势，使敌人首尾不能相顾，并迫使华北国民党军5个师增援东北，从而有力地支援了关内人民解放军的作战。秋季攻势作战共歼灭国民党军6.9万余人，解放城市15座，将国民党军压缩在仅占东北面积14%的锦州、沈阳、四平、长春、吉林等34座城市及其附近地区。

人民解放军外线和内线各个战场的攻势，组成了人民解放军全面进攻的总形势。经过半年的作战，共歼国民党军75万余人。到1947年底，战争已经主要地不是在解放区内进行，而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进行了。中国革命已经进入新高潮。毛泽东指出，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全国大规模的战略进攻，“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

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发展

国民党军统帅部为阻止人民解放军向长江以南进军，确定尽可能坚守东北和华北，争取中原，大力经营华南、西南和台湾的战略方针。为此，将中原、华东、西北战场分成20个“绥靖区”，每个“绥靖区”直接掌握一部分兵力，同时编组机动兵团，往来应援；在东北，集中兵力固守大、中城市，实行“持久消耗战略”；在华北，实行所谓“主力对主力”的新战法，确保平、津、保三角地区；在后方，组织编练司令部，扩建二线兵团，加强后方的守备；为统一战区指挥，先后成立了华北、东北、徐州、华中4个“剿匪”总司令部，统一掌管各战区内军政大权，对人民解放军实行所谓“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总体战。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全面分析全国战局后，于1948年春提出，人民解放军如果在今后仍能每年歼灭敌军100个旅左右，则“五年左右（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消灭国民党全军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为此确定，人民解放军要

继续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稳扎稳打，不求速效，只求平均每月消灭国民党军八个旅左右。要求黄河以南各战场的人民解放军除集中优势兵力，争取子运动中歼灭敌人之外，在有把握的情况下，应尽可能地夺取敌人具有中等坚固设防的城市和战略要点；要求北线华北、东北战场的人民解放军，以拔除敌人据点为主，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进一步发展，取得了重大胜利。

中原战场是国民党军防御的重点，在此设立了8个绥靖区担任要点的防御，并以主力部队编成6个机动兵团担任机动作战任务。其企图是，保持津浦路，以平汉、陇海路作为分割和攻击中原解放军的“十字架”，仍置重点于大别山区，并巩固长江防线，确保江南基本统治区的安全。

刘邓、陈粟、陈谢三军粉碎白崇禧集团对大别山的围攻后，从2月份开始，逐步扩大作战规模，并提高了进行城市攻坚战的分量，至6月的半年中，先后进行了洛阳、宛西、宛东、豫东、襄樊等战役，歼灭国民党军27万余人，攻克了包括洛阳，开封、襄阳坚固设防的重要城市在内许多中小城市，粉碎了国民党军在中原的防御体系。

起初，当中原战局处于对峙状态的时候，为调动和分散国民党军，打破僵局，改善中原战场态势，中央军委于1948年1月决定由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主力3个纵队（通称粟裕兵团）跃进闽浙赣边区，创建新解放区，以吸引国民党军主力一部回防江南。随后，又决定刘邓大军转出大别山区进至淮河以北，由刘伯承、邓小平统一指挥刘邓大军、陈谢兵团和华东野战军的陈（士榘）唐（亮）兵团，在淮河、汉水和陇海、津浦路间机动，打中等规模的歼灭战。陈赓、陈士榘乘国民党军驰援西北之机，洛阳防守兵力单薄，于3月8日至14日举行洛阳战役，全歼守军1.9万人，攻克洛阳。这是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在南线夺取的第一个坚固设防的中等城市。这一胜利，使中原与西北国民党军的联系被完全切断，同时，掩护了艰苦转战大别山的刘邓大军休整，配合了西北野战军作战。中原战局已向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方向转变。

三路大军经过10个月的奋战，至1948年5月，拥有3000万人口的中原解放区日臻巩固。为适应大规模作战的需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于1948年5月9日决定重建中原军区，并将南征的刘邓大军与陈谢兵团改为中原野战军。刘伯承任中原军区和野战军司令员，邓小平任中原军区和野战军政治委员。中原军区的成立标志着人民解放军已取得逐鹿中原的重大胜利。

鉴于中原地区形势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已经具备在这个战场打较大规模歼灭战的条件，同时考虑到渡江南进闽浙赣边区尚有许多困难，中央军委采纳粟裕暂不渡江南进的建议，决定粟裕兵团暂缓过江，加入中原战场作战，与中原野战军协力，寻歼国民党军主力兵团。这是一项重要决策，对中原以至全国战局的发展均有着重要的影响。

6月中旬至7月初，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主力，在中原野战军有力配合下，采取攻城打援的战法举行豫东战役（亦称开封、睢杞战役），首先攻克国民党政府河南省会城市开封，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引起极大的震动。随后又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援敌，创造了一次歼敌一个兵团的范例。豫东战役是人民解放军进行的包括攻坚战和运动战在内的规模大、时间长的一次大兵团作战，共歼灭国民党军9万余人。在豫东大战的时候，中原野战军一部攻克川陕鄂三省要冲襄阳、樊城，歼灭国民党军2万余人。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

攻克津浦路中段重要城市兖州，使济南陷于孤立。

这些胜利说明，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关于集中兵力在中原地区作战的决策是何等正确。为继续歼灭国民党军主力于长江以北，毛泽东决定粟裕兵团不歼灭蒋介石的“五大主力”中的整编第5师和整编第11师，不过长江。正是由于这一重大决策，才有了后来的济南战役和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

在西北战场，西北人民解放军经过艰苦英勇的奋战，已使形势发生显著变化，敌大我小的状况由战争开始时的10：1变为5：1，战场主动权掌握在西北野战军手中。为发展胜利，西北野战军以围城打援的手段于1948年2月发起宜川战役，攻克宜川，歼敌2.9万余人，取得了转入战略进攻的第一个大胜仗。迫使位于陇海路潼关以东的国民党军回撤西安，从而有力策应了中原战场人民解放军攻克洛阳等作战的胜利。4月至5月，西北野战军出击西府，夺取胡宗南集团的补给基地宝鸡，接着挥师陇东。在人民解放军进攻的强大声威下，胡宗南不得不放弃延安。4月21日，革命圣地延安光复。中共中央指出这是一个伟大胜利，并号召西北人民解放军为消灭全部国民党军，解放整个西北而奋斗。

与南线相呼应，北线人民解放军也发起了强大攻势。

在东北，1947年12月中旬至次年3月中旬，东北人民解放军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冬季攻势，攻占和收复战略要地四平、辽阳、鞍山、营口，吉林等城市18座，歼灭国民党军15.6万余人，将国民党军卫立煌集团压缩在沈阳、长春、锦州三个互下联系的地区内，为尔后全歼该集团创造了条件。毛泽东称赞说：我东北野战军在冬季攻势中，冒零下30度的严寒，歼灭大部敌人，迭克名城，威震全国。东北冬季攻势作战丰富了东北野战军的作战经验：针对国民党军采取的“固点、联线、扩面”，而基本点是收缩兵力固守重要城镇的方针，东北野战军集中兵力攻取孤立突出、守备薄弱的据点；处理好攻点与打援的关系，总攻之前遇援以打援为主，在总攻之后遇援以攻点为主，随后移兵打援；攻城时，缜密组织，充分准备，点面结合，发挥炮兵威力，并实施连续作战不给守军以喘息。

在晋察冀和晋冀鲁豫战场，1947年12月底至翌年初，晋察冀野战军在河北涞水县城和庄疃地区歼灭国民党军第35军8000余人，给刚刚就任华北“剿匪”总司令的傅作义当头一棒。接着，发起察南、绥东战役，又歼灭国民党军1.8万余人，收复大片失地。晋冀鲁豫军区部队，从1948年3月7日开始发起临汾战役。在炮火不足的情况下，攻城部队在人民群众大力支援下，运用坑道大爆破战法，挖掘两条各长110米的破城坑道，装填巨量炸药，将城墙炸开各宽50米的缺口，于5月17日攻克临汾，歼灭国民党军2.5万亲人。接着，华北军区第2兵团与东北野战军第11纵队举行冀东作战，歼灭国民党军一部。在5月25日解放隆化战斗中，第11纵队班长董存瑞负伤，用手托炸药包，高呼“为了新中国，冲啊！”炸毁隆化桥上的暗堡，英勇牺牲，用生命力部队开辟前进的道路。战后，该纵队党委授予董存瑞“战斗英雄”、“模范共产党员”光荣称号，并命名他生前所在班为“董存瑞班”。朱德总司令力他题词，“舍身为国，永垂不朽”。第1兵团举行晋中战役，经40天连续作战，歼灭国民党军阎锡山集团10万人，使太原成为一座孤城。

为加强整个华北解放区的建设，使之成为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的战略基地，5月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区合并成华北解放区，两区部队统一组成华北军区，聂荣臻任华北军区司令员，薄一波

任政治委员。

实行战略进攻，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长期以来总是反革命力量强大，一直处于战略进攻的地位；革命力量弱小，一直处于战略防御的地位，但是，这种状态到 1947 年夏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经过一年英勇作战，到 1948 年 6 月取得了辉煌胜利，国民党军的全面防御与分区防御都被粉碎了。人民解放军不但又歼灭国民党军 152 万余人，而最大的成绩是创建了中原解放区，使中原地区由原来是国民党军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成了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阵地，这是对解放战争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与此同时，人民解放军形成了有明显特色的战略进攻理论，那就是：不等总兵力超过国民党军，不待国民党军的战略进攻被彻底粉碎，即转入战略进攻，准确把握了进攻时机；不是将进攻方向直接指向国民党军的重兵集团，而是指向其要害而空虚的腹心地区，准确选择了突击方向；不是正面进攻，一线平推，而是千里跃进，插向敌人战略纵深，进攻样式独特；中央突破，三军配合、两翼钳制、内外线协同，形成了有主有次、主次结合、浑然一体的战略进攻部署；根据力量对比的变化，选择作战目标和确定战役规模，既以打运动战为主，同时又注重阵地战和城市攻坚战，形成了一整套攻坚战术。

四、加强政治工作，提高部队战斗力

人民解放军之所以在革命战争中战胜敌人，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建立了革命的强有力的政治工作，这是敌人永远不同能有的真正优势。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在继承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又有许多新的创造和发展，例如：广泛开展群众性的团结互助运动；为人民立功运动；普遍进行以“诉苦”和“三查”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开展强大政治攻势，争取与瓦解敌军和改造起义国民党军队；恢复与健全军队中党的各级委员会，加强连队党支部建设等。其中，尤以新式整军运动最有特色。

团结互助运动和立功运动

团结互助，是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是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固有的阶级友爱精神的本质表现，是区别于一切旧式军队的一个鲜明特点。解放战争中，这种极普遍平常的团结互助发展成为一个有特定内容的全军普遍开展的群众运动，则是为着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和巩固扩大部队的迫切需要。而立功运动的进行，则大大激发了指战员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了作战、训练、生产等各方面工作的开展。

解放战争全面展开后，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英勇作战，歼灭大批国民党军，但也付出相当大的代价。部队中，经过战争考验的和政治觉悟、军事技术水平较高的老战士减少，翻身农民和解放战士（即被俘虏后经过教育参加人民解放军的原国民党军士兵）大量补入部队，使部队成分发生大变化。三种战士（老战士、新战士、解放战士），因经历不同，受教育情况不同，因而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老战士是部队的骨干，但数量逐渐减少；新战士，经过土地改革，阶级觉悟较高，但缺乏实战锻炼，也不熟悉部队生活；解放战士，一般的有一定军事技术，但政治觉悟低。旧军队的习气较多。如何发挥三种战士的作用，并使他们亲密地团结起来，互相帮助，共同提高，就成为军队政治工作重要而迫切的任务。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晋冀鲁豫野战军产生了团结互助的典型，即王克勤和王克勤班。故团结互助运动又被称为王克勤运动。

王克勤，1941年被抓到国民党军队当兵，1945年10月邯郸战役中被解放。他参加人民解放军后，作战坚决勇敢，帮助战士尽心尽力，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在战斗中光荣牺牲。他在人民解放军短暂的生涯中，创造了思想、技术、生活三互助的带兵方法。他把全班战士分成三个互助组，平时行军、训练，以体力强的帮助体力弱的，以技术熟练的帮助技术不熟练的，以有战斗经验的帮助没有战斗经验的，形成互帮互学；战时，各小组相互支援，互相鼓励，共同完成战斗任务。全班战士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作战、训练、行军，样样都出色。这个班被评为模范班，他本人成为杀敌英雄，带兵模范。

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抓住王克勤这个典型，决定在全军区开展王克勤运动。各部队根据王克勤班的经验，普遍建立了互助组，每班编成三个组，每组三四人，三种战士、三种分子（即先进、中间、后进分子）适当配备。这种建筑在思想一致、目标一致、利益一致的自觉基础上的组织形式，适应了部队成员变化的情况和作战的需要。

1946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普遍开展王克勤运动》的社论。指出，王克勤的带兵法“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创造了新的光荣的范例”。社论号召“全解放区的军民，都能按照当前自己的条件，选择自己的典型，来普遍有力地推行这个运动”。这样，王克勤运动就由晋冀鲁豫军区逐步推广到东北、晋察冀、华东和陕甘宁晋绥军区，形成了全军性的群众运动。这个运动的开展，增强了人民解放军内部的团结，对部队的军事、政治、后勤及其他工作，都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成为提高部队战斗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立功运动是由华中、山东人民解放军首创，尔后在全国各解放区和军队中逐步推广的。1946年8月，华中野战军某团自发地开展了“功劳簿”活动，深受指战员的欢迎。

10月，该团发起个人有“功劳证”，连队有“功劳簿”，给立功者家属寄送“功劳状”的功劳运动。与此同时，山东人民解放军也开展了类似的立功运动。

1947年1月中共中央华东局作出广泛开展立功运动的决定，在华东解放区迅速掀起了“有功报功，论功行赏”，“人民功臣个个敬爱”的立功热潮。

在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有过政治上比进步和战斗中比勇敢、比战果以及比做群众工作的竞赛活动；有过以战斗、生产和做群众工作为主要内容的评选模范活动，但没有立功运动。因此，立功运动这个新生事物一出现，立刻受到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重视与扶植。1946年11月11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广泛开展立功运动》的短评，1947年2月4日又发表《再论立功运动》的社论。指出，正在山东和华中兴起的立功运动，“是人民自卫战争的一个创举”，号召全解放区“党政军民，要热烈进行革命英雄主义的竞赛”，为着保卫自己的土地与争取全民族的独立解放，建立更多与更大的功劳。东北、晋察冀、晋冀鲁豫和陕甘宁晋绥军区，热烈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参照华东军区的经验，做出了开展立功运动的部署。于是，立功运动便在各战略区展开，形成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人民解放军进行的立功运动，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持久性。任何一个运动，从时间上讲都有限度，有的几十月，有的一年以上。立功运动从1946年8月算起，贯穿于解放战争全过程。1950年9月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作为一个大规模群众运动的立功运动的结束，历时4年之久，二是广泛性。从军队到老百姓（民兵、民工）；从前方到后方；从部队到机关；从军事工作到政治工作与后勤工作；从干部到战士；从正面战场到敌占区，游击区。总之，一切领域，一切岗位，都开展了立功运动。这么广泛的运动，在人民解放军历史上是少有的。三是针对性。对不同人提出不同要求：对英雄、模范，有了功劳不应骄傲，应当再立新功；对共产党员，应做模范、立功的先锋；对解放战士提出“功劳看以后，以后建功劳”；对犯错误的人提出“将功折罪，立功赎过”。总之，针对不同情况、不同任务、不同人员，提出不同要求，只要做出了突出的成绩，便可立功。因此出现了“行行出状元，人人可立功”的你追我赶的动人场面。四是立功运动同英（雄）模（范）运动相结合，立功运动是英模运动的发展，使英模运动更加普遍化、群众化，同时又为创造更多的英雄模范奠定了基础，使成千成万的立功者中产生出众多的品质更高、群众更加拥护、带头作用更大的英雄模范。因此，立功与英模相结合，使革命英雄主义更加发扬，使运动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

的基础上再普及，在发展中巩固，在巩固中再发展，由此推动运动向前发展。

人民解放军的立功运动为什么能这么持久蓬勃地开展呢？《解放日报》《再论立功运动》社论指出：“首先是因为解放区军民所进行的事业的正义性。”解放区军民胜利进行的战争不但是为了保卫解放区人民的土地和家园，而且是为了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解放全国各族人民。人民解放军深刻地认识到，为完成人民赋予的伟大而神圣的历史任务，就必须发扬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夺取战争胜利。因此，为人民立功，做人民的功臣，便成了他们的自觉行动和前进的动力，其次，立功运动是在各级党委和连队党支部的领导下进行的，共产党员是运动的骨干，他们以身作则，时时、处处、事事起模范带头作用，不但自己立功，而且帮助他人立功。立功运动的普遍展开，英雄、模范功臣的大量涌现，又为选拔干部，吸收新党员创造了条件。再次，逐步建立与健全了开展立功运动的制度。当时，虽然全军还没有制定统一的立功条例，但各战略区从本区实际出发制定了开展立功运动的暂行办法或概则，有的还颁布了立功运动暂行条例，对立功的标准、等级、批准权限和实施办法，均做出明确规定。各部队还建立了较固定的组织形式，班排设记功员一名，连营设立功委员会，团以上政治机关设评功委员会，班排有记功簿，连营有功劳簿，以及立功、评功、奖功、庆功等一套工作步骤。这样，立功运动就走向了制度化、经常化。

新式整军运动

从1947年冬至1948年夏，人民解放军利用战争间隙，开展了以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为主要内容的整军运动。

1948年3月，毛泽东把这次整军称之为“新式整军运动”。这个运动继承和发扬了《古田会议决议》和延安整风运动的精神，创造了适合解放战争新形势，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建设强大人民军队的新经验。

进行这样一个运动，是人民解放军自身建设和赢得战争胜利的需要。

1947年7月至9月，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响亮地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同一天，中共中央批准并公布全国土地会议制定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决定在消灭封建性和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的原则下，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按照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人民解放军在外线、内线发动强大攻势；解放区人民则掀起声势浩大的土地改革运动，形成了“前方打老蒋，后方挖蒋根”的革命总形势，中国革命进入新的高潮。

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的客观形势，向人民解放军提出了更高要求，那就是“我全军将士必须提高军事艺术，在必胜的战争中勇猛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一切敌人。必须提高觉悟性，人人学会歼灭敌人、唤起民众两套本领，亲密团结群众，把新区迅速建设成为巩固区。必须提高纪律性，坚决执行命令，执行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全军一致，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在中共中央、中央

军委的正确领导下，人民解放军继承和发扬红军与八路军、新四军的优良传统，取得巨大成绩，经受了严峻的战争考验，深受人民的拥护。

但是，在这支人民军队里，还存在着若干与革命形势不相适应和妨碍自身发展壮大不良倾向。因为战争节节胜利，部队迅速扩大，经受长期战争锻炼的指战员减少了，大批新人涌入部队，使部队成分发生很大变化，这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组织上的不纯。有一些干部的思想跟不上革命形势的发展，对战争的长期性、残酷性认识不足，厌倦艰苦的战争生活，不愿意到前线作战，尤其惧怕到国民党区域作战；不少人对土地改革的伟大意义缺乏全面深刻的认识，对土地改革漠不关心。因为胜利，有的干部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和官僚主义、军阀主义，不尊重地方人民政府，破坏群众纪律，使军政、军民关系紧张；有的部队执行命令不坚决、不彻底，缴获归私不归公，搜俘虏腰包；有的干部不关心士兵生活与疾苦，训斥打骂士兵的现象屡禁不止，导致官兵关系不融洽。

这些不良倾向虽不是人民解放军的主流，但问题的性质与程度较为严重，非进行一次全面整顿不可。因此，1947年9月中共中央工委讨论部署农村整党时，朱德提出了整军问题。他说：“我们的军队需要从思想上组织上加以整顿，需要一个查思想查作风的运动，使军队在思想上达到一致拥护土改，组织上纯洁严密”。同月，毛泽东向全军批转由他亲自修改的东北民主联军第3纵队诉苦教育的经验，号召全军普遍进行诉苦运动，提高阶级觉悟。12月，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里指出：“全党同志必须明白，解决这个党内不纯的问题，整编党的队伍，使党能够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完全站在一个方向，并领导他们前进，是解决土地问题和支援长期战争的一个决定性的环节。”1948年1月30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的指示，要求各部队有领导的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进行三查三整，“达到政治上高度团结、生活上获得改善、军事上提高技术和战术的三大目的。”新式整军运动就是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始终不间断地领导下，认真开展起来并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

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结合本战略区的战争形势与部队实际情况，各野战军、各军区开展了新式整军运动。因为是利用战争间隙进行整军，又因为各战略区部队情况不尽相同，因此各区开展运动的时间和内容、方法均有区别，各具特色，但其整军都包含以下内容与步骤。

进行土地改革思想政策的再教育。早在1946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发布，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开始后，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就进行过一次土改教育，成绩显著。1947年10月《中国土地法大纲》公布后，土地改革运动在解放区广泛深入展开。土改是考验军队乃至全中国一切人们、一切党派的一个“关”。对于这场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曾有过的的大革命，人民解放军的不少官兵缺乏思想准备，缺乏全面正确的认识，他们对中共中央新的土地政策也知之甚少。为此，各部队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做出安排，要求全体人员加紧土改政策学习，正确认识与掌握中共中央土改新方针和《中国土地法大纲》的精神实质，提高阶级觉悟，坚决支持土改，拥护土改，并参加土改。在学习中，引导官兵们正确认识，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朱德：《整军问题》，1947年9月7日。

《毛泽东选集》，第4卷，1253页。

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正在胜利进行的解放战争实质上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战争。对于人民解放军来讲，一是要英勇作战，消灭蒋介石的命根子——国民党军；二是要坚决拥护土地改革，和广大农民群众一道，铲除蒋介石政权的根基——封建主义。“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由此才能打倒以帝国主义为靠山、以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联盟为基础的蒋介石的反动统治，解放全中国。

诉苦教育是人民解放军多年来政治思想教育的一种有效方法。许多部队结合土改运动，开展了多种形式的诉苦教育，以端正对土地改革运动的认识，加深对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革命的理解，和对国民党反动派本质的认识。诉苦着重诉封建统治、封建压迫、封建剥削之苦，从根本上提高广大指战员的阶级觉悟，提高革命的自觉性。诉苦教育，一般是经过深入政治动员，启发指战员揭露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和反动社会制度黑暗的自觉性；有计划地培养各类诉苦典型，使不同内容的诉苦起到不同的教育作用，从多方面揭露旧社会与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运用多种方式（如官兵同诉，老战士、新战士、解放战士“三种战士”同诉，军民同诉）进行诉苦；最后进行论苦追根，追究苦从何处来，仇人是谁，这是诉苦教育最重要的一步。追根越深，收效越大，使指战员的认识发生飞跃，由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由经济认识上升为政治认识，由个人的苦上升为整个阶级的苦，把地主恶霸的罪恶归结为蒋介石反动统治的罪恶。

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和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是新式整军运动的关键性阶段。查阶级，即查清每个官兵的家庭出身与本人成分。查工作，即根据单位和个人所承担的义务，检查战斗、生产、业务的执行情况。查斗志，即克服惧怕敌人、惧怕困难的悲观情绪，培养勇敢战斗、不怕牺牲、连续作战的战斗精神。三查之后转入三整。整顿思想，即肃清封建地主阶级思想，克服雇佣思想，明确树立为土地而战，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而战的思想和作风。整顿作风，即克服官僚主义、军阀主义、命令主义，提倡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深入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和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整顿组织，即把那些混入军队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及不可救药的兵痞流氓，坚决清除出去，整顿党支部，建立士兵委员会等。在查整中，采取个人检查与群众揭发，普遍检查和重点批判相结合的方法。形成了既查战士又查干部，既查非党群众又查共产党员，开展从下而上又从上而下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其中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主要是士兵对干部，非党群众对党员的批评，干部和党员在群众中的自我批评。总的方针依然是延安整风运动的方针，即“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以思想教育为主。

在三查三整基础上，人民解放军广泛开展了民主运动，使民主生活又有新的发展。毛泽东将这种民主概括为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

在新式整军运动开展以来，政治民主，主要体现在发动群众评党员、评干部，即邀请非党战士向党支部和党员提意见，推荐新党员，审查候补党员转正，用民主方法检查领导，推荐干部，建议撤销不称职干部等。通过这些活动的开展，使官兵明确只有职务和分工的不同，没有人格高低贵贱之分，都是军队的主人，做到官兵相互尊重。

长时期以来，特别是新式整军开始后，人民解放军各部队的经济民主更加健全，各连队建立了由士兵选出的经济委员会组织。每排选一名经济委员，每班选一名经济代表（或叫经济员），协助连队领导管理伙食，并监督经费开支，定期公布账目。这不但改善了连队生活，而且消除了干部贪污浪费，侵占士兵利益的行为，密切了官兵关系。

各部队普遍实行军事民主，即在练兵中实行“官兵互教，兵兵互教”；作战时发动士兵群众讨论如何攻克敌阵，如何完成战斗任务；战后发动士兵群众评指挥、评战术、评技术、评纪律、评作风，总结战斗经验教训。对于开展军事民主，少数指挥员曾一度存在顾虑或不正确的认识，认为军队可以实行政治民主、经济民主，但不能实行军事民主，军事上只能实行高度集权；战役战斗计划绝对不允许指战员讨论；指挥员能力强的部队不需实行军事民主，实行军事民主浪费时间。毛泽东引证西北野战军蟠龙战役、晋察冀野战军石家庄战役，由于开展军事民主，收到极大效果的战例，指出开展军事民主“只有好处，毫无害处”。“一切部队均应实行”。通过学习中央军委的有关指示和开展军事民主与否的正反两方面战例分析，指战员开展军事民主的自觉性增强了，军事民主的内容也基本固定下来，并形成制度。

人民解放军内部实行民主，这是世界军队建设史上的一个创举，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基本原理，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在军队的具体运用。三大民主的发扬，从根本上调动了广大指战员的积极性、创造性，使人民解放军获得了一切剥削阶级军队无法获得的巨大战斗力。

各部队普遍成立士兵委员会。为使部队民主生活经常化、制度化，使每个干部和党员能随时得到群众的监督，晋察冀军区于1947年底决定在每一个“连队与伙食单位成立士兵委员会，给予士兵以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华东军区所属渤海军区也在连队成立士兵学习委员会，发动战士对干部和党员进行审查和批评，提高了战士的政治觉悟，改进了党支部的工作。因此，他们将这种士兵委员会制度化，并将其经验报告中央军委。西北野战军也采取类似士兵委员会性质的办法评议推荐干部。

部队自动建立士兵委员会的经验，立即得到中央军委的肯定。1948年1月28日，毛泽东指出：“在一切官兵关系恶劣、纪律不好、战斗力薄弱之部队，应采取渤海整军经验，组织士兵委员会，放手发动士兵群众的民主运动，只有益处，没有害处。”2月5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建立部队士兵委员会的通知》。3月8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在部队中试验组织士兵委员会》的指示，指出：为巩固和发扬新式整军运动中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的民主精神和新创造，现在确实需要将这一民主精神的新运动转为部队集中领导下的经常的民主生活。中共四军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上规定了士兵会的组织，似较适宜。为此，中共中央特责成各野战军、各军区政治部，选择几个不同情况的连队，一两个不同情况的营以上直属队或机关，“试行这一组织”，并将其经验报告中央。10月，总政治部颁布《关于革命军人委员会（即战委会）条例草案》，对连队革命军人委员会即士兵委员会的性质、任务、职权、隶属关系和活动方式作出统一规定。

《毛泽东选集》，第4卷，1275页。

《毛泽东年谱》，下卷，273页。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378页。

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各野战军、各军区在试点的基础上，在连队中普遍建立了士兵委员会。这不仅是对红军时期士兵委员会的恢复，而且是在新的条件下，实行集中领导下的民主生活的一个发展，是新式整军运动的极为宝贵的产物，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新式整军运动是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第一次有秩序、有领导的，由全体官兵参加的大规模的民主运动。这个运动使人民解放军的面貌焕然一新，大大加强了全体官兵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坚强团结。在这个基础上，部队的纯洁性提高了，纪律整顿了，三大民主发扬了。毛泽东说：“这样就使部队万众一心，大家想办法，大家出力量，不怕牺牲，克服物质条件的困难，群威群胆，英勇杀敌。这样的军队，将是无敌于天下的。”

恢复与健全党委制，加强连队党支部的建设

人民解放军的成长壮大一刻也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适应解放战争的需要，新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央军委）于1945年8月成立，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

11月，晋冀鲁豫军区遵照中共七大的决议开始在纵队、旅两级设立党委会，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第二年10月又决定在团一级设立党委会，并颁布了《党的团委员会暂行条例草案》。1947年2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认为晋冀鲁豫军区的这种改组是正确的，要求各野战军和军区在中央草拟军队中党的组织条例尚未发布前，可根据晋冀鲁豫的经验及文件，实行改组，“凡关于作战、工作、政策及干部等问题，除紧急情况之处理，应由首长担任外；在一般情况下，经过军队中各级党委会，经民主讨论决定，再由首长执行，较少数首长人员经商谈解决，更为全面与适当。”

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人民解放军的各部队先后建立党的委员会。华东野战军和军区于1947年1月下旬开始，晋察冀军区及野战军于3月开始，东北民主联军于8月开始，西北野战军于10月开始，相继在团以上单位成立党的委员会或前线委员会。7月28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制定全军第一个党委会工作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党委会条例草案（初稿）》。《条例》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实现其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组织形式就是“在军队中设置各级党委员会”，作为对军队之一切领导与团结的核心。同时决定撤销团以上各级军政委员会，旅以上各级党务委员会和团总支、营分支。《条例》对党委会的“组织机构”、“职权与工作”等，均作出明文规定。

1948年9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强调“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各级党委会实行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二者不可偏废”，“一切重要问题（当然不是无关重要的小问题或者已经会议讨论解决只待执行的问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做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就军队工作来说，凡属军事工作方面的由军事主管负责组织实施，属政治工作方面的由政治主管负责组织实施；根据军队的特殊情况，“军队在作战时和情况需要时，首长有临机处置之权”。这个决定对于加强党的集体领导，起了重大作用。为把党委会的工作提高一步，毛泽东还具体提出《党

委会的工作方法》12条，强调指出“要有以上这些方法，才能把党委的工作搞好”。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在人民解放军中得到了认真的贯彻。实践证明，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是完全适应人民解放军情况的一项根本制度，对克服部队某些不良倾向，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执行，完成战斗任务，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加强连队党支部的建设，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又一项重要制度。

1947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党委会条例草案（初稿）》规定：“军队中党的组织基础，是党的支部”，“支部委员会力全连之最高领导机关。连长及政治指导员对支部委员会之一切决定，须负责执行，并按时间向支部委员会报告其工作之执行程度”，“支部应随时发动全体党员带领群众，上下一体积极地完成全连之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重要措施，并领导连队一切群众组织与群众运动。”

连队工作的好坏，关键是建设好党支部。解放战争中，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在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采取一些新的重要措施，不断加强连队党支部的建设。1948年2月，总政治部发出通知，将长期处于秘密状态的连队党支部公开，这是为加强连队党支部建设，提高共产党员素质的一项重要措施，因为这可以使党支部更密切地联系群众，使党员受到群众的监督；邀请党外群众参加党支部大会或党小组会，听取他们对支部工作的建议和开展对党员的批评，由党支部负责人和被批评的党员作自我批评；健全党支部组织，做好党的发展工作，把在完成各项任务中涌现出来的、符合共产党员条件的积极分子吸收入党，从而解决了因战斗频繁、党员伤亡大，部队新成分增加而带来党员数量不足的矛盾，使党员经常保持在全连人数的30%左右，做到不管情况有什么变化，连有党支部委员会，排有党小组，班有党员。通过这些措施及其他措施，党支部真正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和连队统一领导团结的核心，共产党员在群众中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整个连队成为攻必克、守必固、打不垮、拖不烂的战斗集体。

瓦解敌军，改造起义部队

从政治上争取和瓦解敌军，涣散敌军士气，削弱敌军的战斗力，历来是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原则，克敌制胜的有力武器。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瓦解敌军的工作，在吸取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创造了大规模瓦解敌军和改造起义部队的新经验，更显示出这一原则的强大威力。

国民党军是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维护其阶级利益、镇压人民的工具，虽然非常庞大，装备也较精良，但其内部派系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官兵之间尖锐对立，腐败现象严重。蒋介石发动的战争，具有非正义的反人民的反民族的性质，使得民心怨恨，军心不稳，这是其最致命的弱点。随着战争形势朝不利于国民党的方向发展，国民党军队的士气越来越衰败，各种矛盾更加激化。这就为人民解放军开展敌军工作，分化瓦解国民党军提供了客观有利条件。

中国共产党一向高度重视在运用军事手段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同时，运用政治手段去瓦解敌人，以夺取战争胜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规定，“为着粉碎国民党的进攻，我党必须对一

切准备进攻和正在进攻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分化的工作。一方面，由我军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公开的广大的政治宣传和政治攻势，以瓦解国民党内战军的战斗意志。另一方面，须从国民党军队内部去准备和组织起义”。毛泽东为人民解放军总部所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明确规定了对待国民党方面人员的基本方针，“这就是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对于战争罪犯务必归案法办；凡是已经做过坏事的人们，只要能停止作恶，悔过自新，准其将功赎罪；对于放下武器的国民党军官兵，实行宽待；对于起义加入人民解放军的蒋军部队和公开或秘密为我军工作的人们，则给予奖励。1948年1月，刘少奇在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敌军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全面系统地总结了以往开展敌军工作的经验，并根据新的形势对敌军工作的要求，阐明了人民解放军的敌军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方法。

为使瓦解敌军工作切实进行和迅速生效，中共中央决定中央军委和各中央局、中央分局设立“国军工作部”（后改称敌军工作部），调派一批富有敌军工作经验的干部专心致志从事此项工作。瓦解敌军工作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主要是政治宣传、政治攻势、内部策反和严格执行宽待俘虏的政策。

开展政治宣传，即通过广播、报纸及其他工具，宣传人民解放军所进行的战争的正义的革命的性质的，揭露蒋介石的战争的反革命性质和欺骗阴谋；宣传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的基本政策；宣传人民解放军必胜，国民党军必败的战争前途。

发动政治攻势，通常是在两军相持或已将敌军包围的时候，针对当面国民党军的情况，发动全体指战员运用多种手段，如写劝降信，散发劝降传单，火线喊话，送食品，遣返俘虏等，对被围之敌军展开攻心战，反复说明为蒋介石卖命不值得，只有停止抵抗才是唯一出路，不论官兵，解放军将一律保障其生命的安全。促使敌军内部上下孤疑，惶恐不安，零散地或成股地投向人民解放军。这样，不但可以减少自己的伤亡，而且能加速战役战斗的胜利。这是瓦解敌军最有效手段之一。在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的政治攻势，声势之大，效果之好，为战争史上少有。

进行内部策反，即策动敌军将领率部起义或接受解放军的条件实行和平改编。这项工作做得非常隐蔽。因为蒋介石对其军队的控制是很严密的，如有差错，不但计划流产，而且被派入从事此项任务的干部也会惨遭杀害。经过多种渠道的有效工作，人民解放军成功地策动了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率部起义。如战争前期的高树勋起义，孔从周起义，潘朔端起义，和战争中期的吴化文起义，曾泽生起义等。这些起义，对人民解放军粉碎国民党军的战略进攻和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起了很好的配合作用。

严格执行宽待俘虏的政策。这是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也是解放战争中瓦解敌军的一项重要政策。其主要内容为：对俘虏不打、不骂、不杀、不辱、不搜腰包、不没收私人财物，对伤病者给予治疗，对死亡者予以掩埋并作标记。其基本精神是，对已经放下武器的敌军官兵，尊重他们的人格，教育他们，争取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

对俘虏兵的处理原则，是“一切精壮士兵”，均加争取，实行即俘、即查、即补、即战。士兵一俘虏过来除老弱病残者外，经过短期教育（主要是开展诉苦，启发俘虏兵的阶级觉悟，因为他们大部分是被国民党反动派抓来的贫苦农民、工人）就补充到部队，参加作战。有的甚至上午被俘，下午就补充到部队参加作战，连衣服还未来得及更换，就掉转枪口打国民党军。几

十万从国民党军队来的俘虏兵成为解放军战士，有的还当了班长、排长、连长等，充分显示了人民解放军宽待俘虏政策的强大威力。

对俘虏军官的处理。

1946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对俘虏工作的指示》，规定：对旅以上军官，要进行教育，特别优待，争取做宣传号召工作，基本上不释放；对团营级军官，要争取使用一部分，选择其中比较进步而又愿回去者，个别先行释放，其余则视情况分期释放；对连排级军官，经短期训练后，除可留用者外，大部即时释放。此后，大批释放校尉两级俘虏，有选择释放将级俘虏军官，成为人民解放军处理俘虏军官的方针。被放回的军官，大都不再为蒋介石委以重任重上战场，有的还受到监视，害怕他们谈及自己被俘后在解放军内的学习生活情况。事实说明，释放俘虏军官，是瓦解国民党军的一项有效措施，也是蒋介石非常害怕而又无力防护的。蒋介石不得不哀叹：“尤其使我痛心的”是“有许多受我耳提面命的高级将领被俘”，“而不能慷慨成仁”，许多下级官兵被俘虏，编入解放军来打国民党军，“而不能相机反正”，这是“有史以来所未有的奇耻大辱！”

改造起义、投诚和接受和平改编的国民党部队，将他们改造为人民解放军，是瓦解敌军工作的继续和发展。被争取瓦解过来的国民党军队的情况很复杂，有嫡系与非嫡系之分，有中央军与地方军及游杂部队之分。其中，有的是由地下共产党员组织起义的，民主进步力量较大，但大多数是在解放军的强大军事压力下，既不能战，又不能逃，经过多方面工作或起义，或投诚，或接受和平改编的。改造这些部队，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中央军委确定改造起义部队的基本方针政策是：团结、教育、争取、改造。首先根据不同情况实行组织改编。凡是在解放战争前期（战略防御至战略决战）所有起义的国民党军队和战争后期起义的某些国民党军队，废除原称号，改用人民解放军的称号；按其兵力大小，有一军人就称为军，有一师人就称为师，有一团人就称为团，其军师团长不升格，保留原建制不分散。其次，人民解放军派进政治工作干部，着重从政治上思想上改造这些起义部队，建立政治工作机构和开展政治工作，建立新型的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实行三大民主，废除国民党军队的旧制度、旧作风、旧习俗。经过一个较长时期整训后开赴前线，担任力所能及的作战任务，从实战中锻炼与继续改造，对于接受和平改编、投诚和战争后期起义的大批国民党军队，则不保留原有建制，撤销原各级指挥机构，部队实行彻底分散改编或溶编。

改造国民党军队，关键是改造军官，这些人绝大多数是职业军人，尤其是中上层军官，有的出身剥削阶级家庭，有的本身就是地主、资本家，又因长期受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教育，特别是那些被蒋介石重用的军官，毒害更深。虽然他们中的一些人具有爱国思想、反蒋思想，但要真正转变为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还需要经历长期的改造。如何正确处理好起义、投诚、接受和平改编的军官，关系到改造起义部队的成效。人民解放军的原则是“统一包下，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使用改造”。首先对他们进行形势和两种军队、两种政府、两种社会对比的教育；组织他们参加民主诉苦会，揭露旧军队的军阀制度和欺压剥削士兵的种种事实，加深对旧军队反动本质的认识。同时，进行组织处理，不愿留在解放军中工作的，允其回家，愿意留下参加工作的，

蒋介石：《改造官兵心理，加强精神武装》，1948年8月3日。

送各类学校培训；对坚持反动立场，继续进行破坏、捣乱、屡教不改者，按照有关政策规定，坚决进行处理。另外，对起义的爱国将领，政治上给予信任，工作上给予适当安排，生活上给予关心，使他们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人民解放军的伟大。

五、伟大的战略决战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是全国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阶段，人民解放军连续进行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44个师，非正规军29个师，共154万余人，使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三大战役的胜利，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坚实基础。

战略决战方针的确立

战略决战，是决定战争双方命运的严重斗争。一般情况下，往往是数量上、装备上处于优势的军队，主动寻找处于劣势的军队进行决战，以取得战争的决定性胜利。解放战争的头两年，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特别是第一年，国民党军千方百计想迫使人民解放军进行战略决战，企图一战而胜，但人民解放军有效地避免了不利条件下的战略决战，通过若干次战役、战斗上的决战，逐批歼敌，逐步缩小这种敌我力量对比上的悬殊情况，为与敌进行战略性的决战创造了条件。1948年秋，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虽少于国民党军，但全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形势已经变得越来越有利于人民，进行战略决战的条件日渐成熟。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断然决定，利用国民党军统帅部在战略决策上的犹豫不决，迫使它在不利的情况下进行战略决战，夺取解放战争的决定性胜利。

决定与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是建立在对作战双方基本情况的分析基础上的。战争第三年开始时，国民党军经过大量补充，总兵力仍下降至365万人，正规军达198万人。卫立煌、傅作义、胡宗南、白崇禧、刘峙5个战略集团已被人民解放军分割在东北、华北、西北、中原、华东等5个战场上，无法进行相互间的配合。他们的内部矛盾加深，士气进一步低落，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已发展到280万人，正规军149万人。与国民党军兵力的对比，已由解放战争初期的3.4:1，下降到1.3:1，机动兵力优于国民党军。全军装备大为改善，并建立了强大的炮兵和工兵。经过两年战争锻炼，积累了丰富的战争经验，战斗力进一步提高，既能打大规模运动战，又能打大规模的攻坚战。

为扭转不利战局，国民党军统帅部于1948年8月在南京召开军事检讨会议。决定在东北求稳定，在华北力求巩固，在西北阻止西北人民解放军的扩张，将作战重点置于黄河以南、长江以北的中原地区，在这一地区内，“各绥区国军配合地方武力堵剿兼施，国军主力则编组强大之进剿兵团”，“猛烈追剿”。为实现上述战略方针，会议决定加强以主要城市为战略要点的守备兵力和防御工事；同时以精锐主力为骨干，组成若干个机动作战兵团，加强应援力量，企图以此使人民解放军对其战略要点“啃不烂”，对其增援兵团“吃不掉”。同时迅速编练50个步兵师、10个骑兵师，共150万人，使总兵力达到500万人。

面对日益有利的战争形势，为了加速胜利的进程，中共中央于1948年9月在河北建屏（今平山）县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提出全党的战略任务是建设500万人民解放军，在大约5年的时间内（从1946年7月算起），歼敌正规军500个旅（师）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根据国

国民党军 70% 的兵力部署在长江以北的情况，会议决定“人民解放军第三年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南线的重心在中原，北线的重心在北宁路。毛泽东指出：如果把蒋介石的兵力 80% 消灭在长江以北，“也就算打倒了国民党”。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要求，具备条件的各野战军应明确树立敢于夺取敌坚固设防的战略要点，敢于打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歼灭战的决心，消灭国民党的重兵集团。这就是说，要敢于进行战略决战。

辽沈战役

战略决战的第一个战役是辽沈战役。这一战役，歼灭了国民党军卫立煌集团，解放了全东北，使全国军事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实行战略决战，选择首战方向至为重要。由于总兵力对比以及各战场力量对比情况不同，人民解放军尚不具备在西北、中原、华东、华北、东北 5 个战场上同时进行战略决战的条件，只能在条件最好的战场首先开始。当时全国 5 大战场上，形势对人民解放军最有利的是东北战场。

这时，东北人民解放军的军力与经济力已超过东北国民党军。总兵力达 103 万人，其中野战军 70 万人；而东北国民党军总兵力只有 50 余万人，其中正规军 40 余万人。东北解放区的面积达到全东北总面积的 97%，人口占 86%，人民解放军后方巩固，人力、物力资源充足；而国民党军被分割于长春、沈阳、锦州 3 个孤立的地区，长春、沈阳的陆上补给线已被切断。在国民党军的 5 大战略集团中，东北卫立煌集团的处境最困难最危险。是放弃东北，将全部兵力撤入华北，还是固守东北，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争吵不休，决策犹豫。据此，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决定战略决战的第一仗从东北开始。

在东北首先发起决战，对东北对全国战局最为有利。歼灭东北国民党军，解放东北全境，就使全国解放战争获得了战略上巩固的、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后方，东北野战军就由一支区域性的部队，变成为一支战略机动部队，随时可以转入关内机动作战，加速华北解放战争的进程。

早在 1948 年 2 月，毛泽东就提出了“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的战略思想。因为卫立煌集团撤向关内，蒋介石就可以保住自己的主力，并把它与华北的傅作义集团或华东的刘峙集团结合起来，同人民解放军抗衡。毛泽东预见到了这种可能性，因此要求东北野战军冬季作战结束后，将主要作战方向指向北宁路，完全控制阜新、义县、兴城。绥中、山海关、昌黎、滦县地带，阻止东北国民党军撤退。随后又明确指出，东北野战军新的作战计划，应当首先考虑对锦州、山海关、唐山作战，只要有可能就应攻取这三点，尤其要攻占锦州一点，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由长、沈援锦之敌。只要打下锦州，就有了战役上的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胜利。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指挥东北人民解放军于 1948 年 9 月 12 日发动了辽沈战役，至 11 月 2 日结束，历时 52 天，分为三个阶段。

战役第一阶段，9 月 12 日至 10 月 19 日，攻占锦州，解放长春。按照预定部署，东北野战军突然奔袭北宁路，连克兴城、义县等城，切断北宁路，包围了锦州，使东北国民党军陷入人民解放军战略包围之中。蒋介石急忙调兵遣将，编成“东进兵团”和“西进兵团”从锦西、沈阳两个方向增援锦州。10 月 14 日，东北野战军集中 5 个纵队，在炮兵、工兵、装甲兵的密切配合

下，从北、南、东 3 个方向对锦州发动总攻，激战 31 小时，攻克锦州，全歼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部 10 万余人。同时，将国民党军“东进兵团”和“西进兵团”分别阻击在塔山，彰武、新立屯以东地区。攻锦作战的胜利，完全截断了东北国民党的陆上退路，形成了东北人民解放军关门打狗之态势，东北战局发生急剧变化。在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军事压力下，10 月 17 日，长春国民党军曾泽生率一个军起义；

21 日，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率余部放下武器，长春和平解放。从长春被围到解放，历时半年。这是人民解放军历史上取得的第一个大围困战役的胜利。这一战役的胜利，拔掉了国民党军安在东北解放区腹地的一颗钉子，使人民解放军能适时地集中全部兵力进行辽西会战。

战役第二阶段，10 月 20 日至 28 日，围歼从沈阳西进的廖耀湘兵团。锦州、长春解放后，蒋介石决定东北“总退却”。为此，严令廖耀湘率由沈阳地区主力 5 个军 12 个师组成的“西进兵团”沿北宁路继续南下“规复锦州”、掩护沈阳国民党军经北宁路撤入关内；令辽阳第 52 军抢占营口，以备“西进兵团”西进受阻时改经营口从海上撤退。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东北野战军提出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集中优势兵力，在辽西的新立屯、黑山、沟帮子地区打大歼灭战，各个歼灭总退却的国民党军。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在黑山、大虎山西进受挫，改向营口逃跑，复遭截击，又向沈阳撤退。

10 月 26 日，东北野战军 10 个纵队 30 万人将廖耀湘兵团合围在黑山、大虎山以东，饶阳河以西约 120 平方公里地区内，同时实施大胆穿插，分割包围。激战至 28 日晨，将其包括号称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中两支部队（即新 1 军和新 6 军），共 10 万人全部歼灭，无一漏网。这次作战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抓住廖耀湘兵团东奔西突之机，在迅速合围的同时，进行猛烈的穿插分割，并首先歼灭其兵团部，使其失去指挥，来不及收缩即全部被歼。正如毛泽东所总结的：“东北我军，在辽西打廖兵团之所以能迅速解决，是因为我各纵大胆插入敌各军之间，而敌又指挥错乱（先向西遇挫，又向东南遇挫，又向东北），故能迅速解决。”歼灭廖耀湘兵团，标志着辽沈战役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战役第三阶段，10 月 29 日至 11 月 2 日，攻克沈阳、营口。辽西会战刚刚结束，东北野战军即分路、快速向沈阳、营口疾进。沈阳国民党军来不及组织有效的防御，又无法经营口撤退，很快被全部歼灭。逃至营口的第 52 军一部乘船从海上逃走，一部被歼。11 月 2 日，沈阳、营口解放。

辽沈战役，东北野战军以伤亡 6.9 万人的代价，共歼灭国民党军 1 个战略集团，共 47.2 万人，解放东北全境。从此，东北野战军成为人民解放军一支强大的战略预备队，东北解放区成为支援解放战争的大后方。这个战役的胜利，加上人民解放军在其他战场上的胜利，使中国的军事形势达到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国民党军总兵力下降到 290 万人，人民解放军总兵力增长到 310 万人。据此，毛泽东对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时间重新作了估计，指出从 1948 年 11 月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5 卷，317 页。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1361 页。

淮海战役

淮海战役是战略决战的第二个大战役。这一战役歼灭国民党军南线主力徐州刘峙集团，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北广大地区。

淮海战役之前，华东野战军在中原野战军配合下，从1948年9月16日开始至24日，经过8昼夜激战，攻克拥有10万重兵、工事坚固的省会城市济南，开创人民解放军夺取大城市的先例，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军据守大城市的信心。济南的解放为华东人民解放军南下求歼徐州地区国民党军创造了有利条件。

济南战役临近结束时，华东野战军向中共中央军委建议，举行淮海战役，求歼两淮（淮阴、淮安）和海州、连云港之敌。中央军委同意这一建议，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并根据辽沈战役后全国军事形势的根本变化和中原野战军攻克郑州后东进靠拢华东野战军，形成两军联合作战的有利态势，决定扩大原定淮海战役的规模和目标，歼灭刘峙集团主力于徐州附近勿使南窜。

徐州刘峙集团60余万人（后增至80万人），密集于以徐州为中心的东起海州、西止开封，北起临城（今薛城），南达淮河的区域内，依托陇海、津浦两路机动增援迅速，这是同其他战场国民党军截然不同的特点。人民解放军能够参加淮海战役的兵力，华东野战军36万人，中原野战军15万人，以及华东军区、中原军区和华北军区所属冀鲁豫军区部队，总兵力约60万人，武器装备更劣于国民党军，显然不具备一口将刘峙集团吃掉的力量。因此，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确定战役的首要突击方向，一是指向徐州以东新安镇地区的黄百韬兵团，割断刘峙的一条臂膀；一是指向徐州、蚌埠之间的战略枢纽宿县，切断徐州国民党军惟一的陆上退路，将这个庞然大物分割成几块，然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

为统筹淮海战役的一切，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5人组成党的总前委，邓小平为书记；同时责成中原、华东、华北三大解放区用全力组织支援。

淮海战役从1948年11月6日开始，至1949年1月10日结束，分为三个阶段。

战役第一阶段，11月6日至22日，歼灭黄百韬兵团，攻占宿县，孤立徐州。黄百韬兵团是刘峙集团薄弱而又要害的一翼（右翼），歼灭该敌是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战斗打响后，黄百韬兵团由新安镇地区沿陇海铁路西撤。华东野战军展开勇猛追击和堵击，迅速将其包围在碾庄圩地区。在此过程中，中共地下党员、国民党军第3“绥靖”区副司令官何基淬、张克侠率部2.3万人，在贾汪、台儿庄地区起义，为华东野战军迅速截住黄百韬兵团与阻击徐州东援之敌创造了条件。毛泽东指出，何张起义是第一个大胜利。经过激烈战斗，至22日，全歼黄百韬兵团，击毙兵团司令官黄百韬，取得淮海战役的第二个大胜利。

在华东野战军围歼黄百韬兵团的时候，中原野战军举行徐蚌线作战，攻克战略枢纽宿县，并将由平汉路东援的黄维兵团阻止在宿县西南南坪集地区，孤立了徐州。这样，就把刘峙集团分割在徐州、蚌埠与宿县西南，形成互下相连的三股，为尔后各个歼灭该集团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战役第二阶段，11月23日至12月15日，歼灭黄维兵团，合围杜聿明

集团。根据围歼黄百韬兵团的战场态势和华东、中原两野战军的战斗情况，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提出第二个歼击目标，以歼灭由平汉路远道赶来增援而孤军突出的黄维兵团为上策。中央军委完全同意先打黄维兵团，并指出：“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黄维兵团是国民党军的精锐部队之一，是蒋介石赖以解徐州之围的一张王牌。中原野战军实行诱敌深入，当该兵团进入浍河以北的忠义集、东坪集、朱口地区预设的袋形阵地时，全线猛烈出击，于11月25日将其合围在以双堆集为中心的地区内。蒋介石为保存兵力，决定放弃徐州，令杜聿明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3个兵团经萧县、永城公路撤退，解救黄维兵团，然后一同撤至淮河以南。12月1日，杜聿明集团全部撤离徐州，仓皇西逃。华东野战军立即实行多路平行追击与迂回拦截，于12月4日将其合围在陈官庄、青龙集、李石林一带，随后歼灭企图突围的孙元良兵团。这样，中原、华东野战军各包围了国民党军的一个战斗力较强的兵团（集团），鉴于同时歼灭尚需时日，而蒋介石正从各方调兵增援徐蚌战场，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正由蚌埠北进，距黄维兵团约70公里。为保持主动，总前委断然决定，采取吃一个（黄维兵团）、挟一个（杜聿明集团）、看一个（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的方针，先歼灭黄维兵团。为此，集中中原野战军6个纵队和华东野战军3个纵队及待纵一部，对拒绝投降，并施放毒气负隅顽抗的黄维兵团发起总攻，从12月12日激战至15日，全歼该兵团10万余人，生俘兵团司令官黄维。由蚌埠北犯的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害怕被歼，星夜缩回淮河以南。人民解放军取得了淮海战役的决定性胜利。

战役第三阶段，1948年12月16日至1949年1月10日，全歼杜聿明集团。杜聿明集团被围于陈官庄及其附近地区，全军覆灭已成定局。这时，平津战役已经开始。为着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之敌南下，淮海前线人民解放军根据中央军委部署，在一段时间内，停止对杜聿明部的军事攻击，主要展开敦促杜聿明等率部投降的政治攻势。到华北战场上完成对傅作义集团的分割包围后，1949年1月6日，华东野战军对拒绝投降的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至1月10日，全歼邱清泉、李弥两兵团，生俘杜聿明，击毙兵团司令官邱清泉。淮海战役胜利结束。

淮海战役历时66天，人民解放军以伤亡13.3万人的代价，共歼灭国民党军一个战略集团55.5万人，其中包括号称“五大主力”的第5军和第18军。至此，蒋介石在华东、中原战场上的精锐师团丧失殆尽，国民党的政治、经济中心南京、上海完全暴露在人民解放军的炮火之下。

淮海战役是人民解放军战略决战三大战役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是在战场总兵力和装备均处劣势的情况下进行的。毛泽东将其比为一锅夹生饭。中原、华东野战军硬是吃下了，并取得完全胜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选准了战役首要突击目标，将刘峙集团肢解，集中优势兵力，一口一口地吃；再就是当国民党军逃跑时，展开穷追猛打与迂回拦截；当其转入村落固守时，“不是依靠急袭，而是依靠充分的侦察和技术准备（近迫作业、步炮协同等）去取得成功。”

平津战役

平津战役，是在辽沈战役结束和淮海战役已开始，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和平津战场兵力均超过国民党军，但华北国民党军尚有一定防御能力情况下遂行的一个大规模的歼灭战。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傅作义集团所部 52 万余人，华北除少数几个国民党军占领的孤立据点外，其余均获解放。平津战役的胜利，为中共中央机关、人民解放军总部进驻北平创造了条件。

由于受东北卫立煌集团覆灭的震撼，华北傅作义集团已成惊弓之鸟，面临着东北、华北解放军联合打击的危险。这个集团是由傅作义嫡系部队 17 个师（旅）和蒋介石嫡系部队 25 个师组成的，总兵力 60 万人，其中分布在张家口、北平、天津、唐山一线的兵力约 50 万人。是守平津，还是放弃平津；如撤，是西撤绥远，还是南撤江南，蒋介石、傅作义各有打算，但他们都认为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后需要休整，暂时不会入关。因而决定采取暂时固守平、津、张地区，确保塘沽海口，以观时局变化的方针。傅作义精心部署，将蒋系部队摆在天津、塘沽、唐山、滦县一线，将傅系部队摆在北平以西张北、张家口、宣化、怀来一线，随时准备撤返江南，或西撤绥远。

为了加速国民党统治的总崩溃，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从战略全局考虑，认为扣留傅作义集团于华北地区就地歼灭最有利，因此决定，东北野战军立即停止休整，以最快速度隐蔽入关，协同华北人民解放军进行平津战役。在东北野战军尚未入关之前，为稳住傅作义集团，又决定华北第 1 兵团停攻太原，就地休息。因为太原攻克过早，“有使傅作义感到孤立，自动放弃平、津、张、唐南撤，或分向西、向南撤退，增加尔后歼灭的困难”；华北第 3 兵团撤围归绥（今呼和浩特市），主力位于归绥、集宁之间，“坚决阻止傅军向绥远逃跑”；华北第 2 兵团在阜平待命；新华社、广播电台多发东北野战军在东北地区祝捷、庆功、开会的消息，造成东北野战军正在休整的假象，以麻痹敌人。

参加平津战役的有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第 2、第 3 兵团及地方部队共 100 万人，为了统一作战指挥，中央军委规定，在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入关之前，整个战役由军委直接指挥；林、罗、刘入关后，由林、罗、刘指挥。

1949 年 1 月 10 日，中共中央又决定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人组成党的总前委，林彪为书记，统一领导平、津、张、唐地区的作战和城市接管等一切工作。

平津战役从 1948 年 11 月 29 日开始，到第二年 1 月 31 日结束，分为三个阶段。

战役第一阶段，11 月 29 日至 12 月 20 日，分割包围、切断傅作义集团退路。为了抓住傅系、拖任蒋系，按照中央军委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计划，11 月 29 日，华北第 3 兵团围攻张家口。傅作义急令驻丰台的第 35 军率两个师和驻怀来的 1 个师，分乘汽车、火车，驰援张家口。华北第 2 兵团和东北先遣兵团，分别由紫荆关、蓟县向啄鹿、怀来急进，切断平绥路。傅作义发现东北野战军主力已经入关，严重威胁北平，乃急令刚到张家口的第 35 军返回北平，同时将分布在于津地区的 3 个军调到北平加强防御。人民解放军行动敏捷。华北第 2 兵团将第 35 军包围在新保安；华北第 3 兵团包围张家口；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5 卷，228 页。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5 卷，237 页。

先遣兵团攻占密云、康庄、怀来。平绥路上的国民党军就这样或被歼灭或分割了。毛泽东指出，这是极大的战略上的胜利，于大局极为有利。

与平绥路作战的同时，东北野战军主力从喜峰口、冷口、山海关入关。至12月上旬进至丰润、玉田、蓟县地区，距平津铁路和津塘公路还有数天行程。傅作义部从海上逃跑的退路未被切断。为着继续扣留傅作义集团，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决定在两星期内（12月11日至25日）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如对张家口、新保安），有些则是隔而不围（如对平、津、通县），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灭。同时，令淮海前线人民解放军歼灭黄维兵团后，留下杜聿明集团，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令山东军区集中若干兵力，控制济南一段黄河，并在胶济路上预作准备，防止傅作义集团经济南向青岛逃跑。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人民解放军华北第3、第2兵团对张家口、新保安实行严密包围，东北野战军则下借疲劳，不怕减员，不怕受冻受饥，加速向平津铁路和津塘公路挺进。至12月20日，隔断平津间、津塘间的联系，完成对平津地区国民党军的战略包围。至此，将傅作义集团包围分割于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5个地区，为尔后逐次歼灭创造了极有利条件。

战役第二阶段，12月21日至第2年1月17日，歼灭新保安、张家口、天津之敌。按照中共中央军委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原则，华北第2兵团于12月22日攻克新保安，全歼傅作义的嫡系精锐第35军。华北第3兵团和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于24日解放张家口，歼灭突围的傅系第11兵团孙岚峰部。东北野战军集中5个纵队，在炮兵、工兵、装甲兵的支援配合下，采取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的作战方针，于1949年1月14日对拒不投降的天津国民党军发动总攻，经过29小时激战，至15日攻克天津。天津解放后，塘沽国民党守军于1月17日乘船南逃，人民解放军解放塘沽。天津之战，是东北野战军首次在水网低洼地形条件下实施的大规模城市攻坚战，也是人民解放军参战的炮兵、装甲兵和工兵等待种兵最多的一次协同作战，为攻克大城市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毛泽东把用战斗去解决拒绝放下武器的敌人的斗争方式称之为“天津方式”。

战役第三阶段，1949年1月18日至31日，和平解放北平。天津解放后，北平国民党守军25万人，陷于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的层层包围之中，既逃不脱，又战不了。北平是华北第一大城市，也是世界闻名的文化古都，为保护这座城市不受战争破坏，中共中央决定同傅作义进行谈判，争取和平接管北平，但同时命令解放军作好充分准备，以便谈判不成时，以战斗手段解放北平。在中共中央及人民解放军的大力争取、中共北平地下组织和爱国民主人士的促进下，傅作义接受人民解放军提出的和平条件。1月21日，双方达成《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协议》。

31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平津战役胜利结束。这种迫使国民党军用和平的方法，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的方法，被毛泽东称之为“北平方式”。

在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谈判中，双方就如何解决绥远问题达成协议。人民解放军决定让那里的国民党军暂时原封不动，使它在政治上站在人民方面，以后再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毛泽东称这种方式为“绥远方式”。

平津战役中提出的“天津方式”、“北平方式”和“绥远方式”，是人

民解放军对国民党军实行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相结合原则的重大发展，对尔后解决残余国民党军，加速解放战争的进程，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在中国战争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经过以三大战役为主的大规模战略决战，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基本归于消灭，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基础，已从根本上动摇。这就为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夺取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最终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战略决战的胜利，不仅标志着全国解放战争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达二十多年的国内革命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三大战役的胜利，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正确领导的结果；是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英勇奋战的结果；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支援的结果。战略决战的实践和胜利，大大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特别是作为这个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战略决战思想。

六、开展政治军事整训，准备向全国进军

三大战役结束后，人民解放军只须再作若干次重大的攻击，就能夺取战争的全面胜利。已经在军事、政治、经济均陷于总崩溃的国民党反动派，从1948年底起，发动新的和平攻势，以图达到保存残余力量，取得喘息时间，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力量的目的。美国政府也改变了对华政策，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的反革命战争转变为两种方式，即一种是支持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及地方军阀，继续抵抗人民解放军；另一种是网罗所谓“民主个人主义吉”，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如果再要前进，则应带上温和的色彩，务必不要太多地侵犯其利益。国民党的和平攻势，美国帝国主义分子的甜言蜜语，有极大的迷惑性。

中国革命战争又处在一个转折的关头，是将解放战争进行到底，还是半途而废？具有丰富政治斗争、军事斗争经验的中国共产党，识破了美蒋反动派的政治阴谋，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将伟大的解放战争进行到底。为此，毛泽东撰写了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1949年新年献词，指出，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

为了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1949年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提出了全党在新的一年里17项任务，其中赋予人民解放军的主要任务是：占领湘、鄂、赣、苏、皖、浙、闽、陕、甘等省的全部或大部；使各野战军进一步地正规化；使后方勤务工作的组织性和效率在可能和必需的基础上加强起来；几个大的野战军必须休整至少两个月，完成渡江南进的诸项准备工作；在各级领导机关内，开展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斗争。3月5日至13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报告里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并谆谆告诫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绝对不可以稍微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任何松懈战斗意志的思想和轻敌的思想，都是错误的。”在党的工作重心已由乡村移到城市，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新时期，军队工作的重心也必须放在城市，在向全国进军时，“人民解放军将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同时又是一个工作队，对于这一点不能有任何的误解和动摇，但随着战斗的逐步减少，工作队的作用就加大了。

3月23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一年前的同一天，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离开陕北向华北前进。这是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夺取全国胜利的需要。

25日，毛泽东、朱德等在西苑机场检阅了英雄的人民解放军。

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部署，人民解放军从1949年2月开始转入政治、军事整训，提高思想认识水平，扭转错误的思想倾向，加强组织性纪律

《毛泽东选集》，第4卷，1375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1424页。

性等。这是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最后一次大规模整训，为圆满地完成解放全中国的历史使命，在政治上、思想上、军事上做了充分准备。

开展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的教育

人民解放军全体将士看到自己为之浴血奋斗的新中国就要诞生，无不欢欣鼓舞。但在胜利的大好形势面前，一些指战员产生了右的或“左”的错误思想情绪，麻痹轻敌，贪生怕死，以功臣自居和不求进步的情绪也有所滋长。此外，在看待帝国主义出兵干涉的问题上，有的认为，美国有可能出兵支持国民党反动派，这样人民解放军不但要同国民党军作战，还要同手中拿着原子弹的美国兵作战，困难不小；有的则断定美国不敢出兵，不会出兵，缺乏应有的思想准备。这一切说明，要不要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敢不敢将革命进行到底，在一部分指战员的思想仍未解决。因此，开展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教育，是非常必要的。

遵照毛泽东关于必须在党内，在人民解放军内，有说服力地进行教育工作，“使大家懂得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容许半途而废的理由”的指示，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在整训期间，召开了各种会议，或用其他方式传达讨论中共中央的指示和会议文件，掀起了对形势和任务的学习热潮，并紧密联系思想实际，较好地解决了思想认识问题。

牢固树立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全军指战员认识到，虽然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已被基本打倒，但不等于全部地被打倒，还有大片国土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之下；虽然歼灭了国民党军主力，但不等于全部消灭了国民党军，国民党军总兵力还有200余万人，并正在浙、闽、赣、粤、桂、湘、滇、黔、川、陕等省，加紧编练新兵，计划把总兵力扩充到350万至500万人；虽然像辽沈、淮海战役那样规模作战的可能性没有了，但一定规模的战役战斗仍然会有许多，因为敌人还要挣扎。人民解放军不去，那里政权的性质就不能变更，反动军队就不能改编，人民就不能翻身解放。因此，决不可因为胜利在握而冲昏了自己的头脑，因为胜利而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一定要树立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

认识到蒋介石的所谓和平不过是一个骗局，人民解放军丝毫不能松懈战斗努力。全军指战员通过学习，认为“和平”与“战争”，是革命与反革命两种力量斗争时交互使用的两种手段。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时，蒋介石鉴于全面内战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完成，于是邀请毛泽东主席赴重庆和平谈判，企图用“和平”手段，诱使共产党交出军队，交出解放区政权。这一手失灵后，他们就依靠美国帝国主义出钱出枪，把全国人民投入空前的大内战。但是，蒋介石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在战场上被人民解放军打得狼狈不堪，全部国民党反动统治机构即将土崩瓦解，归于消灭。在这种情况下，他又转而呼吁“和平”，其目的是企图用和平手段，达到保持国民党政府的残余力量，取得喘息时间，然后卷土重来。尽管国民党的和平是虚伪的，是阴谋；尽管胜利局面已定，人民解放军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有把握全部消灭国民党的残余军事力量，中国共产党仍然愿意用和平方法来达到胜利，实现国内的真和平。但是，和平谈判必须以毛泽东1949年1月14日《关于时局的声明》中所提的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等八项条件为基础。对于人民解放军来说，在国民党反动政府接受并实现

真正的民主的和平以前，丝毫不应当松懈战斗努力。对于任何敢于反抗的反动派，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之。

对于美国出兵，一要不怕，二要充分准备。如何对待美国帝国主义出兵干涉的问题，是贯穿于解放战争全过程的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在人民解放军将要向全国进军的时候，这个问题变得更加直接了。因为美国追求的在中国建立一个稳定、统一的亲美政府的目标眼看落空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倒台，就意味着美国丧失了在中国的一切权益，他当然不甘心。南京、上海、杭州一带是帝国主义在华的利益集中地区，也是使领馆和外国侨民最多的地区。借口保护侨民，直接出兵侵略别国，是帝国主义惯用的伎俩。更何况帝国主义的军舰就游戈在长江江面上，在青岛还有美国的海军基地。因此，美帝国主义单独或者联合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出兵中国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中共中央“从来就是将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并和我们作战这样一种可能性，计算在我们的作战计划之内的。”并且一直用这种思想教育全党、全军。全军指战员表示，如果美国出兵，我们就坚决地打。同时认为美国不出兵干涉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因为中国人民革命力量已越来越强大，而且只要将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迅速全部彻底消灭，那么美帝国主义出兵干涉的可能性也就变小了。因此，必须克服对美帝国主义力量过高估计的错误观点。

认清了向全国进军既有有利条件，又有不利条件。全军指战员认识到，向南方各省和西北各省进军，使占全国总面积70%的国土和占全国58%的人口获得解放，任务非常光荣也十分艰巨、复杂。同时也认识到，这些地区长期在国民党的统治下，人民群众还没有发动；有的地区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起家的老窝，反动势力根深蒂固；有的地区民族、宗教问题非常复杂；有的地区人口稠密，交通发达，经济较富庶，有的地区地瘠民穷，人口稀少，交通不便，给人民解放军的行军作战带来了困难，尤其使军队的给养在一个时期内将遇到许多困难。夺取城市比较容易，但管理南方城市将比管理北方城市困难得多。这些都是不利条件。然而，全军指战员也认识到，我军又有许多有利条件。国民党军队主力已经丧失殆尽，残余军事力量中的胡宗甫集团、白崇禧集团尚有较完整的部队，但构不成主力了，人民解放军则空前强大；共产党在全中国各族人民中的威望极高，陷于四分五裂的国民党则威信扫地；南方是曾经经过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及抗日战争的区域，现在已经有了许多支游击队和大块游击区，它们已为野战军大规模南进准备了前进基地；人民解放军不但已经积累了在国民党区域作战并取得胜利的丰富经验，而且中共中央又针对南方及大西北的不同情况，制定了正确的方针、政策，为进军胜利奠定了基础。另外，只要认真研究各战场敌军的情况，制定周密的作战计划，争取就地全歼；只要认真学习深入研究中共中央有关新区和城市工作各项政策，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把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那么，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遇到的种种困难，就能够战胜。全军指战员经过学习和教育，提高了思想认识，坚定了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的信念。

全军统一整编和加强炮兵、工兵建设

毛泽东曾经指出，中国人民为了打败国内外敌人，建立一个独立、民主、自由、统一富强的国家，需要有一支300万至500万人的军队。中国共产党人力此奋斗了几十年，缔造了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并使之从小变大，由弱变强。至1949年初，其总兵力已达358万人。但是，由于客观物质条件的限制，其军事建设尚处于比较低级阶段，正规化程度较低。为适应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毛泽东在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向全党全军发出号召，“有计划地走向正规化，完全必需，走迟了就要犯错误”。他责成周恩来拟制统一全军编制的方案。

人民解放军走向正规化不但是必需的，而且有条件逐步实现正规化。至1949年初，解放区已完全连成一片，总面积达261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27%，工农业生产已迅速恢复和发展。掌握了若干铁路、公路和轮船等近代化交通工具。就某一个战略区的部队来说，在指挥、编制、装备、训练、供给、纪律诸方面已经实现了统一，有的战略区如东北，正规化程度还比较高。这些就为全军的正规化建设积累了经验，创造了条件。

1948年11月1日，中央军委发出由周恩来拟定的《关于统一全军组织与部队番号的规定》，决定把各大战略区的部队划分为野战部队、地方部队和游击队三类。将野战部队编成野战军、野战兵团，冠以所在战略区之名称，实行正规编制，统一称号，纵队改称军，师和旅统称为师；地方部队以警备旅、独立旅为最高单位，不再称师；游击队仍保留纵队、支队等名称。野战部队和地方部队，自军、师（旅）、团，直到营、连、排、班，一般按三三制编组，人数、武器装备，依各大战略区具体情况而定。全军分为四大野战军和五个大军区，即西北野战军和西北军区，中原野战军和中原军区，华东野战军和华东军区，东北野战军和东北军区，以及华北军区。野战军下编若干个兵团、军、师等，大军区下辖若干个二级、三级军区和军分区。

鉴于野战军冠以所在战略区地名已不适应向全国进军的新形势，中央军委于1949年1月15日发出通知，决定各野战军改按序数统一排列。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各野战军于1949年2月至6月，先后进行了整编。西北野战军改称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辖第1、第2兵团（6月编成）；第1兵团辖第1、第2、第7军，第2兵团辖第3、第4、第6军。中原野战军改称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辖第3、第4、第5兵团和特种兵纵队；第3兵团辖第10、第11、第12军，第4兵团辖第13、第14、第15军，第5兵团辖第16、第17、第18军。华东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辖第7、第8、第9、第10兵团和特种兵纵队；第7兵团辖第21、第22、第23、第35军，第8兵团辖第24、第25、第26、第34军，第9兵团辖第20、第27、第30、第33军，第10兵团辖第28、第29、第31军。东北野战军改称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辖第12、第13、第14、第15兵团和特种兵司令部；第12兵团辖第40、第45、第46军，第13兵团辖第38、第47、第49军，第14兵团辖第39、第41、第42军，第15兵团辖第43、第44、第48军。华北军区第1、第2、第3兵团依次改称第18、第19、第20兵团，归中央军委直接指挥；第18兵团辖第60、第61、第62军，第19兵团辖第63、第64、第65军，第20兵团辖第66、第67、第68军；

1949年4月，第18、第19兵团奉命归入第一野战军建制。另外编成第8、第70军，属华北军区建制；第19、第58军属中原军区建制；第32军属华东军区建制；第50军属东北军区建制；原属华东野战军的两广纵队番号下变，改属第四野战军建制。

中央军委还决定，原西北、中原、华东、东北、华北五个一级军区建制不变。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习仲勋；中原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1949年5月，该军区撤销，成立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政治委员饶漱石；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政治委员薄一波。同时，在整编中，各野战军将一批翻身农民及解放战士补入部队，将许多地方部队升级编入野战军，充实了各级军政干部，调配了武器装备，并加强了司令部的工作。在此期间，中央军委将1948年7月组成的东北人民解放军铁道纵队改编为铁道兵团，辖4个支队，每个支队辖3个大队，直属军委指挥。战斗在长江以南各省的人民游击队，也在这前后分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闽粤赣边纵队，粤赣湘边纵队，粤桂边纵队，粤中区纵队，桂滇黔边纵队，闽浙赣边纵队、浙东第2游击纵队。全军总兵力400万人以上。

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军徽式样：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为红地，上缀金黄色的五角星及“八一”二字；军徽为镶有金黄色边之五角红星，中嵌金黄色“八一”二字。

在全军进行统一编制的同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极为关心以炮兵、工兵为中心的特种兵的建设。全面内战开始时，人民解放军全军仅有14个炮兵团、17个炮兵营、38个炮兵连。多数团只有3~4个连，十几门小口径炮。那时，全军仅有山炮58门，六0炮476门，轻迫击炮1083门、机关炮6门，九二步兵炮124门，其他炮361门，共计大小炮2108门。工兵也只有数十个连，几乎没有近代化的工兵器材。因此，毛泽东要求各战略区，“应尽一切可能建立和扩充各地的炮兵和工兵”，“今后军事建设方面的中心任务，是用一切努力加强炮兵和工兵的建设。”为此，应解决训练干部和制造弹药两项主要问题。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时，中共中央指出，要“加强炮兵、工兵建设，以便广泛地夺取敌人据点和城市。”这些指示，充分说明建设炮兵、工兵对于夺取解放战争胜利具有何等重要意义，同时，也大大鼓舞了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努力建设炮兵、工兵的积极性，增强了他们建设炮兵、工兵的迫切感和责任感。

东北和华东两战略区客观条件较好，炮兵和工兵建设抓得早、发展快。东北民主联军于1946年3月成立工兵学校，10月底成立炮兵司令部，1948年8月成立东北人民解放军炮兵纵队。在华东，1946年10月成立新四军兼山东军区炮兵司令部，第二年3月建立华东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其他战略区，如晋察冀军区1947年6月成立炮兵旅，晋冀鲁豫军区1948年1月组建炮兵旅。

人民解放军建设炮兵、工兵遇到不少困难。一个是缺少技术人员，一个

《毛泽东选集》，第4卷，1175、1215、1233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1175、1215、1233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1175、1215、1233页。

是缺乏装备，但都在实践中解决了或正在解决。所需技术人员，一是举办各类学校，成立教导团培养，二是大胆使用俘虏官兵中的技术人员，三是通过实战锻炼与利用一切战斗间隙进行技术、战术训练，逐步提高技术、战术水平。所需装备（火炮与弹药），除解放军的兵工厂生产、修理外，主要靠战场上的缴获，大中型火炮均缴自国民党军之手。解放战争第一年缴获各类炮6166门，第二年缴获8920门，第三年缴获2.9万余门，“蒋介石做了很好的运输大队长。”这些缴获的人炮除损坏的外大部装备了野战部队，少部装备了地方部队。

至解放战争第三年末，人民解放军已有了强大的炮兵和工兵。第一野战军编有11个炮兵团，1个工兵团；第二野战军编有1个特种兵纵队，4个炮兵团、1个工兵团和1个战车团；第三野战军编有1个特种兵纵队，21个炮兵团，1个工兵团和1个战车团；第四野战军编有1个特种兵司令部，3个炮兵师，1个战车师，19个炮兵团，3个工兵团和3个战车团。此外，西北军区编有1个炮兵团；华东军区编有3个炮兵团，1个工兵团；东北军区编有4个炮兵团，华北军区编有2个炮兵团、1个战车团，全军装备战防炮（反坦克炮的旧称）623门，野炮（用于野战的加农炮）504门，山炮1474门，榴弹炮527门，加农炮10门，其他小炮共2.5万余门。强大的炮兵和工兵，成为人民解放军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正如毛泽东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里所说那样，“不要忘记，人民解放军是没有飞机和坦克的，但是自从人民解放军形成了超过国民党军的炮兵和工兵以后，国民党的防御体系，连同他的飞机和坦克就显得渺小了。”

加强组织性纪律性

加强军队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克服某些无组织无纪律状态，是夺取解放战争胜利和加强人民解放军正规化建设的重要保证，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人民解放军自诞生后，长时间处在被敌人分割的并且是农村的环境中，因而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某些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山头主义和游击主义，这些曾经损害了革命事业，虽然受到了批判，但是没有从根本上克服。这种不良状态，在解放战争时期具体表现为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报好不报坏，报喜不报忧，“将军队看成自己个人或少数人的财产，看成好像一个独立王国。”“对人民，对友军，对俘虏的关系不好，违犯了党的政策”等。战争形势的迅速发展，要求克服这些不良倾向，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中央分局和前线党的“总前委”）的手里，加强党的统一领导，以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为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政治、军事整训开始之前就采取了许多重要措施。

解放战争时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在执行中。但具体内容因不同的部队而略有差别。为使人民解放军有统一的纪律，中共中央于1947年9月22日致电各战略区领导人，要求他们“于九月底以前电台”“现行的三大纪律

《周恩来选集》，上卷，3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毛泽东选集》，第4卷，1373页。

中央军委1948年11月2日《关于整顿全军纪律的训令》。

八项注意内容，并提出意见”。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陈赓等及时作了报告。刘、邓在回电中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基本思想不应再改变，因为它与我军打仗、生产（或筹款）、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是相适应的，只是文字上有些不同”。毛泽东充分吸取了全军的智慧，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亲自作了修改。

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训令，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重新颁布。三大纪律是：（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是：（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训令》要求全军“以此为准则，深入教育，严格执行。”

1948年1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3月25日又发出《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补充指示》。指示中规定，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除作战方针必须随时报告和请示外，“从今年起，每两月要作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此项报告和请示的内容是：关于该军纪律，物质生活，指战员情绪，指战员中发生的偏向，克服偏向的方法，技术、战术进步或退步的情况，敌军的长处、短处和士气高低，我军政治工作的情况，我军对土地政策、城市政策、俘虏政策的执行情况和克服偏向的方法，军民关系和各阶层人民的动向等。指示中还规定，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凡对于下级发出的一切有关政策及策略性质的指示及答复，不论是属于何项问题，均须同时报告中央；凡下级向野战军和军区首长所作政策及策略性的报告，其内容重要者，亦须同时告知中央。

建立报告制度，是中共中央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无纪律无政府倾向的长期斗争在新条件下的一个发展。中共中央要求各中央局、分局，各野战军、军区必须严格执行报告制度，“绝对不允许违反”。1948年5月，毛泽东向全党全军发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伟大号召，要求全党全军坚决克服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军区执行报告制度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东北军区和野战军主要领导人林彪，自中共中央这个规定之后半年没有向中央做综合报告，因而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毛泽东在8月15日的电报里说：“我们五月间即告诉你们，像大别山那样严重的环境，邓小平同志尚且按照规定向中央主席做了综合报告，并将邓小平同志来电转给你们阅读。你们的环境比大别山好得多，何以你们反不能做此项报告。”“你们心中存在着一种无纪律思想”。当东北局和林彪向中央写了综合报告并做了认真检讨后，中共中央即于8月22日复电中指出，“你们这次检讨是有益的，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没有像你们现在所作的这种认真的自我批评，就不可能脱出被动，取得主动，就不可能克服完全不适用于现在大规模战争的某些严重地存在着的经验主义、游击主义，无组织状态和无政府状态。”中共中央强调，不但东北局应当作此种自我批评，一切中央局、分局、军区及野战军前委，均应依照东北局的办法，认真检讨，实行自我批评。“这是许多环节在目前时期的一个中心环节，这一环节问题解决了，其他环节就可以胜利解决。”

在人民解放军即将举行战略决战的前夕，中共中央于9月又做出《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就“各项工作中何者决定权属于中央，何者必须事前请示中央并得到中央批准

后才能付诸实行，何者必须事后报告中央备审”，均做了明确规定。其中，军事战略方针及战略计划；野战军或兵团的作战计划；军区及野战军或兵团的整训计划；师以上军队的编组，野战军或兵团的组成及一、二级军区的划分；军制的建立及军事教育方针的决定；地方动员、扩兵、补充俘虏的计划，及后备兵制度的建立；机要通信制度的统一规定，特种机构的建立及调度，后勤系统的建立，兵工生产计划的确定，重要兵工原料及技术人员的调剂，弹药基数的规定等，其“决定权完全属于中央”。

在政治、军事整训开始之前，各野战军结合三查三整，揭露与批评了部队中存在的某些无组织无纪律行为，整顿了组织，整顿了作风和纪律。在战略决战之前，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规定，各野战军、军区分别召开了党的会议，做出了执行报告请示制度的决议，开展了反对无组织无纪律的斗争，做出了关于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的决议。由于战略决战阶段作战紧张激烈，反对无组织无纪律的斗争发展不平衡，一系列决议没有落实。为把这个斗争进行到底，中共中央决定，四大野战军必须休整至少两个月，完成渡江南进的诸项准备工作，其中一项就是继续开展反对某些严重存在着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斗争，必须按规定于1949年3月底以前完成。为此，在政治、军事整训开始之后，各个野战军分别召开会议，通过有关决定，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对无组织无纪律的斗争。之后，全军开展了深入的反对无组织无纪律，加强集中统一的斗争，深挖了产生无组织无纪律现象的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按照规定，军、师、团党委和直属党委分别做出了《关于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状态决议》和《关于整顿纪律的决议》。这些措施的实施，大大加强了全军的组织性纪律性和集中统一的现象，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贯彻，为夺取解放战争全面胜利以及胜利后的军队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加强后勤建设，提高后勤保障能力

军队后勤建设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进程和胜败。解放战争时期的后勤是在物质条件很困难的情况下，随着战争的发展而逐步建立与健全起来的，对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起了巨大作用。它的发展，经历了从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独立保障，发展为各战略区建立统一的后勤体系，进而建立起全军集中统一的后勤体系两个阶段。

解放战争开始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解放区被敌人分割。解放区的经济主要是分散的、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落后，交通运输工具也落后，没有条件建立全军统一的后勤保障系统。从这种实际出发，中央军委总后勤部主要是在方针政策上对全军后勤实施领导，对中央直属机关、部队实施后勤保障，并在可能时对各战略区的物资等进行必要调配。各大军区、各野战军逐步自成系统，对本区机关、部队实施后勤保障。

各战略区根据作战需要和本区物资条件，分别设置后勤机关和部队、分队，制定统一供给标准。一般均设置野战军后勤部和军区后勤部。野战军后勤部直接负责保障机动部队的作战所需，军区后勤部负责前方所需物资的筹措、前送及伤员的安置和治疗等。各战略区均实行了军队与地方相结合的后勤保障体制，各级地方政府组成支前委员会，负责动员地方人力、物力，组织支前民工随军。在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思想指导下，解放军打

到哪里，解放区人民就支援到哪里。军队后勤也遵循这一总的指导思想分配各种物资，通常是先前方再后方，先野战军后地方军。同时实行军民兼顾、耕战互助，正确处理战争需要与人民负担的关系，尽量减轻人民负担。各战略区统一后勤体制的建立，不但有力地保障了本区部队的需要和作战胜利，而且为建立全军统一的后勤体制积累了经验，创造了条件。

经过战略决战，整个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要求军队后勤向更高层次发展，以适应人民解放军进军全国的需要。这时建立全军集中统一的后勤组织体制的条件也已具备。

1949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一九四九年必须使人民解放军的后方勤务工作的组织性和效率在可能和必需的基础上加强起来”。为此，中央军委召开了全军后勤工作会议，决定逐步建立全军集中统一的后勤组织体系，健全和充实中央军委和各野战军后勤机构，初步统一全军的后勤保障制度和供给标准，实行统一领导，分区负责。中央军委总后勤部设置财务部、军需部、军械部、卫生部、运输部，对全军后勤实行统一领导，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供应标准。并在调查研究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供给标准制度》、《军需概则》（草案）、《运输工作概则》、《军械工作条例》（草案）等。因为情况不同，野战军和军区后勤机构的设置略有差别。西北分设第一野战军后勤部和西北军区后勤部。第二野战军后勤部下设供给部、卫生部、兵站部，华东分设第三野战军后勤部和华东军区后勤部，均设供给部、卫生部、军械部、运输部。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后勤部，设供给部、卫生部、军械部、运输部和6个分部，另设军需部。华北军区后勤部设供给部、卫生部、兵站部。东北军区后勤部设卫生部、军械部、军工部。

七、实行战略追击，消灭残余国民党军

从1949年2月至1950年6月，是全国解放战争的战略追击阶段。人民解放军遵照毛泽东、朱德《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以渡江战役为起点，向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各省，举行了自有中国历史以来未曾有过的进军，横扫残余的国民党军，解放除台、澎、金、马、南海等岛屿以外的广大国土。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百万雄师渡长江

三大战役以后，国民党军在和平谈判的烟幕掩护下，加紧组织长江防御。1949年4月初，在宜昌至上海间1800余公里的长江沿线部署了115个师约70万兵力，其中以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汤恩伯集团75个师约45万人，担任江西湖口至上海段沿江防御；以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白崇禧集团40个师约25万人，担任湖口至宜昌段的沿江防御。此外，还有舰艇130艘、飞机300余架，构成所谓陆海空立体防线，企图将人民解放军挡在长江以北，保住江南半壁山河。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的舰艇也游大于中国的长江及沿海，有可能对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进行武装干涉。

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在与南京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加紧渡江作战的准备，决定以第二、第三野战军100万兵力，在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12万兵力策应下，准备渡江，歼灭汤恩伯集团，夺取国民党政治、经济中心——京沪杭地区。又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在淮海战役期间组成总前委，统一领导渡江作战。指出：“此次我百万大军渡江南进，关系全局胜利极大。希望我二野、三野全军将士，同心同德，在总前委及二野、三野两前委领导下。完成伟大任务，”

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河，被称为大堑。渡江作战，是人民解放军面临的一个新课题。在既无海军、空军，广大指战员又不习水性，缺乏渡江作战经验的条件下，要突破国民党军海、陆、空军组成的长江防线，困难很多。为完成渡江作战任务，总前委精心制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将第二、第三野战军组成东、中、西三个突击集团，采取宽正面、有重点的多路突击的战法，首先歼灭沿江防御之敌，然后向南发展，夺取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彻底摧毁国民党统治的政治、经济中心。担任渡江任务的各部队于3月初至4月底，先后进抵长江北岸，从政治思想、战术技术、物资保障等各方面进行了充分的准备。

1949年4月1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和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在北平举行和平谈判。15日，双方拟就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并商定于20日共同签字。但是，这一方案遭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拒绝。蒋介石、李宗仁发表联合声明，决心继续进行反革命战争，作垂死挣扎。

21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统率第二、第三野战军百万大军，发起京沪杭战役。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500公里的

战线上，以木帆船为主要航渡工具，在强大的炮兵、工兵支援下，横渡长江，一举突破国民党军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

22日国民党军仓皇实施总退却。一部向浙赣路退却，一部向杭州方向退却，一部向上海退却，企图在浙赣路和上海地区组织新的防御。胜利渡江的人民解放军展开追歼。

23日晚占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南京。南京的解放，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灭亡。中、东两集团主力迅速在皖南郎溪、广德地区包围歼灭南京、镇江逃敌，并解放杭州，逼进上海。西突击集团分多路向浙赣路齐头并进，截歼逃敌，截断浙赣线，并解放九江、南昌，割断了国民党军白崇禧、汤恩伯两集团的联系。

退守上海及其周围地区的汤恩伯集团20万人，在蒋介石的亲自部署下，企图凭借上海大城市的物资和坚固工事继续抵抗，并准备破坏该市，挑起国际事件，促使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第三野战军第9、第10兵团于5月12日发起上海战役。两兵团取钳形攻势，从浦东、浦西两翼迂回，以吴淞口为目标实施向心突击。27日解放上海。6月2日，解放崇明岛。至此，京沪杭战役结束。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和工商业中心，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和广泛的国际影响。解放上海过程中，人民解放军模范地执行城市政策，军事管制委员会有序地对上海实行接管，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拥护。

5月14日，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在武汉以东团风至武穴间的百余公里地段上横渡长江，17日解放武汉三镇。

渡江战役，人民解放军以伤亡6万余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军43万余人，解放南京、上海、杭州、武汉等重要城市和苏南、皖南、浙江广大地区，及江西、湖北、福建三省部分地区，为向长江以南各省进军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追歼逃敌

渡江战役结束后，人民解放军根据中央军委的部署，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追歼逃敌，向全国进军。

南京解放后，国民党政府迁到广州。其时尚存的150万军队分别盘踞在台湾、福建及中南、西南、西北若干省境内。为迅速彻底消灭残余国民党军，中共中央军委于1949年5月23日对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向全国进军作出部署：第一野战军进军西北，解放并经营陕、甘、宁、青、新诸省；第二野战军位于浙赣铁路沿线，准备协同第三野战军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可能的武装干涉，待此种可能性减少后，即进军西南，在第一野战军一部的配合下，解放并经营川、康、滇、黔，藏诸省；第三野战军解放并经营鲁、苏、皖、浙、闽诸省，并准备解放台湾；第四野战军进军中南，解放并经营豫、鄂、湘、赣、粤、桂诸省。

在追歼残敌，向全国进军的过程中，中央军委针对不同的敌情和地理条件，制定不同的作战方针，提出不同的作战要求。

国民党军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力求保存实力，避免与人民解放军决战，并随时准备向边远省份逃跑，甚至逃亡到境外。因此，用什么方法将残存的敌人截住并歼灭于国境内，就成了追击作战中的一个主要问题。

在中南、西南方向，国民党军主力白崇禧集团和胡宗南集团，既企图负隅顽抗，同时又随时准备撤退或逃出国境。对这样的敌人，如果实行正面穷

追猛打，可以抓注一部，但必定会有大部逃到边远地区或境外。在东南方向，国民党军残部仓皇撤向闽南及东南沿海诸岛屿，重新组织防御，企图通过控制东南沿海地区及近海岛屿，屏障台湾，后撤的余地不大。在西北方向，国民党军主要是青海的马步芳、宁夏的马鸿逵集团。由于西北人稀地贫，交通不便，“二马”无处可逃，只能死守其老巢，顽抗到底。根据上述情况，中央军委提出对中南、西南之敌应采取大迂回大包围的方针，即不顾敌人的任何临时部署，以主力大胆从两翼迂回到敌深远后方，断其退路，然而再回打；对华东、西北地区之敌，穷追猛打，辅以小迂回包围的作战方针。

1949年5月，第三野战军继续分路向浙江进军。到7月上旬，解放除舟山群岛外的浙江全省。同月，第10兵团冒着酷暑向福建进军。8月，发起福州战役，17日解放福州。9月19日，发起漳（州）厦（门）战役，10月17日解放厦门。

10月24日，发起金门战斗。这次作战，由于主观指导上对渡海作战的特点和困难估计不足，组织战斗不严密，致使登岛部队9000余人，苦战三昼夜，弹尽粮绝，一部壮烈牺牲，一部被俘。这是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遭受的一次严重损失，教训深刻。第7兵团于1950年5月，解放舟山群岛。第三野战军在向华东南进军中，共歼灭国民党军近10万人，使华东全境除台湾、金门、马祖等部分岛屿外，都获得解放。

第四野战军和暂归四野指挥的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从7月起，发起解放中南各省的作战。7月初到8月上旬，进行了宜（昌）沙（市）战役和湘赣战役。这是第四野战军主力南下后第一次作战，由于对白崇禧集团力避与我决战的行动特点认识不足，采取了通常情况下使用的诱歼敌军与近距离迂回包围的部署，同时。也由于部队初到南方，不熟悉水网稻田地和山地作战特点，水土不适，虽歼敌一部，解放鄂西、湘北及赣北地区，但未达到预定歼敌目的。在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压力和政治争取之下，8月4日。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和第1兵团司令官陈明仁率部起义，长沙和平解放。

在人民解放军威逼下，白崇禧集团退守以衡阳、宝庆（今邵阳市）为中心的湘南地区，企图东面与余汉谋集团、西面与宋希濂集团组成湘粤联合防线，阻止人民解放军南进。中央军委根据全国的战局和第四野战军前一段作战的经验教训，于7月16日就歼灭白崇禧集团的作战方针致电第四野战军：“白匪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作战。”因此，和这个敌人作战，“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遵照上述指示，第四野战军具体确定了东、中、西三路军的行军作战计划：以西路军第13兵团经湘西直插广西，割断白崇禧部退往云南、贵州道路；东路军第15、第4兵团首先歼灭广东之敌，解放广州，然后第4兵团由广东迂回至广西，与西路军形成大钳形合围；中路军第12兵团由北向南，首先歼灭湘南敌人，向广西推进，协同东西两路军聚歼自崇禧部于广西境内。第四野战军等部经过暑期休整，兵强马壮，于9月继续南进。西路军攻占主江等地，截断白崇禧部退往贵州的道路。10月，中路军在西路军配合下，向集结衡阳、宝庆地区自崇禧部发起攻击。战役中，白崇

禧采取以进为退的临时部署，人民解放军的追击时间有所延误，但由于已楔入敌后的部队在敌纵深奋勇抗击，有效地迟滞了敌人的撤退行动。当发现敌人撤退时，第四野战军指挥员当机立断，命令全军迅猛迫击，终将白崇禧主力4个师歼灭于祁阳以北地区。与此同时，东路军发起广东战役，攻击余汉谋集团。人民解放军展开猛烈进击，使余汉谋集团的防线全面崩溃，国民党政府仓皇从广州撤退重庆。14日广州解放。此后，第4兵团继续追歼逃敌，10月26日将敌主力4万余人歼灭在阳江、阳春地区。衡宝战役后，白崇禧余部15万人，以及余汉谋残部4万人均退入广西。解放军从西、中、南三路挥师入桂，于11月6日发起广西战役，横扫逃敌。这次战役采取大迂回战法，首先切断敌退云南、退雷州半岛、退钦州的道路，尔后实行围歼。至12月14日，共歼敌17.3万人，解放广西全境，实现了中央军委在广西境内歼灭白崇禧集团的作战计划。

中南大陆解放后，逃入海南岛的国民党军10万人企图依托琼州海峡长期固守，并准备把海南岛当作反攻大陆的跳板。毛泽东依据金门战斗失利的教训，就解放海南岛问题指示第四野战军：“渡海作战完全与过去我军所有作战的经验不相同，即必须注意潮水与风向，必须集中能一次运载至少一个军（四、五万人）的全部兵力，携带三天以上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滩头阵地，随即独力攻进而不要依靠后援。”1950年3月5日至5月1日，第四野战军第15兵团指挥两个军，在琼崖纵队接应下举行海南岛战役，人民解放军以木帆船为主，配以部分机帆船为航渡工具，采取偷渡、分批小渡和最后大规模强渡相结合的战役指导方针。先以一部兵力，在琼崖纵队的有力配合下，4次偷渡成功，增强了岛上的接应力量。4月16日，主力部队强渡琼州海峡，在先期渡海的部队接应下胜利登岸，并在琼北重创守岛国民党军后，迅速向南展开勇猛迫击。经过十余天的战斗，歼灭国民党军3万余人，5月1日解放海南岛。

第四野战军自1949年6月向中南进军以来历时11个月，在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的配合和华南各游击纵队的有力策应下，先后进行6次较大规模的战役，歼灭中南境内白崇禧集团和余汉谋部等共43万人，使中南大陆和两广沿海岛屿，除西沙、中沙、南沙群岛外均获解放。

平津战役结束后，盘踞华北的国民党军主要是太原阎锡山集团。太原是阎锡山长期统治山西的中心，经其长期经营，已构成由各式堡垒与壕沟、暗道相结合的，互为依托的多层次、大纵深的环形防御体系，总兵力达10万人。

1948年7月晋中战役结束后，太原便成了一座孤城。

10月5日，华北第1兵团（后改称第18兵团）、华北军区炮兵第1旅、西北野战军第7纵队（后改称第一野战军第7军）等部共8万余人，发起太原战役。经过激烈战斗，至12月4日占领太原城外若干要点，将守敌压缩在纵横不过15公里的狭小区域内。随后，为配合平津战役，太原前线解放军按照中共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缓攻太原，转入围城休整。在长达4十月的围城期间，人民解放军采取围困、瓦解和攻击相结合的方针，在反复争夺外围据点中，逐批消灭敌军，同时以强有力的政治攻势瓦解敌军士气，使阎锡山部战斗力严重削弱。平津战役结束后，第19、第20兵团和第四野战军、华北军区各1个炮兵师奉命参加太原战役，使太原前线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增

至 32 万余人，火力也大大增强。在太原前线司令员件向前的指挥下，1949 年 4 月 20 日对太原发起总攻，24 日攻占该城。整个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 13 万余人。大同国民党守军万余人见大势已去，遂接受改编，大同和平解放。至此，山西全省解放，结束了阎锡山对山西人民长达 38 年的反动统治。

根据在平津战役中文战双方商定的解决绥远问题的原则，1949 年 6 月 8 日华北人民政府与国民党绥远地方政府签定《绥远和平协议》，协议包括军队划界驻防、平绥铁路通车、在绥远使用人民币和互派联络员等项内容。9 月 19 日，以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董其武为首的 39 名绥远军政各界代表发表通电宣布起义，绥远和平解放。

第一野战军从 1949 年夏开始进军西北。5 月，解放西安。6 月打退国民党军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等部向西安的联合反扑。6 月下旬至 7 月初，第 18、19 兵团先后入陕拨归第一野战军建制，第一野战军兵力增加为 4 个兵团，西北战场上长期以来敌强我弱的状况发生根本变化，为解放大西北创造了有利条件。鉴于兵力仅占相对优势，不能分兵对胡宗南和“二马”同时进攻，彭德怀遂集中兵力，采取钳马打胡，先胡后马的方针。以兵力一部钳制“二马”，主力于 7 月发起扶郿战役，求歼胡宗南部。作战中，第一野战军以一个兵团迂回国民党军侧后，断绝其西撤的通路，并阻住其突围行动，以两个兵团沿渭河南北两岸从正面由东向西攻击。经过 4 天作战，歼灭胡宗南主力和马步芳 1 个军共 4 个军，4.4 万余人，第一野战军伤亡 4700 余人。胡宗南残部逃往汉中，“二马”亦仓皇向西退却。接着，第一野战军采取“钳胡打马”的方针，以兵力一部钳制胡宗南部，主力攻击平凉，求歼“二马”。“二马”不战而逃，解放军乘胜追击，前进千里。8 月 21 日至 26 日攻克兰州，9 月解放西宁、银川，全歼马步芳、马鸿逵集团。在人民解放军声威震撼下，9 月 25 日，26 日，国民党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和新疆省政府主席鲍尔汉先后起义，新疆和平解放。

第一野战军经过 10 个月的行军作战，解放陕、甘、宁、青、新 5 省，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 30 余万人，提前完成了解放大西北的历史任务，这对于实现民族团结，巩固国防具有重大意义。

第二野战军和第一、第四野战军各一部，在刘伯承、邓小平、贺龙指挥下，向西南进军，求歼盘踞西南地区国民党军。蒋介石企图以胡宗南集团和四川地区的国民党军建立大西南防线，与人民解放军持久作战，等待国际局势的变化，形势不利时则逃往西康、云南、台湾或逃国外。中央军委根据西南地理情况和国民党军力避决战的特点，对进军西南的作战方针和部署作了一系列指示。指出，“胡宗南全军正向四川撤退，并有向昆明撤退消息，蒋介石、何应钦及桂系正在做建都重庆，割据西南的梦，而欲消灭胡军及川、康诸敌，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

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第二野战军采取大迂回、大包围的方针，于 11 月，开始向黔川边境前进，封闭敌人退路。担任战略迂回的第 5 兵团等部，由湘西出发，直趋贵州，15 日解放贵阳，至 12 月。占领川南部分地区；第 3 兵团及第四野战军一部由鄂西和湘西出动，突破国民党军川鄂边防线，解放秀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5 卷，592、670 页。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5 卷，592、670 页。

山等地，直逼重庆。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人员于11月29日晚慌忙逃离重庆。这时，胡宗南集团由秦岭地区急速撤往成都地区。第二野战军乘胜向川西急进，第一野战军第18兵团由川陕边向川北急进，从东、南、西、北逼近成都，至此，胡宗南集团及四川境内的国民党党政军人员共90万人全部被包围在成都地区。

在对国民党军进行强有力军事打击的同时，刘伯承、邓小平于11月21日向西南地区国民党军政人员发出忠告，号召他们接受人民解放军的“约法八章”，停止抵抗，接受和平改编。

12月9日，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分别在昆明、雅安等地起义，云南、西康宣告和平解放。被包围在成都地区的国民党军第16、第15、第20、第7、第18兵团，相继起义。坚持顽抗的第5兵团，被人民解放军歼灭。30日，成都解放。逃至黔西的第19兵团残部，在贵州的普安、盘县地区宣布起义，贵州全省宣告解放。

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和第四野战军一部举行滇南战役，歼灭国民党军2.7万余人，解放滇南、滇西广大地区，云南全省遂告解放。3月至4月，西南军区进行西昌战役，歼灭国民党残部1万余人，粉碎了国民党妄图把西昌建成大陆游击根据地的计划。1950年1月至1951年12月，西南军区第18军等部在西北军区骑兵部队一部配合下，胜利进行昌都战役后，分路向西藏拉萨和全境进军，促进了西藏的和平解放，保证了国家领土的完整和统一。

第二野战军在第一、第四野战军一部的配合下，在进军西南的作战中，歼灭盘踞在云、贵、川三省的国民党军90余万人，粉碎了蒋介石妄图以西南为反革命基地待机反攻的迷梦，把国民党反动统治势力最后逐出中国大陆。

人民解放军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英明领导与全国人民的支持下，经过艰苦作战，在四年多解放战争中共歼灭国民党军807万人，解放除台湾、澎湖、金门、马祖、西沙、南沙等岛屿以外的广大国土。人民解放军总兵力发展到550万人。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人民解放军有26万余官兵献出宝贵生命，有104万指战员负伤。这些为革命事业贡献自己生命和鲜血的中华优秀儿女，永载史册！

在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凯歌声中，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

全国解放战争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的伟大胜利，其主要原因：（一）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为赢得战争的胜利，制定了完全正确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一套完整的、符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和规律的战略战术。毛泽东军事思想，是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可靠保证。（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的英勇奋斗。人民解放军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惟一宗旨的军队。他们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严格的纪律、坚强的战斗力，能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解放战争的胜利，是全军指战员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用鲜血和生命浇灌出来的。（三）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这是战争取得胜利的政治基础。人民群众的参加和支援，使解放战争获得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

全国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经过20多年的浴血奋战，终于取得最后的胜利。几千年来束缚中国人民的封建

制度，百余年来侵略中华民族的帝国主义势力，和 20 多年来祸国殃民的官僚资本主义都被彻底推翻。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成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和发展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第四章 保卫新生政权和合成军队建设起步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形势和人民解放军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 28 年的英勇奋斗，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统治和压迫。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标志着 100 多年来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同封建统治者相勾结奴役中国人民的历史从此结束，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成为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标志着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取得了伟大胜利。

然而，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还存在着很多困难，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

在军事上，人民解放战争虽已获得基本胜利，但还没有完全结束。全国尚有 1/3 的地区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在西南地区、中南和西北部分地区及华东的闽南地区和沿海岛屿残存的 140 余万国民党军队还在负隅顽抗，在新解放区还有国民党军队溃逃时留下的大批残余力量，同当地的土匪势力和反动党团骨干分子相勾结进行破坏捣乱。

在政治上，新解放区的政权刚刚建立，还不巩固。城市的设施遭到破坏，工厂停产，工人、职员、知识分子失业，治安、交通、生活秩序混乱。农村土地改革还未进行。由于国民党特务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造谣，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及新生政权还缺乏了解，思想比较混乱。帝国主义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采取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外交上孤立、政治上颠覆等种种手段，企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

在经济上，新中国接管的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特别是由于帝国主义的残酷掠夺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加上长期战争的摧残，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国民党统治时期长期滥发纸币，造成物价飞涨、物资奇缺，市场混乱、通货膨胀，国家财政经济面临着严重的困难。

面对上述形势，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指挥人民解放军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彻底消灭国民党在大陆的残余武装，解放全国大陆和沿海岛屿，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恢复国民经济，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有步骤地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

随着全国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变化，人民解放军的任务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继续完成解放战争的作战任务，另一方面要担负起保卫新生人民政权的多项工作，并需不失时机地转入自身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

（一）继续担负战斗队的任务，向全国进军，解放全部国土。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国进军的战略决策，发扬勇敢战斗、连续作战的精神，对国民党军残余部队展开战略追击，消灭在祖国大陆、沿海岛屿的国民党残余武装，解放全国大陆，解放台湾及其他沿海岛屿，向新疆和西藏进军。

（二）巩固和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随着全国各地地方人民政府相继成立，人民解放军必须迅速投入巩固和保卫新生人民政权的斗争。一方面抽调兵力剿灭匪患，安定地方秩序，粉碎国民党军的窜犯袭扰，保卫人民安全；另一方面抽调大批指战员参加接收和管理新解放的城市，以及参加新解放区的社

会改革，担负起工作队的任务。

（三）参加经济建设。随着大规模战争基本结束和艰巨的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开始，人民解放军在担负战斗队、工作队任务的同时，必须积极投入国家经济建设，担负起生产队的任务。

（四）不失时机地转入正规化、现代化建设。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和大规模战争的结束，人民解放军进行精简整编、改善武器装备、加强合成军队建设，建设一支正规化、现代化的强大的国防军，担负起防御帝国主义侵略，保卫人民革命和国家建设，保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的使命。

二、剿匪作战和粉碎国民党军的窜犯袭扰

大规模剿匪

全国大陆解放后，许多新解放区匪患严重。国民党军溃败后，其大批残兵败将相聚为匪，形形色色的地主武装、反动会道门头子和地痞流氓也转化为匪，于是，新、老土匪互相勾结，形成一股股猖獗的反动破坏势力。多则千人以上，少则几十人，尤其以浙江、福建、湖南、广西、广东、云南、贵州、四川、甘肃、青海、绥远、察哈尔等新解放区最为严重。

土匪武装在国民党反动势力操纵下，袭击基层人民政权、封锁或占领一些小城镇，控制偏远农村；破坏城乡交通，抢劫物资；杀害地方党政干部和群众，绑架勒索，奸淫妇女，扰乱社会秩序；骚扰和妨碍人民解放军的作战行动，偷袭、抓捕和残杀人民解放军零星外出人员；制造谣言，蛊惑人心，发展武装，组织暴乱等，无恶不作，给新生的人民政权和社会秩序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新解放区剿匪非常重视。早在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南方解放后，地方党组织和人民解放军在乡村中首要任务之一就是步骤地展开清剿土匪的斗争。渡江战役结束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加强新解放区的剿匪。1949年10月1日，朱德总司令在开国大典上发布命令，要求人民解放军把剿匪作为一项重要作战任务去完成。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人民解放军在新解放区仍有继续剿灭残余土匪的任务”；全党和全国人民要配合人民解放军“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华东、中南地区加快剿匪的步伐，限令湖南、广西、广东、福建、浙江等地在1951年5月底前剿灭一切股匪。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确定的剿匪方针是：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发动群众三者相结合。在匪情严重的地区，以军事打击为主，政治争取为辅，军事政治双管齐下；在一般情况下，则以政治争取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在军事打击或政治争取的同时，充分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加强地方武装，进行民主改革。对匪特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策略指导的基本原则是：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以求达到打击、瓦解、争取与最后消灭匪特的目的。

人民解放军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和部署，从1949年5月开始，陆续在新解放区展开了剿匪作战。

各地剿匪大体上都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集中优势兵力，重点进剿大股土匪。主要是集中优势兵力，选择匪情严重的地区，采取奔袭、合围、追击等军事行动，给股匪以歼灭性打击，使其失去集中活动的的能力。第二阶段，实行分区驻剿，歼灭小股土匪。主要是股匪被歼灭或被击溃以后，人民解放军以一定数量的部队驻防，加强对该地区的控制，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开展政治攻势，消灭分散活动的匪特。第三阶段，结合土地改革，肃清潜藏散匪。主要是以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建立革命政权等项中心工作为主，深入发动群众，武装群众，铲除匪特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彻底消灭潜藏散匪。全国各地匪情不同，剿匪斗争的规模及起止时间也不尽相同。

（一）华北地区剿匪。国民党撤退前曾潜伏大批匪特并组成了所谓的“地

下军”，“游击军”。其活动形式有数百人或数十人或三五人一起的股匪。在绥远、察哈尔、平原等省解放较晚的地区；土匪多为大股活动；在天津、北平、太原附近，平原省的新乡、安阳地区，多为小股土匪活动。

1949年5月，根据中共中央华北局和华北军区的部署，平原、察哈尔、河北省首先开始对大股土匪进剿。绥远解放后也开展了这一行动。各省经过大约半年时间，均已剿灭本地区的大股匪特。此后，转入驻剿小股土匪及肃清潜藏散匪。至1951年底，共歼匪5.3万余人（含自行悔过登记1.6万人）。至此，华北地区的匪患基本肃清。

（二）华东地区剿匪。华东地区的苏、鲁、皖、浙、闽等省均有匪患为害，尤以浙江、福建的匪患最为严重，并且多为国民党溃逃部队；除山东、苏北因解放较早，已无大股土匪外，其他地区匪患也较严重，皖北、鲁中南地区多为惯匪：胶东、渤海、东海地区多为海匪。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在鲁中南及胶东、渤海等地开始进行重点清剿。稍后，在其他地区也展开了剿匪作战。至1949年底，华东地区大股土匪被剿灭，许多土匪盘踞地被摧毁。1950年初闽浙境内的解放军部队忙于解放舟山群岛和准备再次攻打金门，华东匪势一度有所抬头。华东军区和第三野战军抽调部队以闽浙两省为重点，全面进剿和清剿。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又加大了剿匪力量，仅在福建剿匪的主力部队即增加到5个师。至1951年6月，全区股匪基本肃清，主力部队转入休整，由地方部队和民兵继续肃清残匪。

华东地区还针对本区海岸线长、海匪猖獗的情况，统一部署山东、苏北、苏南、浙江、福建等军区，在所属的防区内，组织海防警备部队、地方武装、公安部门、民兵和人民群众紧密配合，清剿海匪，至1953年底，歼灭海匪7800多人，解放大小岛屿50多个。

至1953年底，华东地区剿匪斗争基本结束，在历时4年多的时间里，华东军区和第三野战军先后动用5个军部、19个师、1个旅又15个团和海军一部等兵力，共歼灭土匪武装24.6万余人。

（三）中南地区剿匪。中南地区的豫、赣、鄂、湘、粤、桂6省，是解放初期匪特猖獗的地区之一。至1949年7月，在已经解放的河南、湖北和江西地区，有武装股匪9.8万多人。其中，河南3万余人，主要活动在伏牛山区；湖北3.3万余人，主要活动在大别山区；江西3.5万余人，主要盘踞在赣南宁都县北部翠微峰等地。解放较晚的湖南、广东、广西，匪情更为严重。从1949年7月开始，中南军区暨第四野战军在继续执行战略追击任务、迫歼国民党军白崇禧集团、余汉谋集团和宋希濂集团的同时，陆续抽调部队进行大规模剿匪。至1949年底，即剿灭土匪33.64万人。

中南地区多高山峻岭，广西、广东还有很长的海岸线，潜散土匪活动依然十分猖獗。在已基本消灭股匪的地区，如河南、湖北（除鄂西地区外）、江西、湘北地区，潜散匪特及反动会道门公然利用人民政府执行证粮政策中发生的问题，对群众欺骗煽动，破坏生产，组织暴乱及杀害人民干部，袭扰人民解放军及政府机关驻地，焚烧抢劫仓库、监狱，拦路抢劫。

为加快剿匪的进程，中南军区于1950年3月中旬全面总结剿匪斗争经验，确定采取划分地区全面包干、打破省地界限、组织边沿地区会剿的办法，对各省剿匪部署作了调整。湖南军区收缩主力部队，集中一个军和地方武装4万多人，从1950年4月中旬开始，对以沅陵为中心的湘西14个县境内的2万多名股匪展开重点清剿。广东军区集中部队对西江、东江、北江、潮汕等

地区进剿的同时，于四五月间，在粤闽边之饶平、诏安地区，惠来、普宁、陆丰交界地区，进行了重点清剿。

1950年11月，毛泽东对广西剿匪工作作出指示后，由叶剑英、陶铸加强了广西剿匪工作的领导，广西剿匪部队集中兵力对十万大山、大容山、大瑶山的股匪进行了重点清剿。至1951年5月，中南地区又取得重点清剿土匪47.8万余人的胜利。随后，结合社会改革，开展了肃清残匪的斗争。至1952年6月，剿匪斗争基本结束。

该区在3年的剿匪作战中，先后使用12个军部、一个纵队部和46个师的兵力，共歼土匪115万余人。

（四）西南地区剿匪。西南地区是大陆解放最晚的地区，也是匪患最为严重的地区。这里多崇山峻岭，惯匪较多。国民党撤离大陆之前，曾精心策划，妄图依据这里的特殊地形和地理位置，作垂死挣扎，甚至作为反攻的基地。

成都战役结束后，1950年1月下旬，人民解放军驻四川的部队，根据西南军区的指示，即开始全面进剿本省大股土匪。中共西南局决定，首先歼灭腹心富庶地区之匪，尔后推展至边沿贫瘠山区，特别要迅速净化四川腹地，以保证春耕生产的顺利进行。至7月，西南地区组织的重点围剿，歼匪37万人，净化了各省腹心地区。

1950年7月下旬，中共西南局根据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关于加紧剿匪斗争的指示，决定在全区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并把这一斗争比作是西南反封建斗争中的“淮海战役”。集中兵力对黔东北、黔东南、黔西北、黔南、黔桂边、川陕边、川康边、滇南、滇西等地区的匪特进行了围剿或会剿。至10月底，全区又歼匪特31万人，除某些边远地区外，基本肃清了股匪。

从11月初起，西南地区进一步掀起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各地以群众武装为主，以地方武装为骨干，结合镇压反革命分子，开展了全区群众性的清匪反霸斗争。与此同时，各地普遍建立情报站、检查站，组织远征捕捉队，积极侦捕化装潜伏和远遁城镇的漏网匪首，组成“天罗地网”，全面清剿散匪。西南地区剿匪的做法及其战果受到中央的表扬。毛泽东还向其他地区批转了西南剿匪斗争的经验。至1953年，西南（除西藏地区外）剿匪斗争胜利结束。

西南地区在3年多的剿匪作战中，先后共使用13个军部、37个师又2个团的部队，共歼灭匪特116万余人。

（五）西北地区剿匪。西北地区的陕、甘、宁、青、新5省，以甘肃省的匪患最为严重，土匪大多为国民党军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残部的骨干分子纠集溃散官兵、惯匪、流氓、地主、反动会道门头子而组成。1949年秋，他们趁甘、宁、青省刚解放，人民政权尚不巩固之机，煽动群众，制造混乱，并进行爆炸、暗杀、抢劫等活动。驻地人民解放军受命对其进行围剿，恢复社会秩序。

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北的战略任务基本完成后，从1950年初开始，分驻西北5省的第1野战军各部队及各省独立师（旅），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集中兵力，首先对气焰嚣张、危害较大的首要股匪进行了大规模的进剿。至3月底，除新疆外，各省主要股匪被歼灭，局势转为平稳，参加剿匪作战的部队转入生产建设。但是，匪特不甘心失败，他们在潜伏匪特头目的煽动下，

再次集聚。受其影响，少数起义部队甚至发生建制叛变。西北军区针对土匪活动的新情况，于1950年5月重新作出剿匪部署。至7月底，全区大股土匪基本被歼灭。残匪窜入各省边远山区，或转入分散隐蔽活动。针对匪特活动的特点，各地区组成党政军“分区联防围剿指挥部”，结合本地区的社会改革，充分发动群众，展开省与省、县与县以及大行政区之间的联合清剿。至1953年7月底，西北地区基本肃清了匪患，剿匪斗争结束。

西北地区在历时3年多的剿匪作战中，先后投入11个军部、38个师又3个团的兵力，共歼灭上匪7万余人。

大规模剿匪斗争的胜利，清除了中国人民长期以来深恶痛绝的匪患，粉碎了台湾国民党当局在祖国大陆建立“游击根据地”以策应反攻大陆的企图，有力地保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安全，安定了社会秩序，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保障国民经济恢复和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全国新解放区的剿匪斗争，从1949年5月开始，至1953年底结束，先后抽调41个军部、144个师、2个旅又21个团，共计150余万兵力，在海、空军的配合下，共歼灭匪特260余万人，缴获各种火炮2100门，各种枪支130余万枝。

新解放区剿匪斗争胜利的主要经验是：第一，各级重视。自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作出剿匪决定后，各中央局、军区、省、县、乡立即召开会议，进行层层动员和部署。在剿匪期间，各级又多次召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通报各地情况。毛泽东曾亲自批转西南剿匪经验，并及时纠正了福建、广西剿匪斗争中存在的问题。由于各级重视，剿匪斗争始终抓得很紧。第二，方针政策正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确定的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发动群众三结合的方针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为剿匪斗争指明了方向。第三，战术灵活。由于各地区和各个阶段匪情不同，剿匪部队对于大股、小股、零散匪特，分别进行围剿、进剿、驻剿。对于边省边县匪特，进行了会剿。针对匪特流窜活动的特点，则进行了奔袭、伏击等。这些战术运用，适应了剿匪作战的特点，取得了明显效果。第四，广泛发动群众。剿匪部队充分发动群众参加清匪反霸斗争，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并通过匪特亲属做规劝工作，争取匪特弃暗投明。

粉碎国民党军的窜犯袭扰

新中国成立初期，蒋介石集团败逃台湾岛后，不甘心在大陆的失败，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时刻梦想“反攻大陆”，扬言“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成功”。趁人民政权刚建立，国民经济正在恢复，以及后来进行抗美援朝战争之机，配合美帝国主义在朝鲜的侵略战争，不断派遣正规部队、海匪和武装特务等对祖国大陆，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进行各种袭扰破坏活动，企图使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不得安宁，同时为其“反攻大陆”准备条件。其袭扰破坏的主要形式有：（一）登陆窜犯袭扰。人多时成千上万，人少时数百、数十、数人登陆。

1949年秋至1953年7月，国民党军上百至上万人的中、小规模登陆袭扰活动有71次，兵力总计达4.77万余人，进行袭击人民政府机关、抢掠财物、爆破重要建筑设施等活动。（二）海上封锁袭扰。当时，东南沿海很多岛屿还未获得解放，人民海军出海作战能力不强，台湾当局积极配合帝国主

义对大陆实行禁运、封锁，袭击商船、渔船，阻挠渔民出海捕鱼。1950年至1953年，仅在浙、闽两省沿海就袭击渔船2000多艘，抓走渔民1万多人，使50多万渔民不能正常出海。（三）对大陆进行空袭。国民党军飞机经常飞临沿海城市上空实施轰炸，摧毁电厂、桥梁等重要目标，企图给大陆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不便。（四）从云南边境回窜袭扰大陆。一些被人民解放军击溃而逃往境外的国民党部队，在台湾当局的指使下，利用复杂的地理环境，经常潜入云南地区袭击党政机关，抢劫财物，杀害群众。

1950年至1953年窜扰活动达数万人次之多。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国民党军的窜扰活动早有预见。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上就提醒中国人民注意：“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派对于他们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失败，是不会甘心的。他们还会要互相勾结在一起，用各种可能的方法，反对中国人民。”例如，钻入我们内部进行分化和捣乱，封锁海港；还可能派出一部分兵力袭扰大陆。因此，“决不可因为胜利，而放松对于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们的疯狂的报复阴谋的警惕性”，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粉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派的任何一项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同年10月，毛泽东明确指出：未来全国战略重点力广州、上海、天津三个区域。尔后至1951年1月，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先后多次发出指示，调整军事部署，并确定了“确保重点、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方针，同台湾国民党当局的窜犯袭扰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一）打击国民党军空中窜扰活动。台湾国民党当局从1949年冬开始，不断派空军飞机对大陆沿海地区，包括对上海、杭州、南京、徐州、广州等城市进行轰炸破坏。上海，从1949年10月至1950年2月，遭受空袭达26次。造成大部分工厂停产，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社会秩序的安定。为了加强上海和全国其他城市及要地的防空，中央军委决定在各大城市或要地原防空机构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防空指挥机构和防空情报组织，组建一批防空作战部队。这些措施很快得到落实。从3月13日至5月11日，苏联协助上海地区防空的航空兵部队，先后击落国民党空军袭扰这一地区的飞机5架，初步扭转了形势。

1950年夏，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一支作战部队第4混成旅组建后，立即担负起上海的防空作战任务。此后，随着空军作战部队的扩建，除保证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外，也将防空的重点放在广州、上海和京津地区。1953年7月25日，担负上海防空任务的空军击落击伤空袭上海的国民党空军飞机各1架。1952年3月22日和12月27日，人民解放军高射炮部队分别击落空袭汕头和厦门的国民党空军飞机各1架。与此同时，从1951年至1953年，国民党军在大陆11个省区空投物资、宣传品、特务等共40次，其中特务218人，也均被人民解放军和当地民兵及时发现并捕歼。这些，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空军的窜犯袭扰活动。

（二）打击国民党军登陆窜扰活动。

1950年至1953年，是国民党军窜犯袭扰大陆活动的高潮时期。仅1950年上半年即向山东、浙江、上海、福建、广东等省市的沿海地区进行多次窜犯袭击。沿海各军区按照重点守备与全线控制相结合、反击与进剿相结合的

原则，统一区分地段，实行军民联防，分段担负守备任务；对重点地区部署足够兵力，充实粮弹，构筑工事，使之具有独立持久的作战能力，以作为海防警备支撑点；对一般地区和小岛、孤岛、远岛，组织精干部队或武装工作队机动控制；对占岛的国民党军，则组织力量主动进剿，做到“敌占我歼，再占再歼”。同时，人民解放军机动部队随时准备支援作战，有效地打击了国民党军的登陆窜扰活动。

朝鲜战争爆发后，台湾国民党当局以为反攻祖国大陆的时机已到，其窜犯袭扰活动更加猖狂。国民党军在福建、浙江沿海未解放的 20 多个岛屿部署 7 万余人的兵力，其中金门、马祖两岛即有正规军 6 万余人，其余为台湾当局操纵的海匪武装。在广东沿海，国民党军当时尚占据南鹏岛及万山群岛中的几个小岛。以这些岛屿为基地，对大陆及沿海已解放的岛屿进行各种骚扰破坏活动。根据国民党军以沿海岛屿为窜犯重点、力图扩展海上阵地的情况，人民解放军以攻守结合的办法，一边进剿逃往岛屿的残余国民党军，一边打击国民党军对已经解放岛屿的窜犯活动。

台湾当局见人民解放军和大陆人民群众加强战备，防范严密，从 1951 年起，便把窜犯的主要目标从沿海地区转向内陆山区，先后在金门岛成立“福建反共救国军总指挥部”，在大陈岛成立“江浙人民反共救国军总指挥部”，在台湾成立“敌后工作委员会”和“大陆游击总指挥部”，举办“游击首领训练班”。5 月，美国军事顾问团抵达台湾，积极帮助装备和训练 1 万名特务武装，准备派其潜入大陆活动，待机配合国民党军反攻大陆。6 月至 9 月间，台湾当局先后 4 次派出 6 股共约 800 人的武装，从广东海南岛的琼东县（今海南省琼海市），浙江的象山、乐清县，福建的惠安县登陆内窜。这时，祖国大陆沿海地区的陆上股匪已基本肃清，人民解放军的许多剿匪部队先后转移至海防前线，开始形成由野战军控制要点并担负机动作战任务，地方武装和公安边防部队警戒封锁海岸，广大民兵配合三结合的海防力量，构成了海上、岸上和纵深的三道防线。因此，这 6 股内窜武装上岸不久，大部即被歼灭。从 1951 年 1 月至 1952 年 9 月，国民党军从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地区组织内窜 30 余次，兵力规模少则数十人多则上千人，使用总兵力 1.1 万余人，但没有一次成功，均被人民解放军粉碎。

从 1952 年起，台湾当局变换手法，采取所谓“以大吃小，速进速退”的战术，以几倍、几十倍的优势兵力，在海军、空军的配合下，突然袭击大陆防御力量薄弱的海岸突出部或沿海岛屿，企图歼灭人民解放军的守备小分队，得手后或发现人民解放军大部队增援时，即迅速撤离。这种手法在偶然几次得逞之后，对大陆的袭扰行动则更加猖狂。

1952 年 12 月，台湾当局在“战略会议”上宣称：1953 年将是台湾的“反攻年”。然而，随着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场上的不断失败，台湾当局的反攻计划一直无法实施。1953 年 7 月中旬，朝鲜停战谈判签字在即，台湾当局孤注一掷，于 7 月 16 日发动了进攻福建东山岛之战。东山岛是福建省沿海的第二大岛，是闽南的海上屏障。

16 日拂晓，驻金门国民党军 1.3 万余人，在海空军配合下，进犯东山岛。人民解放军守岛部队在支援部队和民兵配合下，经过 2 天激战，顽强抗击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连续打退国民党军的数次进攻，取得了东山岛作战的胜利。共歼灭国民党军 3379 人，炸毁坦克 2 辆，击沉小型登陆艇 3 艘，击落飞机 2 架，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予国民党军“以大吃小”活动以沉

重打击。

从 1949 年秋至 1953 年 7 月，人民解放军在粉碎国民党军对大陆登陆窜犯袭扰的作战中，共歼敌 7900 余人。

（三）打击国民党军海上窜扰活动。国民党军不仅派军队袭扰海上运输，而且收编、组织海匪进行袭扰和登陆活动。人民解放军在沿海公安部门、民兵和人民群众的配合下，给国民党军海上窜扰活动以迎头痛击。仅 1951 年上半年即缴获国民党军船艇 21 艘，击沉 7 艘，击伤 2 艘，毙伤和俘虏国民党军官兵 300 余人。1952 年 1 月 20 日，中央军委和政务院发布关于武装护航，保证海上安全的命令。人民解放军海军和沿海军区部队，迅即行动起来，采取武装人员随航、武装船艇护航、舰艇隐蔽待机、在海岸突出部和岛屿配置火炮等措施，给予在海上进行骚扰的国民党军及海匪以沉重打击。

1953 年，人民解放军海军在东海海域作战 52 次，缴获国民党军船艇 26 艘，击沉 16 艘，击伤 10 艘，歼灭国民党海军 1300 余名。在此期间，创造了许多以小艇战胜大舰、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战例。

（四）打击国民党军从境外回窜的袭扰活动。1950 年 2 月后，溃逃国外的国民党军不断地对广西、云南边境地区进行窜扰活动。在广西战役中侥幸漏网的国民党军第 17 兵团司令刘嘉树，率领兵团部及其第 100 军残部 6700 余人，于 2 月 1 日，从越南北部窜回广西水口，企图取道平而关逃往越南的法军占领区，在中越边境地区长期作乱。人民解放军以 1 个师采取远距离的分进合击战术，突然将其四面包围，并压缩在平而关正南狭小的袋形河套中。经过近 3 天的激烈战斗，毙其一部，俘虏 6100 余人。

1950 年 3 月，国民党第 8、第 26 军残部同西双版纳的反动地主恶霸武装 1900 余人逃往缅甸北部大其力以北、邦桑以南、景栋东北的三岛地区。这三支武装力量逐步勾结，形成一股反动势力，盘踞缅北，利用解放军不能出境作战、缅甸政府一时无力进行清剿的条件，以隐蔽手段出入于国境，袭击当地政府和群众，抢劫财物，严重威胁边境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9 月，台湾当局任命原国民党军第 8 军军长李弥为总指挥，到缅北整顿残部，大量收编外逃的地主、土匪等，组成“云南人民反共救国军”，直属“国防部”领导，命令这些国民党残部对云南边境地区进行中、小规模武装窜扰，并经常派遣零星人员入境搜集情报和进行策反等破坏活动。

1951 年夏季，人民解放军对李弥部的窜扰活动进行两次围剿作战，歼其 500 余人，并争取其 3000 余人投诚，粉碎了他们妄想在云南建立“游击根据地”的企图。自 1952 年至 1960 年中缅联合勘界警卫作战前夕，人民解放军予盘踞于缅甸北部的国民党军残部的袭扰活动以沉重打击。缅甸北部的国民党军残部除部分逃往台湾，少部分隐匿于缅北丛山密林中外，大部被歼。人民解放军驻云南边防部队从 1951 年至 1960 年共歼灭逃缅国民党军 7200 余人，争取投诚 4672 人。此后，境外国民党残部没有进行大的窜犯活动。

反窜犯袭扰斗争的胜利，不仅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和保护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而且提高了人民解放军的防御作战能力。在反窜犯袭扰斗争中，人民解放军海军、空军、炮兵等军兵种建设得到了加强。

三、参加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革命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进行社会改革、恢复国民经济等工作是全党和全国人民面临的重要任务。为适应这些任务的要求，人民解放军除以必要的力量继续完成作战任务外，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又担负起工作队和生产队的任务，投入大批力量参加新中国的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

对新解放城市实施军事管制

在全国解放战争后期，越来越多的城市获得解放。由于国民党政府在溃逃前的破坏，潜留的国民党特务和各种反动分子的捣乱，许多城市在刚获得解放时不仅破烂不堪，而且秩序十分混乱。如何把这些城市管理好，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党中央对此十分重视，要求全党全军做好这一工作。

中共中央根据济南、沈阳等城市进行军事管制的经验，1948年11月指示，新解放的城市一律成立由党、政、军负责干部及各界人士参加的军事管制委员会，作为城市在解放初期的最高权力机关，当地驻军最高首长任主任。据此，在相继解放的北平（今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南京、武汉等大城市都建立了军事管制委员会。叶剑英、聂荣臻、刘伯承、陈毅、粟裕、黄克诚等许多高级指挥员都曾担任一些大城市的军管会主任。

中共中央赋予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任务是：（1）肃清反革命的一切残余势力；（2）接收一切公共机关、产业和物资；（3）恢复并维护社会秩序；（4）收缴一切隐藏在民间的反动分子的武器及其他违禁品；（5）解散一切反动党团组织；（6）逮捕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7）建立系统的革命政权机关，建立临时的各界代表会；（8）建立可靠的革命组织；（9）整顿或建立各级党组织。

军管会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况设置各种组织机构，以有条不紊地开展接管工作。沈阳军管会下设经济处，财政处、后勤处、铁道处、政务处、办公室、市政府、公安局和卫戍司令部。在接管中采取“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办法，重点抓了恢复电力供应，解决金融问题，暂时利用原国民党政府警察徒手服务，利用报纸传布政策、稳定人心，妥善解决工资等问题。北平市军管会设置警备司令部、市政府、物资接管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军管会秘书长领导下的秘书处、行政处和供给部。北平因为是和平解放的，接管方式采用与傅作义的代表组成联合办事处的办法，不仅缩短新旧交替中无政府状态的时间，还了解到一些过去所不知道的接管对象，大大减少了交接中的困难。

新中国成立时，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充分肯定了对新解放区实施军事管制的做法，规定以后的一段时期内，“凡人民解放军初解放的地方，应一律实施军事管制”。新中国成立初期实施的军事管制，除继续执行解放战争时期的有关规定外，还有三个特点：（1）军事管制同新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相联系，是新中国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最初形式；（2）同解放战争时期相比，在组织结构上，多了军政委员会这样一个层次；（3）无论军政委员会，还是军管会，都吸收了大量的民主党派人士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参加。

军管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是逐渐结束的。东北解放较早，在新中国成立时，大部分城市已结束军管，选举产生了人民政府。而其他地区，尤其中南、西南，军管结束较晚。1952年底，镇反、土改运动结束，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和人民政府已经比较健全。

1953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0次会议通过《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确定在1953年召开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的乡、县、省（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在此基础上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城市军管工作遂告结束。

新中国成立前后一段时期内实行的军管制度，卓有成效地保证了新旧政权交替过程中社会秩序的稳定，保证了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各项社会改革的顺利进行。

人民解放军在接管城市的工作中，严格执行城市政策和军管纪律，自觉维护城市秩序，广泛宣传群众，帮助群众恢复生产等，在军管会的领导下，圆满完成了各项接管任务。

参加土地改革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还有约2/3的地区没有进行土地改革。完成土地改革，是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任务。

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8次会议通过和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总结中国共产党过去领导土改的经验和教训，根据当时的形势确定了基本政策，成为指导土改的基本法律依据。

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和中央军委的命令，人民解放军在总结过去参加土改经验的基础上，从1949年冬至1952年冬，抽调数十万名干部、战士参加了新解放区的土改工作。华东军区把参加和保卫土改列为1950年的六大任务之一，并专门下达了《关于全军参加土改的八项命令》；中南军区仅驻河南、湖北两省的部队就抽出18万干部战士参加土改；西南军区的部队从1950年11月至1951年5月止，完成了1200万人口地区的土改任务；西北军区第3、第4军和第19兵团抽出2500余名干部参加了当地土改。

在土地改革中，人民解放军土改工作队坚决执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关于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土改总路线和各项政策，采取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方针，通过访贫问苦、开展诉苦、举办农民积极分子短期训练班、组织农民协会等形式，宣传党的政策，深入发动群众，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等财产，分给雇农和贫下中农，并组织领导群众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和地主分子的反攻倒算活动，保证土改运动的顺利进行。

人民解放军在参加土地改革的同时，为使新建立起来的人民政权机关迅速而有效地行使职能，专门派出40多万名干部战士协助或参加地方基层政权建设。采取的主要形式：（1）兼管地方政务。这种形式带有军管性质，即先建立各地区军事机关，由其负责本地区政务，并由军队派出干部兼任或专任各地方领导工作，逐步过渡到由各级人民代表会议选举地方政府机构。广东军区每个军除就地兼任地方工作外，另调500至700名干部专任地方工作的职务。（2）派工作队到农村筹建基层政权。军队派往各地的工作队与地方工作队相配合，或单独负责一个地区，在发动群众进行剿匪、土改、镇反的同

时，发现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区、乡、村的人民政权。据统计，华东军区抽出 1.4 万名干部战士组成 570 个工作队，到鲁、苏、皖等地 53 个县、340 个区乡、2013 个村建立了政权组织，培养地方干部 8200 名，发展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 3680 名，建立农民协会 2070 个，吸收会员 51 万余人。（3）干部转业，加强政权机构。为了加强新解放地区的建设，中共中央虽然于 1949 年 2 月和 6 月先后两次抽调 9.1 万名干部随军南下，开辟新区工作，但由于地域广大，仍远远满足不了新解放区工作的需要。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人民解放军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迅速将大批干部转业到地方，充实和加强政权机构。这些转业干部在各地政权建设中发挥了骨干作用，此外，大量回乡的革命残废军人、复员军人也为基层政权建设作出了贡献。

由于加强了基层政权建设，土改工作进展顺利。到 1953 年春，全国除台湾尚未解放和新疆、西藏等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尚未进行土地改革外，其他地区的土地改革全部完成。

土地改革的完成，使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制度和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彻底被消灭，极大地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生产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巩固了工农联盟，加强了人民民主专政。在这一运动中，人民解放军发挥了重要作用。

参加镇压反革命

在全国大陆解放之初，在广大的新解放地区，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虽然被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已经建立起来，但是还有大量的反革命分子散布在社会的各个角落，进行破坏捣乱。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更为猖狂。他们叫嚷“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时机已到，更加明目张胆地破坏工厂、矿山，烧毁仓库、民房，抢劫粮食、财物，造谣惑众，组织骚乱，残杀干部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1950 年，新解放区就有近 4 万名干部和群众被他们杀害。豫西南、华南、西南等解放较晚地区的若干地方，情况更为严重。在老解放区，也有潜伏的巨革命分子从事破坏活动。即使在北京，也曾发生特务分子一次纵火烧毁电车 59 辆及密谋炮轰天安门的反革命破坏活动。

中共中央针对反革命分子的猖獗活动和过去一段时间一些地区曾经存在镇压不力的现象，于 1950 年 10 月 10 日发出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坚决纠正过去工作中的偏向，大张旗鼓地开展好这一工作。并明确规定运动重点是打击土匪（匪首、惯匪）、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反动会道门头子。后来，毛泽东又提出镇反要执行“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的方针，并指出：打得稳，就是要注意策略；打得准，就是不要杀错；打得狠，就是要坚决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中央军委的命令，人民解放军积极参加了镇反运动。在各地军管会统一领导下，发动群众，克服镇反工作中的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使罪大恶极为人民群众所痛恨的反革命分子更加孤立，更加暴露。人民解放军的军法机关积极配合各级人民检察机关、人民司法机关、人民法庭，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对反革命案件的检察、审讯和判处进行极审慎和严肃的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上），第 1 版，100~101 页，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

处理，做到既不放过真正的反革命分子，也不冤枉真正的好人。镇反运动期间，担任剿匪的部队，将剿匪与镇反结合起来，保证了稳、准、狠、快地打击一切反革命首恶分子。

全国范围内的镇反运动，从1950年10月开始，到1953年5月全部结束。镇反运动的胜利，一方面基本上扫除了国民党反动派遗留在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势力；另一方面教育了人民群众，提高了人民群众的觉悟，使中国社会秩序获得前所未有的安定，有力地配合和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和其他民主改革运动。人民解放军为取得全国镇压反革命工作的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参加国家经济建设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队在和平时期，在不妨碍军事任务的条件下，应有计划地参加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帮助国家的建设工作”。根据新中国成立时面临的严峻经济形势，1949年12月5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做出了《关于一九五〇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号召全军：“除继续作战和服勤务者而外，应当负担一部分生产任务，使我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借以协同全国人民克服长期战争所遗留下来的困难，加速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同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要求全军一切可能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部队和机关积极行动起来，投入到生产建设中。

1950年6月，全国大陆基本解放，为了减轻国家财政负担，支援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中共中央决定复员军队150万人参加经济建设（由于进行抗美援朝战争，未能完全实现）。

1952年初，朝鲜战争形势基本稳定，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人民解放军缩减战斗人员，积极参加生产和经济建设。据此，从1950年6月至1952年4月，人民解放军即有60余万人转为工程部队、屯垦部队，参加经济建设。

参加农业生产建设。人民解放军屯垦部队开赴天山南北的戈壁滩、东北的三江平原、雷州半岛和海南岛，以及山东、甘肃、宁夏、江苏、西藏等沿海和边远地区，开垦荒原，艰苦创业。

1952年下半年以后，有些部队陆续改为农建师、林建师，并组建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铁道兵密山农垦局，成建制转业到国家农垦战线。此外，积极搞好自身的农副业生产，以减轻国家经济负担。

参加交通建设。新中国成立后的一年间，人民解放军参加修复陇海、京汉、粤汉三大铁道干线和浙赣、同蒲等铁路线上的267座桥梁、146公里线路和8898公里铁路通信线路。1950年至1952年，参加成渝铁路、来（宾）睦（南关）铁路的修筑，总长950公里。整修了天宝铁路。从1949年10月至1951年上半年，工程兵部队在公路同职工配合下，修复公路2万多公里，桥梁2000余座。1950年4月至9月，修筑西宁至玉树的公路，计827公里。

1950年4月至1954年修筑了雅安至拉萨的川藏公路，计2255公里。此外，还修筑了兰州至阿坝的甘南公路、海口至榆林港的海榆公路和青藏公路等。

参加重点水利工程建设。西北部队参加修建了新疆巴楚洪海水库，迪化

和平渠、新盛渠、太平渠、皇渠，哈密红垦一渠、二渠，焉耆解放一渠，二渠，库尔勒 18 团大渠，阿克苏胜利渠，迪化雁他蓄水库；参加修补了青海长胜渠，芳惠渠、阁公渠、平安渠；参加了甘肃山丹、古浪、临泽、武威 4 处水利工程建设。西南部队参加修补了都江堰水利工程等。华东部队在 1953 年派出 2 个师约 2 万人，参加了根治淮河的工程建设。东北部队参加了沈阳浑河灌溉区的挖河工程。华北部队参加了永定河、海河、滦河、滹沱河、子牙河、桑干河等 23 条河流的挖河、复堤、开渠、筑堤 等工程。中南部队参加了荆江分洪工程的建设、南洞庭湖流域的围堤和几十公里的排灌工程，修建了汉水堤、鄱阳湖堤，以及在黄泛区挖河等工程建设。

参加工业建设。新中国刚刚成立，人民解放军即派出 10 万指战员奔赴鞍山、云南、青海、新疆等地，参加矿山开采、钢铁冶炼、机械加工、发电厂建设以及纺织厂、食品厂建设。1952 年，部队将这些工厂、矿山交给地方政府管理，又组建了石油工程第 1 师，直接参加了油田的开发建设。

人民解放军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参加的国家经济建设，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其规模是建军史上较大的一次，为组织参加国家经济建设积累了一定的经验。首先，参加生产的目的明确，即借以协同全国人民克服长期战争所遗留下来的困难，加速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其次，生产项目有严格规定，就是在人民政府允许下，以农业、畜牧业、渔业、水利事业、手工业、各项建筑工程、各项可能从事的工业和运输事业为范围，禁止从事商业，从而维护了经济秩序，防止内部贪污、腐化。再次，有专门领导机构。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军分区、师以上各级成立有司政后代表参加的生产委员会，保证了生产任务的落实。

四、由单一军种向合成军队转变

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就很重视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但是由于条件所限，大规模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不可能进行，那时军队的主要成分是步兵，只有少量的技术兵种部队，现代化、正规化程度很低。随着大规模战争的结束，人民解放军进行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客观条件逐渐成熟。

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宣告：“在英勇的经过了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并把建立强大国防军的任务摆在了当时中国人民两件大事之一的重要地位。

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在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开始了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转变、由单一军种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转变的历程。

确立国家军事领导体制

在革命战争年代，人民解放军的最高领导机构一直是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到1949年4月，为适应夺取全国胜利的客观需要，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对外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国家政权的建立，也建立了新的军事领导体制。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制度，其第三章第20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统一的军队，即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公安部队，受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统率，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这一规定确立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法律地位，它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高统率机关，是制定军事战略方针、领导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最高指挥机构。

1949年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任命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定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任命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程潜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贺龙、刘伯承、陈毅、林彪、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高岗、粟裕、张云逸、邓小平、李先念、饶漱石、邓子恢、习仲勋、罗瑞卿、萨镇冰、张治中、傅作义、蔡廷锴、尤云、刘斐为委员。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由周恩来主持。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后，仍简称为“中央军委”，取代了原有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职能，党内未再设中央军事委员会。

1951年11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决定增补林彪、高岗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54年6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定增补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徐海东为委员。从1952年7月起，军委日常工作由彭德怀主持。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4、103页。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4、103页。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设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它们是中央军委战略决策、方针政策的执行机构，是全军军事、政治、后勤和技术工作的最高领导机关。三总部虽然在战争年代就有，但其机构及职能与过去不大相同。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的需要，要求加强军委总部机构的建设。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后，徐向前任总参谋长，聂荣臻任副总参谋长（后任代总参谋长，徐向前有病休养），总参谋部的各业务部门得到健全和充实。1950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成立，罗荣桓任总政治部主任，傅钟、肖华任副主任，同时健全了各业务部门，各大军区和各军兵种也陆续建立了政治机关，形成了全军统一的政治工作领导体制。

1949年11月总后勤部称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后方勤务部，杨立三任部长。

1950年中央军委任命贺诚、宋裕和、张令彬为副部长，同时建立和充实各业务部门，使总后能担负起领导全军后勤建设和组织全军后勤工作的重任。

1950年9月4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又设立总干部管理部，以加强对干部的管理和为实行军衔制做准备。罗荣桓兼任总干部管理部部长。

1952年7月3日，该部改称总干部部，其下属局改称部。军委总部机构的建立和充实后，在参谋工作、训练工作、政治工作、干部工作、后勤工作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对加强全军的统一领导和完成作战与建设任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根据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的行政区划在全国设置了一级军区、二级军区、三级军区和军分区四级军区体制。与中央局相应的设一级军区，与中央分局相应的设二级军区，在省和行政区设三级军区，在地（专）区设军分区。

1949年11月至1950年2月先后设置6个一级军区，即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政治委员薄一波）、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政治委员饶漱石）、中南军区（司令员林彪，第一政治委员罗荣桓，第二政治委员邓子恢，第三政治委员谭政）、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邓小平）和西北军区（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习仲勋）。另设有18个（1951年3月增加到19个）二级军区。在未设二级军区的省和行政区分别设置了三级军区，地（专）区分别设置了军分区。1951年10月，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颁布陆军各特种兵部队、防空部队领导关系的规定，明确一、二级军区对驻本区内陆军炮兵、装甲兵、工兵和防空部队的建制领导关系。至此，一、二级军区领导机关成为人民解放军合成军队战役指挥机构和所属陆军部队及区内地方性军事工作的管理部门。

1951年10月和1952年3月，中央军委又明确规定各军区领导机关和军委海、空军领导机关对军区辖区内的海、空军部队实施双重领导，主要由军区负责作战指挥。各军区相继成立炮兵、装甲兵、工兵、骑兵和公安司令部等机构以适应需要。1953年12月，军委又再次明确了军区领导机关在其管辖范围内执行领导、管理和指挥的职责。

建立新的军兵种

建立新军兵种的努力在战争年代就开始了。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全国即将解放，建立新的军兵种的条件逐渐成熟，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审时度势，开始筹划建立空军、海军和陆军各技术兵种。但是，许多新军兵种机构的建立、充实，新军兵种部队的建设是在夺取全国政权以后全面展开的，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对空军和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防空部队、铁道兵等技术兵种的建设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人民解放军在建国初期的“边打边建”中迅速成长起来，到1953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发展成为一支军兵种比较齐全的合成军队，除了陆军，还建立了空军、海军；陆军不仅有步兵，还有炮兵、工程兵、装甲兵、通信兵，铁道兵、防空部队等技术兵种。除此之外，属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的公安部队也组建和发展起来。

（一）建立人民海军。人民海军的建立经历一个先建立军区海军或基地，再成立全国性的海军领导机关的过程。人民解放军最早的一支海军部队是华东军区海军。1949年春，人民解放军在准备渡江战役的过程中，长江下游的国民党海军舰艇正在酝酿起义。中央军委预料随着战争的胜利会接收更多的国民党海军人员和装备，而且渡海作战的任务也将提到日程上来，于是命令华东军区及时组建军区海军。4月23日，华东军区海军在江苏泰州白马庙乡第3野战军东路渡江作战指挥部驻地宣告成立，张爱萍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这一天后来被中央军委批准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生日。1949年12月15日，广东军区江防司令部成立，军区副司令员洪学智兼任司令员。翌年12月3日，中南军区海军领导机构成立，方强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950年9月9日，海军青岛基地成立，易耀彩任司令员，段德彰任政治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央军委就决定组建海军领导机构。

1950年1月12日，肖劲光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4月14日，正式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领导机关。司令员肖劲光，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刘道生。同年中央军委又任命王宏坤为海军副司令员，罗舜初为海军参谋长。海军领导机关的成立，标志着海军已正式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军种。海军领导机关建立后，于1950年8月在北京召开了海军建设会议，提出了海军建设的方针，即：“从长期建设着眼，由当前情况出发，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富有攻防能力的、近海的、轻型的海上战斗力量。首先组织利用和发挥现有力量，在现有力量的基础上，发展鱼雷艇、潜水艇和海空军等新的力量，以逐步建设一支坚强的国家海军。”会议提出，建设一支轻型海上力量，包括进行协同作战所必须的诸兵种：水面舰艇部队、潜艇部队、海军航空兵部队、岸防兵部队、海军陆战队以及各种专业勤务部队。这些兵种部队的建设，初期应以空（海军航空兵部队）、潜（潜艇部队）、快（鱼雷艇部队）为主，其他兵种相应发展。会议还提出了人民海军的建军路线，即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以陆军为基础，吸收大量的革命青年知识分子，争取团结和改造原海军人员，建设人民的海军。按照海军建军会议确定的方针原则，在陆军的大力支持下和苏联的帮助下，海军开始初期的创业。

（二）建立人民空军。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夕，中共中央就提出建立人民空军的问题。1949年3月17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航空局，统一领导、管理航空事业。六七月间，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考虑到渡海解放台湾的需要，决定加快建立空军的步伐。7月10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一封信中指出：“我空军要压倒敌人空军短期内（例如一年）是不可能的，但似

可考虑选派三四百人去远方（指苏联——编者注）学习六十月至八个月，同时购买飞机 100 架左右，连同现有的空军，组成一个攻击部队，掩护渡海，准备明年夏季夺取台湾。”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周恩来开始进行组建空军的工作。8 月成立了一个飞行中队，负责北平地区的防空任务。这个航空中队还参加了开国大典的受阅飞行，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一个担负作战任务的飞行中队。

空军领导机关由第 14 兵团机关和军委航空局人员组成。

10 月 25 日，中央军委任命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肖华为空军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王秉璋为空军参谋长。

11 月 11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宣布成立，原军委航空局着即取消。这一天后来被中央军委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成立日。随后，各大军区司令部航空处陆续扩建为军区空军司令部，空军组织指挥领导体系也逐步健全。1950 年 6 月 19 日，第 4 混成旅在南京成立，这是空军第一支航空兵部队。按照中央军委的要求，1950 年 8 月空军拟制了《建设人民空军的四年（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三年）计划大纲》。人民空军以这个计划大纲为依据，进行初期的开创性建设。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中央军委高度重视空军的建设，将原准备购买海军舰艇的苏联贷款转用于购买飞机。在陆军部队的大力支援和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大批航空兵部队迅速组建起来。年轻的人民空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成长壮大。从 1950 年 10 月到 1954 年初，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兵共建立了 28 个师 70 个团，拥有各型飞机 3000 余架，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形成了一支包括歼击、强击、轰炸、侦察、运输航空兵在内的空中力量。

（三）建立炮兵领导机关。在革命战争年代特别是在解放战争时期，炮兵已发展成为人民解放军最主要的技术兵种，是除步兵之外最强大的一个兵种。在新中国建立时，炮兵有 4 个师部、70 多个团、3 所学校和大量分队，有各种火炮 2 万多门。因此确切他说，它不是一个新兵种。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前，炮兵没有一个全军统一的领导机关。

1950 年 3 月，中央军委任命苏进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副司令员兼参谋长，4 月任命陈锡联为司令员。8 月 1 日，人民解放军炮兵领导机关正式成立。在炮兵领导机关成立前后，各大军区也相应成立炮兵领导机构。炮兵按照中央军委提出的“大量发展新的炮兵，同时加强提高老的炮兵”的方针，制定了建设地面炮兵和高射炮兵的规划，采取优先发展预备炮兵，逐步充实步兵师以下队属炮兵的建设步骤。炮兵在 50 年代初期得到空前发展。在预备炮兵的建设上，开始时针对国民党空军经常袭扰沿海地区的情况，优先发展高射炮兵。到 1950 年底，即由新中国成立时的 16 个高射炮兵团发展到 29 个团。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炮兵建设的重点转向地面炮兵。从 1950 年 11 月起，军委先后抽调 8 个步兵师和一些机关及分队共 9 万余人组建大批炮兵部队。到 1953 年底，全军预备炮兵达 23 个师 88 个团又 22 个独立营，军、师队属炮兵团达 100 余个，战防炮营，高炮营各数十个；炮兵的装备也有很大改善，半数的预备炮兵和 1/3 的队属炮兵改换为苏式装备。

（四）建立装甲兵领导机关。早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就认识到建立机械化部队的重要性，并利用一切可能培养装甲兵建设所需要的人才。到新中国成立时，人民解放军坦克部队已经发展成为一支拥有近万人、410 余辆坦克、360 余辆装甲车的现代突击力量。

1949年12月，中央军委决定由第1野战军第2兵团司令员许光达负责组建装甲兵。1950年6月，中央军委任命许光达为摩托装甲兵司令员。是年9月1日，人民解放军摩托装甲兵领导机关正式成立（1951年7月16日，摩托装甲兵司令部改称装甲兵司令部）。装甲兵正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兵种。装甲兵领导机关成立后，各大军区开始组建装甲兵领导机构，并借鉴苏军经验，对已有部队进行了整编。

1950年11月，中央军委决定将坦克旅改为坦克师。装甲兵依据总参谋部下发的“坦克师暂行编制表”，将坦克第1、第2旅改为坦克第1、第2师，在吉林四平新组建坦克第3师。华东军区根据军委的命令，在河南以缴获的国民党军美式水陆坦克编成特种坦克师（后改称战车第26师、坦克第26师）。在军委装甲兵整编坦克师的同时，军区开始组建独立坦克团。

1950年11月至1951年9月，以从苏联购进的装备，成立3个独立坦克团（第1、第2、第3团）。华北军区、华东军区将分散的独立坦克营台编为两个坦克团（第4、第5团）。另外华东军区还组建了3个独立坦克团（第6、第7、第8团）。根据陆军向诸兵种合成军队转变的要求，从1951年9月开始，在步兵师中增编坦克自行火炮团，这是迈向步兵机械化和合成体制的重要一步。

（五）组建防空部队。从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防空的客观需要，开始陆续组建高炮团、对空监视哨等防空部队。1950年至1952年，华东、东北、华北、中南军区防空司令部相继成立。在各地防空机构和防空部队发展的基础上，1950年9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司令部。10月23日，中央军委发布建立防空部队领导机构的命令，任命周士第为司令员，钟赤兵为政治委员。

12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司令部正式成立。防空部队领导机关成立后，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凡担负城市要地防空任务以及正在组建的高射炮、探照灯、雷达、对空监视哨等部队均划归其建制。1951年至1953年，防空部队在抗美援朝战争和国内防空作战中有了较大的发展。

（六）建立工程兵领导机关。工程兵诞生于革命战争年代，在南昌起义部队中就有工兵营，广州起义、百色起义都有工兵参加。在战火中工兵部队成长壮大起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已有8个工兵团、1所工兵学校、4个工兵训练大队。此外，陆军中各军大部建有工兵营，部分师、团建有工兵连或工兵排。为统一领导全军工兵部队，加强工兵部队的建设，中央军委决定建立工兵领导机关。1950年12月25日，人民解放军工兵领导机关成立，李迎希任副司令员。1951年9月陈士榘任司令员。各大军区在军委工兵领导机关建立之前，为适应工兵建设和领导的需要，建立了一些领导机构。1955年8月，工兵领导机关改称工程兵领导机关。从1949年10月到1952年底，全军工兵团由8个发展到28个团，总兵力达7万余人；陆军军、师、团分别建立了工兵营、连、排。从此，工兵成为人民解放军合成军队中的一个重要兵种。1953年9月，全军28个工兵团按任务区分为工程工兵团、舟桥工兵团和建筑工兵团，统一了编制序列。

（七）建立铁道兵，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央军委将东北铁道纵队改编为铁道兵团，隶属中央军委建制，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由军委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兼任。1950年6月10日，按照军委的命令铁道兵团缩编为3个师、1个直属桥梁团、1个直属汽车团，编制定员2.5万人。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的

需要，铁道兵团又进行扩编，以直属桥梁团为基础组建铁道兵第4师。1953年9月，中央军委命令，志愿军在朝鲜的6个铁道工程师正式划归军委系统，与铁道兵团现有的4个师、1个独立团，统一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自此，铁道兵正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兵种。

（八）组建公安部队。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统一的军队，即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公安部队”的规定，人民解放军在1950年的整编中，编为国防军和公安部队两类。5月召开的全军参谋会议确定公安部队定额占军队总员额的4.5%，同月，公安部长罗瑞卿提出《建设人民公安部队方案的几个要点》，对全国公安部队的编制、领导机构的设置、领导指挥关系和军事、政治、后勤工作进行了总体阐述。1950年9月22日，公安部队领导机关成立，罗瑞卿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到1951年10月，各大军区和铁道公安部队领导机构相继建立；组建了正规公安部队20个师又3个团，同时接管了各省、地、县的地方公安武装，初步形成正规公安部队、地方公安部队和边防公安武装的体制。1952年上半年起，将全国的内卫、边防和地方公安部队统一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公安边防部队和公安部队全部隶属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制。

这些军兵种的建立，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由单一军种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目标迈进。

改建和新建军事院校

培养现代作战人才，一条十分重要的途径是办院校。在新中国成立前，在相当艰苦的条件下，人民解放军因陋就简，建立过各种军事院校，这些院校不仅培养了大批军事、政治、后勤干部和各类专业技术人才，为革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也为新中国军事教育事业的发展，储备了军事教育人才，积累了经验。但是由于条件限制，战争年代不能像平时那样正规办学，学制、教材等都不统一，院校教育的这种状况不适应建设正规化、现代化革命军队的需要。尽快建立正规的军事院校，建立军队院校教育体系，已是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军队建设的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

1950年7月，中央军委会议研究了军事院校建设问题。会后，由周恩来制定、毛泽东批准的方案确定，“以战争年代创办的学校为基础，改建、新建一批适应培养现代作战人才的各类院校”，包括：创办一所全军性综合陆军大学，将各战略区原有的军政大学、军政干部学校和各部队的随营学校改建为高级步兵学校、初级步兵学校和专业技术学校，各军兵种新建一批专业学校等。按照这一方案，把战争年代各战略区建立的军政大学、军政干校和各部队随营学校改建为5所高级步兵学校、24所初级步兵学校和一批专业技术院校。

1950年10月23日，毛泽东电令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到北京主持陆军大学的筹建工作。11月13日，刘伯承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关于创办军事学院的意见书》，建议将拟议中的陆军大学改名为军事学院。1951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在南京成立，刘伯承任院长兼政治委员。军事学院是培养合成军队高级指挥员和高级参谋人员的综合性军事学府，毛泽东称它的建立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重大转变的标志之一。

1952年7月，以第一高级步兵学校和高级后勤学校为基础，在北京成立

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李聚奎任院长。后勤学院是一所合成军队后方勤务的指挥学院，培养全军中高级后勤指挥军官和专业勤务军官。

1952年军队院校进行大调整。6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了调整全军军事院校的命令。这一命令规定：全军设军事学院、后方勤务学院、军事工程学院各1所；全军编总高级步兵学校1所，高级步兵学校2所，步兵学校9所；高级炮兵学校1所，高射炮兵学校1所，地面炮兵学校6所，军械学校3所（炮兵军械学校2所、步兵军械学校1所），炮兵摩托学校1所；战车学校2所；高级工兵学校、工兵学校各1所；高级通信学校、通信工程学校、通信学校、雷达专修学校各1所；化学兵学校1所；防空学校、城防高射炮学校各1所；测绘学校、俄文学校和后勤系统的财务、军需、运输、油料、兽医学校各1所，协和医学院1所，医科大学6所（同年11月改成军医大学，并增至7所），卫生干部学校（同年11月改为军医中学）15所。除按此方案调整外，空军在原有10所航校的基础上，增建航空学校、干部学校各2所；海军增建海军预科学校、政治干部学校和后勤学校各1所。大军区各增建1所政治干部学校。经过调整，形成初、中、高级指挥院校和专业技术院校的梯次配置。到1952年底，全军共有军事、政治、文化、后勤、技术院校200余所。

1953年1月10日，以第三高级步兵学校为基础，在南京成立培养步兵部队中高级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的总高级步兵学校，宋时轮任校长兼政治委员。同年9月1日；培养现代军事科学技术的各军兵种军事工程人员的军事工程学院在哈尔滨成立，陈赓任院长。到1953年，人民解放军初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院校教育体系。

为统一领导全军军事训练和院校教育工作，1950年9月成立军委军事训练部，肖克任部长。1952年12月，军委又决定成立军事学校管理部，统一管理全军院校，张宗逊副总参谋长兼军校部部长。

精简整编

人民解放军的数量随着革命战争的发展而下断扩大，到新中国建立初期总兵力已达550万人。1950年军费开支占国家财政支出比例的41.1%。由于新中国建立，大规模战争结束，国家开始了经济的恢复和建设，不需要花费大量经费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50年2月正式决定军队进行大规模的精简整编，计划将总人数压缩到400万人。

1950年5月，中央军委召开全军参谋会议，部署整编工作，确定了全军分期分批复员或转业百余万人的精简整编方案。方案规定，整编的中心是实行复员和统一全军编制。这次整编的方针是：缩减陆军，尤其是步兵员额，加强空军、海军及各特种兵部队。陆军的精简幅度为26.6%，由原来占全军总员额的93.19%下降到95.47%，1950年6月30日，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复员150万人的决定。这是建国后人民解放军的第一次大规模精简整编。

这次整编，陆军分为国防军和公安部队两类，国防军的军、师两级归一、二级军区和个别省军区建制领导；撤销了一部分兵团领导机构，充实了大军

见《当代中国军队的后勤工作》，第1版，30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区。经过这次精简整编，陆军员额压缩，实际精简 17.1%，并统编为国防军和公安部队；海、空军及各特种兵有了较大发展，总兵力达 60 余万人。这是人民解放军合成化的起步。由于朝鲜战争爆发，为了满足抗美援朝和保卫国防的需要，这次精简整编计划未能完全实现，不久部队又进行了扩编，1951 年底总兵力达到 611 万人。

朝鲜战场形势基本稳定后，1951 年底，中共中央决定人民解放军再次进行精简整编，以加强国防力量和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1952 年 1 月 5 日，毛泽东批准《军事整编计划》。这一计划规定：国防军分两期进行精简整编，从 1951 年 12 月 1 日到 1952 年 3 月底为第一期，拟精简 194 万人；从 1952 年 4 月到 12 月为第二期，拟精简 92 万人；另有 56 万人留至 1953 年解决。主要是精简陆军，尤其是精简步兵，特种兵部队的编制根据装备生产情况相应增加。公安部队第一期精简 15 万人，第二期能否精简视情况再定。

这次整编成效大，到 1952 年 10 月底，共精简 19 个军部、73 个师，近 200 万人。整编中撤销了野战军和绝大部分兵团一级领导机构。整编后军、师归各军区直接指挥，军以下部队实行统一编组。全国还统一成立省军区、军分区和县（市）人民武装部，领导地方武装工作。通过这次精简整编，大大压缩了步兵人数和机关员额，陆军的兵种结构出现了可喜的变化：步兵的人数减至 168 万，占陆军部队总额的 84.65%，特种兵部队的编制人数增至 30 余万，占 15.35%，这表明陆军初步完成由分散领导向集中统一指挥、从单一步兵体制向诸兵种合成体制的转变。同时，海军、空军和院校在精简整编中得到了加强，为以后的建设发展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制定和颁发条令条例

在革命战争年代，部队的各种规章制度，都是由各战略区自己制定的，不太统一。新中国建立以后，人民解放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迫切需要全军统一的条令条例，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对此相当重视。

1950 年秋，中央军委指示军委军训部成立于令编修委员会，编写共同条令。条令编修委员会提出针对未来作战对象，适应我军发展状况，重视过去经验，发扬优良传统，照顾中国特点的条令编修基本方针。同年，刘伯承写信给肖克，提出以苏军条令为蓝本，以我军优良传统为基础，力求简明易行，适合现在，照顾将来为原则，编写我军的条令。军训部很快提出以苏军条令为蓝本、结合当时军队的编制体制和武器装备情况编写了《纪律条令》、《内务条令》、《队列条令》草案。新成立的军事学院在院长刘伯承的主持下，对条令草案进行审查讨论，提出修改意见。

1951 年 2 月 1 日，根据毛泽东的命令，总参谋部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草案）》、《队列条令（草案）》和《纪律条令（草案）》，要求全军试行。这三部条令有很多规定偏重于照顾过去各战略区自定的法规和习惯。条令颁布试行后不久，人民解放军的编制和装备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条令显得与实际不相适应。于是又根据新编制和部队改装的情况，对条令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改。

1953 年 5 月 1 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颁布经过修改的三大条令草案。在军委制定全军统一的共同条令的同时，各军兵种组织力量翻译和颁发苏军的一些专业和勤务部门的战斗条令，条例和教范等，在部队中试行。如

《步兵战斗条令》、《骑兵战斗条令》、《高射炮兵战斗条令》、《空军战斗条令》、《海军战斗条令》等。

这些条令条例的颁布试行，规范了军人的行为，加强了军队的纪律性，促进了战术技术水平和组织指挥、协同作战能力的提高。

开展文化教育和技术训练

人民解放军的广大官兵，大部分来自旧中国的农村，很少有机会受到文化教育，文盲、半文盲很多，为提高干部战士的文化水平，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曾经因陋就简，开展识字活动。但是由于条件所限，不可能稳定地进行文化教育，部队的文化水平仍然很低。据 1951 年总政治部的报告：部队战士的文化程度，初小以下者占 80%，其中识 500 字以下的尚有 30% 左右；干部中不及高小程度者约占 68%，其中初小以下尚有 30% 左右。这种状况远不适应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军的需要。为改变这种状况，人民解放军在训练中增加了文化教育的内容。

1950 年 8 月 1 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达《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决定“全军除执行规定的作战任务和生产任务外，必须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着重学习文化、以提高文化为首要任务，使军队形成一个巨大的学校。”毛泽东亲自为部队的文化学习制定了“速成的、联系实际的、但又是正规的”教育方针。在短短的几个月内，调配了 5 万多名文化教员、编印了 200 余万册教材，组建了近 40 所文化学校。由于抗美援朝战争开始，这一计划推迟。1951 年 11 月 29 日，中央军委又作出决定 1952 年的教育训练“全军除海、空军及雷达部队之有文化者外，均执行以文化教育为主的方针。这一方针，是为了更有准备和更有步骤地执行现代化、正规化的训练计划和掌握现代技术。”中央军委要求开展一个以扫盲为重点的文化学习运动，用 50% 的训练时间进行文化教育，扫除干部、战士中的文盲，将其提高到初小毕业的程度，并将已具有初小毕业程度的干部、战士普遍提高到高小毕业的程度，将已具有高小毕业程度的干部提高到相当于初中一年级的水平。据此，军委总政治部于同年 12 月 5 日颁发《1952 年度部队文化教育计划大纲》。全军掀起学习文化热潮。据不完全统计，全军参加文化学习的人数达 150 万人，其中干部 32 万人。全军共抽调 14 万名干部担任文化教员和其他文教工作，师以上单位先后建立文化速成学校 262 所，许多团级单位举办了文化实习学校或文化轮训队。这是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文化教育运动。到 1953 年 5 月，全军文盲半文盲（初小以下文化程度）已从 1951 年的 67.4% 下降到 30.2%，初小毕业以上者由 16.4% 上升为 42.1%。官兵文化水平的提高为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准备了条件。

1953 年 6 月，中央军委发出军队训练由“以文化教育为主”转入“以军事训练为主”指示后，部队军事、政治、文化教育训练的时间按 6：2：2 的比例进行。文化教育仍列为正规训练的内容之一。部队文化教育由突击式的教育转入长期的经常教育。

随着新军兵种建立和新武器装备逐步装备部队，人民解放军各军兵种根据总参谋部的统一要求，并结合各自的装备特点，在 50 年代初期，开展了以掌握现代兵器及其他军事技术为主的军事训练。步兵根据更换武器装备的情况，开展了以射击为重点的，包括投弹、刺杀、爆破、土工作业等五大技术

训练。主要是掌握武器的构造和战斗性能，射击及其他技术的原理和要领，以及排除故障的方法等，并结合地形和一定战术背景进行了综合演练。侦察分队还进行了观察、格斗、攀登、驾车等专业技术训练。炮兵开展了以射击为中心的技术训练，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炮兵部队换装苏式大炮后，只进行了1~3个月的突击训练，就开赴朝鲜作战，主要是在作战中进行边打边训。装甲兵开展了以坦克驾驶、射击、通信三大专业技术为重点的训练。从1950年11月起，相继组建了4个坦克编练基地，除培训车长、炮手和驾驶员外，还培训修理工。装甲兵赴朝参战后，也同炮兵一样，在战场上边打边训，坦克乘员的专业技术水平都有明显提高。空军航空兵部队组建后，即开始担负国土防空任务，并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由于作战需要，空军驾驶员一般在航校只经过6~8个月、几十个小时的飞行训练，即担负作战任务，在作战中逐步掌握飞机性能，各种气象条件下的驾驶技术和作战本领。经过抗美援朝战争的锻炼，空军已经发展成为一支比较成熟的军种，其中一些飞行员已成为全天候的飞行员。海军和陆军其他兵种也结合各自的技术装备特点开展了各种专业技术训练。各军种在技术训练的基础上，还不同程度地进行了战术训练。人民解放军的技术、战术水平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作战能力有了加强。

向和平时期转变的政治思想工作

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部队新成分大量增加，其中有一些是俘虏的国民党部队士兵、起义或接受和平改编的人员，部队存在着一些不良思想和不良习气；部队中新党员人数较多，对党的知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了解不多，还有一些思想不纯的人也进入了党内：随着胜利形势的发展，一些官兵产生了骄傲轻敌、松懈麻痹，以功臣自居，贪图安逸，不求进取，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思想。有的老干部，老党员甚至出现严重官僚主义和贪污腐化现象。这种状况，要求军队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组织建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优良传统，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

为解决这些问题，在50年代初期，人民解放军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进行了两次整党整风运动。

1950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在1950年内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以克服党内首先是领导干部内存在的居功自傲情绪、命令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以及少数人贪污腐化、政治堕落颓废、违法乱纪等错误，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

10月，总政治部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部队的实际情况和美国发动侵朝战争、侵占我国领土台湾的严重局势，发出《关于整风工作的指示》。《指示》要求全军整风运动以团以上干部和机关为重点，并从高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开始；整风的内容以整顿和提高战斗意志，保持和发扬我军优良传统作风为中心，其他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军阀主义、违犯政策、居功自傲、贪图享受等不良倾向，均围绕这个中心进行，以求通过整风，达到牢固树立“永远是一个战斗队”的思想，随时准备用战争去反对侵略者的目的。经过这次整风提高了部队的战斗意志，为应付美国扩大侵朝战争和出兵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做了必要的思想准备，为开始进行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

的思想保证。

1951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用三年时间进行整党，并在全党普遍进行一次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中共中央于同年4月召开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通过《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据此，总政治部对全军整党工作进行了部署，并发出《关于整党工作的指示》，全军各部队展开整党工作。1951年12月以后，结合全党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人民解放军在整党的同时，结合进行了“三反”运动，全体官兵受到了一次很好的反腐蚀教育。这次整党淘汰了一些不合格党员，清除了极少数混入党内的坏分子，纯洁了党的组织，并向军队中的党员普遍进行了一次过去少有的系统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

人民解放军除开展整风、整党、“三反”等大的运动外，还根据党中央的安排进行了一些全军性的大的政治思想教育活动，如进行党的七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的宣传教育、进行抗美援朝的思想政治教育、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思想政治教育等等；加上经常性的政治思想教育，使人民解放军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始终保持了无产阶级性质，同时有力保证了战略追击、剿匪、抗美援朝等重大作战任务和其他各项任务的完成。

建立统一的后勤体系

战争年代，人民解放军的后勤组织机构很不统一，也不健全；后勤供应是分散就地筹措、取之于敌。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供应方针改为“统一领导、分区负责”，但仍不够统一；供给标准和规章制度也不一致。这种状况与人民解放军进行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很不适应。经过抗美援朝战争，人民解放军对后勤在现比战争中重要性的认识大大加深。从而促进了后勤建设的发展。

建立全军后勤组织机构。形成总后勤部领导下的陆、海、空三军供应体制。中央军委于1951年1月发出《注意加强后勤工作的指示》，指出：在现代战争中，后勤组织的健全与否及后勤工作的好坏，对于争取战争的胜利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中央军委要求各级首长要加强对后勤工作的领导，派较强干部参加后勤工作，健全与充实后勤组织。据此，担负领导全军后勤工作的总后勤部首先得到充实加强，组建了各业务部，并设立了政治部。在组建海军、空军和各特种兵时，也相应地成立了各军兵种的后勤机构。各大军区的后勤部在精简整编中统一了编制体制。各级后勤机构建立后，中央军委明确了后勤工作的组织原则和领导关系，即：全军后勤工作在总后勤部领导下进行；分为陆、海、空军三个系统组织实施。各大军区后勤部除负责本区部队的后勤工作外，应成为总后勤部的补给基地；各级后勤机关隶属于各该部队的建制，但在整个后勤工作方面则受上级后勤部的领导；总后勤部与各大军区及海、空军后勤部直接联系。不直接供应部队。形成了在总后勤部领导下三军供应的体制。这种上统下分的体制和军事指挥体制相一致，照顾到当时军兵种的一些特点，促进了后勤建设的发展。

制定供给标准和规章制度，使各级后勤实施后勤供应有依据。1948年底至1949年初的全军后勤工作会议初步制定了全军统一的后勤规章制度和供给标准。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新军兵种的创建、武器装备的改善和部队由作战向和平时期训练转变，原定的标准制度已不适应部队的实际情况和需要，

必须制定新的标准和制度。

1950年上半年，总后勤部先后召开财务、军需、军械、卫生、运输和营房等工作会议，初步制定了各项新的供给标准和规章制度。1952年4月，总后勤部又组织力量对全军两年来制定的标准制度进行检查，作了全面的修改和补充，并于同年8月颁布全军试行。这些标准制度的建立适应了当时军队各项事业建设和各军兵种建设的需要。

完成后勤供应由分散向集中统一的转变。

1950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其中规定军队开支统由中央财政部分负责拨付。据此，中央军委要求军队的后勤供应必须由分区负责实施转为集中统一实施。从此，军队的经费供应形成了由国家统一供应军队、并由军队财务系统归口统一管理的体制。

后勤保障力量得到加强。从1950年起，为保障军队建设、作战和保障志愿军出国作战的需要，总后勤部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对原由各大军区管理的及从国民党军队接管的仓库、医院、工厂等保障机构进行了统一整编和调整、充实。同时建立和健全了勤务部(分)队。到1953年底，后勤系统共建汽车团35个，有运输汽车1万余辆，还建立了各种装备维修分队。经过几年的建设，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的锻炼，军队后勤保障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为适应军队建设的发展，尤其是抗美援朝战争的迫切需要，1950年至1951年中央军委抽调一批军事、政治干部从事后勤工作，并给后勤系统分配5万名新参军的知识青年。为使他们尽快掌握后勤业务知识和技能，除对他们进行在职训练外，还通过院校使他们得到正规的后勤专业训练。至1953年底，全军共创办各种后勤院校29所，在校学员达到2万人，使后勤干部有了可靠的来源。后勤部门在保障抗美援朝等作战行动期间，在卫生勤务工作和战场救治方面遇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迫切需要解决。中央军委根据各大军区卫生部长联席会议的建议，于1951年6月下达《关于迅速成立军事医学科学院的指示》。同年8月，在上海成立了军队后勤系统第一个科研机构——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科学院，后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并迁到北京。军事医学科学院及以后成立的军事医学科研机构，促进了军队卫生事业和军事医学科学研究的发展。

五、援越抗法

新中国成立不久，1950年1月，胡志明秘密访问中国，以印度支那共产党中央的名义向中国共产党提出援越抗法的请求。为了支援兄弟党和友好邻邦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在国家经济尚未恢复，战争创伤急需医治的情况下，中共中央、毛泽东毅然作出援越抗法的决策。并立即派遣罗贵波为中共中央联络代表赴越，与印度支那共产党中央协商援越抗法的重大事宜；派陈赓为中共中央代表，协助组织边界战役和负责统一处理中国对越南军事援助的各项工作；同时决定从第2、第3和第4野战军选调人员，组成以韦国清为团长，梅嘉生、邓逸凡为副团长的援越军事顾问团，协助越南人民军进行军队建设和作战指挥。

军事顾问团79名顾问和随员共250人，于1950年8月12日抵越南高平省广渊越南人民军前指驻地。韦国清任越南总军委和人民军总司令顾问，梅嘉生、邓逸凡、马西夫分别担任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部、总政治局和总供给局顾问。同时，向越军当时的3个主力部队第304、第308、第312师派驻了顾问组。

军事顾问团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越南斗争的实际，把协助越南人民军组织指挥作战，打败法国侵略者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从1950年8月赴越，到1954年越南抗法战争停战，先后协助越南人民军组织指挥了边界、红河中游、东北（18号公路）、高平、西北、上寮、奠边府等7次规模较大的战役。这些战役，从决策到具体组织实施，都是在军事顾问团帮助下进行的。在越南劳动党中央和总军委领导下，人民军英勇作战，打败了法国侵略者，赢得了抗法战争的胜利。特别是边界、西北、奠边府三次大捷，军事顾问团都适时提出战略性的建议，并帮助拟定周密的作战计划和实施灵活机动的组织指挥，对夺取战役的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50年9月16日发起的边界战役，歼敌8个整营，毙俘敌80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收复5个市、13个县镇。打破了法军对越北根据地的包围和对中越边境的封锁，改变了越南北部的战场形势。1952年10月14日发起的西北战役，历时两个月，共歼敌1.38万人，解放约2.85万平方公里土地和25万人口，使越北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改变了抗法战争的战略态势。1954年3月协助组织指挥的奠边府战役，历时55天，共歼敌3个主力兵团的17个步兵、伞兵营，3个炮兵营，连同工兵、装甲、运输部队及少量非正规部队约1.62万人，其中俘虏奠边府法军最高指挥官德卡·斯特莱少将以下1.09万人，击落击伤各型飞机62架，击毁坦克4辆，缴获重炮30门、坦克6辆及大量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奠边府战役的胜利，宣告了法国侵略战争的彻底失败，迫使法国在日内瓦协议上签字。同年7月，法军撤出越南和整个印度支那，北纬17度线以北的越南北方全部解放。

军事顾问团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指示，在协助越南人民军组织指挥作战的同时，还从多方面帮助加强越南人民军建设。在军事工作方面，军事顾问团根据作战任务和形势发展的要求，有计划地帮助越南人民军在作战和建军指导思想上实现了3次转变。第一次是从1950年边界战役开始，军事顾问团结合越南人民军实际情况，提出发展更多主力部队的建议，并帮助人民军总部拟制了《建设主力部队方案》和编制装备计划，人民军在一年多时间内组建了3个步兵师和一个工炮师。随着战局的发展和部队的扩

大，军事顾问团又向人民军提出了加强军事训练和对部队进行正规化教育，建立各项规章制度的建议，并帮助起草了《战斗条令》、《队列条令》和《内务条令》，经人民军总军委讨论修改通过后，颁布执行。使人民军顺利地实现了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第二次是西北战役后，针对人民军攻克坚固防御集团据点能力较弱的情况，军事顾问团与越方共同研究后，采取两项措施，一是加强炮兵建设，二是加强部队攻坚战术技术训练。使人民军攻坚能力有了较大的提高，实现了由小规模攻坚战到大规模攻坚战的转变。第三次是越南实现停战后，军事顾问团与越南人民军总部一起研究了建军计划和未来作战问题，并帮助越南人民军整编、进行系统的正规训练和特种兵建设等军队建设工作，逐步实现由战争环境到和平环境的转变。在政治思想建设方面，军事顾问团不仅将中国人民解放军行之有效的政治工作经验有针对性地介绍给越南人民军，而且帮助越南人民军建立起一整套的政治工作制度和业务机构。并先后有步骤地协助组织了四次重大政治思想教育，开展政治整军，这对保证越南人民军作战的胜利和完成各项任务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后勤建设方面，军事顾问团帮助越南人民军建立健全了各级后勤组织，完善了各项规章制度，提高了保障能力，使后勤工作逐步走上了正轨。

中国军事顾问团在越南五年多时间里，认真执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尊重越南劳动党、政府和胡志明主席的领导，同越南人民患难与共，艰苦奋斗，为越南人民取得抗法战争的胜利，为越南人民军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得到越南劳动党、政府和人民军指战员的高度赞扬，也得到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充分肯定。越南停战后，中共中央根据新的形势，并征得越方同意，决定撤销军事顾问团，顾问团成员于1955年9月起陆续全部回国。

在越南抗法战争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还在中国境内帮助越南人民军训练部队，开办军官学校和驾驶、通信等专业技术人员培训班，培训军事、技术干部1.5万余人。越南人民军的许多建制部队都是首先在中国境内接受装备，进行训练，尔后回国参战。与此同时，还向越南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装备物资，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援助越南人民军枪支15.5万余枝（挺），枪弹5785万发，炮3600余门，炮弹108万多发，手榴弹84万多枚，汽车1200余辆，军服140余万套，粮食和副食品1.4万多吨，油料2.6万余吨，以及大量的医药和其他军用物资，有力地保证了越南人民军抗法战争的需要。

从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至1953年12月，是新中国历史上由革命战争向和平建设的过渡时期。根据党中央的部署和要求，人民解放军继续向国民党军残余部队实施战略追击（第三章），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第五章），开展大规模剿匪斗争，彻底消灭了大陆上残余的国民党军队，解放了除台湾及东南沿海少数岛屿以外的全部国土，奠定了国内安定局面，保卫了国家安全和建设。为了保卫和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人民解放军派出大批工作队参加军管、土改、镇反、帮助地方建立基层政权，恢复、发展生产，执行工作队和生产队的任务，巩固发展了胜利成果。在完成军事、政治任务的同时，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开始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转变，进行合成军队建设，建立和健全各级领导机关，组建新的军、兵种。同时还颁布了三大条令，创办了军事院校，改善了武器装备。经过近四年的建设，人民解放军由单一军种发展成初具规模的诸军兵种合成军队，为全面开展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五章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一、中共中央被迫决策“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正当中国人民在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准备集中精力，争取用三年左右时间恢复国民经济，人民解放军着手进行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之际，美国侵略当局将一场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中共中央被迫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

组成东北边防军防范美国侵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虽然朝鲜人民从日本军国主义的奴役之下解放出来，但由于美、苏两国在朝鲜问题上的妥协和尖锐对立，使朝鲜又陷入了以北纬38°线（下称“三八线”）为界的南北分裂对立的状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跃居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头号强国，积极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妄图称霸全世界。在朝鲜问题上，美国背弃包括美国在内由反法西斯阵线主要同盟国达成的关于使朝鲜自由独立及成立统一的朝鲜政府的协议，阻挠和破坏朝鲜实现独立统一，妄图把朝鲜变为他的殖民地和进行进一步侵略扩张的前进基地。1948年8月，在美国一手操纵下，朝鲜南方单独成立了“大韩民国政府”。针对这种情况，同年9月，朝鲜北方人民组成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主张在没有外国干涉的条件下，实现自主和平统一。此后，朝鲜南北两个政府如何实现统一和统一于谁的问题上进行了斗争，至1950年6月25日，大规模的内战爆发。

美国当局从其称霸全球的战略利益出发，立即进行武装干涉，6月26日派其驻日本的空军和海军部队侵入朝鲜，支援南朝鲜军作战。与此同时，派其驻菲律宾的海军第7舰队，侵入台湾和台湾海峡，干涉中国内政，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

27日，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发表声明，公开宣布了上述侵略行动，并宣称加强美国在菲律宾的部队，加速对菲律宾政府和在印度支那的法国侵略军的援助。美国还在联合国积极活动，乘苏联代表缺席、中国的合法席位被台湾蒋介石集团占据之机，于6月25日和27日，先后操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了指控朝鲜北方已发动进攻，和要求联合国会员国给南朝鲜李承晚政府提供“必需的援助”的决议。6月30日，美国向朝鲜派出了地面部队。7月7日，美国又操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组成侵朝“联合国军”的决议，扩大朝鲜战争。“联合国军”以美国军队为主，由16个国家和地区的部队组成，由美国任命司令官。7月8日，杜鲁门任命美国驻远东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为侵朝“联合国军”总司令。把美国的侵略行动，披上了联合国的外衣。7月中旬，李承晚将南朝鲜军也交“联合国军”指挥。

对于美国的侵略行为，毛泽东、周恩来于6月28日分别发表讲话和声明，进行严厉谴责和抗议。同时，中共中央以敏锐的洞察力，高瞻远瞩，正确分析了朝鲜战局的形势，认为，尽管朝鲜人民军的作战发展顺利，但鉴于美国大规模入侵朝鲜，使朝鲜战局趋于复杂化，朝鲜成了国际斗争的焦点，至少是东方斗争的焦点。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美国甚至直接威胁中国大陆

的安全。因此，中国人民对于美国的侵略威胁不能不有所防备。

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提议，由周恩来副主席主持，于7月7日和10日召开两次国防会议，专门研究讨论保卫东北边防和必要时支援朝鲜人民反抗美国侵略的问题，根据会议的讨论，中央军委于7月13日作出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抽调当时分布在广东、广西、上海、湖北、河南、黑龙江等地执行生产、剿匪等任务的第13兵团（辖第38、第39、第40军）、第42军和炮兵第1、第2、第8师等部，共25万余人，组成东北边防军，开赴辽东和吉林省南部地区集结，整训备战。8月上旬，上述部队按要求全部完成集结，在以高岗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东北军区领导下，由以邓华为司令员的第13兵团统一组织，开始突击整训。8月下旬，军委又决定将在上海的第9兵团和在西北的第19兵团分别集中于津浦、陇海两铁路沿线机动位置，以作为边防军的二线部队。同时决定向苏联订购武器装备，加速空军、炮兵和高射炮兵等特种兵的建设，以适应未来可能投入作战的需要。9月上旬，又决定将第50军编入东北边防军序列。

组成东北边防军并进行突击整训，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战略上的英明举措，为后来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准备了必要的军事力量，争取了战略上的主动。

决策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

中国人民在谴责与抗议美国侵略行为，进行必要防范准备的同时，一再主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要求从朝鲜和台湾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然而，美国当局对此不屑一顾，继续扩大战争。从8月27日起，美国侵朝飞机不断侵入中国领空，轰炸扫射中国边境城镇和乡村。美国为挽救其在战场上的败局，调集军队于9月15日，在朝鲜西海岸的仁川实施大规模登陆，截断了朝鲜人民军的后路，并大举向三八线推进。朝鲜人民军被迫实行战略退却，朝鲜战局发生了逆转。9月27日，美国当局指令麦克阿瑟，美军越过三八线继续向北进攻，占领整个朝鲜。28日，美军登陆部队占领汉城，29日，美军全线进抵三八线。

在这种情况下，9月30日，周恩来总理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一周年的报告中，警告美国：“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10月3日，周恩来总理通过印度驻华大使转达，再次警告美国：“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我们主张朝鲜事件应该和平解决”，“朝鲜战事必须即刻停止，侵朝军队必须撤退”。

然而美国当局认为，周恩来的警告只是对联合国的恫吓，印度大使“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共产党的传声筒罢了”。中国不会插手解决朝鲜问题，不敢同组织有序的美国三军进行较量。于是，美国当局一意孤行，在南朝鲜军于10月1日越过三八线以后，美军于10月7日大举越过三八线北进。同日，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版，24、25~2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版，24、25~2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所谓“统一朝鲜”的决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处境危急，中国大陆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10月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和外相朴宪水，向毛泽东主席发出了请求：请求中国人民给以特别的援助，即在敌人越过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朝鲜人民作战。与此同时，中国人民纷纷要求志愿援助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

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10月上旬和中旬，毛泽东主席多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全面深入地分析形势，研究出兵参战问题，当时，新中国成立仅仅一年时间，经济、政治、军事各方面困难相当严重，尤其军队武器装备严重落后，同现代化的美军作战困难更大。但是，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邻居失火不能不救。毛泽东指出：我们可以提出几十条，几百条，甚至几千条困难，但是对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不能不给以回击。如果“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我们采取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总之，“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中央政治局经过慎重的分析研究，为了挽救朝鲜危局，保卫中国的安全，维护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毅然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战略决策，决定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作战，支援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

10月8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签署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命令内容如下：

（一）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二）中国人民志愿军辖十三兵团及所属之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四十二军，及边防炮兵司令部与所属之炮兵一师，二师、八师。上述各部须立即准备完毕，待令出动。

（三）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四）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工作供应事宜，以及有关援助朝鲜同志的事务，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调度指挥并负责保证之。

（五）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即共产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

（六）必须深刻地估计到各种可能遇到和必然会遇到的困难情况，并准备用高度的热情，勇气，细心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去克服这些困难。目前总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于我们有利，于侵略者不利。只要同志们坚决勇敢，善于团结当地人民，善于和侵略者作战，最后胜利就是我们的。

据此，东北边防军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和高岗的主持下，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117页。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109~110页。

紧急展开了出国作战的动员和准备。

争取战争胜利的部署和准备

中共中央在作出出兵决策的同时，对志愿军参战后战局形势的变化也作了几种估计，指出：“既然决定出动中国军队到朝鲜和美国人作战，第一，就要能解决问题，即要准备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第二，既然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和美国军队打起来（虽然我们用的是志愿军名义），就要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

中共中央还估计到，经过有力作战，也有迫使美国进行外交谈判的可能。中央的对策，是立足于最困难的基点上做准备。

为了争取战争的胜利，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进行了一系列部署和准备：

第一，调整军事战略。将军事战略的重点由准备解放台湾转为抗美援朝战争；军队建设由重点加强海军和空军建设转为重点加强空军、炮兵（含高射炮兵）和装甲兵的建设；将原定从苏联贷款购买海军装备的费用绝大部分改用于购买空军飞机和陆军武器装备，保证抗美援朝战争的作战需要；决定从全国各战略区抽调部队作为志愿军的后续部队；解除野战军部队正在从事的生产建设任务，而转为军事整训；没有担负生产或剿匪作战任务的部队，由以文化教育为主改为以军事训练为主。

第二，请求苏联支援武器装备并出动空军支援志愿军作战。早在8月下旬，周恩来副主席在检查边防军作战准备情况时，就主持各军兵种负责人制定了三年建设规划，决定向苏联订购飞机、坦克、汽车、火炮和步兵武器。10月上旬，中央在作出出兵决策后，立即派周恩来赴苏联会谈请求支援问题。

第三，调整财政工作方针，中央确定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财政工作的方针，由原放在和平恢复经济的基础上，调整为放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基础上，在财政工作部署上，“战争第一……一切服从战争，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

第四，部署沿海城市和工业基地的防空。10月下旬，组成以周恩来为主任，由彭真、聂荣臻、薄一波、李立三参加的防空筹委会，统一研究指导全国城市和工业基地的防空问题，将人民解放军仅有的几个航空兵师和十几个高射炮团部署于沈阳、鞍山、本溪、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杭州、广州等靠近沿海的大中城市，并将辽南地区的工业基地部分地向黑龙江做了迁移。

第五，在福建、广东方向部署兵力，防备美国和蒋介石集团联合登陆进攻。在福建、广东方向各部署4个军，毛泽东并指示华东局和中南局，加速福建、浙江、广西的剿匪工作，限令6个月内全部歼灭股匪，以便抽出兵力随时准备向北或向南机动。电令“华东一切工作要以美国和蒋介石登陆进犯为假想的基础去布置。”“将两广作为一个对付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登陆进犯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106页。

《陈云文选》（1949～1956年），第1版，1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204页。

的统一单位。”

第六，在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在全国人民中开展了仇视、鄙视、蔑视帝国主义的“三视”教育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教育，动员全国人民以各种方式支援志愿军，并于10月下旬成立了以郭沫若为主席，彭真、陈叔通（后增廖承志）为副主席的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简称“抗美援朝总会”），负责组织领导全国的抗美援朝运动。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统揽抗美援朝战争和国内防务的全局，所作的这些部署和准备既有力地保证了志愿军在朝鲜的作战，也使国内安全有备无患。

志愿军的作战条件和作战方针

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经过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锻炼和考验，具有同国民党军队和侵华日军作战的丰富经验，但抗美援朝战争却遇到了不同以往战争的许多新情况。

新的作战对象。志愿军的主要对象是美军。美国国力强，工业发达，技术先进，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发了横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跃居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最强国。美军的武器装备高度现代化，具有强大的海军和空军，掌握整个战场的制空权和制海权，其地面作战部队，每师装备有坦克140余辆，装甲车35辆，各种炮790余门，火炮由汽车牵引或由吉普车驮载，各种汽车3800余辆，战场机动力、火力突击力和后勤补给能力强，通信设备先进，指挥灵敏。美军训练有素，具有较丰富的现代作战经验，可以实行陆、海、空三军联合的、全方位的立体作战，并且陆军和空军以及步兵、炮兵和坦克之间协同非常密切。志愿军首次遇到这样的对手。

新的战场。朝鲜战场不同于国内，地幅小，南北狭长，三面环海，志愿军作战回旋余地小，也不便于展开更多兵力，而有利于美军依靠海空军优势实施侧后登陆进攻。朝鲜在经济上本来就贫穷，再经过侵略者的洗劫，几乎一贫如洗，志愿军难以就地解决作战物资补给问题。志愿军首次出国作战，对朝鲜战场人地生疏。

中国国力弱，志愿军武器装备严重落后。中国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工业落后，经济力量薄弱。新生的人民政权刚刚建立，从旧中国接收的是一片废墟，千疮百孔，百废待兴。志愿军武器装备严重落后，在整个战争期间没有海军参战，前期也没有空军参战，谈不上制主权和制海权。地面部队前期也没有坦克，除机动炮兵编有300~600门火炮外，每个军只编有各种火炮520~540余门，仅相当于美军一个师人炮编制的2/3，并且火炮陈旧、型号杂、口径小、射程近、威力小、炮弹不足，少数有汽车牵引，大部分由骡马驮载或由人员携行，每个军只配有运输汽车100辆左右，后方在美国空军的控制之下，运输极为困难。志愿军的战场机动力、火力突击力和后勤补给能力均很弱，通信设备落后，数量少，联络困难，影响作战指挥。作战中的困难很多。

鉴于这种情况，毛泽东主席为志愿军确定了“从稳当的基点出发，不做办不到的事。……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的基本方针。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版，第1册，666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140、141页。

同时确定志愿军第一个时期只打防御战，在平壤、元山铁路线以北，德川、宁远公路线以南地区构筑两至三道防御阵线，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作战形式，歼灭小股敌军。待6个月以后，志愿军装备训练完毕，在空中和地上均具有压倒优势时，再配合朝鲜人民军举行战略反攻，歼灭美国侵略军。

中国人民志愿军经过紧张的动员和准备，于10月19日，在彭德怀司令员的率领下，秘密开赴朝鲜，从此开始了中国人民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

为统一指挥志愿军作战，10月25日，中共中央决定，将第13兵团司令部、政治部改组为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任命邓华为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洪学智、韩先楚为副司令员，解方为参谋长，杜平为政治部主任，并以彭德怀为书记、邓华为副书记组成中共志愿军委员会。

二、帮助朝鲜人民军实行战略反攻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以后，根据朝鲜战场形势的变化，改变了原定的防御作战计划，实行以运动战为主与部分的阵地战、游击战相结合的方针，帮助朝鲜人民军立即转入战略反攻，连续进行五次较大规模的战役，迅速打出了有利的战争局面，将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并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地区，迫使美国接受停战谈判。这期间的作战特点是：战役规模的夜间作战和很少有间歇的连续作战，攻防转换频繁，情况变化急剧，每个战役都具有战略的性质，关系战争全局，影响战争的进程。

第一次战役

美军越过三八线以后，10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专程飞赴太平洋上的威克岛，同麦克阿瑟探讨中国和苏联出兵的可能性。他们认为，中国军队没有现代化的武器装备，没有空军，因此，中国出兵的“可能性很小”；苏联没有可以派入朝鲜作战的地面部队，虽然在西伯利亚地区有空军部队，但没法同美国空军抗衡，即便苏联空军配合中国地面部队出动作战也“不足为患”，因为他们根本配合不起来。断定整个战争在感恩节前即可结束。

由于这种乐观的判断，加上朝鲜人民军有组织的抵抗逐渐减弱，麦克阿瑟则无所顾忌，指挥部队长驱直入，疯狂向鸭绿江边进犯。

当10月19日志愿军入朝时，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已进占平壤、元山一线。志愿军已不可能按原定计划先敌到达预定地区组织防御了，“联合国军”第一线进攻部队共10个师1个旅又1个空降团，兵力13万余人，分东西两线多路北进，并且两线之间相隔80余公里，相互不能照应，对志愿军入朝毫无察觉，这给志愿军在运动中各个歼敌提供了极好的机会。鉴于此，毛泽东、彭德怀当机立断，果断决定改变原定计划，采取在运动中各个歼敌的方针，立即发起反攻。

10月21日，毛泽东指示志愿军：“现在是争取战机问题，是在几天之内完成战役部署以便几天之后开始作战的问题，而不是先有一个时期部署防御然后再谈攻击的问题。”“此次是歼灭伪军三几个师争取出国第一个胜仗，开始转变朝鲜战局的极好机会”。志愿军几经调整部署，最后确定集中第38、第39、第40军及第42军1个师在西线清川江以北地区歼灭南朝鲜军两至三个师，以第42军两个师进至东线长津湖以南地区阻击敌军北进，保障西线作战的翼侧安全。

10月25日，志愿军在开进中同敌军遭遇，抗美援朝战争打响。第40军第120师在云山以北于北进的南朝鲜第1师部队以迎头痛击，第42军两个师在东线也展开了阻击。第40军第118师在温井以北的两水洞地区，与北进的南朝鲜第6师第2团先头1个营和1个炮兵中队遭遇，采取拦头、截尾、斩

感恩节：美国的一个节日。起源于北美洲的英国殖民地普利茅斯，该地居民于1621年获得丰收后，举行庆祝，感谢上帝。后为全国性节日。日期屡有更改，1941年起定为每年11月的第4个星期四。1950年为11月23日。

伪军，即指南朝鲜军，当时也称李伪军。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130、129页。

腰的战法，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将其全歼。此后，志愿军便边开进，边以军或师为单位分头歼灭冒进之敌。同时，中央军委命令第 50、第 66 军入朝，增加西线作战力量。

29 日晚，第 118 师在古场洞、柳良洞地区，将已窜至鸭绿江边楚山镇尔后又回窜的南朝鲜第 6 师第 7 团大部歼灭；第 40 军另两个师在温井以东龟头洞地区歼灭南朝鲜第 6、第 8 两师共 4 个营。当志愿军西线主力全部完成战役展开后，志愿军首长以第 38 军沿清川江左岸由东北向西南迂回，截断清川江以北敌军退路，而以西线其他各军抓住当面之敌各个歼灭之。11 月 1 日晚至 3 日晨，第 39 军在云山地区包围歼灭美骑兵第 1 师第 8 团大部和第 5 团一部，共歼敌 2000 余人（其中美军 1800 余人），缴获敌机 4 架，击落 3 架，击毁和缴获坦克 28 辆、汽车 170 余辆、各种炮 119 门。此次战斗首开志愿军部队同美军作战并歼其 1 个团大部的纪录，沉重地打击了美军“王牌”部队骑兵第 1 师的进攻气焰，大增了志愿军的战斗士气。至 11 月 5 日，西线敌军全部撤至清川江一线及以南，志愿军遂结束了西线作战。

在东线的志愿军第 42 军主力，奋战 13 昼夜，有力地阻击了美军和南朝鲜军 3 个师的北进，歼敌 2700 余人，完成了配合西线主力作战的任务。

此次战役，志愿军共歼敌 1.5 万余人，歼灭南朝鲜第 6 师大部，重创美骑兵第 1 师，粉碎了“联合国军”在感恩节前结束朝鲜战争的计划，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为尔后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二次战役

志愿军突然出现在朝鲜战场上，令美国当局和在东京的麦克阿瑟大吃一惊，他们既搞不清志愿军在朝鲜有多少部队，也搞不清志愿军在朝鲜的军事目标是什么。但是他们仍然错误地估计了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决心和力量。他们经过分析判断认为，中国无意也不敢同美国较量，最大的可能，只是象征性出兵，或只是为了保护鸭绿江边和长津湖地区的电力设备，在朝鲜的中国志愿军最乡不过几万人，“不是一个不可侮的势力”。于是美国当局决定，麦克阿瑟继续执行占领全朝鲜的任务，发动一次攻势，打到鸭绿江边。麦克阿瑟集中了 13 个师又 3 个旅和 1 个团共 22 万人的兵力，继续分东西两线发动总攻势，计划在 12 月 25 日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争，并于 11 月 6 日即开始了试探性进攻。

毛泽东主席和彭德怀司令员针对美国决策当局和麦克阿瑟战略上的判断错误，决心利用美军恃强骄傲的心理，将计就计，示弱于敌，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将敌诱至志愿军第一次战役已熟悉的战场，尔后举行反击，歼敌 7~8 个团，将战线推至平壤、元山一线，以德川、球场、宁边以北以西区域为后方，使志愿军站稳脚跟，以利坚持长期作战。为达此目的，调以来时轮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第 9 兵团（辖第 20、第 26、第 27 军）入朝，全部担负东线长津湖地区作战，以改变东线战局；以先期入朝的第 38、第 39、第 40、第 42、第 50、第 66 共 6 个军担负西线地区作战。志愿军东西两线总兵力 38 万多人。

志愿军于 11 月 7 日开始诱敌深入，主力全部向后转移，以一部在第一线以节节抗击方式，步步诱敌。当发现敌军行动谨慎，进展较缓时，则停止反击，继续北撤，造成了敌军更大的错觉。至 11 月 21 日，“联合国军”西线

部队已全部到达预定攻击开始线，完成战役展开，其东线部队进至长津湖以东以南地区，美第7师先头第17团已进占鸭绿江边的惠山镇，并向中国境内开枪射击。11月24日麦克阿瑟宣布发起总攻势，东西两线全面发起了进攻。西线由美第8集团军指挥美英军和南朝鲜军8个师又3个旅和1个团，东线由美第10军指挥美军和南朝鲜军5个师。此时，志愿军西线部队完成了反击准备，东线第9兵团主力也在长津湖地区秘密完成集结。

11月25日黄昏，志愿军西线部队按计划突然发起了反击。首先以第38、第42两军在第40军的配合下，向“联合国军”西线进攻的右翼发起攻击，将进至德川、宁远两城的南朝鲜第7、第8两师分割包围，大部歼灭，打开了战役缺口。尔后以正面各军抓住当面之敌分割歼击之，以第38、第42两军由东而西分别向军隅里和三所里，顺川和肃川实施战役迂回，截断进至清川江以北美第9、第1军的退路，以利配合正面主力歼击。至28日夜，志愿军从北、东、南三面包围了美第9军指挥的美第2、第25师和土耳其旅全部及美骑兵第1师、南朝鲜第1师各一部，在军隅里附近的清川江南北地区展开了围追堵截战。

被围的美第9军部队，在空军支援下，组织坦克和炮兵火力开路，拼力向南突围，位于顺川和平壤的美骑兵第1师和英第29旅也各以一部向北救援。但仍未能逃脱志愿军的沉重打击，美第2师和土耳其旅被歼过半，美第25师被歼1/3。美第9军被迫丢弃大量重装备，转道向西会同美第1军经安州、肃川撤往平壤。至12月2日，西线作战结束，志愿军歼敌2.3万余人，缴获各种炮500余门、坦克100余辆、汽车2000余辆、各种枪5000余枝。

在东线，志愿军第9兵团的第20、第27两军，完成攻击准备后，于11月27日晚突然发起反击，一夜之间，即将沿长津湖东西两岸北进的美陆战第1师（也是美军的“王牌”部队）大部和美第7师1个多团分割包围于新兴里（长津湖东岸）、柳潭里（长津湖西岸）和下碣隅里（长津湖南岸）三个点上，冒着零下20~30的严寒同敌军展开激战。被围美军为免于被歼，则以坦克、汽车组成环形防御，以坦克和大炮火力掩护步兵拼死抵抗，固守待援。战至29日，志愿军第9兵团歼敌1000余人。

30日晚，第9兵团集中第27军5个团，对被围于新兴里的美第7师第31团及第32团1个营，发起猛烈攻击，战至12月1日下午，将该敌3100余人全歼，创造了志愿军一次战斗全歼美军1个多团的范例。

新兴里之敌被歼后，美第10军的进攻全线动摇，12月1日开始全线向南撤退。志愿军第9兵团3个军即在长津湖以南80公里的地段上，对突围的美陆战第1师展开了层层阻截、步步紧追。至12月12日，美陆战第1师被歼过半，在空军和美第3师掩护接应下，最后突破志愿军的阻截而狼狈逃窜。志愿军第9兵团在东线作战共歼敌1.3万余人，彻底扭转了东线战局，毛泽东在12月17日的电报中给予高度评价，指出：“九兵团此次在东线作战，在极困难条件之下，完成了巨大的战略任务。”

至此，麦克阿瑟发动的总攻势已彻底失败，12月1日，全线向三八线撤退。志愿军抓住战机扩大战果，西线于12月6日进占平壤，23日全线进抵三八线；东线第9兵团于12月17日进占咸兴，24日收复兴南及沿海港口，美第10军指挥的部队在近300艘舰船的接应下，从海上撤往釜山。志愿军第

二次战役结束。

此次战役，志愿军大获全胜，歼灭南朝鲜军两个师大部，予美军 4 个师和土耳其旅以歼灭性打击，共歼敌 3.6 万余人，其中美军 2.4 万余人，把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打出了中国人民的士气和志愿军的威风，根本扭转了朝鲜战局，奠定了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基础。美国最高军事当局认为，这次失败“是丢脸的失败”，是美军“历史上最可耻的一次失败”。

第三次战役

“联合国军”在遭到中国人民志愿军连续两次战役的突然打击后，其营垒内部笼罩着一派失败情绪，在败退至二八线及以南后，惊魂未定，利用三八线既设阵地布防，将南朝鲜军 8 个师和土耳其旅置于第一线，美英军主力置于第二线汉城及汉江南北地区，遭到痛歼的美第 10 军和美第 2 师在后方休整，第一、第二线兵力共 13 个师又 3 个旅 20 万余人，统归美第 8 集团军指挥。整个部署呈现能守则守，不能守就撤的态势。美国为了给其侵朝军队争取喘息的时间，挽救在战场上的败局，阻止中国人民志愿军越过三八线继续发动攻击，于 12 月中旬，通过由他们控制的联合国玩弄所谓先停火后谈判的阴谋。

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指出，“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部署了第三次战役，决定集中志愿军西线 6 个军在朝鲜人民军 3 个军团的配合下，共 30 万人，采取“稳进”的方针在东起北汉江西至百海岸的春川、汶山间发起攻击，歼灭南朝鲜军 2~3 个师，尔后转入休整，准备春季攻势。

1950 年 12 月 31 日黄昏，志愿军和人民军发起了第三次战役。一夜之间全部突破敌军阵地，突进纵深达 15 至 20 公里。此时，敌军已成了惊弓之鸟，对中朝军队的攻击稍作抵抗即行后撤。战至 1951 年 1 月 2 日，志愿军第 42 军和第 66 军包围歼灭南朝鲜军第 2、第 5 师共 3 个团大部 3200 余人，缴枪 1500 余枝、炮 60 余门。第 38、第 39 军歼灭南朝鲜军第 6 师 1400 余人，其他各军和军团也各歼敌一部。3 日，敌军全线向汉江以南撤退，志愿军和人民军展开追击。在追击战中，第 50 军包围歼灭英第 29 旅 1 个步兵营和 1 个坦克中队，歼敌 700 余人，依靠步兵武器击毁和缴获坦克 31 辆。8 日，敌军撤至三七线附近布防。志愿军因补给运输困难，粮食弹药紧张，为避免追击过远为敌所乘，遂结束了战役。

此次战役，志愿军和人民军共前进 80~110 公里，歼敌 1.9 万余人，将敌军打退到三七线地区，粉碎了美国玩弄的“停火”阴谋，加重了敌人内部的失败情绪，进一步扩大了中朝军队的影响。

第四次战役

布雷德利：《将军百战归》，第 1 版，754 页，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6 卷，239 页。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连续进行三次战役未得休整，于是，在第三次战役结束后，除留少数部队在第一线担负警戒外，志愿军和人民军主力撤至汉城、横城一线以北地区转入休整，准备春季攻势。

此时，美国当局对朝鲜战争形势已悲观到了极点，担心如果志愿军再次发动攻势，将会把美第8集团军赶出朝鲜，同时也担心苏联会乘机攻击日本，而美国能够用于保卫日本的部队只有在朝鲜作战的第8集团军。鉴于这种担心，他们不得不考虑，一旦战场形势所迫，美第8集团军不得不撤回日本。美国决策者们为此大伤脑筋。

在战场上，于1950年12月下旬接替已死的沃尔顿·沃克出任美第8集团军司令官的马修·李奇微，对他的部队进行了整顿。为探明中朝军队的实力和部署，于1951年1月15日开始，发动了试探性进攻。当他探明志愿军第一线兵力不足，物资补给困难，短时间内不会发动进攻后，遂于1月25日开始，集中“联合国军”地面部队16个师又3个旅和1个空降团共23万多人，将美英军和南朝鲜军混合配置，以美军为主力，以西线为重点，在空军支援下发动了全线反扑。

为了粉碎敌军的进攻，志愿军和人民军立即停止了休整，转入第四次战役。此时，志愿军的兵力没有得到任何补充，物资补给的困难状况没有得到任何改善，中朝军队第一线兵力共28万人，与敌军相比已没有多少优势。彭德怀司令员经同金日成首相协商确定了“力争停止敌人前进，稳步打开战局，并从各方面加紧准备，仍作长期打算的方针”。

根据这一方针，并针对敌军进攻特点，彭德怀决定采取西顶东放的作战方针，以韩先楚副司令员指挥第38、第50军和人民军第1军团在西线汉城东西地区汉江两岸，坚决阻击敌军进攻，牵制美军主力，掩护志愿军主力在东线寻机歼敌；以邓华副司令员指挥第39、第40、第42、第66军向横城以北地区集结，在人民军第2、第3、第5军团配合下，诱敌深入，寻机歼敌一部。

韩先楚指挥的志愿军和人民军各部，在兵力单薄，粮弹补给困难的情况下，依托野战工事展开了顽强阻击。虽然敌军有飞机和地面火力的强大支援，但志愿军和人民军仍守住了汉江南岸的基本阵地，并毙伤敌1万余人，有力地牵制了美军主力，掩护了志愿军主力在东线的展开。2月11日晚至13日晨，东线志愿军主力4个军在人民军3个军团配合下，于横城以北地区全歼南朝鲜第8师3个团和美第2师1个营，并歼南朝鲜第3、第5师各一部，共歼敌1.2万余人。尔后，以人民军3个军团和志愿军2个军继续向南发展，以志愿军6个团围歼横城以西砥平里美第2师1个多团和法国营。志愿军对砥平里之敌连攻两夜，虽予其重大杀伤，但未能全歼。15日，敌军援兵赶到，增加了志愿军攻击的困难。同时敌军在整个战线上构成新的防线和完成了纵深防御部署，志愿军即使攻克砥平里，也难打退敌军的整个进攻。为避免同敌军拼消耗，志愿军遂于16日拂晓前主动撤出对砥平里的攻击，志愿军和人民军全线转入运动防御，掩护志愿军后续兵团开进集结。

在第四次战役开始以后，毛泽东和周恩来鉴于战场上敌军在遭到志愿军打击后撤退快，而志愿军停止攻击后其转入反扑也快。不允许志愿军进行休整的情况，于2月上旬决定，志愿军在朝鲜实行轮番作战的方针，由以杨得志为司令员、李志民为政治委员的第19兵团（辖第63、第64、第65军）、陈赓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第3兵团（辖第12、第15、第60军，陈赓未到

职，由王近山副司令员率领)和在朝鲜休整的第9兵团为第二番作战部队，命令第19、第3兵团于2月中旬和3月中旬先后入朝，准备4月中旬前后接替第一线作战。

为掩护志愿军第二番作战部队开进集结，创造下次战役的有利条件，志愿军和人民军第一线部队以空间换取时间，从南至汉城、横城一线，北至三八线地区，部署三道防线，每道防线纵深20~30公里，采取兵力前轻后重，火力前重后轻的配置，逐山逐水节节抗击，迟滞敌军进攻，顽强防御2个月。至4月21日，将敌军阻止于三八线地区。志愿军第二番作战部队第3、第9、第19兵团到达前线已完成战役展开，第四次战役遂告结束。

此次战役，志愿军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灵活运用坚守阻击、战役反击和运动防御等多种作战方式，同人民军一起共歼敌7.8万余人，圆满完成了防御任务，为后续兵团的开进集结争取了时间。

第五次战役

1951年3月中旬以后，许多迹象表明，美国企图以侧后登陆配合正面进攻占领平壤、元山一线建立新防线，为其尔后进行政治谈判，或继续军事进攻占据有利地位。此时，毛泽东为志愿军确定了“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的方针。为了粉碎美国的登陆企图，志愿军在第二番部队到达前线完成展开后，在人民军配合下，于4月22日黄昏发起了第五次战役。敌军地面部队第一、第二线共17个师又3个旅和1个团，总兵力34万余人。志愿军第一线11个军和炮兵部队等58万余人，人民军3个军团10万余人。

志愿军在西起临津江，东至北汉江地区采取全线突破，两翼向心迂回钳击的战法，迅速突破敌军阵地。担负战役割裂任务的第40军，打破敌军的6次阻击，突进敌军纵深30余公里，按时插到汉江北岸的加平地区，割断了敌军的東西联系，第39军在第40军以东牵制了当面美军。担任左翼钳击任务的第9兵团3个军予当面美第24师和南朝鲜第6师以打击，向纵深发展较为顺利。担负中央突击的第3兵团3个军，突破后也予当面美第3师和土耳其旅以打击，向纵深发展。担负右翼钳击任务的第19兵团，突破后其第63军发展较为顺利，歼灭英第29旅和南朝鲜第1师4000余人，其中包括在第65军一部的配合下全歼英第29旅1个营；第64军突破后受阻于临津江南岸地区，未能完成向汉城以北议政府的战役迂回任务，该军先遣支队勇猛穿插至议政府以西的道峰山，威胁了敌军侧后。但整个作战未能按预定计划对敌形成包围，战役形成了平推，各军在向纵深发展过程中，曾包围敌军营团部队10股之多，但因包围兵力单薄、攻击火力弱等原因，也大部被其逃脱。战至28日，志愿军连续突破敌军两道防线，敌军撤至汉城及东西一线组成防御，志愿军遂停止了攻击，歼敌2.3万余人。

此时，战线形成了由西南而东北的斜线态势，东线敌军突出，并且都是南朝鲜军。彭德怀抓住这一战机，采取“瞒天过海、声东击西”的战术，以第19兵团3个军和人民军第1军团在汉城以北和汉江北岸积极佯动，造成攻击汉城的假象，迷惑牵制西线美军，而以第3、第9兵团在第39军的掩护下隐蔽转移到东线。5月16日，第9兵团指挥第20、第27军和第3兵团第12军，在人民军3个军团的配合下，采取多路突破，多层迂回包围的战法，对县里地区的南朝鲜军突然发起了攻击。至17日晨，第20军和人民军第5

军团已对县里地区的南朝鲜第 3、第 9 师形成包围，第 27 军插至具里西南的上南里地区，截断了县里之敌的退路，并会同第 20 军 1 个师包围歼灭南朝鲜第 5、第 7 师共 5 个营 3000 余人，担负外层迂回的第 12 军也歼灭南朝鲜第 5 师一部。南朝鲜军 4 个师立即土崩瓦解，战到 21 日，志愿军和人民军将敌军这 4 个师大部歼灭，并歼美第 2 师 2 个营和法国营大部，缴获大批装备和物资。第二阶段作战，志愿军和人民军又歼敌 2.3 万余人。

至此，在一个月內，志愿军连打两仗，部队很疲劳，加之粮弹补给困难，遂于第二阶段作战结束后，22 日开始，主力向三八线以北地区转移休整，寻机再战，志愿军首长命令各兵团留 1 个军或 1 个师在第一线展开，以运动防御方式节节阻击敌军，掩护主力转移。志愿军主力刚刚撤出第一线转移，留下掩护的部队尚未全部展开，敌军即集中全力，采取“磁性战术”，由西而东逐次展开全线反扑，以坦克、炮兵、摩托化步兵组成特遣队沿公路向志愿军纵深猛插，并配合以空降，抢占要点，封锁中朝军队北移道路。志愿军和人民军对敌军突如其来的猛烈反扑，估计不足，缺乏周密的准备和部署，一度陷入被动，致使志愿军第 180 师遭受严重损失。为稳定形势，27 日，志愿军和人民军令各部停止休整，全线展开阻击，6 月 1 日，又作了纵深阻击部署。至 6 月 10 日，将战线稳定于三八线南北地区，敌军转入防御，第五次战役遂告结束。志愿军和人民军在转移和阻击阶段又歼敌 3.6 万余人。

此次战役，志愿军和人民军连续奋战 50 余天，共歼敌 8.2 万余人，粉碎了敌人在平壤、元山一线建立新防线的企图，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地区，迫使敌人转入战略防御，并接受停战谈判。

三、以打促谈，迫使美国签字停战

“联合国军”在中朝人民军队连续打击下，美国虽然被迫接受停战谈判，但不愿公平合理地解决朝鲜问题，致使谈判一开始就举步维艰。中国人民志愿军采取“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作战与谈判紧密配合，以阵地战为主要作战形式，创造性地解决了物资运输补给和坚守防御的问题，越战越强，越战越主动，同朝鲜人民军一起，经过两年零一个月的边打边谈，终于迫使美国签订停战协定，胜利实现朝鲜停战。这期间的作战特点是：打谈结合，战线稳定，依托阵地进行攻防，作战规模由小到大，小规模战术性作战较多，比较充分地发挥了炮兵的作用，步兵、炮兵、坦克联合作战，空军参加了掩护后方的作战。

边打边谈方针的确定

朝鲜战争进行到 1951 年夏季，双方都进行了战略调整。

经过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以后连续五次战役的反复较量，美国当局已经看到，尽管在朝鲜战场上美国具有强大的海军和空军，武器装备占有巨大的优势，但是依靠战场上的现有兵力，无论如何也难以再打到鸭绿江边，并且自 1951 年初退至三七线以后，每向北推进一步都付出了重大的伤亡代价。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美国的主要对手是苏联，如果继续增兵在朝鲜打下去，甚至不惜将战争扩大到中国，将是在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同错误的敌人打一场错误的战争。这与以欧洲为重点的战略严重冲突，况且美国已无机动部队可再调往朝鲜，英、法等参加“联合国军”行动的国家已看到美国在朝鲜没有胜利的希望，不愿拴在美国的战车上在朝鲜继续打下去。加之美国士兵和美国人民的强烈反战情绪，这些迫使美国当局不得不重新考虑在朝鲜的政策。1951 年 5 月上半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经过讨论，决定将美国在朝鲜的政治目标与军事目标区分开来，在军事上暂时放弃了占领全朝鲜的企图，而是通过一定规模的军事行动，在三八线地区建立一条分界线，并通过谈判求得“体面”停战。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把“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向北进攻并遭到失败的责任全部推到麦克阿瑟身上，一向主张扩大战争的麦克阿瑟被美国当局于 4 月中旬解除了职务，由李奇微接任“联合国军”总司令，此后，美国通过外交途径向朝中方面表示了通过谈判结束敌对行动的愿望。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没有空军和海军支援配合的情况下，依靠劣势的武器装备，在短短 7 个多月的时间内，连续进行五次战役，同朝鲜人民军一起共歼敌 23.3 万余人，迅速将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经过反复较量，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地区，奠定了抗美援朝战争最后胜利的基础。

志愿军虽然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但由于武器装备落后，作战中遇到的困难也是相当严重的，并且付出了重大伤亡的代价（作战减员 16.5 万余人，另人民军作战减员 2.3 万余人）。没有制空权，昼间没有行动自由，作战和物资运输主要利用夜间进行；攻击火力弱，对包围的美英军难以全歼；运输工

1951 年 5 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莱德雷在参议院关于朝战政策调查会上的证言。

具有限，运输能力弱，在美国空军轰炸封锁下，作战物资的运输补给远不能满足需要，直接影响作战的实施。这些困难，在短时间之内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战争的长期性已十分明显。同时，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是中国人民的一贯主张。此时美国已调整了朝战政策，放弃了以军事手段占领全朝鲜的企图，做出了愿沿三八线一带谈判停战的表示。如果能通过和谈解决朝鲜问题，对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是有利的。通过谈判解决朝鲜问题的基础和可能性已经具备。

在这种情况下，6月，毛泽东主席与金日成首相商谈，为志愿军确定了“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总方针，即边打边谈，求得朝鲜问题公平合理的解决，在军事上则确定了“持久作战、积极防御”和作战“与谈判的要求相配合，相适应”的方针，并根据运动战阶段的作战情况，确定了对美英军实行战术的小包围，打小歼灭战，逐步向打大歼灭战过渡的作战原则。

据此，志愿军做了持久作战和谈判的动员及各种准备。6月，中央军委任命陈赓、宋时轮为志愿军第二、第三副司令员，甘泗淇为志愿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加强了志愿军的领导，并调杨成武为司令员的第20兵团（辖第67、第68军）入朝。

经过战场上敌对双方的联络协商，1951年7月10日，在开城开始了停战谈判。从此，朝鲜战争开始出现了旷日持久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交织进行的边打边谈的局面。

关于军事分界线的谈判和作战

美国虽然在战争中遭到了失败，被迫谋求和谈，但仍表现出侵略者狂傲的姿态，使谈判的进行十分艰难。正如彭德怀说过的：“朝鲜停战谈判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停战谈判。它既不是帝国主义者征服了别的国家、强迫别国接受投降条件的停战谈判，也不是帝国主义国家间争夺火并、相持不决，只好以妥协瓜分殖民地谋得短暂和平的停战谈判，而是一个妄图独霸世界的帝国主义者，在侵略战争中遭受到年轻的新兴的人民民主国家的反抗并遏制之后，不得不罢手而勉强接受的停战谈判。很显然，帝国主义者对于这样的谈判是不会甘心情愿地接受的，他无时无刻不在力图翻案。”

停战谈判开始后，美方代表团蛮横无理、横生枝节。朝中代表团表现了极大的克制和耐心。历经半个月的舌战，才以朝中代表团所提方案为基础达成关于谈判议程的协议。谈判议程包括：1. 通过议程；2. 确定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区；3. 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4. 关于俘虏的安排；5. 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

从7月26日开始，双方进入关于军事分界线问题的实质性的谈判。本来就没有多少减意的美方代表团，不但坚决拒绝朝中方面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合理建议，而且狂妄地炫耀其海空军“优势”，无理要求这种优势要在军事分界线的确定上得到“补偿”。美方代表团还标定了一份他们所要求的军事分界线的地图，将军事分界线划在了志愿军和人民军战线后方数十公里的地区。按照他们所划的军事分界线，志愿军和人民军将从当时的双方实际

接触线退出 1.2 万平方公里的地区。为达到这种企图，美方代表百般狡赖，并提出荒唐可笑的理由支持他们的主张。

朝中代表团针锋相对地严词驳斥了美方代表团的无理要求。美方代表团理屈词穷，便发出用飞机大炮辩论的叫嚣。从 8 月 18 日开始至 10 月下旬止，“联合国军”连续发动了夏、秋季同部攻势，并以空军发动了大规模的“绞杀战”，企图以空中轰炸和地面进攻，迫使朝中方面接受其谈判中的无理要求。美方还在开城谈判区连续制造事端，致使停战谈判于 8 月 23 日被迫中断。

对于“联合国军”发动军事进攻，志愿军早有估计和防备，早在停战谈判开始前的 7 月初，毛泽东就指示彭德怀：必须“极力提高警惕。我第一线各军，必须准备对付在谈判前及谈判期内敌军可能对我来一次大的攻击，在后方，则举行大规模的空炸，以期迫我订立城下之盟。如遇敌军大举进攻时，我军必须大举反攻，将其打败。”彭德怀据此作了部署和准备。

“联合国军”首先集中美军和南朝鲜军 7 个师的各一部，对朝鲜人民军防守的北汉江至东海岸 80 公里的地段发动攻击。朝鲜人民军依托野战工事，在雨季洪水危害、粮弹运输补给极为困难的情况下，顽强阻击，予敌以重大杀伤。志愿军为配合人民军作战，打击敌人，前推接触线，以第一线 6 个军中的 5 个军于 9 月上旬进行了战术反击，歼敌数千人，占领几个战术要点，改善了局部地区的防御态势。战至 9 月 18 日，“联合国军”被迫停止进攻，付出 7.8 万余人的伤亡代价，仅将阵地向北推进 2~8 公里。

“联合国军”的夏季攻势未能达到目的，经过准备后，于 9 月 29 日又以志愿军防守的阵地为目标，发动了秋季攻势。先后以美英军 3 个师对志愿军第 47、第 64 军防守的临津江东西地区，以美军、南朝鲜军各 3 个师对第 68、第 67 军防守的北汉江东西地区发动了攻击，在大量飞机、坦克和大炮的支援下，猛烈轰击志愿军阵地。志愿军实行带有坚守性质的防御，利用山地有利地形和掩盖工事，顽强抗击，同敌反复争夺，大量歼灭了敌人。第 67、第 68 军辽集中反坦克武器，组织专门的反坦克分队，结合构筑反坦克阵地，出色地组织了反坦克作战，共击毁击伤敌军坦克 83 辆，为志愿军打击敌军集群坦克的进攻创造了经验。战至 10 月 22 日，“联合国军”被迫停止进攻，付出 7.9 万余人的伤亡，仅向北推进阵地 6~9 公里。

“联合国军”连续两个多月的进攻，付出 15.7 万余人的伤亡代价，仅占去阵地 640 余平方公里。这种得不偿失的进攻遭到美国国会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责。

美方代表团在谈判桌上没有得到的东西，美军在战场上以飞机大炮进行两个多月的“辩论”，并且付出了惨重的伤亡，同样未能得到。于是美方代表团不得不回到谈判桌上来继续谈判。

10 月 25 日，停战谈判在新会址板门店复会，美方代表团的狂傲态度有所收敛，但在其所提出的关于军事分界线的新方案中，仍无理要求志愿军和人民军退出包括开城在内的 1500 平方公里的地区。朝中代表团对此进行了严词驳斥。与此同时，志愿军为了粉碎敌人的企图，收回一些放弃的阵地，显示力量，以促进停战谈判，以第一线之第 64、第 47、第 42、第 26、第 67（后为第 12 军接替）、第 68 军，举行了局部战术反击。从 10 月底至 11 月底，对敌军营以下兵力防守的突出的暴露的共 26 个阵地，攻击 34 次，攻克 21

处，经反复争夺后，巩固占领阵地 9 处，共歼敌 1 万余人。其中第 47、第 64 两军创造了阵地进攻战中，一次全歼美军或英军 1 个营的范例。

第 65 军为保卫开城，在开城南、汉江以北地区进行两次扫荡作战，收复土地 280 余平方公里。位于西海岸的第 50 军在空军的直接支援配合下，连续组织四次渡海作战，攻占大和岛等 10 余个岛屿（这是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中惟一的一次陆空协同作战）。人民军海防部队 2 个旅也收复大同江口等处数个岛屿。

这些作战有力地促进了谈判，美方代表团被迫放弃了关于军事分界线问题的无理要求，接受了朝中代表团于 11 月上旬提出的以双方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并由此线各后撤 2 公里作为非军事区的建议。

从 7 月 26 日至 11 月 27 日，历经 4 个月的边打边谈，谈判双方才达成关于军事分界线的协议，并校订了双方实际接触线。但美方提出并坚持在协议中写明，自本协议签字之日起，30 天以内实现停战，则本协议签字时校订的军事分界线有效，30 天以后实现停战，届时则重新校订军事分界线，仍迷信其依靠优势的武器装备在 30 天以后会得到便宜。

粉碎美军的“绞杀战”和细菌战

“联合国军”为了在谈判中对朝中方面施加压力，于 1951 年 8 月 18 日以地面部队发动夏季攻势的同时，集中其 80% 的作战飞机，以破坏朝鲜北方铁路系统为主要目标，发动了大规模的“绞杀战”，于 1952 年 1 月开始，违反国际公法，不顾人道主义，又秘密在朝鲜北方和中国东北的部分地区实施了细菌战。中朝两国军民在中朝两党两国政府的领导下，展开了反“绞杀战”和反细菌战的斗争。

美军具有强大的空军力量，侵朝以来，一直把轰炸朝鲜北方的重要设施和交通运输系统作为其战略上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配合停战谈判，乘 1951 年 7 至 8 月间朝鲜暴发了 40 年来罕见的特大洪水之际，发动了“绞杀战”，企图瘫痪朝鲜北方的运输系统，窒息志愿军和人民军前线部队。美国空军每日出动数百架次战斗轰炸机，分区分段对朝鲜北方铁路进行毁灭性的轰炸，以战略轰炸机重点轰炸平壤以北的几座主要铁路桥梁，以轻轰炸机执行巡逻任务，追打公路、铁路运输车辆。其轰炸的重点是朝鲜北方的铁路咽喉——平壤、安州、价川间的三角地区铁路。据志愿军铁路运输司令部统计，9 至 12 月，美军轰炸这一地区共出动飞机 2.1184 万架次，投掷炸弹 6.3515 万枚，破坏铁路和车站 5618 处次，破坏桥梁 288 座次。这一地区的铁路总长 180 公里，仅占当时志愿军和人民军管区铁路总长 960 公里的 1/5，但这期间遭破坏的数量却占管区被破坏总数的 50% 以上。致使这一地区铁路在 4 个月内 80% 的时间不能通车，使志愿军本来就极为困难的物资运输更是雪上加霜。这期间最困难的时候，在二线的部队和机关每天只吃半斤粮食，以野菜充饥，保证第一线部队的需要。

1952 年 1 至 6 月，美国空军又采取机动重点突击的战术，寻找志愿军高炮火力比较薄弱的铁路地段进行轰炸。

为了粉碎美军的“绞杀战”，中央军委决定志愿军空军出动作战，重点掩护平壤以北地区铁路运输。年轻的志愿军空军以中国辽东地区的机场为基地，在刘震司令员指挥下，经过实战练习后，采取以师为单位轮番作战的方

针，于9月下旬出动作战，先后出动9个师共450架飞机投入反“绞杀战”斗争。在整个反“绞杀战”的作战中，志愿军空军共击落击伤敌机140余架，与苏联空军一部共同夺取了清川江以北地区局部时间内的制主权，建立了“米格走廊”。

志愿军总部动员在朝鲜境内的后方部队全力保障交通运输，为统一协调指挥这些部队的反“绞杀战”斗争，成立了以刘居英为司令员的前方运输司令部。

从1951年8月底起，陆续集中了在朝鲜的70%的高炮部队共3个师又数十团和数个独立营，投入了反“绞杀战”斗争，并以高炮第64师司令部为基础，组成了统一的高炮指挥机构。高炮部队针对美军的轰炸特点，先是采取了集中兵力、重点保卫的方针，重点在平壤、安州、价川三角地区打击敌机。

1952年上半年，又采取重点保卫、高度机动的作战方针，减少了铁路沿线对空火力的空白区，使敌机在朝鲜北方铁路沿线处处受到高射炮火的威胁。整个反“绞杀战”期间，志愿军高炮部队共击落敌机260余架，击伤1070余架。志愿军铁道抢修部队4个师1个团和1个铁路援朝大队，在志愿军铁道兵团的指挥下，根据敌机轰炸特点，先是采取以集中对集中的方针，集中2个多师的兵力重点抢修三角地区铁路，后又采取以机动对机动的方针，除保证三角地区的抢修外，以适当机动兵力对其他地区随炸随修，并采取许多创造性措施，提高抢修速度和抢修质量，争取铁路多通车。为了保证朝鲜境内的铁路抢修，中国政府还将从苏联订购的准备用于修建黄河大桥的一批桥梁材料运入朝鲜。志愿军铁路运输部队，根据军委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改变物资包装办法，多用大型车辆，并增载1/3，重点保证粮食和服装的运输，根据各段铁路通车状况不同，采取了分段倒运（在铁路被毁地段由汽车运输相衔接）、顶牛过江（在紧急抢修不负重压的桥梁地段，以机车将车皮顶过桥，而机车不上桥）等措施，抢运物资。

与此同时，志愿军组织工兵部队及在二线和在后方休整的各军和各兵团直属队，全面加宽加固了公路，并新修公路300余公里，改善了公路状况。还以1个多师和志愿军后勤警卫部队在主要公路沿线设置了防空哨，为公路上通行的车辆防空报警，打击低飞的敌机和指挥交通，从而减少了车辆损失，提高了运输效率。

经过志愿军后方各军兵种的协同奋战，至1952年6月，终于彻底粉碎了美军的“绞杀战”，并且建成了由防空、抢修、抢运相结合，铁路运输和公路运输相结合的钢铁运输线，从而基本解决了物资运输问题。

1952年1月，美军在进行“绞杀战”的同时，对朝鲜北方和中国东北的部分地区秘密实施了细菌战，以造成疫区，残害中朝人民，削弱中朝军事力量。

中朝两国政府在判明美国确系实施细菌战之后，分别发表声明，抗议美国细菌战的罪行，利用新闻工具，揭露美国实施细菌战的真相。“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和中国抗美援朝总会组织的“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进行了現地调查，公布了调查报告书。新华社陆续公布了执行过细菌战任务的25名被俘美军飞行员的供词，使美国细菌战的罪行昭示在世人面前，遭到国际舆论的谴责。

与此同时，在战场上采取有力措施展开了全面的反细菌战防疫治疗工作。中国政府紧急向前方运送了大批药品和器材，供志愿军和朝鲜军民使用，派出防疫治疗队和专家检验队，协助前方防疫治病。志愿军各部队明确了责任，在各自作战区和驻防区内及时发现扑灭美军布撒的各种带有病菌病毒的媒介物，及时消毒，还展开了清理驻区卫生运动。采取这些措施，迅速控制了疫情的发展。

至 1952 年冬，反细菌战斗争告一段落，美国的细菌战不但未能达到军事上的目的，而且在政治上、道义上也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巩固战线，掌握战场主动权

在停战谈判达成关于军事分界线的协议后，志愿军能不能坚守阵地、巩固战线，能不能在作战中夺取和巩固地占领阵地，已具有战略上的意义，同政治需要紧密相连。

1951 年秋，根据战争形势的需要，毛泽东指示志愿军：“节约人力、物力和财力，采取持久的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坚守现在战线，大量消耗敌人，以争取战争的胜利结束。”根据这一指示，志愿军进行了精简整编，节约了人力和开支，并从 1951 年底起。在全线创造性地展开了构筑以坑道为骨干的坚固阵地活动。至 1952 年 8 月底，志愿军和人民军在正面 250 公里，纵深 10~20 公里的地区，基本形成了以坑道为骨干与各种野战工事相结合的支撑点式的坚固防御阵地体系，有了可靠的阵地依托，可攻可守，巩固了战线。

在构筑坑道工事的同时，从 1952 年 3 月底起，志愿军采取战术上积极活动的方针，不放过任何有利时机，歼击运动的、暴露的敌人，相机挤占阵地，使敌人处于一种防我进攻的紧张状态之下。至 5 月，停战谈判各项议程，除战俘问题外，其余均已达成协议。在战俘问题上由于美方代表顽固坚持所谓“自愿遣返”原则，企图强迫扣留朝中方面被俘人员，而使谈判陷入僵局。志愿军为了配合谈判，随着第一线阵地日益巩固，这种挤占阵地的作战活动在全线普遍展开。5 至 8 月，第一线各军共挤占敌我中间地带和敌军突出的连排阵地 20 余处，扩展阵地面积 30 余平方公里，将斗争的焦点推向敌军阵地前沿。

志愿军还从 1952 年 1 月开始指示第一线各军，组织优秀射手，神出鬼没地展开了冷枪冷炮歼敌的狙击活动，歼击暴露在阵地前的敌军。仅 5~8 月，志愿军和人民军即狙击歼敌 1.3 万余人，有效地打击和杀伤了敌军，吓得敌军昼间不敢在前沿阵地活动，被迫龟缩在工事内。

4 月初，彭德怀在中央的一再催促下回国治病，7 月中央决定由他接替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仍兼志愿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中央军委任命邓华为代司令员代政治委员，主持志愿军的全面工作，任命杨得志为志愿军副司令员协助邓华工作。在邓华、杨得志的组织指挥下，以第 12、第 39、第 68 军为主，第一线志愿军 7 个军和人民军 2 个军团，从 9 月 18 日开始，进行了全线战术反击作战。至 10 月 31 日，共对敌军营以下兵力防守的 60 个阵地攻击 77 次（其中人民军对 3 个阵地攻击 3 次），攻克 53 个阵地，均全歼守敌。对于攻克后的阵地，不利于防守的立即放弃；可以争取的，进行反复争夺，大量杀伤敌军后视情况放弃或固守；可以固守的，坚决固守，打退敌军反扑。不但攻击连连得手，而且将攻克后是否弃守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

手中，打得敌军 8 个师频繁调动，疲于奔命，处处被动。整个战术反击作战，共歼敌 2.7 万余人，经过反复争夺后，巩固占领 17 个阵地。这次作战同以往作战相比，志愿军在使用兵力、火力的构成上有了很大的变化，一般攻击敌军 1 个连，使用步兵 1 个连，而支援炮兵则达 8~10 个连，人炮 30~40 门，炮兵火力有了大大加强。这是志愿军所以在反击作战中取胜的重要因素，毛泽东在 12 月的一个文件里指出：“今年秋季作战，我取得如此胜利，除由于官兵勇敢、工事坚固，指挥得当、供应不缺外，炮火的猛烈和射击的准确实为致胜的要素。”毛泽东对战术反击作战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此种作战方法，继续实行下去，必能制敌死命，必能迫使敌人采取妥协办法结束朝鲜战争。”

经过 1952 年春季以来志愿军在战术上的积极打击，敌军在战场上已处于不利地位。战后美国和韩国编写的战史中都写道：到 1952 年 10 月初，“共产党已越来越明显地掌握了地面作战的主动权。”“前线作战的主动权转移到敌人手里。”

此时的“联合国军”地面部队指挥官、美第 8 集团军司令詹姆斯·范佛里特，为了改变这种不利的战场局面，并对志愿军的战术反击作战进行报复，经报请“联合国军”总司令马克·克拉克（1952 年 5 月接替李奇微）批准，于 10 月 14 日对志愿军第 15 军两个连防守的上甘岭以南 597.9 高地和 537.7 北山阵地发动了攻击，即所谓“金化攻势”。美方代表团并在此前的 10 月 8 日，单方面宣布了停战谈判无限期休会。范佛里特对志愿军这两个不足 4 平方公里的阵地，先后投入 3 个多师 6 万余人的兵力，300 余门大炮，近 200 辆坦克，3000 余架次飞机，连续攻击 40 余天，投掷炸弹 5000 余枚，发射炮弹 190 余万发，将阵地土石炸松 2 米，仍未能攻克。志愿军也先后投入第 15、第 12 军共 3 个多师 4 万余人的兵力，140 余门火炮，依托坑道工事与敌军展开激烈争夺，虽然表面阵地工事几次被敌军占领，但最终将敌军全部赶出阵地。战至 11 月 25 日，敌军被迫停止了攻击，志愿军共歼敌 2.5 万余人，阵地岿然不动，创造了坚守防御的范例。

至此，志愿军已完全掌握了正面战场的主动权。尽管“联合国军”具有现代化的武器装备，但是“铁多气少”，士气低落，在正面战线已是进攻屡屡受挫，防御往往人地两失，完全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境地。

抗美援朝战争发展到这时，正如毛泽东所讲的：“我们方面发生的问题，最初是能不能打，后来是能不能守，再后是能不能保证给养，最后是能不能打破细菌战。这四个问题，一个接着一个，都解决了。我们的军队是越战越强。……美国人攻不动我们的阵地，相反，他们总是被我们吃掉。”

鉴于美军在朝鲜战场上每况愈下的形势，到了 1952 年冬，美国朝野对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均已感到厌倦，迅速结束战争的呼声越来越高。对于刚刚当选为美国第 34 届总统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当局来说，如何结束这场战争，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恢复谈判，公平合理地解决战俘问题，从而同朝中方面达成停战协定；要么继续增兵进行最后军事冒险，以达到所谓“体面”结束战争的目的。而美方尚无恢复谈判的迹象。对于军事冒险，美国决策当局和“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都有考虑，克拉克并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和进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6 卷，324 页。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6 卷，353~354 页。

行了具体准备。

此时，中央军委和志愿军总部判断，由于美军在朝鲜战场上发动正面进攻已没有任何希望，实施的“绞杀战”和细菌战又都未达到目的，进行最后军事冒险就只有实施大规模的侧后登陆进攻。美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和朝鲜战争中都有大规模侧后登陆进攻的经验，志愿军获得的情报表明，美军确有登陆进攻的各种迹象。同时，志愿军侧后的东西海岸一直是防御上的薄弱环节。为了解决这一薄弱环节，粉碎美国的登陆冒险企图，中共中央决定，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进行反登陆作战准备。

12月20日，中共中央给志愿军发出了反登陆作战准备的指示，指出：“美帝国主义采用了很多办法和我们斗争，没有一样不遭到失败。现在剩下从我侧后冒险登陆的一手，它想用这一手来打击我们。只要我们能把它这一手打下去，使它的冒险归于失败，它的最后失败的局面就确定下来了。中央坚决相信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是能够粉碎敌人的冒险计划的。希望同志们小心谨慎，坚忍沉着，动员全力，争取时间，完成一切对敌登陆作战的准备工作，只要准备好了，胜利就是我们的了。”指示强调：“特别注意从目前起到一九五三年四月这一段时间内的准备上作，这是战胜敌人的关键所在。”

据此，志愿军于1952年12月下旬起，协同朝鲜人民军进行了规模巨大的反登陆作战准备。

第一，进一步加强了东西海岸的指挥机构，全面进行了部署调整，重点加强西海岸地区的防御力量，邓华亲自兼任西海岸指挥部司令员，在西海岸部署6个军和人民军1个军团又1个旅，在东海岸部署2个军又1个师和人民军2个军团又2个旅，在正面战线部署10个军和人民军3个军团又2个旅，另有2个军为预备队，还有坦克、炮兵等部队，空军也有10余个师做了准备。

第二，以东西海岸为重点全面加强防御工事，至1953年4月，共挖掘坑道8090余条，总长720余公里，均设置两道防御阵地，连同以前正面战线挖掘的坑道，总长共为1250公里，使正面和东西海岸绵亘1130余公里的马蹄形防线上形成了以坑道和永备工事为骨干的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

第三，进一步改善了朝鲜北方的交通运输网络，大量贮备了作战物资。增调6个铁道兵师新建纵横各一条铁路干线，以1个步兵师和工兵部队新修纵横各4条公路干线，囤积了大量粮食和弹药。

第四，正面战线进行了积极作战活动，有力地配合了侧后的部署调整和工事构筑。

至1953年4月底，志愿军反登陆作战准备工作全部完成，从而消除了后顾之忧，完全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为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胜利铺平了道路。

鉴于此，美国的军事冒险计划只好胎死腹中，一直未敢实施，不得不转而于4月26日同朝中方面恢复了由美方单方面中断6个月之久的停战谈判。

胜利实现停战

停战谈判重新恢复后，志愿军首长判断，此次谈判恢复，使朝鲜战争结束的可能性增大，但美国一些好战分子和南朝鲜李承晚集团仍可能节外生枝，拖延谈判。此时，志愿军已无后顾之忧，可以在战场上放胆作战。为促成朝鲜停战实现，志愿军决定举行夏季反击战役，以打促谈，要求部队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采取“稳扎狠打”，“由小到大”的方针，“不打则已，打则必歼，攻则必克，守则必固。”目的主要是消灭敌人，锻炼部队，吸取经验，以配合谈判，同时注意适当改善现有阵地。

经报请中央军委批准后，从5月13日开始，第20兵团指挥的第60、第67军和第9兵团指挥的第23、第24军，先后对预先选定的敌军连以下兵力防守的阵地发起攻击，至26日，第一阶段作战结束，共对敌军20个阵地攻击29次，全部攻克阵地，全歼守敌，经过反复争夺后，巩固地占领2个阵地，共歼敌4100余人。

由于朝中代表团的努力和志愿军作战的有力配合，至5月25日，美方代表团在俘虏问题上的态度有所转变，接受了朝中代表团提出的新建议，即停战实现后，立即遣返那些要求遣返的战俘，对那些不直接遣返的战俘交由双方协议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接管，安排其遣返。而南朝鲜李承晚集团却极力反对，公开宣称不接受联合国军的新方案，南朝鲜的谈判代表拒绝到会，以示抗议。

志愿军首长鉴于这种形势，为更有力地配合谈判，决定将原定反击战役以打美军为重点改为以打南朝鲜军为重点。于是，第一线部队经过调整和准备后，重点对南朝鲜军发起了攻击，并且作战的规模比第一阶段更大。从5月27日至6月15日，志愿军第19兵团指挥的第46军，第9兵团指挥的第23、第24军，第20兵团指挥的第60、第67军和人民军第3、第7军团等部，共对敌军团以下兵力防守的51个阵地攻击65次，歼敌4.1万余人，扩大阵地面积58平方公里，其中，第60、第67军均创造了阵地战以来一次攻击全歼南朝鲜军1个团的范例，志愿军和人民军的作战，有力地促进了谈判斗争。6月8日，谈判双方正式达成了关于战俘遣返问题的协议。至此，朝鲜停战谈判各项议程均已达成了协议。6月15日，根据双方早已达成的关于军事分界线的协议，重新校订军事分界线的工作业已完成，双方司令官最后签署停战协定的各种准备工作基本就绪。为保持政治上的主动，促进停战实现，志愿军和人民军于16日起停止了第二阶段的攻击。

然而，就在这时，李承晚集团极力阻挠和破坏停战的实现，公然破坏谈判刚刚达成的关于战俘遣返的协议，有组织有计划地于17日深夜至19日，以“就地释放”为名，强迫扣留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2.7万余人。刚刚看到的朝鲜和平的曙光，又罩上了阴影。李承晚集团的破坏行为，遭到了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

6月19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联名致函“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指出了这次事件的严重性质和美方的严重责任，要求美方追回被“释放”亦即被扣留的战俘，做出南朝鲜方面是否能遵守停战协定的保证。为了抗议李承晚集团的破坏行为和等待美方的保证，20日，朝中代表团宣布谈判休会。

为了严惩李承晚的破坏行为，实现有效的停战，已到达平壤准备履行停战协定签字手续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20日致电毛泽东，建议再给李承晚集团以打击，加深敌人内部矛盾，同时指示志愿军进行部署。21日，

毛泽东复电同意彭德怀的建议。

据此，志愿军第一线第 1、第 46、第 23、第 24、第 16、第 60、第 67 军及人民军第 3、第 7 军团，从 6 月 25 日开始，发起了第三阶段的进攻。第 20 兵团首长并计划切掉金城正面敌军的突出部，拉平战线。经志愿军首长批准，于 7 月 13 日起，第 20 兵团指挥第 21、第 60、第 67、第 68、第 54 军，分成 3 个作战集团，在第 9 兵团第 24 军的配合下，发起了金城战役。此次战役，志愿军的兵力以 3：1 占有优势，地面火炮以 1.7：1 占有优势，1000 余门火炮参战，发射炮弹相当于第一至第五次战役发射炮弹总量的 2.2 倍，共 1.9 万余吨。7 月 13 日当夜一次齐射即发射炮弹 1900 吨，志愿军一举突破金城以南南朝鲜军 4 个师防守的正面 25 公里的坚固阵地，经过一昼夜作战，拉平了战线，全部实现了战役第一步目标，尔后继续向纵深发展，突进纵深最远达 18 公里。至 27 日，战役结束，歼南朝鲜军 4 个师大部，共 5.3 万余人，扩大阵地面积 160 余平方公里。毛泽东讲到金城战役时说：“如果照这样打下去，再打它两次、三次、四次，敌人的整个战线就会被打破。”

整个第三阶段进攻作战，志愿军和人民军共歼敌 7.8 万余人，扩展阵地 178 平方公里，加深了敌人内部矛盾，有力地惩罚了李承晚集团。

在志愿军第三阶段进攻的打击下，美国一方面对李承晚集团施加了压力，迫使李承晚做出了不再对停战实现进行破坏的保证，另一方面，“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也不得不做出服软的表示，对朝中方面提出的问题做出了保证。7 月 10 日，谈判复会后，美方代表团对朝中方面提出的问题又一一做出答复和保证。7 月 20 日后，双方再一次校订了军事分界线，同 1951 年 11 月 27 日相比，志愿军和人民军净向南推进阵地 332.6 平方公里。至此，美方已没有什么“体面”可言了，但也不得不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1953 年 7 月 27 日，双方签订了停战协定，朝鲜停战实现，中国人民两年零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到此胜利结束。

此后，志愿军又参加了维护停战协定的斗争和帮助朝鲜人民恢复家园的工作，1958 年 10 月全部撤出朝鲜回国。

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国人民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被迫进行的一场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依靠劣势武器装备同朝鲜人民军一起，将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并迫使美国签字停战，取得了战争的伟大胜利。从 1950 年 6 月朝鲜战争爆发算起，在三年零一个月的朝鲜战争期间，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共毙伤俘敌 109 万余人（美国 and 韩国官方公布的各自作战减员之和即为 113 万余人）。其中志愿军在两年零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共毙伤俘敌 71 万余人，自身作战减员 36.6 万余人，共击毁和缴获飞机 4268 架、坦克 1492 辆，装甲车 92 辆、汽车 7949 辆，缴获（不含击毁）各种炮 4037 门、各种枪 7.3263 万枝。志愿军损失飞机 231 架、坦克 9 辆、汽车 6060 辆，各种炮 4371 门（含被击毁）、各种枪 3.7557 万枝（含被击毁）。美国开支战费 400 亿美元，消耗作战物资 7300 余万吨。中国开支战费 62.5 亿元人民币、消耗作战物资 560 余万吨。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无论对朝鲜、对中国、对东方，乃至对于整个世界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抗美援朝战争，有力地打击了美国的侵略气焰，保卫了中国的安全，援助了朝鲜人民，极大地提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

和国际威望，提供了现代条件下依靠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敌军的宝贵经验。这场战争是现代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是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现代化程度最高的一场战争。经过这场战争，使人民解放军作战观念发生了许多重要转变，主要是：由单一步兵作战向现代多军兵种联合作战的转变；由地面作战向现代立体作战的转变；由主要实行运动战向既注重运动战又注重阵地战的转变；由单纯前方作战向现代前后方全面作战的转变；后勤保障由“小米加步枪、仓库在前方”向组织现代后勤保障的转变等等，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军事学术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 50 年代我国的军事变革。

抗美援朝战争之所以能取得胜利，主要是：

1. 以毛泽东为主席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实施了正确的战争指导。主要表现在：（1）高瞻远瞩，以敏锐的洞察力正确判断形势，及时组建了东北边防军，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预有防范准备。（2）在朝鲜处境危急，美军侵入我国领土台湾，中国大陆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关键时刻，勇敢地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战略决策，并确定了“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的战争指导路线。（3）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适时调整战略指导方针和战场作战方针。（4）边打边建，根据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加强经济建设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尤其加强空军、炮兵（含高射炮兵）、装甲兵和后勤建设，提高志愿军的现代作战能力和后勤保障能力。

由于这场战争有许多不同于我军以往战争的新特点、新情况，所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这场战争的战略指导上也有许多新特点，如：以志愿军而不是以国家的名义参战，力争将战场限制在朝鲜境内；从战略的高度上指导每一次战役或战役性的行动；在作战中既注重歼敌又注重占地（前期更注重歼敌，占地的目的是为了更有效的歼敌，总体目的都是为了改变战场态势；在后期作战的目的是为了巩固战线，更加注重占地，歼敌在更大程度上是为了占地）；军事斗争同政治、外交斗争紧密配合，孤立和打击主要敌人；创造了人民战争的新形式，依靠国家政权的力量动员和组织全国人民全力支援战争等等。

2. 实行灵活的作战指导。抗美援朝战争无论从战场地理条件、作战对象或是从现代化程度来说，对志愿军都是一场全新的战争。志愿军在作战中，针对敌我双方特点，在灵活运用传统战略战术的基础上，还有许多新的创造，丰富、发展了我军作战理论，诸如：发挥兵力优势，实行轮番作战；充分利用夜间争取行动自由，创造了一套有效的夜战战术；抓住美军现代化装备对后方和道路依赖性大的致命弱点，大胆实施迂回包围战术，切断敌军后路；对美英军实施“零敲牛皮糖”、积小胜为大胜，打小歼灭战的方针；在坚守防御中构筑以坑道为骨干的坚固防御体系，创造了一套依托坑道进行攻防作战的战术；采取一切可行手段组织防空防御和保证物资运输。等等。

3. 发挥政治优势。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军队保持旺盛斗志，克服困难，克敌制胜的法宝。针对抗美援朝战争的特点，志愿军普遍深入地进行了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为中心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进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开展立功运动；严格执行政治纪律和军事纪律，取得朝鲜人民的拥护和爱戴等等。充分发挥了我军的政治优势。

4. 依靠中朝两国人民的支援，实行人民战争。在中国共产党和各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团结一心，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中国政府在财政方针上把保证战争的胜利摆在第一位，并尽所能调拨器材、物资、

车辆等保证前方作战需要。动员和号召中国各族人民踊跃参军、参战、支前；增加生产，厉行节约，捐款支援志愿军改善武器装备；组织慰问，优待烈军属，把志愿军称为“最可爱的人”等等。朝鲜人民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也为志愿军作战提供了最大的支援。这些力志愿军取得胜利提供了巨大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动力。

归结起来，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我们的经验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

第六章 向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迈进

一、军队建设总方针、总任务的确立

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即着手进行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由于国家正处在经济恢复时期，并正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虽然贯彻“边打边建”的方针，但受各方面条件的限制，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未能全面展开。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际上，美帝国主义由于侵朝战争的失败，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短期内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中国进行和平建设的外部环境有了保证。在国内，经济恢复已经完成，社会秩序基本稳定。人民解放军经过4年的建设，在步兵的基础上，建设了空军、海军和各特种兵部队，武器装备得到了改善。从1953年起，中国共产党制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并开始执行国民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全国将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发展时期。这些为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要求人民解放军必须抓紧有利时机，在现有基础上，有步骤地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以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保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防御帝国主义的侵略。

在这种形势下，中央军委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于1953年12月7日至1954年1月26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军委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种、兵种和各直属院校的主要领导共123人参加了会议。会上军委副主席朱德致开幕词和闭幕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彭德怀代表中央军委作了《四年来的军事工作总结和今后军事建设上的几个基本问题》的报告和会议总结；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副总参谋长张宗逊、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总干部部副部长赖传珠分别就组织编制、军训工作、政治工作、干部工作作了报告。刘伯承、贺龙、陈毅、叶剑英作了重要发言。

会议以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为指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4年来的军事工作进行全面检查和总结，对人民解放军全面建设进行总体规划 and 部署，并研究和解决当前军队建设工作中必须解决的若干重大问题，经与会同志充分的讨论和研究，统一了思想，统一了认识，并对军队建设的重大问题作出了决策。

1. 明确了军队建设的总方针和总任务。会议根据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要求和毛泽东关于军队建设的方针与指示，明确规定把建设一支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以保卫社会主义建设，防御帝国主义侵略作为军队建设的总方针、总任务。从而使人民解放军的建设有了宏伟的长期的奋斗目标和方向。

2. 规划了国防现代化建设蓝图。会议根据需求和可能，确定国防现代化的第一步，到1957年底，武装力量除在现有基础上继续提高质量外，在装备上，在干部培养和技术兵员训练上，都要达到一个相应的规模；用5到10年时间，逐步达到武器装备现代化，编制体制合理化，军事制度和军事训练正规化。

3. 解决了军队现代化建设中若干重大问题。

(1) 明确了建设现代化军队的道路。现代化的军队必须有现代化的技术装备和现代化的交通及交通工具。这些不是单靠国外定货所能解决的，必须建设国家自己的工业，特别是重工业。而发展重工业，又需要大量的投资。不愿意紧缩开支，要大量挤出钱来是不可能的。会议确定减少军队总定额，减少国外定货，选择重点建设，以便挤出钱来，发展工业，打下国防现代化的工业基础。从而明确了建设现代化军队应走的道路。

(2) 明确了现代化军队建设中长期的、经常的中心工作是训练部队，特别是训练干部。会议确定部队训练要按军事、政治、文化教育 6:2:2 的比例进行，按时完成各种训练计划。训练干部的工作是建设现代化军队的中心工作的中心。今后培养干部的方法，主要依靠办好院校，同时抓紧组织广大干部的在职训练。

(3) 明确了正规化是建设现代化军队不可缺少的基本条件。正规化就是要全军做到“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和与此相适应的高度的“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会议确定在编制上达到定额、定型、定员；在制度上根据目前的情况和今后的需要进行改革和确立，用义务兵役制代替志愿兵役制，用薪金制代替供给制，颁布军官服役条例，实行军衔制等统一的制度；在工作作风上要加强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改变不适合军队现代化要求的工作作风和习惯。

(4) 明确了加强各级司令机关和后勤建设是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环节。会议认为，组织现代战争，指挥诸兵种合成军队的战役和战斗，如果没有健全的、有能力的、具有头脑作用的司令机关，没有后方充分的物资保证，是不可能进行的。会议要求选择优秀干部充实司令机关，实行指挥与参谋人员的轮换与合一，有计划地组织各级司令机关的干部进行业务学习，以提高全军参谋工作与指挥的质量；要求调配和动员一些精干而有战斗经验的军政干部到后勤学校学习，加强后勤干部的培养，以不断提高后勤业务能力和后勤战术水平。

(5) 进一步明确了加强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是建设现代化军队的根本保证。会议批评了某些削弱党的领导和忽视政治工作的倾向，强调建设现代化的军队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会议指出，为完成党中央和毛泽东所提出的军队建设任务，必须加强党对军队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切实执行集体统一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必须继续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加强政治工作，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纯洁和巩固部队，保证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及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保证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各项任务的完成。

(6) 进一步明确了如何学习苏军问题。会议针对前几年在学习苏军方面存在的问题，强调指出，苏联军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要建设现代化革命军队，就一定要向苏联军队学习，把苏联建军的一切先进经验都学到手，克服骄傲自满、墨守成规现象。同时，必须创造性地学习，学习苏联的军事科学必须保持和发扬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必须结合人民解放军的特点和战争经验，特别是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防止完全不问实际情况的机械搬用。

会议还就巩固国防和国防建设、军队的编制体制、武器装备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作出相应的决定。

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是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一次划时代的会

议。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人民解放军完成了由革命战争向和平时期的转变，是人民解放军建设由低级阶段走向高级阶段的里程碑。贯彻这次会议精神，人民解放军的建设迅速出现了新局面。

明确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

战略方针是全面计划、部署和指导平时与战时军事力量建设和运用的基本依据。战略方针的制定，不仅关系到国家经济建设的规划和部署，也关系到军队建设和战争准备。在中国革命战争的不同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根据形势的变化，结合战争的实际，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方针，从而指导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军事斗争的总体目标，战略环境，敌我双方主客观因素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民解放军的总任务由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夺取政权，转为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保卫国家领土、主权和安全，防御帝国主义侵略。朝鲜战争结束后，国际形势虽趋向缓和，但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反动势力仍然推行敌视中国的政策，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1955年3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开幕词中指出：“帝国主义势力还是在包围着我们，我们必须准备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今后帝国主义如果发动战争，很可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样，进行突然的袭击。因此，我们在精神和物资上都要有所准备，当着突然事变发生的时候，才不至于措手不及。”防御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完成好人民解放军的总任务，首先就需要解决战略方针问题。

关于反侵略战争的战略方针问题，毛泽东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就已明确过。1955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重申：中国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决不先发制人。

1956年3月6日至15日，中央军委在北京举行扩大会议，着重讨论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会上，国防部长彭德怀代表中央军委作《关于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专题报告，明确系统地阐述了战略方针问题，指出：为了有效地防止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保卫人民革命和国家建设的成果，保卫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应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为了使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得到切实保证，会议还就落实战略方针应采取的作战形式，保持适当的军队员额，以及在作战指导上的要求，作出了规定，并对国防建设中的军队建设和战备工作、动员准备工作、开展军事科学研究工作等问题，作了具体部署。3月23日，中央军委将会议情况向毛泽东主席并中共中央作了书面报告，得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批准，下发全党全军贯彻执行。

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是根据中国所面临的安全环境和军队建设实际而制定的，充分反映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根本政策。彭德怀在阐释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报告中指出：确定军事上的战略方针，必须根据军事服从于政治的原则，必须从中国的根本性质和根本政策来考虑。从国家的性质来说，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是社会主义性质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版，第5册，62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参见《彭德怀传》，第1版，第535页，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

的国家。是不应当对别的国家发动战争的。从中国当前的总任务来说，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努力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因此，是不需要对别的国家发动战争的。从中国处理国际事务的和平外交政策来说，中国主张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主张以著名的五项原则来建立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张以谈判的方式而不是用战争的方式来解决国际间的各种争端。中国的国家性质、任务和外交政策，都很清楚地说明，人民解放军在战争爆发之前的战略方针只应当是防御的。而发动战争，是和中国的国家性质、任务和外交政策根本相违背的。

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要求在战争爆发前，加强战争准备，采取积极措施制止和推迟战争的爆发。当帝国主义不顾一切后果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要能够立即给予有力的还击，并在预定设防地区阻止敌人的进攻，把战局稳定下来，打破敌人速决的企图，迫敌进行持久作战，逐渐剥夺敌人在战略上的主动权，然后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最后彻底打败敌人。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基本内容，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积极防御的思想，从而解决了我国反侵略战争战略指导的基本问题。

积极防御战略方针指出了反侵略战争准备的基点，明确了军队建设的着力点。这一战略方针的明确，有力地指导了军队建设和反侵略战争准备。此后，随着国际形势及战略格局的变化，尽管具体内容有所调整 and 变化，但积极防御作为一个完整的战略方针始终没有变。

参见彭德怀《关于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报告第一部分第2节。

二、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全面展开

从1954年开始，人民解放军依照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确立的军队建设总方针和总任务的要求，全面展开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部队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调整编制体制，加强质量建设

精简整编，改革编制体制，是加强军队质量建设，提高战斗力的重要途径，中央军委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和军队的实际，在50年代中后期，通过精简整编、调整编制体制等措施，探索军队现代化建设道路，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一）领率机关的调整。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国家根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国家机构体制进行了调整，取消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设立的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一届人大一次会议决定，设立国防委员会和国防部，撤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的设置。国家主席毛泽东为国防委员会主席，朱德、彭德怀、林彪、罗荣桓、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程潜、张治中、傅作义、龙云任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委员81人。彭德怀任国防部长，黄克诚、谭政、肖劲光、王树声、肖克、李达、廖汉生任副部长。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成立党的军事委员会的决议》。决议指出：中央政治局认为，必须同过去一样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之下成立一个党的军事委员会，来担负整个军事工作的领导。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和军事委员会有关军事工作的决定，可用军事委员会（简称军委）的名义下达，其需要公开发表的命令和指示则用国务院或国防部的名义下达。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12人组成，毛泽东任主席，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10月31日，黄克诚任中央军委秘书长，肖向荣任副秘书长。1956年11月，增补黄克诚、粟裕、陈赓、谭政、肖劲光、王树声，许光达、肖华、刘亚楼、洪学智为中央军委委员。建立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加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鉴于宪法规定取消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1954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各统率机关，原冠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者，一律改冠“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如“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等。随后，总部领导进行了调整：总参谋长粟裕，副总参谋长张宗逊、李克农、陈赓、王震、许世友、邓华，彭绍辉、张爱萍、杨成武、韩先楚；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副主任谭政、傅钟、肖华、甘泗淇；总干部部部长罗荣桓，副部长宋任穷、赖传珠、徐立清；总后勤部部长兼政治委员黄克诚，副部长洪学智，张令彬，副部长兼副政治委员邱会作。此外，借鉴苏军领导体制，于1954年11月至1955年8月，还先后建立了4个新的总部，即：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军械部，王树声任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负责全军训练工作，刘伯承任部长（未到职，由叶剑英代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负责陆海空三军和后勤财务监察工作，叶剑英任部长；中国人民解

放军总财务部，负责全军财务工作，余秋里任副部长，主持工作。这样，加上人民解放军原有的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干部部、总后勤部，形成了与苏军一致的八总部体制。这一体制有其合理的地方，但分工过细，又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传统和特点不完全适应。鉴于此，1957年对总部体制又进行了调整，将总财务部和总军械部并入总后勤部，总干部部并入总政治部，并撤销了训练总监部和武装力量监察部。这样，又恢复到人民解放军传统的三总部体制。

（二）军区的调整。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根据主要作战对象、作战方向、地形条件、交通状况等因素和减少指挥层次的需要，对军区进行调整。1955年，将原来的6个大军区改划为12个大军区，即沈阳军区（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周桓），北京军区（司令员杨成武、政治委员朱良才）、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第一政治委员谭启龙、第二政治委员王新亭）、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政治委员唐亮）、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政治委员陶铸）、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治委员王任重）、昆明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谢富治）、成都军区（司令员贺炳炎、政治委员李井泉）、兰州军区（司令员张达志、政治委员洗恒汉）、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恩茂）、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政治委员谭冠三）、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乌兰夫）。将原来的四级军区体制调整为大军区、省军区、军分区三级军区体制。大军区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之下，负责领导和指挥本战区内的野战军、省军区和地方武装，并与海、空军领率机关共同领导战区内的海、空军部队。

1956年又增设福州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叶飞），使全国的大军区达到13个。这样调整，便于一旦国家转入战时状态。除成都、武汉军区外，其他大军区可改为该地区方面军指挥机构

（三）军兵种的调整变化。1955年7月公安部队改为公安军，其各级领导机关、各师、市总队和院校的名称也作了相应改变，专区和县两级的公安部队则改编为人民武装警察，交地方公安部门领导和管理。同年8月，防空部队改力防空军，杨成武力防空军司令员。这样，人民解放军就由陆、海、空3个军种变成了陆、海、空、防空、公安5个军种，1957年以后，中央军委鉴于5个军种体制不大适应中国的特点和情况，决定防空军与空军合并，公安军番号撤销，这样又恢复为陆、海、空3个军种。

海军。

1955年8月，华东军区海军更名为海军东海舰队，中南军区海军更名为海军南海舰队。1960年8月，以海军青岛基地为基础，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北海舰队。海军部队建设也有很大发展。到1955年底，海军已经拥有战斗舰艇500余艘、勤务船只300余艘、各种飞机500余架、各种口径岸炮300余门。1954年至1959年，又先后组建了一批鱼雷快艇、扫雷舰、护航舰（护卫舰）、驱潜舰（猎潜舰）、巡逻艇（护卫艇）、雷击舰（驱逐舰）等战斗舰艇大队，同时舰队和基地范围内水面舰艇部队的配套建设也开始进行，组建了辅助舰大队、测量船大队、防救船大队、修接船管理大队和部分辅助船中队、快艇基地等。除水面舰艇部队外，海军的潜艇、航空兵、岸防兵、陆战队等兵种也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了。

1954年6月成立了第一支海军潜艇部队，并建立了潜艇基地，1956年至1959年又有新的发展。到1955年底，海军航空兵已编有水鱼雷轰炸机、歼

击机、混合机和水上飞机等不同机种部队共 6 个航空师，并在大部分沿海地区建成了以岸基航空兵为主的作战指挥体系。1956 年以后，海军航空兵部队转入正常配套建设，逐步健全了舰队航空兵领导体制，发展了歼击机部队，陆续组建了航空兵训练基地和夜航侦察、运输、直升机部队等。至 50 年代末期，基本上建成了一支具备一定规模的多兵种的海军。

空军。空军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到 50 年代中后期，航空兵主要是在原有基础上调整、充实，到 1955 年底。空军装备的飞机已达 4400 余架。1959 年 6 月开始，又分批组建若干夜航独立大队，1957 年 5 月，防空军高射炮兵部队并入空军，成为空军的一个兵种。此时高射炮兵部队已有 11 个师部、36 个团又 4 个营。1958 年 7 月，为打击美国和国民党空军高空侦察机的窜扰，彭德怀提出要建立一定数量的防空导弹部队。中央军委批准空军从所属部队选调人员，组建地空导弹部队，先后组建了 3 个地空导弹营。1959 年 5 月 21 日，又组建了空军地空导弹训练基地。1957 年 4 月 28 日，空军陆战第 1 旅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空降兵师。1957 年，空军和防空军合并时探照灯部队已发展到 6 个团、3 个独立营。同年防空军并入空军后，原防空军的对空情报部队和空军的引导雷达分队合编为雷达兵团，担负对空警戒和保障引导任务。至 50 年代末期，空军已具备了较强的防空作战能力。

从 1954 年至 1957 年，先后建立了铁道兵（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震）、通信兵（主任王净、政治委员朱明）、防化学兵（部长，后改称主任张迺更）领导机关，行使兵种领率机关职能，工兵司令部改称工程兵司令部。加上原有的炮兵、装甲兵、陆军已发展到 6 大兵种。

炮兵。1955 年根据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和新引进远程加农炮的情况，对预备炮兵进行了组织编制调整，将火箭炮兵师撤销，改建为榴弹炮兵师和防坦克炮兵师，组建加农炮兵师。1954 年至 1956 年先后组建炮兵仪器侦察营、炮兵气象站和炮兵校射飞机大队，加强了炮兵特种专业技术分队的建设。同时重视加强队属炮兵建设，增建军属炮兵，改装师属炮兵，充实团营属炮兵。至 50 年代末共组建和装备几十个军属炮兵团和上百个师属炮兵团，统一了压制火炮的品种和型号，形成了步兵团、营、连以迫击炮为主要装备，步兵师以上部队以加农炮、榴弹炮为主要装备的压制火炮装备体制，火力有较大增强。

装甲兵。1955 年 4 月，装甲兵部队编组为坦克师、机械化师、独立坦克团和步兵师属坦克自行火炮团，基本上形成了直属总部和军区建制的独立坦克部队和军以下部队建制的队属坦克部队的体制。

其他兵种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在进入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阶段后，人民解放军按照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确定的精简整编规划和贯彻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在以往精简整编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两次大的精简整编。这两次精简整编的特点，是把着眼点主要放在军队和国防的长远建设方面，立足于加强军队质量建设。

第一次，是从 1954 年 2 月至 1955 年底，全军总员额（包括公安部队）减为 350 万人，精简比例为 21.2%，其中陆军精简比例最大。

第二次，是党的“八大”以后，为贯彻党的“八大”精神，减少军费开支，支援国家经济建设，加强军队质量建设，从 1956 年 11 月到 1958 年底，

全军成建制地集体转业或移交地方的有 1 个军部、46 个师、30 余所医院和 30 余所院校。这次裁减的主要对象是陆军、公安军和各级机关学校及其附属单位和勤务分队。全军总员额降至 240 余万人。这是新中国建立后人民解放军人数最少的时期。军费在国家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也从 1953 年的 34.2% 下降到 1958 年的 12.2%。

经过这两次精简整编，人民解放军海军，空军及陆军特种兵的比重增加，在编制体制和作战指挥上已初步达到了战略合成的要求，各军兵种的比重趋于合理。到 1958 年，空军占全军总人数达 12.2%，海军占 5.8%，炮兵占 4.8%，装甲兵占 2.3%。步兵师的编成内兵种部队人数，1958 年与 1950 年相比，步兵由 61.1% 下降到 42.33%，炮兵由 20.42% 上升到 31.89%，装甲兵达 4.73%，工程兵由 1.62% 上升到 4.36%，防化兵达 1.2%。此时，人民解放军已经成长为一支诸军兵种合成军队，全军数量比以前虽然大大减少，但质量却有了很大的提高。同时，减少了军费，有力地支援了国家经济建设。

此外，中央军委根据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需要，从 1954 年开始，对全军院校进行了调整，撤销了大部分文化学校，建立了政治学院、高等军事学院和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等军兵种的高等学校。人民解放军的院校教育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培养了一大批具有现代战争知识的军政干部和专业技术干部。由于现代军事技术的发展，大量毁灭性的武器如核武器、化学武器、细菌武器和导弹等的应用，引起军事领域的一系列变革。为了适应人民解放军建设事业的发展，适应未来战争的需要，中央军委领导提出了积极地有计划地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军事科学研究工作的任务。经过筹建，1958 年 3 月 15 日军事科学院正式成立，叶剑英任院长兼政治委员。军事科学院是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下的全军军事科学研究中心，全军军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计划协调机构，其主要任务是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总结建军和作战经验、探讨未来反侵略战争的规律。随后，全军各级领导机关也建立了相应的军事科学研究机构。这些军事科学研究机构的建立，对于研究和探索现代战争规律，总结战争经验，发展中国的军事科学，从军事理论高度指导部队的训练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颁布“政治工作条例”，实行三大制度

为适应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需要，贯彻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精神，1954 年和 1955 年，人民解放军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和实行薪金制、军衔制、义务兵役制。

1954 年 4 月 15 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这一条例草案的颁布实施，是人民解放军建军史和政治工作史上的一件大事。毛泽东亲自审阅了这一条例草案，特别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把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鲜明地提了出来。这个政工条例继承了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结合部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实际，同时借鉴了苏军政治工作的经验，对军队政治工作的性质、任务、职责、组织形式、工作方法、政治工作与其

参见《当代中国军队的后勤工作》，304 页，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0。

他工作的关系以及军队建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都作了明确规定。政工条例明确规定，在军队中设立党的各级委员会，实行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是党领导军队的根本制度，政工条例的颁布，回答了部队进行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新形势下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对于纠正忽视政治工作的倾向、完善政治工作制度起了重要作用，使部队进行政治建设和开展政治工作有章可循。

1954年11月9日，国防部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薪金、津贴暂行办法》，从1955年1月起开始实行。长期实行的供给制为军官薪金制所代替。

1955年1月中央军委发布《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2月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并公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根据该条例规定，人民解放军于1955年9月开始实行军衔制度。军官军衔分为5等15级，具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大校、上校、中校、少校；大尉、上尉、中尉、少尉；准尉。士兵军衔分为2等5级，即上士、中士、下士；上等兵、列兵。9月27日，授予元帅军衔及勋章典礼在北京隆重举行。毛泽东主席亲自为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授元帅衔。同一天，国务院举行授予将官军衔和勋章典礼，周恩来总理为在京将官授衔，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肖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被授予大将军衔。首次授衔，共授予元帅10名、大将10名、上将57名、中将175名、少将800名，校官3.2万余名、尉官49.8万余名、准尉11.2万余名。

授勋典礼与授衔仪式同时进行。

1955年2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有关规定，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规定勋章奖章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决议》，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勋章奖章条例》，还通过了《关于规定勋章奖章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保卫祖国和进行国防现代化建设中 有功人员的决议》和《关于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有功人员勋章奖章的决议》。全军共有131人获一级八一勋章，117人获一级独立自由勋章，570人获一级解放勋章。到1957年共向人民解放军有功人员颁发勋章10万余枚，奖章52万余枚。

实行薪金制、军衔制和对有功人员颁发勋章奖章，是国家对军人在政治上的关心和生活待遇上的照顾，有利于激发军人报效和保卫祖国的荣誉感和责任感，有利于推进部队的正规化建设。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一些领导带头压低自己的薪金级别，还有的领导主动请求低授一级军衔，为广大官兵做出了表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保卫祖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依照法律服兵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光荣义务的规定，1955年7月，一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兵役法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由志愿兵役制改为义务兵役制。1956年义务兵役制开始实行，实现了人民解放军由志愿兵役制向义务兵役制的转变。这一兵役制度的实施，使人民解放军有了可靠的常备兵源。

颁布政治工作条例，实行薪金制、义务兵役制和军衔制三大制度是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重大举措，使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建设向前迈

进了一大步，部队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建立国防科技体系，改善发展武器装备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品种繁杂，陈旧落后，为了尽快提高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水平，实现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党和政府在经济还很困难、各方面都需要发展的情况下，一方面购买苏联武器装备以应急需，另一方面着手建立自己的军事技术研究机构，抓紧兵工建设及武器装备生产。

1954年以前，中国先后从苏联购买60个步兵师的武器装备，有偿接收了12个苏军航空兵师的装备，还购买36艘鱼雷快艇等。到抗美援朝战争后期，人民解放军步兵基本上换成苏式装备，空军、海军及炮兵、装甲兵等陆军特种兵都有了长足的进步。正如周恩来所说，“经过朝鲜战争的锻炼，我们的军事装备逐渐走向现代化，部队的军事素养也得到新的提高。”1954年和1955年，苏联军队从安东（今丹东）、沈阳和旅大地区撤走时，中国又有选择地有偿接收苏军1个潜艇基地、5个歼击机师、1个轰炸机师、2个步兵师、1个机械化师、3个地面炮兵师、3个高射炮兵师等部队的大部分武器装备。至1955年底，中国共进口和接收苏式武器装备，计有各种枪80余万枝（挺）、炮1.1万余门、坦克和装甲车3000多辆、飞机约5000余架、舰艇约200艘（含转让制造）等。1956年以后，中国又从苏联进口了少量飞机、舰艇和其他装备的仿制样机，中国人民解放军通过这些进口和接收的武器装备，使自己的装备水平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很大提高。

1951年1月4日，中央军委又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主任、聂荣臻和李富春为副主任的兵工委员会，负责兵工建设。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内，中国先后新建和扩建了79个规模较大的军工厂，武器装备的生产进入到大批仿制苏式武器装备的阶段。

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到50年代末，中国建成包括兵器、航空、船舶、电子等一批大中型军工骨干企业，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国防工业体系，基本改变了国防工业基础薄弱的状况。初步具备了生产比较先进武器装备的能力，共仿制生产了100多种制式武器。同时，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工作也有了良好的开端，为以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陆军武器装备方面实现了中央军委提出的“一五”期间发展和加强压制兵器的目标。兵工企业从1953年开始仿制生产制式武器，当年就仿制成功9种制式轻武器和弹药，1954年又仿制成功122毫米榴弹炮和76.2毫米野炮，一改中国不能自行制造大口径火炮的历史。

1956年，国务院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批准56式7.62毫米半自动步枪、冲锋枪和班用机枪，40毫米火箭筒，160毫米迫击炮定型投产。同年，人民解放军淘汰了全部旧杂式武器和弹药。

1957年又有14种枪械火炮定型。到1959年陆军武器装备初步实现了国产化 and 制式化。

空军和海军武器装备的仿制也取得进展。

1954年仿制成功苏式雅克—18（初教—5）型初级教练机，结束了中国

不能生产飞机的历史。

1956年仿米格—17型歼击机的歼—5型飞机试飞成功，这是中国国防工业发展史上的重大突破，成为当时世界上少数几个能制造喷气式飞机的国家之一，1958年7月喷气式歼击教练机——歼教—1型飞机首飞成功，翌年4月又成功仿制米格—19型歼击机。海军的专用装备在50年代基本完成了苏联提供的鱼雷快艇、鱼雷潜艇、护卫舰、猎潜舰、扫雷舰等的转让制造和半成品装配，并能够仿制部分舰艇。

从50年代中期开始，军用电子装备进入全面仿制，到50年代末走向自行研制。这期间仿制生产了坦克电台、陆用短波收发信机、舰艇通信设备、超短波航空电台及地面设备等几十种陆、海、空三军通信设备和中程警戒雷达、鱼雷快艇搜索雷达和炮瞄雷达。50年代末还仿制第一代通用电子管数字计算机，成为中国计算机技术的开端。这期间自行研制也取得较大进展，研制成功远程对空警戒雷达。海岸警戒雷达，晶体管和电子管混合式营连电台等电子装备。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重视常规武器改善的同时，还以极大的勇气和信心，决定研制导弹核武器，力争使中国在世界高技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1955年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作出了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研制核武器的战略决策。同时会议指定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组成三人小组，负责原子能发展的领导工作。

1956年3月14日，由周恩来主持召开会议，作出发展中国导弹事业的重大决策。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弹。但是，过去我们也没有飞机和大炮，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此后，国防科技发展的重点开始转向突破原子弹、导弹“两弹”的技术方面，有关部门立即着手调集专门人才，成立一些科研机构。

1958年1月31日，中央军委批准总参于1957年制订的全军《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工作10年（1958—1967年）规划纲要》。该纲要指出军队的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应以制造中程导弹和防空导弹及其裂变和聚变物质装料为中心，同时开展陆、海、空军常规武器和战斗保障器材的科学研究工作。

为加强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的领导，1956年4月13日，成立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负责导弹的研制工作和航空工业的发展工作。同时，总参谋部装备计划部成立科研处，负责筹划常规武器装备的科研工作。

1958年又成立以万毅为部长的国防部第五部，负责领导特种部队的组建工作。成立以聂荣臻为主任、陈赓为副主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国防科委），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负责统一领导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工作。

1959年4月国防部第五部合并到国防科委。1959年12月中央军委成立了以贺龙为主任的国防工业委员会在不长的时间里，国防科技工作有了较大发展，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水平得到很大提高。

1957 年底全军基本上完成了装备的改换工作。

1959 年国庆 10 周年阅兵时，受阅的武器装备基本上是国产的，有中国自己制造的超音速歼击机、中型坦克、装甲运输车、100 毫米高射炮、122 和 152 毫米榴弹炮、大威力火箭炮。这次阅兵向世人展示了人民解放军日益改善的武器装备，显示了新中国不断增强的国防力量，国防科技工业的发展，为 60 年代国防尖端技术的突破，创造了条件。

进行正规统一的军事训练

为掌握新装备和新战术，学会现代条件下作战，和贯彻毛泽东要“开展正规训练，迅速提高人民解放军现代作战能力”的指示，从 1953 年下半年至 1959 年，人民解放军进行了以战斗训练为主的正规训练。其显著特点是：

第一，中央军委及时提出训练方针、原则，指导军事训练工作的开展。

1953 年底至 1954 年初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强调部队军事训练工作是全军的工作中心。

1956 年 3 月，中央军委明确了以积极防御作为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

1957 年 1 月，中央军委又提出新的训练方针，即：“在人民解放军原有基础和优良传统基础上逐步提高现代军事技术，学会在新式武器条件下及夜间和复杂气候条件下诸军兵种合同作战，以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保卫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这些，为部队训练提出了方针、原则，指明了方向。在这些方针原则指导下，出现了全军性的训练热潮，部队训练取得重大成绩。

1955 年执行训练任务的步兵部队由 1953 年的 31.7% 上升到 60.3%，空军部队由 53% 上升到 71.4%。1957 年陆军全训师达全军陆军师总数的 77%。据训练总监部统计，步枪实弹射击完成率，1953 年为 47%，1954 年为 63%，1955 年为 67%。

第二，突出干部训练，把对干部的训练看成是现代化建设工作中心工作的中心，着力提高干部现代作战的指挥能力。彭德怀在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干会议上指出：“应明确确定，训练干部的工作，是我们在建设现代化军队中长期的、经常的中心工作的中心。”不久，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又指出：“培养教育干部的学校工作又为中心的中心。这是因为部队军事训练成绩的优劣，各级干部学习军事科学成绩的优劣，将是决定我军今后战斗力高低的基本标准。”干部的训练工作被提到了极其重要的位置。干部的训练除院校培养外，还经常搞教学法集训、首长机关司令部演习和诸军兵种合同实兵战术演习等。

1954 年春夏之交，军委在北京组织在职高级干部第一次战役法短期集训班，参加集训的有总部、大军区、军兵种、军事院校领导干部等共 200 余人。通过这次集训，许多领导干部增加了学习现代战争的兴趣，增强了学习军事科学的信心，此后，各大军区和军兵种普遍组织了指挥员的战役法集训。为了提高诸军兵种协同作战能力，1955 年 11 月，由叶剑英任总导演，在辽东半岛举行了一次陆、海、空军参加的方面军抗登陆演习。这次演习是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诸军兵种实兵合成演习，是 50 年代人民解放军训

《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上），45 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彭德怀军事文选》，499、511 页。

练高潮的重要标志。

1956年后，总部每年都要组织有诸军兵种参加的各种规模的军事演习，在近似实战的条件下训练提高部队的现代作战能力。

1957年7月，沈阳军区空军与苏联远东军区空军举行了防空联合演习。8月，中国、苏联、朝鲜三国军队举行方面军首长司令部现地演习，训练在海军舰队和空降兵协同下，歼灭敌人濒海集团的方面军进攻战役的准备与实施等科目。

11月15日至12月4日，中央军委在上海举办高级干部战役集训班，学习方面军抗登陆战役的组织实施科目。

1959年5月，根据总参谋部的指示，南京军区在杭州湾穿山半岛地区组织了加强步兵师渡海登陆对筑垒地域之敌进攻实兵实弹示范性演习。除陆军外，海军、空军派出部分部队参加演习。这些集训和演习，有力地提高了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组织指挥现代作战的能力。

第三，强调训练的正规化和制度化。

1954年初，总参谋部还参照苏军的做法，统一规定了8种训练制度，即，请示报告制度、检查制度、训练会议制度、教学法集训制度、学习制度、司令部训练制度、指挥员训练制度、校阅制度。年度训练由国防部长下达训令，训练总监部下达训练大纲和指示，各军区、军兵种下发训练计划。训练任务下达后，军区和军兵种如要调整训练课题，需上报训练总监部批准。完成训练科目后，经上级考核合格后，方能转入下一科目的训练。每年年底，国防部都组织校阅团对部队年度训练情况进行检查考核。这些制度保证了部队正规化、现代化训练的顺利开展。

人民解放军经过几年的正规训练，建立了正规的秩序，熟练掌握了新的武器装备，基本上掌握了与新装备相适应的战术，指挥员的军事素质和部队战斗力有明显提高。如1957年步兵步骑枪、冲锋枪、轻机枪、重机枪4种武器的实弹射击成绩，全军总评优秀；炮兵炮手能熟练操作火炮，熟悉人炮性能、构造和保养方法，射击精度和速度总评良好；装甲兵掌握了战斗和夜间驾驶技术，实弹射击成绩总评优秀；工程兵、通信兵、防化兵能熟练使用本兵种的各技术装备和器材，能在一般战斗情况下完成保障任务；海军各兵种能较熟练地掌握一般条件下战斗的技能，潜艇、快艇等部队的鱼雷攻击命中率近100%；空军大部分飞行部队能在昼间复杂气象条件和夜间简单气象条件下，少数飞行部队能在夜间复杂气象条件下，完成各种战斗任务。

经过数年的努力建设，人民解放军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不但由单一陆军发展成为一支包括陆、海、空军的诸军兵种合成军队，而且，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也取得了显著成就，初步具备了在现代条件下进行诸军兵种合同作战的能力。

三、“反教条主义”斗争和“以我为主”方针的提出

正当人民解放军按照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确定的方针、原则，全面进行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时候，1958年错误地开展了一场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使军队建设特别是正规化建设遭受很大损失。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进入新的建军阶段，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成为一项根本任务。

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全党全军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毛泽东指示“永远不要骄傲自满，一定要将苏联的一切先进经验都学到手，改变我军的落后状态，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的军队，以利于在将来有把握地战胜帝国主义军队的侵略”。遵照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人民解放军采取聘请苏联军事专家、顾问，选送干部入苏联军事院校学习深造，翻译出版苏军资料等方法，学习苏军的经验，并从改善武器装备、创办各类军事院校、颁布条令条例、严格军事训练、改革军事制度、调整编制体制等方面入手，借鉴苏军经验，进行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这在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开始时，不仅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通过学习苏军，人民解放军在掌握新的军事技术，学习诸兵种协同作战，养成正规生活秩序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绩，推动了人民解放军的建设。但由于对现代化革命军队建设经验不足，对苏军的经验缺乏充分的了解和具体分析，在学习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没有很好照顾人民解放军的历史特点和实际，机械搬用苏军某些具体做法的情况。例如，在编写教材时，以苏军条令为蓝本；训练中不走样地按苏联专家所教的实施；在部队管理教育中，实行了一些形式主义制度和繁琐礼节，曾出现过分强调首长职权，滥用纪律，压制民主等现象。甚至出现“要实行单一首长制”，“政治机关要大大压缩”，“政治主管领导不要干预过多”的错误主张。有的单位军事训练和军事演习计划下要党委过问，下达命令不要政治委员署名，军事演习没有政治工作人员的位置等情况。但这只是一时的局部出现的偏差，人民解放军的基本制度始终得到了坚持。

在1954年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在确立军队建设总方针、总任务的同时，针对学习苏军出现的偏差，对人民解放军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许多根本制度和方针、原则予以重新肯定，并进一步明确了学习苏军应具有的正确态度。彭德怀在会议总结中明确提出四条要求，（1）就是要学；（2）要亲自去摸，到实践中去下一番苦功夫；（3）要发展，把苏联军事科学与自己的经验结合起来，使其条理化，变成自己的东西；（4）要克服骄傲自满、墨守成规和防止机械搬用。朱德在会议闭幕词中强调：“我们必须在我军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并结合我军今天的实际，虚心地、全面地学习苏联军事建设的经验”。这次会议，在许多方面纠正了学习苏军中照搬照套的偏向。

1956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总结建国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并借鉴苏联及东欧一些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的经验教训，为寻找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多方探索。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提出要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习外国经验，不能盲目的学，不能一切照搬照抄，机械搬运，要有选择地学。6月，中共中央发出学习毛泽东《改造我们

的学习》等五个文件的通知，指示全党“要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克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人民解放军从1956年开始，针对学习苏军出现的某些偏差，在高层领导机关、军事院校和部队工作中采取许多政治上和工作上的措施进行纠正。如许多领导同志发表了阐述人民军队本质和光荣传统的文章；部队普遍开展了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民主运动：对部队的一些制度、条令进行了必要的修订等，因而没有形成全局性的教条主义错误。

1958年中央军委召开了扩大会议，错误地开展了一场反“教条主义”的斗争。这个会议，是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决定的。会议要求，用整风方式，讨论军事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统一认识，提高觉悟，并在这个基础上使各项工作得以贯彻。会议于5月27日开始，至7月22日结束，参加会议的有军内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各军区、各军兵种领导干部共360余人（列席25人）。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林彪、邓小平、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等在会上讲了话。彭德怀宣布会议的内容一是整风，二是整编，方法是大鸣大放大争大辩论，主要解决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建军方针、战略方针三个问题。然而会议开始后，预期解决的几个重点问题没有形成会议的中心议题。有的同志在会议发言中，还公开点名批评了主管全军训练和院校工作的同志。

6月7日下午，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军委秘书长黄克诚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6月5日在一位同志对军委扩大会议开法意见上的批语：“一方面有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就整个历史说来不占全军统治地位的另一个恶劣传统是存在着，即非马克思主义的、有时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例如教条主义，军阀主义。”号召与会同志根据毛泽东主席“振起生气，大有可为”的指示和有关领导的一些意见，彻底解放思想，打破顾虑。敢想、敢说、敢于明辨是非，以反教条主义为纲，针对军委及总部各部的领导，通过小组会、大会、大字报、小字报等形式，大鸣大放、大争大辩，把会开好。自此，会议转向，反教条主义成为会议的中心议题。林彪在1959年军委扩大会议上批判彭德怀时，曾说，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原来并没有确定以反对教条主义为主题，我认为应该开展这个斗争，并报告了毛主席，才有以反教条主义为中心的这次军委扩大会议。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立即调整了会议安排，翌日发出扩大会议范围的通知，吸收全军军以上单位和部分师级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参加，参加会议人员由360余人增至1400余人。并派人协助彭德怀主持会议。

6月21日、23日、29日，毛泽东先后在大会和小组长座谈会上讲了话。他在21日接见全体同志大会上谈到军队工作时指出：“八年来基本上搞的好，有些缺点错误”，“各方面都是蓬蓬勃勃，军队也是蓬蓬勃勃的。可是，比较起来稍微差一些，经过这次会议要起变化。”他在回顾了党和军队历史上教条主义错误给革命事业带来的损失后指出：“有这么两部分教条主义。一部分是对资产阶级军事学和管理军队的制度，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一种；再就是对苏联的，或叫无产阶级的军事学和管理军队制度，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在中央苏区一个时期是有的……解放以后又发生了教条主义”，“有些人就是搬外国，不加区别地搬外国，这是妄自菲薄。”毛泽东在大会讲话之后，23日又把军委委员和各组组长召集到中南海，座谈两个

多小时，他在插话中说，“人民军队有没有教条主义呢？我在成都会议上说过，搬是搬了一些，但建军基本原则坚持下来了。现在有四种说法，一种是说没有，一种是说有，一种是说很多，一种是说相当多。说军队中没有教条主义是不存在的，究竟有多少，这次军委会议要实事求是地加以研究，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他明确指出：“苏联的经验有三种，一种是好的，我们用得上的，就要‘取经’；第二种是不好不坏的，要取其好的一部分；第三种是坏的，也可以研究，引以为戒”。他强调：“一定要有选择地学”。“要坚决反对教条主义，打倒洋奴思想，埋葬教条主义。”

此后，会议以毛泽东讲话为基调，对负责训练和院校工作的刘伯承、肖克、李达等进行点名地批判。在7月9日和10日的大会上，刘伯承、肖克和其他被认为犯有教条主义错误的人，被迫进行检讨，批判性的发言一直持续到15日。7月19日彭德怀在全体大会上作总结发言。7月22日，大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决议（草案）》。决议指出：“在某些部门和某些单位。主要是训练总监部和一些院校，教条主义倾向直到最近仍然占着统治地位”，“现在我军中存在的错误倾向，基本上是我军历史上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斗争在新条件下的反映”，“实际上是历史上的错误路线在某些范围内的复活”。决议要求“目前的斗争必须在全军认真展开”。

军委扩大会议后，全军按照决议的要求，自上而下地开展了“反教条主义”和“反单纯军事观点”的教育和斗争。各大单位都相继召开党委扩大会议或干部会议，在传达军委扩大会议的基础上。采取大鸣、大放，揭露批判所谓“教条主义”，“单纯军事观点”的危害，并抓住重点人和主要问题展开斗争，对一些受批判的同志作了组织上的调整。

这次“反教条主义”斗争，完全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把学习苏军过程中难以避免的并已经基本纠正的一些偏差和军队管理、军事训练、院校教育中出现的一些缺点，说成是“教条主义”；把严格管理，按科学规律办事等一些正确的东西，说成是“单纯军事观点”；把一时局部出现的偏差，夸大全力全军性的系统错误；把本属于工作上、思想认识上的分歧，夸大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因而对当时和以后的军队建设产生消极影响。此后，正规化建设不提了，一些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和条令条例处于不被重视以至被废弛状态，使刚刚起步的正规化建设受到挫折；自觉不自觉地排斥外国有益的东西，使军队在一个很长时期内忽视对外军经验的研究和汲取；采用过人的批判斗争方法，无限上纲、上挂下联、搞大批判等“左”的做法开始盛行；一些负责军事训练和院校工作的同志受到过人的批判和斗争，有的受到错误处理，严重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等。中央军委在1987年《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中指出：“错误地开展反‘教条主义’斗争和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给我军建设和政治工作造成了很大损害”。

反教条主义斗争所造成的消极影响，经过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实事求是的工作，以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努力，在经历了近30年之后终于得以消除。1986年10月16日胡耀邦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在刘伯承同志追悼会上的悼词》中说：“1980年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这也是党中央一致的意见”，不久，邓小平发表《悼伯承》一文，指出：“1958年批判他搞教条主义，那是不公正的。”这就为反教条主义斗争作了正确的结论。1987年11月25日，总政治部和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发出通知，为在1958年因所谓教条主义问题受到错误处理的同志彻底平反。

军委扩大会议在错误发动反教条主义斗争的同时，提出了“以我为主”的军队建设指导方针。

1958年6月17日，毛泽东在《关于向军委会议印发李富春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报告的批语》中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经济战线上如此，军事战线上也完全应当如此。”23日，毛泽东在各小组长座谈会上讲话时指出：我们打败了蒋介石、日本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我们有丰富的经验，看不起自己的经验是不对的。要以我为主，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同时要研究敌情、友情。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讲话精神，军委扩大会议提出了“以我为主”加强军队建设的指导方针。彭德怀在会议总结中强调：必须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著作，坚决以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作为今后我军建设和作战的指针。必须以我军经验为主，有选择地学习外国经验，绝不能盲目地机械搬运。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决议中也强调：在军事训练方面，必须以现有装备为主，照顾将来装备的情况，以我军经验为主，有选择地学习苏军经验，并认真地研究敌情。必须集中必要的人力，在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的指导下，系统地总结我军30多年的各方面经验，吸收我们的伟大同盟者苏军的经验，注意我们的主要敌人帝国主义的军事经验，在一两年内陆续编出适合我军情况和需要的条令教范和教材。

“以我为主”军队建设方针，是中央军委对建国后几年来军队建设进行反思后提出来的，它正确地揭示了人民解放军建设和发展的进程，科学地阐明了学习外军经验与自己实际相结合的相互关系，是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经验总结。尽管“以我为主”方针是在“左”倾思想开始滋长，错误地发动反教条主义斗争的背景下产生的，以后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把“以我为主”与学习外国经验截然对立起来，忽视了对外军经验的学习和研究的偏差，但它毕竟是在建国后首次指明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军队的方向。从实践中看，这是一条正确的方针。标志着中央军委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加强军队建设认识上的深化，使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在突出中国军队特色方面更加明确，方向更加坚定，对于后来全军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精神发展国防事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东南沿海地区军事斗争及平息西藏武装叛乱

一江山岛渡海登陆作战

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帝国主义从遏制共产主义战略需要出发，加紧了对台湾的扶植和控制。为最终完成对华半月形包围圈，与台湾当局积极策划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台湾当局则加紧“反攻大陆”的叫嚣，在浙江沿海，形成以大陈岛为中心，以一江山、头门山、披山、渔山、南麂山诸岛为外围的防御体系，总兵力约2万人。在福建沿海则形成以金门岛为中心，以大担、二担、东碇等岛屿为外围的防御体系。他们把这些岛屿作为反攻的前哨阵地，经常在其海、空军配合下，对浙江、福建沿海地区实行侦察袭扰，迫使渔民不能出海，商船不能通航。为统一祖国，保卫沿海地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1954年1月，华东军区提出陆、海、空三军联合攻打大陈岛的战役计划，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后开始实施。

5月15日至20日，华东军区以部分空军歼击机、海军护卫舰，配合陆军分队，先后攻占大陈岛以北的门头山、田岙、蒋儿岙三岛，拔除了大陈岛的前沿据点，取得了三军联合作战的初步经验。人民解放军的行动引起国民党军的不安，他们一方面向南麂岛增兵，图谋实施海空联合反击，一方面则加速与美国商谈签订共同防御条约，企图借手美国阻挠人民解放军解放沿海岛屿和台湾。

为打破美蒋的军事和政治联合，中共中央决定突出台湾问题。7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社论，严正指出，“台湾是中国领土，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不达目的，决不休止”。随后，朱德在“八一”建军节，周恩来在中央人民政府第33次会议上的外交报告中都强调了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决心。

遵照中共中央“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指示，中央军委决心，首先在浙江沿海，以空军力量为主，结合海军鱼雷快艇，袭击国民党军舰艇，加强沿海炮击，相机攻取闽浙近海某些小岛，转变该区海上形势，尔后，攻占上下大陈岛及解放浙东诸岛屿。为解放台湾创造有利条件。

据此，华东军区对攻打大陈岛的具体方案进行了认真研究，决定首先攻占一江山岛，作为大陈战役的第一步。一江山岛位于浙江省椒江口外，距陆上13海里，距上、下大陈7.5海里，面积1.7平方公里，系大陈岛的北部屏障，岛上守军约1100余人，设有3道防御阵地和4层火力网，筑有明暗地堡150多个，形成以永备和半永备工事为骨干的环形防御体系。因该岛地理位置重要，地形险要，台湾当局倍加关注，由美国顾问直接参加设防。夺取一江山岛，使大陈岛直接暴露在解放军的炮火威胁之下，可起到攻敌要害，撼敌全局之效，方案上报后，很快得到中央军委批准。

华东军区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于8月成立浙东前线指挥部（简称浙东前指），由华东军区参谋长张爱萍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浙江省军区代司令员林维先、华东军区空军副司令员聂凤智、华东军区海军副司令员彭德清和参谋长马冠三为副司令员，华东军区副参谋长王德为参谋长。浙东前指建立后，立即进行周密的战前准备。依据作战方案，对渡海登陆作战进行了精心部署，确定参战兵力为步兵4个营，炮兵2个团另2个营及喷火兵、工兵各一部；海军各类船艇180余艘和部分海岸炮兵；空军航空兵15个大队又1

个夜航中队、海军航空兵 7 个大队，作战飞机近 200 架。组织参战部队进行登岛作战的战术、技术演练，并从空中、海上、地面对一江山岛进行周密地侦察，摸清了岛上的基本情况，确定了具体打法。

从 11 月 1 日开始实施战役第一阶段计划。浙东前指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在美国政府与台湾当局签订《共同防御条约》期间，从空中、海上对大陈海域的国民党军舰艇实施突击，同时轰炸大陈岛上的军事目标，封锁预定战区，狠狠打击国民党军，以此表明中国政府和人民反对这一侵略条约的严正立场。

11 月上旬，海军鱼雷艇首次南下，为寻找有利战机，在海上隐蔽待机 13 个昼夜，11 月 14 日击沉国民党军“太平”号护卫舰，取得鱼雷艇部队组建以来首次作战的胜利，给予国民党军一个沉重打击。

在这期间，解放军空军和海军航空兵连续出动，寻机轰炸大陈港内国民党军舰艇及大陈岛上军事目标。

1955 年 1 月 10 日，解放军空军和海军航空兵隐蔽出航，奇袭大陈港。全天共出动飞机 130 架次，分 4 次对大陈锚地的国民党军舰进行猛烈轰炸，取得击沉“中权”号坦克登陆舰，重创“衡山”号修理舰，击伤“太和”号护航驱逐舰等 5 艘军舰的重大胜利。同日，海军鱼雷艇击沉国民党军“洞庭”号炮艇。经过两个多月的空中、海上连续打击，国民党军舰白天已不敢在大陈海域停泊，飞机亦不敢飞临大陈上空，解放军掌握了预定战区的制空、制海权，为一江山岛渡海登陆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1955 年 1 月 14 日，战役进入第二阶段，浙东前指下达渡海登岛作战命令，从 16 日起三军参战部队按计划展开。

18 日晨，空军 3 个轰炸机大队和 2 个强击机大队在歼击机掩护下，对一江山岛纵深工事和主要火力点实施第一次航空火力突击。9 时许，支援炮兵实施火力准备，对敌前沿阵地予以压制。12 时 15 分至 13 时 22 分，登陆输送队分别从高岛、蒋儿岙和头门山岛起渡，70 余艘登陆艇，满载着 5000 多名指战员，在 40 余艘作战舰艇掩护下，分两批成三路防空队形，驶向展开区。14 时，第二次火力准备开始。船载的 10 门火箭炮对北江岛进行第二次齐射。轰炸航空兵 3 个大队又 1 个中队，对南、北江岛敌各主要阵地再行猛烈轰炸。强击机 2 个大队对登陆地段的前沿阵地进行轮番俯冲轰炸扫射。

14 时 20 分，发起登陆突击，仅 35 分钟就抢占了主峰，尔后迅速向纵深发展进攻，战至 18 时，登岛部队占领全岛后转入防御。至此，一江山岛渡海登陆作战胜利结束。此役共毙敌 519 名，俘敌 567 名，击沉敌舰 3 艘，击伤 4 艘，解放军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牺牲 393 人。

一江山岛解放后，大陈岛国民党军面临覆灭命运，台湾当局故作姿态，声称要在大陈岛作最后战斗。美国政府也甚为恐慌，亟谋阻止解放军采取进一步行动。从 19 日开始，美国海军第 7 舰队派出数十艘军舰驶抵浙东海域，掩护大陈本岛，并操纵联合国斡旋停火，企图借手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1 月 24 日，周恩来总理发表声明，指出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联合国和任何

《共同防御条约》是美国与台湾当局签订的军事同盟条约。1954 年 12 月 2 日由台湾代表叶公超和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签订。条约全文共 11 条，台湾当局从条约规定中得到美国的庇护及大量的军援、经援，美国得到了在台湾、澎湖及其附近部署其海、陆、空军以及用武力干涉台湾事务的权利。1979 年 1 月中美建交，美国于 1980 年 1 月终止该条约。

外国都无权干涉。1月30日，浙东前指下达准备进攻大陈的命令。

在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和世界舆论面前，美国被迫以私下承诺协防金门、马祖，提供空中、海上掩护为条件，规劝台湾当局撤离大陈岛。台湾当局为避免大陈岛守军覆灭命运，只好接受美方建议。2月8日至12日，国民党大陈岛守军在美国海军第7舰队和空军第5航空队掩护下撤退台湾，并将岛上居民连同牛羊等财物抢掠一空。人民解放军当即进占该岛，至此，浙东沿海岛屿全部解放。

一江山岛渡海登陆作战，是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第一次三军联合渡海登陆作战，战役规模虽然有限，但影响深远。这一胜利，显示了人民解放军三军联合作战的威力，标志着人民解放军协同作战能力有了新的进展，作战能力有了显著提高。这一胜利，打击了美台共同协防活动，改变了台湾海峡斗争形势，并在实战中取得了组织三军联合渡海登陆作战的宝贵经验。主要是：

1. 战役准备工作充分。浙东前指遵照中央军委要充分准备的指示，认真进行了战场建设、物资准备、战前训练和敌情侦察等工作，统一战术思想，解决了一系列渡海登岛作战的战术技术问题。为组织好战役协同，成立了专门机构，统一计划、指挥和协调整个渡海登陆行动，按照组织关系逐级落实。浙东前指负责组织陆海空之间及王攻、助攻、佯动方向的协同动作，各军种指挥所负责军种内部的协同。并专门进行了三军联合渡海登陆作战的模拟演练。同时组织可靠的通信联络，保证不间断地指挥与协同。参战部队在准备过程中，特别重视隐蔽战役企图，采取隐蔽、佯攻、不规律的轰炸和炮击等一系列措施，出敌不意，造成国民党军判断上的错觉，从而达成战役突然性。由于组织计划周密，战前准备工作充分，从航渡到登陆突击的整个作战过程中，各参战部队主动配合，互相支援，充分发挥了三军联合作战的整体效能，形成了压倒敌方的强大威力。

2. 从实际出发，创造符合登岛作战实际的战法。浙东前指考虑到首次组织三军协同渡海登陆作战，缺乏经验，已掌握制空制海权的实际情况，大胆确定昼间航渡，昼间登陆突破，为解决好指挥协同问题创造了条件，减少了因艇船性能不一，登陆地段狭窄易造成混乱的问题。鉴于一江山岛的特殊地形和敌人的防御情况，浙东前指把主要突击登陆点选在登陆条件虽差，但敌火力配系较弱，利用潮满时节，不用涉水，可直接登岛的北一江西北突出部——黄岸礁和海门礁，出其不意，一举登陆突破成功。

3. 建立“联勤”，搞好后勤保障。浙东前指成立三军联合后方勤务部（简称联勤），在“联勤”的统一组织指挥下，充分发挥各参战部队后勤的保障职能，形成强有力的联合保障体系。在任务分工上，除专用物资和技术保障由各军兵种负责外，通用物资供应、卫勤保障、伤员的抢救与后送、交通运输的指挥与后方警戒等，统由“联勤”组织指挥，从而较好地解决了陆海空三军的供应、救护和运输等问题。同时，中共浙江省委和上海市委帮助征集船只、动员船工，浙江省还组织了支前大军，使三军联合渡海登陆作战得到了较好的后勤保障。

炮击金门

1958年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福建前线部队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对盘踞金门的国民党军进行大规模的炮击作战。中国、美国与台湾当局

三方围绕金门岛进行了激烈而微妙的斗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巧妙地运用军事手段与政治、外交斗争相结合，把支持中东人民的解放斗争与粉碎美国搞“两个中国”的图谋相结合，始终掌握斗争的主动权，赢得了这一斗争的胜利。

炮击金门作战有着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坚持敌视中国的政策，坚持不承认中国政府，反对接纳中国进入联合国，限制对华贸易，在国际活动中公开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并依据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向台湾当局提供大量经援、军援，加强对台湾军队的扶持和控制。同时，不断增加驻台海空军兵力，调整驻台军事指挥机构，并将“斗牛士”导弹部队派驻台湾，对中国大陆施加军事威胁。

台湾当局依靠美国的庇护，加强金门沿海岛屿的防务，妄图以此作为反攻大陆的跳板。他们在金门设立防卫部，部署6个步兵师和特种部队8.5万余人，配置75毫米以上口径火炮380余门，轻型战车和自行火炮106辆，在其海、空军配合下组成坚固防御体系，并不断对祖国大陆沿海城镇进行袭扰破坏。从1953年1月起，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炮兵即不断对这一地区国民党军实施惩罚性炮击，1954年9月3日为抗议美国政府与台湾当局签订“共同防御条约”，曾进行大规模炮击，但其反动气焰仍很嚣张。

中东事件的爆发，成为炮击金门的导火索。1958年7月15日，美国为镇压黎巴嫩人民的爱国斗争，派军队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附近登陆，制造了中东事件。美国为转移世界人民的视线，竟在台湾海峡地区大量集结武装力量，公开威胁要把它在台湾海峡地区的侵略范围扩大到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对中国人民进行战争挑衅。台湾当局乘机造势，叫嚷“加速进行反攻大陆的准备”，企图依靠美国实现“反攻大陆”的梦想。7月17日，台湾当局下令其陆海空三军处于特别戒备状态，连日组织军事演习，出动飞机对大陆沿海进行侦察、挑衅，一些高级将领频频到金门、马祖地区活动。与此同时，美国在台湾的军事和外交人员，频频与台湾当局密谋策划。美国海军参谋长伯克8月8日宣称。美军正密切注视台湾地区局势，随时准备进行像在黎巴嫩那样的登陆。台湾海峡地区局势日趋紧张。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根据中东事件后国际形势和台湾海峡地区局势，作出加强东南沿海军事斗争的决策。

1958年7月18日晚，毛泽东召集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空军、海军、炮兵等单位的领导人，部署东南沿海军事斗争的任务。毛泽东指出，金门炮战，意在击美。支援阿拉伯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不能仅限于道义上的，还要有实际行动的支援。他同时指出，金门、马祖是中国领土，打金门、马祖，惩罚国民党军，是中国的内政，敌人找不到借口，而对美帝国主义则有牵制作用。他明确指示，以地面炮兵实施主要打击，准备打两三个月；以两个空军师于炮击同时或稍后，转场南下，分别进驻汕头、连城。当晚中央军委召开会议，对炮击金门作战进行了部署。

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决策和部署，人民解放军立即展开了战前准备。福州军区组成了以叶飞为首的前线指挥所，调任聂凤智任福州军区空军司令员，组成福州军区空军前线指挥所，海军组成了以东海舰队副司令员彭德清为首的舰队前方指挥所。参战的459门火炮、80余艘舰艇和200多架飞机，迅速隐蔽地按时进入指定位置，做好了战前的一切准备。在此期间，人民解放军空军与国民党空军进行了4次空战，击落击伤敌机9架，基本掌握

了福建地区的制空权，保证了战役展开和战场准备。

8月20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作出炮击金门的最后决定，拉开了炮击金门的帷幕。炮击作战，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8月23日起至10月5日止，以炮兵为主，实行陆海空军联合封锁。8月23日17时30分，福建前线部队奉命，向金门国民党军实施大规模的猛烈炮击，历时两个多小时，发射炮弹2.92万发，由于准备充分，企图隐蔽，出敌不意，一举毙伤国民党军中将以下官兵600余人，摧毁其大批军用设施，击伤货轮“台生”号。为扩大战果，24日又组织炮兵和海军舰艇，实施第二次大规模的联合打击，取得重创国民党军大型运输船“中海”号，击沉货轮“台生”号的重大胜利。在解放军猛烈炮火连续打击下，金门岛基本被封锁，补给运输中断，金门国民党守军士气沮丧，处境艰难。

台湾当局为打破封锁，摆脱困境，请求美军协防金、马。美国既怕国民党失去沿海岛屿，导致台湾防御体系崩溃，又怕协防金、马引发中美之间的战争。为防止两种情况发生，采取战争“边缘政策”，炫耀武力，进行战争恐吓。美国政府除连续发表恫吓性言论外，急忙调遣太平洋第7舰队主力和中地中海第6舰队一部及驻日本、菲律宾和本土的海空军一部，加强台湾海峡地区。至9月初，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集结各种类型飞机430余架，舰艇60余艘。企图迫使中国政府在战争威胁面前却步。

面对美国的战争威胁，中其中央、中央军委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9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关于领海的声明，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海宽度为12海里，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未经中国政府许可，不得进入中国领海及其上空。进一步封锁位于12海里之内的金门、马祖，不给美国协防金、马以借口。9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发表《关于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的声明》，严正指出：中国政府完全有权对盘踞在沿海岛屿的蒋介石部队给予坚决的打击和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任何外来的干涉，都是侵犯中国主权的罪恶行为。同时警告美国政府，如果继续对中国进行侵略和干涉，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的头上，必须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美国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声明和警告，从9月7日起公然派军舰进入金门海域，为国民党军护航。针对美军的侵略行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以打击国民党军方式反对美军的护航行动。毛泽东当时指示，一照打不误，二只打蒋舰，不打美舰。9月8日实施第三次大规模炮击，击沉击伤国民党军舰各1艘。9月11日实施了第四次大规模炮击。迫使护航的美国军舰仓皇逃离金门海域。9月13日后，福建前线人民解放军，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为配合中美大使级谈判，转入零星炮击，使金门国民党守军处于昼夜惊慌，不得安宁的状态。这一阶段共进行了4次大打、83次中小打和上千次零星炮击，金门被封锁，惩罚了国民党军，打击了美国“战争边缘”政策，使其处于进退两难境地。

第二阶段，从10月6日宣布暂停炮击开始，进入打打停停阶段。台湾当局为了摆脱困境，扬言轰炸福建、江西，逼美国与其并肩作战。美国则怕越陷越深，要台湾当局从金、马撤兵，以达到在军事上避免卷入与中国的战争，政治上隔离台湾，搞“两个中国”的双重目的。蒋介石则怕划峡而治，老死

参见《台湾问题文献资料选编》，99、100~101页，人民出版社，1994。

参见《台湾问题文献资料选编》，99、100~101页，人民出版社，1994。

他乡，从“反攻复国”目的出发，不肯从金、马撤兵，美台矛盾日趋尖锐。

美、台之间矛盾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意识到美国要从金、马脱身。是收复金、马，还是把金、马留在蒋介石手中，中共中央反复权衡，为了抵制美国搞“两个中国”的图谋，促使海峡两岸向和平统一方向发展，决定留下金、马当美帝国主义的绞索，待时机成熟时将台、澎、金、马一揽子解决，中央军委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意图和指示，作出“打而不登，封而不死”的决策。在具体行动上，一方面开展政治攻势，进一步扩大美、台之间矛盾，另一方面采取有条件暂停炮击和无限期隔日炮击的方式，拖住美国，使其不得从金、马脱身。

10月6日，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发表了毛泽东起草的《告台湾同胞书》，指出“金门战斗，属于惩罚性质。”“台、澎、金、马是中国的一部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共同敌人”；中国人民之间的战争应当停止，“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反对美国插手，并宣布“从10月6日起，暂以七天为期，停止炮击……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10月13日，福建前线广播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命令》，宣布“从本日起，再停两星期，借以观察敌方动态，并使金门军民同胞得到充分补给”，同时指出“这是民族大义”，“是为了对付美国人的”。但美国把暂停炮击看成是他们强硬政策的胜利。

18日宣布国务卿杜勒斯将于21日到台湾与蒋介石会谈。19日美军军舰在金门海域公然为国民党军护航，中央军委决定提前恢复炮击，于10月20日杜勒斯访台的前一天，实施第五次大规模炮击。提前恢复炮击为蒋介石拒绝从金、马撤兵提供了理由，使杜勒斯访台没能如愿以偿。

25日，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发表了毛泽东起草的《再告台湾同胞书》，揭露美国插手台湾的目的，第一步要孤立台湾，第二步要托管台湾，并以张作霖被日本人致死于皇姑屯的历史事件为殷鉴，提醒台湾当局当心美国人的毒计；规劝台湾当局，不可尊美为帝，屈服美国人的压力，随人俯仰，丧失主权，最后走到存身无地，被人丢到大海里去。同时宣布“逢双日不打金门的飞机场、料罗湾的码头、海滩和船只……以利你们长期固守”。10月31日，中央军委又决定“今后逢双日对任何目标一律不打炮”，“逢单日可略打一点炮，炮弹一般不超过200发”。

以国防部长的名义，连续发表的三个文告，申明了中国的立场，揭露了美国的侵略行径和阴谋，划清了中美两国之间与国共两党之间的界限，在台、澎、金、马军民中引起强烈反响，加深了美台之间的矛盾。通过有条件暂停炮击和无条件隔日炮击的行动，抵制了美国胁迫台湾当局从金、马撤兵，隔离台湾，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持续两个多月的紧张局势开始松弛下来。此后至1960年6月，福建前线人民解放军又有针对性地对金门实施了4次大规模炮击，给金门国民党军以惩罚性打击，给蛮横干涉中国内政的美国政府以严正警告。

从1958年8月至1959年1月的4个多月里，人民解放军进行了7次大规模炮击，13次空战和3次海战，发射炮弹数十万发，严惩了国民党军。使台湾当局深感武力“反攻大陆”难以实现，而代之以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光复大陆”口号。

1961年12月中旬，中央军委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为保持台湾海峡局势的稳定，指示福建前线部队停止对金门实弹炮击，只在单日打一些宣传弹，

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 70 年代末。1979 年 1 月 1 日，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美国宣布与台湾断交、废除《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军，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徐向前于当天发表《关于停止对大金门等岛屿炮击的声明》，持续 20 多年的炮击遂告结束。

炮击金门，本属中国内政，由于美国的无理干涉，台湾当局置身于美国庇护之下，使炮击作战既有军事上的较量，又有政治上、外交上的斗争，情况异常复杂。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精心运筹，根据局势的发展变化，灵活运用斗争策略，巧妙地把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外交斗争紧密结合，有理、有利、有节，始终掌握斗争的主动权，展现出高超的斗争指导艺术。人民解放军参战部队执行命令，听从指挥，叫打就打，叫停就停，显示了高度的政治。策略观念和组织纪律性。广大指战员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发扬了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因而使炮击金门作战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政治、外交上都取得了伟大胜利。

炮击金门突出了台湾问题，揭露和打击了美国的侵略行径，挫败了美国隔离台湾，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把美国逼上谈判桌，有力地表明了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维护祖国统一的立场和决心。同时打乱了美国的侵略计划，调动和吸引了美国海空军 20 余万人，减轻了中东人民的压力，支援了中东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炮击金门使中共中央摸清了美国的战略意图，重估了美国的对台政策，从而改变了先收复金、马等沿海岛屿，再收复台、澎的战略构想，形成把金、马留在蒋介石手中，同美国的“两个中国”图谋作斗争，待时机成熟时，将台、澎、金、马一起解决的对台政策，维护了“一个中国”的利益。

平息西藏叛乱

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积极帮助西藏进行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建设，并从尊重西藏历史和现实出发，本着祖国统一、民族平等团结的一贯主张，对西藏的工作采取“慎重稳进”的方针。《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中规定：“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办法解决”。

1956 年底中央人民政府宣布，西藏 6 年内不进行民主改革。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是否改革，也要视情况而定。并在组织上、工作上进行了相应的收缩，减少了驻藏部队和工作人员数量。对西藏原地方政府和上层人员，则采取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政策，争取他们共同建设西藏。然而，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把中央的政策视为软弱可欺。他们在外国势力的支持和操纵下，坚持农奴制度永远不改的反动立场，千方百计阻挠和破坏十七条协议的实行，阴谋实现“西藏独立”。他们一方面利用民族、宗教关系唆使邻近一些省区的藏族宗教组织和部落的上层反动分子，公开组织叛乱。1957 年，川、甘、青三省藏族地区的少数分裂分子猬集拉萨，成立了名叫“曲细岗珠”的叛乱组织，以统一策划和指挥西藏周围地区的叛乱活动。另一方面与叛乱分子勾结，积极积蓄力量，蓄谋叛乱。1958 年 4 月，拉萨“三大寺”及藏军首恶分子与

三大寺，指拉萨的哲蚌寺、色拉寺和甘丹寺。

叛乱组织“曲细岗珠”签订了进行叛乱的同盟书，并区分了各自的任务和发动叛乱的地区，于6月初开始分批前往山南、黑河、林芝等地。到达山南的叛乱武装头目，打着保护宗教信仰的幌子，组织了“卫教军”，企图把山南作为叛乱的大本营。他们还在昌都、黑河、山南、林芝、江孜等地策动当地反动分子，袭击人民解放军驻地和车队，破坏交通干线，抢劫物资。叛乱分子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给西藏人民造成了深重灾难。

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在支持参与各种叛乱活动的同时，还积极扩充藏军，使藏军由1951年的1400多人，增加到3000多人，以作为叛乱的骨干力量。

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经过长期策划准备，以为时机成熟。于1959年3月10日公然发动了以拉萨为中心的武装叛乱。他们借达赖喇嘛3月10日要到西藏军区机关驻地观看军区文工团演出之机，挑起事端，煽动不明真相的僧侣俗民围住达赖喇嘛的住地罗布林卡，阻拦达赖喇嘛前往，唆使叛乱分子打伤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桑颇·才旺仁增，杀害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官员、爱国人士堪穷·索郎降措，并拖尸示众。叛乱分子还驱使部分群众上街游行示威，高喊“西藏独立万岁”等反动口号。当天，叛乱首领在罗布林卡开会，宣称“同中央决裂，为争取西藏独立而干到底”，他们指使聚集于拉萨及其周围的叛乱武装7000多人，在药王山、罗布林卡、布达拉宫及市郊各要地构筑工事，将西藏军区司令部和中央人民政府驻拉萨代表机关团团包围。17日，达赖喇嘛潜离拉萨前往印度，叛乱活动更加猖狂。他们切断电线，破坏桥梁，向解放军和中央代表机关进行零星射击。20日凌晨，叛乱武装袭击前往拉萨河渡口执勤的人民解放军分队，向驻拉萨的解放军和中央代表机关发起了攻击。

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上层反动集团蓄谋已久的分裂行径和叛乱活动早有察觉，并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等待他们觉悟。直至3月14日，西藏军区政治委员谭冠三在致达赖喇嘛的信中仍然“希望西藏地方政府改变错误态度，立即负起责任，平息叛乱，严惩叛乱分子”。然而，他们不顾中央的耐心等待，再三教育，仍肆无忌惮地进行分裂活动，发动武装叛乱。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巩固民族团结，彻底解放西藏人民，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不得不改变原定“六年不改”的方针，作出“彻底平息叛乱，充分发动群众，实行民主改革”的决定，以从根本上推翻封建农奴制度，建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新西藏。3月28日国务院发布命令，宣布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解散藏军，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任命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代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并责成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指挥西藏部队，团结西藏广大人民，彻底平息武装叛乱。

遵照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央军委关于平息西藏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指示，西藏军区于3月20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不待增援部队到达，即组织市内现有兵力平息拉萨市区的叛乱。上午10时，驻藏人民解放军开始对叛乱武装实施反击，步兵分队在炮火掩护下首先攻占了药王山，控制了市内制高点，切断了西郊叛乱武装与市区的联系。继尔攻占罗布林卡。

21日晨对市区叛乱武装达成合围，并对小昭寺顽抗之敌予以全歼。在此情况下，大昭寺、布达拉宫的叛乱武装开始动摇，在强大政治攻势下，于22日拂晓缴械投降，至此，拉萨市的武装叛乱基本平息。21日至23日，驻日喀则、黑河、阿里的解放军分别解除了这些地区的藏军武装，接管了地方政权。这样，解放军就完全控制了西藏几个主要城镇，摧毁了叛乱的指挥中心，

打乱了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叛乱计划，为平息西藏其他地区叛乱创造了条件。

拉萨平叛结束后，西藏军区迅速调集兵力，平息山南地区的武装叛乱。山南地区的武装叛乱，早于 1958 年夏季在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直接策划指使下，以康、青、甘流窜入藏的叛乱分子为骨干发动起来的，是叛乱武装盘踞的一个重要巢穴。拉萨叛乱平息后，叛乱首领及其部分溃逃的叛乱武装窜至山南，与山南的叛乱武装会合，并成立总指挥部，调整强化组织，妄想把山南地区变成武装叛乱的大本营，为迅速歼灭叛乱武装主力，西藏军区命令平叛部队分进合击，围歼山南叛乱武装，从 1959 年 4 月 4 日开始，平叛部队兵分五路，日夜兼程，连续奔袭，不断进剿，捣毁了叛乱武装的巢穴，迅速控制了整个山南地区，切断了叛乱集团与国外的联系，为平息西藏全区叛乱奠定了基础。

拉萨、山南地区的武装叛乱被平息后，为确保青藏公路补给运输安全，平叛部队又于 5 月 22 日对藏北青藏公路以西地区展开进剿。经 40 多天的反复搜寻、追歼，于 7 月上旬形成纳木湖南岸追堵结合的围歼战，基本肃清了班戈湖、申扎和黑河之间地区的股匪，控制了该地区。8 月 17 日至 9 月 15 日，平叛部队以迂回合围形式，对盘踞麦地卡地区的叛乱武装进行围剿，历时 29 天，基本肃清了麦地卡地区的叛乱武装。经过纳木湖、麦地卡等围剿作战，基本歼灭了青藏、川藏公路两侧的叛乱武装，保证了公路补给运输安全。与此同时平叛部队还组织了昌都东北、盐井和昌都东南两次进剿作战，围歼了主要叛乱武装，控制了金沙江、澜沧江两江之间的广大地区，从而结束了昌都地区长期动乱的局面。

经过 9 个月的平叛作战，驻藏人民解放军完全肃清了拉萨、山南、江孜地区的叛乱，基本平息了昌都、黑河、塔工等地区的叛乱，控制了主要城镇和交通干线。但边沿地区的叛乱仍未停止。为迅速平息叛乱，驻藏人民解放军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于 1960 年 2 月开始，集中主要兵力，在大股叛乱武装盘踞的思达、丁青、嘉黎、扎木之间地区，黑河，巴青之间地区，申扎、萨噶、定日之间地区，昌东南宁静、三岩地区和阿里地区先后组织 6 次进剿作战，歼灭叛乱武装 2 万余人。到 1960 年 7 月，西藏全区范围内大股叛乱武装被歼灭，取得了平叛斗争的决定性胜利。

从 1960 年下半年起，平叛部队即转入全面清剿。经过 1959 年至 1960 年的平叛斗争，西藏地区公开的武装叛乱基本平息，全区剩下零散叛乱武装 2000 余人，仍在昌都东南和黑河公路以北地区，拉萨、林芝、那曲结合部地区和昌西等地区活动。叛乱武装虽然为数不多，但多系首领和骨干分子，分布面广，活动隐蔽狡猾，不易剿捕。西藏军区遵照中共中央“主要的要靠政治，要靠群众，同时进行坚决的军事打击”的指示，从 1961 年初开始，采取分散扎点与集中机动相结合，分兵以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政治争取工作；集中以清剿叛乱武装，对继续顽抗者予以军事打击。经过一年的艰苦斗争，残存的叛乱武装大部投降，少数被歼，平叛斗争胜利结束。

西藏平叛斗争的胜利，是党的方针政策的胜利。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确定的“边平边改”，“军事斗争、政治争取、发动群众相结合”的平叛方针和对叛乱分子的土地实行“谁种谁收”，牲畜实行“谁放牧分给谁所有”，对未叛乱的领主的土地和生产资料实行“赎买”以及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分两步走等政策，得到了西藏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党的方针政策争取教育了群

众，调动了他们对平叛和改革的积极性，分化、争取了上层，使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和叛乱分子政治上陷入孤立。因而，叛乱武装在人民解放军军事打击下，很快土崩瓦解，民主改革运动迅速开展。

人民解放军平叛部队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平叛的方针政策。在平叛作战中，把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和发动群众三者紧密结合起来，在进剿阶段，对主要集股叛乱武装，侧重军事打击，结合进行政治争取，采取先打后争；对小股叛乱武装，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双管齐下，边打边争。在清剿阶段，侧重于发动群众和政治争取，同时进行积极地搜剿和侦捕，对拒不投降者予以坚决打击。从而加速了平叛斗争的进程，巩固了平叛斗争的成果。

人民解放军平叛部队英勇作战，艰苦奋斗，严守纪律，为夺取平叛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西藏平叛斗争同西藏民族问题、宗教问题联系在一起，又是在特殊地理环境下进行的，斗争艰苦复杂，任务繁重艰巨，平叛部队高度发扬了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英勇作战，不怕流血牺牲，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他们严格遵守民族政策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藏民的风俗习惯，关心群众疾苦，有的部队在食物紧缺情况下，却拿出粮食和衣物救济一些贫苦牧民，甚至在断粮断炊，靠挖野菜、采蘑菇充饥的情况下，宁可忍饥挨饿，也不动用群众的食物，他们以实际行动戳穿了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制造的谎言，赢得了西藏各族人民的支持和爱戴。

西藏各族人民的有力支援，为平叛斗争的胜利提供了可靠保证。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和平叛斗争实际，教育动员了西藏广大人民群众，他们不避艰险，密切配合平叛部队清剿叛乱武装，主动为解放军带路、提供情报；协助部队瓦解叛乱武装，捕捉武装叛乱分子；运送物资粮秣，支援部队作战。据不完全统计，藏族同胞支援解放军作战达 1.58 万余人次，支援畜力 10.4 万余头（匹）。

西藏平叛斗争的胜利，粉碎了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势力勾结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分裂中国的阴谋，维护了祖国统一，增强了民族团结，为建设民主繁荣的新西藏奠定了基础。

五、参加和支援社会主义建设

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人民解放军在加强自身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履行保卫国防，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以高昂的政治热情，积极参加和支援社会主义建设。

（一）参加和支援农业生产。土地改革胜利完成后，全国迅速掀起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为支援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农业生产，1956年2月5日总政治部发布了《关于军队参加和支援农业合作化运动及农业生产的实施方案》，要求全军除应完成训练、作战等保卫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任务以外，还应尽一切可能，同全国人民一道，为完成中共中央制定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所提出的任务而奋斗。按照总政治部的要求，人民解放军各部队本着就地就近的原则，与营区附近的村庄定点挂勾，建立参加和支援农业生产的基地，参加和支援农业生产。对一些条件较差的边远地区，则派出支农工作队。1956年至1958年，驻云南部队派出7000多名官兵，组成300多个工作组深入边寨山村，帮助各族群众发展生产，使85%的村寨取得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丰收。人民解放军在支援农业生产中，集中人力物力，帮助地方搞好农田基本建设、兴修水利工程，为发展农业生产创造条件。1957年人民解放军支援农业2000万个劳动日，完成较大水利工程400多项，1958年初，辽宁省人民政府决定修建浑沙灌溉总干渠，沈阳军区主动请战，全部工程由部队完成，从4个师抽调2600余名官兵，在军区首长率领下，苦战20天，圆满完成了任务，受益农田达57万亩，改变了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在兴建十三陵水库过程中，驻北京的陆、海、空三军部队先后出动11.5万名官兵，机械400余部，完成工程土石方总量45%。在工程紧张阶段，北京军区的3个步兵师停止训练，全力以赴。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赞扬了军队的突击精神。据统计，自1956年至1959年的3年间，人民解放军承包和支援各种水利工程达2.1万多项。人民解放军各部队还踊跃捐款，兴建拖拉机站和化肥厂，支援农业生产。从1956年2月到1957年10月，仅一年零八个月时间，全军就捐献人民币2400多万元，可购买拖拉机1500多台，建立拖拉机站45个。各部队辽向农业生产合作社捐献退役军马3440匹。1958年人民解放军官兵集资捐款支援农业活动再次出现高潮，仅广州军区即筹集捐款510万元，帮助湛江、惠阳、揭阳、衡阳等地办起了10多个小化肥厂。人民解放军还出动大批人员，在新疆、黑龙江、云南、海南岛等地建起了一批军垦农场，为国家提供了大量农副业产品和许多急需的轻工业原料。

（二）支援工业交通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国家确定694个大中型重点建设项目，作为建立国家社会主义工业的基础。人民解放军抽调了35个建制师参加这些建设。为把钢铁工业搞上去，成师成团的建制部队投入到鞍山、本溪、包头、马鞍山等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为使长春第一汽车厂和洛阳拖拉机厂早日建成投产，人民解放军抽调8个师进行支援，1958年，南京军区、海军东海舰队动员广大官兵积极参加上海钢铁公司扩建、改建工程。南京军区工程兵某团连续奋战6个月，完成转炉和铸钢车间的30多项土建工程，建筑面积7.6万平方米。驻京陆、海、空三军部队，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参加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等“十大”建筑的建设，济南军区组织3000余名官兵在山东境内为“十大”建筑开采加工大理石6万余立方米、花岗岩

石 5 万多立方米。人民解放军为铁路、公路、航空等交通运输线的修复、新建也建立了不朽的业绩。从 1954 年起，铁道兵部队每年出动 20 万人参加重点工程建设。

1954 年 9 月，铁道兵部队承担了黎湛铁路的抢建。黎湛铁路北起广西黎塘，南至广东湛江，全长 315.6 公里，施工部队克服地质复杂，南方雨季造成的重重困难，艰苦奋斗，于 1955 年 12 月胜利通车，经国家验收，质量总评优良。铁道兵部队仅用 9 个月时间就筑成了国民党政府空喊 10 年没有动工的黎湛铁路，赢得了“革命速度”的赞誉。黎湛铁路建成后，铁道兵又集中 8 个师 1 个团的兵力，与闽赣两省 13 万民工一起向鹰厦铁路进军。鹰厦铁路北起江西省鹰潭市，穿越武夷山脉、南抵厦门市，全长 697.7 公里。铁道兵部队以战斗的姿态，全力以赴投入施工，提前两年竣工，于 1956 年 12 月 29 日通车。黎湛、鹰厦铁路的修建成功，对发展对外贸易，巩固国防，促进沿线工农业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人民空军为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于 1956 年 3 月 29 日奉命派出伊尔—18 型、C—46 型、杜—4 型飞机 5 架，空地勤人员 176 人，开辟北京—拉萨、西宁—拉萨航线。这两条航线，地处西藏高原，海拔 4000 米以上，气候变化异常，一向被称为空中禁区。参加试航的指战员克服空气稀薄，缺乏资料等困难，一段一段地试飞，摸索总结经验，历时 68 天，于 5 月 26 日试航成功，10 月 16 日北京—拉萨航线正式通航，这对密切西藏和内地之间的联系，加强民族团结，促进西藏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帮助地方发展文教卫生等公益事业。为了改变农村文化落后的状况，各部队从驻地实际情况出发，热心帮助地方办学，开展农村文化活动。东海舰队仅 1955 年就帮助东南沿海地区建立学校 34 所。济南军区守岛部队从 50 年代起先后在黄海的灵山、长山、慕官、鸡鸣、天衡等岛屿上兴办学校，不仅发展了岛上的中小学教育，而且为岛上培养了一批教师、会计和其他专业人才，为改变海岛人才缺乏的状况作出了贡献。许多部队采取向地方捐款、捐物、提供器材设备、为社队培训人才等多种形式，帮助农村开展文化活动，到 1958 年，仅南京、济南、广州等部队就在华东、华南等地的农村，协助地方建立农村俱乐部、图书室、文化站，电影院等 2000 多个。各部队的医院，卫生队和门诊部，积极帮助地方发展卫生事业，协助地方扑灭流行病、地方病，在社会上赢得了很高赞誉。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曾是血吸虫病流行区。1958 年 2 月，昆明军区组成 115 人的血防大队，分成 34 个小组，奔赴该州的 6 个市县进行普查和治疗。8 个月内，治疗病人 1.4 万人，使当地血吸虫病患者大都恢复了健康。各部队还积极参加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工作，1954 年 5 月，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联合发出《关于部队参加植树造林工作的指示》，全军热烈响应。驻雷州半岛的某军官兵，从 1953 年起，与当地人民群众一道，经过 3 年的艰苦奋斗，造林 91.4 万公顷，建起一条长 400 公里的防风林带，使雷州半岛披上了绿装。到 1959 年，仅部队在湛江市植树造林即达 375.5 万株，昔日湛江旧貌换新颜，成为全国城市绿化的先进单位。人民解放军在支援城市绿化，特别是支援北京、南京、广州、昆明、兰州、济南、青岛、桂林、南宁等重要城市的绿化方面，也做出了突出贡献，仅 1954 年，驻京部队就为绿化首都植树 100 多万株。

（四）抢险救灾。

1954 年 8 月，长江、淮河流域发生了严重洪灾。总政治部及时发出《关

于防洪救灾的紧急指示》，中南、华东军区派出部队 6.3 万人参加抗洪救灾工作。1955 年 4 月 17 日，上海海运局民主 3 号客轮在上海至宁波途中触礁，华东军区部队紧急出动 40 余艘舰船抢救，使 1300 多名乘客全部脱险。1956 年全国 10 余个省区旱涝灾害严重，总政治部发出《关于救灾工作的通知》，要求全军积极参加救灾工作，仅济南、北京、新疆、广州、空军等部队就为灾区捐款 34 万元，衣服 20 多万件。

1957 年 12 月 12 日，在舟山渔场捕鱼的山东、江苏、浙江、福建等省的几千艘渔船，突遭暴风袭击，海军东海舰队立即派出 14 艘舰船进行紧急救援，在两昼夜内抢救出 1200 多名落水渔民。1958 年 7 月，河南地区连降暴雨，黄河出现特大洪峰。周恩来总理亲自指挥抢险，河南驻军 2 万余名官兵和工程兵部队、济南部队 8600 名官兵日夜奋战，控制了险情。

1954 年至 1959 年是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起步和取得重大成就的阶段，这一阶段，人民解放军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八大”精神。确立了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化建设的总方针、总任务，制定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经过几年的努力，无论编制体制的调整、武器装备的发展，各种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的建立和军事训练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现代化、正规化水平明显提高，军队面貌全面改观，为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 1958 年错误地开展了反“教条主义”斗争，一些正确的方针、原则没有坚持贯彻下去，有的甚至被当成错误的东西进行批判，也给军队建设，特别是正规化建设造成了严重损害。

第七章 军队建设在曲折中发展

一、党内反“右倾”对军队的影响

错误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从1957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出现了“左”的错误，虽进行过纠正，但不彻底。到1959年7月至8月，党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上，又发展到错误地开展反“右倾”斗争，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力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两个文件，把彭德怀和赞同其意见的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打成“反党集团”。党的“左”倾错误，也给军队建设造成了影响。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1959年8月18日至9月12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继续开展批判彭德怀和黄克诚的斗争。这次军委会议扩大的范围很广，大军区领导除留一名值班外，全部参加了会议，省军区、野战军和部分师一级的领导也参加了会议，实际到会人数达1569人。

会议从彭德怀领导的平江起义到庐山上书各个时期的活动进行了回溯和追究，说彭德怀是“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倡导者。“教条主义的总根子”，“反党反毛泽东的篡党篡军的野心家”。并“揭发”彭德怀、黄克诚、周小舟等人结成了“军事俱乐部”，阴谋反党。最后，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决议》。决议要求全军在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毛泽东著作，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和政治理论水平，加强党性锻炼的基础上，“热烈讨论和坚决执行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决议，同全国人民一道，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

军委扩大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做出决定：免去彭德怀的国防部长职务，由林彪接任国防部长；免去黄克诚的总参谋长职务，由罗瑞卿任总参谋长。9月26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委组成人员的通知》，调整了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成员，毛泽东任主席，林彪、贺龙、聂荣臻为副主席，罗瑞卿为秘书长，军委的日常工作由林彪主持。

全军贯彻落实八届八中全会和军委扩大会议的精神，层层进行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斗争。在批判彭、黄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同时，也揭发本单位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半年左右的时间里，将一大批对“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表示异议和对彭、黄表示同情的同志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全军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共有1848人。一些对“三面红旗”有疑惑的人也被划为“中右分子”，并作了处理。

军委扩大会议上对彭德怀等人的指责和批判缺乏事实根据，有的甚至是歪曲事实的，但在当时“左”的思想指导下，人们并没有认识到这种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等问题所带来的不良后果和影响。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的召开以及随后在全军开展的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斗争，是党的“左”倾错误思想在军队中贯彻执行的表现。它否定了

参见《中国共产党军队政治工作七十年史》第1版，第5卷，238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

新中国成立以来军队建设中许多正确的东西，对部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造成了很大危害。

1960年军委扩大会议和《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

1959年9月，林彪接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便大讲政治挂帅，提倡个人崇拜，在军队中提出和推行一套“左”的东西，林彪的所作所为，遭到了邓小平、罗荣桓和总政治部主任谭政等领导人不同程度的抵制。林彪为了排除其推行“左”的一套的阻力，提出了端正军队政治工作方向的问题。

1960年9月14日至10月20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议程有三项：一是反修正主义问题，二是军队的编组和装备规划问题，三是政治思想工作问题。政治思想工作是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

在会议召开的前两天（9月12日），林彪在军委常委扩大会上，作了关于政治工作“四个关系”的讲话。他强调，在“四个关系”中，“要更重视人的作用”，在军队各种工作中，“政治工作好了”，“就可以一通百通”。提出了所谓指导政治工作的“四个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的原则。

会议开始后，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向大会作了《关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报告》，与会者认为这个报告是符合部队实际的。但是，林彪不仅指责谭政的报告没有围绕和突出他的“四个关系”，而且还说谭政主持总政工作期间，只把军队政治工作当作其他工作的保证，只重视抓部队的文化学习，而不抓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政治工作“方向有些偏”，要“彻底扭转和纠正”，必须坚持“四个第一”的军队政治工作方向。继而诬蔑谭政同彭德怀、黄克诚的错误路线长期“和平共处”，对上面的指示和思想贯彻的不够，发起了对谭政和总政治部其他部门的一些领导人的批判。

会议总结了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经验，研究讨论了在新的形势下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对其他两项议程也进行了讨论，最后通过了《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

《决议》总结了人民解放军历史上政治工作的成就。认为古田会议所确定的建军原则在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有着重要的作用，它是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基础，它所建立起来的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光荣传统是永远有价值的。同时，肯定“建国11年来，我军的政治工作是前进了，成绩是主要的、巨大的。”在此基础上。《决议》提出人民军队的建设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认真进行思想教育，坚决反对各种不良倾向，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等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军队的政治工作应当继续贯彻执行古田会议确定的群众路线，发扬三大民主，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等优良传统。

《决议》提出，在加强军队革命化建设的同时，也必须积极地提高全军的技术业务水平和科学研究工作的质量，加强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在人民解放军已由单一军种发展为诸军种、兵种合成军队、技术装备不断改善的情况

四个关系：人和武器的关系，各种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关系，政治工作中事务性工作和思想工作的关系，书本思想和活的思想的关系。

下，必须大力加强军事技术、业务和科学研究中的政治工作，充分发挥人在掌握技术中的主观能动性，保证最大限度地发挥技术装备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

《决议》还阐明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也是政治思想工作的根本路线。要求政治工作必须扎根于连队，发挥连队党支部的核心领导和战斗堡垒作用。《决议》还就建立一支又红又专的干部队伍，如何做一个合格的政治指导员，加强党委对部队政治思想的领导等问题，提出了具体要求及实施的办法。

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是经过到会人员的集体努力形成的，《决议》对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和建国后 11 年来军队政治工作经验进行了总结，对新形势下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进行了探索。毛泽东对这个决议十分重视，亲自进行了修改。12 月 21 日，《决议》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转发全党全军执行。

由于这个《决议》是在当时党内“左”倾错误继续发展，在林彪错误地批判谭政，纠正政治工作所谓“方向偏”的背景下产生的，一些主要观点，贯彻了当时党的“左”的错误思想和林彪的错误主张。如：《决议》把阶级斗争作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把反政治上的“右倾”作为军队政治工作的主要任务；把林彪提出的“四个第一”写进了《决议》的《总纲》，并认定“四个第一”“是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方向，也是整个军队建设的方向”。提出“广泛地又是灵活地运用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大字报的方法”打好思想仗，等等。这些内容对全军政治工作产生了消极影响。

军委扩大会议后，林彪继续诬陷总政治部有一个所谓“谭政反党宗派集团”，总政治部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进行“整风”，揭发批判谭政等人，随之谭政的军委委员和总政治部主任职务被撤销。

1961 年 1 月，中共中央决定罗荣桓再次出任总政治部主任一职。

《决议》的贯彻执行，对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加强基层建设，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尤其是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和其他军队领导人，对林彪的一些错误主张进行了抵制，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林彪“左”的一套的推行，但在当时全党“左”的思想发展的形势下，《决议》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错误思想和内容，也对军队建设产生了许多消极影响和不良后果。

二、加强政治工作和大抓基层建设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提出的要加强军队各方面的政治工作，深入基层、改进工作作风的要求，从1960年起，在军队建设中先后开展了学习毛泽东著作，争创“四好连队”、“五好战士”，学习雷锋、南京路上好八连先进典型，深入基层改进工作作风等一系列活动。

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指南，也是人民解放军的指导理论。开展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活动，是人民解放军提高干部、战士的理论水平和加强部队思想建设的根本性措施，早在50年代中期开始，人民解放军就开展了群众性的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的活动，总政治部对全军干部战士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作了具体的规定。

1960年9月30日，中共中央在全国发行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总政治部要求全军各单位广泛宣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组织广大干部战士进行认真学习；各军事院校在政治理论课中，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有关文章作为主要内容。号召全军官兵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把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1960年10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也要求“一切干部的理论学习，都要以毛泽东著作作为主要内容。部队和院校的军事、政治训练，都要以毛泽东著作作为基本课程。要全面地改革军事、政治训练，教材中一切与毛泽东思想不相符合的部分，必须彻底革除。”

据此，全军把学习毛泽东著作作为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主要内容，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都把学习毛泽东著作作为第一位的任务。为了配合全军开展的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八一”杂志社、军事科学院、政治学院和高等军事学院等单位共同编写了《毛泽东同志论人民战争与人民军队》言论辑录，向全军发行，作为全军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一本普及性的读物；不久，总政治部又编印了《毛泽东著作选读》颁发全军，供广大干部战士阅读学习。

1963年12月23日至1964年1月13日，总政治部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总结了几年来部队学习毛泽东著作群众运动的经验，表彰了一批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先进典型，号召全军进一步掀起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的新高潮。

1964年5月，总政治部又以《解放军报》刊载过的毛泽东语录为基础，编辑出版了《毛主席语录》，向全国全军发行。

全军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提高了干部战士的理论水平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但在这一运动中，由于林彪宣扬“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毛泽东的后“一句顶一万句”，以及“带着问题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需要什么，学什么”、“活学活用”、“立竿见影”、“要背警句”、“走捷径”等实用主义的学习方法。也出现了一些形式主义、实用主义的问题。针对林彪把学习毛泽东著作实用主义化的做法，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曾指出：“应当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精神

实质,带着问题学这几句话改掉为好。”并得到了党的总书记邓小平的支持。在 1963 年以前,全军学习毛泽东著作基本上还是贯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因此。这一时期开展的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对于部队干部改造思想、提高觉悟、增强斗志、改进工作作风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963 年 12 月,罗荣桓逝世后,林彪再次提出“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方法,并强调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方法,是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正确途径”,“不仅适用于战士,也适用于干部,不仅适用于一般干部,也适用于高级、中级干部,适用于各行各业做各种不同工作的干部。”1965 年 11 月,林彪又提出了“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要求“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企图通过学毛泽东著作活动推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大搞个人迷信,把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引入歧途。

虽然林彪在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中,推行了一套“左”的做法,但是,全军的广大指战员始终以饱满的政治热情认真学习毛泽东著作,全军的干部、战士、职工和家属都参加了学习,不少干部战士通读了《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并用毛泽东思想指导自己的工作和行动。通过对毛泽东著作的学习,对于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开展“四好连队、五好战士”运动

加强连队工作,搞好基层建设,是人民解放军几十年建设中取得的一条重要经验。在“以我为主”的建军思想指导下,从 50 年代末起,人民军队建设在借鉴红军时期建军经验基础上,在基层建设上做了大量工作,其中最突出的内容就是大力开展“四好连队、五好战士”运动。

早在 1958 年上半年,根据全国青年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军队代表向全军青年发出的开展“五好”竞赛的倡议和总政治部关于《在连队中开展“五好”的指示》,即在全军掀起了一个争当“五好”个人和争创“五好”连队的群众性运动。“五好”的内容为:“努力学习,爱护武器装备和一切公物,消灭事故,节约生产,锻炼身体。”同年 12 月,又调整为“学习好,工作好,爱护武器装备、消灭事故好,生产节约好,身体好”。

1960 年 10 月,军委扩大会议充分肯定了军队中开展的“五好”运动,把“五好”内容确定为:政治思想好、军事技术好、三八作风好、完成任务好、锻炼身体好,写进了会议的决议。

12 月 30 日,中央军委办公厅又传达了林彪对 1961 年部队工作的指示,提出连队的工作应当抓四个方面,即:一是抓政治工作,二是抓作风,三是抓军事训练,四是抓生活。要求各个连队争做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军事训练好、生活管理好的“四好连队”。从此,一个创造“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的活动作为基层建设的内容在全军开展起来。

为了更好地指导这一运动的开展,1961 年 10 月 18 日至 11 月 4 日,总政治部召开了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会议对全军开展的“四好连队、五好战士”运动提出了六个方面的要求,即: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大抓活的思想教育;

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社会主义时期)》,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著,176 页,1989。

做好军事训练中的政治思想工作；加强管理教育，培养三八作风；搞好物质文化生活；加强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改进政治指导员的工作方法。这次会议把“四好、五好运动”更为具体化，更便于基层干部战士操作。

创“四好连队、五好战士”运动，是群众性比、学、赶、帮竞赛活动的产物。要求连队从四个方面来开展工作，战士从五个方面来要求自己，把连队工作具体化，使基层连队的建设有了明确的标准和目标，这对于加强人民解放军的建设，特别是基层连队的建设是一个有力的促进。

后来，由于林彪片面地强调政治工作，用“一好”（政治思想好）去代替其他“三好”，使这一运动出现了偏差。1971年9月，这一运动即告终止。

开展学习雷锋、好八连活动

60年代初，人民解放军在加强军队各项建设的同时，还开展了学习雷锋和好八连这两个先进典型的活动。

雷锋是沈阳军区工程兵某团运输连班长，是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一位共产主义战士。他努力工作，认真学习，一心为公，1962年8月，不幸因公牺牲，实现了他自己立下的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当中的誓言，充分体现了革命战士的高贵品质和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是全党全军的一代楷模。

1963年2月9日，总政治部向全军发出了关于开展宣传和学习雷锋活动的通知，指出，雷锋的生平事迹是对广大干部战士进行革命精神和共产主义思想品德教育的教材，是加强部队思想建设，推动创造四好连队、五好战士运动的强大思想动力，全军干部战士要认真学习雷锋爱憎分明、永不忘本的坚定无产阶级立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的工作态度；艰苦朴素、克勤克俭、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高尚品德，以钉子精神努力学习毛泽东著作，自觉接受党的教育，严格要求自己，认真改造自己的好学上进的精神。为了配合全军对雷锋的学习。《解放军报》发表了《雷锋日记摘抄》和雷锋事迹。

3月5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发表了毛泽东的“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随后，又发表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题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题词，指出了雷锋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新一代的光辉榜样。

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号召下，全军迅速掀起了学习和宣传雷锋活动的热潮，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都把学雷锋活动作为政治思想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各部队通过广播宣传，举行报告会、座谈会，读报，出墙报等多种形式，广泛、深入地宣传雷锋先进事迹；部队的广大官兵也都决心以雷锋为榜样，处处以党的利益为重，从革命需要出发，党叫做什么就做什么，学雷锋、见行动。部队中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的好人好事层出不穷，蔚然成风。

在开展学雷锋活动的同时，全军还开展了宣传学习“南京路上好八连”的活动。南京军区某部八连自1949年6月进驻上海市南京路后，在14年的时间里，虽居热闹繁华的南京路，但始终保持着人民解放军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身居闹市，一尘不染，热心为人民服务，深受广大市民的赞扬，被上海人民称为：“南京路上好八连”。

1963年4月8日，总政治部在批转总政青年部《关于部队学习雷锋活动情况报告》中，指出：“在某种意义上讲，好八连是一个集体的雷锋。雷锋和好八连是对部队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活教材。”报告把学雷锋和学好八连的活动结合在一起，要求部队在开展学雷锋活动的同时，也要向“南京路上好八连”学习，争创像好八连一样的先进集体，4月25日，国防部发布命令，授予八连以“南京路上好八连”的荣誉称号。8月1日，毛泽东主席专门写下《八连颂》一诗，歌颂好八连的先进事迹，号召全军各部队向八连学习。

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全军各基层连队，结合开展“四好连队、五好战士运动”，以八连为榜样，努力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完成训练和其他各项工作任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继续保持和发扬艰苦朴素、勤俭建军的优良传统，部队的基层建设得到了全面的落实。

60年代前期，人民解放军除了开展向“南京路上好八连”先进典型学习外，还先后宣扬了欧阳海、王杰、谢臣、麦贤得和武汉军区“硬骨头六连”、广州军区“南海前哨钢八连”、沈阳军区“学习毛主席著作模范红九连”、“神枪手四连”等一大批先进集体和个人。开展这些宣传和学习活动，提高了全军干部战士的思想觉悟，促进了基层各项建设，部队精神面貌焕然一新，“雷锋精神”和“好八连精神”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军队思想道德建设的主贵精神财富。

深入基层，改进工作作风

深入基层，与群众建立广泛的联系，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一贯工作作风。早在195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就发出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并把这项工作视为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一项重要措施。根据这一指示精神，总政治部作出干部下连队当兵的规定，要求全军各级干部除年老、体弱、有病者外，每人每年至少要用一个月时间下连队当兵，没有当过兵的或者没有做过基层工作的青年干部，第一次当兵的时间应为半年或一年，下连当兵的干部应当编入班、排，归班、排长领导，与广大战士坚持“五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操作，同娱乐，以了解基层，深入基层。在这一规定下，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北京军区司令员杨成武、沈阳军区司令员邓华、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等先后下连当兵。

将军下连队当兵的事迹在军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将军们的带动下，人民解放军掀起了一个干部下连队当兵的热潮，仅就1960年七八月间的统计，北京军区团以上干部下基层当兵的就有8800余人，沈阳军区有5000余人，南京军区有3000余人，空军机关有2000余人，这些干部下基层不仅同广大战士坚持“五同”，而且还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帮助连队解决实际问题，深受基层官兵们的欢迎。干部下连队当兵，既密切了干部和战士的关系，又使得广大干部更加了解基层的情况，便于更好地指导基层的工作。后来，下

《八连颂》：好八连，天下传。为什么？意志坚。为人民，几十年。拒腐蚀，永不沾。因此叫，好八连。解放军，要学习。隹军民，要自立。不怕压，不怕迫。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贼。奇儿女，如松柏。上参天，傲霜雪。纪律好，如坚壁。军事好，如霹雳。政治好，称第一。思想好，能分析。分析好，大有益。益在哪？团结力。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连当兵的活动就逐步发展成为干部下连蹲点、机关干部下连当兵代职等制度。

与此同时，中央军委各级领导和机关大抓部队基层建设，同基层连队的支部建立起广泛的、直接的联系，改进工作作风。

1961年1月，毛泽东要求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根据这些要求，总政治部于1960年11月和1961年1月，先后发出《关于军、师、团干部同连队支部建立联系制度的通知》，《关于执行毛主席指示，立即进行调查研究工作工作的通知》。1961年7月13日，又发出《关于领导机关进行调查研究和下连检查帮助工作的几项规定》，着重强调部队的主要领导和领导机关必须把调查研究作为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经常派出调查组，深入基层，发现和帮助基层解决实际问题，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全军出现了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狠抓基层建设的局面，军、师、团各级领导和机关普遍同连队建立了联系制度。这对克服领导和机关的官僚主义，改进工作作风，密切上下级关系和官兵关系，加强基层建设起了良好的促进作用，同时使各级领导和机关的工作指导更加符合实际。

1964年5月，中央军委在转发《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蹲点改造后进连队问题向军委的专题报告》中指出：“高级干部下去蹲点，确实大有好处。既可以有效地克服官僚主义，改进自己的领导作风，又可以起示范作用，带动广大干部改进工作作风；既可以检查领导机关作出的决定、提的办法是否切合实际，从而避免工作上的瞎指挥，又可以鼓舞部队，调动部队的积极性。”

60年代前期领导干部下连队当兵、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做法，有力地改进了领导作风，促进了基层建设的发展。

三、备战整军，加强国防工程建设

60年代初，由于中苏关系的破裂，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的叫嚣和袭扰行动，再加上印度在中国西南边境的挑衅，使中国周边国际形势趋于紧张，国家安全受到了威胁。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确定了“备战整军”的方针。按照这一方针，人民解放军加强了战备工作。

调整编制体制

调整编制体制是全军在“备战整军”方针指导下进行的一项重大工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10年中，随着我国国防工业的发展，人民解放军逐步由过去单一的陆军发展成为诸军兵种初步合成的军队，武器装备有了很大的改善，编制体制也作了较大调整。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人民解放军的编制体制还不尽合理，如部队中存在的官多兵少、机关庞大，连队缺编，装备落后，编制没有体现南北地区特点等情况，根据现代战争的需要，在1960年10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中央军委制定了组织编制和装备的8年发展规划。

在这个规划中，中央军委明确提出要在建立完整的现代国防工业体系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空军、海军和各特种兵，适当减少步兵和普通兵员的数量，努力提高质量，大搞民兵，大力培养、储备干部和技术力量等建设方针。就步兵的建设，规划还专门指出：要逐步地适当地裁减步兵和普通兵的数量，加强部队的火力、突击力、防护力和机动力，逐步实现全面的机械化。

根据这一规划，从1961年起，全军各大军区、军兵种都深入探讨了适应本战区和本军兵种特点的编制体制。1962年2月和3月，中央军委先后两次在广州和北京召开了全军编制装备会议，就全军的编制体制进行深入的探讨。这两次会议都是在“整军备战”的方针指导下召开的，会议依据中国目前面临的严峻形势，提出了人民解放军编制的原则和整编的方针，确定了新的编制装备方案，规定了整编的步骤和时间。但是，对军队的建设方向和标准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

1962年6月8日，周恩来总理在《东北地区军事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把“整军备战”改为“备战整军”，首次提出“备战整军”的方针。指出，通过备战促进整军，按战备的要求加强军队建设。解决了国防建设与军队建设的关系问题。随后，国防部根据两次编制装备会议的精神颁布了人民解放军军、师级单位的编制表，根据南北方的特点和防区的重点，对全军步兵师的编制体制进行了全面的调整。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公安部队和后备部队也做了相应的调整。使全军的编制体制逐步走向科学化、合理化。

从1959年到1965年，人民解放军在实行统一、正规的部队编制同时，还重点加强了海军舰艇部队和空军航空兵的建设，同1958年相比，海军增编了51.6%，空军增编了41.8%，其他如工程兵、铁道兵等各兵种的部队也作了相应的调整，部队的战斗力有了很大的提高。

加强国防工程建设

在调整编制体制的同时，中央军委对国防工程建设进行了全面的部署。50年代，国防工程建设的重点是沿海一带，进入60年代后，鉴于国民党军队继续窜扰东南沿海的同时，中苏关系形势日趋紧张，因此，在继续加强沿海岛屿防御工程建设的同时，还进行了以三北（即东北、华北、西北）地区为主的防御工程和导弹、原子弹研制试验基地特种工程的建设。

为了加强沿海岛屿国防工程的建设，1961年8月，总参谋部、总后勤部联合发出通知，将所有沿海岛屿上的防御阵地工程建设，纳入全军设防工程建设计划，其勘察、设计、施工和经费、物资、器材的申请、调拨等，统由工程兵负责。将沿海岛屿国防工程建设纳入全军统一规划，既避免了各军区、军兵种分别建设造成的不必要的浪费，又便于突出重点。

1963年2月，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在福州召开岛屿战备工作会议。会议在重点设防的原则指导下，提出在一些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能牵制敌人、起枢纽作用的岛屿上，重点建设一些阵地工程。会议还依据现代战争的需要，就岛屿的防御作战体系及阵地工程配置建设，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了岛屿防御工事战术、技术上的不足，提出了改进要求。

在这次会议之后，沿海各军区根据本防区岛屿的战略地位和担负的作战任务，在原计划设防岛屿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些岛屿的设防工程，并根据新的技术要求，对已经建好的岛屿防御阵地进行了改进。经过这次对岛屿守备工程的全面建设和对工程技术的改进，使得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十多年的艰苦施工，主要设防岛屿均基本上达到了能长期坚守、独立作战的要求。

1964年，针对中苏边境斗争形势，中央军委决定在“三北”地区建立国防工程体系。同年9月至11月，总参谋长罗瑞卿、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对华北地区进行了勘察。在此基础上，总参谋部对“三北”设防工程作了具体的部署。根据这一部署，北京、沈阳、兰州、新疆等军区抽调了大批部队，在气候恶劣、食宿条件都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风餐露宿，日夜奋战，在主要作战方向上，进行了大规模的国防工程建设。

这一时期，国防工程建设还依据现代战争的特点，力求达到具有防原子、防化学、防细菌，可抗拒一定当量的核武器袭击。并能在密闭隔绝较长时间里保障不间断地实施作战的能力。广大官兵发挥聪明才智，攻克许多难关，在技术较落后的情况下，按质量要求完成了施工任务。

为了更好地指导国防工程建设，1965年底，中央军委召开了全军国防工程会议，强调国防工程建设要正确处理全局与局部、重点与一般、前沿与纵深的关系，重申了重点设防的原则，要求各军区把国防工程建在最关键的地方。这次国防工程会议的召开，解决了国防工程建设当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使国防工程建设更为合理。

在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为了保障导弹、原子弹等尖端武器的研制和试验发射，国家还进行了特种工程建设。

1957年秋，中共中央确定建设中国第一座导弹试验场。

1958年初，全军对陆上和海上部分地区进行了全面的勘察，经过反复比较，最终确定了在西北地区建设第一个特种工程基地。3月14日，随着工程兵特种工程指挥部的成立，特种工程的建设也全面展开。经过3年的努力，于1960年8月，在西北茫茫的戈壁、人烟罕至的荒滩上，终于建成了中国第一座导弹试验场。

11月5日，在这个试验场上发射了第一枚中国自己制造的导弹。

1964年，在特种工程指挥部的领导下，工程兵又完成了国家第一个原子弹试验基地的工程建设，确保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试验。

60年代初是中国国防特种工程建设的起步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人民解放军发扬了不怕困难、不畏艰苦的精神，取得了巨大成就，奠定了国家国防特种工程建设的基础，为我国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大办民兵师，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

1958年2月美国不顾世界人民的反对，出兵入侵黎巴嫩、约旦后，又在中国台湾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对中国进行军事挑衅和战争威胁。因此，中央军委于7月召开扩大会议，提出在加强人民解放军战备工作的同时，加强民兵工作，实行全民皆兵，随时准备打击一切可能入侵的敌人。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会议，指出：我们除必须建设强大的常规部队和特种部队之外，必须在全国范围内把能拿武器的男女公民武装起来，以民兵组织形式实现全民皆兵。

9月29日，毛泽东主席在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中，指出：“帝国主义者如此欺负我们，这是需要认真对付的。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这样，在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时候，就会使他们寸步难行。”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号召下，从1958年起，全国掀起了大办民兵师、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的热潮。各个市、县、厂矿、公社、大专院校等单位都建立民兵师、团、营、连，到1958年底，全国建立民兵师5175个。

大办民兵师作为加强国防力量、防止帝国主义侵略的一项重要战略措施，在配合军队作战，抢险救灾，支援国家经济建设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大办民兵师中出现了一些过激现象，特别是在大跃进的狂热推动下，大办民兵师成为单纯地追求民兵人数越多越好，武装的面越大越好，许多民兵组织都是一哄而起，没有做细致的组织工作和政治思想工作，民兵工作出现了以民兵组织代替劳动组织，片面追求所谓“军事化”的形式主义现象，使民兵队伍质量建设受到了影响。

针对这些问题，1959年11月，中央军委召开会议，对民兵工作的战略地位、战略布局、指挥机构、训练方针、干部工作、武器管理、经费开支以及对民兵工作的领导等九个方面的问题，作了明确的规定，这九条规定被称为民兵工作的“九条方针”。对于纠正民兵工作中的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会后，成立了在中央军委领导下，由总参谋部、总政治部、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教育部、国家体委、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等单位各一名领导参加的民兵工作组，罗荣桓任组长，张爱萍、甘泗淇任副组长，各省（自治区）、地（市）、县均成立了党委领导下的民兵工作组，加强了对民兵工作的指导。

为进一步推动民兵工作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1960年4月，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民兵代表会议，与会代表有革命战争年代各个时期和建国后民兵工作中的先进人物、单位，总人数达6161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民兵工作的盛会。

会议强调，要组织动员民兵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除了加强军事训练外，还必须带头参加生产建设。指出：民兵是不脱离生产的群众武装，必

须注意工作方法，不能离开生产而孤立地强调民兵工作。据此，与会代表向全国民兵发出了“十项倡议”。这次会议的召开，促进了民兵工作的健康发展。

1961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民兵工作条例》。条例从民兵组织的建立条件和方法、配备原则，到民兵组织的工作任务、工作作风以及管理办法等各个方面，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条例还专门规定，选配民兵干部，必须坚持“四条原则”，优先从复员、退伍军人中选拔思想上、身体上、军事上和文化上等方面素质优秀的民兵干部。条例还修改了民兵的年龄，将男民兵最高年龄由50岁改为45岁，女民兵由50岁改为35岁。基本上是以保留基干民兵为主，全国的民兵数量也随之减少了几千万。《民兵工作条例》的颁布，使民兵工作有了可依据的法律制度。

1962年6月毛泽东提出民兵工作“三落实”（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的指示，从1962年冬到1963年春，全国各地都对民兵组织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整顿。在《民兵工作条例》和毛泽东对民兵工作“三落实”指示指导下，使民兵工作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十项倡议”即，一、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二、积极参加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运动；三、积极参加爱国卫生活动；四、积极参加配合人民解放军巩固国防；五、积极维护社会治安；六、各级学习军事技术；七、参加体育锻炼和国防体育活动；八、积极学习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九、积极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十、积极学习毛泽东著作。

四条原则是：一、严格条件；二、专职兼职相结合；三、保证党支部对民兵分队的领导；四、民主管理。

四、群众性练兵活动的开展

群众性练兵活动和大比武

1963至1964年，全军掀起了群众性大练兵、大比武热潮。这一活动规模之大，热情之高，影响之深，是人民解放军训练史上前所未有的。实践证明，这一活动的开展，对提高人民解放军战斗力，加强部队的全面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50年代末期，由于错误地开展了反“教条主义”的斗争，全军教育训练受到极大影响。

1959年底，依据“以我为主”思想，中央军委提出了四条军事训练方针：（1）全军研究毛泽东的军事著作；（2）继续总结人民解放军的经验，编出自己的条令；（3）研究原子弹、导弹等条件下的作战与训练；（4）军以上干部选读部分马、恩、列、斯的军事理论，批判地选读克劳塞维茨的军事著作。接着，又提出了“少而精”、“从难、从严、从实战需要出发”的训练原则。

1960年初，中央军委批准成立军事训练和军事学术研究委员会，由叶剑英任主任，领导全军军事学术研究和训练工作。根据这些训练方针和原则，中央军委对如何搞好军事训练，采取了一些措施。

一是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在全军特别是干部中，努力学习毛泽东人民军队、人民战争的理论。1961年中央军委指示，师以上干部训练总时间的1/3至2/3，团以上干部训练总时间的1/3至1/2学习毛泽东著作，各类军事院校普遍开设毛泽东军事思想课，研究解决军队建设特别是教育训练中遇到的新问题。

二是确定军事训练的重点，统一训练要求。

1960年，叶剑英在《关于军事训练问题向军委的报告》中，总结前几年军事训练的经验，提出：全军军事训练应注意四个问题，即突出重点，抓住关键，反复练、经常练、勤学苦练，特别要在复杂、困难条件下练；掌握练的要领，讲究练的方法。海军在岸苦练、出海精练，空军在地面苦练、空中精飞，陆军在营苦练，野营精练；一切技术训练都是为了“开得动、打得准、联得上”，一切战术训练都是为了“合得成，摆得开，捏得紧”；严格遵守条令和规章制度，切实防止和减少事故。

三是编写条令、条例和教材，完善军事训练法规和制度，遵照毛泽东“一定要搞出我们自己的战斗条令来”的指示，在叶剑英主持下，军事科学院组织各级研究机构，在全军抽调近万人，开展以战斗条令为中心的各种条令、条例，教范、教程的编写工作。1961年5月后，《合成军队战斗条令》、《步兵战斗条令》和各军兵种条令、条例等陆续颁布试行。

新的训练方针、原则的确立，条令条例的颁布，使全军军事训练有了新的标准和依据，为开展军事训练并掀起大规模群众性练兵热潮创造了条件。

这一时期，由于军事斗争形势日益紧张，党中央、中央军委高度重视军队的战备工作。1962年，中央军委发出了“备战整军，增加全训师，大搞训练”的指示。据此，各部队从实战需要出发，狠抓基础训练，突出技术训练。驻边、海防和准备执行作战任务的部队，结合战区特点和作战急需，进行紧急战备情况下的适应性训练，如渡海登陆训练，特种地形和复杂气象条件下

的训练。有条件的部队还响应毛泽东“部队要学游泳”的号召，开展游泳及武装泅渡训练。可以说，60年代严峻的战备形势，增强了各级抓好军事训练的紧迫感和针对性。

在全军军事训练重新起步的形势下，各级领导机关为了抓好部队的军事训练，深入基层，言传身教，发扬传统练兵方法，注意发现和培养典型，促进了军事训练的开展。特别是“郭兴福教学法”的产生和大力推广，将全军群众性练兵活动推向了高潮。

1961年，南京军区某军军长李德生在某团2连蹲点抓训练时，发现该连副连长郭兴福在进行小组战术教学中，吸取了班战术和单兵战术教学的优点，教得很活，他便组织工作组对郭兴福进行指导和培养，把练技术、练战术和做思想工作结合起来，形成了很有特色的郭兴福教学法。同年，总参谋部在《军训通讯》上介绍了郭兴福的教学经验，向全军推荐了他的教学方法。

1962年11月，南京军区首先在全区推广了郭兴福教学法。接着，郭兴福教学法在广州、武汉、沈阳军区表演了数十场，受到普遍好评。1963年底，叶剑英元帅在镇江观看了郭兴福教学法汇报表演后，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作了书面报告，指出，郭兴福教学法继承了人民解放军的传统练兵方法，把每个战士练得像小老虎一样。他建议在全军推广。毛泽东对此非常赞赏，并肯定地说：“不仅是继承，而且有发展。”1964年1月3日，中央军委发出号召：全军立即行动起来，开展一个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群众运动。1月25日至30日，总参谋长罗瑞卿在南京军区主持召开了推广郭兴福式教学方法的现场会议，并将这一先进的练兵方法概括为“红、活、硬、细、实”。5月，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结部队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的经验，联名颁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连队基础训练方法二十条（草案）》，进一步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指导连队基础训练。南京会议后，各军区、各军兵种，各军事院校迅速开展了创造郭兴福式教练员活动，一个深入广泛的比、学、赶、帮、超的群众性练兵活动在全军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展开。

郭兴福教学法是在群众性练兵的实践中产生的，而这一教学法的推广和普及，又将群众性练兵运动推向高潮。为了检查训练效果，队夏季开始，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分别组织了大比武。同时选拔尖子选手，准备参加全军比武。

在这一运动中，党和国家领导人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和鼓励。6月15日和16日，北京、济南等军区代表队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和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领导人等作了汇报表演。与会领导对汇报的科目及官兵高超的技艺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毛泽东观看汇报表演时指示：“很好。要在全军中普及，光有‘尖子’部队是不够的，普及要很快布置，要抓紧这个工作。”周恩来说，练兵就是这样的练法。陈毅、贺龙、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元帅，还多次观看了其他部队的军事表演，对大比武给予了充分肯定。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人的勉励，给全军指战员以极大的鼓舞，促进了全军大练兵活动。

在这次群众性大练兵、大比武活动中，各军兵种部队、机关结合专业技术和业务特点，培养自己的尖子、典型；把大比武同开展创“三手”（神枪手，神炮手，技术能手）活动结合起来，通过抓尖子，带动部队整体素质的

提高。7月上旬，各军区、各军兵种比武基本结束。7月16日至8月23日，全军分18个比武区进行比武（不包括海军舰艇、岸炮、航空兵部队）。参加比武的有部队和民兵共1.37万人，参观见学的干部近10万人。比武中，获集体一等奖的单位1212个，获个人一等奖的有2257人，其中各军、兵种一等集体尖子289个，个人一等尖子545人。

大比武活动，在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通过群众性大练兵大比武活动，不仅极大地促进了部队战斗力的提高，也带动了其他工作。在练兵活动中，各级领导深入基层，同战士实行“五同”，改进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培养和树立典型，密切了官兵关系：大比武活动的开展，规范了部队的训练、工作和上活制度，促进了条令条例的落实，使部队涌现出一大批懂训练、会管理、会做思想工作的优秀基层干部，推动了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在这一活动中，也加强了部队的政治工作，使政治思想工作围绕中心任务一道去做，真正起到了服务和保证作用。据统计，在大比武活动中，全军政治事故下降了37.3%。

大比武活动也有其不足之处。如在比武中偏重技术基础训练，忽视了诸兵种合成训练；有些部队在比武活动中，有拼凑尖子、搞花架子、弄虚作假等形式主义、锦标主义的现象。但是，全面地、历史地看，大比武对当时部队建设产生的积极影响，成绩是巨大的。

“突出政治”的提出及其危害

正当全军群众性练兵活动轰轰烈烈向前发展之际，时任国防部长的林彪，认为大比武活动是对他推行“左”的一套的“冲击”和否定。他派叶群等人到基层“蹲点”，搜集练兵和比武中的问题，并抓住大比武活动中出现的一些枝节问题大做文章，污蔑大比武是“搞锦标主义、形式主义”、“弄虚作假”，冲击了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动，是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方向有些偏”。1964年11月30日，林彪在全军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一定要突出政治”。

12月29日，他又召见总政治部领导，指出“‘四个第一’不落实”，并说这是带有全军性的问题。他强调：“现在出现了不好的苗头，军事训练搞得大突出，时间占的太多，军政工作比例有些失调，冲击了政治。”“军事训练、生产等如果和政治工作发生了矛盾，要给政治工作让路”，“时间上谁让谁的问题，基本上要确定一个原则：让给政治。”“军事训练、生产等可占用一定时间，但不应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它”等等，从而全盘否定了群众性练兵活动。林彪还提出：1965年的工作要“突出政治”，今后两三年不要搞全军性的比武，军区、军、师大规模的比武也都不搞。

林彪对军事训练及大比武进行否定的讲话和“突出政治”的主张提出后，许多军队领导表示了异意。

1965年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的第八次扩大的军委办公会议上，各军区、各军兵种领导在会议讨论发言中，充分肯定了大比武活动，指出这是人民解放军抓军事训练最好时期，带动了其他各项工作，成绩是主要的，方向是对的。同时，政治工作也落到了实处，事故下降，获得了军政双丰收。总参谋长罗瑞卿在会上说：一方面“不要犯单纯军事观点和单纯技术观点的错误，一方面必须把政治思想工作落实到军事训练和其他各项工作之中，使各项工

作都过得硬。”会后，针对林彪“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论调，罗瑞卿说，如果单纯政治好，别的都不好，垮下来，这种政治恐怕不能算好政治，是空头政治，哪里有这种政治，“政治也不能乱冲一气”。罗瑞卿对“突出政治”的不同意见和解释，引起了林彪的极大不满，林彪认为是下“捧他”、“跟他”，欲置罗于死地而后快。为排除阻力，他派叶群到杭州向毛泽东诬告罗瑞卿“反党、反毛主席”，说“大比武活动”是个大阴谋，诬陷罗瑞卿“妄图夺取兵权”，反对“突出政治”，是“逼林彪让贤”。并授意吴法宪、李作鹏等人写揭发材料。12月2日，毛泽东在一份报告中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衷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12月8日至15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罗瑞卿进行了背靠背地揭发批判。随后便解除了他的总参谋长职务，接着，在全军开展了对罗瑞卿的所谓“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批判。通过这次批判，使大比武遭到彻底否定。

林彪“突出政治”的提出和在全军贯彻执行，给军队建设带来严重危害。

军事训练受到了冲击，轰轰烈烈的群众性大练兵活动被压了下去。全军从此大减军事训练时间，大砍军事训练科目，废止了军事、政治、后勤、科研等业务、技术考核的标准，以及一些条今条例和规章制度；在院校，否定了以教学力中心的方针。

林彪的“突出政治”，严重歪曲和混淆了政治与政治工作，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和其他业务工作的辩证关系，在全军官兵的思想中造成了极大的混乱。林彪强调把政治工作摆在“大于一切”、“高于一切”的位置，用政治工作代替和取消了军事和其他工作。把政治工作与其他工作的关系变成为“冲击”与“被冲击”的关系，压倒与被压倒的关系。这种形而上学的“左”的理论实行的结果是，在政治与军事、政治与业务、红与专、政治工作与其他工作的关系上，搞乱了人们的思想。使许多人对政治工作的性质、地位、作用产生误解，认为政治好了，其他工作就自然而然上去了。许多领导和机关把开展政治运动，抓“兴无灭资”，抓阶级斗争，开展批判修正主义，作为部队的中心工作。林彪还荒谬地说：“政治好了自然就会打仗。”过分强调人的精神因素，使政治工作越来越脱离实际。

此后，“突出政治”成为考察一切工作的首要标准，并成为考核和选拔干部的“首要条件”。对各级干部以是否“突出政治”进行“排队”审查，对在大比武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尖子，进行排挤以致严厉批判。许多干部、战士因怕戴上“单纯军事观点”、走“白专道路”、“不关心政治”的帽子而不敢热心抓军事、学业务，不敢搞科研，严重影响了部队军政素质的提高。

1965年12月，全军召开政治工作会议，贯彻林彪的“突出政治五项原则”，随后《解放军报》连续发表了数篇关于“突出政治”的社论，把关于“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中去”的观点加以批判，使“突出政治”当成军队各项工作的总方针和心须恪守的原则。1966年8月，林彪指示以军委名义颁发了《关于改革部队军政教育时间比例的决定（草案）》，使政治教育时间占部队工作时间的50%，军事训练时间大大压缩，全训部队军事训练时间也仅占40%。并规定，其他工作如果与政治教育发生了矛盾，都要给政治教育让路，使“突出政治”在时间上、制度上得到保证。从此，“突出政治”被置于全军工作的“统治地位”，使政治工作脱离实际的偏向越来越严重。这种片面的“突出政治”，大大削弱了政治工作在军队建设中的威力和作用。政治工

作的威信受到严重损害。

五、国防尖端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武器装备实现国产化

60年代，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毛泽东和党中央、中央军委把研制原子弹、导弹列为武器装备发展的重点，同时，加快常规武器国产化进程。广大科技工作者和军工生产部门，在“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方针指导下，克服重重困难，经过艰苦努力，相继研制成功原子弹、氢弹和导弹核武器，并使常规武器的发展完成了由仿制到自行研制的转变，初步建立了较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大大增强了国防实力。

自力更生，突破“两弹”技术

在5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就作出了发展核武器等尖端武器的重大决策。

把立足点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础上，自力更生进行革命和建设，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中国发展核武器等尖端武器，走什么样的道路，是指导进行国防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问题。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认识到，拥有几百万军队的中国，在关系到国家安危的重大问题上，完全依靠别国的援助来实现国防现代化、发展核事业，必然受制于人，这是国家根本利益所不能允许的。因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制定发展核武器的方针时，十分强调坚持“自力更生”。1956年10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了聂荣臻提出的“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的发展我国的核武器、导弹事业的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中国在发展“两弹”技术中，一方面努力争取得到苏联的帮助，引进技术，少走弯路，一方面强调做好“消化、吸收”工作，从培养人才，建立工业基础设施等方面扎实起步。在中苏科技人员的合作下，1958年，中国建成了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原子弹研制工作进展顺利。

然而，就在中国研制“两弹”进入关键阶段之际，1959年6月，苏联以与美国、英国举行部分禁止核武器会谈为由，单方面撕毁协定。并于次年8月，撤走全部专家，带走重要图纸资料，停止供应设备材料，给正在进行中的中国核弹研制工作造成了巨大损失和严重困难。此时，我国正值3年经济严重困难时期，国际上有人幸灾乐祸，断言中国“二十年也搞不成原子弹”。国内也有人认为研制原子弹困难太大，花钱太多，主张应集中力量发展飞机和其他常规武器。

在这紧要关头，中共中央毅然决定：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把原子弹研制出来。毛泽东明确指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表达了中国人民不信邪，不怕压，勇于战胜困难的决心和意志。

1960年2月，中央军委进一步明确了“两弹为主，导弹第一”发展国防尖端技术的方针。中共中央在七八月召开的工作会议上，讨论了克服面临的严重困难，发展国防科学技术特别是尖端技术的问题，提出要“埋头苦干，发愤图强，自力更生，奋勇前进”的口号。为保证这项工作的进行，中央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一是加强领导，组织全国各科研、生产部门协作攻关。

1962年11月，成立了以周恩来任主任、罗瑞卿任办公室主任、国务院几位副总理及中央军委有关部门领导参加的专门委员会。二是遵照“缩短战线，任务排队，确保重点”的原则；对其他一些尖端武器发展项目，除保留一定的骨干力量继续攻关外，暂缓进行，以集中力量研制“两弹”。三是选调技术骨干100名，大中专毕业生6000名，培养充实“两弹”研制队伍。

中央专委会在周恩来领导下，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大力协同，及时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进行调度，卓有成效地组织了全国大协作，解决了研制“两弹”中遇到的100多个重大问题，安排了“两弹”所需的特殊材料、部件和配套产品2万余项的研制生产，大大加快了“两弹”研制的步伐。广大科技工作者在科研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的环境下，凭着力祖国争光的勇气，克服重重困难，发挥聪明才智，攻克了一道道难关，经过反复试验论证，于1963年3月，提出了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

西北核武器试验场和研制基地建成后，为全面突破原子弹技术创造了条件，从1963年3月起，集中北京的国防科研人员陆续迁往大西北，进入研制原子弹的总攻阶段。广大科技人员奋发图强，进行了千百次试验。

1964年6月6日，经过全尺寸爆轰模拟试验，完全实现了预期设想。

1964年10月16日，由周恩来亲自领导，张爱萍担任现场总指挥，刘西尧任副总指挥，中国在西北核试验基地首次进行了原子弹爆炸试验，获得圆满成功。

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震惊了全世界，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激发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给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以极大鼓舞，有力地打击了少数大国核垄断的阴谋，对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贡献。在首次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的当天，中国政府即发表声明，表明中国政府关于核武器的严正立场：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力的。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发展核武器，是为了防御，为了保卫中国人民免受美国发动核战争的威胁。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和无核地区使用核武器。在此以后，中国不断重申了这一原则立场。

第一颗核爆炸装置试验成功后，1965年5月14日，中国又成功地进行飞机空投原子弹空爆试验，使中国有了可用于实战的核武器。

通过原子弹的研制，培养了科技队伍，积累了经验，形成了全国协作网，为氢弹的研制奠定了基础。1965年1月，毛泽东明确提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周恩来要求有关部门立即作出全面规划。

早在1960年，在钱三强负责下，已开始了对热核材料性能和热核反应机理的基础研究。在原子弹研制成功后，氢弹研制全面展开。经过广大科技人员的刻苦攻关，氢弹研制的关键难题一个个被攻破。1967年6月17日，中国成功地进行了一颗氢弹爆炸试验。从第一颗原子弹到第一颗氢弹，美国用了7年零4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中国只用了2年零8个月，而且赶在了法国前面，成为第4个掌握氢弹技术的国家。

导弹核武器，是射程远、精度高、威力大的战略武器，是国家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

1963年12月，中央专委会决定：“核武器的研究方向，应以导弹头为主，

空投弹为辅”。核航弹投放试验成功后，中央专委立即组织集中力量研制导弹核武器。早在1960年11至12月，中国仿制成功苏制P—2型导弹；1964年6、7月，中国研制的中近程地地导弹进行了3次飞行试验均获成功；

1966年10月，自行设计的改型中近程导弹，作为核武器的运载火箭试验成功。

导弹试验成功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示尽快实现“两弹”结合，研制成功导弹核武器。

1966年3月11日，周恩来亲自主持会议，听取关于进行两弹结合的试验论证报告，并决定，先搞“冷试”（即弹头不装核材料）后搞“热试”。毛泽东在试验关键阶段，鼓励主抓此项工作的聂荣臻说：这次可能打胜仗，也可能打败仗，失败了也不要紧。聂荣臻转达了毛泽东的鼓励，广大科研人员深受鼓舞。1966年10月27日，我国成功地进行了导弹核武器试验。

“两弹”研制成功，是贯彻执行“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方针的重大胜利，是广大科技工作者团结协作、奋力攻关的结果，标志着中国国防科技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人民解放军有了核反击的能力，打破了帝国主义的核垄断，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提供了有力的保证。邓小平后来曾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加快常规武器国产化步伐

在大力发展尖端武器的同时，中央军委也特别强调加快实现常规武器国产化。1958年毛泽东在一次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指出，我们发展核武器，不能因此否定常规武器。洋的土的要结合，常规武器加特种武器。依据毛泽东这一思想，中央军委制订了“突破尖端，加强常规”发展武器装备的方针。为尽快研制新一代常规武器装备，使武器装备的研制、生产走向系列化、正规化，在国防工业科研和生产中，加强了科研机构的建设。1960年12月，组建了国防部第六研究院（研制军用飞机）、第七研究院（研制舰艇）、第十研究院（研制军事电子装备），分别由唐延杰、刘华清、孙俊人任院长。此外，总参谋部、总后勤部、各军兵种还组建和扩建了一批其他研究院（所），担负本部门、本军兵种常规武器的论证、研制等任务。为进一步加强国防工业的统一领导，1961年11月成立了由总参谋长罗瑞卿任主任的国防工业办公室。遵照中央军委确立的发展常规武器的方针和规划，科技战线和军工生产部门，一方面大力抓紧现有武器装备的改进工作。一方面积极研制新一代武器装备。

在发展陆军武器装备方面，遵照1960年军委扩大会议提出的主要是“提高火力、突击力、防护力和机动力”的要求，着手研制新一代武器装备。到1963年，一大批中国自行研制的步枪、火炮、坦克、装甲车等陆军武器装备相继定型并陆续装备部队。

空军装备的发展，在苏联中断对华援助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心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革命精神，努力发展自己的军事航空工

《邓小平文选》，第1版，第3卷，2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转引自李俊亭：《毛泽东对中国战略武器发展的历史贡献》，载《军事历史》，1995年第3期。

业。航空工业部门和科研机构采取仿制和自行设计相结合、参照样机改进改型、自行设计等多种途径，循序渐进地从仿制向自行研制过渡，加速军用飞机的国产化进程。经过几年研究设计，到 60 年代中期，先后研制成功并陆续装备部队的有：全天候歼—5 甲型歼击机、超音速歼—6 型飞机、轰—5 型轰炸机及航空配套装备；设计定型的有：超音速强—5 型飞机、轰—6 型飞机等。作战飞机的不断发展，使人民解放军空战能力进一步提高。

海军装备，在 60 年代初以前，中国还无自行设计制造大型舰艇的能力，这与中国海洋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尽快发展海军装备，是建设一支强大海军、有效地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需要。

1955 年中央军委即作出了《关于海军建设的决议》，强调以发展潜水艇为重点，相应地发展必要的水面舰艇，无论是潜水艇，还是水面舰艇，都应特别注意采用新的技术成果，如导弹、核动力等。在苏联毁约、技术力量和财力不足的严重困难形势下，中央军委在 1960 年召开的扩大会议上，再次明确规定海军以潜艇、快艇为重点的装备建设方针，并要求坚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海军舰艇科研机构在中央军委统一领导下，根据资金条件和科研力量，保留一定科研力量对核潜艇关键项目进行攻关，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形成拳头，突击研制常规动力潜艇和快艇。到 1966 年，先后完成了中型鱼雷潜艇、小型导弹快艇、大型常规动力导弹潜艇和大型导弹快艇的仿制，并对某些型号舰艇作了改进。同时，还自行设计完成了巡逻艇、高速护卫艇、反潜护卫艇、导弹快艇、港湾扫雷艇、小型登陆艇、火炮护卫舰的制造。

战术导弹在现代战争中越来越占有重要地位。在 50 年代后期，中国在重点发展战略导弹的同时，积极发展战术导弹。

1964 年 12 月，试制成功第一批地空导弹（命名为“红旗 1 号”）；

1965 年试射成功“红旗 2 号”地空导弹；

1964 年试制成功“霹雳 1 号”、“霹雳 2 号”空主导弹；

1966 年底，仿制成功“上游 1 号”舰舰导弹。这些导弹武器装备部队后，增强了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作战能力。

与此同时，人民解放军的通信及电子技术、防化、工程、后勤等装备也有相当程度的发展，提高了武器装备自控、自动化程度及作战性能，提高了人民解放军作战指挥、通信保障、电子对抗的现代化水平和后勤保障能力。

在 60 年代前期，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的发展，逐步完成了由仿制为主到自行设计研制为主的转变，在国产定型的武器装备中，自行设计的项目由 1963 年以前的 38%，发展到 1964 年的 55%。

中国发展尖端武器和常规武器的实践说明，坚持自力更生为主，努力提高自行研制能力，是发展国防科技事业的基本方针。国防科技，特别是国防尖端技术，国外是不可能转让给中国的，只能自己去攻关，去拼搏，去创造。依赖别人就会受制于人，用钱是买不来国防现代化的，建设强大的国防，必须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正是由于坚持贯彻了这个方针，才在发展尖端武器的过程中，打破封锁，经受住了风云变幻的考验。在实践中，只要方向对头，目标明确，重点突出，措施得力，在吸取外军科研技术成就的基础上，依靠自己的力量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就能创造出令全世界为之惊叹的业绩。

六、粉碎国民党军窜扰行动和保卫边防作战

60年代前期，中国面临着来自多方面的战争威胁。人民解放军坚决履行自己的神圣职责，沉重地打击了来犯之敌，胜利地完成了各项作战任务，保卫了东南沿海地区的安全，捍卫了国家领土主权。

粉碎台湾国民党军窜扰行动

（一）粉碎台湾国民党军“反攻大陆”企图。炮击金门后，中共中央根据形势的发展，从实现祖国统一大业这一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进一步确定了关于台湾问题和对台工作的总方针，其基本精神是：台湾必须回归祖国，这是原则问题，没有商量的余地，更不会让步；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当地之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听从蒋介石的意见；台湾军政及经济建设费用不足部分，由中央拨付；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须待条件成熟，并尊重蒋介石的意见协商进行；双方互不派特工人员，不做破坏对方团结的事情。

然而，蒋介石从反共立场出发，顽固坚持“反攻复国”的反动政治主张。特别是在中共中央这项和平统一方针政策出台之际，大陆正处在经济困难时期，国际上掀起一股反华逆流，中印边境也出现了紧张局势。蒋介石错误地估计形势，认为反攻大陆的时机已经到来。他在1960年9月召开的国民党八届三中全会和1962年元旦文告中鼓吹，要以“革新”重启“革命契机”，动员和集中反共力量，以“战斗”争取反共的胜利。声称“我们已掌握了复国之钥，进而要打开铁幕之门的时刻到了”。吹嘘“国军一旦开始反攻，可以在三五年内底定全国”。1962年国民党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光复大陆指导纲领》。台湾国民党当局加紧进行“反攻大陆”的准备：成立了以蒋介石、陈诚为首的“反攻行动委员会”，开设“战地政务局”，在岛内征收“国防临时特别捐”，加强对士兵反攻大陆的政治教育，鼓动士兵为“光复大陆”“献身”，甚至连士兵的鞋子和皮带上都刻上“光复大陆”的字样。此外，还从日本购进了大量血浆，全岛弥漫着“反攻大陆”的战争气氛。

针对这种政治、军事形势，1962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准备粉碎国民党军进犯东南沿海地区的指示，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提高警惕，加强战备，决不让台湾国民党当局的阴谋得逞。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中央军委采取了八项紧急措施：研究作战方针和战备计划；调整部署，加强东南沿海军事力量；指示部分空、海军和特种兵做好作战准备；对预定参战部队补充兵员和弹药；协调地方有关部门落实支前工作等。同时，东南沿海地区的部队有针对性地展开了登陆、抗登陆、反窜扰等军事课目的训练，当地的人民群众和民兵也积极行动起来，随时准备支援和配合解放军作战。

中央军委所采取的各项战备措施，一方面从最坏处着眼，进行了充分的军事斗争准备；另一方面通过示形造势，对台湾当局起到震慑作用，迫使其放弃“反攻大陆”的阴谋行动。党中央、中央军委这一斗争策略，在实际斗争中收到了较好效果。台湾当局对东南沿海军民声势浩大的战备行动产生畏

参见廖心文：《周恩来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载《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台湾四十年》，第1版，102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

惧心理，不敢轻举妄动。

美国从自身的战略利益考虑，不赞成台湾当局进行大规模的“反攻大陆”行动，认为台湾对大陆采取军事行动，是“以卵击石”，“等于自杀”，台湾同大陆打起大仗，会使美国卷入中国内战，影响美国在越南的军事行动和重点在欧洲的战略。鉴于上述原因，加之新华社公开揭露美蒋阴谋，台湾当局不得不放弃大规模的军事冒险计划。

（二）粉碎国民党军小股武装袭扰。台湾当局“反攻大陆”企图破产后，并不肯就此罢休，遂改变行动方式，对大陆开展小股武装袭扰活动。美国出于战略和策略上的需要，对台湾的武装袭扰行动给予支持。

1962年8月，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美国参议院作证时称，由于台湾当局牵制中共相当数量军队于台湾对岸大陆，故必须继续执行对其重要军援计划。

1962年秋，台湾国民党军经过精心策划和准备，搜罗和挑选了一批职业特务、军官、惯匪首领和大陆土改时的逃亡地主、反革命分子，编成“反共救国军”，经专门训练后，开始执行代号为“海威”、“班超”的窜扰作战计划。

10月1日至12月6日，台湾派往东南沿海9股武装特务，中台湾高雄和东沙乖船出发，其中8股分别在广东省海丰、惠阳，惠来，电白、台山等县的沿海地区登陆，一股在惠阳县海面未敢登陆而逃往香港火头盆岛。12月4日，美国还派出P—2V型飞机一架，将在冲绳岛经美军专门训练的一股武装特务空投到广东阳江地区。窜入东南沿海地区的武装特务，无论是海上登陆还是空投，都落入沿海军民早已布下的天罗地网，有的一上岸就束手被擒，有的负隅顽抗被就地歼灭；还有的未及登陆便遭打击，葬身鱼腹。大陆沿海军民仅用一两天时间，就全歼了9股武装特务172人，击沉机帆船3艘。

国民党军在遭到沉重打击后，开始变换手段，从公开登陆变力化装潜入偷袭，企图在东南沿海军民设防薄弱处或孤岛复杂地形处登陆，进行摸哨、抓人、破坏设施等行动，以扩大政治影响。国民党军这种抓一把就走的罪恶行动，曾几次在福建、广东沿海得逞。针对这种斗争形势，总参谋部于1963年5月及时召开了海防、边防作战会议，总结了反国民党军武装袭扰作战的经验教训，制定了“放上陆来打，断其退路，包围歼灭，同时海上把其输送船打掉”的作战方针。在具体斗争措施上，确定建立和组成海上、海岸、陆地和隐蔽斗争四道防线，各道防线明确分工，相互配合，形成从海上到陆地，从前沿到纵深，从公开到隐蔽的军民联合作战部署，使敌无隙可乘。

6月后，台湾当局在美国支持下，利用南越、南朝鲜的岛屿为中转基地，将偷渡渗透袭扰行动扩大到华东、华南沿海各省。至1964年3月，国民党军又连续派出50多股武装特务，在沿海地区军民严密防范和打击下，许多股敌特没敢登陆便中途折返。上岸的38股大部被沿海军民歼灭。

1964年4月后，国民党军在偷渡渗透、登陆突袭连续遭到失败的情况下，转为采取以“海上袭击”为主的窜扰活动。国民党军组织“海狼队”，以马祖、东引和乌丘为基地，以解放军炮艇、运输船和沿海渔力袭击目标。但在人民海军打击下，其20余次活动，无一得逞，其“海狼”艇多艘被沿海军民击沉和俘获。从1962年10月至1965年1月，东南沿海地区的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和民兵密切配合，连续打击敌特，取得了一次又一次胜利，共歼灭国民党武装特务594人，击沉和缴获各种船艇24艘。

（三）“八六”海战和崇武以东海战。窜犯东南沿海地区的国民党武装特务遭受沉重打击，几乎有来无回，国民党军产生严重怯战心理。然而，台湾当局不甘心窜扰行动的失败。为了重新鼓起国民党军官兵“反攻大陆”的勇气，扩大影响，对东南沿海地区采取了新的军事行动：一方面对东南沿海地区出海渔民进行抓捕和“反共心战”活动；一方面派出海军舰艇输送武装特务，对沿海渔业生产进行骚扰。为了彻底粉碎国民党军的破坏捣乱，人民解放军决心采取隐蔽待机手段，在海上给予其有力的打击。

1965年8月5日，国民党海军巡防第2舰队大型猎潜舰“剑门”号和小型猎潜舰“章江”号，载着执行“海啸计划”的一股武装特务，由台湾左营隐蔽出航，驶向广东沿海。海军南海舰队获悉此情报后，立即制定了放至近岸、协同突击、一一击破的作战方案。由4艘高速护卫艇和6艘鱼雷艇组成海上突击编队，以1艘炮舰和5艘鱼雷艇为支援兵力，于当日晚21时30分和23时14分由汕头、海门隐蔽出航，驶往南澳岛待机。

6日零时31分，人民海军舰艇编队隐蔽接敌，1时42分，护卫艇编队发现敌舰，此时，国民党军海军“剑门”、“章江”号向人民海军舰队开炮，人民海军护卫艇冒着炮火，勇敢地冲向敌舰抵近还击，将敌两舰分开，敌舰“剑门”号见势不妙，慌忙向东逃跑。人民海军4艘护卫艇紧紧咬住敌舰“章江”号不放，从距离500米射击，追打到100米，“章江”号连中数弹，起火爆炸，沉入海底。“章江”号被击沉后，遵照总参命令，在云澳待机的5艘鱼雷艇和战场上的3艘护卫艇、1艘炮舰，一同向在外围海域徘徊的“剑门”号发起追歼战斗，激战4分钟，将敌“剑门”号击沉在东山岛东南约38海里处。

“八六”海战后不久，11月13日13时，国民党军又派出大型猎潜舰“永泰”号率护航炮舰“永昌”号，由澎湖列岛的马公出航，驶向福建省崇武以东海域执行袭扰任务。海军东海舰队决定由6艘护卫艇和6艘鱼雷艇组成突击编队，另以4艘护卫艇担负警戒和救援任务，以3艘护卫艇实施佯动和钳制。对这次作战，周恩来总理亲自作了五点指示：要抓住战机，集中兵力打一条；要打近战，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组织准备工作要周密；不要打到自己；天亮前撤出战斗。

22时16分，人民海军编队由东沙屿出击，1小时后发现目标，随即勇猛冲向敌舰，将两敌舰分割包围，双方展开激烈炮战。敌舰“永泰”号中弹受伤，慌忙撤退，“永昌”号逃离不及，在人民海军炮人和鱼雷猛烈攻击下，沉没于乌丘屿附近海底。

两次海战，人民海军共击沉国民党海军军舰3艘，击伤1艘，毙国民党海军少将司令胡嘉恒以下170余名，俘42名。人民海军运用机动灵活的战术，发扬勇敢顽强的战斗作风，敢于近战、夜战，两战皆捷。战斗中，涌现出了麦贤得等英雄人物。党中央、中央军委高度评价这两次海战的胜利，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接见了“八六”海战部分作战有功人员，陈毅副总理亲临前线，慰问了参战官兵。

崇武以东海战后，国民党军深知对大陆的袭扰只能是飞蛾扑火，袭扰活动逐渐减少。

（四）打击国民党空军的侦察窜扰活动。炮击金门后，人民解放军空军夺取了沿海地区的制空权，制止了国民党空军对沿海地区的轰炸，但国民党空军装备了美国生产的性能先进的飞机，继续对大陆进行窜扰活动。人民

解放军遵照毛泽东“全力以赴，务歼入侵之敌”的指示，防空斗争由反轰炸、反侦察为主，转入了反侦察、反窜扰为主阶段。

国民党空军为加强对大陆的侦察窜扰活动，1958年和1959年先后装备了RB—57型和U—2型高空战略侦察机和RF—101型超音速战斗侦察机。这些美制飞机速度快，升限高，续航时间长，装有先进的电子干扰和照相侦察设备，可在暗夜、低空等复杂条件下执行任务。国民党空军不仅对沿海地区进行袭扰，而且时常窜入大陆纵深地区进行战略侦察，有时一次跨越十几个省区，甚至窜入北京、兰州等腹地。从1960年1月至1961年7月，国民党空军RF—101型飞机，先后窜入沿海和内地9次，对汕头、晋江、厦门、龙田、路桥、宁波等地进行了侦察袭扰。

1958年4月至1961年10月，国民党空军使用P—2V型等飞机，窜入祖国大陆达84架次。给人民解放军空军和防空部队作战增大了难度。在这种情况下，能否有效制止国民党空军的侦察骚扰活动，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政治上有重要影响。人民解放军空军和防空作战部队，认真研究敌机活动特点和规律，探索新战法，发挥现有防空作战兵器的最大效能，打击国民党空军的侦察窜扰活动。

从1960年初开始，人民解放军防空作战部队把打击RF—101型侦察机作为主要目标，群策群立，制定了以快制快的作战方案，加强观察报知、指挥、射击等快速反应训练，提高技术、战术水平和应变能力。于1961年8月2日上午，在福州机场上空以高射炮击落国民党空军RF—101型侦察机1架。此后，敌机又改变战术，采取低空飞越海峡，高空快速照相，迅速退出的手段进行袭扰活动。针对敌机活动的新特点，人民解放军在沿海地区增加高炮火力，指定飞行技术较高的航空兵拦截敌机。1964年人民解放军研制成功歼—6型飞机后，迅速装备部队，成为东南沿海打敌侦察机的主要防空作战兵器。从1964年12月至1967年，人民解放军空军使用歼—6型飞机又先后击落RF—101侦察机2架，击落F—104型战斗机1架。

打击国民党空军夜间侦察，是防空作战的难点。中央军委和空军提出了保卫要地与机动作战相结合的原则，决定在夜间入窜敌机可能进出的方向和必经航路上，部署高炮群，进行伏击。针对打击夜间窜扰敌机的难点，着重进行发现、截获、射击三关的技术战术训练。经过反复演练，于1959年5月29日晚，人民空军使用米格—17型飞机在粤桂边界地区击落国民党空军B—17G型飞机1架。

1961年后，国民党空军夜间改用P—2V型飞机，为对付其较强的电子干扰和快速机动能力，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采取组织雷达佯动、以探照灯部队照明、在战术上多点设伏的手段，于1961年11月6日夜，在辽东半岛以高射炮击落1架P—2V型侦察机。1963年6月20日和1964年6月11日夜，又击落国民党空军P—2V型飞机2架。

在防空作战中，人民解放军还注重更新装备，增强现代条件下作战能力。

1959年，国民党空军使用RB—57D型和U—2型高空战略侦察机对大陆纵深进行战略侦察，人民解放军空军和防空部队多次迎战，但因高度不够，未获战果。据此，中央军委决定迅速组建地空导弹部队，加快地空导弹的研制和引进。4月，人民解放军地空导弹部队完成组建后，经过突击训练，于9

月下旬正式担负起要地的防空作战任务，并在打击国民党空军 RB—57D 型和 U—2 型高空战略侦察机中，创造了显赫的战绩。1959 年 10 月 7 日，1 架国民党空军 RB—57D 型飞机窜入祖国大陆后，飞至北京东南通县上空，人民解放军地空导弹部队首次开战，就将其击落，开创了中国和世界防空史上第一次使用地空导弹击落敌机的先例。

国民党空军高空战略侦察机对大陆的侦察、窜扰活动，通常以小编队或单机进行，活动范围几乎遍及全国大部分省区。人民解放军导弹部队少，广泛实施大范围的机动作战，成为精兵制敌的重要手段。

人民解放军年轻的地空导弹部队，在全国十几个省区机动设伏，给敌机以有力的打击。

1962 年 9 月 9 日地空导弹第 2 营在南昌附近设伏，成功地击落国民党空军 U—2 型高空战略侦察机 1 架。周恩来总理听到这个消息后，高兴地说：“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毛泽东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亲切接见了地空导弹部队作战有功人员。

1963 年 11 月 1 日和 1964 年 7 月 7 日，该营在江西广丰县和福建漳州地区机动设伏，又击落美蒋 U—2 型飞机 2 架。在中国原子弹、导弹研制进入关键阶段后，美国指使国民党空军加强对大陆西北地区的战略侦察，并在飞机上加装先进的电子侦察、干扰设备，人民解放军地空导弹部队加强训练，采取抗干扰措施。1965 年 1 月 10 日在包头上空击落 U—2 型飞机 1 架。几年中，地空导弹部队历尽艰辛，克服了重重困难，转战 24 万余公里，先后击落国民党空军战略侦察机 6 架（其中 U—2 型飞机 5 架），受到党中央领导高度赞扬，地空导弹第 2 营被国防部授予“英雄营”称号。

人民解放军空军和防空部队在反侦察窜扰斗争中，给国民党空军以有力的打击。从 1959 年至 1967 年底，共击落其窜入大陆的飞机 14 架，击伤 2 架，胜利地保卫了沿海和内地的空中安全。到 1968 年，国民党军完全停止了空中窜扰活动。

粉碎国民党窜犯袭扰作战，是 60 年代初、中期人民解放军军事斗争的重点。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准确分析判断国际风云变幻对东南沿海军事斗争的影响，针对台湾当局“反攻大陆”的叫嚣，确定和实行正确的军事斗争方针。在斗争策略上，以积极充分的战备措施准备打，以每战必胜的军事实力坚决打，从而粉碎了台湾当局的“反攻大陆”企图和各种武装窜扰活动，有效地保卫了东南沿海地区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群众的安全。

打击入侵的美军飞机

1964 年，美国扩大侵越战争，中国全力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在中国援越抗美期间，美军为了查明中国的军事部署和动态，加强了对中国中南、西南地区的空中侦察、袭扰活动。为保卫国家领空安全，对付美军可能的突然袭击，8 月上旬，中央军委指示有关军区和军兵种，进入战备状态，并采取措施，加强中南、西南地区防空力量，打击入侵美军飞机。

1964 年 8 月，经毛泽东和党中央批准，人民解放军向中南、西南地区增调了 2 个航空兵师和 1 个夜航大队、1 个高射炮兵师。指定 8 个航空兵师又 1 个团担任第二梯队。同时，在该地区增修和扩建了机场，增设了雷达、通信等保障设施。

人民解放军的防空作战准备，完全是为了保卫自己的领空不受侵犯。中央军委对防空作战做了严格规定。然而，美军飞机在对北部湾频繁侦察的同时，屡屡侵入中国海南岛上空。

1965年4月8日、9日，美军F—4B型舰载战斗机多批多架，侵入中国海南岛榆林港上空，人民海军航空兵起飞4架歼—5型飞机监视，未予攻击。美机却连续发射数枚导弹攻击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飞机。鉴于此，中央军委决定：对入侵中国领空的美机实行“坚决打击”的方针，以保卫国家领空。1965年9月20日，美军1架F—104C型战斗机侵入中国海南岛上空，人民解放军南海舰队航空兵迅速起飞2架歼—6型飞机截击，在与美机几十米的近距离处猛烈开炮，打得敌机凌空爆炸。10月5日上午，侵越美军在出动上百架次轰炸机轰炸越南北方城镇的同时，派战斗机3批13架次侵入中国广西凭祥地区上空。12时，当美空军4架F—4C型战斗机掩护1架RA—3D型侦察机再次侵入南宁隘店上空时，人民空军4架歼—6型飞机升空迎敌，将美空军RA—3D型侦察机击落。1967年，美军对越南北方实施全面轰炸，侵入中国领空的美军战斗机和侦察机次数也显著增多。仅4月24日至5月1日8天时间，美机就入侵广西地区11次，人民解放军空军和高炮部队，奋勇迎击入侵美机，连续击落了5架入侵美军飞机，其中有2架号称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F—4B型鬼怪式战斗机。这一战绩，受到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高度赞扬。

从1964年8月至1968年11月，美军作战飞机入侵中国领空共155批，383架次，被人民解放军击落12架，击伤4架。

美军派遣作战飞机侵犯中国领空同时，还使用高空无人驾驶侦察机进行侦察活动。这种飞机体积小，飞行高度可达2万米。为击落该型飞机，人民空军认真研究其飞行特点，如强战术技术训练，攻克爬高、动力升限、瞄准射击等技术难题。1964年11月15日，一架美军无人驾驶飞机侵入中国雷州半岛上空，人民空军立即起飞一架歼—6型飞机拦截，爬高1.75万米向美机开炮，首开击落美军无人驾驶飞机的战例。在取得经验基础上，人民解放军空军、海军航空兵和导弹部队，又连续击落美军无人驾驶侦察机数架。从1964年8月至1971年12月，共击落美军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20架。

人民解放军空军、海军航空兵、防空部队，在打击美军入侵飞机的作战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胜利地保卫了祖国的空中安全，积累了丰富的防空作战经验。

中缅勘界警卫作战

新中国成立后，逃往缅甸的国民党残匪在台湾当局指使下，不断窜回云南边境地区进行袭扰破坏活动。1952年至1959年，人民解放军驻云南边防部队奉中央军委命令，曾予以严厉打击。60年代初期，台湾当局利用该股残匪继续进行破坏活动，1960年7月，将1个400亲人的特种作战部队和大批武器装备从台湾空运至缅北，至11月，逃缅残匪实力增至9400余人。国民党军将其编为5个军、15个师、6个纵队和1个军区（西盟军区），台湾当局为其制定了窜扰行动计划，并帮助其建成了孟百了机场，以加强补给，增添军政人员加强对该残匪的控制与训练，企图将中缅边境地区建成“反攻大陆”的前哨阵地。

1960年初，中国政府和缅甸政府签订了中缅边界问题协定。这是新中国

实行睦邻友好政策，通过友好协商与周边邻国解决的第一个边界问题，为世人所关注，有着重要的国际政治意义。1960年下半年，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开始勘测边界和竖立界桩工作。然而，由于盘踞在该地区的国民党军残匪的干扰破坏，给勘界工作带来严重困难。

为保证勘界工作进行，根据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警卫问题专门小组双方协议，决定在中缅边境实行警卫作战，歼灭盘踞在中缅边界缅甸境内的国民党军残匪。作战区域正面宽约300公里，纵深20公里。

这是一次特殊的作战行动，它既不同于国内剿匪作战，又有别于援外作战行动。缅甸同中国社会制度不同，作战地区有严格限定。因此，作战行动政治性、政策性很强。党中央、中央军委对出境作战十分重视，为保证作战顺利进行，制定了出境作战政策、纪律及有关规定。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贺龙、聂荣臻元帅等，对作战中军事、外事等问题多次作了重要指示，总参谋长罗瑞卿亲赴昆明军区参加了作战会议，对参战部队提出了具体要求。

中缅边境地区是亚热带山岳丛林地区，山高谷深，溪流纵横，道少路窄，灌木丛生，部队作战行动十分困难。作战对象是政治上极为反动的国民党军残部与逃亡地主恶霸、反动头人组成的反动武装，他们在境外盘踞多年，虽装备陈旧，但地形熟悉。其作战特点是，利用隐蔽条件，守备和游击相结合，避免与人民解放军大部队作战，不利条件下迅速分散撤退。因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对逃缅残匪的作战，主要是搜剿聚歼和摧毁残匪巢穴。

1960年11月5日，昆明军区组成前方指挥所，由云南省军区黎锡福副司令员和某部崔建功副部队长分别任正副指挥，参战兵力共5个团又1个营，于1960年11月22日至1961年2月9日实施了中缅勘界作战。

1960年11月22日，人民解放军参战部队发起第一次作战。在人民解放军作战线内，歼敌目标是逃缅国民党残匪第1、第4军军部和第2、第3、第5、第6师师部及所属8个团又8个行动小组。该敌盘踞在曼俄乃、掸邦孟瓦和孟马地区，共22个据点约800余人。人民解放军按预定作战计划，对国民党残匪实施迂回包围，突然发起猛烈攻击。在人民解放军绝对优势兵力的强大攻势面前，残匪不堪一击，四散而逃。当日，人民解放军即歼敌过半。

23日，人民解放军以2个步兵团另1个步兵营，向掸邦孟瓦和孟马地区敌各据点攻击，以3个团奔袭孟瓦地区敌各据点，于当日歼敌一部，余敌望风逃散。人民解放军随即展开清剿，至1961年1月20日，第一次作战胜利结束，共歼灭国民党残匪467人，缴获轻武器和其他装备一部。

1月25日，人民解放军参战部队发起第二次作战。作战对象是逃缅国民党军柳元麟残部约3100余人。

25日、26日，人民解放军4个步兵团克服重重困难，迅速攻占了巴西里、叭坎亮、索水、南昆、孟百了等地的国民党残匪据点，打掉了柳元麟残匪总部，歼敌274人，余敌逃散，一部撤往老挝和泰国境内。2月9日，人民解放军参战部队胜利完成了中缅勘界警卫作战任务，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全部撤回。

中缅勘界警卫作战，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缅甸军民配合和支持下，共歼灭国民党残匪741人，捣毁了其盘踞10多年的巢穴，直接保障了中缅联合勘界工作的顺利进行，迫使台湾国民党军将其在缅甸境内的残部大部撤往台湾。使云南边疆和平建设有了安全保障。作战中，人民解放军参战部队坚决执行

上级命令，英勇顽强，对人民群众利益秋毫无犯，在缅甸边境人民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增进了中缅两国人民的“胞波”情谊，从而不仅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而且在政治上、外交上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

1962年，在国民党当局对大陆开始窜犯活动时，逃缅残匪在台湾当局策动下，又窜回缅北老巢，抢占地盘，继而开始向云南边境进行策反和窜扰破坏活动。从1963年3月至1970年，人民解放军对窜入滇西潞西、镇康、沧源、孟连等县边境地区的小股武装，给予了坚决打击，保卫了边境地区的安宁。在解放军的打击下，该敌于1970年上半年后停止了窜扰活动。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

1962年，印度军队越过中印边境东、西段双方实际控制线，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进攻。中国西藏、新疆边防部队在忍无可忍、退无可退的情况下，被迫进行自卫反击作战，维护了国家领土主权，取得了中印边境反侵略战争的重大胜利。

（一）中印边境争端的由来和发展。中印两国是友好邻邦，有着悠久的睦邻友好的历史。到了19世纪中叶，由于英国殖民主义者统治印度和侵略中国西藏、新疆，造成中印边界全线不少地区存在争议，埋下了边境争端的祸根。19世纪中叶，征服了印度的英国殖民主义者为了同沙俄争夺势力范围，在中亚和中国西部展开了激烈的角逐。英国殖民主义者为了制止沙俄南下，实行了以牺牲中国和中亚国家领土利益的“制俄保印”战略，在同沙俄私自瓜分了中国的帕米尔地区后，又企图将中国的西藏、新疆变为英国控制下的英俄之间的“缓冲区”。为达此目的，英国殖民主义者以探险、游历为名，在中印边境西段进行秘密勘测，企图按英国殖民主义的战略利益划定边界线。在中印边境东段，

1913年10月至1914年7月，英印当局又策划召开了所谓的中、英两国政府代表和中国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参加的三方会议——即西姆拉会议。会议期间，英国代表麦克马洪背着中国政府代表，以秘密换文的方式，胁迫西藏地方政府代表承认英印当局精心炮制的“麦克马洪线”。这条非法的所谓“麦克马洪线”，将中印边境东段属于中国的9万平方公里领土划归英国统治下的印度版图。这是一笔肮脏的私下交易，英国政府作贼心虚，长期秘而不宣。中国历届政府都发表声明，严正指出“麦克马洪线”是非法的、无效的，不予承认。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一直把建立和发展与印度的友好合作关系作为睦邻政策的重点，“希望中国和印度两个民族继续团结起来，为和平而努力。”但是，从1951年起，印度趁新中国成立不久和进行抗美援朝战争之机，抢占了中印边境东段“麦克马洪线”以南的9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尔后又陆续侵占了中印边境中段的巨哇、曲惹、波林三多和西段的巴里加斯等地。同时，为了使西藏成为印度控制下的反动政府和中印之间的“缓冲国”，暗中怂恿达赖集团进行分裂活动。

1959年，西藏反动上层发动的武装叛乱被粉碎，宣告了“西藏独立”幻想的彻底破灭，印度当局便公开向中国政府提出了领土要求，不仅要中国承认所谓“麦克马洪线”是中印之间的合法边界线，而且要中国将西段以阿克赛钦地区的3.3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划归印度。连同“麦克马洪线”以南的

领土，总面积约为 12.5 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福建省。这一无理要求遭中国拒绝后，印度军队便在边境上寻衅滋事。

1959 年 8 月，印军在东段侵占西藏山南地区朗久，袭击中国边防巡逻官兵，制造了流血事件；接着，印度不顾中国政府的劝告和警告，10 月又在中印边境西段的空喀山口，袭击中国边防部队，打死打伤中国边防部队官兵多人。

中国政府从中印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和根本利益出发，一贯主张通过友好协商、和平解决边界问题，并为此作出了巨大努力。在印军制造朗久、空喀山口事件后，周恩来总理多次给印度总理尼赫鲁写信，说明中印边界问题的历史事实，建议通过友好协商和平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为缓和边境紧张局势，中国政府提出在边境地区，双方军队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 20 公里，实行隔离。在这一建议遭到印度当局拒绝后，中国边防部队单方面作了后撤，并规定在双方实际控制线中国一侧 30 公里以内不开枪，不巡逻，不叛，不打猎；在 20 公里内不打靶，不演习，不爆破。为寻求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途径，1960 年 4 月，周恩来总理率代表团赴新德里，积极倡导两国友好协商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然而，中方所作的一切真诚努力，没有得到印度当局的任何响应。

从 1961 年特别是从 1962 年 4 月起，印度当局在中印边境大肆推行“前进政策”，蚕食中国领土，侵犯中国领空。在中印边境西段建立侵略据点，步步向中国纵深进逼，有的据点甚至设在中国边防哨所之间和侧后，至 9 月份，在中印边境西段中国境内设立了 43 个侵略据点，同中国边防哨所形成了犬牙交错的态势。侵入中国境内的印度军队不断袭击、拦截中国边防部队巡逻和运输官兵。

在这种严重的局势下，中国政府仍命令西藏、新疆边防部队采取克制忍让的态度，尽力避免武装冲突。同时，中国政府在外交上一再呼吁印度政府放弃使用武力，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然而，印度对中国边防部队的克制忍让，认为是软弱可欺，对中国政府的严正警告和和平呼吁置若罔闻。1962 年 9 月 20 日，越过东段“麦克马洪线”侵入克节朗地区的印军，突然向中国边防部队哨所发起攻击，制造了择绕桥流血事件。10 月 5 日，印军在东方军区之下，成立了一个新军团——第 4 军，专门执行同中国作战任务。10 月 10 日，印军边境部队又向中国尺冬哨所发起了进攻，再次制造了流血事件。印军向边境大规模调兵遣将，一场战争已经难以避免。

根据中印边境斗争形势的发展变化，西藏、新疆边防部队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立即进入了战备状态。为加强边境军事斗争的组织指挥，西藏和新疆边防部队分别成立了由张国华和何家产负责的东、西段指挥部。西藏、新疆边防部队和边境地区各族人民同仇敌忾，团结一心，抓紧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各项准备工作，决心给敢于来犯者以坚决反击。

（二）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作战。印度当局错误地估计形势，企图使用武力实现其领土要求。为了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尊严，为了创造和平稳定的中印边境，在印军发动武装进攻之后，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果断作出了实施自卫反击作战的决定。

第一阶段自卫反击作战，自 10 月 20 日始至 28 日止，共 9 天时间。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东段西藏的克节朗、达旺地区，西段新疆阿克赛钦的加勒万河谷、红山头、巴里加斯等地区，同时对入侵印军进行反击作战。

中央军委将主要作战方向选择在东段的克节朗地区，西段予以配合。在东段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南北地区，印军集结了第4军约1.6万余兵力。其中第7旅3000余兵力及配属的炮兵，部署于“麦克马洪线”以北的克节朗地区；在西段，印军部署1个旅部6个步兵营、1个机枪营及若干配属分队共5600余人，其中1300余人配置在侵入中国境内的43个据点上，正面宽640余公里，深入中国境内纵深20余公里。

10月20日7时30分，西藏边防部队针对克节朗地区印军部署前重后轻、翼侧暴露、正面宽、纵深浅等情况，采取两翼开刀、侧后迂回、分割包围、各个击破的战法，集中主要兵力，在炮兵、工兵配合下，向印军第7旅左右两翼发起攻击，迅速攻占枪等、卡龙、克宁乃、沙则等地；以一部兵力在山南军分区协同下，向该印军正面扯果布、邦冈丁攻击，一部兵力向左侧后章多迂回攻击；昌都、山南、林芝军分区各以一部兵力对当面之敌实施反击，配合主要方向作战。反击作战部队克服高山、峡谷、密林等天然障碍，以勇猛的攻势行动，迅速攻克了印军在克节朗地区的重要据点。印军大部被歼，一部溃逃。中国反击作战部队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决定不受非法的“麦克马洪线”的约束，乘胜发展进攻，至23日，进占达旺。此战，收复了“麦克马洪线”以南达旺河以北部分中国领土，歼灭了印军第7旅共1897人，印军第7旅旅长达尔维准将被俘，缴获一批武器装备。

在东线发起反击同时，西线新疆边防部队，对侵入加勒万河谷、红山头等地印军据点发起攻击，配合东线作战。边防部队在高山缺氧、气候严寒的边境地区，对入侵印军据点实施强攻，经过1小时战斗，全歼守敌。尔后反击作战部队乘胜扩大战果，向班公湖两岸、巴里加斯等地区转用兵力。战至28日，清除了侵入中国境内的印军据点37个，歼灭印军296人。

至此第一阶段反击作战胜利结束，为尔后的军事、政治外交斗争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在东段克节朗地区作战取得胜利的形势下，为缓和印度当局造成的严重局势，10月2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提出了停止冲突、重开谈判、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并命令东线反击作战部队停止追击。

11月4日，周恩来又写信给尼赫鲁，希望印度当局对中国政府的三项建议作出积极响应。

然而，印军虽遭惨败，却不罢休，印度当局蛮横地拒绝了中国政府的和平建议，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进行战争动员，公开向美、英、苏等国乞求军事援助，向东、西段边境地区调集4万余人兵力，决心再度同中国进行军事较量。侵入中国西藏山南地区之西山口、昌都地区及瓦弄等地和中印边境西段的印军，不断对中国边防部队实施炮击，并于11月14日、16日在中印边境全线再次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猛烈进攻。

为实现边境的和平与安宁，中央军委决定，再次对印军实施反击作战。

第二阶段自卫反击作战，自11月16日开始至21日结束，共6天时间。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全线对印军实施反击。

东线西山口——邦迪拉方向。印军第4师战术司令部指挥5个旅共约1.5万余人，沿达旺至邦迪拉公路两侧成线式布防，重点防守西山口；在邦迪拉以南，部署第4军主力作为机动部队。中国边防部队针对印军“铜头、锡尾、背紧、腹松”的部署特点，采取打头、切尾、击背、剖腹的战法，以一部兵力攻击西山口打敌之头，一部兵力向申隔宗、略马东地区攻击，击敌之背；

以一部兵力迂回至德让宗、邦迪拉之间，切敌之尾。

11月18日，反击作战部队对印军形成了多路攻击部署，将印军切成数段。战至11月19日，西藏边防部队攻占邦迪拉，残敌仓皇溃败，西藏边防部队随即展开搜剿、追击作战，于21日全部清除了西山口—邦迪拉方向的印军据点。

东段瓦弄方向。西藏边防部队某部，于16日对印军第11旅发起反击，从右翼方向直插瓦弄扎公，经两小时激烈战斗，夺占了瓦弄扎公，分割歼灭了入侵印军；左翼部队在察隅河东岸向侵占“80”等高地的印军发起反击。战至16日17时许，驱逐了入侵瓦弄地区的印军，进驻瓦弄。夺占瓦弄后，西藏边防部队主力就地转入搜剿，一部继续向南反击，21日进至金古底，逼近了传统习惯线。在东段中部地区，西藏山南、林芝军分区拔除了印军据点16处，歼敌一部。西线新疆边防部队，自11月18日至20日，清除了班公洛地区的印军侵略据点。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历时1个月，在西段，清除了印军设在中国境内的所有43个侵略据点；在东段，中国边防部队进到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靠近传统习惯线地区，共毙、俘印军870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装备和物资。印军在中国边防部队勇猛反击下，遭致惨痛失败。

在自卫反击作战取得胜利后，为促进中印边界问题和平解决，表示中国决不以武力解决边界问题的诚意，中国政府于11月21日再次发表声明，决定在中印边境全线主动停火，主动后撤。从12月1日至1963年3月1日，东线中国边防部队全部撤至1959年11月7日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中国一侧20公里以内地区。随后，中国又向印度政府交还了大批战缴物资，释放了全部战俘。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是中国边防部队在特殊高原地区进行的一次较大规模的反侵略作战，是一场局部战争。它融军事、政治和外交斗争于一体，各种矛盾错综交织，斗争极其复杂。毛泽东和党中央、中央军委从战略全局出发，灵活运用军事、政治、外交斗争手段，体现了高超的斗争指导艺术，不仅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维护了国家领土主权，也取得了政治、外交斗争的主动；不仅有力地打击了印度侵略者，也回击了国际反华势力。正如毛泽东所说：这是一场“军事政治仗，或者叫作政治军事仗。”

这次自卫反击作战，具有很多特殊性。诸如边境地区少数民族聚居，人员稀少，物资匮乏，远离内地，自然地理条件恶劣，作战保障困难等。西藏、新疆边防部队，认真落实战备工作，紧紧依靠边疆地区各族人民群众，加强边防建设。在作战中坚决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发扬吃苦耐劳、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战胜重重困难，创造性地运用人民解放军传统战法，大胆穿插迂回、分割包围，胜利地完成了保卫祖国领土主权的作战任务，这一胜利，成为人民解放军开展边境军事斗争、实施反击作战的光辉典范。

七、勤俭建军，支援国家经济建设

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遭受自然灾害以及苏联撕毁帮助中国进行经济建设的合同等原因，60年代初期，中国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困难。

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人民解放军广大官兵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建军的优良传统，从维护人民利益出发，体谅国家困难，努力减轻人民的负担，同全国人民一道同甘共苦，共渡难关。

在全国粮食和物资紧缺的情况下，全军部队响应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号召，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大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压低口粮定量，节约办公费、杂支费。许多官兵为减轻国家负担，节衣缩食，自觉开展节约一两粮票、一分钱、一粒米活动，有的将发给的服装返交给国家，有的积极向灾区捐款、捐粮、捐衣，尽最大努力，帮助群众渡过饥馑和寒冷。

1959年到1961年，中共中央发出“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号召，全军以实际行动积极响应。在这个时期，周恩来副主席提出，军队要实行“兵农结合，亦工亦农”。中央军委决定，把农副业生产作为全军中心任务之一，建立生产基地，抽出一部分部队专门搞生产，其他部队除担负战备值班任务外，半训练半生产，以解决面临的饥荒。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全军积极开垦荒地，兴办农场，种粮、种菜、养猪。

1962年和1963年中，部队生产发展很快，全军每年参加开荒生产的部队达50多万人，耕种土地面积达到600多万亩，各类型农牧场达1220多个。经过广大官兵艰苦奋斗，全军连年做到蔬菜基本自给，肉食自给率达到50~70%，食油自给10%。在这一时期，部队不仅不向国家报领补助粮，而且还支援国家大批粮食、肉类和蔬菜，仅1961年、1962年两年，全军就上交生猪10万多头。

为帮助国家扭转国民经济的困难局面，全军积极支援工农业生产，帮助人民抗灾减灾，生产自救。

1960年，总政治部向全军发出《关于军队参加抗旱备荒的指示》，派出大批部队和医疗队深入灾情最为严重的地区，为群众治疗“浮肿”等疾病，和群众一道突击抗旱、灭蝗、修渠、打井，出动飞机人工降雨，组织群众开展生产自救活动。

1960年2月，兰州军区在1个月时间内，投入22万多个劳动日帮助群众抗旱救灾，共挖水渠30多条，打井200多眼。与群众合修了酒泉的金塔水库和永登的金嘴水库，使万亩土地得到灌溉。3月至5月，海军航空兵和空军改装飞机，在山东、广东、广西、江苏、河北、河南、陕西、甘肃等省实施人工降雨，缓解了该区部分旱情。

10月，沈阳军区空军派出飞机，帮助东北三省69个公社灭虫6.4万余亩，1961年全军支农劳动日达2200多万个。各部队还把自己开垦的一部分荒地和人民公社化初期接收的一些土地、渔塘、果木林等生产资料，全部无偿地交给地方政府。

在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一大批重要工程濒临绝境之时，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开赴工地，艰苦奋斗，尽力减少国家损失。1960年4月至9月，

沈阳军区派出 3 万余名官兵，与广大工人和科技人员患难与共，克服缺粮缺菜等困难，参加了大庆石油大会战，为中国摘掉贫油国帽子作出了贡献。

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军广大指战员与党同心同德，与人民休戚与共，以自身的模范行动，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心目中树立起了良好形象。通过同人民群众一道抗灾自救，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战胜自然灾害、克服暂时困难的信心。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努力实现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而奋斗，极大地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形成了 60 年代初期顾全大局、战胜困难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是党坚强领导的体现，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高度团结，战胜一切困难的精神支柱。

三年困难时期之后，全军为贯彻党中央关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为实现国民经济根本好转，做了多方面的努力。

在支援农业方面，着重帮助农村进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1963 年广州军区一个师进驻广东台山后，即参加台山烽火角水利工程建设，解除了 20 多万亩农田的盐潮和干旱等危害。同年 6 月至 7 月，沈阳军区先后出 19 万多个，插秧 1000 多亩、锄草 5 万多亩，修堤坝 7.3 万多立方米。

1966 年 3 月，昆明军区驻云南蒙自地区的部队 3000 多人，参加对大屯矿区的治理工程，经过突击，使工程在大雨之前完成，该地区 6 万多亩土地成为旱涝保收田。从 50 年代中后期到 60 年代，人民解放军还先后出动 10 万多官兵参加了辽宁、福建、广东等省的围海造田工程。1964 年五六月间，西藏地区出现了特大旱灾，受灾农田 13.5 万亩。驻藏官兵紧急投入 5.4 万个劳动日，挖渠引水，浇灌庄稼 9.8 万亩，藏族群众称颂解放军为他们架了“银河”，为高原人民送去了“甘露”。在 1963 年，军队还向广大农村先后派出 60 多万干部，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与人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积极帮助人民群众解决生产和生活上的问题。

在支援工业建设中，1964 年 7 月，铁道兵抽调 3 个师担负了修建工程浩大的嫩（江）林（古莲）铁路任务；8 月，抽调 19 万名官兵参加成（都）昆（明）、襄（樊）渝（重庆）铁路大会战；1965 年又先后参加了北京地铁第一期工程和（北）京原（平）铁路的修筑任务。

除连续三年农业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外，1960 年至 1966 年，中国部分地区还发生一些其他灾害。人民解放军急人民所急，救人民群众所危，哪里有灾情，哪里有险重任务，就出现在哪里。1960 年 3 月 31 日，南海、渤海、黄海北部海域遭强台风袭击，4000 多渔民和 800 多只渔船陷入被狂风恶浪吞没的险境。海军、空军和沿海守各部队，连续 4 天与风暴搏斗，使大部分渔民和船只获救。1963 年 8 月上旬，天津、河北省中部和南部地区发生特大水灾，该地区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津浦路岌岌可危。在这危急时刻，党中央、中央军委发出“保卫天津，保卫津浦路”的指示，全军出动 11 万多人、69 架飞机，766 艘舰船，展开空前规模的抗洪抢险斗争，与洪水搏斗 40 多个日夜，解除了洪水对天津市和津浦铁路的威胁，抢救群众 9.4 万余人，粮食 4250 多吨，空投食品 4440 吨，药品 40 多吨，救生器材 8.1 万余件，守护修筑堤坝 158 公里。抗洪抢险中，有 31 名干部战士献出了生命。

1966 年 3 月 8 日和 22 日，河北邢台地区发生 6.7 级和 7 级强烈地震，房屋倒塌，桥梁断裂，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损失。地震发生后，人民解放军迅速奔赴灾区。北京军区、海军、空军共约 1.7 万余人在隆尧、巨鹿、宁晋、南宫、新河等县展开了抗震救灾战斗。许多官兵在余震不断的情况下，

冒着生命危险闯进房舍，抢救遇险群众；有的干部、战士为不误伤群众，用手扒泥土砖块，手指抠破出血；有的冒险跳入刺骨的冰河中转运抢救伤员；有的连续几日奋战，累倒在救灾现场。经过昼夜奋战，先后救出遇险群众 4500 余人，牲畜 1100 余头，挖出粮食 176.5 万多公斤，为群众搭简易房 55.2 万多间。地震后，部队立即投入帮助人民群众重建家园、进行生产自救的工作，许多官兵自动向灾区捐款捐物，把党的温暖送入千家万户，表达了子弟兵对人民群众的深切爱戴。部队的行动，加深了军民之间的鱼水之情，鼓舞了灾区人民群众战胜灾害的信心和斗志，1966 年，灾区人民连续夺得夏秋两季粮食大丰收。

在支援国家经济建设中，人民解放军发扬“既是战斗队，又是生产队”的光荣传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在和平时期，人民解放军不仅是社会主义的坚强保卫者，而且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

1959 年至 1966 年 5 月，是人民解放军历史上一个比较复杂的阶段。这一阶段，人民解放军虽然受到了来自党内“左”倾思想的影响和林彪的干扰，但正确的建军思想仍占主导地位。在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下，经过全军指战员的努力，军队建设仍取得了显著成绩。开展“四好连队”、“五好战士”活动，学习“好八连”、“硬骨头六连”等先进典型，推动了基层建设各项工作的开展。通过学习毛泽东思想，加强了部队革命化建设。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相继研制试制成功原子弹、氢弹、导弹核武器等尖端武器和一大批陆、海、空军现代化武器装备，建立了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建设赖以发展的国防工业体系。发扬传统练兵方法，创造性地掀起了群众性的大练兵、大比武热潮，促进了战斗力的提高。开展学习雷锋等英模人物活动，雷锋精神影响和鼓舞了一代人。圆满完成了粉碎国民党军窜犯袭扰、保卫祖国反击侵略和抢险救灾、支援国家经济建设等各项任务。人民解放军的威信大为提高，赢得了全国人民的爱戴和拥护。

与此同时，由于受党内“左”的思想的影响和林彪在军队中推行其一套“左”的东西，人民解放军的建设也出现了一些曲折：正规化建设和学习研究苏军等外军有益经验基本下提了；林彪片面鼓吹“突出政治”、“政治可以冲击其他”，使这一阶段的后期军事训练遭受严重挫折，政治工作也走向严重脱离实际，等等。这些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

第八章 在“文化大革命”中艰难前进

一、“文化大革命”对军队建设的影响

1966年至1971年，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文革”干扰和破坏人民解放军建设，军队一些高级干部对他们进行了抵制和斗争，对制止“文革”的错误和减少对军队的破坏与损失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军队建设还是遭到了严重损失。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对军队的冲击

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认为：在文化领域各界和党、政、军各个领域都混进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帜”，不但要彻底批判文化领域里的学术权威的“反动立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且“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的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以这个通知为标志，错误地在全国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此前，江青等人已通过林彪插手军队，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制造了舆论准备。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合谋，姚文元署名的《评新编历史剧 海瑞罢官》的文章，从而引发了一场思想文化领域广泛的批判运动。这个批判运动，在北京等地受到抵制。于是江青在得到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的支持后，于1966年2月2日至20日，在上海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江青发表了“意见”，并由江青和张春桥、陈伯达整理成《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抛出了“文艺黑线专政论”，全盘否定了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成绩，宣称建国以后的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给建国以后的文艺界扣上三顶大帽子：理论黑、作品黑、队伍黑。这个《纪要》经毛泽东修改后，以中共中央名义转发全党。

根据《纪要》的要求，在北京召开“全军创作工作会议”，给数十部影片加上“大毒草”、“坏戏”等罪名，进行批判，同时诬称彭德怀、黄克诚、谭政等专了军队文化部门的政。军队文化部门、文艺团体的一些主要负责人和编导、导演、创作人员也遭到批判。

林彪、江青等人在文艺领域突破后，立即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在党、政府和军队中担任重要职务的领导干部。在军队中首先拿已被解除总参谋长职务的罗瑞卿开刀。1966年3月4日至4月18日，专门召开了讨论罗瑞卿问题的小组会议，指控罗瑞卿反对毛泽东思想、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个人专断；公开向党伸手、篡军反党等。会议结束的当天，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号召全军“积极地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坚定不移地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前奏。

《五一六通知》发表后，为贯彻《通知》的精神，总政治部作了布置。提出，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总的步骤是先搞正面教育”，在此基础上，“对重点单位和重点人物进行充分揭露，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彻底批判”；运动主要在宣传、文化、院校、科研等部门进行，连队和师以下战斗部队着重进行正面教育；确定在夺权的军以上机关，可以贴大字报，开批判会：不准上街游行，一般不参加地方的批判会、声讨会；总政设立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及文化革命办公室。军队“文化大革命”在各级党委领导下，逐步展开。

8月12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被确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8月23日，林彪在军委常委会上提出“九月、十月、十一月大闹三个月”，煽动在军内搞“四大”。借搞群众运动，否定党的领导，提倡无政府主义。他说，“什么叫突出政治？突出政治就是突出群众，就是群众路线”，“群众是天然革命者，群众是有智慧的，是不会大错的”，让他乱一个时期。根据林彪的提议，10月5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原有的由党委领导运动的规定，由学生和教职员选举成立辩论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作为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允许进行串连。同日，中共中央将这一文件向全国转发。《紧急指示》发布后，军队的形势急转直下，军队院校相继大乱，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一切规章、制度被视为束缚群众的“条条框框”，院校师生纷纷外出串连，参与造反夺权活动。总部、军区机关不断遭受冲击，军队负责干部被揪斗，军队战备训练受到影响，事态发展越来越严重。

稳定军队的努力和二月抗争

“文革”开始时，军队的一些高级干部虽然对“文革”运动不理解、怀疑，但是基于对毛泽东的信任，怀着良好的愿望支持了这场运动。可是，到了1966年10月，随着运动的发展，取消了党委的领导，造反派到处乱冲乱抓乱斗，老师们对此深为担忧，并为稳定军队和国家形势作了努力和抗争。

为了避免局势一发不可收拾，军委和总政领导人紧急磋商，决定动员军队院校所有员工离京回校复课闹革命。11月13日和29日，总政治部两次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10万人大会，贺龙、徐向前、陈毅、叶剑英4位军委副主席作了重要讲话。强调稳定军队，军队不能乱，“文革”必须由党来领导，必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对“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许多非正常现象和错误做法提出了严肃批评，动员大家离京返校，老师们的讲话，代表了对“文化大革命”本质的不同认识以及对“左”倾错误的觉察和抵制。这是老师们对稳定军队和全国形势的首次努力。大会在全国、尤其在北京引起了巨大反响，给狂热的军事院校青年学生泼了冷水，促使他们重新思考。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接受了劝说离京返校，甚至退出“造反”行列。江青等人对两次大会极为反感，煽动批斗陈毅、叶剑英等，陈、叶遭到“炮轰”，并被迫“检讨”。

跨入1967年，全国更加混乱，对军队的冲击更加厉害。1月10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王力等人起草了一个“关于解放军报宣传方针问题的建议”，提出“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当天晚上，江青将这个报告送林彪批阅。林彪批示“完全同意”。从此，“揪

军内一小撮”的口号迅速在全国全军蔓延，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抓穿军装、拿枪杆子的“刘邓路线”的反军乱军浪潮。

1967年1月19日下午，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扩大的碰头会。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军委领导，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中央文革成员共40余人，主要议论军队搞不搞“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问题。会上，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要军队支持革命群众开展“四大”，要和地方一样搞“文化大革命”，不能搞特殊，老师们则认为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战备任务很重，和地方不同，不能搞“四大”。两种意见争论十分激烈。陈伯达、江青、叶群等人在会议上又节外生枝，对总政治部主任肖华进行突然攻击，他们捏造种种罪名，强加在肖华头上，要他当晚向军队院校师生作检查。其目的是从总政打开缺口，搞乱军队。在此前后，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总政治部副主任梁必业、刘志坚等军队高级领导干部相继被打倒或被揪斗。对此，老师们非常愤慨，会议还没有结束，叶帅、聂帅等提前退出会场，以示抗议。

担任全军文革组长的徐向前，看到总政和北京军区等单位的主要领导人被揪斗，机关陷于瘫痪状态，为军队的稳定十分担心。他多次叫人电话请示中央文革，却得不到回音。几次叫秘书打电话给林彪的办公室要求见林彪，林不肯见。在这种情况下，徐决定“闯宫”。1月24日晚7时，徐帅直接驱车前往林彪住地毛家湾，向林彪陈述军队的混乱状况，反映军委一些老同志的要求，建议军委就军以上机关开展“文革”的问题要搞几条规定。林彪同意由军委发一个文件。报经毛泽东批准后，1月28日颁布了中共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命令》规定，1.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对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2.所有军队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3.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4.一切外出串连的军队人员应迅速返回本地区，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5.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6.军队内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不得索取和抢劫军队的文件、档案和技术资料；7.军以上机关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8.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严格管教子女。“八条”的中心思想是军队要稳定，“八条命令”起到了暂时稳定军队局势的作用。

然而，军委“八条命令”下达后，江青一伙大肆进行捣乱破坏，使冲击军事机关的事件，又接连不断发生。

鉴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一伙煽动和支持造反派进行反党乱军活动，搞乱了党、搞乱了国家、搞乱了军队，1967年2月，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以及余秋里、谷牧等老一辈革命家，同中央文革小组就运动要不要党的领导，对老干部应不应该都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2月中旬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又称怀仁堂会议）上，谭震林斥责张春桥借口群众运动，否定党的领导，当面指出：“你们就是不要党的领导”，“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叶剑英质问张春桥等人：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过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想干什么？他还质问陈伯达：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

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徐向前也拍着桌子，责问陈伯达，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你们把军队搞乱，还要不要这个支柱？谭震林气愤地表示：“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在这次会议上，对“文革”的一些做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在其他一些会议上，老革命家们也对“文革”的做法公开提出了批评。因为这场斗争集中在2月，因而被江青一伙诬力“二月逆流”。毛泽东在听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汇报后，认为这是根本反对“文化大革命”，对老同志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责令他们作检讨。

军队建设受到严重破坏

1967年2月抗争被压下去后，无政府主义狂潮更加高涨，肩负着党、政、军重任的一大批老革命家被打倒、靠边站，或不能正常工作。至此，中央文革取代了政治局，造反派夺权行动，在全国全面展开。林彪、江青一伙篡党夺权的活动也越加猖狂。3月以后，林彪多次提出要把军队中“一小撮人”揪出来“烧掉”。并策划制造了一系列阴谋事件，企图搞乱军队，乱中夺权。林彪等人用阴谋手段整倒罗瑞卿之后，接着诬陷贺龙，企图搞“兵变”，将贺龙打倒；诽谤朱德是“黑司令”、“老机会主义者”、“野心很大，想当领袖”，企图把朱德搞臭；逼迫叶剑英、徐向前等元帅作“检讨”；改组全军文革小组，宣布徐向前不再管全军文革的事。5月13日，军队文工团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在京举行文艺演出时，他们违背周恩来总理关于军队文工团两派同台演出的指示，支持一派演出，压制另一派，造成两派发生武斗，加深了军队的派性斗争。随后，又在武汉制造轰动全国的“七二事件”，这是一起借故挑起事端把矛头指向军队的事件。7月19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谢宫治、王力等在武汉军区师以上干部会议上说：“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7月20日，有些军队人员和群众组织把王力拉到军区大院说理辩论。林彪、江青等人把群众的这一行动说成是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搞的兵变，是“反革命事件”。他们利用这次事件，再一次掀起反军乱军浪潮，全国到处发生“揪陈再道式人物”和冲击军事机关的严重事件。仅湖北省在“七二事件”后被打死打伤的干部、军人、群众即达18.4万人。

林彪、江青等人把人民解放军的高级领导机关视为篡党夺权的巨大障碍，他们培植亲信，排除异己，夺取这些领导机关大权。7月25日，他们提出“砸烂总政阎王殿”，打倒肖华，搞垮了总政，使总政机关40多名副部长以上干部被批斗，总政机关及直属单位许多干部被立案审查，有的被迫害致死。林彪又宣布对总政实行军事管制，导演了一场军队“管制”军队最高政治机关的闹剧。之后，矛头直指总参谋部。他们采用捏造罪名，突然袭击的手段，制造了所谓的“杨、余、傅事件”，诬陷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治委员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为‘三月逆流’翻案”。

1968年3月24日，林彪在北京地区团以上干部大会上宣布，撤销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职务。并借此排斥打击一批老干部，篡夺军权。同时，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组成由黄永胜、吴法宪分别任正副组长，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参加的军委办事组，以取代中央军委常委。至此林彪集团

控制了军委的大部分权力。

在“文革”期间，他们通过罗织罪名制造了大批冤案，残酷迫害军队干部，使人民解放军 8 万多人遭到诬陷、迫害，其中 1169 人被迫害致死。仅 1968 年 7 月 21 日，康生为江青开列名单，许多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被诬陷，其中解放军中将以上的高级将领 37 人。

由于军事机关受到造反派的严重冲击，大批军队领导干部被打倒或靠边站，致使许多军事机关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许多战备设施遭到破坏；正常的军事训练基本停止，部队战斗力水平下降；院校由 125 所减至 43 所，大部分军队院校被撤销；军事科研工作也处于停滞状态；许多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被废止，部队作风、纪律、官兵关系受到严重破坏，机构臃肿，兵员膨胀，设立了名目繁多的办公室。军队建设遭到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破坏。

二、执行“三支两军”任务

1967年“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全面夺权”的阶段。从1月份开始，在全国掀起一场由造反派夺取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权的狂暴行动。在这场夺权斗争中，夺权者同倾向于支持原来的党政领导的群众之间，这一派夺权者同那一派夺权者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派性斗争。全国处于“打倒一切”、“全面内乱”的局面，地方各级党组织和政府机关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公安、检察、法院等机关失去或基本失去作用，工矿企业停产或半停产，武斗成风，社会秩序混乱，局势难以控制。

为了制止上述混乱局面，1967年1月21日，毛泽东决定人民解放军正式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执行“三支两军”（即支持左派广大群众、支援工业生产、支援农业生产、军事管制、军事训练）任务。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3月19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指出：为了适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阶段形势的需要，集中力量完成毛主席赋予军队的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等项重大任务。军委决定：1.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机关的“四大”，一般在3月底左右暂告一段落。除了照顾战备、援外和必需的工作外，视情况抽调1/3、1/2，甚至2/3的人员，立即投入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工作。2.各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可在整风告一段落后，立即全部投入上述工作，作为这些单位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步骤。按照上述的精神，人民解放军各部队陆续派出了大批干部、战士投入“三支两军”工作。

“三支两军”是“文革”期间人民解放军执行的一项主要政治任务，也是当时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为保证完成这项任务，全军师以上机关设立了“三支两军”指挥部（或办公室），负责领导“三支两军”工作。

“支左”从1967年1月至1972年，进行了6年。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支左”首先是支持“文化大革命”；其次是支持造反派夺权。各造反派组织之间在“权”这个根本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甚至酿成武斗流血事件。到1967年秋，全国陷入“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为了扭转天下大乱的局面，军队支左人员遵照毛泽东促进革命的大联合的指示，制止武斗、收缴武器。“支左”把解放军推到了“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线，既要支持造反派夺权，又要稳定局势，这种两难的矛盾是很难解决的。许多指战员为了制止造反派之间的武斗，减少群众的伤亡，而负伤或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经过长期艰苦细致的工作，全国大多数地区的派性组织相继走向联合，武斗基本停止，局势趋干稳定。到1968年9月，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其中由军队干部担任主任的有20个。军队支左人员担任县以上革委会主任的、北京市占78%，广东省占81%，辽宁省占84%，山西省占95%，云南省占97%，湖北省占98%。支左人员担任县以上革委会第一、二把手的约有5000余人，担任委员的有近5万人。“支左”人员主持革委会和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直接领导和组织了所在单位的斗、批、改运动。1972年，“支左”人员逐步撤回部队。

“支工”就是支援工业生产。“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为了扭转工农业生产不断下降的趋势，1967年3月3日，毛泽东在沈阳军区的一个报告上批示，“军队不但要协助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军队不能坐视工

业生产下降而置之不理”。于是，人民解放军在“支左”的同时，担负起支援工业的任务。使遭受“文革”严重破坏的工业生产，得到某种程度的恢复，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文革”运动对工业生产建设造成的损害。使一些停工停产的厂矿得以开工生产，使一些因武斗而瘫痪的重点工程得以继续进行。

“支农”就是支援农业生产。“文革”运动开始不久，“大民主”、大串连、武斗之风蔓延到农村。1967年初，一些地方由于农民参加夺权斗争，打派仗，致使农业生产无人管，影响了春耕生产。2月23日，中央军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号召全体干部战士紧急动员起来，协助驻地农村人民公社，抓好春耕生产。要求省军区、军分区和市、县人民武装部，把抓好春耕生产作为当前工作的重点。于是，人民解放军担负起“支援农业”的任务，派出大批宣传队到各地农村，协助当地领导机关和农村人民公社，抓好春耕；说服动员农村基层干部承担起组织领导春耕生产的责任；成立领导生产办公室，恢复生产组织，动员外出参加串连、武斗的农民回乡生产。与此同时，各部队不失时机，派出人员、技术力量，大力支援农业生产。各地驻军还采取定点挂钩的形式，每当耕种收割季节，都派出大批人员、机械，支援农业生产。为保证农业生产做出了重要贡献。

“军管”就是实行军事管制，是针对当时混乱局面，对一些特殊部门和单位采取的一种措施。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严重危及到边防沿海、交通要道、专政机构、机密单位、宣传舆论阵地、国防工厂、重要仓库等核心要害部门的安全。为了保证这些单位、部门必需的正常的工作秩序和安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了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军事管制的机构有两种：一种是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设有军管会主任、副主任，军管会成员若干人；一种是建立军管小组，设有军管小组组长、副组长，军管小组成员若干人。军管会或军管小组，负责本军管单位或下属系统的全面工作。到1967年2月中旬，全国实行军事管制的单位即达6900多个，大部是外事、公安、邮电、电台、报社、银行、仓库、监狱、交通、重要厂矿、国防工业等核心要害部门。实行军事管制，使这些要害部门和单位，避免了更大的损失，对保护国家财产，维护稳定，维护正常工作秩序，保证生产等，起了重要作用。

“军训”就是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学生实行军事训练。对师生实行军事训练是“文化大革命”中教育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

1966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对大中小学校教师进行短期军政训练，毛泽东指出：驻军部队派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方法很好，很有成效，应当在全国推广。按照指示精神，各部队抽出干部战士，对大中学校师生进行军训。“军训”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集中15至20天时间，进行短期的军政训练；一种是抽出干部战士，组成“军宣队”进驻学校，参与组织领导学校的“文革”运动和军训。“军训”对稳定学校的秩序，防止更大的混乱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967年至1972年间，人民解放军先后派出280余万指战员执行“三支两军”任务。三支两军人员分布在全国各条战线上，范围之广，规模之大，人员之多，时间之长，是我军建军史上前所未有的。参加“三支两军”的指战员在全国局势非常混乱的情况下，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中，做了大量工作，对于缓和紧张局面，维护社会秩序，减少动乱造成的损失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三支两军”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采取的非常措施，是在“文化大

革命”这种带全局性、根本性的错误方针指导下进行的，还由于参加“三支两军”的指战员思想上缺乏必要的准备，对地方的情况不甚了解，缺乏地方工作的经验；特别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插手、干扰、破坏，因而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也产生了许多缺点错误，带来一些消极的后果，给军队建设造成一些不利影响。

三、军队的整顿和一九七五年军委扩大会议

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

1969年4月，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将林彪作为“接班人”正式写入党章，林彪集团的其他主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他们通过军委办事组这一特殊机构，实际上掌握了军队日常工作的领导权。

党的“九大”以后，林彪反革命集团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利用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修改宪法的机会，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大做文章，以实现由林彪担任国家主席的企图。虽然毛泽东多次明确说，他不担任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但是，1970年4月11日，林彪仍然提出要设国家主席，表面上建议毛泽东担任这一职务，实际上，是他自己想当国家主席。正如叶群于同年7月在他们一伙人中私下说的：“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8月23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毛泽东主持会议。会议一开始，林彪便抢先发表讲话，仍然坚持设国家主席，并大讲“毛泽东是天才”，试图为会议先定调子。在分组会上，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黄永胜在北京值班，没有参加前期会议），有组织、有计划地煽风点火，说有人不赞成毛泽东当国家主席，否认毛泽东是天才。煽动不明真相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们坚持设国家主席。他们的活动，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并责令他们检查。会议闭幕时，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会后，中央召开华北会议，揭批陈伯达。同时，对军委办事组“掺沙子”，派人参加军委办事组。

1971年4月，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责令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黄、吴、叶、李、邱在会上检讨，党中央和毛泽东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削弱了林彪集团的权势，使林彪当国家主席的野心破产。

林彪在庐山这场斗争的失败，使他确认“我们这些人搞不过他们，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决心挺而走险，策划武装政变。1970年10月，林彪的儿子、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林立果，利用职权秘密组织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骨干力量，代号“联合舰队”，在北京、上海、广州建立秘密据点，进行联络。还在上海、广州组织“战斗小分队”、“教导队”，对参与搞政变的成员进行特种训练。1971年3月，“联合舰队”主要成员在上海制定武装政变计划，代号《“571工程”纪要》（“571”为武装起义的谐音），规定了实施的要点、口号、策略等。

正当“联合舰队”紧张准备发动“武装起义”的时候，1971年8月，毛泽东巡视南方，同沿途各省、区党政军负责人进行多次谈话，着重谈庐山这场斗争，指名批评林彪集团几个主要成员，并说“林彪当然要负一些责任”。这表明毛泽东不再信任林彪。林彪、叶群通过他们的亲信获悉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后，陷于极度恐慌之中。他们加快实施武装政变的计划，企图在毛泽东南巡途中对他加以谋害。并准备一旦阴谋败露，便带领亲信骨干，南逃广州，另立中央。9月上旬，毛泽东在杭州了解到一些可疑情况后，立即机智地采取措施，并迅速于9月12日提前返回北京，使“联合舰队”谋害毛泽东的计划破产。

林彪、叶群等人见一案不成，转而准备实施第二方案，企图南移广州，

分裂党和国家。但这一图谋迅即被党中央察觉。9月12日晚10时30分，周恩来接到中央警卫局的电话报告，反映林立果傍晚乘一架三叉戟飞机从北京飞到山海关有异常活动的迹象，立即下令追查擅自调动飞机之事，并命令飞机立即飞回北京。林彪、叶群、林立果见南逃已不可能，遂于9月13日凌晨强行乘飞机外逃叛国。途经蒙古温都尔汗附近时，飞机坠毁，机上人员全部葬身异国他乡。同日，“联合舰队”其他骨干分子乘直升机逃跑未成，有的畏罪自杀，有的被捕。一场武装政变阴谋被彻底粉碎。

9月24日，党中央责令林彪集团其他主要成员黄、吴、李、邱离职反省，彻底交代问题。

10月3日决定撤消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由叶剑英主持，负责军委日常工作。至此，林彪集团宣告彻底覆灭。

军队的初步整顿

林彪集团覆灭后，毛泽东于10月4日召集新成立的军委办公会议成员谈话，指出，林彪搞了十几年，军队的问题不少。军队要统一，要准备打仗，要好好整顿，肃清林彪的影响。

据此，在周恩来支持下，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在1972、1973年两年中，对军队工作进行了初步整顿，取得了一些成效。

第一，开展批林整风，纠正军队思想政治工作出现的“左”倾偏差。军队按照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揭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阴谋和罪行，重点地清查参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的人和事。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严肃而又慎重地处理了一批与林彪有牵连、犯有严重错误的人。对受林彪一伙打击、迫害的一批领导干部，军委本着有错必纠的原则，对其冤假错案予以平反，恢复其名誉和职务。针对当时军队部分同志存在的骄傲自满情绪，总政治部根据毛泽东指示，于1972年1月1日发出通知：在全军开展学习全国人民的运动，认真检查部队在执行政策纪律中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采取了一些改善军政军民关系的措施。经过一段时间的批林整风，部队的思想政治建设得到一定的加强。

第二，整顿各级领导班子，加强军队的稳定、统一。为确保军队的领导权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里，毛泽东亲自抓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解放了一批被打倒的老干部，重新安排了他们的工作。1973年，中央军委在对部队情况进行全面调查摸底的基础上，对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等大单位领导班子进行了整顿和调整。同年年底，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全国八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在这次会上，毛泽东领着到会人员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提出高级干部要加强组织纪律性。12月22日，中央军委发布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命令。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与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与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与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与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钧对调。限令各司令员10日内到职。各司令员坚决执行军委命令，及时赴新的工作岗位就职。这次调整，对加强军队的稳定和集中统一，具有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第三，重申军事训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文化大革命”以来，军事

训练得不到落实，部队军事素质下降。为改变这种状况，军委要求全军把军事训练作为经常性的中心工作来抓，狠抓军事训练的落实。队真办好教导队和恢复一些军队院校，狠抓了干部训练，有实践经验的军、师、团领导干部亲自任教，进行传、帮、带。到1973年9月，全军轮训干部数十万人，占应训干部的75%以上，基层干部的军事水平和组织指挥能力有较大提高，初步扭转了干部缺乏训练的状况。开展了野营拉练训练，提高了官兵在野战条件下“走、打、吃、住、藏”能力。在训练中，还积极开展拥政爱民活动，增进了军政军民团结，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毛泽东在一份报告中批示，“这样训练好”。为了适应当时的战备形势，开展了以打坦克为主的“三打”（打坦克、打飞机、打空降）、“三防”（防原子、防化学、防生物武器）训练，全军掀起一股学习和研究打坦克群众性的练兵热潮。全军的军事训练出现了好的势头。到1973年上半年，陆军野战部队全训师达34%。空、海军部队100%实行全训。全军部队军事素质、军事训练水平都有显著恢复。

但是，“文革”尚未结束，尚有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加之毛泽东不允许批极“左”。因此，批林整风，批“左”不可能彻底，林彪推行极“左”路线给军队造成的破坏和影响，也不可能彻底恢复和肃清。

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

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后，江青反革命集团不但未受到触动，而且在1973年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其势力进一步扩张，野心更加膨胀，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准备在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由他们“组阁”，并插手军队，企图夺取军权。1974年初，江青一伙借“批林批孔”运动之机，把矛头直指周恩来、叶剑英。江青还以个人名义向一些部队、机关写信，送材料，以及派人到部队等手段，“点火放炮”、“放火烧荒”，企图掀起动乱，打倒一批老干部，达到乱中夺取军权的目的。

在毛泽东支持下，党中央坚定地阻止了江青一伙“组阁”的阴谋，确定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1975年1月，党的十届二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并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同月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仍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任命邓小平为国务院副总理，不久，由毛泽东、周恩来提议，邓小平主持党中央、国务院日常工作。邓小平复出后，力挽狂澜，对“文化大革命”以来所造成的严重困难局面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整顿，同“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75年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取消了军委办公会议，恢复军委常委会，由叶剑英、邓小平担负起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领导责任。

6月24日至7月15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军事科学院、军委直属院校的负责人共70余人出席会议。会议在叶剑英、邓小平主持下，集中讨论了军队整顿和编制体制调整等问题。通过了《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报告》。邓小平、叶剑英分别就军队的整顿作了重要讲话，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军队整顿的必要性、目标、任务及其伟大意义，并就整顿的具体工作作统一部署。徐向前、聂荣臻作了重要发言。

会议遵照毛泽东关于“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的指示精神，深

刻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和军队存在的问题，并确定了解决军队问题的办法和措施。

关于战争形势。会议认为，世界革命和战争的因素都在增长。一方面是战争不可避免；另一方面是战争可能推迟。中国有必要也有可能争取更多一些时间，做好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等工作，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相应发展国防力量，准备应付霸权主义可能强加给我们的战争。

关于军队的状况。会议认为，军队总的来说是好的，经得起考验。但由于林彪一伙的破坏，存在的问题很多，邓小平概括为五个字：肿、散、骄、奢、情。除此之外，军队各级领导班子中有不少存在着“软、懒、散”的问题。根据上述问题，会议研究确定，军队进行整顿。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消肿”。调整编制体制，坚决把军队员额压减下来；精简机关，裁并重叠机构，安排超编干部；减少保障部队和普通兵员；一些部队平时实行简编制，保留技术骨干和技术装备，保持一定数量的齐装满员部队。有重点地加强特种兵部队，在3年内将军队总员额减少60万人。二是调整各级领导班子。解决软班子、懒班子、散班子的问题，纯洁组织，增强活力。三是提高部队整体作战能力。抓战备，搞好预设战场建设、作战训练和改善武器装备。这几项工作的侧重点是提高部队各级干部的组织指挥和管理能力，加强国防科研工作，发展军工生产。会议特别提出，要把军事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

会上，针对军队存在的问题，邓小平强调要把军队存在的“五个字”问题联系起来考虑，协同解决。针对江青等人插手军队事务，叶剑英强调军队要坚决执行三大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指出，今后未经军委同意，任何人不得在军队中发指示，搞运动，施阴谋。叶剑英、邓小平两位副主席的讲话，统一了全军高级干部的思想，为军队的整顿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7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军委《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报告》，以及叶、邓两位副主席的讲话。25日，中共中央通知将两个讲话转发全党学习。这对当时全国各条战线正在进行的整顿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在军队建设发展史上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会上提出的集中精力考虑军队长远建设，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发展国防力量，把军事训练放到突出的战略地位，必须消除派性增强党性，坚决克服“肿、散、骄、奢、情”等一些加强军队建设的思想、方针、原则，为军队的长远建设提供了有力指导。这次会议，连同会后进行的军队整顿，对后来中国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以其所具有的伟大而深远的意义而载入史册。

会后，中央军委提请党中央和毛泽东批准，组成叶剑英等6人参加的调整班子领导小组，对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等25个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把一些追随“四人帮”搞派性的人调整下去，把一批相对年轻的干部选进领导班子，增添了班子的活力，组织更加纯洁。

同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制定的《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方案》，经中央军委批准，在全军贯彻执行。全军机关、保障部队所占比例减少，战斗部队、院校和科研单位所占比例增大；陆军所占比例减少，海、空军所占比例增大。到1976年军队总人数比1975年减少13.6%。精简整编工作取得很大成绩。

根据军委会议精神，军队全面加强军事训练，并确定1975年的训练重点

是干部和诸兵种联合演练，计划争取在二至三年内解决军以下各级干部组织指挥问题。到 1975 年 11 月底，全军已集训师以上干部达 2000 余人，营团干部和参谋人员近 3 万人，野战部队基层干部轮训率达 85%。三总部还对刚刚恢复不久和新增办院校所存在的办学尚未走向正轨问题进行了大量深入的调查研究，提出《关于调整院校体制，加强干部培训的建议》、《关于加强院校建设若干问题的建议》，以及恢复军事、政治、后勤学院的建议，这些建议虽然得到军委的批准，但不久开展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而没能很好地付诸实施。

这一时期军队整顿工作取得相当成绩。然而，江青一伙对邓小平实行全面整顿，纠正“文革”错误，恨之入骨，抓住邓小平很少提及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绩”，向毛泽东进行歪曲性、挑拨性的情况反映。毛泽东不允许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随即于 1975 年 11 月掀起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976 年 2 月初，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通知，称叶剑英生病，由陈锡联主持军委工作。叶剑英被变相剥夺了军委领导权。同时决定，停止对 1975 年 7 月叶剑英、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的学习和贯彻执行。4 月，邓小平被撤消了一切职务，再次被打倒。从此，“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冲击全军，军队正在进行的各项整顿工作被迫停止，刚刚趋于稳定的形势重新开始动荡，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 1976 年 10 月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为止。

四、战备工作与军队建设

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思想的提出

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问题，是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正式提出的。但是，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由平时时期转入临战状态，则从6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

进入50年代末期，特别是到6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和中国周边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中苏友好关系，由于苏共公开全盘否定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干涉其他兄弟党的内部事务；在国际事务中推行霸权主义政策，并企图在中国建立海军基地和长波通信电台，遭到中国的反对，从而出现了裂痕。到60年代中期，发展到中苏公开论战，友好关系彻底破裂，社会主义阵营随之瓦解。特别是1964年开始，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地区大量增兵，从军事上对中国施加压力，使两国关系紧张起来。二是印度当局自50年代末开始，公开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并蚕食中国领土，1962年冬导致了中印边境地区战争。虽然印度当局遭到严厉惩罚，但仍不甘心失败，在美国等支持下继续与中国为敌，中印边境依然处于对峙状态。三是60年代初开始，美国以“特种战争”方式介入越南战争。1964年夏天“北部湾事件”后，美国公然轰炸越南北方，地面部队在越南南方参战，侵越战争升级，并时常侵犯中国领空，使中国面临着战争的威胁。四是1962年台湾国民党当局乘机加紧对东南沿海地区进行武装窜扰活动，再次叫嚣“反攻大陆”。一时间，形成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反动派的反华大合唱。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军事斗争形势。鉴于这种形势，1964年10月22日，毛泽东在一份批示中指出：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立足早打、大打、打原子战争。我们不仅要在战略部署、后方设施、作战准备和国防工业建设等方面充分注意这个问题。同时，也要在国民经济建设方面充分注意这个问题。随着中苏边境对峙局面日趋紧张，双方不断发生磨擦。至1969年3月发生了苏联武装入侵珍宝岛事件。4月，中国共产党在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指出：“我们决不可放松自己的革命警惕性，决不可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要做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总而言之，我们要有准备。”“他们一定要打，我们奉陪到底。”在此前后，全国进入临战状态，全民搞备战。

鉴于中国面临战争威胁的形势，党中央和毛泽东要求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从最坏的估计出发，树立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思想，做好反侵略战争准备，有备无患，是必要的，对于加强国防建设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要求全国以临战姿态做好战争准备，在经济建设中也过分强调符合战备要求，影响了经济建设的正常发展。

战备工程建设

为了适应未来反侵略战争的需要，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全国军民大力进行了战场建设，并取得了重大成就。

建设巩固的后方基地。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加快了后勤战备工程建设

的步伐。到 1970 年，全军交付使用的后方基地仓库 133 万平方米（吨），全国新建国防公路 6300 余公里，新建铁路 2400 余公里，整治航道 2500 公里以上，各地区还修建了许多地方交通线路。这些交通线路对连接各后方基地，建立战时畅通的兵站运输网，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强调加强战备的形势下，后方基地建设保持了较高的速度。到 1975 年，全军基本形成了以国家后方为依托，以军队战略、战役后方基地为骨干，由纵横交错的交通运输连接起来的，比较完整的后勤保障体系。

加强战场建设。人民解放军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规模宏大的战场建设，有效地改善了预设战场的阵地工程。主要方向和重点地区的设防工程建设已初具规模，阵地工程配套，使主要方向的阵地工程进一步完善。战略、战役指挥工程建设也取得明显成绩。各军兵种的战场建设也迅速加强。海军扩建了数座大型驱逐舰码头，新建了核潜艇基地和一批导弹艇、潜艇、飞机洞库，还建立了一些综合性的指挥工程。空军重点加强机场建设，并新建、改建了一批地下指挥工程和仓库、抽库，新建和改善了許多高炮、地空导弹、雷达技术阵地。第二炮兵部队根据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军委批准的战略导弹阵地工程建设规划，组织进行了阵地工程建设。为了提高国防通信网的抗毁性，增强通信保障能力，加强了地下电缆通信的建设。周恩来在 1969 年一次会议上强调：“要改变通信上的落后现象，从有线到无线，包括电缆、微波，一定要赶上去。”他亲自抓地下电缆通信网建设规划，落实工程建设投资。从 1969 年到 1979 年，埋设电缆线路数万公里，连通了全国大陆 27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基本形成了地下电缆通信网。

构筑人防工程。

1960 年前后，毛泽东主席多次强调要加强人民防空、城市防卫建设，提出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经毛泽东提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全国人民防空领导机构。随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人民防空重点城市也都相继成立人民防空指挥机构。总参谋部、工程兵、各军区和省军区等领导机关都设立人民防空业务指导机构，全国很快出现了修建人防工程的高潮。经过广大军民的艰苦努力，在各重点城市和地区构筑了大量人防结合、平战结合的人民防空工程。

在加强战备中，人民解放军在战场建设和后方基地工程建设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不仅为组织部队的正常供应，保障平时部队训练及各项任务的完成，保障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也为长远的国家战备建设打下了基础。

第二炮兵和基建工程兵的组建

第二炮兵的组建。为了适应现代条件下作战的需要，随着 60 年代中国核弹和导弹事业的建立和发展，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建立一支独立的，或协同其他军种共同对敌人实施有效自卫反击的战略核力量。

1966 年 6 月 6 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作出了以原中国人民公安部队领导机构为基础，与军委炮兵领导机构中管理战略导弹部队的机构合并，组建地地战略导弹部队领导机构的决定。经周恩来提议将地地战略导弹部队命名为“第二炮兵”。7 月 1 日，第二炮兵领导机构在北京正式成立。第二炮兵直属中央军委领导。

1967年7月4日，中央军委任命向守志为第二炮兵司令员，李天焕为政治委员。从此，人民解放军的序列里增添了一支实施战略核反击的新兵种。战略导弹部队是由近程、中程、远程和洲际导弹部队，作战保障、技术保障、后勤保障部（分）队，以及担负阵地修建任务和工程建筑部队等组成。它的基本任务是遏制敌人对中国使用核武器，在敌人对中国发动权袭击时，遵照统帅部的命令，协同其他军（兵）种或独立地打击敌方的重要目标。第二炮兵的组建，提高了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和威慑力，对贯彻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加强国防，保卫国家安全和提高共和国的国际地位起着重要的作用。

基建工程兵的组建。

60年代中期，在加强战备、准备打仗的思想指导下，国家基本建设工程和国防工程建设任务较重，特别是一批新建的“三线”项目多在偏远山区，施工条件异常艰苦。为了解决地方施工单位拖累重、调动困难的矛盾，中共中央政治局研究决定将中央全部的直属施工队伍，逐步整编为基本建设工程兵。

1966年8月1日，国防部下达命令，授予基本建设工程兵番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是由冶金、煤炭、水电、交通、石化、地铁、建工、水文、铀矿、黄金以及战备通信等多种专业施工部队组成，主要担负国家基本建设重点工程和国防工程施工及水文、铀矿、黄金的地质普查勘探、生产等任务。受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双重领导，各项工作由国家建委总负责。

基建工程兵组成后，随着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发展，部队逐步扩编，原有的专业施工部队规模不断扩大。同时，又在一些新的建筑行业部门组建了一批专业部队。1972年，整编组建了基建工程兵的铀矿地质矿山部队；

1973年开始组建基建工程兵水文地质普查部队。到1973年，基建工程兵组建了5个支队（师）、36个大队（团）。

1978年1月，中共中央批准，正式成立基本建设工程兵领导机构，国务院、中央军委任命李人林为基建工程兵主任，谷牧兼任政治委员。到1979年底，相继成立了冶金、煤炭、水电、石化、水文、黄金、通信、交通等10个指挥部（军级），部队共有32个支队（师）、5所技术学校（师级）、156个团，总人数达到49.6万人，成为一支多种专业的综合施工部队。基建工程兵认真贯彻执行人民解放军的建军原则和“劳武结合，能工能战，以工为主”的建设方针，发扬艰苦创业精神，为国家基本建设重点工程和国防施工及水文、铀矿、黄金地质普查勘探、生产等，做出了重要贡献。从1966年建立，到1982年撤销，16年间，先后完成国家大型重点工程150多项。

1964年，中共中央出于备战考虑，将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一线主要是指东北及沿海各省；三线是指西南、西北地区，包括云、贵、川、陕、甘、宁、青、晋、豫、鄂、湘11省，主要是长城以南、京广线以西广大地区；二线是位于一线和三线之间的广大地区。

五、国防科技的艰难发展

60年代中期，针对超级大国极力推行核威慑政策和军备竞赛，为了确保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要求加速发展国防科技，特别是国防尖端技术。中央专门委员会陆续部署有关部门制定发展核武器、导弹和运载火箭、核潜艇、人造卫星的计划。中央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元帅在主持制定1966年至1970年的国防科技第三个五年计划时强调指出，国防尖端技术要进一步突破，常规武器也要从仿制、改进，适时地转入自行研制，尽快研制出部队急需的新式武器装备。国防科技“三五”计划确定的主要任务是：继续下大力突破国防尖端技术，同时认真解决急需的常规武器装备。国防尖端要重点突破氢弹技术，同时积极研制地地战略导弹。常规武器以陆军武器为发展重点；陆军武器发展以防空武器和反坦克武器为重点；军用飞机发展以歼击机为重点；海军舰艇发展以潜艇为重点；军事电子技术发展以保障进一步突破国防尖端技术为重点。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落实国防科技“三五”计划受到了严重干扰和破坏。林彪、江青一伙诬蔑国防科技事业执行的是修正主义路线，完全否定国防科研、生产成绩；煽动“造反派”冲击国防科研、生产单位，一批专家、教授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遭批斗、抄家，家属受牵连，引起科技人员的严重不安，大批领导干部和科技专家受到冲击和迫害，被靠边站，造成许多科研、生产单位和职能部门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的状态，一些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被废弛，科研和生产难以正常进行。针对国防科技工业部门的混乱局面，1967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决定对国防科技工业部门实施军事管制，不准串联，不准停产，加强重点单位的安全保卫工作，以保证科研和生产的正常进行。周恩来、聂荣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采取了种种措施，尽力将“文化大革命”对国防科技事业的干扰破坏减少到最低程度；国防科技战线上的广大科技工作者、职工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继续发扬创业时期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从而保证了“文化大革命”前作出的发展国防科技的正确决策和部署基本得以贯彻，基本实现了国防科技“三五”计划确定的目标。

1968年3月以后，林彪集团把持了军委的大部分权力，在1969年制定国防科研、生产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1975）时，他们直接插手，不顾实际地要求战略武器和航天技术“前三年赶上，后两年超过”世界发展水平，对常规武器的发展也提出了高指标、大计划。造成了国防科研工作“遍地开花，无处结果”的严重后果，致使一些常规武器生产质量下降，很多武器装备长期不能定型。

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周恩来确定对国防科研和生产计划进行调整，果断地减、停、缓了一些项目，使国防科研走上了正轨。毛泽东指定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协助周恩来领导国防科技工业。他们围绕恢复科研、生产秩序，尽快改变其停滞不前的状态，进行了第一次整顿，使国防科研、生产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在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下，特别是“批林批孔”运动又把国防科研生产的部署搞乱了。

1975年邓小平主持工作后对国防科技工业进行了第二次整顿，把“抓装备”列为中央军委的主要工作内容之一，采取各种措施，排除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大力维护科研和生产秩序。

在“文革”十年中，由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聂荣臻等对国防科技工业的高度重视，不断采取措施排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使国防科技事业得以艰难地发展，也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重大成就。

一是战略核武器和航天技术取得新突破。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尔后到1976年底，中国又陆续成功地发射了一颗科学实验卫星、两颗返回式遥感卫星和3颗技术试验卫星，并对返回式遥感卫星成功地进行了回收。这些卫星发射的运载火箭研制成功，促进了地地战略导弹技术的发展。1970年1月，中国自行研制的远程地地导弹发射成功。

1971年8月和1974年4月，中国研制的第一艘鱼雷核潜艇，相继完成了系泊试验和航行试验。

1974年8月1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第一艘核潜艇——“长征一号”，正式编入海军战斗序列。核潜艇装备部队，对中国海军的综合作战能力产生了质的飞跃。

二是常规武器装备的发展有明显进步。根据国防现代化建设和援越抗美斗争的需要，国务院、中央军委继续以打飞机，打坦克，打军舰为重点，制定了发展常规武器的各项方针、政策，使常规武器的发展，由仿制和自行研制并举，逐步转向以自行研制为主，并取得了一定进展。陆军装备：到1975年，中国自行研制的63式自动步枪装备部队。70年代初，人民解放军火炮数量较之60年代初增加了一倍，性能也有改进。1971年，炮兵部队装备82毫米以上口径压制火炮，一次齐射弹丸总重和有效杀伤面积分别比1956年增加3.2倍和1.95倍。重量轻、机动性能好的国产火炮基本上取代了苏式火炮。国产59式坦克数量已超过苏式T—34坦克，成为人民解放军新一代主战坦克。1974年，69式中型坦克设计定型。空军装备：1967年，改进的国产轰—5轰炸机装备部队。1969年，强—5型强击机和航程更远、载弹量更大的轰—6型轰炸机开始装备部队。歼—7、歼教—5型飞机大量生产并相继装备部队。这些飞机的相继服役，及其地面辅助设备的相应发展，大大增强了人民解放军空军的作战能力。海军装备：在导弹和潜艇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1971年12月，航速高、航程远、火力强的051型驱逐舰编入海军建制序列。70年代初与60年代初相比，舰艇数量和吨位分别增长了63%和71%，人民解放军的海上战斗能力大大提高。

六、珍宝岛与西沙群岛自卫反击战

珍宝岛自卫反击战

新中国成立后，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友好过一段时间，但由于苏联推行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政策，使两党两国关系逐步恶化，直至酿成 60 年代末期的珍宝岛边境流血事件。

珍宝岛历来是中国领土，位于黑龙江省虎林县境内，在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面积 0.74 平方公里。原与中国大陆相连，后因江水终年冲刷，1915 年形成小岛。由于该岛两头尖，中间宽，形状似中国古代的元宝，因而得名“珍宝岛”。当地中国居民祖祖辈辈都在这里从事生产和打渔等活动。中国边防军也一直在这一地区执行巡逻任务。

1960 年以后，随着中苏之间国家关系的日益恶化，中苏边界亦开始多事。1960 年，苏联边防军在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地区挑起第一次边境事件。嗣后，苏方不断破坏边境现状，干涉中国边境居民的正常生产活动，殴打、绑架中国边民，阻止中国边防部队执行正常巡逻任务等。

1964 年中苏两国举行边界谈判，苏方无视国际惯例，强称珍宝岛为苏联所有。苏军不断进行武装侵扰，制造流血事件。从 1964 年 10 月至 1969 年 2 月，苏联边防军在中苏边境地区挑起事端达 4180 起。

1968 年 12 月 27 日，苏联边防军出动装甲车、卡车、吉普车共 7 辆，人员 75 名，公然越过中苏两国边界线乌苏里江主航道，侵入珍宝岛，武装拦截、阻挠中国边防部队执行巡逻任务，当场打伤 8 人。

1969 年 1 月 4 日，苏军 30 多入侵入该岛，强迫在该岛巡逻的中国边防部队人员离开。1 月 6 日，苏军再次侵入珍宝岛，抓走了 2 名捕鱼的中国公民。1 月 23 日，苏军出动 76 人，携带军犬，分乘 4 辆军车，在直升机的掩护下，突然袭击了正在珍宝岛上执行正常巡逻任务的中国边防军分队，打伤 20 多人，其中 9 人重伤。2 月，此类事件又连续发生了 5 起。对于苏军的多次挑衅，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中国边防部队一再采取克制忍让态度，未予还击。然而，苏联将中国的克制忍让态度视为软弱可欺。继续发动了武装入侵。

1969 年 3 月 2 日 8 时 40 分，中国边防部队派出巡逻队，分成两个组，在珍宝岛执行正常巡逻。第一组沿着冰道抵近珍宝岛。苏军发现后，立即出动 70 余人，分乘 2 辆装甲车、1 辆军用卡车和 1 辆指挥车，从位于珍宝岛对岸上游的下米海洛夫卡 and 下游的库列比亚克依内两个地方，分别向珍宝岛急进，企图阻拦中国边防人员执行巡逻任务。中国边防巡逻组当即向苏军发出警告，令其退出中国领土。苏军不但拒不撤退，反而以一部兵力向中国边防巡逻组的翼侧穿插，对中国第一边防巡逻组突然开枪射击，打死打伤中国边防巡逻人员 6 人。中国边防第二巡逻组听到枪声后，主动增援，并给入侵苏军以有力打击。经一个多小时的激战，击退了苏军的进攻性挑衅。

3 月 4 日至 14 日，苏军又多次侵入珍宝岛地区。均被中国边防部队击退。15 日凌晨 4 时许，苏军在坦克、装甲车掩护下，先后 3 次向守岛的中国边防部队发起猛烈进攻。中国边防部队采取集火近战的战术，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顽强抗击，在长达 9 个小时的激战中，苏军动用 50 余辆坦克、装甲车，实施 6 次炮火急袭，均未突破中国边防军守岛

部队的防御。中国边防军顶住了苏军的进攻，并将苏军打回了苏联境内。战斗中，击伤苏军 T—62 坦克 1 辆。3 月 17 日凌晨，苏军出动 70 余人，在坦克、装甲车掩护下再次侵入珍宝岛。向中国边防部队前沿阵地和纵深炮击，并在岛上敷设了 1000 余枚地雷，企图阻止中国边防部队登岛，以便强行拖走被炸坏的坦克。为粉碎登岛苏军的企图，中国边防部队用炮火拦阻射击。17 时，苏军撤回苏联境内。至此，珍宝岛自卫反击战遂告结束。被炸坏的苏军坦克被中国边防军缴获，送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展览，成为苏联侵略中国的铁证。

在这场自卫反击战中，中国边防军英勇作战，顽强地抗击苏军坦克、装甲车的连续进攻，保卫了中国神圣领土。中央军委通令表扬珍宝岛反击战参战部队，边防部队侦察连等 10 个单位记集体一等功，授予 10 名指战员以“战斗英雄”称号。

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苏联霸权主义行径，捍卫了中国的主权尊严和领土完整。

西沙群岛自卫反击战

1974 年 1 月 17 日至 20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南海民兵对入侵中国西沙永乐群岛的南越军队进行了一场自卫反击战。粉碎了南越的侵占企图，保卫了中国的领土主权。

西沙群岛，位于中国海南岛东南约 330 公里的海域，由宣德、永乐两个群岛及其他岛礁组成。它与东沙、南沙、中沙群岛同为南海四大群岛之一，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总面积约 10 平方公里。其中永乐群岛包括甘泉、珊瑚、金银、琛航、晋卿等岛屿。因其地处连接印度洋与西太平洋之间的海上要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且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历来为侵略者觊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西沙群岛中的一部分岛屿被法国所占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落入日本之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沙群岛，连同南海其他岛屿，重归中国。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多次声明，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无可争辩的领土主权。这一立场，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

印度支那战争结束后，法国将其占据的珊瑚岛移交南越政府。1956 年 5 月 26 日南越政府对中国提出领土要求，声称对西沙群岛、南沙群岛拥有主权，并派兵占领了西沙永乐群岛的一些岛屿。1958 年 8 月 21 日，南越增兵甘泉岛，并派军队侵占琛航岛。9 月 4 日，中国政府发表领海声明，重申西沙群岛是中国领土。中国政府的声明得到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在世界公正舆论压力下，南越不得不从甘泉、琛航、金银岛撤走侵略军。但在珊瑚岛上仍留驻有兵力。时隔不久，他们又重新侵占了一些岛屿。至 1973 年 8 月底，南越军队已侵占了中国南沙、西沙群岛的 6 个岛屿。并于 9 月宣布，将南沙群岛中的南威、太平等 10 余个岛屿划归其福绥省管辖。

1973 年 11 月，南越军队在西沙海域野蛮地撞毁中国南海渔业公司的捕渔船，把中国渔民抓到南越岷港，进行严刑逼供，强迫其承认西沙群岛是南越领土。

1974 年 1 月 11 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再次重申南沙、西沙、中沙、东沙群岛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这些岛屿拥有主权。南越西贡当局置中国政府的警告于不顾，于 1 月 15 日至 18 日悍然派驱逐舰李常

杰号、陈平重号、陈庆瑜号和护卫舰怒涛号相继侵入西沙永乐群岛海域，向在这里从事生产的中国南海渔业公司的渔轮 402 号、407 号疯狂进行挑衅，向飘扬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甘泉岛开炮，打死打伤中国渔民和民兵多人，并相继占领了金银岛、甘泉岛。

为了维护中国领土主权不受侵犯，保护中国渔民的正常生产作业，中央军委于 1 月 17 日命令南海舰队立即派出舰艇，驶抵西沙永乐群岛海域，执行巡逻任务；海南军区派出民兵，随南海舰队舰艇进驻永乐群岛的晋卿、琛航、广金三岛。中央军委要求在同敌人斗争中，应始终坚持说理原则，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先开第一枪。如敌人首先发起攻击，我则坚决进行自卫还击。为夺取这场斗争的胜利，中央军委组成由叶剑英、邓小平等参加的领导指挥小组。

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广州军区决定由南海舰队派出广州基地扫雷舰第 10 大队的 396、389 号舰组成 396 编队，榆林基地猎潜艇第 73 大队的 271、274 号艇组成 271 编队，于 17 日至 18 日进至西沙永乐群岛附近巡逻，由海南军区派出 4 个武装民兵排，分别进驻晋卿、琛航、广金三岛；由南海舰队派出广州基地猎潜艇第 74 大队 281、282 号艇组成 281 编队，于 18 日驶抵永兴岛附近，执行机动支援任务；由南海舰队航空兵和广州军区空军派出部分兵力前往支援。

18 日上午，南越驱逐舰“陈庆瑜”号和“陈平重”号侵入甘泉岛附近海域，进行挑衅，撞击中国 407 号渔轮，驾驶台被毁。

19 日 5 时许，南越军舰分路接近中国舰艇编队，企图凭借其军舰吨位大、火力强的优势，胁迫中国海军编队就范。海军南海舰队按照广州军区的部署，命令 396 编队进至广金岛西北面拦截南越“李常杰”号、“怒涛”号舰；

271 编队进至广金岛东南海面，监视“陈庆瑜”号、“陈平重”号舰。南越军舰靠近这几个中国岛屿。

南越军舰为达目的，以“李常杰”号舰冲向中国 396 编队，并猛然掉转船头，撞坏了中国 389 号舰的左舷栏杆、指挥台支柱，并蛮横地从中国海军 396 编队中间穿过，抵近琛航、广金两岛。

7 时 40 分许，南越 40 多名士兵强行登上琛航、广金两岛，在广金岛首先向中国民兵开枪。中国民兵被迫还击。毙敌 1 人、伤 3 人。南越军队后撤。

10 时 20 分许，南越军舰与中国海军编队拉开距离，凭借其火炮口径大，射程远的优势攻击中国海军。中国海军编队在遭到 4 艘南越军舰突然炮击的情况下，奋起自卫还击。在吨位小、火炮口径小、射程近的情况下，采取近战战法，以 271、396 两个编队高速接近南越军舰，各自寻找最近的目标，紧紧咬住敌人不放，发挥小口径火炮射速快的优点，狠狠打击南越军舰，迅速压制了南越军舰的火力，改变了不利局面。

经过一个多小时激战，中国 389 舰、274 艇相继中弹受损，但中国海军指战员仍以顽强的意志坚持战斗。南越军舰亦遭受到沉重打击，4 艘军舰全部受伤，无心恋战，纷纷逃窜，“李常杰”号舰逃往外海，“陈庆瑜”号舰、“陈平重”号舰分别向西北、东南方向逃走。“怒涛”号舰因伤势过重、行动迟缓，在琛航岛以东海域被中国海军舰艇 281 号、282 号追上，将其击沉在羚羊礁以南海域。

1 月 19 日榆林要塞区 3 个步兵连、1 个两栖侦察队、部分加强分队和民兵共 500 人，奉命向珊瑚、甘泉、金银三岛进发，迅速发起登陆作战。

20日顺利收复三岛。西沙自卫反击战胜利结束。

南越当局不甘心失败，增派2艘驱逐舰至帆港，又派6艘军舰从岷港向西沙方向机动，试图发动新的侵略。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严正警告南越当局必须立即停止对中国的一切军事挑衅和侵略活动。中央军委命令驻守南海海疆的陆、海、空军和民兵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迫使南越军队不敢来犯。

在这次西沙自卫还击战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参战部队击沉南越护卫舰1艘，击伤驱逐舰3艘，毙伤敌数百人、俘敌49人。给南越军队以沉重打击，捍卫了中国南海海疆，取得了海上自卫反击作战的经验。1月23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了嘉奖令，表彰全体参战军民。

七、对外军事援助

继 50 年代初抗美援朝之后，60 年代至 70 年代，应越南、老挝两国政府的请求，中国先后派出部队，进行了援越抗美和援老抗美斗争，帮助这些国家赢得了抗美救国战争的胜利。此外，中国还为一些国家提供了武器装备援助和培训军事人员，有力地支援了受援国的军事建设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得到了受援国和世界人民的高度赞扬。

援越抗美

50 年代初期，中国人民解放军派出援越军事顾问团，援助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并取得了胜利。1955 年，法国军队按照日内瓦协议的规定撤出越南后，美国公然违反日内瓦会议通过的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国家和平的协议，以提供军事援助力手段，乘机迅速渗入南越，取代法国势力，扶植西贡政权，阻挠越南南北统一，企图变南越为美国的殖民地和军事基地。60 年代中后期，美国直接派武装部队侵入越南，使侵越战争不断升级，逐渐演变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继朝鲜战争之后又一场大规模局部战争，加剧了亚洲的紧张局势，严重地威胁到中国的安全。面对美国的武装侵略，胡志明为首的越南劳动党中央，领导越南南方和北方人民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抗美救国战争。同时，越南政府要求中国政府予以援助。中国政府和人民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从 1965 年至 1975 年，在物力上和人力上给予越南人民以真诚、巨大、无私的援助。为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民族牺牲。

在越南抗美救国战争中，中国先后有 20 多个省、市、自治区和数千家科研单位、工厂担负了援越抗美的任务，为越南人民提供大量的武器装备和其他物资援助。只要越方需要，有现成的就马上供给，甚至抽调人民解放军的装备；没有现成的就立即生产；没生产过的即行组织研制。当时，越南要求中国援助物资品种多，数量大，时间紧，要求高。承担任务的单位，把它当作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加班加点、不折不扣地完成。中国对越南的军事物资援助有：枪、炮、汽车、坦克、飞机、舰艇、弹药、军服、油料和食品等。这些物资约合 40 亿元人民币，可装备 200 余万人的部队。

1964 年 8 月 5 日，美国制造“北部湾事件”后，侵越战争愈演愈烈。根据越南政府要求和中越两国政府及军队签订的有关协定，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从 1965 年 6 月至 1973 年 8 月，先后派出了防空、工程、铁道、扫雷、后勤等部队，总计 32 万余人（最高年份达 17 万余人），在越南北方，执行防空作战、筑路、构筑国防工程、扫雷及后勤保障等任务。

协助防空作战，保护交通运输线。美国在侵略越南的战争中，把轰炸越南北方铁路、公路，疯狂破坏交通线，作为其侵越战争的重要战略任务，使越北仅有的几条铁路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为了打击美国空军对越南北方的轰炸封锁，1965 年 8 月 1 日至 1969 年 3 月止，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派出 9 批高炮部队轮换入越作战，计有 16 个支队、辖 63 个高炮团和 50 个队属高炮营及部分高射机枪连和勤务分队等，总计 15 万余人，主要担负河内至友谊关铁路线北宁至谅山段、河内至老街铁路线安沛至老街段、新建的克夫至太原铁路线，以及太原钢铁基地等地区的防空作战任务，并掩护中国援越工程部

队的施工。在历时3年零9个月的防空作战中，共作战2153次，击落美机1707架，击伤1608架，打击了美国侵略者，保卫了越南北方领空，有力地支援了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中国援越高炮部队于1969年3月中旬前陆续回国。

维护抢修铁路、公路。为帮助越南人民抢修越南北方的铁路、公路和改善其运输条件，保障运输线的畅通，应越方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从1965年6月至1970年6月，先后派出以铁道兵、工程兵为主的支援部队10余万人，担负修建和保障河内以北铁路运输与修建7条重要公路的繁重任务。于1965年6月，中国抽调正在国内修建铁路的铁道兵部队，组成1个支队赴越，遂行河内以北地区铁路的抢修、抢建任务。奋战至1970年6月5日，提前完成了各项工程。计新建铁路117公里、改建铁路362公里、抢建铁路战备工程98公里，新建铁路桥梁30座、隧道14条，新建扩建铁路站段20个，架设通信线路1023对公里，敷设水底通信电缆近8公里。改善了越南北方的铁路网络，有力地保障了越南抗美战争铁路的运输需要。授越筑路的工程部队3个支队，辖16个团、1个民工总队、25个测量设计队和4个钻探队，配属6个高炮营及部分高射机枪分队等，共8万余人，从1965年9月开始。陆续赴越担负新建和改建越南友谊1号、3号、7号、8号、10号、11号、12号共7条公路的任务。在3年多时间里，完成了7条干线公路及附属防护设施的修建任务，共计修路1206公里，桥梁305座、总长6954米，涵洞4441座、总长4.6838万米，完成土石方3050万立方米。所有工程全部达到或超过了规定的技术标准。1968年7月23日，胡志明在庆祝实现“中国援助越南修建公路协定”时深情他说：“你们为越南虽然只修了1200多公里的公路，可是你们的情谊胜过几千公里、几万公里！”

构筑国防工程。中国援越工程部队3个支队，奉命于1965年6月9日、10月3日和1966年12月15日先后赴越，在越南东北群岛和红河三角洲地区构筑永久性设防工程。经过艰苦奋战，完成的主要工程有：坑道239条毛总长2.5万多米，外炮场138个，掘开式永备工事149个，海底通信电缆15条、总长103公里，永久性道路和施工道路171公里、桥梁14座、涵洞21个，码头9座。还帮助越南修建了内排、安沛两个现代化机场和飞机洞库。通信工程大队，帮助越南架设了通信线路330杆公里、挂线894对公里，安装了4个载波电话站，还架设了其中一个电话站至越南西北军区驻地的中继线。越方对工程评价说：工程抗力均超过越方要求，质量高，坚固、适用、伪装好。

扫雷和铺设输油管工程。美国在侵越战争中不断遭到失败、国内反战情绪日益高涨的形势下，被迫于1968年底停止了对越南北方的轰炸，

1969年初在巴黎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开始谈判。美国为了迫使越南在谈判桌上让步，1972年5月，对越南北方重要港口及内河航道布设水雷，实行海上封锁，切断越南北方接受外援物资和对越南南方支援的主要运输线，使停息了3年多的战火又在越南北方重新燃起。越南政府要求中国帮助越南人民打破美军的海上封锁。中国政府同意立即开通中越间隐蔽的海上航线，抽调汽车部队在两国边境地区向越运送援助粮食和其他物资。同时派海军部队协助越军扫除沿海美军布设的水雷和抢建野战输油管线的任务。

南海舰队奉命调集各型扫雷艇12艘、保障艇4艘，人员共计318名，从1972年5月28日开始，分5批入越，执行扫雷任务。于1973年5月17日

扫雷工作全部结束。越南海军对海区航道检查后认为，中国海军扫雷工作队任务完成得很好，达到了清扫的目的。为帮助越南铺设野战输油管线，从1972年5月31日至1973年2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抽调部队和民兵8000多人次，并配备大批机械、车辆，在凭祥至友谊关、防城港至摊散两地段，铺设了5条援越野战输油管，总长159公里，连同新建扩建的油库、泵站、通信设施和铁路专线等工程，共完成土石方10多万立方米。从1972年6月至1976年6月，4年间中国通过输油管向越南输送的汽油、柴油总计近130万吨，占越南抗美战争期间中国援越石油总量的一半多。有力地支援了越南抗美战争。

中国支援部队在援越抗美的艰苦年月里，在战场上英勇作战，在工地上艰苦奋斗，涌现出许许多多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英雄人物，有4000多名指战员负伤，有1000多人壮烈牺牲，长眠在越南的土地上。中国支援部队还时时处处注重增进中越两国人民的友谊，帮助越南人民做了大量好事，受到越南人民的热诚拥戴。胡志明主席曾盛赞中国援越部队是“来时人人敬爱，走时人人想念的革命军。”

中国支援部队的将士们，与越南军民并肩作战，用生命和鲜血捍卫了越南北方领土和领空的安全，保障了越南北方交通运输的通畅，有力地支援了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谱写了中越人民友谊的新篇章。

对中国人民给越南人民的无私援助，越南党和政府曾给予高度评价，1977年11月，越南劳动党总书记黎笋率越南党政代表团访华时说：“越南人民的胜利是与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兄弟的中国人民的强有力支持和巨大援助分不开的。”

援老抗美

1954年7月日内瓦会议后，法国殖民主义者撤出老挝，美帝国主义乘虚而入，镇压老挝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面对美国的侵略，老挝人民在老挝人民党和爱国战线的领导下，不畏强暴，英勇抗击，建立和发展了自己的武装力量。但在武器装备、军用物资、军事训练和交通运输等方面，都存在着许多困难。为了抗美救国斗争的胜利，老挝人民党和政府，请求中国给予军事、物资援助，并帮助修建公路。老挝是中国友好邻邦。为了支持老挝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决定从物资上和军事上给予大力支援。从1959年起，向老挝爱国战线提供大量武器装备援助和帮助训练军事技术人员。

在老挝人民抗美救国期间，中国向老挝无偿援助各种枪11万余枝（挺）、各种火炮2780余门、枪弹1.7亿发、炮弹267万余发，以及一扎其他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为保证其武器装备能及时得到维护，还向老挝提供了19套师团修械所的设备。自1962年至1978年，中国先后派出18个工程大队，3个民工大队，直接施工力量7万人，投入主要施工机械2250多部，无偿为老挝修筑7条沥青路面公路，总计修建公路8224公里，桥梁131座，涵洞2677个，铺设沥青路面458万多平方米。为了保障筑路工程的顺利进行和施工人员的安全，根据老挝人民党的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自1969年3月至1973

黎笋：《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的讲话》，见《人民日报》1977年11月21日。

年 11 月，先后派出高炮 3 个支队和 1 个大队，担负援老筑路工程的防空作战任务。在 4 年多的时间里，对空作战共 95 次，击落美机 35 架，击伤 24 架，有效地保障了筑路部队和民工的安全。援老部队在艰苦的施工和对空作战中，顽强奋战，许多人员负伤致残，有 269 人牺牲，其中 210 人长眠在老挝孟塞和班南舍的烈士陵园里。

老挝人民革命党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对于中国人民为老挝人民所做出的贡献，给予很高的评价。

1974 年 10 月 10 日，老挝人民解放军最高指挥部参谋部致函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称赞：“中国人民的援助，是在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援助。”老挝人民革命党代表团在烈士陵园向中国烈士献花圈时表示，“对于中国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我们子孙后代将永远铭记在心”。

外训和对外武器装备援助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遵照中国政府对外援助方针和政策，依据中国政府与受援国家政府签订的协议，进行了培训外国军事人员和对外援助武器装备工作，有力地支援了受援国军队建设以及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受到受援国高度赞扬。

培训军事人员。人民解放军依据中国政府对外援助政策，实行“从受援国的实际出发，为受援国着想，积极帮助受援国军队提高自训能力和掌握中国提供的武器装备”的外训工作方针，以极端负责的精神，精心施教；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采用形象直观的教学法，精讲多练；按协议规定的时间，尽快帮助外军学员学习和掌握所需的军事知识与技术。人民解放军先后承担外训任务的有院校、部队、医院和工厂等单位 130 多个。先后给 50 多个国家培训了军事人员，培训的对象，既有军事指挥员和政工人员，也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为保证外训任务圆满完成，承担外训任务的单位都成立了外训工作领导小组，设置了相应的外训机构，负责领导此项工作；选配思想作风好、业务能力强、技术过硬、专业对口，并会讲、会做、会教，有丰富教学经验的干部担任教员和翻译。培训的方式：一是接收受援国军事学员来中国培训；二是派遣军事专家到受援国施训。50 年和 60 年代，人民解放军先后对越南、朝鲜、古巴、老挝、阿尔巴尼亚等亚非国家派来中国的 6700 名各类军事学员进行了培训。同时，还先后派出各类专家 700 余人到一些受援国帮助培训军事人员。其中，为越南承担的培训任务最多。

60 年代中期至 70 年代后期，人民解放军先后为 40 多个国家培训了军事人员，接收外军学员 8000 余人，派出军事专家 6400 余人。训练内容由步兵轻武器的使用和基本战术，到陆、海、空军重装备的专业技术及合成军队的战役战术。80 年代，外训工作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以派出专家到受援国就地培训为主，接收外国军事学员来中国培训为辅，使外训工作更加适合受援国的实际需要。

中国人民解放军从事外训工作的教职员工，发扬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谦虚谨慎，忘我工作，热忱为学员服务，圆满完成教学计划，增进了与受援国人民和军队的友谊。有的外国学员感激他说：“我们来中国之前是一盏没有油的灯，现在中国朋友给我们加满了油，可以点亮回国了！”出国的军事专家和翻译，在异国他乡，无私地传授知识，严格遵守受援国的法律，

尊重当地人民的风俗习惯，同受援国人民和军队同甘共苦，圆满地完成外训任务，受到了受援国政府和军队的高度称赞。

援助武器装备。为了支援亚洲人民反抗美国侵略的斗争和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世界各国积极发展友好关系，从 50 年代初起，中国人民即根据中国的能力和条件，对一些国家提供了武器装备援助，60 年代中期至 70 年代后期，武器装备对外援助达到高潮。

越南是我国对外武器装备援助时间最长、数量最大的国家。这项工作，从 1950 年即已开始。1963 年以前，计向越南提供各种枪 35.6 万余枝（挺），各种人炮 7360 余门、飞机 15 架、艇船 28 艘、汽车 100 辆、工程机械 935 部、无线电机 6300 部、有线电机 2 万余部和大批弹药。还有防化、观测器材等装备以及大量军需物资等。在越南抗美救国战争期间，是中国援助越南武器装备及其他物资的高峰期。1964 年至 1978 年间，中国向越南提供了总值人民币 40 多亿元的武器装备物资援助，主要有各种枪 177 万余枝（挺），火炮 3 万余门，坦克、装甲车 810 辆，飞机 165 架，艇船 117 艘，汽车 1.5 万余辆，地空导弹系统 3 套，导弹 180 枚，雷达 260 部，无线电机 3.2 万部，有线电机 4.9 万部，工程机械 4834 部，舟桥 15 套，各种枪弹 10.4 亿发，炮弹 1660 万发，地雷 19 万个，炸药 1.5 万吨，以及其他装备器材和大量军需物资等，有力地保障了越南抗美救国战争的需要。1977 年 11 月，越南党政代表团访问中国期间表示：“越南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这种慷慨支援”。

60 年代和 70 年代老挝、阿尔巴尼亚是中国援助武器装备的重点国家。

1960 年至 1977 年，向老挝无偿提供的武器装备物资援助主要有：各种枪 11.5 万枝（挺），火炮 2780 余门。坦克、装甲车 34 辆，各种枪弹 1.7 亿发，炮弹 267 万余发，手榴弹 92 万枚，地雷 25.4 万个，无线电机 2530 部，有线电机 2654 部，汽车 773 辆，炸药 958 吨，军服 257 万套（件），主副食品 771 吨等，为老挝人民取得抗美救国斗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从 1961 年至 1978 年的 18 年间，中国向阿尔巴尼亚无偿提供了军事援助，援助的主要武器装备有：各种枪 75.2 万枝（挺），各种人炮 1.1 万余门，坦克、装甲车 890 辆，飞机 180 架，艇船 46 艘，还有地空导弹、弹药及通信、工程、防化器材等一批装备和物资。援助的武器物资除满足阿军队平时需要外，还使阿军有相当数量的储备。

在 50 年代，中国人民为支援朝鲜人民抗击美国的侵略，也为朝鲜提供了大批武器装备援助。

从 1964 年至 1978 年，中国对 60 多个国家提供了武器装备援助。援助的品种由轻武器装备发展为重型武器装备，援助的数量大幅度增长。计有各种枪 420 万枝（挺），各种炮 9 万余门，坦克、装甲车 3620 辆，飞机 1430 架，艇船 352 艘，一些新型武器，如地空导弹、歼—7 型飞机等也援助了某些国家。80 年代，武器装备的对外援助工作，进行调整和改革。调整了对外军事援助的款额和援助武器装备的结构比例，改革了援助的方式。根据受援国的不同情况，分别采取无偿、收取成本费、贷款等多种方式，对处在争取民族解放斗争中的国家和虽无战争但经济实力低于中国的友好国家，采取无偿

见《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上），576～581，581～583 页。

见《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上），576～581，581～583 页。

见《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上），580 页。

援助的方式；对无反侵略战争又有支付能力的国家，采取收取成本费、贷款或延期付款的方式。

中国在对外武器装备援助中，一贯遵循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总方针和尊重对方、平等相待的原则，因此受到了受援国的赞誉。

八、支援国家经济建设和抢险救灾

“文化大革命”10年期间，人民解放军积极参加国家经济建设，架桥开路，修厂建矿，抢险救灾，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保卫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

部队农副业生产

新中国成立以来，军队大力开展农、林、牧、副、渔业生产，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先后津立起一批稳定的大型生产基地，蔬菜大部分做到自给。连队农副业生产有很大发展。

1966年5月初，总后勤部向中央军委呈送《关于进一步搞好农副业生产的报告》，毛泽东于5月7日批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即可以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经中共中央转发，在全党全军全国学习贯彻。由于“五七指示”是在“文化大革命”即将开始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发出的，不可避免地带有“左”的色彩。尽管如此，但在实践中对推动部队农副业生产的发展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66年至1975年，人民解放军共建成大中型农场200多个，生产粮食63.5亿公斤，交售国家粮食16亿公斤。同时，开办了2000多个中小工厂，累计产值26亿元，收益7亿元。

部队农副业生产的发展，改善了部队的的生活，支援了国家经济建设，但在工作中，有的部队背离了“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的方向，致使生产用兵过多，影响了部队军事训练。针对这些问题，1972年军委领导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指出，军队搞生产是可以的，但首先要注意我们是军队，要以军为主。同年底，中央军委批转总参谋部关于加强军事训练、调整压缩生产用兵比例的建议。

1974年5月，总后勤部发出通知，调整部队生产任务。1975年全军进行各方面整顿，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关于整顿部队生产的意见》。《意见》执行的结果，使部队的农副业生产的规模和体制趋于合理。到1975年，全军生产用兵29.3万人，不到1971年的一半，比1974年减少9万人。

1976年全军继续压缩生产用兵人数，仅留了24万人。

军队进行农副业生产，不仅锻炼了部队，强化了思想作风建设，密切了官兵关系，改善了部队生活，而且为国家的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

支援国家经济建设

人民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除执行作战、训练和“三支两军”等任务外，还抽调部队参加国家重点工程项目的建设，特别是随着铁道兵、工程兵的组建，成为国家大中型工程项目建设骨干力量。

在支援交通建设方面，1964年至1972年，铁道兵经过8年奋战，修建了大兴安岭林区铁路，解决了林区木材外运和进一步开发的问题。1966年至

1974年，参加成（都）昆（明）铁路会战，逢山凿洞，遇河架桥，打通了西南地区重要的交通运输要道，为加快西南地区经济建设步伐作出了贡献。从1969年开始，铁道兵先后抽调8个师又8个团与当地驻军一起参加修建襄（樊）渝（重庆）铁路，在5年的艰苦奋战中，仅修隧道就有405座、桥梁716座。

1971年，基建工程兵4000多指战员，开赴川藏线，投入川藏公路上两个受自然灾害破坏严重的地段（邦达至林芝、竹巴笼到海通）的整修工程。用了整7年时间，到1978年修复公路576公里，改善了川藏线的通行条件。1974年基建工程兵1万多指战员投入对青藏公路的整治改造工程，把沥青铺上了“世界屋脊”，为建设团结、文明、富裕的新西藏，促进各民族大团结，巩固边疆防务作出了重要贡献。1974年，铁道兵进入西北地区，修筑南疆铁路吐鲁番至库尔勒段、青藏铁路哈尔盖至南山口段。此外，铁道兵还承担了北京地下铁道和（北）京原（平）铁路建设任务，并开始修建沙（河）通（辽）铁路。在交通建设方面，人民解放军还参加了南京长江大桥、广西柳江桥、天山公路等重点工程的新建、改建、扩建。为发展国家航空事业，人民解放军航空兵帮助地方修建了许多机场和航空设施，培训和输送了大批民用航空人才，开辟了一些飞行难度大的新航线。承担了许多航空测量、航空拍摄、航空运输等紧急而繁重的任务。

在支援工业建设方面。人民解放军从1966年至1976年的10年间，先后参加了武汉钢铁公司、第二汽车制造厂、辽阳化纤厂、上海金山石油化工厂、云南天然气化工厂、大庆油田、葛洲坝水利枢纽、刘家峡水电站、桑树坪煤矿、平顶山煤矿等重点工程项目建设。1970年至1975年的5年间，沈阳军区派出8个步兵师、3个工兵团、2个舟桥营、2个架线连，协助大庆油田建成了8条输油管道，总长2471公里，形成了从大庆到秦皇岛和从大庆到大连的两条输抽大动脉，年输油量为4000万吨。有力地支援了国家经济建设。

人民解放军在帮助地方抢运国内外贸易的紧急物资，疏导物资流通，解决压车压船滞港问题等方面，做了不少的工作。派出了大批人员，动用了千万台次车船航空器材，为地方有关部门减轻压力，减少了可能造成的巨大损失。

在支援农业生产建设方面，人民解放军除担负“三支两军”中的“支农”任务外，一般采取就近定点挂钩、派出工作队和利用野营驻训的机会三种方式支援农业生产。仅昆明军区在“文革”10年期间，即支援地方1400多万个劳动日。1970年到1977年，全军出动14万个劳动日，参加整改土地工程达1万多项。人民解放军的支援，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文革”给农业生产造成的损失。

参加抢险救灾

“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间，人民解放军先后参加了河南驻马店、辽宁海城、云南龙陵、河北唐山等地的抗震、抗洪和其他抢险救灾。为国家和人民避免和挽回了可能造成的大量损失，为人民立下功勋。

海城地区抗震救灾。1975年2月4日，辽宁省营口地区海城县发生7.3级强烈地震，许多房屋倒塌，堤坝开裂，大地喷水冒沙。震前，沈阳军区根据预报，做了防震救灾准备工作。震后，人民解放军3.6万人按照预定的方

案迅速出动，赶赴灾区，开展救援工作。

在抢险救灾中，部队发挥了强大突击队的作用，以最快的速度把遇险群众抢救出来，把受伤群众送到后方。在短短几天里，从倒塌房屋中抢救群众2700多人，救治伤病员5万多人次。参加抢送的车辆1400台次。空军航空兵在1个月内出动飞机254架次，空运物资143吨，有力地支援了抗震救灾斗争。

地震发生后的第6天，即是中国人民的传统节日春节。救灾部队为了使群众像往年一样过好春节，当即从营区调去帐篷4450顶、棉大衣7.8万件。棉衣20万套、棉被3.3万床、褥子4.4万床、棉帽6万顶、毛皮鞋6.7万双、炉子900个，还有大批药品。海军某基地送去大米5吨。并力群众搭起了4.3万个简易窝棚。让群众吃得好，睡得暖。

春节过后，为帮助灾区春耕生产，部队同群众一起刨粪、送肥、选种、修理农具、清理淤沙、平整土地。4月份，还出动2万多人，沿辽河、浑河、太子河两岸，展开抢修河堤的大会战，修补因地震而开裂的裂缝和坍塌处，有效地保障了震区人民的农业生产。

驻马店抗洪救灾。1975年8月5日至8日，河南省中南部洪河、汝河、沙河、颍河、唐河、白河流域连降暴雨，多处河堤、水库决口，使驻马店、许昌、南阳、周口地区遭受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灾。数万顷农田被淹没，数百万间房屋被冲倒，铁路、公路、桥梁被毁坏，1200多万人口被困。在紧急关头，人民解放军立即出动7万余人，上百架飞机，近3000辆汽车，5艘登陆艇，并组织起89个医疗队，在中共河南省委、省军区统一领导下，参加抗洪救灾。

救灾部队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作风，与洪水展开顽强搏斗，涌现出许许多多的英雄集体和个人。炮兵某师的一个营被特大洪峰冲散，分隔成十几处，但他们被水冲到哪里，就在哪里重新组织起来，带领群众继续战斗。为了把群众救出险区，他们把电缆紧紧缠在自己身上，在水中排成一行，搀扶着群众渡过激流，转移到安全地带。该营干部战士经过三天三夜奋战，共抢救出群众1600多人，转移群众8000多人。群众感动他说，“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才把俺老百姓的生命看得这样珍贵”。为表彰他们对人民的突出贡献，中央军委授予3营“抗洪救灾爱民模范营”称号。某部2连28人站在齐腰深的烂泥里，用肩膀垫起木板竹筏，架起一座浮桥，让群众顺利安全通过。被当地人民传为佳话。部队医疗队深入灾区抢救危重病人。仅济南军区14个医疗队，两个月内即救治6.9万余人，其中危重病人230名。为解决数十万灾民无处栖身、挨饿受冻的问题，救灾部队在地方政府统一布置下，给群众提供食宿。空军航空兵在非常复杂的气象条件下，把国家和各地人民支援的大量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到灾区。

据不完全统计，救灾部队共抢救转移群众34.8万余人，抢救粮食750万余公斤、牲畜3800余头，运送物资2500多吨，出动飞机3500多架次，空投食品、药品等5400余吨，为群众治病33万人次，盖房搭棚子31万余间，安置近70万群众住宿。还支援灾区粮食600多吨，捐款4万余无，捐衣物28万多件。河南、湖北两省省军区以及其他部队为尽快恢复灾区生产，帮助群众抢种秋季作物4万余亩，收获残存粮食、蔬菜4300余吨。

此外，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基建工程兵部队，同民工一道，抢修京广大动脉毁坏最严重的遂平县焦庄车站102公里区段，提前在当年国庆节前夕实

现通车，把国家因运输中断造成的损失减少至最低点。兰州军区还千里迢迢送来了上千匹军马，表达他们对灾区人民的关切之情。

唐山抗震救灾。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河北省唐山、丰南地区发生了7.8级的强烈地震，震中裂度为11度，波及北京、天津及周围的50个县。顷刻间，山摇地裂，唐山一下子变成一片废墟。数十万群众被掩埋在倒塌的房屋中，道路桥梁被毁，水电、通信全部中断。这场罕见的大地震，造成24万亲人死亡，16万亲人重伤，城、乡建筑破坏率分别为96%和91%，直接经济损失达50亿元。

驻地人民解放军心系人民，在自己同样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以无私无畏的精神投入抗震救灾。空军唐山场站通信连想尽一切办法于地震后两小时沟通了与北京的联系，第一个向党中央报告了唐山严重灾情，同时引导一架飞机载着空军某团副政委刘忽然等飞往北京，当面向党中央、国务院领导汇报了唐山震情。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根据唐山灾情，迅速作出部署，立即调动陆海空10万大军急赴唐山。北京军区、各军兵种、沈阳军区、济南军区的救灾大军从四面八方唐山挺进。在震后24小时内，人民解放军带着发电机、抽水机、推土机、通风机、运水车、救护车等机械到达唐山，迅速展开了救灾工作。与此同时，空军航空兵亦投入了紧张的空运救援。

救灾部队指战员，不顾长途跋涉的疲劳和频频余震的危险，哪里有人呼救，就奔向哪里。他们硬是用一双双手扒开堆堆砖头、瓦块。钢筋、水泥板，抢救出数以万计的遇险群众。他们轻伤不下火线，常用自己的身体挡住塌落的砖石，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由6000余名医护人员组成的196个医疗队，在缺少药品器材的情况下，克服灾区缺水、断电的重重困难，开设救护所、医疗站，收治和抢救伤员上百万人次，使大批垂危伤员在现场得到及时治疗。

空军唐山机场，在整个救灾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个机场自身严重受损，许多设备被砸坏。机场指战员克服许多难以想像的困难，保证了飞机起降安全。为了提高飞机起降效率，机场果断建立左右航线，实施双向起飞，使飞机安全起降次数成倍增长。最紧张时每26秒起落一个架次。最后14天内，起降飞机超过以往3年的总和，达2400多架次。1个月内运出伤员2万多人，运进物资2510多吨，创造了中国航空调度史上的奇迹，保障了灾区救援工作的需要。

灾后遗体处理是一大难题，要求：“快验、快运、深挖、深埋”。救灾部队勇挑重担，在20多天内，共掩埋遗体7万多具，有效防止了瘟疫等疾病的肆虐蔓延，确保了灾区人民的生命健康不再受到损害。

震后，力迅速恢复唐山生产，重建家园，救灾部队就地取村。昼夜突击，帮助群众搭盖简易房屋40余万间；许多部队想方设法安排好灾民的生活。工程兵还日夜抢修唐山钢铁厂的变电站、炼钢厂和其他重要厂矿，提前完成了修复任务。

唐山救灾部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深深打动了唐山人民，群众说：解放军的功绩像天上的星星，看得见，数不清，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1977年4月30日，中央军委为表彰抗震救灾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单位和模范人物发布命令，授予8个单位和个人荣誉称号，给10个单位和个人记功。

此外，部队还参加了许多其他抢险救灾。如抢救1968年1月26日晚齐

齐哈尔市生产民用烈性炸药的化工厂发生的严重火灾；1976年7月21日下午兰新线黄河大桥附近一列满载原油的火车发生相撞起火的险情；1968年1月中旬广东韶关鸡公山的森林火灾；1971年3月底福建清流县郊区的山林火灾；1969年7月28日广东汕头沿海一带12级强台风登陆灾害；1973年9月14日海南岛强台风登陆灾害；1976年4月17日福建省7个地市的部分地区冰雹和暴风雨袭击灾害等。

人民解放军在抢险救灾中挺身而出，奋勇当先，为抢救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减少损失，作出了突出贡献，深深得到党、政府和人民的信任和爱戴。

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10年内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人民解放军也深受其害，军队建设受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严重干扰和破坏，一些正确的建军方针、原则被歪曲，一批卓越的军队领导人被打倒、关押，有的被迫害致死。“左”的一套被当作正确的加以推行，致使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受到挫折。但是，由于老一辈革命家和广大指战员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通过不懈的努力，坚持了党的绝对领导，保持了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保持了自身的稳定，英勇地保卫了国家安全，维护了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在动乱的年代，人民解放军仍然是国家稳定、安全、统一的重要支柱。

第九章 开创军队建设新局面

一、拨乱反正，肃清“文化大革命”对军队建设的影响

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一举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全国局势逐步趋于稳定。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全军随即开展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组织上的清理整顿，平反大批冤假错案，医治“文化大革命”给军队建设造成的创伤，使全军在思想认识上达到了高度的统一，为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打下了良好的思想、组织基础。

思想政治上的拨乱反正

多年来，由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对军队建设的干扰破坏，军队建设正确的方针、原则被歪曲，而“左”的一套却被作为正确的东西在军队中长期推行，流毒甚广，影响深远。

为了肃清“文化大革命”对军队建设的影响，粉碎“四人帮”后，人民解放军根据中共中央的有关精神迅速掀起了一个群众性的揭批高潮，对“四人帮”反党乱军、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罪行进行了深入而又系统的批判，同时，对林彪反党集团给军队造成的恶劣影响也进行了全面彻底的清理。

在1977年3月的军委座谈会上，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副主席作了《坚决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把揭批“四人帮”运动引向深入》的报告，总结了全军揭批运动经验，分析了揭批运动形势，并再次强调要把揭批“四人帮”同揭批林彪反党集团结合起来。针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对军队的破坏，提出了亟需澄清的十个问题：应该不应该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应该不应该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应该不应该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应该不应该整顿军队？应该不应该严格遵守革命纪律和规章制度？应该不应该按照接班人“五项条件”搞好老中青三结合？应该不应该强调军队要稳定？应该不应该严格训练、严格要求？应该不应该坚持野战军、地方武装、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应该不应该准备打仗？这十个“应该不应该”概括论述了军队全面整顿的基本内容，抓住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反党乱军的要害，提出了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根本要求，指出了军队全面整顿的基本内容，为军队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指明了方向。

按照会议部署，全军普遍进行了十个“应该不应该”的教育。各部队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针，批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反党乱军的罪行和谬论。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弄清军队建设的大是大非问题，从而在一系列建军的重问题上，初步澄清了被他们搞乱了的的思想，统一了认识。

1977年7月31日，叶剑英在隆重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50周年的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再次批判了林彪、“四人帮”倒行逆施、破坏军队建设、毁我长城的滔天罪行，总结了粉碎“四人帮”近一年来军队拨乱反正的基本情况，并进一步向全军提出必须坚持的八个原则问题：必须使枪杆子牢牢掌握在党和人民手里，决不能让“四人帮”、林彪那样的大小野心家篡夺军队的各级领导权；必须搞马克思主义，搞团结，搞光明正大，决不能像“四人帮”、林彪那样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必须完整地准

确地理解和贯彻毛泽东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决不能像“四人帮”、林彪那样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摘取片言只语，骗人吓人；必须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作风，决不能像“四人帮”、林彪那样搞唯心论、形而上学，说假话，骑在人民头上称王称霸；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党性，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决不能像“四人帮”、林彪那样结成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唯利是图，唯权是夺；必须坚持正常的民主生活，广开言路，决不能像“四人帮”、林彪那样开“帽子工厂”、“钢铁工厂”，一提不同意见，就把人一棍子打死；必须坚决维护党和军队的纪律，决不能像“四人帮”、林彪那样搞无政府主义，“踢开党委闹革命”、肆意破坏捣乱；必须加速军队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决不能像“四人帮”、林彪那样把军事和政治对立起来，破坏革命，取消现代化。

这些原则问题，既为全军拨乱反正进一步清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流毒影响提出了明确的原则要求，也为新时期加强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打下了思想基础。

作为全军群众性的揭批运动，到1978年10月基本结束，全军的拨乱反正取得明显成绩，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破坏军队的时间较长，流毒影响较深，不可能通过一次短时间的群众性揭批运动而彻底肃清。加之，当时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华国锋继续遵循“左”的指导思想，提出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甚至在中共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他还是只字不提党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严重“左”的错误，认为党所面临的任务是“反右”而不是纠“左”。这种“左”的指导思想，不仅阻挠和拖延了恢复老干部出来工作和平反冤假错案的进程，使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主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无法澄清，而且影响了全军的拨乱反正工作，使军队许多大是大非问题不能澄清。

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1977年4月，邓小平写信给党中央，提出“我们必须世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的工作。尔后，他又多次指出过，“两个凡是”不行，必须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

1978年6月，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又强调了坚持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思想路线的重要性，支持《光明日报》引发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此后，全军各大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也发表文章和讲话，参加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对军队进行思想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具有重要的意义。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全军根据中央军委和邓小平的指示，在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中，自上而下深入普遍地进行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至此，全军广大指战员摆脱了“左”的思想的束缚。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肯定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科学地分析了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使全党全军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有了统一认识。根据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军队在1983年11月至1986年底的分期整党中，又进行了彻底否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讨论。

《邓小平文选》，第2版，第2卷，39页。

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使军队消除了“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实现了思想政治上的拨乱反正。

组织上的清理整顿

长期以来，由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一直推行“任人唯亲”的干部路线，在军队笼络安插了一批亲信和死党，其中包括少数高级干部。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后，尽管在全军范围对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进行了清查，但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致使清查处理工作遗患不少。加之在揭批“四人帮”时，联系揭批林彪反革命集团，又揭发出一些人的问题，需要彻底清查。对此，中央军委十分重视。叶剑英在1977年3月的军委座谈会上，强调要把同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彻底查清。邓小平在同年底的军委全会上也指出：“对于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一定要彻底查清。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军队不搞好，军队干部不纯，祸害很大。”

依据中共中央关于既要搞清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的方针，全军在清查工作中，充分放手发动群众，把学、揭、批、查紧紧结合起来，并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受审查人员的组织处理工作，始终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在1983年至1986年的全军整党过程中，又重点清理了“三种人”（即“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这次组织清理，没有因受审查或害怕受审查而死伤一个人，这是过去历次政治运动所无法比拟的，也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审查干部提供了新的经验。通过清查处理，纯洁了军队，纯洁了军队干部队伍，军队各级领导权掌握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手里，从而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左”的错误，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一大批开国元勋、建军功臣被打成“军队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历史反革命”、“叛徒”、“自首变节分子”、“特务”、“现行反革命”，遭受残酷迫害。有的被长期监禁，有的被强行劳动改造，有的被残害致死致残，其家属、子女、亲友也均受程度不同的株连。

粉碎“四人帮”后，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对“两个凡是”的批判，促进了全党全军的思想解放。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讨论了党的历史遗留问题，审查、解决了历史上一大批冤假错案及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为从组织上全面、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彻底平反冤假错案创造了条件。在邓小平、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支持和推动下，在全军官兵的强烈要求下，军队各级党委彻底冲破“左”的指导思想的束缚，坚持有错必纠、实事求是、全错全平、部分错部分平的原则，并依照过去由哪一级定的由哪一级纠正的程序，进行了大量艰巨细致

的工作，使大批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

自 1973 年 11 月起，全军平反、纠正的冤假错案先后有：为原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作了平反；为“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江青和康生一伙迫害致死的贺龙元帅作了平反；为 1967 年在武汉“七二 事件”中遭受迫害的原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等干部战士作了平反；为在 1976 年 4 月“天安门事件”中受到迫害的干部战士作了平反；为 1973 年遭受“四人帮”迫害的原海军司令员肖劲光作了平反；为创造“郭兴福练兵法”的优秀教员郭兴福作了平反；为 1967 年 7 月在林彪“砸烂总政阎王殿”中受到打击迫害的肖华等同志和在 1960 年 9 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及其以后受到迫害的谭政等同志作了平反；为原总参谋长罗瑞卿作了平反；为原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原空军政治委员余立金、原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作了平反；为在贯彻《1966 年 2 月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中受审查人员和作品作了平反；为聂荣臻、涂向前、罗瑞卿、杨成武的所谓“晋察冀山头主义”、“华北山头主义”作了平反；为 1959 年庐山会议以后受到错误批判、处理的原中央书记处书记、总参谋长黄克诚、原副总参谋长兼沈阳军区司令员邓华、原总后勤部部长洪学智等作了平反；为 1974 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受迫害的原中共中央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作了平反；等等。据统计，全军共有 2600 余起错误案件得到了纠正，共有 2.6 万余人得到平反昭雪。

在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政策过程中，还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精神，对在军队 1957 年反右派斗争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 5799 人作了改正。随后，又对在 1959 年反右倾斗争中，被错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错戴上其他政治帽子的 1.7 万余人作了平反。对 1958 年错误开展反对“教条主义”而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同志也作了平反。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落实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的指示精神，对他们当中一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错误地定为“历史反革命”的人也作了认真复查，进行了平反。

各种冤假错案的平反，不仅有效地医治了“文化大革命”给军队造成的创伤，而且还极大地调动了广大指战员的积极性，促进了安定团结，推动了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上），第 1 版，287，287～288 页，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上），第 1 版，287，287～288 页，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

二、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

中越两国山水相连，在长期的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两国人民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特别是在越南抗法、抗美救国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节衣缩食，全力支援越南人民，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但是，胡志明逝世后，越南当局背离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在实现国家统一后，地区霸权野心急剧膨胀，把中国视为其推行侵略、扩张的最大障碍。不断挑起事端，煽动敌视仇视中国的民族情绪。

抗美救国战争一结束，越南当局于1978年12月20日，出动20万人的兵力，武装侵略柬埔寨。同时完全改变了对中国的政策，把中国当作“最直接、最危险的敌人”和“新的作战对象”。反华、排华、仇华愈演愈烈，并把20万华侨和华裔越南人强行驱入中国境内。对中国无理提出领土要求，宣称历来属于中国的西沙、南沙群岛为越南领土，并出兵侵占南沙群岛的一些岛屿。中越两国陆地边界全长1300余公里。从1974年开始，越南当局不断制造边境挑衅事件，此后入侵中国边界事件逐年增多，少则百余起，多则千余起，仅1978年就入侵1100多起。1978年9月至1979年2月的半年时间里，越南还在边境地区侵占中国领土达160余处，严重地威胁和破坏了中越边境地区的建设与安宁。对于越南的武装挑衅和入侵，中国政府一直采取克制忍让态度，多次规劝越南当局要以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并一再提出通过谈判合理解决两国边界领土争端，同时，广西、云南边境军民严格执行边防政策，坚持说理斗争，即使在越南军警向中国军民开枪的情况下，也不予还击。但是，越南当局把中国政府的克制忍让视为软弱可欺，无视中国政府的多次警告，反华叫嚣愈演愈烈，并进一步加剧中越边境的军事挑衅活动。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党中央、中央军委不得不作出自卫还击的决定。

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包括，1979年2月中旬至3月中旬，广西、云南边防部队实施的边境自卫还击作战；1981年5月开始的收复法卡山、扣林山地区的作战；1984年4月开始的收复老山地区的作战等军事行动。

广西、云南边境地区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

1979年2月17日凌晨，人民解放军广西、云南边防部队，遵照中央军委命令，在广西、云南中越边境全线对侵犯中国边境的越军进行了自卫还击作战，作战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月17日至26日，历时10天。这一阶段，主要是击退侵入广西、云南边境的越军后，歼灭以越南高平、老街地区为基地经常出犯的越军，同时对同登、芒街和封土地区之越军实施了牵制性进攻。

17日凌晨，广西、云南边防部队向当面越军发起攻击。

广西边防部队击退当面越军后，采取南北对进，钳击高平之越军，于22日完成了对高平地区越军的合围。由于高平地区地形复杂，石山林立，自然洞穴多，越军被合围后，除一部坚守要点外，大部化整为零，分散游击，负隅顽抗。为了尽快歼灭当面越军，广西边防部队旋即增调预备队进入高平

转引自《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分册》（下）第1版，379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

地区作战，战至2月25日，攻占了高平。

云南边防部队分为右翼和左翼两路，合围老街地区越军。战役发起后，右翼部队强渡红河，迅速歼灭了河西岸守敌；左翼部队激战至20日，歼灭老街守敌大部，攻占了该市区。云南边防部队突破越军前沿防御后，越军恐中国边防部队向纵深攻击，遂令部队增援，妄图前后夹击云南边防部队，死守柑糖。越军增援部队一部于21日进至代乃。力粉碎越军企图，22日，云南边防部队以右翼一部迅速夺占代乃及其附近高地，切断越军前后联系。23日，右翼和左翼部队主力采取钳形攻势，沿红阿两岸并肩突击，直逼柑糖。柑糖守军弃城南逃。25日，云南边防部队全部占领柑糖市和柑糖矿区。

广西、云南边防部队主力，在围歼高平、老街地区越军的同时，以一部兵力在凭洋、金平等方向发起攻击，有力地牵制了越军，为下一步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战役第二阶段，从2月27日至3月5日，历时7天。根据第一阶段的作战经验，广西、云南边防部队主要采取穿插迂回、多路突击的战法，在炮火掩护下全线昼夜出击，夺取谅山市，歼灭电缩在沙己地区的越军，造成在战略上威逼河内的态势。

反击谅山越军的广西边防部队分为左中右三路，中路主力部队在左右两翼部队的配合下，于27日对谅山发起进攻，经4天激战，于3月2日攻占了谅山市北区。为扩大战果，3月4日，广西边防部队在强大炮火掩护下，分多路越过奇穷河，占领整个谅山市区，并前出控制了市区以南各要点。

云南边防部队于2月27日对越军增援部队发起攻击，3月3日攻占沙巴、铺梭、郭参、封土等地。广西、云南边防部队经连续战斗，于越军以沉重打击，越军惟恐中国边防部队进攻河内，急忙在纵深组织防御。

回撤阶段，从3月6日至3月16日，历时11天。人民解放军广西、云南边防部队连续作战17天，达到了自卫还击作战的预期目的。3月5日晚，新华社奉命发表声明：“中国政府宣布，自1979年3月5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开始全部撤回中国境内。”广西、云南边防部队自3月6日起，采取交替掩护，边回撤，边搜剿的战法，在回撤过程中，继续搜剿残敌，扩大战果。3月16日边防部队全部撤回中国境内。

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参战的空军部队在中国领空内实施巡逻警戒。海军舰艇也在北部湾中心线中国海区进行巡逻警戒活动，有效地配合了地面部队的作战。广西、云南边防部队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在当地民兵和各族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配合下，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连续作战，克服地形复杂、情况多变等困难，出色地完成了预定任务。中国边防部队在17天的自卫还击作战中，曾突入越南军队防御纵深20~40公里，攻占了高平、谅山，黄连山、莱州四个省的21个县（市），以及广宁、河宣两省的部分地区和战略要地，给越南侵略者以严厉打击，同时摧毁越南当局在边境地区针对中国构筑的大量军事设施。在还击作战中，中国边防部队严格遵守战区群众纪律，不住民房，露宿街头，不拿越南人民一针一线。在回撤过程中，中国政府信守诺言，没有占越南一寸土地，更没有在越南留一兵一卒。中国政府严正声明：中国绝不侵占别国领土，也不容许别人侵犯我们的领土，我们要的只是和平和安全的边界。表明了中国政府和人民捍卫领土主权，保卫边疆各族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自卫立场。

这次作战时间短，纵深浅，政策性强。由于双方在战场上没有使用空、海军直接交战，仅限于地面部队的作战，这些情况不同于一般的战争，加之，中国边防部队已多年没有打过仗，部队绝大多数中下级指挥员缺乏实战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部队训练少，军事素质差，在战斗中也暴露了诸如指挥失当，协同失调，编制不合理，武器装备不配套等问题。但通过实战，人民解放军在战役指导、战术运用、指挥协调、组织各种保障和民兵参战支前等方面，取得了一些可贵的经验，对于加强人民解放军建设和指导未来反侵略战争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收复法卡山、扣林山地区的战斗

广西、云南边防部队回撤后，中国政府为维护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改善中越两国关系，一再建议举行中越边界谈判，协商解决两国间的边界领土争端。同时，要求中国边防部队严守祖国边界，维护边界地区的安全。而越南当局表面上同意改善中越关系，暗中却在加紧扩军备战，抢占边境要点，不断挑起边境事端，仅1980年武装挑衅即达1500余次。越军凭借占领的有利地形，经常向中国广西和云南边境地区进行袭扰，开枪开炮，严重威胁中国南部边疆人民的安全。面对越军的侵犯挑衅活动，广西、云南边防部队又奉命进行了收复法卡山和扣林山的战斗。

法卡山，位于中国广西宁明县上石边境地区，主要由3个高地组成。越军占领法卡山后，经常袭扰中国边境军民。广西边防部队于1981年5月6日收复失地。越军于当日、10日、16日、19日和6月7日，先后组织炮兵火力猛烈袭击法卡山中国军队防御阵地，并实施步兵营团规模的进攻。保卫法卡山的广西边防部队英勇作战，顽强抗击，粉碎了越军一次次的进攻，牢牢地守住了阵地。

扣林山，位于中国云南省麻栗坡县猛硐东南边境地区，主要由3个高地组成。越军侵占该高地后，多次袭击中国边境军民，打死打伤多人，中国边境人民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云南边防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于1981年5月7日对越军实施了反击，收复了扣林山。此后，双方在该地区争夺异常激烈。在两个多月时间里，越军组织了192次步兵营以下规模的反扑，向中国境内发射炮弹1.8万余发。边防部队经过坚守阵地，寸土不让，打退了越军的进攻。

广西、云南边防部队收复法卡山、扣林山地区的作战，再一次打击了越南当局的嚣张气焰，稳定了边境地区的局势。边防部队能攻善守的英勇事迹受到了中央军委的表彰。

收复和坚守老山地区的作战

老山地区位于云南省麻栗坡县境内，是中越边境主要通道，主要包括老山、662.6高地、八里河东山和者阴山等边境要点。老山主峰海拔1422.2米，是扼制边境通道的制高点，地位十分重要，1979年中国边防部队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回撤后，越军抢占老山主峰及边界线中国一侧的有利地形，建立几个军事据点，并不断制造边境挑衅事件，给中国边境人民的生产和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为打击越军的挑衅活动，保卫中国边境安全和维护国家尊严，中国

边防部队奉中央军委命令收复老山地区。收复和坚守老山地区作战，从 1984 年 4 月起，至 1989 年 10 月止，共 5 年多时间。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炮击作战。从 1984 年 4 月 2 日起，到 27 日上，历时 26 天。中国边防部队集中参战的炮兵部队，在中越边境全线对越军阵地、指挥所、仓库等 1600 余处目标进行猛烈炮击，尔后转入持续的重点炮击和反炮击作战，有力地打击了越军，为收复老山、者阴山等地区创造了条件。

第二阶段为收复老山和者阴山作战。从 1984 年 4 月 28 日起，到 5 月 15 日止，历时 18 天。4 月 28 日凌晨，中国边防部队分两路向占据老山的越军发起进攻，边防部队一部在炮火支援下，仅用 9 分钟就攻占了 662.6 高地；另一部从东西两翼向老山主峰实施向心攻击，经 4 小时激战，攻占老山主峰。4 月 30 日凌晨，中国边防部队向占据者阴山的越军发起进攻，经 5 小时激战，基本全歼守敌，收复了者阴山。5 月 15 日，中国边防部队又收复了八里河东山。至此，中国边防部队完成了收复老山、者阴山作战任务。

第三阶段为打击越军反扑作战。从 1984 年 5 月 16 日起，到 1987 年 4 月止，历时近 3 年。参战的中国边防部队为打击越南当局的地区霸权主义的嚣张气焰，在老山地区组织坚守防御，与越军长期近距离对峙，抗击越军反扑。这一阶段粉碎了越军千余次袭扰和 7 次师团规模的反扑。中国边防部队还对越军前沿阵地实施了小规模出击作战，以及多次较大规模的炮击与反炮击作战，予越军以沉重打击。

第四阶段力缩小作战规模，转入正常守备。从 1987 年 4 月起，到 1989 年 10 月止，历时两年半，中国边防部队对当面越军进行了 11 次集中炮击作战，粉碎越军 700 余次小股袭扰。同时，根据作战形势的发展，适时减少参战兵力，逐步收缩防御阵地，逐渐转入正常守备。

在老山地区作战期间，驻云南、广西边防守各部队，空军部分航空兵、地空导弹部从和有关军区的侦察大队也密切配合老山地区的作战行动，在中越边境全线有效地牵制和震慑了越军。

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是一场特定条件下规模有限的边境局部作战。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和作战地区各族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在军事上、政治上都取得了胜利。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反对侵略、反对大小霸权主义的决心，沉重地打击了越南当局的嚣张气焰，保卫了中国边界、领土主权尊严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对稳定东南亚的局势，支持柬泰人民的反霸权主义斗争，具有重要意义。人民解放军在这次作战中受到一次较为全面的锻炼和考验，并树立了新一代最可爱的人的形象，创造了“亏了我一个，幸福十亿人”的无私奉献的“老山精神”。

三、新时期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确立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与此相适应，人民解放军的建设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是重新确立了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总方针和总任务；二是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到和平时期的建设轨道，即利用大仗暂时打不起来的和平环境，加快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三是提出了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这些，为新时期人民解放军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重新确立军队建设的总方针和总任务

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是新中国成立后军队建设的总方针、总任务。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军队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从50年代末期，受“左”的思想的影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和破坏，使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走上了一条曲折发展的道路。

1975年，邓小平针对军队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军队要整顿”的思想，其根本目的就是要按照现代战争的要求建设军队。

1976年，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叶剑英、邓小平等军委领导，围绕军队建设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其根本着眼点是要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一支现代化的革命军队。1977年3月，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针对林彪、“四人帮”对军队建设的干扰破坏，提出必须澄清是非问题的“十个应该不应该”，和7月30日，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50周年大会上讲话中提出八个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时，就提出了加强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1979年1月，徐向前在军委座谈会上进一步指出，把工作重点转到四个现代化上来，作为军队来说，就是国防现代化。同月，总政治部发出《关于贯彻执行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问题政治工作意见》，要求全军加速实现国防现代化，为建设一支现代化的革命军队而奋斗。1981年9月19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华北地区军事演习阅兵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更加明确提出了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总方针和总任务。他指出，人民解放军“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肩负着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保卫四化建设的光荣使命。因此，必须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并且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加强政治思想建设，使部队成为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模范；在国民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改善武器装备，加速国防现代化；进一步密切军政、军民关系，增强军队内部团结，加强民兵建设，继承和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加强军政训练，进一步增强部队的军政素质，努力提高现代条件下诸军兵种协同作战能力；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进一步开展“四有、三讲、两不怕”活动，加强作风培养，使部队具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扎扎实实地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为保卫世界和平，为保卫祖国领土的安全，力争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的神圣大业作出新的贡献等。从而，在经历“文化大革命”10年动乱的破坏之后，重新确立了人民解放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总方针和总任务，为军队建设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和目标。

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

军队建设总方针总任务重新确立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作了科学的分析和判断，从而作出了军队建设从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准备状态转到和平时期建设轨道的战略性转变的重大决策。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力中心的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本身就要求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转移到现代化上来，同时要求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大局。然而，自60年代中期以来，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一直处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准备状态。这种状态，已经不适应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的要求。

从国际环境看，历史进入70年代后，国际关系有所缓和，60年代中期以来那种针对中国的军事压力和威胁相对减弱，特别是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后，中国的国际地位迅速提高，中国不仅同社会主义国家及非洲、拉丁美洲的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了友好合作关系，而且还同加拿大、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等西方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英国、荷兰升格为大使级关系，同日本邦交也实现了正常化。随着美国第38届总统尼克松的访华、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发表和1979年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美两国长期的敌对状态开始缓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同时，也确定了对外开放政策，中国的外交政策更加灵活。

1982年9月中共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明确宣布，中国对美苏都不结盟，也不建立任何战略关系，同时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作为对外政策和外交工作的主要目标。在国际事务中，中国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力处理国际关系的最高准则。这样，中国与亚洲及世界大多数国家保持和发展了良好的关系，中国周边环境大大改善。长期紧张对峙的中苏关系也开始缓解。这些，为人民解放军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的转变，提供了客观基础。

1985年6月，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上对当今时代战争与和平问题以及中国周边安全环境进行了科学分析，明确地提出了虽然“世界战争的危險还是存在的”，但“在较长时间内不会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科学论断。根据邓小平对国际国内形势的科学分析和判断，会议作出了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重大决策，即从长期以来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准备状态，转变到和平时期建设轨道上来。要求要充分利用大仗打不起来的这段和平时期，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前提下，抓紧时间，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以现代化为中心的根本建设，减少数量，提高质量，增强军队在现代条件下的作战能力。为了贯彻这一指导思想，军委扩大会议还做出了裁减军队员额100万的决定，通过了《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

军队建设指导思想进行战略性转变的决策，适应8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和平与发展的主题和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体现了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特点和规律，从总体上调整了平时与战时、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的关系，对于保障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推动军队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总体建设具有重要的深远的历史意义。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军队建设总要求和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的提出

1989年6月，中共第十三届四中全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同年11月，中共第十三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军委主席，从而完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向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交接。

1990年12月，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根据新时期人民解放军建设的实际需要，提出了“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军队建设的总要求，为人民解放军的全面建设、全面进步规定了方向，明确了标准。

随着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和苏联的解体，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各国都重新调整了军事战略，以及8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发展为标志的世界军事革命的出现，特别是1990年海湾战争表明，未来战争将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适应这种世界性军事形势的变化，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1993年初军委扩大会上，江泽民主席主持制定了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这个方针要求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加速人民解放军的质量建设，提高应急作战能力。为贯彻落实这一军事战略方针，中央军委在后来又提出了“科技强军”和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的战略思想，即“在军事斗争准备上，由应付一般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向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转变；在军队建设上，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以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的提出为标志，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迈向一个新的台阶。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91年7月1日。

见《解放军报》，1995年10月12日第1版和1997年1月14日第6版。

见《解放军报》，1997年1月21日第6版。

四、调整改革编制体制

粉碎“四人帮”以后，人民解放军重新贯彻 1975 年军委扩大会议精神，把“消肿”和调整编制体制作为军队整顿的重要任务，到 1985 年军委扩大会议召开时，“消肿”和编制体制改革调整，已经取得了重大成绩。贯彻 1985 年军委扩大会议精神，军队编制体制又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改革，到 1987 年底基本完成，并裁减了员额 100 万。裁减的重点是总部、大军区、军兵种和国防科工委机关及直属单位，其中总部机关平均精简员额近一半，同时，撤并了部分军区和院校；减少了各级副职，将机关和部队中 76 种由军官担任的职务改为士兵担任，使人民解放军的官兵比例趋于合理。尔后根据形势和任务的要求，军队编制体制又进行了一些小的调整，并继续裁减了一些员额，到 1990 年，全军员额已减少到 319.9 万人。与此同时，还削减淘汰了大量落后陈旧的装备，其中削减各种火炮近 1 万门，各型坦克 1100 余辆，各型飞机近 2500 架，各型舰艇 610 余艘。

经过调整改革，军队的编制体制逐步趋于合理，逐步适应了和平时期建设和现代化条件下作战的需要，人民解放军精兵合成程度和质量建设水平都有了明显提高。

中央军委、各总部、军兵种和大军区体制的调整改革

中央军委领导体制的改革：1982 年 9 月，中共中央决定，中共中央军委由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副秘书长组成，由秘书长、副秘书长组成军委常务会议，负责处理军委日常工作，精干了军委的组成。1993 年后，未再设秘书长、副秘书长，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由军委副主席和军委委员组成，由军委副主席主持。1982 年 12 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修改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立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据此，从 1983 年 6 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始，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家政治体制和军事体制的重大改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均简称为中央军委，其职能和成员都是同一的，两个机构融为一体，充分体现了以人民解放军为主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既是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武装力量，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的武装力量的一致性，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军队领导的一致性，这是中国军队领导体制所具有的特色。

1982 年 9 月以后，邓小平、江泽民先后任中央军委主席，担任军委副主席的先后有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杨尚昆、赵紫阳、刘华清、张震、张万年、迟浩田。

军委总部、兵种机关和大军区体制的改革调整。随着全党和军队工作重点的转移，及中央军委的统一规划和部署，总部机关、兵种机关和大军区体制编制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调整，主要的有：

（一）根据 1982 年 9 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决定，军委炮兵、装甲兵、

工程兵由兵种领导机关缩编为总参谋部的业务部，划归总参谋部建制领导，各大军区的炮兵、装甲兵、工程兵机关则相应改为军区司令部的业务部门，后来，又将这些业务部门做了相应合并：撤销基建工程兵，所属部队按系统对口集体转业到国务院有关部或地方部门；铁道兵与铁道部合并，撤销铁道兵番号，其部队集体转业移交铁道部。恢复总参谋部第四部，并增加了电子对抗部队的编制，以适应高技术条件下作战的需要。1987年5月，中央军委决定组建陆军航空兵，成立了总参谋部陆航局。从此，人民解放军一个新的兵种正式诞生。为了适应军事法规法制建设的需要，1977年总政治部增设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和军事检察院，新增的两院，是国家设在军队的审判机关和法律监督机关，它们既受总政治部的直接领导，也分别接受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领导。

(二) 根据1985年军委扩大会议通过的《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将全国11个大军区调整为7个大军区，即将福州军区与南京军区合并，武汉军区与广州军区合并，昆明军区与成都军区合并，乌鲁木齐军区与兰州军区合并，其他未变。调整后的7个军区为：北京军区、沈阳军区、兰州军区、济南军区、南京军区、广州军区、成都军区，并且还对军区领导机关的编制体制也作了重大调整，编制人数精简50%。

此外，为了加强对国防科学技术和国防工业生产的统一领导，1977年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中央军委科学技术装备委员会。

1982年，国务院、中央军委又决定将中央军委科学技术装备委员会与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合并，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同时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简称国防科工委），撤销原中央军委科学技术装备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及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

在军队精简整编过程中，中央军委还对军队院校的设置、训练任务的分工、各类干部的培训比例及学制进行厂调整，按归口训练的原则调整合并了某些分散设置的院校和相同专业。

1985年底，中央军委决定将1978年初重新成立的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合并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该校的成立，为军队中高级干部学习最新科学知识和军事理论，研究国防发展战略，运筹国防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场所。

陆军合成集团军的组成

进入80年代，为适应军队发展和未来反侵略战争的需要，并进一步完善陆军军编制体制，中央军委对陆军军的编制进行了三次较大的调整、改革。

1980年3月，中央军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集中讨论军队精简整编问题。会上，军委主席邓小平强调指出：军队要提高战斗力，提高工作效率，就必须“消肿”，减少冗员，把省下来的钱用于更新装备。根据这一精神，此次整编，在压缩编制员额同时，着重加大了特种兵的比例，以提高部队的防空、反坦克火力和机动能力。

1982年2月，中央军委成立了体制改革、精简整编领导小组，以加强对体制改革、精简整编工作的具体领导。同年7月，中央军委召开座谈会，确立了对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的四项原则：精兵、合成、平战结合、提高

效能，这次主要是精简陆军步兵，而陆军军编成内的各种特种兵比例则继续增大。在陆军军的编成内开始组建机械化步兵师，原属兵种建制的坦克师及大部分炮兵师也划归陆军军，同时，由各军代管军区下放的部分独立兵种部队，开始进行合成集团军编组试点。至此，陆军军的编制体制，虽几经调整，有了一定改善，但合成程度还是比较低，特种兵部（分）队数量少，火力、机动能力差，即使原则规定兵种部队归陆军军领导，但合成问题仍未从编制体制上予以解决。

为了更好地适应未来现代化战争的需要，1985年军委扩大会议明确提出了精兵合成、质量建军的方针，并决定对陆军军的组织编制再次进行重大调整。根据这次会议的决定，撤销了31个军级单位、4054个师团级单位，保留的陆军军统一整编为集团军，将装甲兵部队的全部，炮兵、高炮部队大部及部分野战工兵部队编入陆军集团军序列。

整编后的陆军集团军加大了特种兵的比重，构成了以装甲兵、步兵组成的地面突击力量，以炮兵、防空兵、陆军航空兵组成的火力支援力量，以侦察兵、通信兵、工程兵、防化学兵、气象和电子对抗专业部（分）队组成的作战保障力量，以运输、修理、输油管线、卫生、军需、器材等专业部（分）队组成的后勤保障力量。至此，陆军军中的特种兵数量第一次超过了步兵数量，从而成为陆军的主要作战力量。特种兵的大量充实及各兵种的有机结合，使集团军的火力、突击力、机动力、防护力和快速反应能力均有较大提高，整体作战能力空前增强，并使其可在上级编成内或独立遂行战役作战任务。集团军的组建，标志着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预备役部队的建立及人民武装部隶属关系的调整

预备役部队的建立。1955年1月，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兵役分现役和预备役。民兵与预备役相结合的制度，是中国后备力量建设的一大特色。但长期以来由于多种原因，预备役制度被中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预备役制度得到了恢复，并有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1982年3月，沈阳军区作为试点，率先组建了一个预备役步兵师。

1984年5月，在对首部兵役法修改的基础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兵役法》规定，中国实行义务兵役制为主体的义务兵与志愿兵相结合、民兵与预备役相结合的兵役制度。

为了提高战时快速动员能力，中央军委根据兵役法有关规定，在全国有计划、有步骤地组建预备役部队。1985年7月，中央军委在《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中，提出了要“有计划地组建预备役部队”的任务，并确定“当前主要是搞好试点，总结经验，巩固提高，控制发展”。据此，经过试点，总结经验，1986年8月三总部发出通知，明确规定预备役部队列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制序列，其师、团级单位授予番号、军旗。预备役师、团均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委员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

中国的预备役部队是按照现役部队的编制，以少数现役军人为骨干，以复退军人为主要成分，由预备役军官和士兵组成。它既区别于现役部队，又不同于民兵组织。平时，作为动员组织，是为建立和完善快速动员体制而采

取的一项战略性措施；战时，根据需要，成建制地转为现役部队，遂行作战任务。

经过 10 多年的建设和磨而，中国人民解放军预备役部队已发展成为一支包括步兵、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通信兵、防化兵等兵种师、团和空军、海军部分专业技术兵种在内的国防新旅，担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保卫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并已初步显示出其很强的生命力。

1987 年 5 月，黑龙江某预备役师，在大兴安岭扑人救灾中，仅 23 个小时就集结完毕，奔赴灾区，奋勇灭火，受到国务院的赞扬。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广西某预备役师炮兵连参战时，以其过硬的军事技能和战斗作风，受到了人们的称赞。

1989 年春夏之交，在制止动乱、平息北京政治风波中，辽宁某预备役师接到上级命令后，仅 3 小时就集中 5000 余人，为赴京执行戒严任务的部队开道护路。

1991 年 2 月，总参谋部颁发《中国人民解放军预备役部队训练大纲》，标志着预备役部队的教育训练在正规化的道路上迈出了新的步伐。

1995 年 5 月，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备役军官法》，更进一步完善了中国武装力量动员体制和军队干部制度。

1996 年 4 月，中央军委又决定为预备役军官评授军衔。1997 年 1 月，预备役军官正式佩戴军衔。

预备役部队，是干战结合的一种形式。组建预备役部队，较好地解决了战时军队迅速动员、扩编，平时少养兵、战时多出兵的重大问题，是适合中国国情军情、加强国防建设的一个有效途径。

人武部隶属关系的调整。人民武装部（简称“人武部”）作为民兵工作、兵役工作的直接组织和指挥机构，是中国在县（市、区）设立的军事工作部门。各级人武部在同级地方党委、政府和上级军事部门的双重领导下，负责本行政区的军事工作，主要是民兵、兵役和动员工作。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的县和市辖区均建立了人武部，属军队建制，编配现役军人。实行义务兵役制后，人武部曾一度改称“兵役局”，工作重心转向兵役工作。为了贯彻落实民兵与预备役合二为一的方针，1958 年撤销兵役局，恢复人武部。这种体制一直延续到 80 年代中期。1986 年 3 月，根据《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的决定，县（市、区）人武部除部分边疆地区仍为军队建制外，其余均由军队建制改为地方建制，任务不变，名称不变，实行军队和地方的双重领导。同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又先后发出通知，对人武部改为地方建制后的机构设置、领导关系、工作职责、干部选配、工资福利、经费来源以及移交的方法和步骤等，都作了具体的规定。

县（市、区）人武部改归地方建制以后，各级地方党委、政府对人武部建设都很重视、关心，广大人武干部为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也出现了工作关系不顺等问题。1995 年下半年后，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全国县（市、区）人武部又重新列入人民解放军的建制序列。

武装警察部队的组建

随着兵役制武警、边防、消防民警队伍的发展壮大，加强对这支人数多、任务重、高度分散、遍布全国、专业性强的武装警察部队的管理和建设，成

为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1982年，根据《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党组〈关于人民武装警察管理体制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精神，以人民解放军移交给公安部门的内卫部队及公安部原有的边防、消防民警为基础，整编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1983年4月6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总部在北京成立。不久，各省、市、自治区公安厅（局）、各地（市、州、盟）公安处（局）、各具（市、旗）公安局的武警总队、支队、大队也相继成立。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同中国人民解放军一样，均是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之下的国家武装力量。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职能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维护社会治安，保卫国家安全和四化建设，保卫党政领导机关、重要目标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平时主要配合公安部门执行任务，战时也有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执行作战的任务。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实行义务兵和志愿兵相结合的制度，执行解放军的条令、条例。武警部队的编制和经费由公安部武警总部统一管理。

1988年12月17日，国务院总理李鹏、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发布《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实行警官警衔制度的具体办法》。比照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的有关规定，结合武警部队的实际情况制定了警衔条例，警官和专业技术警官在警衔前分别冠以“武警”。授衔对象包括警官和士兵，同时还实行文职干部制度。

武警部队自1982年组建以来，经过广大官兵的不懈努力，已发展成为一支政治可靠、训练有素、装备良好、出色履行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威武之师。仅1995年各武警部队即在确保守护固定目标万无一失的同时，参与处理各类突发事件100多起，完成重大临时勤务2万余次。

武警部队的组建，使国家武装力量的战略布局和使用更加合理，使国家武装力量的整体功能得到充分发挥。

驻香港部队的组建

香港是中国的领土，包括香港岛、九龙、新界，总面积1092平方公里。在1840年至1860年期间，英国和英法联军先后发动两次鸦片战争，逼迫腐朽的清朝政府签订两个不平等条约，先后将香港岛和九尤半岛尖端割让英国政府管辖。1898年，英国当局又逼迫中国清朝政府签订一个下平等条约，强行长期租借九龙半岛大片领土及附近200余个岛屿（后统称为“新界”）。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耻辱。中国人民一直不承认上述三个不平等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主张在适当时机通过谈判解决这一问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解决台湾和香港问题的构想。解决香港问题时机已经成熟。1982年9月至1984年9月，中英两国政府经过两年的谈判，终于就解决香港问题达成了协议，并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中国政府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于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国政府声明：“联合王国政府于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将香港交还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政府还宣布，收回香港后，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除外交和国防事务由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

1990年4月，由七届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中央人民政府派驻军队负责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防务。同年10月，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批准了《关于组建驻港部队的报告》，并批示：关键是进驻的部队政治上要特别过硬，事先要做过硬的思想工作。

据此，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93年初，开始组建驻香港部队（也称香港驻军）。江泽民主席对驻香港部队的组建十分关心，并作出过一系列的重要指示，要求：驻香港部队建设必须高标准，严要求，在政治思想、军事训练、作风纪律、管理教育等方面，都应该是一流的，一定要充分显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在视察驻香港部队时，江主席还欣然题词：保持人民军队本色、维护香港繁荣稳定。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张震、张万年、迟浩田等领导都先后视察了驻香港部队，解决组建中的困难和问题。同时，军委、总部也对组建工作提出了严格而又具体的要求，包括对官兵的文化程度、身体素质、语言、修养等作了严格规定。

驻香港部队是一支具有光荣传统的部队，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精锐之师编成，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首任司令员刘镇武、政治委员熊自仁。驻香港部队的职责是：防备和抵抗侵略，保卫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安全；担负防卫勤务；管理军事设施；承办有关的涉外军事事宜等，不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地方事务，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必要时，可向中央人民政府请求驻军协助维持社会治安和救助灾害，驻军人员除遵守全国性的法律外，还遵守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

1996年1月28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公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的使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负责香港防务的规定，为保卫祖国的统一和香港的繁荣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组建完成。这既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也是人民解放军发展史上的大事。

1996年12月30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驻军法》为驻香港部队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各项活动规定了法律准则。

1997年7月1日零时，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进驻香港。这是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结束英国在香港殖民统治的重要标志。

五、加强法规制度建设

50年代，随着人民解放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全面展开，军事法规制度建设取得了重要成就，制定了一系列体现中国人民解放军特色的军事法规制度，对人民解放军全面建设的加强起了重要作用。10年动乱期间，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一方面利用军事法规还不完善，对军队建设进行严重的干扰破坏，另一方面对已有的军事法规肆意践踏，使军队建设遭受严重挫折和损失。粉碎“四人帮”后，随着人民解放军建设总方针总任务的重新确立和国家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发展，作为整个国家立法重要组成部分、关系着军队建设和国家安危的军事立法，也逐步得到加强，并呈现出新的局面。

第一，确立了军事统帅机构在国家机构中的法律地位。

1982年12月，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部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是国家军事机关，领导全国武装力量，实行主席负责制，军委主席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负责。

第二，建立了军事法制机构。

1988年6月，中央军委成立了法制局，负责编制国防立法和军事立法规划、计划；审查各军事部门向中央军委呈报的法规草案；协助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务院法制局做好国防立法和军事立法方面的工作，组织起草重要军事法规；检查监督军事法规的执行情况等。各总部、各军兵种编制法制秘书，负责法制行政工作。这些，标志着军事法规建设迈出了重要的步伐，同时也给军事法规制度建设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

第三，军事法规制度的修改和制定。为适应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的历史条件下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的需要，以及随着军队技术装备的不断发展更新，修改和制定了一些重要法规。（一）对原有的军事法规制度进行修改，重新颁布。如198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对中国的兵役制度进行了改革，不但对现役制度作了规定，而且对民兵和预备役制度也作了规定。这期间还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士兵服役条例》、《内务条令》、《纪律条令》、《队列条令》等，多次进行修改，重新颁布施行。（二）制定了一些新的军事法规制度。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驻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戒严法》等等，还制定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干部暂行条例》，等等。“八五”期间，军事法规建设呈现出与国家法制建设和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同步发展的格局，军事法的迅速发展已成为“八五”期间国家法制建设的一大特点，形成了较为健全的国防和军事法律、军事法规、军事行政法规、军事规章和军事行政规章体系。据统计，在人民解放军制定的现行700余件法律文件中，其中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就达600余件，内容涉及到国防现代化建设的方方面面，包括组织、人事、装备、战备、教育、训练、政治工作、行政管理、后勤保障、军事利益保障、外事、军事司法等类别；这些法规，既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宪法制定的军事法律，也有国务院、中央军委根据宪法、军事法律制定的军事（行政）法规，又有国务院各部和军委

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联合或单独制定和颁发的军事（行政）规章。

这一系列军事法规制度的颁布和实施，对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调整军内外关系，对人民解放军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全面建设，巩固和提高战斗力都具有重要的意

六、教育训练和军事科研的新局面

教育训练是人民解放军和平时期的中心工作，这一点早在 50 年代前期即以明确。到 60 年代中期，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片面鼓吹“突出政治”，“政治可以冲击其他”，军队的教育训练受到严重排挤和冲击。

1975 年，邓小平强调：“要把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他还针对军队的实际情况指出：“如果不注意军队训练，至少在战争初期要相当倒霉就是了。”1977 年 8 月 23 日，邓小平在军委座谈会上专门作了《军队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的重要讲话。他指出：“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要把军队的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我们的军队过去是在长期的战争环境中锻炼成长的，那时提升干部主要靠战场上考验。现在不打仗，你根据什么来考验干部，用什么来提高干部，提高军队的素质，提高军队的战斗力？还下是要从教育训练着手？要把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的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这个方针具体化。”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后，邓小平又重申要把军队的教育训练具体化、制度化，要抓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部队本身要提倡勤学苦练；另一方面要通过办学校来解决干部问题。

1977 年 9 月，为进一步加强教育训练的指导，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中央军委成立了以来时轮为主任的全军教育训练委员会，部队教育训练出现了新的面貌。1978 年 1 月，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加强部队教育训练的决定》、《关于办好军队院校的决定》。6 月，总参谋部、总政治部重新颁发《中国人民解放军连队基础训练方法二十条》。全军各部队开展“一专多能”和“三手”（神枪手、神炮手、技术能手）活动。海军主要是恢复和完善训练法规，加强对舰、艇长和专业军官的培训。空军航空兵部队主要演练高难度项目。许多部队中、高级军政主要领导干部深入练兵场，进行传帮带，指导训练，教育训练重新成为部队的中心工作。军队实行战略性转变以来，人民解放军各部队深入进行了以训练内容为中心的全面改革，特别是海湾战争后，为打好打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准备，全军教育训练出现了新的局面。

部队训练的加强和改革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训练得到全面恢复和加强，并对训练内容、方法和手段进行了全面改革，出现了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空前的训练热潮。

部队训练的全面恢复和训练的指导思想。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从 1978 年到 80 年代初，部队训练得到全面恢复，全训部队逐年增加，陆军全训部队 1978 年占 42.5%，到 1981 年占 62%，基本上改变了部队多年失训的情况。空军拟制了创造甲类团的三年规划，增加了飞行员的飞行训练时间，对“文革”中毕业的飞行员进行飞行理论补课。飞行员技术素质大为提高，飞行事故大为减少，1978 年和 1980 年，组织两次射击、轰炸考核比赛，成绩都超过 1964 年大比武的纪录，1980 年甲类团数量超过了三年规划的 85.7%。海

《邓小平文选》，第 2 版，第 2 卷，21、60 页。

《邓小平文选》，第 2 版，第 2 卷，21、60 页。

参见《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下），第 1 版，239 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军进行了舰艇远航为主的全面训练，远航次数明显增多，远航能力明显增强。第二炮兵和其他兵种也都展开了全面训练。

随着部队训练的全面恢复，中央军委不断提出新的要求，以指导全军训练的深化和改革。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邓小平等军委领导针对未来战争的特点，多次强调必须克服过去“单打一”的思想，要求部队各军兵种密切协同，扬长避短，发挥整体威力。1983年10月，邓小平又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同年11月，中央军委提出以合同战役训练为中心，着力提高合同作战能力、快速反应能力、电子对抗能力、后勤保障能力和野战生存能力的重要指导思想。

1988年12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强调，全军要认真贯彻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必须把提高战斗力作为军队改革和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检验军队各项工作的根本标准；要以战斗力标准来统筹各项工作，理顺内部关系，解决各种矛盾。1993年，军委又强调加强打赢现代条件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战法研究和作战训练。这些为这一时期的军事训练明确了指导思想和规定了标准要求。

训练的深化和改革。这一时期部队训练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对训练的内容、方法和手段进行了全面的深化改革。根据军委关于军事训练的总体要求，1983年冬三总部拟制了《关于全军教育训练改革的若干问题》的文件，1984年1月经中央军委批准后，下发全军贯彻执行。

1984年至1986年，围绕提高部队整体作战能力这个中心，先后对单兵训练、分队训练和合同战术训练三个层次的训练内容作了改革。单兵训练突出了战术训练和应用训练，以战术为经、技术为纬进行综合应用训练。分队训练区分必修和选训课题，以本级基本攻防战术为轴线，突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训练，协调各兵种专业的训练时间和内容。合同战术训练，调整了干部在职训练的重点，突出军兵种协同作战的组织指挥训练。各部队通过改革军事训练，实现了从重点抓单兵训练转到重点抓干部训练，从重点打步兵训练转到重点打坦克、打飞机、打空降训练，从重点抓单一兵种训练转到重点抓合同训练的“三个转变”。这一阶段干部训练、多兵种或多军兵种合同战役战术训练、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训练比重明显加大。

1996年春，首次举行了现代高技术背景下的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和第二炮兵部队的联合战役演习。训练的难度、深度都更加接近现代高技术条件下实战的要求。

1993年以来，全军贯彻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突出打赢现代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战法研究和训练，重点进行高技术条件下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机动作战、海上封锁作战、岛礁攻防作战、登陆作战、空中进攻作战、要地防空作战、高寒山地作战、电子战和后方保护等战法训练。到1995年底取得了阶段性的训练成果，并形成了新一代训练大纲。全军严格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新一代军事训练大纲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条令》，以及按照江泽民主席提出的“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五句话的军队建设总要求，严格施训。各大军区、军兵种分别在高原、高寒、热带丛林、沿海滩头等不同地区，陆地、海洋、空中等不同领域，实施常规、核化和高技术条件下的各类演习，检验和促进部队训练改革，部队建立起了依法治训，按纲施训的正规训练秩序，提高了部队的整体作战能力。

在训练方法上，重视对抗训练、多课题的综合性训练和检验性演习，缩

小了训练和实战的差距。

1984年总参在军兵种部队驻地比较集中的一些地区，建立了合同战术训练协作区，改变了各军兵种部队平时训练不见面，只在年底一起搞合练的状况。1985年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后，各大战略区建立了合同战役战术训练基地。在基地内，诸兵种部队都可组织协同训练、组织演习和对部队进行考核。这种基地已逐步发展为合成集团军的综合训练基地或训练中心。

在训练手段上也实现了重大改革，其主要标志就是模拟训练和模拟器材的迅速发展。从1981年至1996年，全军先后举行三次训练模拟器材成果展览。

1996年的展览表明，人民解放军的训练模拟器材，已从80年代以前基本上以技术上的物理模拟、机电模拟为主，发展到了应用计算机仿真模拟、分布式交互网络和多媒体等新的模拟技术，可以在计算机上展示作战区域各军兵种联合的作战态势和局部冲突，以及部队调动，武器射击，后勤保障等战场活动。训练模拟器材已形成了合同战役战术指挥、专业协同训练、装备技术操作训练、战场环境仿真、模拟弹药、计算机模拟软件等系列，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为部队战术技术训练、合同战役训练提供了简便、经济、有效的手段。

此外，在训练保障上，建立健全了教育训练规章制度，使教育训练工作按照现代化、正规化的要求协调发展。

阅兵和重大军事演习。在部队训练中，阅兵是一项重要内容。为了促进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同时也为了向国家和人民汇报武装力量建设的成就，鼓舞全国人民的爱国热忱和建设社会主义的豪情壮志，1981年3月18日，总参谋部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定恢复军队内部的阅兵。各部队加强了阅兵活动。1984年10月1日，人民解放军在北京举行了建国35周年国庆阅兵。受阅部队的雄姿和阵容，展示了人民武装力量的建设水平和精神风貌。

全军各部队积极贯彻军委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从难、从严、从未来战争需要出发，加强部队的军事演习。军事演习的内容和规模有很大的发展，已由以往的单一课题、单级演习发展到多级、多军兵种、多课题的演习，演习次数逐步增多，演习质量逐步提高。1981年至1985年5年间，各部队加强了诸军兵种联合作战实兵演习，组织各种综合性演练，使领导机关和部队，既练进攻和防御，又练合围和反合围、空降和反空降，以及突击和反突击、登陆和抗登陆。许多集团军为适应编制体制的调整，按照新编制、新装备组织部队实兵演习。这些战役演习中，比较重要的有：1979年10月，沈阳军区组织的在核条件下陆军师野战阵地防御研究性演习；1981年9月，北京军区组织的方面军防御战役实兵演习；1983年8月，第二炮兵组织的兵种、基地、支队三级首长机关带部分实兵的核反击作战战役演习；

1985年10月，总参谋部在北京怀柔地区组织的激光电子模拟对抗试验性演习。

北京战区在华北地区组织的方面军实兵战役演习，是在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领导下，由北京军区导演和组织指挥的。重点演练了模拟“蓝军”坦克师进攻，空降、反空降，坚固阵地防御和集团军首长机关带部分实兵实施战役反突击四个课目。参加演习的有陆军1个军部、8个师零29个团，空军2

个航空兵大队，以及后勤分部、医院等，共 11 万余人，出动坦克、装甲车 1300 多辆，火炮 1500 多门，飞机 285 架，汽车 1 万余辆。这次演习，较好地体现了现代战争的特点，摸索了现代条件下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方法，提高了部队军政素质和作战能力。

到了 90 年代，随着对海湾战争后高技术战争研究的开展，人民解放军的战役演习又有了新的发展，主要特点：一是战役指挥员和领率机关的战略意识进一步增强；二是加强了打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理论的探讨；三是以集团军力重点的战役演习层次稳步提高；四是从难、从严、从实战需要出发，有针对性地进行检验性战役演习。

1995 年以来，为贯彻中央军委新时期的军事战略方针，依据国际战略形势和中国周边战略环境，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完成台湾回归和祖国统一大业，人民解放军在现有训练条件的基础上，针对高技术条件下可能出现的情况，几个大战略区先后进行了实兵实弹战役演习。比较重要的有沈阳战区、兰州战区、海军、空军、第二炮兵和南京战区的战役演习。

1995 年 7 月，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向东海预定海域发射 6 枚地地导弹，全部准确地命中目标。这次演习成功，表明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军事素质和防卫能力有了新的提高。同年 10 月，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等军委领导视察海军部队，并观看海军战役演习。这次演习，电子战贯穿全过程。演习了舰机协同、编队协同、舰空对抗、潜舰对抗、登陆作战等课目。显示了人民海军武器装备质量的新发展，海上作战能力的新提高。接着，11 月下旬，南京战区加强近似实战条件下的训练，在闽甬沿海地区成功地举行了一次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演习。1996 年 3 月，人民解放军连续举行了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几个作战演习。3 月 8 日至 15 日，第二炮兵部队完成了地地导弹向东海和南海海域的发射训练任务，4 发导弹全部命中目标。3 月中旬，空军和海军部队先后在东海和南海，举行了诸兵种联合作战实兵实弹演习，战机、舰艇、导弹、电子战装备在演习中密切协同，显示了强大的空中、海上的打击威力。3 月 18 日至 25 日，在台湾海峡举行了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演习，包括三军联合渡海登岛作战和山地进攻作战演习。这次演习，从夺取制主权、制海权到快速装载航渡，从装甲集群抢滩登岛到空降、机降部队垂直登陆，从多层次火力突击到多路强击突破，从穿插分割到纵深越点攻击，均显示了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优良的军政素质和高昂的战斗意志。这些演习，展示了人民解放军在高技术条件下防卫作战能力新的提高。表明人民解放军有决心有能力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有决心有能力维护祖国的统一。

入夏以后，各战区演习突出联合作战能力。8 月下旬，北京军区组织了一次联合作战战役演习。演习在近似实战的空、地、电磁多维战场上进行，地面攻防作战、空中作战、导弹突击作战和电磁作战等多种作战样式交替出现，展示了一个地面空中紧密配合，兵力火力协调一致，软、硬打击有机结合的主体作战场面。9 月中旬，空军汇集了当前主战的先进机种、机型和各“拳头部队”的精兵强将，首次在大漠戈壁深处举行了多机（兵）种未知条件下攻防对抗演练。这次演练，是空军继 3 月东南沿海海空军实弹演习之后，独立组织的一次重要演练。这些演习深化了人民解放军的训法改革，为训练走向实战化提供了重要经验。

院校教育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军队院校教育逐步向现代化、正规化方向发展。1977年8月23日，邓小平在军委座谈会上提出：“训练干部、选拔干部、推荐干部。用形象化的语言说，就是各级学校本身要起到集体政治部的作用，或者说起到集体干部部的作用。”邓小平对军队院校的地位作用和根本任务作了科学的概括，从而为军队院校教育指明了方向。同年11月7日，中央军委批转了教育训练委员会《关于调整和增建军队院校的报告》，在1973年全军84所院校的基础上，再增建28所院校，以军政大学的军事系、政治系、后勤系为基础，分别组建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和后勤学院，1985年12月合并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以北京、南京军区军政干校为基础，组建石家庄、南京两所高级步兵学校（后分别改为陆军参谋学院和陆军指挥学院）；除北京、南京两军区另行组建步兵学校外，其他各军区以原各自的军政干校为基础，组建军区步兵学校（后改为陆军学院），各军兵种军政干校改为军兵种学院，总后勤部军政干校改为后勤学校。到70年代末，军队院校已发展到116所。其中指挥院校40所、政治院校5所、技术院校54所、飞行院校17所。为使院校适应新形势的要求，总参、总政、总后于1980年10月和1983年2月召开两次全军院校会议，着重研究了院校训练任务、体制编制、提高教学质量等问题。进一步明确军队院校建设要为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正规化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的战略目标服务。

1985年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后，进行了精简整编，在部队训练改革的同时，调整了各院校训练任务的分工、各类军官培训的比例和学制。

为贯彻1985年军委扩大会议精神和邓小平提出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指导思想，1986年3月，召开了全军第13次院校会议。会后，中央军委下发了《关于军队院校改革的决定》，同时，还批转了三总部关于《全军院校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对全军院校的体制、规模、培训层次、教学比例、院校等级、名称等都作了较大调整，撤销、合并和改建了部分院校，进一步完善了指挥院校初、中、高三级培训体制和中等、高等两类专业技术院校系科结构。中央军委规定，士兵提升为干部和各级干部的提升，都要经过相应院校的培训。为保留部队的专业骨干，在部分指挥院校内设置了士官大队，海、空军各增设了一所士官学校。人民解放军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各军兵种指挥院校和技术院校相配套的从中专生到博士研究生教育5个培训层次的院校体系。1990年10月，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9次会议批准，中国首次设立了军事学硕士学位授权单位及其学科、专业授权点。1993年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等又增加了军事学博士授权点。军事学培养研究生和授予硕士、博士学位工作的开展，标志着中国军事学学科的发展和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标志着军事学教学和科研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军队院校在经过训练体制、训练内容、训练方法调整改革的基础上，抓紧院校教员的选调和培养。到90年代初期，军校教员具有大专以上学历达93%，其中大学本科学历的占52%，博士、硕士学历的占9.5%，并拥有一批包括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博士生导师在内的高级教育人材，形成了一支素质较高、结构合理的教学科研队伍。院校以新的面貌，培养各级优秀军官，为部队建设输送合格人才。作战部队的团以上领导班子成员中基本上都受过

本级训练，全军军官军政素质逐步提高。军队院校在人民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发挥了“集体干部部”的作用。

军事科学研究的新局面

“文化大革命”期间，军事理论研究工作受到严重破坏。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军事科学理论研究进入了新的繁荣发展时期。

（一）建立健全军事科研机构。1978年12月2日，经中央军委批准，各大军区、军兵种和国防科委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一级机关及军级以上政治院校和军事、后勤指挥院校各编设1个研究机构，连同原有的军事科学院，至80年代末，全军共有军事科学研究机构90个，编制研究人员1730人。使军事科学研究的繁荣发展有了组织保证。此外，为加强中外军事学术交流，经中央军委或总政治部批准，还建立了一些军事学术团体，如中国军事科学学会、中国毛泽东军事思想学会、中国近代军事史学会、孙子兵法研究会、战略问题研究会、中国军事法学会、军事历史研究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运筹学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统筹学会、中国军事未来学研究会、军事人工智能学会、国防经济研究会等。这些学会的活动，推动和促进了军事科学研究的深入。

（二）军事科学各学科领域研究全面展开。一些学科虽然在50、60年代即已开始研究，但主要是学术准备，真正展开研究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如战略学、战役学、军事历史等。此外，这期间又新开辟了许多学科领域，如军制学、军事指挥学、武器装备学、军队管理学、军事运筹学、国防经济学、军事百科全书等。这一时期，军事科学理论研究的重点是关于国防建设、军队建设和立足现有装备打赢现代条件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战法等重大现实问题。在作战问题研究上，实现了四个转变，即从主要研究一般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作战，转到主要研究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作战；从重点研究战争初期内陆地区坚守防御为主的作战，转到重点研究沿海、沿边地区机动进攻为主的作战；从主要研究预设战场、长期准备的作战，转到主要研究快速反应的作战；从主要研究以陆战为主的合同作战，转到主要研究海空作战比重增大的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七五”计划以来，军事科学研究被纳入人民解放军的全面建设规划，并且有许多军事科研课题被列为国家“七五”、“八五”、“九五”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中的重点科研项目。

（三）出版了大批军事科研成果。据不完全统计，到90年代中期，出版的军事论著、编著（汇编）、译著、军事辞书、法规、外国军事著作以及各种咨询报告、军用数学模型与计算机软件等成果达2000余种。其中在军内外较有影响的著作有：《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5卷本）、《列宁军事文集》、《斯大林军事文集》、《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毛泽东军事文集》（6卷本）、《邓小平论国防和军队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法规汇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规章汇编》、《军事科学概论》、《战略学》、《战略学教程》、《国家军制学》、《战役学纲要》、《空军战役学》、《海军战役学》、《第二炮兵战役学》、《战区战役初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战役战法研究》、《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战术问题研究》、《中国人民解放军司令部条例》、《战术学》、《军事哲学》、《军

事未来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3卷本）、《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中国军事通史》（17卷本）、《中国近代战争史》（3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史》（5卷本）、《中国抗日战争史》（3卷本）、《当代中国》丛书《国防军事卷》（10卷本）、元帅传记和军事文选以及外国军事理论著作和对外国军事研究的著作等。同时，在原有的综合性《军事学术》刊物的基础上，又创办了《中国军事科学》、《国防》、《军事历史》、《中国空军》、《海军学术交流》等100多种军事理论刊物。此外，经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批准，还召开了多次全军性的军事学术专题研讨会。由总参谋部主持，有计划地为在京军队高级干部举办国防现代化发展战略和现代高科技系列学术讲座。

这一时期军事科学研究的繁荣和发展，有力地促进和推动了人民解放军的全面建设。

七、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建设

思想政治建设，是人民解放军的根本建设，既是人民解放军全面建设的根本保证，也是人民解放军全面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下，人民解放军始终把加强思想政治建设，保证“政治合格”，“摆在全军各项建设的首位”，保持和发扬了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

新的形势对人民解放军思想政治建设提出的要求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际国内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国际上，由于东欧局势发生巨大变化和苏联的解体，一方面，世界战略格局多极化趋势加速发展，国际和平环境可望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带来巨大冲击，同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存在，西方敌对势力一刻也没有放弃“西化”和“分化”中国的图谋，更不愿看到一个社会主义中国的强大。因此，他们对中国在政治上压，在经济上卡，在意识形态上进行渗透，大肆宣扬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和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等政治主张。在国内，一度也出现了一股主张“全盘西化”的错误思潮，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但由于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侵蚀和影响，以及深化改革中各种利益关系的调整，使一些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发生扭曲，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观念有所滋长蔓延。这些，不可避免地给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带来不利影响。

此外，随着历史的发展，部队领导成员不断更替，一大批经过革命战争锻炼和考验的干部已逐渐退出领导岗位，一大批有知识、有文化的年轻干部担任领导职务，为军队建设增添了生机和活力，但他们对党和军队奋斗的历史，对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了解体会不深。

这些情况，都要求人民解放军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发扬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保证永远“政治合格”。

针对这些形势的变化，早在1978年，邓小平就强调“研究和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的问题。”1979年初，又强调“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1981年9月，明确提出“一定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加强政治思想建设，努力使部队成为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模范。”1987年1月，中央军委专门作出了《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政治工作的地位和指导思想，对新时期政治工作提出了要求。江泽民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后，也反复强调，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必须把它摆在全军各项建设的首位。

《邓小平文选》，第2版，第2卷，113、164、395页。

《邓小平文选》，第2版，第2卷，113、164、395页。

《邓小平文选》，第2版，第2卷，113、164、395页。

新时期军队思想政治建设正确处理了以下几个关系：一是在加强部队各项建设与加强思想政治建设的关系上，强调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二是在军队思想政治建设与全国精神文明建设的不关系上，强调军队的精神文明建设要走在社会前列，军队要办成培养人锻炼人的大学校、大熔炉，为国家、为社会同时也为军队培养大批高素质人才；三是在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上，强调在现实生活中结合新的实践，把历史上的好传统、好作风发扬光大，保持老红军本色。

保持政治上的坚定性和思想道德上的纯洁性

保持政治上的坚定性和思想道德上的纯洁性，是人民解放军思想政治建设的核心内容。1989年11月12日，邓小平就军队的性质说过：“我们的军队始终要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忠于社会主义”，“这个性质是，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军队要绝对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坚决维护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权威，自觉服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挥。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建设有多方面的要求，但第一位的是不断增强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自觉性，做到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同党中央同心同德，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无论情况怎样变化，都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以保证部队高度集中统一，保证政令军令的畅通。

思想道德上的纯洁性，最重要的是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1980年底，邓小平就针对社会上出现的思想道德观念混乱的现象，指出：“要教育全党同志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同时倡导“发扬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的五种革命精神。人民解放军以此在部队中开展教育，总政治部并结合军队特点，提出了“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讲军容、讲礼貌、讲纪律，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的“四有、三讲、两不怕”的口号，在全军青年中广泛倡导（“四有”后来改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

1986年，针对部队中出现的当兵吃亏的思想，在全军展开了如何看待军人“得与失”的大讨论。

1987年中央军委《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中，把“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培养高尚的道德”作为新时期部队思想教育的重要内容写在了决定里，并大力提倡大公无私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江泽民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以后，反复提倡用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提出的做“五种人”教育部队，即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在1994年底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江泽民主席提出，要在部队中普遍深入地开展爱国奉献教育、革命

《邓小平文选》，第1版，第3卷，334页。

《邓小平文选》，第2版，第2卷，367~368页。

人生观教育、尊干爱兵教育和艰苦奋斗教育（“四个教育”）。结合这些教育，又在全军普遍开展了学习英模活动，重新发表了雷锋和“好人连”事迹，并宣扬了学苏宁、徐洪刚、孔繁森、李国安等一批新的英雄模范典型事迹。

1996年7月30日，经中央军委批准，总政治部发出通知，要求在全军统一悬挂张贴党的三代领导核心关于军队建设的题词和张思德、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雷锋、苏宁6位英模画像，引导官兵对照英模和先进典型的事迹，查找差距，从而明确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当军人、如何做事、如何做官，激发官兵献身国防事业的革命精神。同时，军队广大新闻、理论、文学、艺术工作者，遵照江泽民关于“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指示，利用各种舆论阵地和工具弘扬正气，弘扬主旋律，教育和鼓舞广大官兵。通过这些教育，促进了人民解放军在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思想道德建设，保持了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

加强部队的理想信念教育

人民解放军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是保持人民军队本质和宗旨的必然要求，也是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和优良传统。为达此目的，必须对部队加强理想信念教育，进行强有力的政治灌输。邓小平指出：“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

这一时期，人民解放军的理想信念教育，最核心的就是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80年代中后期，在西方敌对势力的支持下，国内一些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严重的人，从根本上否定中华民族的历史，散布“全盘西化”的主张，煽动一些学生闹事，并发展到1989年出现北京地区的动乱。他们的目的是企图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针对这些情况，邓小平反复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人民解放军在全军中开展了这一专题教育，学习邓小平的有关论述，学习“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学习中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并结合学习中国革命史，使广大官兵从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认清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也只有共产党才能发展中国，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的道理，从而更加坚定了对党和社会主义的信念。

1993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同时再版了第一、第二卷，人民解放军联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生的巨大变化，普遍深入开展学习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共第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十四届六中全会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央军委结合军队的情况，作出了贯彻这些精神的相应决定或意见，在全军开展教育。这些都更坚定了人民解放军对党和社会主义的信念，从而增加了维护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权威的自觉性。

《邓小平文选》，第1版，第3卷，110页。

《邓小平文选》，第1版，第3卷，303页。

军民共建精神文明

开展拥政爱民活动，密切军政军民关系，是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也是人民解放军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一活动发展为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活动。1979年9月29日，叶剑英在国庆30周年大会上指出，我国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此后，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也多次强调精神文明建设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1981年3月，中央书记处会议对军队提出了要求：在大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活动中，军队要起带头作用和推动作用。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召开，会议明确提出了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并要求人民解放军不仅成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钢铁长城，而且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力量。人民解放军在支援国家经济建设的同时，广泛深入地开展了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活动。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军队和地方共同创造的一项群众性活动，是人民解放军参加全国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形式。

1981年6月，驻山东省文登县某师与驻地党、政机关首先开展了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活动的试点。9月，北京军区和空军参加华北地区军事演习的部队，主动和保定地区群众开展了军民共建文明村活动，把部队开展“四有、三讲、两不怕”活动和地方的“五讲、四美”（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活动相结合，制订了爱民公约、文明守则等，加强了军民团结。对此，总政治部召开了全军拥政爱民会议，及时推广了他们的经验，要求全军各部队积极行动起来，开展以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主要内容的群众工作。这一活动迅速在全国和全军全面展开，形成由点到面、由农村到城市、由内地到边疆的诸多军民共建点，只要有驻军的地区，都开展了军民共建精神文明的活动，涌现出一批军民共建文明街、文明学校、文明商店、文明工厂、文明车站、文明医院、文明交通线等精神文明建设先进集体。在军民共建活动的影响下，各地亦创造了工农共建、警民共建、厂街共建、于群共建、民兵带头建设精神文明等多种形式的共建活动，有力地促进了全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项工作，一直受到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1983年“八一”前夕，邓小平、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为“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展览”题了词。

邓小平和江泽民对人民解放军的精神文明建设作过许多指示，要求人民解放军在精神文明建设中走在全社会的前列。

1996年中央军委为贯彻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精神作出的关于加强军队精神文明建设的《意见》中要求：军队参加地方精神文明建设，要以军民共建为基本形式，以思想道德建设和文化建设为主要内容，开展多种多样的活动。人民解放军积极行动，在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活动中作出了重要贡献。据统计，至1996年底，全军共有4.7万个军民共建点，其中60%被评力县级以上精神文明单位。全军依托军民共建点建立思想政治教育基地

8000 余个。

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活动，促进了全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也促进了人民解放军自身的思想政治建设。

加强基层建设

基层建设是军队建设的基础，搞好基层建设，是加强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1983年7月，中央军委座谈会提出大抓基层的要求。同年8月和9月，总政治部分别在北京和济南两地召开有部分军区领导干部参加的基层建设座谈会，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基层建设的特点和经验。1987年1月，中央军委《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把“做好基层政治工作”，作为做好新时期政治工作八项重要内容之一专门作了规定。同年5月5日至15日总政治部召开全军基层政治工作会议，40多个典型单位在会上介绍了经验。1988年6月，中央军委颁发全军试行《军队基层建设纲要》。尔后，根据形势变化和基层建设的实际，多次进行修改，重新颁发。比较大的一次修改，是在江泽民主席提出“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军队建设总要求以后。遵照这一总要求和根据新时期基层建设遇到的一些新情况，重新修订，于1994年颁发试行，1995年5月正式颁发全军执行。新修订颁发的《军队基层建设纲要》，用江泽民的“五句话”总要求规范和指导基层建设，符合基层建设的客观规律，是基层建设指导上的一个重要突破。新的《纲要》对基层建设的标准，基层经常性的主要工作，基层建设的检查、评比和表彰，领导机关抓基层建设的主要职责和要求作了全面的规定。《纲要》中规定，在基层开展按“五句话”总要求，努力争创先进连队；以“四有”为目标，积极争当优秀士兵的“双争”活动。江泽民十分重视和关心《纲要》的贯彻落实，多次作出指示，并指出《纲要》“是军委贯彻小平同志关于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思想，全面加强基层建设的一个重大措施。”1996年，中央军委又决定，给优秀士兵颁发由江泽民亲笔题名的“优秀士兵”证章。《纲要》的颁布实施，标志着人民解放军基层建设走上了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

全军贯彻《军队基层建设纲要》，出现了你追我赶、争先创优的生动局面。据统计，自1994年《纲要》重新修订在全军试行以来，至1996年7月，两年多的时间，全军共涌现出2万个先进基层单位，近80万名优秀士兵，有力地推动了基层的全面建设和全面进步。

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加强军队干部队伍建设是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保证人民解放军永远忠于党，永远忠于人民，永远忠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键。毛泽东曾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无论是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建设时期，人民解放军都把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文化大革命”时期，军队干部队伍建设受到严重损害。粉碎“四人帮”后，干部队伍建设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问题提到了军队建设的重要

见《解放军报》，1995年10月27日第1版。

位置。

1978年中央军委对干部队伍进行了大规模调整。兵团级和军级领导班子调整的比例为53.2%，军区系统所属的师级领导班子的军政一把手调整的比例为46.7%。清理了混进领导班子队伍中的“文革”时期的“三种人”，纯洁了领导班子队伍，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干部队伍臃肿的问题。但师以上领导班子的年龄老化问题比较突出，1978年底，领导班子的平均年龄统计：兵团级59.6岁、省军区59岁、野战军54.8岁。1980年全军干部大专文化程度只占9%。作战部队主官中受过本级院校训练的，军职占53.1%，师职占31.5%，团职占26.7%。

军队要完成新的历史时期担负的任务，迫切需要解决干部的“四化”问题。1977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了选拔任用干部的四个标准：（1）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斗争中经得起考验；（2）党性强、能团结人，不信邪；（3）艰苦朴素，实事求是，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作风正派；（4）努力工作，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有魄力，有实际经验，能办事的人。概括起来就是德才兼备两个方面，即政治上要听党的话，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有坚定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业务上要有能力，包括有知识、有实际经验、有组织领导才能。

1979年至1982年，中央军委在对各级干部广泛深入考核的基础上，对团以上领导班子作了调整，但班子“老化”和超编问题仍没有完全解决。1983年和1985年结合部队精简整编，对领导班子进行了大规模调整，重点解决干部年轻化和知识化、专业化问题。经过两次调整，军以上领导班子成员年龄明显下降，形成了梯次配备，野战军的领导班子平均年龄下降为47岁；大军区领导班子平均年龄下降为56.1岁，60岁以下的占77.2%；各总部的领导班子分别由60多岁、50多岁、40多岁的干部组成。领导班子的文化程度和专业水平大为提高，大军区级以上领导干部大专以上学历的占60%，经过院校培训的占75%。逐步实现了领导班子的“四化”要求，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开始走上正常升迁调补的轨道。

1992年底，全军高层领导班子又做了一次全面调整，中央军委并作出军队高级领导班子建设规划，使高级领导班子的调整配备步入正规。

1997年3月，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签署命令，批准颁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团以上领导干部职务任免暂行条例》，进一步规范了军队中高级领导干部职务任免工作。中央军委还针对新形势下干部队伍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于1996年初批转了总政治部制定的关于加强中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的规定，重视从政治上、思想上和作风纪律上进一步加强中高级干部队伍建设，更好地保证全军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周围。

与此同时，全军也形成了一套对各级各类干部，经过院校按级分层培训和在职培养相结合的干部培养、管理制度。进入90年代后，人民解放军的干部队伍建设，积极贯彻中央军委指示，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坚持领导干部的学习和培训制度，注重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坚持“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选拔使用干部，使干部的选拔、培训、考核、晋升、交流、奖惩、服役、退役、退休、工资、福利等干部建设的各项环节都有章可循。特别是遵照江泽民关于“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指示，大力加强了领导干部

特别是中高级领导干部政治素质的培养教育，使领导干部在复杂的国际形势面前，在领导军队进行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全面建设的过程中，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始终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保持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一致。

八、武器装备的发展和尖端科技的新成就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及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建设也从全局规划入手开始改革。

1977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军委全会，作出《关于加速我军装备现代化的决定》，提出了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和任务，并明确了陆、海、空军装备和导弹核武器各自发展的重点和要求。要求尽最大努力，抓好新型武器装备的研制和生产，逐步更新现有装备，形成基本上适应现代战争的武器装备体系。

1983年4月，中央军委发出《关于近期我军武器装备的发展方针问题》的通知，要求从实际出发，贯彻缩短战线、突出重点、狠抓科研、加速更新的原则，决定在近期内首先发展陆军主要短缺的武器装备，同时尽力发展空、海军的武器装备，尽力完善和改进战略核武器。次年12月，总参谋部在讨论制订“七五”计划期间武器装备规划纲要时，明确指出：武器装备建设，应服从国家建设大局，从长计议，突出重点，有取舍；多研制，少生产，为后10年振兴积蓄力量；部队装备要新老并存，梯次配备。

依据这些精神，国防科研和生产部门集中人力、物力、财力，研制、生产了一大批性能先进、质量精良的武器装备。同时还不断加强国际技术交流，及时了解国外武器装备的技术水平和发展动向，通过引进生产线、购买关键零部件、直接进口、技术合作等手段，提高武器装备研制、生产能力。经过10多年的努力，不仅较大地缩短了中国与世界技术先进国家的差距，而且还极大地加强了人民解放军在现代战争条件下的防卫作战能力。

常规武器装备的整体水平有显著提高，特别是陆军武器装备，是历史上发展最快、取得成就最大的时期。仅在“六五”期间，研制成功并达到设计定型的主战坦克、榴弹炮、自行榴弹炮、加农炮、火箭炮、反坦克导弹就达130余项。成功改进了原来的坦克而且还自行研制出了性能明显优于原来的主战坦克的第二代主战坦克，同时，还成功地研制出其他装甲车辆，其共同特点是机动性增强、射程增大、弹药品种增多、射速增高、火力密度增大等。综合技术性能均达到国际同类产品80年代水平。

反坦克武器的性能和质量有了较大提高。新型的反坦克炮系统的研制成功，大大地提高了反坦克的威力，标志着中国高膛压反坦克火炮、弹药的设计和制造技术已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

高射兵器的现代化水平也有了较大提高，特别是用于低空和超低空防御的小口径自行高炮，其中某型25毫米高射炮系统，其技术性能接近国际同类武器的水平。

轻武器的发展已跨入了全面提高技术水平的新时期。步枪、冲锋枪、轻机枪等轻兵器已发展成使用同种弹药和零部件的枪族。

在导弹系列的研制中，地（舰）空导弹已从改进第一代武器发展到研制第二代武器，形成超低空、低空、中低空、中高空导弹系列，为陆、海、空三军提供了有力的防空武器。空空导弹也走上了自行研制的道路，成功研制出雷达制导、红外制导等不同类型的空空导弹。反舰导弹（包括舰舰、潜舰、空舰、岸舰导弹）的发展已进入自行研制阶段。在技术上已从亚音速发展到超音速，从液体发动机发展到固体发动机和冲压发动机，从单项制导发展到

综合制导，其中第二代反舰导弹在主要技术战术性能上已接近或达到了同期的世界先进水平。

军用飞机自行研制出亚音速、超音速喷气式歼击机、强击机和高亚音速轰炸机，及侦察机、教练机、无人驾驶机等数十种型号，形成了一套完备的作战飞机的研究、设计、试制、实验、试飞、生产体系。同时，国家在沈阳、西安等地建成军用作战飞机科研基地，着重加强航空兵装备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重点型号的研究，加强技术储备。

海军舰艇及武器装备的发展，走上了自行研制的道路，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研制生产体系。新研制的导弹护卫舰、鱼雷潜艇，以及新型的鱼雷、舰艇和空舰导弹，特别是导弹核潜艇装备部队，使人民解放军海上作战能力提高到新的水平。

军用电子技术研制出一批采用新型元器件、新体制、新技术的较为先进的装备。其中，多波束三坐标雷达、小型化小高炮炮瞄雷达，具有保密抗干扰能力的战术电台、防空自动化指挥系统、空空导弹靶试自动化指挥引导系统筹，技术上达到较高水平。特别是亿次银河计算机的成功研制，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继美、日等少数国家之后，能独立设计、制造巨型计算机的国家。

在战略武器方面，战略核导弹完成了陆基近程、中程、中远程到洲际的系列化，并进入第二代战略武器的研制、试验、定型工作，走上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地下核试验道路。

1982年10月，潜地导弹试验的成功，标志着中国的战略核导弹，已从液体发展到固体；从陆上发展到水下；从固定阵地发射发展到隐蔽机动发射，从而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潜艇水下发射导弹能力的国家。1985年5月，中国首次用机动发射装置成功地发射了地地固体战略导弹，宣告了中国机动发射的固体核导弹的诞生。1988年4~5月，中国第一代核潜艇在南海海域成功地进行了极限深潜、水下高速航行和大深度发射鱼雷的试验。中国发展核武器完全是出于自卫目的。中国在核试验问题上一贯持十分克制的态度。截至1995年底，50多年来全世界进行的核试验达2000多次，其中美国最多，达1030次，前苏联次之，计715次。而中国从1964年10月16日首次核试验起，到1996年7月29日止，总共才进行45次，是核国家中试验次数最少的。中国从拥有核武器时起，就率先向世界宣布，并反复申明：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国还无条件地承诺，不对无核国家或无核地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中国是世界上惟一作出并恪守这一承诺的核武器国家。中国从未在境外部署过核武器，也从未对别国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中国历来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所拥有的极为有限的核武器完全是防御性的。中国积极参加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谈判，并于1996年7月29日郑重宣布：从1996年7月30日起开始暂停核试验。中国作出这一决定，既是为了响应广大无核国家的要求，也是为了推行核裁军而采取的一次实际行动。

中国的航天技术，尽管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并已从试验走向应用。在宇宙太空过游的“中国星”就达20多颗，形成了近地轨道返回式遥感卫星、太阳同步轨道气象卫星和地球同步轨道通信卫星三大系列。卫星发射中心增加到3个，卫星测控网也已建成，其中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不仅具有多星管理能力，而且可与国外测控网联网工作。从总的发展情况来看，中国的运载火箭技术、发射技术、测控技术均已开始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其中在卫星测控、

回收、静止卫星发射、低温材料火箭、大推力火箭、一箭多星技术等方面，已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成为世界上独立掌握航天技术的国家之一。

九、拉萨戒严和平息北京政治风波

1989年春夏，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在西藏拉萨制造骚乱，在北京地区制造政治风波。这两起事件，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进行的社会主义事业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两起事件的性质，都是企图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正如邓小平指出的：“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的”。其“大气候”为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泛滥，尤其是一些西方国家加紧进行思想、政治渗透，竭力支持和扶植各种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反对社会主义的活动，企图动摇和颠覆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小气候”的影响，主要是社会上出现的一股盲目崇拜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否定共产党领导，否定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加之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不坚决，酿成了北京地区的政治风波。经验和教训再次证明，要搞好改革开放，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社会主义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拉萨戒严。80年代中期以来，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在流亡国外的达赖分裂主义集团的支持下，频频在拉萨制造骚乱事件，到1989年3月5日，骚乱达到了极端疯狂的程度，骚乱分子利用数万名僧俗群众在拉萨祈祷大法会（传昭节）之机，打着“雪山狮子旗”，呼喊“西藏独立”等反动口号，在拉萨市主要街道大肆进行打、砸、抢、烧等破坏活动，抢劫商店、餐馆，围攻自治区领导机关，用石块和酒瓶等器具，袭击执勤的公安干警和武警官兵，烧毁、砸坏公安、武警、消防汽车20余辆，并向公安、武警开枪射击，反动气焰十分嚣张。鉴于拉萨市社会治安受到严重破坏，人民生命财产遭到严重威胁，党中央、国务院采取果断措施，作出了对拉萨市实施戒严的决定。

1989年3月8日零时起，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藏部分部队和人民警察部队，奉命对拉萨市执行戒严任务。部队上岗后，坚决执行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命令和指示，严格遵守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在任务紧急、斗争复杂、气候恶劣、条件艰苦的情况下，坚持依法执勤、文明执勤，坚决打击各种分裂破坏活动，为稳定拉萨局势、维护民族团结，捍卫祖国统一，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拉萨市局势逐步稳定后，国务院决定于1990年5月1日，解除对拉萨市的戒严。

平息北京政治风波。

1986年以来，国内一些热衷于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利用一些群众对当时党风、社会风气和物价上涨的不满情绪，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攻击，主张“全盘西化”，并煽动学生闹事。这种情况在1987年曾受到暂时的制止。但当时和后来党的两任总书记，对继续泛滥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制止不力，加之国外敌对势力正加紧推行和平演变战略，通过各种渠道对中国施加影响，以及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泛滥，在国际上掀起了一股猖獗的反社会主义活动的势力。致使国内那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受到鼓舞。

1988年末到1989年初，在若干大城市，特别在北京，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陆续举行意在根本改变国家制度的政治集会、政治上书和其他活动，

酝酿动乱。1989年4月15日，国内、党内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和搞政治阴谋的人，同西方、海外的一些敌视中国的政治势力相互勾结，借胡耀邦因心脏病逝世之机，煽动北京高校学生罢课、游行，冲击中南海新华门，占据天安门广场，成立非法组织，到处串联，并向全国各地扩散，在西安、长沙、成都和其他一些地方还发生了严重的打、砸、抢、烧等违法犯罪活动。

为了迅速平息动乱，稳定局势，4月2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

25日，邓小平对动乱性质发表了讲话，党中央决定采取措施尽快制止动乱。

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指出“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5月中旬，极少数人利用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访华之机，又煽动一些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为了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5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决定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并于5月19日晚在总后勤部礼堂召开了中央和北京市党政军干部大会，号召紧急行动起来，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旗帜鲜明地制止动乱，恢复社会正常秩序，维护安定团结，以保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为了坚决制止动乱，维护北京市的社会安宁和保障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国务院决定，自1989年5月20日10时起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人民解放军旋即抽调部队，协助首都武警、公安干警执行戒严任务。

但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在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的参与和支持下，煽动群众阻止戒严部队进入市区，并肆无忌惮地进行破坏活动，在6月初的几天中，砸、烧、损坏军车、警车和公共电汽车辆1280多辆。其中军用汽车1000多辆，装甲车60多辆。一批武器弹药被抢。武警战士、公安干警负伤6000多人，死亡数十人。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不得不下决心，令驻首都周围的戒严部队，强行开进市区，维护秩序。人民解放军戒严部队和武警部队、公安干警在广大市民的配合支持下，平息了北京地区的动乱，保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之后，戒严部队文明执勤，维护社会治安，恢复首都的生产、生活、交通秩序。从7月开始，戒严部队分期分批逐步撤出，至1990年1月11日，北京地区的戒严全部解除。

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1989年6月9日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的讲话中，对人民解放军执行戒严任务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这是一个考验，考试是合格的。……人民子弟兵真正是党和国家的钢铁长城。……我们这个军队永远是党领导下的军队，永远是国家的捍卫者，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捍卫者，永远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是最可爱的人！”^①

① 参见《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1版，528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十、服从大局支援国家经济建设

国家经济力量是建设和发展国家军事力量的基础。邓小平依据国家经济建设和军队建设的辩证关系，指出：国防的现代化，只有建立在国家整个工业以及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要求军队必须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在这个大局下面行动。全军坚决贯彻邓小平的指示，精简机构，裁减员额。国防工业也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决定，实行“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的方针，支援和参加国家经济建设。各部队在军费紧张的情况下，体谅国家的困难，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建军的优良传统，精打细算，挖掘潜力，积极开展农副业生产和其他各项生产经营活动，以补助部队供应，改善官兵生活，改善武器装备，减轻国家和人民的负担，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裁减军队员额和压缩军费比重

60年代后期，由于人民解放军转入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和担负“文化大革命”中的“三支两军”任务，军队的规模扩大，达到600万人。军队机构庞杂，“肿”的问题相当突出，在1975年“消肿”的基础上，1978年至1984年又多次进行精简，到1985年，人民解放军的员额仍高达400余万人，居世界军队员额之首。“人头费”占了军费开支的绝大部分，国家负担重，也限制了武器装备的更新和发展。

为了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适应形势发展对人民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要求，把有限的军费用在刀刃上，1985年5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减少军队员额100万的决定，并通过了《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减少员额100万的战略行动，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有力量的表现。这一行动充分表明：拥有10亿多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并且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对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6月10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一重要消息。许多国家赞扬中国这一行动，是中国政府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奉行独立自主和站在世界和平力量一边的战略举措。

按照中央军委的部署，全军体制改革、精简整编工作，从1985年下半年开始，依照先机关，后部队、院校和保障单位的顺序，自上而下地组织实施。到1987年，人民解放军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顺利完成了精简机构和裁减100万军队的战略任务。

为保证国家经济建设，1975年至1995年的20年中，国防费占国家财政支出比例逐年下降：1975年17.4%，1985年为10.4%，1995年为8%，下降了9.4个百分点。中国军费同发达国家相比，所占比例很小，差距较大。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统计，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国防费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美国约为6.4%，前苏联约为10%，法国的为4%，德国约为3.1%，印度约为4.2%，韩国约为2.5%。中国从1990年至1994年，国防费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分别为1.64%、1.63%、1.57%、1.36%和1.26%。如果加上国防科研费等费用，这些比例都没有超过1.7%，大大低于上述国家。压缩军费后，军费开支主要用于保障作战、装备、教育训

练、基本建设和军队人员生活改善等方面。员额裁减 100 万和压缩军费比重，有力地保障和支援了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

军工企业转民用生产和开放部分军用设施

为适应改革开放、支援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主动为国家排忧解难，按照中央军委的要求，全军积极参加国家与地方的重点工程建设；腾出部分机场、港口、设备和空闲的营房、仓库、场地等为地方建设服务；全军医院和大部分服务设施向地方开放；军工企业积极发展民品生产等。这些活动的开展，有力地支援了国家经济建设。

军工企业转民用品生产。军工企业是由军队投资、统一计划，实行企业化管理，担负军械、车辆、飞机、舰船、坦克、工程机械制造和修理，军需品、印刷制图、军训器材生产和武器装备修理任务的全军性大中型骨干企业。这些军工企业技术力量较强，生产设备较好。随着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军工企业面临着“吃不饱”的问题，而社会大量需要民用产品。军工企业为了减轻国家负担，同时也为面向社会、面向市场，寻求生存和发展，在保证军事方面需求的前提下，增加民品生产。1979 年军工企业作出了初步尝试，当年军队工厂民品产值就达 2 亿元人民币，相当于 1978 年的 2.5 倍。

1985 年后，军工企业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认真贯彻中央军委和总部关于“军民结合、保军转民”的方针，大力发展民品生产，成绩显著。如 1987 年军工企业工业总产值为 42.9 亿元人民币，其中民用品产值 27.1 亿元，占 2/3，相当于 1979 年的 13.5 倍。

军工企业发挥科技力量比较雄厚的优势，帮助地方进行科技开发，与地方开展经济技术合作，向工农业生产单位转让科学技术成果直接支援国家经济建设。从 1985 年至 1995 年的 10 年中，军队以高科技成果支援国家经济建设项目 1000 多个，解决国家急需科研攻关项目 100 多个，共有 3.5 万项科研成果转为民用，使 320 家面临困境的企业扭亏为盈。到 1995 年，军工企业的民品产值已接近军工企业生产总值的 50%；帮助地方培训各类科技人员 131 万余人。国防科技工业已建成民品生产线 470 多条，遍及 20 多个行业和领域，产品远销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军工企业面向社会，面向市场，调整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如将军队汽车修理厂由过去的单纯维修型向制造型转变，1987 年年产（改装）近万台汽车和达到近亿元人民币的零配件生产能力，使汽车行业向以生产汽车产品为主体的专业化大生产迈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直属的军工企业，积极开拓市场，为军工企业转民用品生产闯出了一条路子。总参测绘局 1002 工厂开发经纬仪、水准仪系列产品，民品产值已达总产值 98% 以上。总政 2601 工厂生产的“井冈山”牌电影放映设备、彩扩设备，在国内外用户中享存较高声誉。总后勤部军需工厂还投资之亿多元人民币，用于纺织、服装、制革、制鞋、钢铁、化工等 61 个项目的技术改造。总后勤部 7407 军工企业工厂，研制的 212 新型系列车桥，作为全军首批仅有的两个工业品名牌，

转引自《当代中国军队的后勤工作》，第 1 版，599，599 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转引自《当代中国军队的后勤工作》，第 1 版，599，599 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向全国推荐。军工企业的民用产品在占领国内市场的同时，积极打入国际市场。如总后 3518 军工厂从 1980 年至 1987 年，共出口胶鞋 3104 万双，产品远销日本、北美和西欧等 20 个国家和地区，获取了较高的经济效益，到 1987 年，全军工厂已出口服装、胶鞋、机电等 100 多种产品，外贸产值达 1.75 亿元人民币。

开放部分军用设施。人民解放军为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支援国家经济建设，自 1984 年以后，利用一些军用设施就便为人民群众服务。1985 年军队建设实行战略性转变后，又将精简整编后闲置的军用设施做了大的调整，解除了部分军事设施的秘密等级，腾出一些机场、码头、港口、铁路专用线、军用通信线、营房、仓库、场地等设施，转交民用或军民结合，以解决国家和地方生产建设的急需。

从 1985 年至 1995 年，经中央军委批准，空军先后向地方开放了大连、宁波、郑州、福州等 101 个军用机场，开辟 700 多条民用航线、44 条国内联航航线，协助地方 300 个县市开通了航空运输业务。海军先后开放和腾出 29 个军用港口、码头，支援沿海港口城市经济建设。全军开放了 100 多个军用仓库和 300 多条铁路军事专用线，不同程度地缓解了铁路部门运输和装卸紧张的状况。为支援国家通信事业，军队向地方提供军用长途线路 257 条，其中，在 1986 年至 1987 年的两年间，军队通信系统为国家机关和经济特区提供长途电话线路和卫星线路 90 余条，使 28 个省、市、自治区的 44 个城市和地区的通信环境得到改善。除此而外，全军还有 100 多个油料设施对社会开放，保障了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营。为方便地方群众治病，军队医疗部门，在确保部队医治伤病员的同时，向社会开放，积极协助地方普查疫情、治疗流行病和地方病，据不完全统计，从 1979 年至 1994 年的 15 年中，共收治地方病人 2.5515 亿人（次），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方群众治病和看病难的问题。

军队部分军事设施的开放，支援了国家和地方经济建设，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为国家节约了一部分基本建设投资，以集中力量进行其他经济建设；有力地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锻炼了军队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能力。

参加国家大型工程建设

改革开放后，全军官兵积极响应中央军委的号召，抽调一定兵力支援国家经济建设。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联合发出指示，要求全军积极行动起来，把参加支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列入部队年度工作计划，统筹安排，切实做出成效。从 1979 年至 1994 年的 15 年中，全军参加支援的工程建设共 8.25 万项。其中国家和省级重点工程 4500 项，主要工程项目有：

公路铁路建设。军队官兵参加沈大、京石、济青、广深、沪宁高速公路和京九、金温、宝中铁路干线、欧亚大陆桥建设等百余项工程，开凿山丘 300 多座，架设桥梁 200 多座，铺设公路、铁路 2000 余公里。

机场码头建设。海、空军工程部队承建了沈阳、深圳、北海、桂林、延安、延吉、邦达等 50 多个机场和惠州、大东港、大亚湾、盐田等 40 余个码头等大中型工程建设项目。

能源建设。人民解放军官兵会战绥中、黄岛、清源电厂，山西平朔煤矿，辽河、胜利、新疆塔里木油田等 300 余项骨干工程。

大型水利工程建设。人民解放军抽出成建制部队投入引滦入津、引黄济青、引大入秦、西藏水库、三峡开发等上千项国家和地方重点工程。

全军还先后参加了北京平谷、上海浦东、厦门九江、苏州工业园等 500 多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被誉为“特区建设的光荣标兵”。

在重点工程建设中，讲科学、讲效益，工程进度快、质量高，受到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的称赞。铁道兵某师和驻天津某师承担引滦入津重点工程建设，预计 3 年完成，仅 1 年零 4 个月的时间即告竣工，工程质量被誉力全国重点工程建设的榜样，并受到中央军委通令嘉奖。济南军区、海军、空军为响应国家把胜利油田建成第二个大庆的号召，于 1984 年抽调 1.7 万余名官兵，承担修建水库、引黄水闸、新建油港等工程建设的艰巨任务，全体官兵团结奋战，只用两年时间就优质、安全、高速、低耗地完成了施工任务。

培养军地两用人才

为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的工作经邓小平倡导深入地开展起来。邓小平认为，培养军地两用人才，这是关系到大局的一个问题。

1977 年 12 月 28 日，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邓小平对全军官兵提出：“军队干部既能在军队建设中发挥作用，到地方上也能发挥作用，打起仗来，又可以在战争中发挥作用，就能成为军队和地方都台用的干部。”士兵“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技术，还要学点数理化，学点工农业知识，学点外语。”邓小平特别强调：今后我们军队只着眼于军队本身建设的需要是不够的，还要着眼千干部、战士转业复员到地方的需要。同时，还要使我们的干部和战士，经过训练后，既能打仗，又能搞社会主义建设。随即，各部队根据军官和士兵的实际和需要，开展了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的活动。南京军区某师、成都军区某团、济南军区某守备团、中央警卫团等，在军官和士兵积极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学习一些简单的民用技术。总政治部和这些部队所在军区及时总结经验加以推广。1982 年 11 月，总政推广了南京军区某师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的经验。1983 年 3 月，总政在江苏南京市、浙江金华召开了第一次全军性的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经验交流会。推广了南京军区某师和成都军区某团等部队培养两用人才的经验。1984 年 9 月，海军在舟山群岛某地也召开了培养两用人才的经验交流会，全军各大单位派人参加。空军、北京军区等单位在会上交流了经验。舟山会议后，全军各大单位把这一活动推向了新的高潮。南京军区某师又总结出了军、政，文、民一体化教育训练的经验。

1986 年 5 月，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及时推广了这个师的经验，并提出：培养军地两用人才要贯彻“以军为主”、“以干部为重点”的原则。从此，军队培养军地两用人才坚持以军队建设需要为主，把培养两用人才工作纳入了教育训练轨道。据不完全统计，到 1992 年底，军队共有 11 万余名军官参加在职高等教育，近 4 万人取得大专以上学历；54 万余名老战士在接受军政训练的同时，参加民用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培训，其中 30 多万人获得军民两用合格或技术等级证书。另外，在两用人才培养中，军队和地方特别重视对农村籍士兵的教育培养，有 260 余万农村籍退伍战士被征聘使用，使农

村籍退伍军人两用人才开发使用率高达 90%，其中有 50 万人担任了乡、村干部，100 多万人进入乡镇企业，12 万人任厂长、经理，其中 1600 多人被省、部级授予企业家称号，3600 多家被评为明星企业；两用人才研制发明的 6487 项科技成果获国家或军队科技进步奖。

培养军地两用人才，是新时期军队建设中的一个新事物，是军队为国家建设输送人才的一项重要措施，很受广大战士特别是农村籍战士的欢迎。

大兴安岭森林扑火救灾和其他抢险救灾

从 1977 年到 1996 年，人民解放军参加了四川、辽宁、陕西、安徽、江苏、湖南、湖北、上海、新疆、河南、河北等地的抗洪；广东、海南岛等地的抗台风；江苏溧阳，云南澜沧、耿马、丽江，内蒙古包头，新疆伽师等地的抗地震，内蒙古、甘肃、四川、黑龙江、新疆、西藏等地的抗风雪斗争，大兴安岭地区的森林灭火等抢险救灾。

1977 年冬，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连降三天三夜大雪，80% 的草原被大雪覆盖，有 100 多个公社和牧场受灾，50 多万牧民和 586 万头牲畜被大雪围困。人民解放军内蒙古军区、空军、铁道兵几千名官兵，经过 40 多天的紧张奋战，使灾情得到了缓解。

1981 年 6 月下旬到 9 月上旬，四川省先后 6 次普降暴雨，遭到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57 个县城被淹，135 个县受灾，受灾人口达 2000 万人，冲毁农田 1756 万亩，因灾停产的工矿企业 3100 多个，受水灾影响的中、小学达 1 万多所，人民解放军出动 21 万多人次，飞机 46 架，汽车 7149 台次。从洪水中救出遇难群众 4.3 万多人，抢救各种物资 10 万余吨。

1987 年 5 月 6 日至 6 月 2 日，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北部地区发生了特大森林火灾。在国家森林资源和人民生命财产遭到巨大损失和严重危害的关键时刻，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和空军部队遵照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命令，先后分五批次调集两个集团军又一个坦克师和部分预备役部队，共 3.5 万余名官兵；空军各型飞机 62 架，地勤和其他保障人员 1.4 万余人；地方配属森林警察 3216 人，民工 3584 人；汽车共 880 余辆，投入扑火救灾。

这次森林火灾是建国以来罕见的，过火面积达 101 万公顷，其中有林面积 70 万公顷。由于气候异常干燥，火势凶猛，死灰几经复燃，给扑火救灾增加了相当的困难。部队官兵和警、民全力扑火，火点多，战线长，大火在最凶猛的时候，火头有的高达十几米，在几十米外都使人感到灼热难忍。救灾官兵同武装森林警察、地方干部、职工和广大群众一道，不畏艰险，顽强奋战，靠双手和简陋的扑火工具，用湿毛巾包住脸钻进火里打，用湿大衣裹着身体往火海里滚，有的组成人墙，堵住火头扑打。一个师担负的扑火任务区，有的正面近 200 公里，纵深达 60 公里。师以下部队以团或连为单位，分点扑火，往往几天几夜连续战斗，且食宿在丛林中。部队大多是“天当被子地当床，一件大衣裹身上”，在积雪未化，冰冻未解的大兴安岭灾区风餐露宿，顽强战斗。各部队先后有 200 余次，1 万余人被大火包围，但官兵们临危不惧、英勇无畏，斩断了一条条火龙。在总面积约 1.7 万余平方公里的火区内，连续同烈火搏斗了 28 天，把火势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此次扑火救灾，共扑灭 1 公里以上宽的火头 1700 多个，开辟防火隔离带近 900 公里，清理 200 米宽的火线 1400 余公里。军民团结战斗，保住了塔河、瓦拉干、盘古、北极村等

城镇、林场和一些重要的贮木场、原始森林及自然保护区。部队官兵抢救疏散群众 1 万余人，并积极帮助灾区人民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沈阳军区某部师长吴长富（“大胡子师长”），接到扑火救灾的命令后，迅速率部赶到灾区，指挥部队奋力扑火，为确保塔河，把大火阻止在呼玛加河以北做出了贡献。某集团军炮团战士何秘书，身患骨瘤，疼痛难忍，仍顽强奋战在扑火第一线，被沈阳军区命名为“硬骨头战士”。官兵们舍生忘死，无私无畏的行动赢得了灾区和全国人民的爱戴。在灭火救灾中，有 1400 余人推迟休假，5300 余人带病、带伤坚持救灾，408 名家在灾区的官兵路过家门而不入，400 余名确定转业的军官义无反顾地奔赴灾区。国务院领导赞誉解放军不愧是爱国家，爱人民，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敢打敢拼，英勇顽强的人民军队。

人民解放军还先后担负抗洪抢险、抗震救灾等任务，1991 年 5 月至 9 月，全国有 19 个省市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特别是江淮地区和大湖流域，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洪涝灾害，全军共投入 75 万人次的兵力，以大批车辆、舰艇、飞机参加抗洪抢险。同时全军各部队积极响应中央军委的号召，向灾区捐款、捐物。至 1996 年，人民解放军空军和成都军区等部队在四川石渠与百年不遇的特大雪灾奋战；向甘肃玉树藏族自治州被风雪围困的 1000 多名藏族牧民空投物资；云南丽江县和中甸县发生强烈地震后，成都军区驻滇部队出动 2000 余人，车辆 500 多台，赶赴地震灾区救灾。1996 年 7 月中旬以来，新疆、河南和河北等地发生洪水灾害。当地驻军积极组织部队奋起抗洪，为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建立了新功。据不完全统计，从 1979 年到 1994 年的 15 年中，人民解放军参加抢险救灾出动兵力共 1380 万人（次），出动飞机舰艇共 3.12 万架艘（次），出动车辆机械共 89.8 万台（次），抢救转移遇险群众 3100 万人（次），抢救各种物资 2357.8 万吨。人民解放军在抢险救灾中做出了巨大贡献。

十一、参加国际军备控制和维持和平行动

参加国际军备控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军备控制与裁军作为维护世界和平和各国安全，减少战争危险的积极措施，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重视。

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当时联合国还没有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但仍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了我国对军备控制的真诚愿望和主张。1963年7月，为反对美国、苏联和英国签订的歧视性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我国政府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我国在发表的声明中提出了全面、彻底、干净、坚决地禁止和销毁核武器的主张，并倡议召开世界各国政府首脑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为了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同时也为了更有力地参加国际军备控制斗争，我国于1964年10月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旋即在当日的声明中郑重宣布：我国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我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完全是为了防御；我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我国一贯认为，争取实现国际间的军备控制，尤其是消除核战争的威胁，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工作，需要全世界各国进行共同努力。对此，我国作出了持续的努力，特别是自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曾三次派高级代表团参加联合国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以及“联合国裁军与发展的关系”国际会议。在这些会议中，我国代表团多次强调：裁军和消除核战争威胁的问题，关系到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和平和安全，对于这样重大的问题，全世界所有国家，不论大小、不论有否核武器，都应当有同样的发言权。进入80年代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两大主题。我国确立了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施了战略性转变。我国的发展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而一个繁荣稳定的我国会更加有利于世界的和平。我国在参加联合国的事务活动中，坚定不移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为国际军备控制作出努力。

1987年，我国作为东道主同联合国合作在北京召开了“世界裁军运动”区域讨论会。我国响应联合国的号召，就裁军问题进行了广泛宣传，在全国范围开展“国际和平年”、“裁军十年”等活动。我国曾多次派人参加由联合国主持的有关研究裁军和安全问题的专家组、讨论会，认真负责地力拟订公正合理的研究报告作了自己的贡献。90年代以来，我国在联合国的事务活动中，积极维护国际和平、安全与稳定，高度重视军备控制，一贯反对军备竞赛，主张各国通过军备控制与裁军减少和消除战争危险。我国提出了为促进公正、合理、全面、均衡的军控与裁军，国际社会应遵循的六项基本原则：

(1) 各国应遵守《联合国宪章》，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宗旨和原则，以及有关的国际法准则，在国际关系中消除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2) 裁军的最终目标是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包括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全面禁止外空武器，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削减常规军备；(3) 要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只有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此类武器才能有效防止扩散；

(4) 国际军控与裁军的实行不得损害任何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不得使用

见《人民日报》，1995年11月17日。

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不得干涉任何国家的内政；（5）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应严格管制敏感材料、技术及军事装备的转让，停止不负责任的武器转让；（6）各国应赞同、尊重并支持国家间根据地区的实际情况，在自行协商、谈判和自愿协议的基础上采取的军控与裁军措施。上述基本原则，中国在军控问题上不仅首先承诺，而且还承担在军控与裁军领域所负的国际义务和责任，其国防建设的出发点始终以为促进人类的和平与发展来考虑的。中国始终坚持军备只用于防御的原则，不搞任何形式的军备竞赛。

中国在参加国际军备控制的同时，对自身的军备控制做了多方面的努力，多次裁减军队，其中1985年一次性裁减100万；削减各种火炮、坦克、飞机、舰艇等武器装备1.4万余件；国防支出始终控制在确保国家安全所需的低水平上。在当时冷战尚未结束，美苏裁军谈判长期未果的情况下，中国采取单方面大规模的裁军行动，不仅有力地促进了东西方两大集团减缓军备竞赛的势头，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而且使世界各国增进了相互信赖的气氛，改善了军备控制与裁军环境，为推动国际军备控制与裁军进程作出了积极贡献。

对核能出口、化学生物武器和常规武器贸易方面，中国一贯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在核能出口方面，中国支持《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关于防止核武器扩散、推进核裁军进程和促进和平利用核能国际合作的三大目标。1992年中国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后，严格履行条约关于保障监督等各项义务，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进行充分合作。中国的核出口由政府指定专门公司经营，有关政府部门对出口申请逐案审批。中国出口的核材料和核设备均提交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在核出口方面严格遵循三项原则：（1）仅用于和平目的；（2）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监督；（3）未经中国允许不得向第三国转让。中国从未出口过铀浓缩、后处理和重水生产等敏感技术。在化学、生物武器方面，中国虽是民用化工大国，但对可用于生产化学武器的化学品及其技术和设备的出口持慎重、负责的态度，不出口以制造化学武器为目的的化学品及其技术和设备。对生物武器，中国既反对任何国家生产生物武器，也反对任何国家以任何方式扩散此种武器。中国认真全面地履行所承担的《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的义务，并从1987年以来，逐年向联合国报告与公约有关的资料 and 情况。为了加强常规武器的贸易管理，在国务院、中央军委领导下成立了由外交部、总参谋部、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和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等部门负责人组成的国家军品贸易管理委员会。该委员会是武器装备及其技术转让的统管机构，负责制订转让的法规和政策。该委员会的办事机构为国家军品贸易局，负责处理日常事务。中国在较长时间里没有武器装备的出口贸易，直到本世纪80年代初才开始出口，并参加了联合国常规武器转让登记，其出口情况表明，中国的常规武器出口同美、俄、英、法、德等国相比，数量甚微。中国对常规武器转让也坚持三项原则：（1）武器出口应有助于接受国的正当防卫能力；（2）武器出口不损害有关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3）武器出口不利用军贸干涉主权国家的内政。中国在军品贸易方面奉行的原则和做法，对于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的稳定，对于推

见《人民日报》，1995年11月17日。

见《人民日报》，1995年11月17日。

动国际军备控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维持和平行动。在联合国的事务中，参加国际维持和平行动，保障世界和平与安全，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一项重要任务。1948年，联合国向中东地区首次派出维和军事观察员。到1997年6月共有76个国家派出过维和军事观察员，进行了43项维和行动。中国根据联合国的要求，参加了联合国的维持和平行动，使世界各国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军队，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受到了联合国的好评。

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是在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的领导下，由总部有关部门具体组织实施。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派出军事观察员；二是派出军事工程部队。

中国派出的联合国军事观察员，是从各总部机关、海空军、各大军区及军事院校抽调有一定外语水平、会驾驶车辆、有较好军政素养的军官担任。从1990年开始，中国每年向联合国派出军事观察员，到1997年6月止，共派出约500人次的联合国军事观察员。他们分布在中东、伊科边境、西撒哈拉、莫桑比克、利比里亚和柬埔寨等亚洲和非洲的6个国家和地区，执行一年或半年时间的维持和平任务。其中中东地区是中国最早派出军事观察员的地区。根据联合国的安排，到1996年底，除柬埔寨和莫桑比克解除任务、人员撤回外，中国还有向中东、西撒哈拉、伊科边境和利比里亚4个国家和地区的派遣任务。中国在上述地区执行维和任务的军事观察员约有40人。中国联合国军事观察员担负维持和平任务的国家和地区，大都是经过长期战争、条件异常艰苦的地方，主要任务是观察和巡逻，监督敌对双方或单方遵守联合国规定，以维护本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他们经历了战争危险和恶劣自然环境的考验，以坚强的毅力和敏锐的洞察力完成了联合国交予的任务。当他们在战后有很多雷区的地区巡逻时，置生死于度外；当他们在一望无际的伊科边境的大沙漠巡逻时，要克服65至70的高温。他们以自己的行动，为中国军人争了光。

中国在向联合国派遣军事观察员执行维和任务的同时，于1992年4月至1993年9月止，向柬埔寨派遣2批800余人的联合国军事工程部队。入柬后，他们在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司令桑德森中将的指挥下，完成了一项项艰巨的任务：抢修柬埔寨通往世界的唯一海港——磅逊至金边的4号公路，使联合国部队1.5万余名官兵，8000台车辆、成千上万吨物资，运进柬埔寨各地；抢修柬埔寨通往世界的唯一航空港——波成东国际机场，修复停机坪，新建雷达基座、油罐平台，使联合国的各型飞机把维持和平的人员、物资，紧急空运到柬埔寨各地；抢修金边通往泰柬边界的6号公路，为37.5万难民早日返回家园开辟通路；他们以一个月的高速度，高质量地修复了位于金边400余公里的柬埔寨东北部的上丁机场。在完成上述任务中，中国军事工程部队经受了异常恶劣的自然环境的考验：在雨季的泥泞道路中、在密布着数不清的地雷区施工作业，度过了由于当地饮水、食品严重污染，仅靠联合国直升机等运输供给的困难日子，同时，战胜了致命的传染病的威胁。柬埔寨内部派系斗争激烈，且土匪众多，中国军事工程部队有时一面施工，一面还要与土匪战斗。中国军事工程部队在柬埔寨的战斗作风受到联柬司令官桑德森将军的赞扬，他指出：中国工兵是一支作风勇猛、战斗力强、富有牺牲精神和正义感的精锐之师。

中国不论是在军备控制方面还是在维持和平行动方面，都做出了自己的

努力，为人类的和平和进步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从 1976 年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到 1997 年人民解放军建军 70 周年的 20 年时间，是人民解放军历史上发展的重要时期。人民解放军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迅速完成了拨乱反正，肃清“文化大革命”给军队建设造成的消极影响，实现了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全面开创了军队建设的新局面，胜利完成了保卫祖国安全和领土完整的任务，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新的重大贡献。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认真贯彻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按照“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军队建设总要求，为打赢现代条件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全面建设部队，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结束语

中国人民解放军自 1927 年 8 月 1 日南昌起义诞生以后，已经走过了 70 年的战斗历程。人民解放军的 70 年，是全心全意为民族和人民的利益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 70 年，是战胜千难万险不断发展壮大的 70 年，是为保卫祖国、维护世界和平付出巨大牺牲、建立丰功伟绩的 70 年。

70 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解放军与全国人民一起，前仆后继，英勇奋斗，战胜了国内外的强大敌人，夺取了政权，巩固了国防，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并且为世界的和平和发展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与此同时，人民解放军在长期建军和作战实践中，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水平不断提高，逐步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人民军队建设的道路，由一支弱小的、单一军种的军队发展成为诸军兵种合成的、具有一定现代化程度的强大的人民军队。

70 年来的历史表明，人民解放军无愧是一支人民军队，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中坚力量，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是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力量。中国革命的事实证明，“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为中国的民族解放和人民的幸福而奋斗的历程中，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两个历史阶段。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人民军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达 22 年的革命战争，终于战胜了国内外强大的敌人，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出了伟大贡献。1927 年 8 月到 1937 年 7 月的土地革命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深入开展土地革命，以游击战、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一次又一次地打败了国民党军的“进剿”、“会剿”和“围剿”，并在反“围剿”斗争遭到严重挫折的形势下，进行了战略转移——长征，使革命转危为安，开始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在这个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消灭了近百万国民党反动军队，战胜了内部的“左”、右倾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不但形成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而且形成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为全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1937 年 7 月至 1945 年 8 月进行的全国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由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外爱国侨胞广泛参加的全民族的抗战。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人民军队实行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根据国共两党协议，主力红军奉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八路军、新四军、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和东北抗日联军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开展了广泛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人民军队是坚持抗战的中坚力量，敌后战场逐步发展成为抗日战争的主战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百余年来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所取得的第一次完全的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45 年 9 月至 1950 年 6 月进行的全国解放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胜利而进行的一次伟大的人民革命战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革命力量同反革命力量进行的一场大决战。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下，人民解放军以自卫战争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随后转入战略进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适时发起战略决战，举行战略追击向全国进军，消灭了数百万国民党军队，解放了除台湾、澎湖、金门、马祖等少数岛屿以外的全部国土，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开创了历史的新纪元。从此，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变成了真正独立、统一的国家，中国人民成为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胜利，主要是依靠我们党所领导的完全新型的与人民血肉相连的人民军队，通过长期人民战争战胜强大敌人取得的。没有这样一支人民的军队，就不可能有人民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

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是人民解放军发展的初级阶段。人民军队是中国共产党所缔造和领导的。三湾改编、古田会议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为把这支由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在作战和军队建设实践中，特别是在先后两次由游击战争向正规战争实行军事战略转变过程中，军队的正规化水平不断提高。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制定，各种法规、条令、条例的颁行，随着战争进程而实行的一次又一次整编，加强了全军的集中统一，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人民军队创建之初，武器装备极其简陋，大多靠战场缴获，在较长时间内，只有以步兵为主的单一的陆军。在战争中，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程度逐步发展。到解放战争后期，人民解放军已经发展成为一支有 500 余万人的，以步兵为主体，拥有一定数量的炮兵、工程兵、通信兵、铁道兵和装甲兵的强大的陆军。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人民解放军的地位、任务和所处的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民军队成为国家的武装力量，其根本任务由夺取政权转变为巩固国防，抵抗侵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维护世界和平。人民解放军是党的军队、国家的军队和人民的军队。建国后 48 年来，人民解放军在以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能，保卫了祖国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自身建设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从 1949 年 10 月新中国成立，到 1978 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 29 年中，人民解放军与党和人民共命运，在由低级向高级阶段的发展中不断前进。军队建设虽然受到一些干扰破坏，但仍然取得重要成绩，为保卫祖国、建设祖国作出了贡献。

人民解放军英勇地保卫了国防，保卫了人民的和平劳动。1950 年 10 月至 1953 年 7 月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是以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军民一道进行的一场反侵略的正义战争。它粉碎了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扩大侵略的计划，保卫了中国的安全，维护了亚洲和世界和平。新中国成立后的 20 多年中，人民解放军还先后进行了粉碎台湾国民党军窜犯大陆作战，击落入侵中国领空的美国飞机作战，援越抗法、中缅勘界警卫作战、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援越抗美、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严惩入侵西沙群岛的南越军队作战等等。

人民解放军积极参加和支援了社会主义建设。许多铁路、公路、桥梁和厂矿等重点工程建设项目，都洒下了解放军指战员的汗水；各次重要抢险救灾中解放军都发挥了突击骨干作用。

人民解放军的自身建设，在这个时期已由低级阶段进入了高级阶段。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即提出“建设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的口号。1953年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确定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一支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的总方针和总任务，这是党对军队建设所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经过精简整编，加强技术军兵种建设，人民解放军完成了由以步兵为主的单一陆军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转变，这在人民军队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50年代，军队先后颁发了《内务条令》、《纪律条令》、《队列条令》等三大条令以及其他各种条令、条例，实行了义务兵役制、薪金制、军衔制三大制度。全军实行了正规和统一的教育训练，初步形成了初、中、高级互相衔接，各军兵种专业相配套的干部培训体系。群众性的练兵热潮广泛开展，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和协同作战能力。武器装备方面，50年代初期开始仿制外国武器；60年代中期基本实现了陆军装备国产化；70年代中期基本实现了海、空军装备国产化。以核武器为代表的尖端武器的研制在60年代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原子弹、氢弹、中程运载火箭、核潜艇等先后试制成功，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的国防力量和国际地位。

在这29年中，人民解放军的发展道路并不平坦。其间主要是多次受到“左”的错误的干扰和破坏。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这样长时间、全局性的“左”的错误中，军队建设和各项工作遭到严重挫折和损失。但是，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的19年，人民解放军的建设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提出新时期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的理论及一系列方针政策。1985年，人民解放军实现了军队建设指导思想上的战略性转变。1989年江泽民任军委主席以后，人民解放军建设又有新的发展，为探索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进行了必要准备。这19年，人民解放军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成就：明确了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总目标，总要求，确立了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进一步加强，政治工作有了新的发展；加强质量建军，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全军多次进行精简整编，改革体制，裁军百万，组建了合成集团军，在精兵合成、提高效能的道路上不断前进；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确立了以军事训练为中心，以战斗力为标准的方针，部队的协同作战、快速反应、电子对抗、后勤保障等能力有了增强，驾驭现代战争的能力明显提高；完善法规制度，依法从严治军，颁布了一系列有关军队和国防建设的法律法规、条令条例，全军现代化建设水平进一步提高，正规的战备、训练、工作和生活秩序不断完善，各项工作在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上不断前进；坚持科技强军，发展武器装备，部队的现代化程度得到了明显的提高；军队的后勤建设、国防后备力量建设也取得了显著成绩。

70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的一切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全军官兵团结战斗的结果。

70年来，人民解放军在建军作战中积累了丰富的宝贵经验。

第一，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

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一切听从党的指挥，是由人民解放军的无产阶级性质决定的，是解放军的建军之本，胜利之本，是最重要的历史经验。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反映了党与人民军队的本质联系，是人民军队成长和发展的基本规律。人民解放军自诞生之日起，就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这就决定了它必然接受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军队要有高度的纪律性和集中统一性，这也就要求它更加自觉地服从共产党的领导；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只有在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才能清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团结成为一个坚强的整体。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在斗争实践中逐步确立和发展起来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反动势力特别强大，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没有丝毫政治权利，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在中国共产党的幼年时期，对军队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致使大革命遭受失败。血的教训告诉人们，领导革命战争，“惟有共产党”，“共产党这种绝对领导权，是使革命战争坚持到底的最主要条件。”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和人民军队，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党领导了南昌起义等一系列武装起义，人民军队由此诞生。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不断加强。1927年9月秋收起义部队进行的三湾改编，确立了党对军队领导的制度，为建立一支党领导下的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1929年红军第4军召开的古田会议，从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和各项制度，会议通过的决议，成为人民军队建设的伟大纲领。古田会议决议规定，军队中要建立党的“领导中枢”，重大的问题经党委会讨论，一成决议就需坚决执行。以后，总政治部在指示信中又进一步提出“提高并巩固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保证红军中对上级命令的执行与巩固红军的纪律。”长征途中，党中央召开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这在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次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党中央对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指出：“中国工农红军，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惟一的、绝对的领导下，生长和发展起来的。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工农红军，就没有苏维埃革命运动。”

毛泽东在总结这段历史经验时深刻指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不容许枪指挥党。”在由国内阶级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转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但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坚决反对党内“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观点，挫败国民党企图控制和消灭人民军队的阴谋，使人民军队保持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恢复和健全党委制，实现了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高度集中统一。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明确指出，“我全军将士必须时刻牢记，我们是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只要我们时刻遵守党的指示，我们就一定胜利。”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成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最高指挥权仍然属于党中央、中央军委，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和制度得到巩固和加强。在党的领导下，人民解放军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文化大革命”中，林彪背着党中央和毛泽东，试图“指挥一切，调动一切”，

江青一伙也插手军队，想把军队变成他们实现个人野心的工具。正是党中央和毛泽东一次又一次识破并粉碎了他们的阴谋，才使人民解放军保持了无产阶级的性质。70年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克服千难万险，无往而不胜的根本保证。没有党的领导，就不会有真正的人民军队。

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必须坚持在长期革命战争和和平建设中逐步确立和发展起来的党领导军队的一系列根本制度，即军队应完全地、无条件地置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容许闹独立性，不容许任何个人向党争兵权，不容许其他政党在军队中建立组织和进行活动；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属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它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军队的一切活动都必须符合于共产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军队成员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军队中建设和进行党的政治工作，以保障党中央在政治思想和组织上对军队的领导；坚持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坚持在团以上部队设置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坚持“支部建在连上”等等，这都是人民军队建设历史经验的精华，是保证党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的系统而完备的措施。

邓小平曾经指出：“我确信，我们的军队能够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性质。这个性质，是党的军队，国家的军队，人民的军队”。江泽民也指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是人民军队特有的政治优势。在新的历史时期，必须更好地发扬人民军队忠于党的优良传统，使军队永远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这些重要论述，是对人民军队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充分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质要求，是人民解放军必须永远坚持的建军原则。

第二，必须坚持开展强有力的政治工作。

军队的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在军队中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是人民解放军的生命线，是军队建设一系列基本原则得以贯彻实行的重要保证，开展革命的政治工作，是保证实现党的纲领路线，克服一切困难，战胜一切敌人的法宝，是人民解放军特有的政治优势。在历次革命战争中，人民军队之所以能够“以弱胜强”，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开展了坚强的政治工作。

人民军队创建之初，党面临着把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改造成具有无产阶级性质的、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大任务。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了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1929年“古田会议决议”，肯定和总结了三湾改编以来的经验，奠定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基础。1934年2月，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苏区中央局书记和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的论断。1944年，毛泽东、周恩来主持起草的留守兵团政治部《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重申了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指出：“政治工作是我们军队的生命线，无此则不是真正的革命军队。”1954年4月，毛泽东在审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时，亲笔加上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中央军委对军队政治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和规定，使之更加制度化、规范化。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和发展，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理论原则、措施方法，形成了

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在人民军队的建军作战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进行革命的政治工作，必须坚持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人民解放军来自人民，忠于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解放军区别于任何剥削阶级军队的根本标志。在南昌起义的政治纲领中，就曾明确规定，要“实行土地革命，废除苛捐杂税，维护工农利益”。古田会议决议指出，红军必须树立为人民打仗，为人民建立革命政权的无产阶级思想。抗日战争中，毛泽东为追悼张思德，作了《为人民服务》的著名演讲，强调：“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紧紧地 and 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解放战争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规定：“本军是中国人民的军队，一切以中国人民的意志为意志。”在革命战争年代，全军官兵为了人民的利益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写下了辉煌壮丽的篇章。正是因为开展深入的政治工作，加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教育，才使全军官兵为了共同的阶级利益和远大的目标团结在一起，形成无坚不摧的战斗集体；才使军队与人民群众之间保持着鱼水般的密切联系，得到广大的人民群众衷心爱戴和支持。这是人民军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

进行革命的政治工作，还要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原则；实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发扬爱国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选拔任用干部，坚持对高中级干部的教育管理；发挥政治工作者以身作则的模范作用等等。

几十年来，人民解放军依靠强有力的革命的政治工作，加强自身建设，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保持了人民军队的性质，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军队的贯彻执行，保证了军队内部和外部的团结，保证了指战员具有二不怕苦三不怕死，英勇顽强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保证了作战、建军等各项任务的胜利完成。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人民解放军正按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要求，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组织官兵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学习江泽民关于军队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入开展“四个教育”，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保持政治上的坚定性和思想道德上的纯洁性，加强军政、军民、官兵团结，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积极走在全社会的前列。这是政治工作在新时期的新发展，必然越来越显示出它作为人民军队建设生命线的重要作用。

第三，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军队建设和作战实行正确的战略指导。

实行正确的战略指导，是人民军队战胜强大敌人，并使自己不断壮大发展的基本条件，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作出关于革命战争和军队建设的战略性决策。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开辟，对人民军队的生存和发展，对人民军队战胜凶恶敌人，夺取全国胜利，具有极大的战略意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势力相当强大。他们长期控制着中心城市，实行残酷的军事独裁统治。这就决定了弱小的革命

力量不能首先从城市发展起来，并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要坚持奋斗下去，准备积蓄和扩大自己的力量，避免在自己的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就必须在农村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借以在长期的斗争中，使革命由局部走向全局胜利。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在斗争中逐步开辟了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在井冈山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随后，其他各革命根据地也相继建立和发展起来，形成星火燎原之势。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深入敌后，与当地党组织相结合，先后创立了有1亿人口的19个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进一步加强解放区建设，为开展人民战争，完成战略任务，创造了重要条件。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开辟，对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对夺取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胜利，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和平建设中，党还领导人民军队依据各个历史阶段的不同情况，适时进行军事战略转变，以促进作战、军队建设和各项工作的开展。民主革命时期，人民军队先后进行了三次重要的军事战略转变。土地革命战争中期，进行了以由游击战向带游击性的运动战转变为主要内容的军事战略转变；抗日战争初期实行了由运动战到抗日游击战的军事战略转变；抗日战争后期到解放战争时期，实行了由抗日游击战争到国内正规战争的军事战略转变。社会主义时期，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实行了战略重点的转移，提出了建立强大国防军的任务，明确了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总目标，使军队建设逐步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中央军委基于对国际形势的科学分析，于1985年决定在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上实行战略性转变，由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到和平时期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以后，又提出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的战略方针，以及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即在军事斗争准备上，由打赢一般条件下局部战争向准备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转变，在军队建设上，由数量规模型和质量效能型、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的指导思想。历次重要军事战略转变，是革命战争和人民军队发展的重要关节点，具有全局性的影响和根本性的意义。

第四，必须实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人民军队的战略战术，是在人民战争和人民军队的基础上，总结作战的丰富经验逐步形成起来的，反映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客观规律，是人民军队克敌制胜的法宝。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等从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出发指导红军战争，并在战争实践中逐步总结作战经验，使之形成系统的理论。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的红军游击战中，毛泽东、朱德等提出了带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奠定了人民军队战略战术体系的第一块基石。经过三次反“围剿”作战，红军全部作战原则就形成了。其要点为：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慎重初战，集中兵力，实行速决战、歼灭战、运动战等作战原则，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了坚持持久战的总方针，提出了与之相适应的具体作战方针和原则，即：在战略上是内线的持久防御战，在战役战斗上必须实行外线的速决进攻战；

要善于根据战争发展的不同阶段，正确地运用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三种不同形式；抗日游击战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具有战略地位；人民军队的作战方针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等依据战争发展进程，提出了人民解放军进行解放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和原则。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在战略防御阶段，要坚持积极防御，实行运动战，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当条件成熟时，果断抓住机遇实施战略进攻，将战争引向敌方区域，将进攻的主要方向指向敌人要害而薄弱的地区，外线与内线、进攻与反攻紧密配合，互相呼应，构成战略进攻的总形势；适时举行战略决战，就地各个歼灭敌军重兵集团；在战略追击中，实行大迂回、大包围或穷追猛打的方针，将革命进行到底。解放战争中，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这是人民解放军战略战术思想的理论结晶。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坚持了敢于斗争，后发制人，争取战略主动权的思想；采取了“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总的战略指导方针和“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打小歼灭战；发挥运动战和夜战特长，最大限度地限制敌人现代化技术装备效能的发挥；适时转入阵地战，以阵地战为主要形式；组织全面对空防御，进行群众性对空斗争等等。毛泽东指出：“十大军事原则，是根据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初期的经验，在反攻时期提出来的，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运用十大原则，取得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十大原则目前辽可以用，今后有许多地方可以用。但马列主义不是停止的，是向前发展的，十大原则也要根据今后战争的实际情况，加以补充和发展，有的可能要修正的”。在建国后人民解放军在巩固国防、保卫人民政权、对外支援的历次作战中，战略战术思想又有了许多新的创造。

在新时期，邓小平一再强调，要依据现代战争的不同情况，努力探索现代战争的规律，研究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创造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新形式、新战法。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提出了新时期的军事战略指导方针，领导全军实行两个根本性转变，这就促使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战术思想，进一步发生新的变革，以迎接世界军事发展的挑战。今后，人民解放军将坚持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巩固国防，捍卫领土和主权完整，对敢于入侵我国领土、领海、领空的侵略者坚决予以自卫还击和打击。

第五，必须加强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使军队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

加强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使人民军队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是由军队建设的一般规律决定的，也是由中国的国情、人民解放军的军情决定的。人民军队创建之初，力量非常弱小。在革命斗争实践中，逐步加强现代化建设，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开创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建设强大的人民军队的道路。

革命战争年代，人民解放军的建设还处于低级阶段。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只有以步兵为主的单一的陆军，武器装备极其简陋，主要靠战场缴获。在极端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党中央、中央军委十分重视提高军队的现代化水平。毛泽东曾一再指出：“革新军制离不了现代化”，并说，军队建设和作战的正规程度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由中国型的，变为世界型的。随着战争的发展进程，部队的武器装备逐步改善，技术军兵种也逐步建立发展起来。

解放战争后期，已经发展成为一支以步兵为主，拥有相当数量炮兵、工兵和少量通信兵、铁道兵和装甲兵的强大陆军。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解放军建设进入了高级阶段。人民解放军成为国家的军队，既对军队现代化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为这一要求的实现提供了巨大的现实可能性。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在英勇的经过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他还说：“我们的陆军、空军和海军都必须有充分的机械化的装备和设备。”在上述方针指引下，50年代，人民解放军先后建立了海军、空军、防空军、公安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通信兵等军兵种领导机关及其所属部队，逐步完成了由单一军种向诸军兵种合成的历史性转变。

60年代中期第二炮兵建立，战略导弹部队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个新的兵种，是军队发展史上的一个飞跃。与此同时，国家逐步建成了独立的国防工业体系，部队的武器装备迅速发展。通过进口、仿制和自行研制，全军装备实现了制式化、国产化。60年代中期试验成功了原子弹、氢弹，研究成功中程运载火箭，打破了国际上的核垄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民解放军建设又迈出了新的一步，加强了诸军兵种合同作战的整体能力，全军在精兵合成、平战结合、提高效能上前进了一大步。常规武器和战略武器的发展，都取得重大进展。武器装备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增强了人民解放军的整体实力，为赢得未来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支现代化的革命军队，不仅要有科学的编制体制，高质量的武器装备，而且需要具有高素质的人。在战争年代，人民解放军官兵素质的提高，主要靠实战，同时，也进行一切可能和必要的军事训练，毛泽东总结人民军队的练兵经验，把“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作为十大军事原则之一。同时，人民解放军的院校教育也逐步发展起来。战争是一所伟大的学校，而学校又推动了伟大的战争。实战和训练增强了官兵的军政素质，推动革命战争一步步走向胜利。在和平时期，官兵军政素质的提高、人和武器的结合，主要靠院校教育和部队训练来完成。训练、教育和管理，是部队最经常、最大量、最重要的工作，提高部队战斗力的根本手段。新中国成立后，军队院校和部队训练几落几起，与军队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事实说明，切实搞好教育和训练，才能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使人民军队沿着现代化的道路不断前进。

在新时期，邓小平一再强调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随着改革不断深入，全军训练更加科学、系统和规范化。部队实现了三个转变，即从重点抓单兵的训练转到重点抓干部的训练；从重点抓打步兵的训练转到重点抓打坦克、打飞机、打空降的训练；从重点抓单一兵种的训练转到重点抓合同训练。海湾战争后，军队训练围绕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逐步实现四个转变，即从主要研究一般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作战，转到主要研究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作战；从重点研究战争初期内陆地区坚守防御为主的作战，转到重点研究沿海、沿边地区机动进攻为主的作战；从主要研了顶设战场、长期准备的作战，转到主要研究快速反应的作战；从主要研究以陆战为主的合同作战，转到主要研究海空作战比重增大的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所有这些，都大大提高了部队适应现

代战争的能力。

1996年人民解放军在东南沿海等地举行的一系列军事演习，展示了部队的训练水平和实战能力。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军委一再强调，要立足现有装备战胜高技术装备的强敌，这是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的基本出发点。对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新的历史时期，军队建设的中心是现代化建设。为迎接世界军事发展的挑战，要千方百计把部队的武器装备搞上去。坚持自力更生，坚持科研先行，缩短战线，突出重点，促进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建设。要继续积极稳妥地进行体制编制的调整和改革，以“精兵、合成、高效”为原则，使军队建设朝着规模适度、结构合理、指挥灵便的方向发展。要继续把教育训练摆在战略地位，提高官兵军政素质，以适应现代条件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需要。要加强后勤建设和改革，适应军队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进一步增强后勤保障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在未来的反侵略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第六，必须加强军队的正规化建设。

军队正规化建设是革命化、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条件和基本保证。没有必要的正规化建设，军队就不可能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就不可能完成好所担负的各项任务。

民主革命时期，人民军队从实际情况出发，不断提高部队的正规化程度。1930年人民军队开始实行第一次战略转变，在正规化建设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各地红军游击队分别集中，按照三三制的原则组建正规红军，进行运动战。随后，成立了方面军，建立了全军统一领导的指挥机关——红军总司令部及其所属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供给部。《中国工农红军纪律暂行条令》、《奖惩条例》、《中国工农红军内务条令》等相继颁发，红军的正规教育电进一步发展起来。抗日战争中，人民军队虽然进行的是敌后游击战争，但并没有忽视随着战争推移，逐步向正规化、现代化的方向发展。毛泽东曾经指出：“不懂得正规战争是解决战争最后命运的关键，不注意正规军的建设和正规战的研究，就不能战胜日本。”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人民解放军实行了由抗日游击战争到国内正规战争的战略转变，编组野战兵团，加强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的建设，使人民军队的正规化水平得到了空前的提高。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人民解放军总部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党中央强调加强请示报告制度，“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成为全党全军的行动准则。全军实行统一整编，建立了四个野战军和华北军区。这些都为夺取全国胜利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了以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和培养加强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为主要内容的军队正规化建设的要求。50年代，人民解放军颁布了《内务条令》、《纪律条令》、《队列条令》三大条令，实行了义务兵役制、薪金制、军衔制等制度，同时，还制定了一批适应当时情况的条令、法规，使人民解放军在作战、训练、工作、生活秩序等方面有规范和依据可循，有效地提高了部队正规化水平。但是，在六七十年代的一段时间内，人民解放军建设受到“左”的干扰和破坏，影响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发展进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建设边开了新的步伐。改革体制、依法治军、从严治军，颁布军事法规和条令条例，严格按照条令，

条例和规章制度管理部队，全军官兵正规化意识和法制观念不断加强，部队正规化水平大力提高。事实说明，加强部队正规化建设，其革命化、现代化建设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第七，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实行人民战争。

人民战争是人民解放军进行革命战争的根本指导路线。“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无论是在民主革命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斗争，都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实行人民战争。这是人民军队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所向披靡的根本原因。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初创不久的人民军队人数少、武器差，但一次又一次粉碎了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围剿”，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进行人民战争。在各次反“围剿”作战中，红军实行主力红军与地方红军相结合，正规红军和赤卫队、游击队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使在整体上占优势的敌军，在局部上转为劣势；苏区人民参军参战，支援红军，在敌军进攻时坚壁清野、封锁消息，红军“处处明亮”，敌军“处处黑暗”，显示了人民战争的无穷威力。毛泽东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提出了实行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在艰苦的对敌作战中，人民军队与广大人民群众密切结合，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建立主力军、地方武装和民兵游击队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以军事斗争为中心，把各种斗争形式结合起来，打击敌人，迅速壮大了人民的力量。经过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由抗战初期的9万余人，发展到有120万正规军，260余万民兵；革命根据地由原来仅有近200万人口、13万平方公里面积的陕甘宁边区，发展到拥有1亿多人口、100多万平方公里面积的19个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是一场空前广泛的人民战争。解放区人民全力支援前线，与人民解放军并肩作战；国统区人民掀起了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潮，国民党蒋介石处于全民的包围之中。在解放战争各次重大战役战斗中，人民群众的支持都起到了重大作用，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人民战争的胜利。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次军事斗争中，人民解放军继续坚持人民战争的军事指导路线。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在党和政府的号召下，全国人民掀起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运动，这是志愿军出国作战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志愿军在朝鲜作战中，尊重朝鲜人民，遵守朝鲜政府的法令，与朝鲜军民紧密团结、密切协同、互相支援，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建国后人民解放军在各次军事行动中，相信人民、依靠人民，进行人民战争，保证了作战的胜利。人民战争是人民解放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

在未来的反侵略战争中，人民解放军要立足现有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最根本的一条，仍然是依靠人民群众，进行人民战争。战争现代化的程度提高了，人民战争的指导思想不能变。另一方面，在现代条件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实行人民战争又要根据现代战争的新特点和新要求，努力探索人民战争的新途径和新规律，更好地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

70年来，人民军队历史经验的精华，集中体现在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的理论、江泽民关于军队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领导革命战争和和平建设的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与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军事理论——毛泽东军事思想。这是全党全军牺牲奋斗的结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原则，总结人民军队建设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经验，根据现代战争的要求，精辟地论述了军队建设中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方针和原则，形成了新时期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思想。这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大发展，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就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采取了许多重要措施，在理论和实践上又有了许多新的创造。所有这些，都是指引我们进行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指引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理论指南。

先进的军事理论，历来是军队建设得以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是战争的重要制胜因素。以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国防建设的理论和江泽民军队建设一系列论述为代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科学理论，本质上是一个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军事思想体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些科学理论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为我们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应该坚持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代领导核心确立的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的理论为指导，紧密结合中国人民解放军建设的实践，借鉴世界军事理论的有益成分，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勇于创新，把中国的军事科学理论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70周年的时候，历史正处在世纪之交。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时期。当前国际形势虽然趋于缓和，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还未得到改变，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面临着一系列严重的挑战。在新形势下，人民解放军肩负的历史使命是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祖国，保卫人民和平劳动，维护世界和平。要坚决保卫国家领土、领海、领空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祖国统一和安全；自觉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积极支持和参加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同时，全面加强军队建设，使人民解放军沿着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道路继续胜利前进。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确定的新时期的军事战略方针，是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为此，人民解放军的各项建设和一切工作，包括军事训练、政治工作、后勤保障、国防科研等，都将在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的指导和统揽下，周密规划，全面部署和深入展开。全军的各项建设和一切工作，都服从、服务于这一战略方针的需要，都力确保这一战略方针的实现而展开并力争切实取得成效。人民解放军将继续加强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积极参加和支持国家经济建设，自觉维护社会稳定，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跨世纪的宏伟目标，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实现作出应有的贡献。

70年英勇奋斗；70年成就辉煌。人民解放军将与全国人民一起，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周围，坚持邓小平建设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思想，为完成党和人民所赋予的历史使命而努力奋斗。

后 记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七十年》一书，是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根据军事科学院领导的决定，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七十周年而撰写的。由军事历史研究部部长林登泉，副部长曾庆洋、支绍曾领导撰写和修改，经军事科学院审查并批准出版。

参加本书撰写的人员是：陈伙成、陈力（第一章），李昌华、林治波、高连生（第二章），周宏雁、江英（第三章），刘志青、郭志刚（第四章），齐德学（第五章），李士甲、郭志刚（第六章），杨贵华、朱少军（第七章），邓礼峰、陈奇勇（第八章），谢国钧、柴中国（第九章），谢国钧、江英（结束语）。本书精装本有《中国人民解放军七十年大事记》和插图。参加撰写《中国人民解放军七十年大事记》的人员是：陈力、高连生、温瑞茂、齐德学、郭志刚、李士甲、朱少军、邓礼峰、柴中国，第一至第三章文中插图由李辉编选；第四至第九章文中插图由谢国钧、李士甲、邓礼峰、柴中国、陈奇勇编选。

在林登泉和曾庆洋、支绍曾主持下，刘国语、齐德学等同志参加了全书的提纲制定和修改定稿工作。

在本书撰写和修改工作中，军事科学院和院有关部门的领导、总参谋部有关部门的领导和同志给予了大力的指导、支持和帮助。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姜思毅和有关专家林蕴晖、陈伯江、曾岩、王法安、穆显奎等对第四至第九章的撰写和修改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军事科学出版社的领导和责任编辑张健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在这部书中，编者试图对中国人民解放军七十年来所走过的历史道路和所取得的光辉业绩、历史经验作一个完整的叙述，并为此作了很大的努力，但难免有不当或不周之处，恳切地希望全军同志、广大读者，特别是军队和曾在军队工作过的老同志给予批评指正。

